新发现的周恩来

司马清扬&欧阳龙门

目录

内容简介

周恩来是神？是鬼？还是人？无论如何，周恩来作为中共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人物，对于中共的创建、政权的夺取以及执政，所起到的作用和地位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周恩来的兢兢业业的形象，非常符合世俗的道德传统。特别是去世后的周恩来，又被中共树立为道德楷模，被请上「神坛」。而在当今互联网上，又有人把周恩来打入「地狱」。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是非功过」。本书用大量的史实来论证周恩来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周恩来是否真的是「参天大树护精华」？周恩来的检讨到底是为谁而作？周恩来在建国后什么时候成为真正的大管家？在打倒彭德怀、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少奇、逼走林彪等中国建政以后诸多重大事件里，周恩来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至于令人「谈虎色变」的中共中央项目组，周恩来在其中的角色到底如何？「批林批孔」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真实关系如何？

本书依据众多知情人的口述和档案材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并对诸多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大量的史实考证的基础上，提出许多新的看法与思路。诸如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想拿掉周恩来，而取代周恩来的人选一直以来则是邓小平等等。

周恩来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作为一个无法超越历史条件限制的人－「政治家」存在。而这个存在，是有代价的……由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立体的、完整的、真实的周恩来形像。

作者简介

司马清扬：曾用名蓑笠翁，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在网络和电子杂志诸如《记忆》等上发表多篇文章，计有四十多万字，曾经被一些颇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书籍引用，专长于中共党史，特别文革时期的研究，被《亚洲周刊》评价为对「林彪一案」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者之一，参与过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林彪》的编写。

欧阳龙门：在美国从事信息技术工作。业余爱好中共党史，尤乐于为中共官方党史拾遗补缺，纠错澄清，使之更加完善、全面。偶有帖子发于网上，也参与过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林彪》的编写。

序言：千秋功罪任评说－－解析“文革”中的周恩来

丁凯文

友人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新近撰写了《新发现的周恩来》，这是海外研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一部新的力作。承蒙作者的信任，笔者有幸先睹为快，愿就周恩来“文革”作用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行文仓促，草成此序，还望不负作者和读者们的期望。

对于周恩来的评价，国内与海外本来就有很大的争议。国内党史学界自然是秉持官方一贯的说法，将周恩来美化为“圣人”，是上个世纪的“伟人”，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正面人物”，是“苦撑危局”的中流砥柱，是“文革”正确路线的代表。本人手头就有几部代表官方观点的专著，一部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周恩来传》，一部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武生撰写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还有一部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石仲泉撰写的《我观周恩来》，国内类似颂扬周恩来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不知凡几。不同于国内官方观点的海外著述，当推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其价值有目共睹。海外因《晚年周恩来》一书的出版曾掀起了一股重新评论周恩来的热潮，一些文章亦不乏真知灼见，但也难免有些粗制滥造的坊间读物充斥其间，为学术界所不取。总体而言，这几年间海外有关周恩来的研究并未有更为深入的进展，究其原因，不外缺少相关的内部档案数据，而所披露者又多为歌功颂德，不少“文革”中的当事人按官方的口径对周恩来隐恶扬善，鲜少触及那些敏感话题；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难于对周恩来其人有准确和全面的把握。然而，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广泛地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文革”中周恩来的言行、作用作了极为深刻的剖析，将周恩来许多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人们对“文革”中的周恩来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笔者对此深表赞赏。

笔者曾经撰写过有关周恩来“文革”作用的文章，深知重新评论周恩来的难处。海外著名政论家胡平先生在论述周恩来时言：“评周最难。评周之难，不仅在于我们对其行为难有全面的了解；评周之难，尤其在于我们对其处境难有准确的把握。”胡平先生进一步阐述说：“邓小平也说，周在文革中‘经常要说一些他不愿意说的话，做些不愿意做的事’。问题是，周的言行哪些是违心，哪些是本意呢？我们总不能说，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坏的都是违心是无奈。……关键在于，周在中共体制中究竟处于何种境地？周顺从毛，有几分是主动，几分是被动？主动意味着什么，被动意味着什么？考虑到周本人正是该体制的缔造者之一，上述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评周确实相当困难。尽管说人们对毛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评毛的分歧多半源于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在评周的问题上，即便是持有相同价值标准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１）笔者对此论述深表赞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全面认识、理解“文革”中的周恩来呢？

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层关系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探讨：

（一）“文革”中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在“文革”当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是周恩来从事及处理一切其它要务的首则，是所有相关线索中的最为关键的主线，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其它问题也就不难搞清了。

从历史上来看，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有过一段曲折的变化过程。在北伐战争和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都曾高于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前后排斥过毛泽东，以致毛泽东被罢黜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

得不开始大转移——“长征”，周恩来对此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周恩来在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重返红军的领导岗位，后来在延安亦支持毛泽东斗垮了张国焘。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整垮了王明，成为中共党的实际领袖，周恩来更是洗心革面，努力、深刻地检讨自己以往的错误，最终得到毛泽东的宽容而留在中央高层，但是其党内地位则降到刘少奇之后。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一直从旁协助毛泽东，仅仅扮演了幕僚的角色，未曾单独主导过全党或某一个大区的工作，这一点远不如同一时期的刘少奇和林彪等人。事实上自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在党内就一直是个辅佐最高领导人的角色，终其一生没有变化。中共建国后发生的几次党内斗争，周恩来都毫无保留的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维护毛泽东的权力和地位，并与其它中共领导人一起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了解这段历史在于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这段曲折变化的关系是周恩来日后的一块心病，周当年在苏区执行了所谓的王明路线，排斥过毛泽东，这就成为周恩来一生当中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也是周恩来后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政治上异常小心谨慎的最重要的原因。了解这段历史即可了解周恩来在“文革”当中对毛泽东的态度。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可以用“两个坚决”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坚决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从未就“文革”的发动、发展提出过任何重大的方针、政策，一切均唯毛泽东马首是瞻，举凡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政策，周恩来无不立即表态支持和拥护，从无异议，更不用说反对了。举例来说，早在１９６５年夏季毛泽东就已开始着手军队内部的部署，开始作所谓“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工作。在１９６６年5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发表了一篇“防政变”的讲话，周恩来对此心领神会，随即予以支持和响应，在5月２１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与林彪讲话内容完全一致的讲话，不仅称赞林彪讲话讲得好，还提出“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２）还如，１９６６年１０月1日，王力等中央文革笔杆子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社论中首次提出毛泽东自己审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提法，周恩来由于没有参与其间，故似乎并未进入状况，遂询问王力：党内涉及路线问题时过去都是提左倾或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和“反动路线”的提法。周对此感到心里没底，随后以小学生的姿态向毛请教，得到毛的答复后，周最后心悦诚服地对毛说“我懂了”。（３）再如，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初号召各地造反派造反夺权，特别是“上海一月革命”后夺权之风日盛，周恩来在1月１４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的讲话中说：“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的。”（４）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些情况在在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持的是坚决拥护和支持的态度。至于“文革”期间周恩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更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唯恐不合毛泽东的旨意。王力回忆说：“对周总理，毛主席不满意……但毛主席对周总理还能合作，因为周总理向来是主席一讲他就马上拥护。总理自己讲他是管策略的，搞战术性工作。”（５）“文革”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具体处理，从“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到中共“九大”之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九一三事件”到中美外交关系的和解等等，周恩来可以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在具体的工作中，大到“三支两军”的部署、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国防、外交，党内斗争人员的处理等，小到革命样版戏里的台词、唱腔、身段、服装造型等等，无一没有留下周恩来的身影和辛劳。这已经有太多的回忆和文字予以记载。可以说，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都由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毛泽东自己甚至说过：“不管

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离不开总理。总理不能当第一把手，可是谁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他。”（６）换句话说，这些能当一把手的人都离不开周恩来在具体事务上的操办，“文革”当中的周恩来将这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周恩来是坚定的毛派、左派、革命派，是属于“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周恩来“文革”当中的所做所为实为真心实意，不能简单地以所谓“违心”一词予以解释。邓小平日后用所谓“违心”一词为周恩来作开脱，根本就是罔顾事实的一个遁词，与真实的历史完全不符。搞清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厘清了所有复杂政治关系当中的这条主线，也就不难理解周恩来“文革”当中的所做所为了。

（二）周恩来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关系

周恩来“文革”期间对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态度，实际就是周恩来对毛泽东态度的延续。虽然“文革”当中江青有过数次想整倒周恩来，但是周恩来对江青却是一如既往地尊重、关怀、照顾、忍让，乃至迁就、纵容。在“文革”初期，毛泽东通过非正常的手段突出江青的政治地位，使江青一鸣惊人，周恩来揣摸毛意坚持提名陈伯达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陈伯达顺势提名江青出任副组长（７），江青由此一跃而成为领导“文革”运动的中央领导人。

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８日接见北京各院校师生员工时颂扬江青说：“这俩年来她搞文化大革命是很辛苦的，取得了很大成绩”，同年１１月２８日在文艺界大会上，周恩来再次说：“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８）据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邱会作回忆说：“过去的中央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在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在主持……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过去碰头会开会之前，周恩来总要谦恭地问江青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不点头不搭话，周恩来一般不会马上宣布开会。……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是江青这个‘霸王’呈威风的地方。凡是要经过碰头会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江青不点头不能算数。”（９）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几乎从来不否定他们的意见。”而江青却蛮横地指责周恩来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吴法宪最后说：“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维维诺诺不敢犯颜。”（１０）这一时期的周恩来沦为中央文革的走卒。此时的周恩来还为江青办了不少私事，包括江青一些无理要求，如江青要求派人到上海抓捕当地的公安干部，周恩来随即布置派人把所谓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抓起来，并把这些材料统统收到北京。（１１）中共“九大”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林彪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有了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的大力支持，周恩来在政治局内部有了较为坚实的组织基础，不必事事都看江青的脸色行事了，但依然不敢真的触动江青，对于来自江青的指责和攻击，周恩来也只能私下叹气，惶论与之斗争。１９６９年底到１９７０年５月，江青曾四次背着周恩来私下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发泄自“九大”后对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专门诽谤和攻击周恩来。邱会作回忆说：“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作笔记。他非常难过地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是仁至义尽，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可以说是无

微不至，坚持照顾她几十年呵，人不能不讲良心呀。’”（１２）林彪倒台后，“文革”极左派们在毛泽东的扶植下开始把持中央，而周恩来则缺少了来自军队老干部的支持，政治势力大不如前。中共“十大”召开前，周甚至只能作“造反派新秀”王洪文的辅佐人。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导演，江青亲自上阵的评法批儒事件，更使周恩来陷入空前的危难之中，若非检讨及时，自我作践，以及身患不治之症，周恩来还真有可能过不去这个坎，周恩来怎么可能会如后来邓小平所拔高的“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二月逆流”中的叶剑英、谭震林和陈毅，庐山会议上的林彪以及后来搞了整顿的邓小平，都曾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作过斗争，但是很快就被毛泽东毫不留情地赶下了台，林彪甚至还命丧异域，唯独周恩来却总能全身而退，因为周恩来心里十分清楚，江青这伙人是不能随便触动的，一旦触动了红朝女老板江青这个“文革”图腾，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那么在毛泽东眼皮底下一天都混不下去，只能招致自己的迅速毁灭，周恩来当然明晰这层利害关系，这也就是周恩来极尽“保持晚节”和顺守之道的根本原因。

在政治上，周恩来决不敢与江青作对，生活上则对江青呵护备至。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如处理江青身边医疗事务，委派医生、护士，解决江青的私人纠纷等。可以说，周恩来对江青的照顾、关怀无微不至。如果让江青自己也写一份回忆周恩来的记述，其内容绝不亚于周恩来对其他老干部的关怀和爱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邱会作回忆说：“周恩来对江青的认识与众不同，认为‘江青问题’是关系到全党的‘政治大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会影响全党全国的大局。因此周恩来对江青处处关照、爱护、帮助、忍让，甚至有时有些放任，只要她不闹事就好。”（１３）邱会作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列席者和后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成员，他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非常具有史料价值。周恩来不仅对中央里的老干部多有关照，对于那些在地方造反起家的“文革”新秀亦是如此。张春桥在上海的亲信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多年后也曾深情地回忆说：“我对周恩来怀着一种对待自己父辈一样的感情，是有着特殊原因的，我觉得他待人十分平等，而且对年轻干部特别关心和爱护。”徐景贤通过几件小事描述了周恩来对他的关爱，徐最后说：“我从心底里尊敬周恩来，也牢记他对我的厚爱。（１４）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还提名徐景贤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对于远在上海的徐景贤，周恩来尚且关爱有加，相信近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能得到周恩来的关怀与照顾了。至于周恩来与康生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内战之时共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工作，那时他们就形成了密切的友谊，“文革”期间周恩来与康生的关系更加密切，“文革”期间江青确曾多次向周恩来发难，但我们从未见到康生予以响应。有数据说康生病逝之前曾强拖病体单独与周密谈，如非关系密切是绝不会有此现象的。

总的来说，周恩来对江青和“文革”极左派们的态度是以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为前提的。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必然要信任和重用这批人，周恩来也自觉自愿地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不仅在政治上步步紧跟，同时也在生活上处处加以关照，对这批人的态度其实也就是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的延伸。显然，周恩来做到了面面俱到，得到大多数人的称道和爱戴。

（三）“文革”中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

“文革”期间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同样也是以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为态度的。但是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又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之间的关系大有不同。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加以论述（１５）。概括而言，从历史上来看，林彪长期以来就是周恩来的学生和战友，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从第一次国共内战到红军长征，从抗日战争到第二次国共内战，周

恩来与林彪都经历了那段出生入死、如火如荼的岁月。林彪自１９５９年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就一直大力支持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更形密切，在中央内部的军队一方和江青“文革”极左派等人的矛盾中，在“文化大革命”的很多具体问题上，周恩来都是靠向军队一边，也就是靠向林彪一边。

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称颂。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在各种场合都坚决拥护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革”中周恩来发表的讲话里就曾反复称颂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副帅”，甚至在中共“九大”上周恩来还发表长篇讲话，从历史讲到现实，大力歌颂林彪。周在党内地位原本一直都高于林，但是为了树立林彪接班人的形象，周恩来甘为人下，以此成为全党的表率。第二，周恩来对林彪极为尊重。周恩来不仅在公开场合注意突出林彪的地位，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也同样向林彪作汇报，有时甚至毛只交代周办的事情，周也向林彪通报，表现出周恩来很强的组织观念。王力以自己的亲身观察说：“总理对林彪还是很尊重的。”第三，周恩来对林彪的保护。庐山会议上由于林彪发起的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批判，引发了毛泽东的不满。周恩来连夜为林彪修改讲话稿，甚至致信康生帮助修改，并说“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党，忠于领袖。”（１６）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庐山上向毛进言，请毛在《我的一点意见》上去掉吴法宪的名字，同时周也帮助吴法宪写检讨，保护了吴法宪暂时没被打倒。下山后周更设法帮助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诸人检讨过关。周恩来明白，保护了军委办事组也就保护了他们背后的林彪。第四，周恩来对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大力支持，其中涉及军队的战备工作、国防工业建设、对外军事援助等。“九大”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始逐步步入正轨，取得了许多傲人的成绩，如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研制成功等。军队投入“三支两军”的工作也顺利展开，不仅稳定了全国的局势，且迅速恢复了由于“文革”运动造成的生产停滞，使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第五，周恩来与林彪之间有着长达四十年的深厚友情，用“生死之交”来形容亦不为过，两家关系也十分密切，高层人士之间对此也是十分了解的。

反过来我们再看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林彪长期以来就支持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文革”期间亦然。林彪领导下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了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主军之时，还是黄永胜、吴法宪的军委办事组当权之际，军队不仅从未参与过中央文革的倒周活动，而且大力维护周恩来的执政地位，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林彪明示军委办事组诸人

要尊重、支持周恩来的工作，甚至在江青恶意攻击周恩来时，林彪不怕得罪江青，要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并向周恩来及时通报。正是由于周恩来与林彪相互尊重与支持，且政治理念一致，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在“文革”期间处于最佳时期，而这恰恰是现在官方所刻意回避和掩饰的。

（四）周恩来与其它中共老干部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周恩来与其它中共老干部之间的关系也是以毛泽东的态度为态度。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决接班人的问题。然而，这场运动却是要由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再由下层普罗大众自下而上完成所谓的“夺权”斗争。这里首当其冲的就是党的各级干部，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到基层党支部书记都属或被批判、靠边站或被打倒被夺权之列，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影响之巨都创造了历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干部当属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干部当属被冲击却要“烧而不焦”之列，

这些无疑都在毛泽东的全盘考虑之内，有时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更要根据他们在“文革”中的具体表现加以区别对待，而周恩来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这一重要的角色。

“文革”结束后，不少中共老干部都曾深情地回忆周恩来对他们是如何保护的。笔者不否认周恩来的确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过、关照过一批老干部。但是保护和关照的前提却是要看毛泽东、江青的脸色行事，绝非周恩来自己能擅自作主。比如邓小平这位刘少奇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毛泽东并不想将其彻底打倒，而是区别对待，将邓小平与刘少奇分割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适当的关照。刘少奇、邓小平虽属同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只有打倒了刘少奇才能证明“文革”运动的及时、正确，但是邓小平原本就是毛泽东的自己人，是毛泽东曾经属意的接班人之一，“文革”前邓走到刘的一边，引发毛的不满，需要整一下，但是毛并不想彻底整死邓小平。外边大批、特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邓小平本人却还住在中南海，安然无事，并未遭受刘少奇那般摧残和折磨，后来因为对苏战备，邓被“疏散”到江西，但却住进了将军楼，还有夫人、子女、秘书等生活在一起，并未遭什么罪。这些当然是出自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负责实施而已。王力回忆说：“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１７）

这里我们还必须论及周恩来与中央项目组的关系。据王力回忆，大约在１９６６年的5月中央成立了项目组，这是与中央文革小组并列的机构，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项目组下设四个分组，分别有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安子文负责，而周恩来就是这些项目组的总负责人。以后这些项目分组的负责人有所变化，但是周恩来却一直担任这个总负责人，直到去世。中央项目组在其成立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也搞了不少类似的项目组，其存在期间搞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案子，这些案子可以说，毫无例外都是冤假错案，这实际是中共极左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周恩来作为这些项目组首要负责人当然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具体而言，对于那些被打倒的高层人士，都必须有毛泽东、周恩来的签字、批准。何人应被软禁在家、划地为牢，何人要被软禁在北京卫戍区或送到外地隔离看管，以及何人要被关进秦城监狱等，这些都要由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刘少奇是毛泽东“文革”运动当中首要被打倒之人，周恩来对此心知肚明。在对刘少奇的处理方面，周恩来是很严厉的。刘少奇先被在自己家中隔离起来，划地为牢，再交由“群众”批斗，随后受到中央项目组的审查，以至后来刘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以及转移到河南开封而死于当地，周恩来对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贺龙是毛泽东“文革”开始时一直防范的人物，随着刘邓倒台，贺龙也被毛泽东批准隔离审查。据知情人透露，对贺龙，周恩来则是自己直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贺龙被软禁在国务院西山象鼻子沟的战时指挥所，由周恩来的卫士长杨德中直接管理。贺龙因病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死，周恩来要负最主要的责任。另据知情人士披露，罗瑞卿是“文革”爆发前即被毛泽东打倒的军队领导人，罗瑞卿“文革”中的医疗管理也由周恩来直接负责，解放军总医院就罗的治疗事宜只向周恩来一人报告，其它人均无权过问。解放军总医院只能提出医疗方案，但无权决定，所有治疗均需经过周恩来的批准方可执行。如果说罗瑞卿因为不能得到及时的医疗而导致腿部残疾，这不是正说明了周恩来应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吗？“文革”中军内造反派曾经对罗瑞卿进行过残酷的武斗，甚至用箩筐将罗抬致批斗会场。罗瑞卿当时由中央警卫团负责看管，若无毛泽东、周恩来的许可，罗瑞卿不可能被拉出去批斗惨遭迫害。其它中共高干则根据情况被分别关押在秦城监狱，如安子文、陆定一等，他们在狱中都受到非人的折磨和迫害。此外黄吴李邱这几位林系大将，在“９１３事件”后被送到北京市卫戍区隔离关押起来，这也是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所

办。这里我们只举这几个最典型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是全盘政策的决策人物，周恩来则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具体执行之。

整体而言，周恩来在毛泽东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人，其中包括不少党外人士，还有一些毛泽东并不想真正打倒的人。当然在处理过程中，周恩来也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适当的关照，但是总体的政治格局是不可能改变的。然而往往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关照"却颇能打动人心，不少曾经惨遭迫害的中共高干"文革"后都曾深情地回忆起周恩来是如何"保护"他们的，但是却从不具体追究这些冤案是什么人主持制造出来的，而那个时候的周恩来又在哪里，他们只是笼统地把一切罪责归结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罗瑞卿至死都不忘周恩来的一句"珍言"："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１８）。对照罗瑞卿一案的整体过程和周恩来在其中的所做所为，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画面啊！

通过上述几个部分对周恩来"文革"中几个最主要的关系的论述，周恩来"文革"中的整体轮廓和脉络也就十分清晰了。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主要依靠的就是三个人：江青在前台指挥造反派为毛泽东打倒自己的政敌而冲锋陷阵，林彪指挥解放军为毛泽东的"文革"保驾护航，而周恩来不仅负责贯彻、执行毛泽东"文革"的各项战略部署，且负责保障"文革"运动顺利进行的经济基础，一身兼任了毛泽东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周恩来在军队事务上的发言权有时甚至大过林彪，如"三支两军"一事上，周恩来所起的作用就远远大于林彪。正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拥护者，同时又是最得力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再加上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大力支持，周恩来成为中共高层中一个无可轻易取代的人物。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善于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及时杜绝任何可能形成的危险，把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点，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他人而保存自己。虽然，周恩来在"文革"中也偶遇危难，但却总能及时地化险为夷。最关键的一点是，周恩来更善于隐忍，机巧地把握好与毛泽东、江青的政治关系，永远把自己摆在臣子、属下的地位，对于来自毛泽东、江青的批评、指责甚至诋毁、谩骂，从不会公开说"不"，且时时处处地检讨自己以往的错误，唾面自干，向毛、江输诚表忠，甘于作毛、江的奴才和工具。这正是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在那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笔者认为，国内官方的御用史学家们对周恩来的那些正面论述和评价有些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邓小平的是非为是非来论述历史，以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准，按照党的意志来解释历史。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曲解、篡改历史的处境当中。以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为例，当１９８０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邓小平将周恩来定性为"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而将林彪定性为"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１９８１年6月中共中央按照邓小平定下的调子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提及周恩来时该决议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显然不是真实的历史。历史证明，周恩来在"文革"中顾全的并非国家的大局和人民利益的大局，而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大局，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局；周恩来为了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同时也是为了自保，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点名打倒了很多老干部，其数量之多丝毫不亚于江青、康生

等人；所谓“周恩来与林彪、江青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一说，更是一个天方夜潭。对于邓小平的“违心”之说，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显然是不认同的，陈伯达说；“人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周总理有时也说了些错话，现在说他说了违心的话，违心的话是有的，我也有过。可是人不可能经常说违心的话，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原因，当时就是那样一种认识。”（１９）“违心说”不仅不能减轻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责任，反而使周恩来堕落成一个没有人格的软骨头和伪君子。通过前文的论析，我们对周恩来“文革”中的作用就会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可喜可贺的是，司马清扬和欧阳龙门的这部新书，将周恩来“文革”当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一面，特别是官方史学家刻意掩盖的周恩来的面目作了细致、深入的剖析，诸如周恩来与中央项目组、周恩来与“清查‘五?一六’”的关系等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弥补了这些方面过去研究周恩来的不足。《新发现的周恩来》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这些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追寻历史的真实，亦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在文革史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笔者期盼此书的出版为世人深入研究、探讨周恩来另辟蹊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文革史的研究。

注释：

（１）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载《北京之春》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２）《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　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２００６年版。

（３）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版　第９４８页

（４）《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２００６年版。

（５）同注（３）第７１１页。

（６）同注（３）第７２４页。

（７）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第８１页。

（８）《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８日，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２００６年版。

（９）邱会作回忆稿、谈话稿，转引自程光《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田园书屋，２００７年３月版　第６１３页。

（１０）《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９月版　第６８０－６８１页。

（１１）《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９月版　第７０６页。

（１２）同注（９）第６３２页。

（１３）同注（９）第６１８页。

（１４）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1月版　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１５）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２００７年３月版。

（１６）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明镜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４月版　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１７）同注（３）第９２２页。

（１８）罗瑞卿《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回忆周总理》，见刘武生、徐晓红编《评说晚年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9月版　第４４页。

（１９）同注（７）第２６７页。

导言

作者将从历史的角度来描述和分析周恩来的另一面。这个另一面是为中共官方的政治宣传有意掩盖、有意忽视的一面；这个另一面也是为一些崇敬周恩来的人所不了解、或者即使了解了也不愿意面对的一面。（本书作者之一也曾经是这样的人）

如果说中共官方以及一些虽非官方但是有着和官方相同看法的人描述的都是周恩来的光辉的一面的话，那么他们会认为作者描述的都是周恩来的「阴暗」的一面。但是，作者并不这么认为，作者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地描述和分析那些「光辉的一面」所遗漏的史实。

作者不否认，有关「光辉的一面」的描述中有一些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作者不再去重复这些事实。因为已经有大量的、连篇累牍的书籍、文章对此加以描述、渲染、甚至夸大。而对于「光辉的一面」的描述中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加以夸大和歪曲的说法，作者会根据史实予以指出。所以作者所描述的另一面也可以看作是对「光辉的一面」的一个补遗。

作者所采取的历史的角度不同于政治的角度，尤其不同于政治宣传的角度。历史的角度首先考虑的是事件的真相：事件是「有」还是「没有」，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发生的环境，什么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政治的、宣传的角度首先考虑的是在政治斗争中取胜，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是拥护或反对现政权。有时仅仅是为了某一集团在某一时刻

的利益、有时甚至在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之间做出错误的判断。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就要对历史事实加以剪裁、拼凑、甚至歪曲以便说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但是，为了利益集团的政治路线服务而描述历史也有它的的尴尬：每当利益集团的政治路线变化的时候，对历史的描述就只好重新改写。而在周恩来的一生当中，党的政治路线是经常而剧烈地变动。对此我们都能表示理解，我们不去和他们争论他们的目标，我们只是要指出历史事实和他们的某些说法不同。

作者所采取的历史的角度不同于道德的角度。道德的角度常常要区分「好人」和「坏人」，而一旦区分了「好人」和「坏人」之后便有「好人干好事，坏人干坏事，好人不会干坏事，坏人不会干好事」之类的推论。他们尤其需要树立一个道德上的「楷模」、「圣人」，为此就要「为尊者讳」。例如有人认为：不管你怎么说，周恩来就是我心目中的好人。对此我们也表示理解，我们也不去和他们争论。我们只是指明周恩来说过哪些话、做过哪些事，而有些话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好人」应该说的，有些事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好人」应该做的。而且随着人们知道的史实越多，要「讳」的东西也就越多、越难。刘少奇有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那么套用一下，我们说：「林彪、江青有好就说好，周恩来有不好照样说不好」。至于说周恩来他是「违心」还是「有意」，是「迫不得已」还是「助纣为虐」，则各人可以有不同的结论。

作者还要指出的是：以政治人物作为道德楷模是十分靠不住的，也是十分不可取的。

本书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以编年的形式，从时间的发展看周恩来的另一面；第二部分是以专题的形式，从具体的个案看周恩来的另一面。

本书第一部分首先在第一章「七千人大会以前：在权力斗争中挣扎」里描述了在「高、饶事件」之后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人一起「反冒进」，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反『反冒进』」，而且毛泽东对他们三人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高饶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在此次斗争中，周恩来和刘少奇连手「逼宫」成功。　周恩来在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过程中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勇气，同此密不可分。１９５６年6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冒进」的文章实际上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起草的。　甚至周恩来可以在会后对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但是自１９５８年初，毛泽东就对周恩来开始轮起大棒，周恩来不得不多次检讨。此等状况不同于周恩来在延安时期的检讨。此时周恩来明白无误的知道自己是对的。此举开创了自己正确还要检讨的恶劣之先河。周恩来如此的地位在正确的前提下还要检讨，那其它人又有什么选择呢？如果说在延安是要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做检讨，那么此时的周恩来做检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周恩来再次劝说意见正确的彭德怀做检讨。至少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在政治上做出了选择：跟从毛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周恩来在其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远远比不上他在政治上跟从强者的选择。此时的周恩来彻底完成了自延安以来的自我异化。毛泽东是不能怀疑的，是只能顺从的，做一个永远忠于毛个人的战士。　柯庆施曾经说过：「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当时中共党内高层，自「反『反冒进』」之后，真正始终如一地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位。由此作者要强调的是

自「反『反冒进』」以后，毛和周的关系在双方的心目中、在实际上明确地形成了「君臣关系」。从此以后周恩来完全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如彭德怀等遭到整肃，下场如此悲惨，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像周恩来那样完成从过去的同志关系、战友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向「君臣关系」的转变。

彭德怀在庐山被整肃，周恩来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周明明都同意彭德怀的观点，也明明知道彭德怀挑战的是毛泽东的权威而不是权位，却硬要站在毛的错误立场上，同其它人合力将彭德怀等人屈打成反党集团，维护和强化了毛的神圣地位。周由此被彭德怀当面斥责为「老奸巨滑」。周恩来丧失原则，换来了自身地位「稳固」的好处，但是由此周恩来同毛泽东的君臣关系完全得到确定。周因为「反冒进」遭到批判以后，其主持的国务院各部带头抛出大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周面对背离基本常识的天文数字般虚假生产业绩报告，不质疑，不追究。事实上周从未为自己在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上弄虚作假、严重失职及其恶果实质性承担责任或扪心自责。这也是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再次不同意给彭德怀翻案、充当「反右倾」和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吹鼓手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章「文革前的四年：在『君臣关系』中揣摩」。毛泽东为了证明其打倒彭德怀的正确性，不得不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先前所犯的错误。其结果则是三年的大饥荒和几千万人的死亡。这种结果加剧了毛泽东对其死后被别人作「秘密报告」、被「鞭尸」的担心。这个人到底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毛泽东的策略则是要先联合其中之一打倒另一个。毛泽东一面在七千人大会之后重新开始对刘少奇是否是叛徒的调查，另一方面则向刘少奇透风，要求其配合打倒周恩来。但是刘少奇对此的反应是不同意。此种情况下，毛泽东采取联合周打倒刘少奇的策略。而周恩来当时在政治、权力上受到中央书记处的排挤、压制的局面，则提供了周恩来积极配合毛泽东的动力。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底对周恩来的态度完全可以一件事来表明：毛泽东曾经属意要把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预先透露给周，但是在江青的建议下，毛泽东放弃了这种做法。

第三章「文革初期：积极配合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周恩来积极参与了整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参与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例如，在毛、林整肃罗瑞卿的突然袭击之中，他是事前就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在斗倒彭真的过程中，他起到了决定性的支持作用。在１９６６年3月２８日，周恩来同康生的谈话是同毛泽东在文革当中建立政治同盟的开始，由此决定了彭真甚至是刘少奇的命运。在打倒彭真的过程中，周恩来充分向毛泽东表明：周恩来是忠诚于其本人而非其它。周恩来的这种观点，在其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周恩来公开在全党内宣称，要忠诚于毛本人。对毛本人的忠诚大于对其政策的忠诚是周恩来得以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周恩来在１９５８年做检讨之后最大的心得。他甚至别出心裁地将彭、罗、陆、杨称之为「四大家族」。如果说林彪有一本「政变经」（准确的说法应该说是「『反政变』经」）的话，周恩来不仅跟着念了这本经，而且还在毛的授权之下主持了「反政变」的具体工作。周恩来付出的这一切，得倒了丰厚的回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是毛泽东唯一一个与之商量改变全会会议议程、商定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次序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第四章「天下大乱：成为真正的『总管家』」：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毛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１９６７年１月出现全面的「夺权」，毛终于达到了「天下大乱」的目的。而周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了中共的「总管家」。一般人都说周恩来是毛时代的中共的「总管家」，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周并非「总管家」，他头上的婆婆除了毛、刘之外，甚至连邓

小平、彭真也曾对他发号施令。「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和林彪成了他的「婆婆」，而陶铸也有取代他的趋势。直到陶铸倒台以后，周才成为真正的「总管家」。

文革一旦发动起来，周恩来出色的组织能力和个人运作能力成为毛泽东不可或缺的人选。周恩来总是主动接受和完全服从毛的个人意志，毛泽东也需要周恩来的政治服从和政治支持。特别是在「林、邓、陶三架马车」代替「刘、周」政治格局失败之后，随之天下大乱的局势，周恩来更是如鱼得水。此时的周恩来大权在握，实际上主持党、政、军的工作。特别是虽然名义上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实际上是一直是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掌控中央军委。周恩来的权力完全可以用一件事表明：「九大」的中央委员名单仅是由周和毛之间商定而非其它人。周恩来是实际上的二把手、第二号决策人。虽然江青作为毛泽东的代言人，周恩来不得不有时要忍耐江青的指责与狂妄。但是究其本质来言，二者都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革进而深化文革的得力人选，堪称是毛的左膀右臂。周恩来对于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遗余力，而且有时要走的更远。

第五章「二月逆流：协助毛成功地反击」：作者只讨论了狭义的「二月逆流」即「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现。限于篇幅，作者没有讨论广义的「二月逆流」即「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的表现，有些地方体现为「二月镇反」。「二月逆流」的实质是一些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不满的「当权派」对文革的反弹。对此毛成功地进行了反击，而周恩来的协助是毛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六章「全面内战：随着毛的意志左右急转」：对「二月逆流」的反击在中央取得了胜利，在各地却遭到军方和保守派群众组织的反弹，因而导致了武汉「七?二０事件」以及全国全面大武斗，即毛所说的「七月、八月」的「全面内战」，亦即林彪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

「七?二０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转折点，有的人认为此后毛的政策转向和缓、文化大革命转向「收场」。而事实上毛在「七?二０事件」后的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转向了更为激烈、更为极左的方向，其中包括提出「武装左派」、「群众专政」，甚至怀疑整个解放军、试图建立第二武装。然后才有急剧右转，开始制止武斗、提倡大联合，开始给「文化大革命」收场。

中共官方的说法是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煽动起了「全面内战」，而周恩来是反对武斗的，周促使毛向右的方面偏转。事实上武斗的根源是毛提出的「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周恩来既有制止武斗、促使毛向右的方面偏转的言行，也有鼓吹「武装造反派」、帮助毛具体落实「武装左派」的言行。在这样一个剧烈的左右震荡的过程中，周恩来基本上是随着毛的思路行动的。

第七章「艰难的收场：为毛收拾烂摊子」。１９６７年７、８月的「全面内战」使「文化大革命」再也无法像原来那样继续搞下去了。１９６７年秋毛泽东南巡归来，不久就提出要开「九大」，实际上就是要收场、要结束「天下大乱」。但是，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相互的仇恨一旦被煽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平息下去，更加上历史上形成的中共干部的派系、山头的矛盾也纠缠其中，使得由乱到治的过程格外地艰难，其中甚至包含着镇压的血腥。再加上毛泽东又不甘心让「文化大革命」完全偃旗息鼓，于是出现了多次的反复。

从１９６７年秋到１９６８年９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山河一片红，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共「总管家」的周恩来反反复覆地和各地造反派、军方打交道、一个省一个省地组建革命委员会、处理「杨、余、傅事件」，整个过程是曲折而又艰难。

第八章「九大前后：为毛巩固文革的胜利」。经历了艰难曲折过程，「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终于收场了，全国的政权机构实现了重组，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而永远开除出党，可以认为毛泽东个人取得了胜利，而周恩来为巩固毛的胜利、为给刘少奇定下罪案贡献甚巨。不过，权力斗争并未就此罢休，「九大」过后才一年多一点，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爆发了。

尽管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毛泽东对周恩来是「用而不信」。当「九大」召开过后，毛泽东开始打算重新启用邓小平。此时后院失火，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攻击了「极左派」的代表之一张春桥。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派的攻击，认为这实际上是攻击文革甚至是毛本人。毛泽东的当务之急是要优先解决林彪的问题。解决林彪问题，周恩来可以说是毛泽东唯一依靠的人物。「庐山会议」其实质并非是中共官方所说的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而是朝臣派别之间的权力之争，至于「设国家主席」、「称天才」等等都只不过是把朝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当时的话语表述出来。

第九章「『林彪事件』：进入新一轮的斗争和整肃」。在毛、林之间的裂痕逐渐公开和扩大的时候，周恩来不断揣摩毛意图，开头还试图调和毛、林的关系，但是随着毛搞掉林彪的意图明显起来，周也就根据毛泽东的调子而变。在处理「林彪事件」前后，周恩来再一次充当了毛的前台经理。事后，周恩来又对划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加以整肃。解决所谓「四大金刚」的模式，正是周恩来同毛泽东关系的一个典型个例。毛泽东下决心要抓黄、吴、李、邱，但是并没有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周恩来则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把黄、吴、李、邱用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调到人民大会堂，然后在会上宣布他们的罪行，当场逮捕。

第十章「起伏的两年：从最高点跌落到受批判」。「林彪事件」之后，局势把周恩来推上了「二把手」的位置，这时候的毛如果出现意外，周便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接班人。遭受重大打击的毛泽东，在病急当中无奈把大权委托给周恩来。所以作者认为１９７２年，周恩来的位置达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点。但是毛泽东事后很快就后悔交权，于是责令周恩来对全党说明自己不是接班人。同时毛泽东开始培养王洪文，并且指定是周恩来「传、帮、带」。周恩来几乎与每一个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关系都十分良好。周恩来也心甘情愿充当王洪文的副手。但是历届接班人遭到毛泽东的厌弃，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时，周恩来即坚决予以打击，毫不手下留情。就是邓小平在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周也是帮着很很地踩了一脚的。

在１９７２、７３这两年里，毛泽东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具体错误，同时也意识到党内外日益增长的利用这些错误来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倾向。因此，毛泽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那些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而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执行调整后的外交政策方面，周恩来取了得巨大的成就。外交上的突破，一个是给周恩来带来了个人的荣誉，另一方面并没满足毛泽东个人的期望。这两点都给周恩来带来了个人的灾难，导致了１９７３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毛泽东开始明确地警告周，在批示中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到１９７３年底毛对

周恩来的不满到达了最高点，对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打击。毛再次批评到：「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这两项批评实际都是批评周恩来的，因为军委也是周恩来实际主持的。毛泽东指责周恩来在大事上独断专行，向毛封锁消息，搞「独立王国」，也就是后来批《水浒》时说的「架空晁盖」。

从１９７３年底，周恩来遭到批判、从最高点跌落下来以后便一直下滑，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元气。

第十一章「批林批孔批周公：在身受其害的同时推波助澜」。文革开始，毛是依靠军队整肃政府地方干部。现在是反过来搞军队。进入１９７４年，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批林批孔」运动的实质是「批周」、整军队以及树立文革派在军队中的威望，而周恩来既是运动的批判对象，也是运动的推动者、领导者。因此周恩来此时的身份是双重的，即领导批判自己的运动。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的崛起完全是毛泽东一手促成，周恩来并不是官史中所认定的主动积极，而是被动、消极的。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关系在１９７３－７４这段时间里是非常淡漠的。

然而，毛泽东整军队的意图并没有达到，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军队里的地位并没有建立起来。周恩来的病情发展以及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乱状态，使毛泽东只好停止「批林批孔」运动。四届人大以及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提到日程上来，为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的整顿打下了基础。

第十二章「四届人大以及最后的日子：终于没有被『打叉叉』」。毛泽东本意是期望王洪文等人和邓小平合作准备四届人大。不料江青等人多次对邓小平加以指责，毛泽东不得不仍然启用周恩来准备四届人大。作者描述了四届人大的前后过程，作者认为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周恩来、邓小平一方与「四人帮」一方「并无两条路线的斗争」。

而在批判周恩来和批林批孔中表现优异的邓小平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１９７５年的１月份，随着邓小平的真正掌握大权，也就标志着周恩来在政治生命上的结束。虽然随后有批经验主义和评水浒的运动，但是此时的毛已经无力再折腾了。在重病中的周恩来还是对于江青、张春桥以及邓小平之间的矛盾加以调和。虽然邓的崛起意味着周恩来的没落，周恩来对邓还是抱有一丝期望。毛泽东希望邓对文革做一总结，但是被邓拒绝。此举的客观效果则是周恩来避免了在离世之前被打上叉叉的可能性。

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林彪葬身异国。无数老革命干部死后还打入九层地狱的现实让周恩来确实感到恐惧。特别是周恩来对于身后是否被「打叉叉」感到极度的恐惧。周恩来参与迫害的人如此之众多，造成的刺激是无以复加。一方面这是由于党内斗争的结果注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周恩来自己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结果。还有就是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作风。因此周恩来费了极大的心思保住自己的「晚节」，乃至在身患绝症、弥留人世之际还念念不忘。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保全，完全得益于毛泽东所重点培养的王洪文包括江青等人不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毛泽东的本意完全是要他们同邓小平合作，批判周恩来。但是王洪文和周恩来走的过近，江青等又多次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邓小平，这完全偏离了毛泽东的预定战略方向。以至被毛泽东多次斥责，直至怒骂江青的讲话为「文不对题，放屁。」　但是周恩来任

劳任怨的形象却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评判标准，再加上当时周恩来在中央项目组的诸多行为广大百姓并不知情（至今也是如此），周恩来有幸成了广大百姓群众对文革发泄不满的「大旗」在文革结束之后更是成了打「鬼」的「钟馗」。

第二部分一共有以下几个具体的个案。

一、周在对毛的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人们都知道林彪在这个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作者则指出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远远比林彪起步的早，而且起到的作用更是是远远地超越其它许多人。长期以来对于周恩来在个人崇拜中的行为被忽视。周恩来在制造个人崇拜的过程中，充满了个人特色。特别是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出台，是在刚刚走出大饥荒的阴影之后，几千万的冤魂尚未散去之时。相比于刘少奇在制造个人崇拜上的落伍，周恩来此举更是大获毛泽东的赏识。共产党统治下的文艺向来是造神的工具，在周恩来手里更是发挥到极致。

二、周与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的关系。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当家人，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文革战略决策。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在文革前、中期基本上是同盟关系，虽然也有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却被官方演绎成是路线不同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

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在「怀疑一切」的口号鼓舞下，「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的人也多次受到炮轰。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被贴过大字报。中央文革内部虽有矛盾，但在镇压外敌方面倒是步调一致、齐心协力、毫无商量的余地。无论是在镇压「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还是镇压被通令禁止的造反派组织，周恩来同中央文革都是并肩战斗。

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中央项目组工作，执行毛泽东所有关于文革的战略决策。周恩来是无可置疑的的文革派。周恩来对于文革派的重要成员也是多次加以褒扬，无论是江青还是陈伯达。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1月２１日专门对诽谤陈伯达的大字报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这并不妨碍陈伯达被毛泽东踢开之后，周恩来对其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

江青在整个文革中同周恩来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既有开初的分歧、发展到后来江青为毛整肃周而奔忙的一面，也有相互合作、利用的一面，在「伍豪脱党」、「清查『五?一六』」等事件上江青甚至向周恩来示好。所以历史事件的描述绝不能简单地「脸谱化」。

三、「伍豪启事」风波。被江青点了名的周荣鑫被周恩来下令烧锅炉。其女周少华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发现了「伍豪启示」之后，周少华通过其父把此材料转交给戚本禹。但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并没有在此事上为难自己。事实证明「伍豪事件」是周恩来自己一手造成的自己的心病！毛泽东则利用此事，不时的敲打周恩来，直到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段。

四、周在中央项目组中的作用。中央项目组的结构和运作迄今还很少见诸公开出版物。实际上，整个中央项目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项目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能否迎合毛的要求。无论早期的彭德怀项目还是文革期间的的刘少奇、贺龙等项目，都是依据中央项目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所有的重要项目的最后仲裁完全取决

于毛泽东，都是毛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具体执行的模式。

中央项目组作为中共迫害干部、群众的法西斯组织，周恩来作为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共官方对此百般为周恩来解释，却总是显得苍白无力。对于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无论是刘少奇一案还是贺龙一案，其定性都是依据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项目组所提供的最后材料。显然不是一句「周恩来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维护大局」就解释得了的。

五、作者专门讨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保人」－－保护干部、保护民主人士、保护知识分子和其它人－－的问题，即所谓的「大树参天护英华」。作者认为周恩来为保护文革受害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实施毛的意图。基本上来周恩来是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毛泽东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便会积极保护。

以后的几章分别针对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及贺龙的案例作了具体的分析。

六、当毛没有表示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并作出种种承诺时，周恩来也是跟着表态，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在毛泽东最后决定要将刘少奇置于死地之后，周恩来明明清楚刘少奇的历史、明明知道刘少奇一案是冤案、假案，仍然秉承毛的意图参与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

七、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力保陈毅一事，是中共官方津津乐道的。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毛对陈毅采取了「一批二保」的政策，并没有要马上打倒陈毅；二是因为文革初期周恩来与陈毅有着荣辱与共的利害关系，周恩来清楚保陈毅是为了保自己。所以周有保陈毅的需要。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周恩来不再有这个需要了，便参与了对陈毅的严厉批判。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在庐山甚至当众指斥陈毅和陈伯达为「二陈合流」。

八、作者讨论了「彭德怀的冤案与周恩来的责任」。无论是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还是之后，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批判丝毫不手软。而在文革中彭德怀所受到惨无人道的的迫害，周恩来更是负有一定的责任。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共同的敌人，周恩来也没有手软的理由。

九、作者较详细地介绍了「贺龙被整与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贺龙因为未能配合毛泽东的文革战略而遭到毛泽东抛弃。贺龙在被项目组审查和迫害的过程中，周恩来则是罪魁祸首。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贺龙平反的过程中周恩来有意拖延和阻挠，最终导致了贺龙在１９７４年并没有完全被平反，而是留下了「尾巴」。周恩来本来没有准备去参加贺龙的追悼会。在毛泽东批示后，周在追悼会上的表演让贺家和无数不知真相的人感动不已。但是经过多年以后，贺家终于知道真相。

十、清查「五?一六」详尽的介绍了周恩来如何利用清查「五?一六」来整肃对立面、并通力同文革小组成员合作的事实。周恩来从来不主动迫害人的神话由此被打破。而千千万万因为「五?一六」而受迫害的人仅仅因为「五?一六」的要害是反对周恩来而至今未得到来自官方的正式平反，甚至在《历史决议》中丝毫未提。

从以上两个部分的介绍可以看出作者描述和分析的篇幅主要集中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就是周恩来生命中的最后十年。这一时期是中共历史上一个异常复杂的时期，周恩来又是中共历史上一个异常复杂的人物，于是文革中的周恩来就是更加地复杂。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文革中的周恩来，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作者所取的是「历史的」角度、「客观的」角度。作者并不认为自己的结论是唯一正确的结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作者的观点和结论也许会改变。但是，这种改变的条件只会因为作者引用的史料被证伪、新的史料被发现，而不会因为政治路线被改变、宣传纲领被涂改、某个个人被打倒、被提升。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七千人大会以前：在权力斗争中挣扎

建国前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歧见，致使毛泽东决定要「动一动」刘少奇的位置。「马上人打天下，马下人坐天下」导致的矛盾成为毛泽东要利用的动力，「高饶事件」遂应运而生。但是刘少奇、周恩来反弹的力量超乎毛的想象，而高岗的表现更是不如毛的期望，因此毛泽东不得不中途改变初衷。但是「高饶事件」却在政治格局上造成了刘周靠拢的可能。为此，毛泽东一面重用邓小平作为平衡和稀释刘、周权力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利用反「反冒进」刻意在刘周之间打下楔子。毛泽东要改变政治格局的依靠力量还是军队，但是彭德怀并不是靠得住的人，毛泽东早就有意提拨林彪作为替代人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却使这一权力斗争不得不推迟，但是这一切都为以后历史的发展做下了铺垫。

一、高饶事件之后的政治格局

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有意借重「白区」力量整「红区」的人马，如此才可以抛开情面、避免庇护，整肃也就更加彻底。但是由此产生的「白区」和「红区」的纠葛，随着「白区」力量的崛起，不少人位高权重，致使不少经历枪林弹雨的「红区」将领难免不忿忿不平。这种不满情绪是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高饶事件」得以发生的内在根源。

在建国前后，毛泽东对于靠延安整风成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和被整者周恩来都产生了新的不满。针对于刘少奇在「关于农村互助组织以及对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看法，特别是「主张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搞分散主义，未经毛泽东看阅，就印发中央文电」等诸多问题，毛泽东多次提出批评，甚至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

对于周恩来的不满则表现在周恩来领导的政府工作存在着分散主义，且未能及时向中央报告工作、有形成独立王国之嫌疑。

在地方上，由于革命进程而形成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行政区。为避免地方权力膨胀，以加强中央领导能力为名，行削藩之实，１９５２年8月，中共中央下令调动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习仲勋（西北局）到北京担任中央机关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俗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而其中的「一马」是高岗，负有最重要任务。

高岗进京后，被毛泽东委以重任。１９５３年３、４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据此计划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门由高岗负责（由此以高岗为主席的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内阁」之称），而周恩来只剩下外交、对外贸易等工作，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同时撤销。后者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向高岗交心：刘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刘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刘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因为刘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递国书等事务）。除此之外，１９５３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２０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由此，高岗拿走了原本属于周恩来的权力，又担当了「挪动」刘少奇的重任。无形之中，高岗犯了未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错误，树敌过多。在错估形势，错选时机的情况下，高岗又轻信陈云的话，后来又被陈云告发。而且高岗自以为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泽东的「天机」，而且还打乱了毛的战略部署，犯了大忌。鉴于陈云、邓小平等人的表态，刘少奇、周恩来的抵制，毛泽东不得不把高岗作为替罪羊抛出。赵家梁先生在《高岗在北京－半截墓碑下的往事》中，在对「批薄射刘」会议进行了大量分析和列举事实后，认为「批薄一波容易，批刘少奇难。毛泽东感到了重重阻力。」　于是毛泽东的态度转为袖手旁观。而刘少奇和周恩在得手之后，进而落井下石。

１９５４年2月6日至１０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１９５４年2月２５日，周恩来主持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并发言：「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周恩来从十个方面揭露高岗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　5月，周恩来在发言中无限地上岗上线，并且毫无根据的断言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这种证明无疑是一种诛心之论，由周恩来在建国后的党内斗争开创先河。

在周恩来作长篇发言时，服务员事先得到通知，会议中间不许给茶杯上水，「任何人不许进去。」因为会开得太长，与会的领导们禁不起没茶水喝，一个服务员被指定进去添水。他看到周恩来正站在前面讲话，口气非常激烈严厉。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周这个样子。周知道

他的角色就是凶神恶煞，怕高岗冲动起来加害自己，派他信赖的陈赓、宋任穷破例地带枪进入会场。

毛的本意是敲打刘少奇、架空周恩来。而结果却使本是冤家对头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大有合拢之势。当然毛泽东留了后手，让刘少奇做了长篇检讨，此检讨种下了刘少奇晚年悲惨的结局。十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过去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终究被后来者发现并利用起来。毛泽东在以后也多次提及高岗。

高饶事件牵涉的其它人员如彭德怀、林彪等后来无一不成为一时历史的焦点。彭德怀对高岗说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要篡党，后台是刘少奇。　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刘少奇、彭真等对于彭德怀丝毫不留情面。林彪由此而得出对毛「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主义。

此后，毛泽东另辟溪径，自「八大」开始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开，由邓小平出任书记处的总书记（开始为秘书长）。毛泽东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　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大跃进中许多决策就是出于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要把刘少奇、周恩来分开，培养邓小平来牵制。这就是高饶事件之后的政治格局，也是以后庐山会议、文革的发端。杨继绳先生说：「凡高饶联盟，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这三次斗争，从人事上看，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毛泽东在这三次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来在这三次斗争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　而周恩来是依靠怎么样的表演才能在毛泽东这个导演手里能够一直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正是此书的考察之处。

二、「反冒进」的由来

在抗美援朝之后，无论是国内的经济状况，还是外贸的需求，特别是核武器研制的启动　，都迫使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决定要大力发展经济。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５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因此必须加大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毛泽东在１２月６日再次专门强调「反右倾反保守」：「群众潜力极大，可多办事，应该反右倾反保守，提前完成改造。建议，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改掉『大约』、『基本上』、『十五年左右』等不定语气。」「过去反盲目冒进出毛病，反掉群众干部的积极性，不对的。扫盲，反冒进反掉了，正气不升，邪气高涨，干部群众均没劲。」「反保守、右倾、消极、骄傲，发现先进经验，改变领导方法，做到又快又好。动员群众批评，自我批评，克服保守主义，做

出来更多成绩，全党准备，全人民准备。」

对此，周恩来非常同意：「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１２月８日，周恩来在怀仁堂讲：「过去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也许还不到２０００万吨，可是现在我们估计可以超过这样的数目。」「毛主席最近说，如果我们要检查过去六年来的工作的话，那么主要的倾向还是保守倾向。」

但是实际操作中，周恩来发现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１月主持起草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根本不可能实现。继而，１９５６年２月，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周恩来把计划中的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砍掉大约四分之一。　随之因为前阵子的冒进，１９５６年４月国民经济出现相当严峻的局势。对此，毛泽东全不理会。于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产生了面对面的冲突。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４日，胡乔木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针。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也许是高饶事件中刘少奇、周恩来的胜利给了周恩来说良心的底气。

此时站在周恩来后面的是刘少奇、陈云等。１９５６年２月，刘、周、陈等人就「反冒进」达成了共识。

１９５６年６月２日毛泽东离开北京。６月４日，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调整计划指标的意见，并且最终通过削减国家预算和压缩基建的１９５６年国家预算报告(草案)。

６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安排中宣部起草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特别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倾向反对什么倾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刘少奇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后批示：「主席阅后交乔木办。」

毛泽东后来对吴冷西和胡乔木说：「这不关你（指胡）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后来南宁会议，毛泽东把此文加了很多批语，挑明此社论是针对「我」的（《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的，发到与会人员手中。

１９５６年８月，周恩来在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８－１

９６２）的建议（草案)》时，删除了部分「多、快、好、省」的口号，以避免其带来的消极作用。因为当时不少人只重视「多、快」而忽视了「好、省」。由此周恩来后来被说成是「促退委员会」的代表。

周恩来在１１月９日召集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　１１月１０日，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基调就是「反冒进」。毛泽东忍不住了，在１１月１５日终于开口，批评了李先念，「稳妥可靠」不如「充分可靠」！毛泽东忌讳这个同急躁冒进相对立的「稳」字。

三、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

１.毛的批评

毛泽东不满也无可奈何。接踵而来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反右运动，毛泽东只能暂时退让。波匈事件使得毛泽东倍加警惕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毛也认为「反冒进」促进了右派的进攻，所有的这一切都使毛更加急迫的需要在经济上的「大跃进」。

１９５７年6月２６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报告中有两处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跃进的发明权是属于周恩来。周恩来的态度变了。

１９５８年5月１７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周恩来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是「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虽然如此，毛泽东依然没有放过周恩来。

周恩来在退缩，而毛泽东的牛皮越吹越大。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势必要以反「反冒进」来进行「跃进」的动员。

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公开反「反冒进」。毛泽东说：「我高兴的是这次会有个别同志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完全的口号。我看要实事求是，要提倡合乎实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去年把这个口号扫掉了，现在要恢复这个口号，你们赞成吗？还扫掉《农业纲要四十条》，四十条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共产党应该永远是促进会。我们有许多委员会，最根本的是共产党委员会，究竟你是个促进委员会，还是个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去年二中全会组织个小组促退，就是去年多花了三十亿，就只能在这点促退一下，多促退就要犯错误，也就是说，不可过分强调反冒进。因右派是促退派，我们与右派的根子不同，我们永远是促进派，要促退只是暂时的、局部的。」

从１９５８年１月份的杭州、南宁会议直到３月份的成都会议，调子越来越高。从离右派三十米到是否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承受的压力愈来愈重，一路检讨不断。周恩来的顺从与认错，更使毛泽东沿着错误的轨道继续发展。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个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８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３月９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

毛泽东把「反冒进」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就占领了思想制高点。陈小雅女士说：「这样一来，反对他的计划就是政治问题，他不仅代表六亿人民，还代表了真理。他有资格指鹿为马－说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他说『搞的多』是马克思主义时，『搞得少』自然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此武器甚是好用，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屡试不爽。

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做检讨：「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在３月２５日就反冒进问题再次作检讨：「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毛泽东并不认可周的检讨：「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他还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还不满意，还将进一步解决反冒进的问题。毛泽东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这是唯一的一次党的大会有二次会议的情况。这就是把周恩来的问题在全党面前揭开盖子。

２．权力之争

（１）邓小平的崛起

高饶事件结束后，１９５４年9月，根据新颁布的宪法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组织法》对原政务院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撤消了政法、财经、文教、监察４个委员会，在国务院设置８个办公室、l 个秘书厅协助总理分掌各部工作，设置了主办专门业务的２０个直属机构；３５个部委职能机构。共计６４个工作部门，其中经济部门增设到３５个。一刹间，周恩来大权在握，特别是经济大权。

毛泽东一生信奉的都是权力至上。在「反冒进」的背后，同样存在着权力之争。对于周恩来的这种权力状况，毛泽东在「反冒进」时多次表达不满。

１９５８年1月１１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第一次讲话，就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关于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

陈云在２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作检讨时，毛泽东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还说：「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它实际在国务院。」

为此，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就成了毛泽东手里强有力的工具。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１９５８年６月，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说得更明确（见下文６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

书记处在讨论国务院的工作时，周恩来也要参加。从记录看，副主席只有周恩来出席书记处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反而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

现仅举二例，说明邓小平的实际地位。

１９５９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将提交给「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提交给与会者讨论。《报告草稿》中，毛泽东将一段话修改为「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周恩来在５８年5月２６日夜致信解释「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后（见下文），毛泽东即指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指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一笔者注)

毛泽东　１９５８年5月２７日上午１１时

到１９５９年的上海会议，毛泽东更是明言「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

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因「反冒进」挨批，陈云那时也不受重用，国务院很多工作就转到书记处。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的权力枢纽。在「三面红旗」方面，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大跃进时期许多决策，都出自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不过，「大跃进」的问题暴露以后，邓小平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但他还坚持对「三面红旗」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的出版物对邓小平大跃进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极力回避。

一个是横竖强迫签字，一个是无权参与设计，周恩来是否架空了毛泽东？无论如何，在１９７５年，毛泽东在关于《水浒》的评论中提到：「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自然是有旧仇新恨的。　无论如何，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是极度不满的。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时候说，「(国务院）几十个部，不知道都干些什么！」

（２）林彪取代彭德怀的迹象

１９５６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在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时，毛泽东未得全票，他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　林彪虽然没有进入常委，但是在政治局委员的排名仅在常委之后。毛泽东是否从此时就有准备用林作为代替彭的打算？实事求是的讲，毛彭摊牌是早晚的事。彭德怀是否受林彪在政治局委员排名在其前面的影响，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但是仅仅几天之后，彭德怀就提出自己可以只担任国防部长以对付外事活动，不担任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人，请另一个委员来主持军委工作；或者自己只搞军委日常工作，不当国防部长，而且同林彪商讨了裁军问题。　同年年底的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再次提出交班、退休问题。以后，彭德怀多次提出此问题。

１９５８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被增选为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此时的林彪在党内的排名已经远远高于彭德怀，已经属于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核心人员。１９５９年3月２５日至4月１日于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再次向毛泽

东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毛泽东不采纳彭德怀的意见。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８日至２３日的第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彭德怀被再次任命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这一段时间里，彭多次推荐林做国防部长。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觉得奇怪。林为中央副主席，对党内团结是有好处的；我曾经总想林任国防部长（笔者注：原文如此，不通顺），较为适当，对于团结也有利。此事同聂荣臻同志谈过多次，并且同毛主席当面谈过此事。毛主席说，现在林有病。我以后没同毛主席再谈了。」　反过来，林彪也很尊重彭德怀，在１９５８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军队「同志继续在彭老总领导下，更好的团结起来，发挥全军的力量，争取（更）大的成绩」。

笔者认为，军队一直是毛泽东的权力基础和最重要的保障。抗美援朝之后，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在当时是不二人选。但是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对彭德怀表示出不满？毛泽东在庐山上批评彭德怀的话自然可以作为证据，但是毕竟是一时的激愤之作，要多加考虑。有证据可考的则是１９３５年毛泽东作军旅诗《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１９４７年该诗首次公开发表，同年毛泽东重新书写该诗。但是１９５７年毛泽东曾说该诗「记不起了，似乎不像」、「不宜发表」。此后在１９５８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未收入该诗。　１９５８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作为毛泽东整治军队的重要「打手」，致使包括刘伯承、粟裕等一大批军队元勋被整肃（笔者认为此事彭德怀虽然不是元凶但是也要负有一定的责任）。「反冒进」之后，毛泽东要整治刘少奇、周恩来等，要把军队牢牢的捏在手里。彭德怀和林彪相比，毛泽东自然更倾向于林彪，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论述，此处不再多赘。　这也是庐山会议的重要背景之一。

四、周恩来的检讨

尼克松曾经说过，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毛泽东一个人。　周恩来还有一句名言：「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　周恩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此心态？或者说周恩来是不是一贯如此？高文谦在其著作《晚年周恩来》中如是说：「延安整风运动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重要关节，对周恩来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遵义会议后，周开始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还只是「半条心」的话，那么通过延安整风，他从此洗心革面，开始由衷地拥戴和信服毛。」此话有一定道理。但是周恩来还没有完全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独立人格的」政客，历史表明，１９５８年的反「反冒进」才是周恩来彻底「臣服」的关键门坎。

１．周的检讨

毛泽东说：「（检讨）要自己写，不要秘书写。」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关于这次周写检讨一事有个极为难得的回忆：周恩来同志指示我：……因为这次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

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记录周口述检讨的）这个时候，陈云同志打来电话……打来电话之后，他说的很慢了，有时候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的构思……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了？」当范说明情况后，邓大姐说：「……还是由他口授（大意），你整理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赵无眠先生在《真假周恩来》中的描述更为贴切：范若愚见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纸发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颤动，目光专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寐」。有几次，他彷佛想通了，下决心落笔，却成不了文句，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痕迹。忽然又放下笔，将稿纸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梁的某一点上。眼圈一红，泪水盈眶，他轻合眼皮，不让眼泪流下来……。

无论是「几乎流出了眼泪」还是「不让眼泪流下来」，这个检讨对于周周恩来说是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凤凰涅盘。

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５０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份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

在周恩来检讨前，毛泽东于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针对国内形势发表讲话：「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高岗、饶簌石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不让××××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未看过阿 Q 正传。你们看过阿 Q 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来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峰（笔者注：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比古好些，有进步），……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闹分裂的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驹稍好一点。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疆也有一批干部闹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南也有人在闹。想分裂，不想合作。闹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在５月２０日，毛泽东再次对防止分裂讲话：「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　（笔者注：有资料把毛泽东在庐山上说去年讲分裂就是针对彭德怀的话当作证据，来证明毛泽东在５８年的讲话所讲分裂是指针对彭德怀的，依现有资料来看，此种认识不确。毛泽东在５８年的讲话所提分裂是指针对周恩来的。）

这些话，是十分严厉的，周恩来如何才能过关？

５月１７日，周恩来首先对「反冒进」一事检讨：「『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他还痛挖自己之所以会犯上述错误的「思想根源」，称之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时表现为「两者的混合」。周恩来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其次周恩来表态说：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２０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最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表示彻底的臣服：「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时候或者作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建国后，第一次「凡是论」，也是周恩来首创。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及国内「反冒进」的形势，促使毛泽东要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时候，正式为提倡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打开绿灯。周恩来的这番话无疑是对毛泽东的响应。周恩来的这些话是含有深意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抬轿子、吹喇叭，开创了６０年代中国造神运动的先河。

毛泽东在成都还讲：「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反对毛泽东的主张针锋相对的。

１９５８年6月９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常委会讨论他们的请求时，挽留他们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职务。会后，邓小平拟定了常委会会议纪要，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他还将这个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既没有画圈也没有任何批示，而是退书记处。　　周恩来当然不是主动辞职，是感觉失宠了，再恋栈没意思了。毛也没有急着让他下去，事实证明周后来成为毛整肃刘少奇的最强大和秘密的武器。周恩来也就顺势收回。

当然，毛泽东也对「反冒进」一事盖棺定论：「反冒进（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但是毛泽东真的就高抬贵手了么？

１９５７年底，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说：「要那么多秘书干什么？秘书多了误事。」当时周恩来的秘书最多，于是这些秘书被纷纷下放至各部委和地方，最少之时仅有三位。　南宁会议之后，周恩来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一职被撤。

１９５８年夏季，周恩来要其秘书们把他个人的书和总理办公室的书分开来管理。

就在周恩来做检讨之后不久，毛泽东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财经小组组长由陈云担任；政法小组组长由彭真担任；外事小组组长由陈毅担任；科学小组组长由聂荣臻担任；文教小组组长由陆定一担任。此文件在次日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出。

6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中央决定成立各专业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实际上削减了总理的权限，架空了周恩来和国务院。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国务院成了书记处的办事机构，政府机构只剩下建议、检查和具体执行、细节决策的权力。

２.「跃进」的发明

毛泽东对「跃进」一词情有独锺。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５月２５日，毛泽东看了彭真送来的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

毛泽东阅后，急不可耐的于次日早７时，即致函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它同志，指出：「重看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周恩来收到此信后，坐不住了，唯恐别人抢去了大功。在受到严厉批评之后，此事可以向毛泽东表白自己原来的思想觉悟还是有一点高的。

当天夜里，周恩来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时送上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单行本。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９页和第１４页上，提到１９５６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意在表明跃进一词的专利是属于周恩来的ー笔者注）

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１９５６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１９５６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的会上发言，说那时是「开始觉醒」，经过了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而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地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在我的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１９５６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１１月１３日和１２月１２日（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后，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地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是立的多快好省和农业纲要四十条的大旗，破的反「冒进」而「促退」的歪风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　１９５８年5月２６日　夜

周恩来通过写信的方式，再次表示自己要脱胎换骨，思想并无抵触，心悦诚服的认识到自己同毛的差距。

周恩来在大跃进中说：「伯达同志讲，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可以提高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我们今天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这是发自内心的还是纯粹是政治表态？笔者认为二者皆有。

在周恩来等人受批评的同时，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为当时权力枢纽。在大跃进当中，邓小平对于毛泽东是鼎力支持。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成了一个试金石。由此也让邓小平攒了一大笔的政治资金。

五、反「反冒进」的后果

１．刘、周之间的隔阂

反冒进刘少奇领头，周恩来等人参与，但是毛泽东却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手法来处理。

胡乔木、胡耀邦以及李锐在提及此时曾说：「由于在一篇定性为反毛泽东的错误的社论原稿上（作者注：指１９５６年6月２０日的《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有刘少奇修改的笔迹，刘也就同这一『错误』脱不了干系了。党内唯一还可以同毛泽东以平等的态度讨论问题的刘少奇，从此似乎也今非昔比了。南宁会议之后，逐渐使毛泽东奠定了他在中央的特殊地位，这是党内生活的极大变化。」

李富春则说：「当时反冒进的是陈云、薄一波出面，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但是刘少奇没有自我批评，陈云没有自我批评，薄一波也没有自我批评，而总理担当了责任，总理作了自我批评。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是刘邓陈薄的错误，不是总理的错误。」

周恩来也说：「１９５６年带头反冒进的是刘少奇，还有陈云、薄一波，我也有责任。１９５８年南宁会议，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薄一波就没有很好检讨。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陈云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

「反冒进」是刘、周连手发起的了，但是反「反冒进」之后，刘没事，而周则被逼检讨而致心力憔悴。这幕后原因是什么呢？

延安整风曾经造成刘少奇与周恩来之间的过节。

陈毅在文革中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谁整了周恩来？

在延安身兼两大职（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的刘少奇指责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未能对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其次是指责周恩来１９３７年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是想「带八路军走」；再就是指责周恩来参与签署「誓死保卫大武汉」的文件，而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主张。此外，周恩来还被指为对「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败负责，要对１９２８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错误负责。

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周恩来同意负大部份责任，但延安还有九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刘少奇。

但是，在「反冒进」一事上二人却唱起了「二重唱」，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担心害怕，尤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在耳边回响。

众所周知，刘少奇作为二把手，实际上并无多少实权，在枪杆子出政权的中共体系里面，根基不大。然而周恩来则不同。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不在毛泽东之下，而且做过毛泽东的上级领导。毛泽东自然不能对他们两人「一锅煮」，只能分而治之。于是，毛泽东选择了周恩来，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明显有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带来了一个机遇，就是借去「斯大林化」而进行「非苏化」。周恩来的苏联背景成了自己被彻底「搞臭」的重要原因。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有意树立刘少奇为周恩来的对立面。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工作报告：「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说得正对！难道我们能够不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吗？难道我们应当好小喜过，绝功弃利，安于落后，无为而治吗？」

刘少奇在报告中以毛泽东的语言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并严厉的批判了「反冒进」，认为「反冒进造成了『马鞍形』」。报告说：「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此报告把周恩来、陈云等至于被批判的境地。

因反「反冒进」造成了周恩来被整，以至同刘少奇薄一波等人产生了隔阂。「反冒进」之后，刘少奇接踵而来的上升，同周恩来的贬斥形成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因此在刘少奇、周恩来之间打下楔子。这一后果在后来历史的进程中，被证明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２．历史的转变

胡乔木说：「１９５８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批判反冒进是（指毛泽东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党内生活不正常）这种变化的重要关键。从那以后毛主席的话谁也不能表示异议，中央其它领导人很难与他平等相处。」　从此，毛泽东总是对的，别人都要为之让步，即使批评错误，也要先说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正确性，错误只能是中央集体承担而不敢言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

在一系列的大会上，毛声色俱厉的批评了周恩来，上纲上线到所谓「反冒进」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周恩来不得不放弃正确的主张，反而作出了羞辱自我人格的检讨，直至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总理是否适当？」经众议一致挽留，周恩来渡过此次危机。大陆流行的比较婉转的说法是「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指出：「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党中央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终于导致十年内乱。」

从周恩来做这个检讨开始，党内便开始形成一种不正常的政治氛围，一切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维护毛泽东党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权威，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就是反党。周恩来成了对毛泽东的只能聆听执行，毛如何说，就跟着如何做的典范。这种态势同毛泽东欣赏的个人崇拜交织互促，吹喇叭，抬轿子的作风日甚，终于导致了个人崇拜在全国泛滥，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创造了条件。

周恩来的检讨的确暂时维护了全党团结的大局，缓解了党内紧张的气氛，还保护了同样「反冒进」的国务院其它领导人。但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就高居政治局之上，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比较正常转向非正常。

对于周恩来的检讨行为，后人有多种评说，赞扬者称其是顾全大局，为了几亿老百姓而「忍」；但也有批评者则认为，周恩来的忍让已经到了没有原则的程度，助长了毛泽东的权势。

然而影响最大则是反「反冒进」改变了周恩来，宛如完成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高层折腰自周而起，覆辙难收。毛周关系开始沦为君臣关系。

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经常提到：「活到老，改造到老」，其实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来改造自己，完全不顾是对还是错。因此，在后来的「文革」中，周恩来仅是忠实的执行毛泽东的决定，从不谏言。作为第一号执行者，自然是第一个跟随毛犯错误的人，是仅次于毛犯最大错误的人。金冲及说：「我读过不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记录和文章……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的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的是负责执行和落实。」

周恩来对于毛泽东逆来顺受。以至于到后来对于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王洪文，尽管相对于周恩来王洪文犹如一个毛头小伙，但是周恩来仍然对之「恭敬有加」。自毛泽东发话，要「传帮带」，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周恩来成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典范。周恩来亲自讲：「如果压制就犯路线错误，像林彪同志跟主席跟的很紧，他也能预见到，主席一点，我们就要紧跟着做。」　只要毛一指责，周就迫不及待地认错，照单全收，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思想连拐弯都不用，还要做检讨。最后就是当毛泽东不指责的时候，周恩来把检讨当成了向毛表示忠心的工具。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九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向二中全会讲，并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劝总理不要讲，并指示二中全会闭会时由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周恩来在大事小事上更加突出毛泽东。军事博物馆的开放，就因为周恩来指责其没有突出毛泽东这条红线而被迫推迟两年。

同此相对应的是，周恩来对于毛之恶而甚恶，无论是彭德怀还是后来的刘少奇、林彪，即使周恩来知道事情本不应该做，都是毛泽东的错，但是周还是一如既往。此事本来就是一「双刃剑」，身边战友的一个个变成了敌人，在刺伤别人的同时，也刺伤了自己，周自己也始终担心害怕自己也落得同样下场。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之后，被打入地狱。

以后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凡是被当权者、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们诬为「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现他们名字的时候再加上个红笔叉叉，如果有他们的照片出现（一般是从相关人家中抄出的旧照片或旧的报刊上登载的），则马上在他们认为是「叛徒」、「特务」、「黑帮」、「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人的脸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而这些人，如同彭德怀一样，很多都有周恩来的功劳。但是说不定，自己就是下一个被打倒的对象。

后来，无论局势多么险恶，周恩来则从未提出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日，周恩来在会见完泰国外宾后，乔冠华要求周恩来同大家合影。周恩来同意了。但是就在摄影师杜修贤按下快门的时候，周恩来突然说到：「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周恩来是有感而发还是另有所悟？

为了保存自己，周恩来还揣摩毛泽东的意图，做的比毛还左。例如文革初期中提出司局级以上干部都要烧一烧的。　这种特别的「左」，正比如打别人是出于自卫的「用心」，周恩来整别人，包括整彭德怀等，是为了赚取自己的「不倒」的资本。「不倒」的背后是因为周恩来自己的恐惧，而这种恐惧，一直到死也没有解脱，直到１９７６年１月２日还要听毛刚发表的两首诗词，并且还要笑出声来。

六、将功折罪

１．庐山会议上的周恩来

（１）引蛇出洞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一信奠定千古英名，万世流芳。但是彭德怀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里面实在是有毛泽东的「功劳」。彭德怀在庐山上的勇气，部分的来源于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据记载：彭德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颇显激烈。他７天时间里在西北组发言７次，许多话据说连负责记录的秘书们都「手指发抖」。他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１０７０』(笔者注：毛泽东提出１９５８年钢产量要达到１０７０万吨，２年内超过英国)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

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并不是作了批评那么简单，而是严厉的批评了一帮大员，要他们学海瑞！

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到长沙做短暂停留。其间，周小舟请毛观赏了湘剧《生死牌》。周小舟告诉毛，国防部长彭德怀十一月在长沙看了这出海瑞的戏，非常喜欢。毛当时表示喜欢生死牌，并欣赏海瑞这个角色。那晚在长沙，他叫林克给他找来有关海瑞事迹的部分明史。

１９５９年３、４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柯庆施则将湖南湘剧团调至上海再次演出。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看了湘剧《生死牌》。毛泽东在会上则对海瑞赞不绝口，后还安排胡乔木找人，马上宣传海瑞精神。这也是吴晗《海瑞骂皇帝》的由来，由此惹祸上身是后话，暂且不表。

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毛泽东还说：「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领导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正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之余，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让彭向海瑞学习。就是在这次上海会议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彭德怀，他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此处省略见下文)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一个人这样，跟其它同志也是这样。」

不少人根据后来庐山会议的结果来反证这段话，是毛泽东早就对彭德怀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毛泽东当时在上海会议说这话只能是暗藏杀机。笔者则认为毛泽东是在用「激将法」，引蛇出洞：彭德怀你不要因为你我之间的私人恩怨而不敢讲话啊！

４月５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提倡海瑞精神。毛泽东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

周恩来答：看了。

毛泽东还对周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了不正确的，也不批评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

为了让彭德怀、周恩来「上钩」，毛泽东对于历史来了个大回顾，一个个点名，作为陪衬。

毛泽东说：「(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两个人斗。(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

接着毛泽东说：「我们这些老同志没有打过架的相当少，不打不相识。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跟恩来打过架没有？跟彭德怀打过架没有？跟朱德打过架没有？跟你（指刘少奇）也打过架，就是合作化问题，对于洛甫的处置问题，翻你的案，也打过架。跟陈云我们打过架。跟林彪也打过架，我们在闽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义会议以后我跟你们两位（指林彪与彭德怀）斗分裂了，搞了一个会理会议整你们。因为你们要把我们搞掉，要搞掉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朱德，一个是周恩来，你们要来组织司令部，你们没有纪律，你们是错误的，那得整。……肖劲光我跟你打过仗没有？那个仗恐怕是我错的多，你正确的多。但是那个时候你也有错误，你一点错误没有？

刘伯承同志我们两个不是斗得厉害？我还写了书，战略问题，那就是批评你的，你也没有答复。后来你在军事院校大概是想答复一下，没有尖锐地提出问题来批评，因为我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能反驳的，是驳不了的。那里头批评了刘伯承，批评了任弼时，没有指名字。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还有已经死了的凯丰同志，那时他是博古派……。至于跟粟裕同志，肖克同志，还有陈伯钧，还有郭化若同志，我们几个人是历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笔者注：原文如此。）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了错误，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了。」

毛泽东还以李锐写信为例，鼓动下属向他提意见，说不仅要有「骨头」还要有「肉」。但是胡乔木却说：引用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如果真是如此，那不就是钓鱼么？周恩来就读懂了毛的真实含义，检讨没有白做。后来彭德怀庐山上书，是不是同毛泽东鼓励李锐写信有关？

彭德怀上庐山前，对是否上山开会，有过犹豫。黄克诚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黄克诚说，可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引诱彭德怀「犯我」，然后再将「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怀。　或许是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诱惑，或许是要「为民鼓与呼」，也许是毛说的看准了事要大胆干，当逆风袭来时要敢于「挡风」给以的鼓励，彭德怀上了山。 但是同在庐山上，也受到毛泽东特意点拨的周恩来，和彭德怀的表现却是大相径庭。

（２）庐山会议

１９５７年7月２日，庐山会议开幕。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万言书」(笔者注：实际上彭德怀致毛的信大约在３４００字左右)，力陈大跃进的荒唐，矛头直指毛泽东。周恩来开始呈观望态度，李锐问他对「万言书」怎么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没有什么吧。」其实毛泽东已经就彭德怀写的信和刘少奇、周恩来通过气了。　不在庐山的陈云都觉得庐山上气氛诡异，劝接到上山通知的邓子恢不要上山。邓子恢说：幸亏陈云同志，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７月２２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大发雷霆，对彭德怀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毛泽东话中有话，警告周恩来要站稳脚，要思量，别站错了队：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

他们重复１９５６年下半年、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３０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这段话是在敲山震虎。周恩来要以切实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已经悔过。无独有偶，在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在征求《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意见时就联系１９５３年的事情敲打周恩来。毛泽东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八句歌诀，产生于１９５３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意即针对当时政务院在１９５２年未经请示中央讨论即批准财政部发布「新税制」。（笔者注：「新税制」是薄一波报周得到周的同意后发布的，但是周并未上报给毛。）

会后，周恩来就指责彭德怀把「失」字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现在的周恩来，在毛泽东决定反击后，开始积极充当打手，不过不再是打自己的屁股，而是帮着毛打彭德怀的屁股了。

周恩来不是不知道彭德怀是对的，就像一年多以前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对的一样。

周恩来对彭德怀说（笔者注：此对话节选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六个月的存量只有三百一十亿斤。去年增加了二千八十万人。按『一五』经验，一元货币九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一比八点八就紧张了。」

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去讲一讲呢？」

周恩来支吾其词地：「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感叹：「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岂止是人情世故那么简单。周恩来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却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置彭德怀于死地，立下一份功劳，表上一份忠心。

周恩来后来在８月１日的常委会上为自己辩解：「你的骨头是犯上。」　言外之意毛泽

东不是皇帝么？周恩来同志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思想却停留在封建王朝皇权时代。现在应该「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但是「驯服就没骨头？」于是周恩来后一半辈子非常驯服，但是有没有骨头则是见仁见智。这一驯服是对毛一个人驯服，后来还对毛的夫人也驯服。

７月２６日，毛泽东提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由此，对彭德怀的批判开始升温。当天下午，周恩来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提醒到会人员划清政治方向和工作态度的界线：一是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这是第一位的问题；二是工作态度是第二位的问题。周恩来警告下属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要站错队，要保卫总路线，不要动摇；同时要抓好经济工作，渡过经济难关。此外，周恩来还劝彭德怀不要站在局外指手画脚，要尽快认识「错误」亦即检讨。

8月1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其它常委不时插话，追问。周恩来除了为自己的驯服辩解以外，指责彭德怀的信「方向是向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是指向总路线」。当刘少奇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时，周恩来插话说：「这是感情问题。」当毛泽东说彭德怀过去和他七分合作时，周恩来急忙补充说：「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8月1日，批判彭德怀的大批「援军」上山，他们是来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这批「援军」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同志为代表。他在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7月7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第二次在主席那里汇报，他又说，工业的大跃进，是农业的浮夸搞起来的。归罪于农业，也是不对的。大跃进是工业跃进在先。农业是主席直接领导的。他攻击谭振林，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标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冷言冷语，……」，接着，周恩来把常委会上强加给彭德怀的各种罪名，传达给「援军」。如：「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的。」「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是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内分裂斗争。问题本质是这么一回事。」

周恩来还把黄克诚和张闻天捆绑在一起：「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总是密切合作了。」「张闻天讲了三个钟头，文武合璧，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　而黄克诚则是上山之后，周恩来就劝黄不要乱发言。但是黄发言之后，周恩来批评到：「你吃了狗肉来的吧！劲头这么大!」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没有是与非了。

彭德怀折身于庐山。原来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不知道彭德怀是对的？当然知道。但是周恩来依然落井下石，还劝说别人攻击彭。

张爱萍回忆：他上山的时候，庐山上对彭老总的批判已经搞了半个月。也许是怕他们上山后乱放炮、犯错误吧，当晚，周恩来通知他们参加预备会，介绍了前一阶段的情况，特别指出「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总路线的进攻。这有着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是有纲领体系的活动。」　虽然张爱萍想方设法为周恩来开脱，但是就如后来文革中一样，周恩来不仅自己要做帮凶，还要说服别人也要当帮凶。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应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的要求，在会上作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的报告。虽然周恩来表示：「我也不能说对彭德怀同志的历史问题知道的完全的清楚。」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对彭德怀的历史来个总的清算和鞭挞。

报告将彭德怀的历史分成１５个时期：（１）平江暴动及其以后一段时间；（２）立三路线时期；（３）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期；（４）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５）长征、遵义会议；（６）张国焘分裂时期；（７）北上长征时期；（８）洛川会议极其以后、东征以后西征；（９）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１０）华北抗战时期；（１１）延安整风和华北座谈会；（１２）七大前后；（１３）西北野战军时期；（１４）抗美援朝时期；（１５）主持军委工作时期。周恩来历数彭德怀的历史问题。除此之外，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彭德怀以外，周恩来把张闻天和黄克诚也列入「高岗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重要成员」，这一次是「高饶事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

彭德怀倒了，周恩来立功了。

随后在１０月６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恩来发表长文《伟大的十年》，论证了总路线的正确，不点名的批评了彭德怀，指出「我们党内有些人之所以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反对党的总路线。」，为大跃进大唱赞歌。

其实早在周恩来刚做完检讨，于１９５８年的７、８月间在河南农村视察时，就已经表态了。周恩来在８月初视察河南遂平县人民公社时得知亩产才３８５３斤时说，「你们放的卫星不小啊，听说西平县比你们胆子更大一些，放了亩产７３２０的卫星。」周恩来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９日和８月６日两次参观丰产展览，当他看到西平县和平社二亩小麦平均亩产７３２０斤和猛进社一亩七分地的小麦平均亩产７２０１斤时，非常重视。他说：「西平在你们那里，西平是第一的，是状元。」人们用常识作出判断：７３２０斤，在一亩面积的打麦场上平铺将近半米厚，这是不可能的。　由此就可以理解周恩来是如何对待其主管下的国务院各部委所依据的那么多虚假的数据而做出的生产计划！

《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聂眉初回忆：「在那一段时间，我每次都列席中南海大炼钢铁的电话会议，成为聆听这个最高指挥部声音的新闻工作者。这样的会议多由周总理主持，有时是薄一波同志，个别时候是李富春同志主持的……各省是工业书记参加。总理挨个点名询问：昨天产量多少？书记们挨个回答：昨天生产焦（炭）多少，铁多少，纲多少。《人民日报》与此配合，在显著位置以最快的速度刊登各地放的『卫星』和创造的先进经验：８月２１日三版报导了『河南一千多座转炉土炉炼出千吨钢』……(一个个的卫星就是这样放出来的一笔者注)」。

而周恩来后来为了维护「三面红旗」，对于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的主要原因之一的「大跃进」的评价是「这是真正的大跃进，不是吹牛。」

（３）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杨继绳认为：毛泽东７月２３日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大会集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逼他们作违心的检查。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加入反右倾的大合唱。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当然，他们这样做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维护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个人利害关系。在战争年代，他们多是孤身一个，没有家庭包袱，他们认定斗争的对象是邪恶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牺牲了就是烈士。当了高官以后，有妻子儿女，有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是，惩治他们的是被戴上种种理想光环的政权，是被所有的宣传工具天天歌颂的「英明领袖」。这使他们感到，杀了头不仅殃及子女，还要遗臭万年。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中国的高官历来有一个追求：文死谏，武死战。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武死战的层出不穷，文死谏的寥若晨星。这也是制度使然。……１９５６年，周恩来和陈云根据在第一线抓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反冒进」，后来在南宁会议以及其它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周恩来一度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大跃进」就是针对「反冒进」而提出来的。周恩来从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议「大跃进」了，紧跟毛泽东搞「大跃进」。」「既要维护「三面红旗」，又要解决「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

另一种观点则是：

庐山会议后，党内外在一片「反右」气氛笼罩下，急躁冒进再一次抬头，各地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出现了新一轮的「跃进」风潮。旧的困难没有消除，又增加了新的困难。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也从此升级。庐山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接导致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长期混乱。周恩来在庐山处于被动尴尬的地位。在这种处境下，他忧心如焚，顾虑重重，内心常常充满矛盾。他难以忍受一些过头的做法和违反经济规律的事，但又不便在公开场合提出不同意见。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做出的这些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损失，而「变通」起来往往是力不从心，困难多多。特别是「投鼠忌器」，他在尽最大可能消除「大跃进」消极影响的时候，还必须顾及到毛泽东的形象不受影响；他在反右倾保守的时候，还要考虑务实，挤去虚高的水份。他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夹缝中周旋着，在两难处境中游走着。实践证明，庐山会议以后的历史虽然没有因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而改写，但在经济上却把因批右造成的损害减小到了最低程度。周恩来功不可没！

无论哪种观点都承认了：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彭德怀学海瑞，周恩来没有学，彭德怀学了。没有学的周恩来成了批判彭德怀的主力之一。对于周恩来的「老奸巨滑」在庐山会议一开始，就表现无遗：

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这番讲话主要是为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辩护。第二天传达时，当传达到「一年来有好的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时，周恩来插话说，１９５８年邀请来中国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国后谈在中国的观感，说中国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错误缺点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中国「大跃进」这个词好。其实，扎夏季科对中国有批评性意见。周恩来只转达人家的好话，把人家批评的话隐瞒了。周恩来为了用苏联人的话为毛泽东帮腔，竟片面地转述人家的意见。　　深深知道毛泽东内心想要的东西，周恩来总是给予支持，无论是否对人民有利是无所谓的。在此点上，周恩来在后来责任田一事上的表态得到了充分体现。（见第二章）

笔者认为：反「反冒进」是中国建国后第一大转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迅速发展起来的。周恩来可以说是以原则为代价，换取自保的利益。明明「反冒进」是对的，却要顺着毛的意思，偏要说自己不对；明明说不出口，下不了笔，硬是强迫自己公开说出自己的罪过，袒臂接受廷仗。整个国家却继续为毛泽东错误冒进的政策付出代价，直至经济大幅滑坡，天灾人祸，一连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无数。因此，周的相忍为党纯粹是美化，是党重要，还是老百姓重要？可以说，如果没有反「反冒进」，就没有后来的文革。而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进而采取积极措施，而是完全的体现了了一个当时体制下的一个官僚的本色，在大饥荒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２．大饥荒中的周恩来

（１）周恩来对于各地大量死人和农民缺粮是知情的

１９５８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１９５９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１９５９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在线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１９５９年４月６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４月９日，又送上了１５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２５１７万人无饭吃。

早在１９５９年１月至２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１９６０年２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１２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１９６０年初，周恩来收到有关部门转来的安徽省一个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周恩来于３月２９日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

信件全文如下：

希圣同志：

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敬礼！

周恩来

一九六零三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并没有认真对待此事，仅是表示「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同时此信表明了周恩来知道「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

随即在４、5月份，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分别写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事后周恩来也只是表示「信阳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　有人说，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整整一夜没合眼。

但是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的周恩来又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开仓放粮么？没有。相反，周恩来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一书中讲述了这么一个情节：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１９６１年9月１５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３２.１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２.４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２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５日晚，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１０月１６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３３亿斤。」「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３６３８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会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宋任穷回忆：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要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宋任穷还回忆到，当时他派了大批地方干

部和军队干部调查黑龙江省的情况，写了不少报告。周恩来就看了１９篇。但是这并不影响周恩来在１９６２年继续从黑龙江征收大量粮食。

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杨易辰回忆：１９６２年，中央给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２８亿斤粮食的任务。黑龙江虽说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过一点，但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已经十分困难，粮食非常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肿，患肝炎的相当普遍。我主管财贸工作，负责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既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压力很大。１９６２年3月，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调粮问题是一个主要议题。黑龙江省是欧阳钦同志和我参加的。会上，当总理向我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２亿斤粮食支持外地时，我就有些想不通了。觉得黑龙江已经调出了不少粮食，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再要多调出２亿斤粮食，实在困难太大，如果因为粮食出了问题，也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我是个直性子，想不通的事就不容易转弯。因此，就同总理争了起来，表示对再调拨２亿斤粮食有意见，要求中央考虑黑龙江的实际困难。总理表现出高度民主的作风，他并不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强迫我执行命令，而是耐心地听我讲完，然后循循善诱地与我谈，要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大局。黑龙江有困难，但其它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了，想整体的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动上我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３０亿斤的任务。

结果却是黑龙江饿死了１９万多人！

真的拿出粮食来帮助其它省了？还是出口了？此问题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对于粮食的去向分析的非常透彻，在此，笔者仅引用当时的库存粮来说明问题。

对于当时（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间的粮食情况，周恩来是了如指掌的。仅仅从１９６０年6月到１９６２年9月，根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就粮食问题谈话就多达１１５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３２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９９４处。但是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近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但是农村即使饿死人，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在中共当时的封锁体制下，很难象大城市那样容易传播出去。１９６１年8月２３日至9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涉及估产、征购、销售、调拨、进口和集中运输的等多项议题，唯独没有提到甚至也无建议：开仓放粮！

当时的库存到底有多少粮呢？

大饥荒年代粮食库存（贸易粮，亿斤）

	５７－５８年	５８－５９年	５９－６０年	６０－６１年	６１－６２年
七月	３５４.８５	３８８.９４	３３８.７９	２６５.８８	１５７.４６

八月	４０１.９	３９８.７１	３９５.８４	２８９.１１	１９１.３
九月	４８６.３１	４１７.２３	５０３.１５	３４１.０２	２３４.８１
十月	５６０.２１	４１８.１２	６５５.２１	３８６.９３	３０４.９５
十一月	６９０.６６	６５８.０２	８８７.０３	５４０.０８	４６０.５７
十二月	７５６.９１	７４８.４３	８４８.９８	５７２.１１	４９０.０２
一月	７２５.０８	７１４.４２	７６４.１５	５１０.３５	４３８.７９
二月	６７６.７５	６５４.５６	６７３.１９	４４４.５	３９４.８８
三月	６０１.６６	５５６.０１	５４４.５４	３５９.８３	３２８.８６
四月	５０７.６２	４３３.５	４０３.５１	２６７.８９	２５７.９８
五月	４０４.５３	３１９	２８６.２２	１９０.８６	２００.９２
六月	３８４.４１	３４３.２８	２９７.０６	１７１.７１	１８９.２８

资料来源：１９６２年8月２５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数据提要》

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周恩来无需说什么大话，只要下令开仓放粮就可以了！而在个别地方，确实有地方官员开仓放粮而导致本县死亡人数大大低于邻县！　就连信阳那么死亡严重的地方，都没有运粮进来！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　而作为罪魁祸首之一的吴之圃在６７年因病去世时，周恩来竟然还提出要为他举行追悼会！　可见当官和老百姓在周恩来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可见为了调粮到中央，为了出口，为了其它，但不是为了救人命，周恩来谎言说尽！

（２）周恩来仍然决定卖粮食换黄金

应当说，当时很多的决策是毛泽东或者当时的体制决定，周恩来并无太多主动权。例如在造成如此重大死亡的大饥荒原因之一就在与不准老百姓逃荒！根据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的记载，地方官员根据１９５９年3月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制止百姓逃荒，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而此文件正是周恩来根据根据郑州会议精神亲手改写制定的！　显然这是针对当时饥荒日益严重，百姓逃荒事件剧增而出台的。此事如果完全算到周恩来头上是不公平的。

但是并非说明周恩来手里毫无一张牌可打！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１９６０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

「１９６０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８０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周总理这种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崇高思想质量，使我们感动不已。事隔这么多年后，每当我想起他这两句言简意赅铿锵有力的话，仍然感慨万千。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１９７０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

一两是１.６１３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４０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２.４６１８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大米约为０.２元人民币每公斤，１０万两黄金就需要近１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１９６１年也还是如此买进！１９６１年发生了什么？

１９６１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对于事无巨细，事必亲躬的周恩来，可以理解不能违背中央政策不开仓放粮，不能违背中央政策制定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卖粮食换黄金却是周恩来一手决定的！是钱重要？外汇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对于本国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对于那些死亡的证据又是如此的敏感保密，这个是何等的讽刺！

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在到地方大员，庐山会议后，从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不再像１９５９年那样，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从好处着眼，是维护大局，是防止党的分裂，但是如果从官场进退，政治沉浮、个人得失等角度来看，周恩来等顺从毛泽东的意志，明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敢进言，而是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共同把灾难推向极端。

第二章 文革前的四年：在「君臣关系」中揣摩

周恩来历来是紧跟当朝的一把手。在毛泽东的眼里，如果毛下台或者周在毛死之后还在台上，那么周是极有可能做「秘密报告」的人。因此毛借「反冒进」整治了周恩来，随后掀起了「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的进一步「跃进」加剧了大饥荒，而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退让。这时虽然有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６０年代初期，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６０年代初期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可以当场拍板。

随着经济的好转，毛整肃党内高层的念头重起。刘少奇在１９６２的七千大会上当面指责大跃进，触动了毛。但是毛泽东在先整周还是整刘的问题上尚未作最后决定。直到刘少奇让王光美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江青告了状。鉴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教训，毛泽东感到有生前被清算或架空的危险，同时江青的告状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于是拿掉刘少奇成了毛泽东的优先选择。同时由于周恩来的积极迎合，特别是同刘少奇相比，对待江青的态度，在毛泽东决定先打倒哪一个上起了重要作用。在毛泽东清洗了「彭罗陆杨」之后，刘少奇的态度，终于使得毛泽东下定了决心。但是周恩来始终是要被打倒的一个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没有等到被画叉叉，周恩来就离开了人世，随后毛泽东也撒手人寰。

一、重新解读七千人大会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打倒了刘少奇。文革的中后期，毛泽东又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没有等到毛泽东的那「九篇文章」重新「出炉」，周恩来就去见马克思了。　　众所周知，在「反冒进」的时候，毛泽东批过周恩来，说周离右派只有５０米了。　　但是此时「批周」和后来文革中的「倒周」完全不同。毛泽东何时开始想「倒周」？或者更明确的说：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革的时候，是否在准备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刘少奇，还是另有他人？笔者在阅读大量的文献之后，发现毛泽东在考虑发动文革的过程中，对于是先「倒周」还是先「倒刘」是考虑过的。是因为刘少奇自己的「所作所为」，周恩来给予毛的「充分配合」，才使毛在１９６５年初下定决心先「倒刘」。

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对此有过如下表示：一则是喜，一则是惧。「喜」，是指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是指除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思想混乱外，也包含担心身后有人否定自己。　　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在当年仅是担心有人反对他的话，那么从苏共二十大之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吸取斯大林在世时没有能识别和除掉赫鲁晓夫式人物的教训。

许多专家学者说，七千人大会是个分水岭。主要的证据为三：

第一个是：刘少奇的「指头论」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满

张素华女士持有这种看法：

「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就有意见，岂料刘少奇在１月２７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更讲了一些让毛泽东心中不快的话。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天灾、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他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这里有人要问，早在１９６０年底和１９６１年初，毛泽东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为『人祸』，刘少奇这样讲毛泽东怎么会不高兴呢？问题是，毛泽东自１９６１年４月以后，几乎没有再用『人祸』的提法，也从未做出过几分人祸几分天灾的判断；此外，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他经常讲，尤其是在工作出现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者，毛泽东虽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时，曾突破『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但是并没有对全国的工作做出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的估量。因此刘少奇的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大胆，作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泽东从未做出过的判断，而这些敏感问题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多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几次谈到『人祸』，是在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讲的，而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对工作做出了这样的估量，毛泽东听起来自然不那么愉快了。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１９６４年8月２０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４、５月更讲得严重。』可见刘少奇的这一估量，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张素华女士指出「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刘少奇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七千人大会上首次提出的。

刘少奇在１９６１年的5月３１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它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

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这几年确实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见效的事情。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虽然没有七千人大会规模大，但是也包括中央和各地负责人，含（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其助手）。　因此涉及面也不能说小。

第二个是：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2月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时说：「１９６２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然而张素华经过查证毛泽东讲话原稿，发现毛泽东并没有在七千人大会上这么讲过。

第三个是：三面红旗的问题

张素华认为，尽管刘少奇为三面红旗做了辩护，但实际上「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每一面『红旗』都做了论述，他的方法是总体上肯定，具体上指出问题，事实也等于检讨了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意见并不是很大，有的问题他自己也做过检讨。关键是刘少奇的结论，即『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就要取消？毛泽东似乎觉得刘少奇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尤其同林彪相比，更显得刘少奇坚持『三面红旗』不那么理直气壮，即使同周恩来相比，刘少奇的态度也显得有所保留。这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不满的另一个因素。」

或许刘少奇是有所保留。实际上，当在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有人对于三面红旗的维护不够。刘少奇这才口头讲话上做了大量的对于三面红旗以及总路线的肯定，而这些在其选集中仅被「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所代替。刘少奇在讲话中对于总路线是完全肯定的，对于每一面红旗都是用大量的词语来维护的。　笔者认为刘少奇的对于「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的表示恰恰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维护三面红旗：不要因为现在出了这些问题而否定它。这正是刘少奇要传达给听众的信息。而至于刘少奇真心是否也这么想，或许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真心维护，则是另当别论的。

综上所述，毛刘的矛盾并没有后来渲染的那么严重，特别是在毛发动文革后，一些原本的说法被改动。例如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于苏联的说法是强调向苏联学习而非后来１９６６年整理公开的反修内容诸如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等。后来党史界为了刻意把七千人大会的分水岭作用夸大以及把其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源头，使得七千人大会陡然突出。

那么是否就可以说七千人大会是否真的没有影响或者没有重大影响？当然不是。

流传颇广的江青说的一句话，很多人认为其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直到文革才出了这口气。　然而笔者在查阅所有关于江青

此次讲话的多种版本，未曾发现。《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在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说：刘被打倒后江青说：现在才出了七千人大会上这口恶气！但是马沛文也没有提及江青在何时何地讲的。　　但是这是否就表明许多文革史专家判断毛泽东在１９６２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以后就开始计划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呢？

在毛泽东那张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１９６２年的「右倾」赫然在目！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始于１９６２年策划无疑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不久，毛泽东已下令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始策划排除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高层的反对派。　　我们的问题是：毛泽东在锁定刘少奇之前，是否还另有打算？

很多人在解读这张大字报时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就是毛泽东除了指责刘少奇之外，还同样的指责了周恩来！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这点毫无争议。然而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周恩来采取任而不信，时而警告，以至后期则采取了打倒策略，这点上确实重视不足。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中却透露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周恩来无疑也是牵涉在内的中共大员之一。毛泽东指责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同时，把工作组问题同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６４年中央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联系起来，明确指出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周恩来都难脱其身。　　毛泽东是否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后，在先打倒刘少奇还是周恩来的问题上有过犹豫，继而仔细斟酌，随之时局的变迁，最终做出了先打倒刘少奇的决定？

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为什么对周恩来不满？经过三年大饥荒以后，毛泽东实际上内心知道是失败了，并且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的。但是这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这种自我批评不是真心的，是在客观情势的逼迫下、当时大饥荒的压力下的产物。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名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则被毛私下里改为「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并讽刺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１９６２年1月３０日，毛泽东做自我批评，除此之外，还另外讲了几点，其一就是民主集中制：「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对于毛泽东的这话，明显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更为隐晦的是，在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不是发自内心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有「替罪羊」。是什么导致了毛泽东今天要当众批评自己？毛泽东不会真正的去从自己的原因去找答案。如果毛泽东真的认识到，根子出在自己身上，那么就不会有以后的文革。毛泽东此话还可以从反面来理解：因为有人提供了虚假材料或者对我施行了封锁，我并没有得到真实的材料和数据，所以你们要承担责任。对此，毛泽东除对刘少奇的当面指责不满外，对于周恩来心生不满也是不难想象。

１９５９年４月，毛泽东在上海讲：「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周恩来就更不敢在毛泽东面前讲真话，为此被彭德怀怒骂为「老奸巨滑」。中共高层圈子的人都知道能够引起毛泽东大发脾气的几件事都与他认为有人向他隐瞒情况报告有关。１９６５年春，罗瑞卿在和林彪谈话时说：「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林彪的反应是完全同意。　有一次毛泽东当着叶子龙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到底为什么？」叶子龙说：「早在１９５８年１月份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听到的不完全是实话。」毛泽东找人了解情况，但听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没人讲问题。

周恩来对此心领神会。周恩来在２月３日为毛解脱和分担责任：「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像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在这里，周恩来首先讲了下面提供假材料的责任，又为毛分担了责任。

在２月７日，周恩来继续为毛泽东辩护。周恩来首先是努力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表示忠心：「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其次，周恩来再次为毛推卸责任：「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周恩来的这些动作，并没有获得毛泽东真正的欢心。对于自己威信受损，毛泽东迁怒于刘，也迁怒于周。毛泽东迁怒于周的另一个原因，则来自于周恩来的顺从。毛泽东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非常容易把责任推给那些只是顺从领导而不提意见的人。恰恰周是这方面的典范。

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在２月６日的讲话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责任，实际上就把责任推给了具体办事的周恩来。于是周恩来在２月７日的讲话指责了邓小平。周恩来在检讨了国务院的责任后说，「国务院的具体工作都是在书记处的领导下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周恩来自反「反冒进」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在决策方面被边缘化。国务院制定的文件要拿到书记处

讨论，周恩来也要参加书记处的会议。但是，这样一来也难免有影射毛泽东之嫌。因此对于周来说，难有「万全之策」。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没有收入《周恩来选集》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周恩来一方面要千方百计为毛泽东辩护，另一方面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不免要顾此失彼。但是周恩来维护毛泽东的一面是占了上风。

彭真在１月１８日提出毛泽东也要负责任，有错误也要检讨后，１月１９日许多人对于彭真的这个讲话做了不同的表态。周恩来显然对彭真的话不满：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如粮食上交１３０到１５０亿斤，就很难。１９５９年认识钢材，１９６０年认识煤炭，１９６１年认识木材，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来的这个表态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周的意思非常明显：第一：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特别是集权到毛手里，要听「梢公」的话，同毛泽东在１月３０日讲话的弦外之音不谋而合；第二：维护「三面红旗」，即使周恩来知道「三面红旗」带来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不久前周恩来在河北调查时对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过比较尖锐的意见（笔者注：当时毛泽东提议要求的）。周恩来的这番表态无疑是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成熟一面，但这对于国人是否是福，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周恩来在此处的表达的另一个观点则是应该肯定的，必须顶住当前的困难局面，不能低头。

正是在周恩来的这番表态下，陈伯达才奋起指责彭真，国内党史对陈伯达的不公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张素华女士在其《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中就用「发难」二字来形容陈伯达的发言。

二、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表现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线人员的根本差距在于对于形势的判断。毛泽东认为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越过了最低点。早在１９６１年的８－９月份，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毛泽东这次开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再次提高征购粮食数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同意的。但是在刘少奇等人的反对下，此举没有通过。周恩来如此讲：「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　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之后有过内部指示，指出：「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　周

恩来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一旦毛泽东提出要再次高征购，周恩来再一次跟上了。

但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等召开了西楼会议。发现了财政问题十分严重，原因则是屈服于政治压力，怕戴右倾的帽子，财政部门没有报告，对此李先念等人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刘少奇因此说：「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怕什么？！」

１９６２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做了发言。刘少奇直言不讳的改变了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基本估计。刘少奇的讲话非常尖锐，甚至把对困难的估计的够不够上升到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　而周恩来的讲话则明显「弱」，是在强调调整所需要的时间上做文章，而非强调形势的好坏。　显然这样讲话，政治风险会小的多。实际上，周恩来早在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工作时就说「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周恩来的看法更接近于毛泽东的看法。

毛泽东的看法恰恰同此相反。而且事实上经济的快速好转，让毛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５月１１日，周恩来说「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除部分地区还在继续外，大多数地方已经停止并开始回升。」　麦克法奎尔认为正是经济上的好转才使得毛泽东在１９６２的夏季能够发动反击。　毛泽东是否进一步认为，大跃进的发动大家都有责任，对于形势的看法为什么又要改变？实际上却是一步步好转。刘少奇等人的做法是否借此向自己施压或者逼其让权？

此时的周恩来虽然也跟在刘少奇的后面，积极的参与经济调整工作，却比刘少奇谨小慎微得多。王光美在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陈云同志曾就包产到户和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业生产的问题，同一些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来同志表示还是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回北京的当天（１９６２年的7月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笔者注），陈云同志当面向毛主席陈述意见，主席不表态，实际上是反对的。毛主席和陈云同志谈完话后，即找周恩来同志谈话，接着又找少奇同志谈话。」

早在１９６２年的４、5月份，田家英同逄先知在上海向毛泽东汇报调查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时，杨尚昆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下？」田家英当即表示同意。

作为一个国家总理向一个秘书询问国家政策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王朝遗风。如同皇权时代丞相要通过皇帝的近臣来了解皇帝的思想和转达自己的意见，虽然田家英的地位远远低于周恩来，而此近臣也一点不含糊，立即自己就做了决定。当陈云寻求意见时，周恩来看重的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毛的意见要比多数常委的意见更重要。

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还有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部分是「坚决还账，努力承担国际义务」，周恩来提及对于其它国家的援助并不能因为自己困难而削减对外国的援助。　这同王稼祥在七千人大会后提出的「三和一少」是完全相反的。周恩来为此被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表扬。

毛泽东在农村大搞社会主义教育，城市进行「三反」、「五反」的时候，没有忘却对上层建筑的改造。毛泽东要把上层建筑改造成能够为自己的革命路线而服务。因此毛泽东对于知

识界、文化界大动刀戈。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而被牵连，作为周恩来依赖的重要副手，周恩来并无一句为习仲勋辩诬，仅是在毛泽东的允许下，告诉习仲勋「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劝其「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　对于文化界艺术界，周恩来也是积极配合毛泽东的决策。（笔者注：周恩来是很早就感觉毛要在文化界大动干戈的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

例如对于江青要搞样板戏，周恩来非常配合。《人民戏剧》在１９７７年撰文称：「周总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极为关心革命现代京剧的创作，浇灌了许多心血。周总理日理万机，非常繁忙。但是，他总是不辞辛苦，抽出许多时间来看戏，提出修改意见。毛主席作过指示，肯定过的几个样板戏，总理不知参加过多少次排练，看了多少遍演出，作过多少次指示。」其实无论是在样板戏，还是在京剧改革上，只要作为毛的「探测器」（江青）有任何要求，周恩来都是积极配合的。（笔者认为：周恩来是对此是非常明情的。江青自己也对王光美说过说：做对了是毛主席，做错了是自己的。　）

中国文艺舞台开始刮起编演现代戏的时候，周恩来对于泊来品芭蕾舞指示到：「当然，芭蕾舞是外来艺术，不可能一开始就民族化，可不可以先编个巴黎公社，或者十月革命题材的？」周恩来并委托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处理此事。后来林默涵真的抓了，搞了一部《纺织女工》的现代剧，并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

除此之外，１９６４年，在大跃进饿死的那些冤魂尚未远去的时候，由周恩来任「总导演」为毛泽东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歌舞剧《东方红》面世。此剧在树立毛泽东个人崇拜方面立下的功劳不亚于后来形成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当年它在各种政治场合的地位仅次于「东方红」，在为毛泽东个人崇拜制造气氛方面，也只有「东方红」可以相比。这首歌的诞生同周恩来也是密切相关，而且在文革前期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最后都是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此歌。

艺术作品，在周恩来手里成了为毛泽东树立个人崇拜的工具，而且独出心裁。通过更通俗更容易传播的音乐和舞台艺术，使毛泽东在普通老百姓心中扎下了跟。当年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仅是林彪，还有独具匠心的周恩来。用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搞个人崇拜，利用这种手段来保护自己，是周恩来奉行的基本策略之一。

建国以后，毛泽东始终对知识分子怀有深深的「敌意」，阶级属性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自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６０年代初的系列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再到文革，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在这当中，江青被始终赋予了重任。从参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６０年代初期的文化界的政治斗争，江青是毛泽东精心培育的「尖兵」，也是为「文化大革命」准备的的「旗手」与「文攻」闯将。

对待江青的态度，是周和刘的一个很大不同。同一个时期，周恩来的小心翼翼同刘少奇的「猖狂」形成了明显对比。如果考察６０年代以来的上层政治斗争，无论是早期的刘少奇、中期的林彪，还是后期的邓小平，他们对于江青以及后来江青势力（即「左派」）的态度是如此的重要，甚至都可以影响到他们的存亡与是否可能复出。

江青说过：「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　周恩来则不同。文化部于１９６４年6月5日至7月３１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在6月２３日由周恩来出面召集演出人员并举行的座谈会上，江青首次以江青的名字公开出席了大会。江青在会上批评到：「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

罗瑞卿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机构。时值四清，（毛岸青的太太）劭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毛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邵华坚持要去，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却很不高兴，于是下令取消罗列席常委会的资格。后来毛的护士吴旭君告诉，这是邵华自己要去的，罗参加常委会的资格便得以恢复。

邵华仅是一个儿媳而已，江青则是毛的夫人，对江青态度的好坏，由此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同此对应的是，江青对于毛泽东的影响也很大。例如江青的告状，在刘少奇倒台一事上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笔者注：详见下文）。

在文革中直到１９７２年的年底，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也维持的相当不错，虽有冲突，但是合作是主要的。

刘少奇可以说是发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但是建国以后，特别是「八大」以后，见于国内外的局势变化，刘少奇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造势已经远远落后于周恩来。虽然在庐山会议后，刘少奇再次表示要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是刘少奇同时又说也要搞林彪、邓小平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在刘少奇眼里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了。

赫鲁晓夫下台让毛感到活着就被推翻或者架空的可能性。毛觉得忠于其本人比忠于其路线更为重要。这也是毛喜欢个人崇拜的终极原因。周恩来搞的针对毛个人的《东方红》无疑是备受毛泽东欣赏的。而此时的刘少奇不仅不继续在搞毛泽东个人崇拜上努力，而是要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后腿了」。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写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当选时大不相同。街头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拿着彩旗，舞着狮子，放着鞭炮，并排举着毛和刘的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很明显，在中共高层，有相当多的人在暗暗为刘使劲。刘在制止饥荒上的功劳使他有了众多支持者，就连毛的亲信也觉得刘「行」，「有办法」，跟他「感到对路」，而同毛疏远。甚至还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当时毛的像只在节庆时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刘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正在选举刘的当儿，刘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刘当选后走进来，看见妻子在场，一愣。毛劈头盖脑辱骂了刘一顿，仇恨之意溢于言表。刘跟妻子僵坐在那里，默然对视。

三、整肃周的活动

苏共２０大之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的影响巨大。一喜一惧，喜的是毛终于「小媳妇熬成了婆婆」，惧的是自己身后是否也有人会做秘密报告。朱德的秘书陈友群说：五六年我曾听田家英同志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道百年后如何？」　因此对于毛来说，牢牢的掌握权力是其核心纲领。然而权力斗争是掩藏在路线斗争之下，不是赤裸裸的喊出来的。权力斗争的目的之一又是为了培养自己中意的接班人，而此举又是为了防止赫鲁晓夫报告的出现。大饥荒却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开展党内斗争、换掉现有的接班人、树立新接班人的计划推迟。赫鲁晓夫下台之前，毛泽东主要是防止有人会在其身后做秘密报告。历史上的周恩来和康生非常相似，这点在西方学界基本上达成共识。　那就是周恩来历来是摇身一变，跟随新的一把手，并且痛打前任一把手。但是在文革中，康生主管的中联部，江青很难插手进去。　这和周恩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１９５８年周恩来被指责为「反冒进」，进而后来有了柯庆施要取代周恩来的说法。　但是无论此事真相如何，周恩来下台一事并不是空穴来风。

王若水回忆说毛泽东曾经在１９５７年大骂邓拓为汉元帝，他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骂。后来王若水才知道周恩来因为「反冒进」被毛泽东批评，并且在１９７３年毛泽东再次提及汉元帝时，方才明白：我一直以为，１９７３年那次毛提及汉元帝是指周恩来，而１９５７年那次是指邓拓；这说明我没有真正听懂。现在我才明白，其实两次都是对着周恩来——５７年骂邓拓不过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而已。　李志绥认为，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　王若水还说：毛泽东曾经将想把周恩来从总理的位置上撤下来的意图告诉刘少奇，征求刘的意见，刘没有同意，大概刘觉得不能理解。党外民主人士就更想象不到毛竟会有这个意图了。所以，在「大鸣大放」中，竟没有什么人批评周恩来。　但是王若水并没有说是从何处得知「毛泽东曾经将想把周恩来从总理的位置上撤下来的意图告诉刘少奇」的。

七千人大会之后，江青和刘少奇、王光美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１９６２年的北戴河会议期间，江青告诉王光美这次是田家英、陈云犯错误。

在１９６３年底或者１９６４年初，江青找王光美抱怨其在中宣部、文化部受到冷遇。江青对王光美说：文艺界的问题如何如何严重，说北京借口没有房子住，不让在北京搞文艺会演。她向主席告状，主席发脾气，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房子把人民大会堂腾出来，进部队招待所。然而更令王光美感到惊讶的是：江青毫不隐晦地讲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坏话。她两次声色俱厉地说：「夏衍是个叛徒，怎么调到北京的？要追查!」她还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事后王光美把江青谈话的情况和内容详细向刘少奇报告了。刘少奇后来找江青谈话，对江青进行了批评，并说中央准备开一次文艺问题座谈会，你对文艺工作有些意见，你可以今天在我这里谈，也可以到会上谈。

迟延昆先生后来回忆说：王光美于１９８０年春天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我只是在１９８０年五月中旬听陆德（陆定一之长子）讲述过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当时陆定一已经解放，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待遇，所以读到过这封信）。　信的主旨是，毛泽东本来要联

合刘少奇整周恩来，但是由于刘少奇不肯配合，毛泽东反过手来联合周恩来打倒了刘少奇。她在信中说，１９６５年春节（笔者注：根据《刘少奇年谱》推断其实是１９６３年底），江青去她家讲了许多对周不满的话，其中我今天还记得的一件是说夏衍不是好人，为什么会调到北京。当王光美向刘少奇转述江青的意见时，刘少奇批评了王光美，要她不要过问这类事情。并说：「夏衍调北京是我（刘）批准的」。　其实早在建国一开始，毛泽东就约刘少奇谈话，反对周恩来。但是刘少奇就没有同意。刘少奇说反总理对党的事业不利，周恩来有很大功绩，绝不能反。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６日，毛泽东在听取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２０％？３０％？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指周恩来）的秘书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整个文化部都跨了。」

齐燕铭和周恩来关系非常密切。毛泽东惯用手法就是「剥笋」政策，由表及里。周恩来的外围就是齐燕铭、陈毅等人。到了文革，周恩来死保陈毅，就是这个道理。后来打倒刘少奇，不就是先拿掉彭真嘛?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指责周恩来：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子走！为此，周恩来被迫取消了「总理办公室」的建制。　对于这种批评，周的秘书们是有不同看法甚至是愤愤不平的，但是这无济于事。　周恩来表示：我现在有１２个人，６、７个人下乡，还剩一半，还不行，要作个彻底革命派，把那个办公室不要了。　周恩来对于毛的指责，改正的比谁都快。对于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跟风跟的特紧，例如在文革中，当毛泽东提议要精简机构时，周恩来再次对其总理值班室「动手术」。

对于如何建设三线建设，毛泽东对国家计委非常不满，终于导致国家计委的改组。　周恩来因此而向毛泽东检讨：「这星期内，建议主席指定时间，约富春、秋里、一波、伯达、先念（瑞卿不在）参加常委会，听取秋里口头汇报，并给指示。」草案说：这些年来，在计划工作中没有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病根就是思想方法陷在形而上学的泥坑中不能自拔，计划工作不讲辩证法，工作做得不活，没有生气，老在那里搞烦琐哲学，气魄不大，甩得不开，没有战略观点，不能高瞻远瞩。现商定由余秋里负责组织二十人左右的计划参谋部，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搞长期计划。」

「小计委的成立」实质上削弱了周的经济管理权。建国以来，李富春一直领导计划工作，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而李富春领导的计委则是毛泽东眼中的「独立王国」之一。　即使毛泽东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但是实际上周事情繁多，难以专顾。事实证明「小计委」是贯彻毛的经济思想，削弱了周的权力和地位。

实际上早在１９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毛泽东就决定成立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统一管理公安部、内务部等。　谢富治直接向毛泽东负责。

对照历史，１９５８年6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６３-６４年周恩来的权力也一直不断削弱，后来在文革八届十一中全会，陶铸分管了大部分部。所有这些史实表明，周恩来一

直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职位，周恩来在文革前丢失。中央调查部的一系列任务都被当局视为至关重要，诸如反间谍、收集政治情报、保证高级官员出行的安全、监控访华的外国要人和代表团，其前身更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建国后常委里面是由周恩来主管。但是文革前夕，由邓小平接任。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再由康生接管。

毛泽东的心态从《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的批语可以探知一二。此文实际上包括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写的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篇文章。

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到：「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　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它领导人中间传阅。

１９６４年春，「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档案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极具攻击性的文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显而易见的是，刘少奇已经知道此文，而且此文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目标显然是周恩来，而且周恩来恰恰是文中所攻击对象之一。毛泽东是提前给一干大员「打预防针」，是在拉拢刘少奇。

然而，在１９６５年１月２日，毛又将此件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让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以便毛「修改」。众所周知，谢、陶都是属于毛嫡系人马，李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由邓小平出面毛泽东同意才保住位置，不过后来李的表现确实令人惊讶，大致是邓小平最后也被打倒的缘故。

引人注目的是毛在１９６５年１月２日的批语中写道「删去文中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还说，「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最终以刘少奇道歉了事。　这绝对不是巧合，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在这段时期前后，已经改变打倒周的打算，开始拉周反刘，但是又不明确反刘。

此文又经多次反复，１９７４年６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尽行删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此举完全是针对周恩来有意将此文作为反周的大石头。此为后话。

四、为什么毛最后还是决定先倒刘

七千人大会之后，坚持激进的毛泽东和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为代表的相对务实的人在路线和政策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并且这种分歧越来越严重。这些分歧的本身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但是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掩藏在背后的是毛泽东是否被架空夺权的问

题。麦克法奎尔认为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内的权威明显受到削弱。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犹如「反冒进」之时，毛泽东再次说「强迫签字。」谁是这里的中央？难道是刘周等一线领导么？显然不是，是指毛泽东自己。毛泽东觉得意犹未尽，在当天发出《关于领导机关应加强请示报告工作的批语》。批语说：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国外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表扬了外事部门，实际上是对周恩来的表扬，但是同时又对刘少奇、周恩来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

统战部副部长、曾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宁一后来说：为什么从刘少奇同志身上开刀呢？毛主席认为党权是在少奇同志、政权是在周总理那边，而刘周用的人都是坏人，反对他的。

毛泽东发动反击，是从两个方向上开始的。一个在国际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方面在国内开展四清五反运动。

然而，毛泽东出于胜算的考虑，不可能刘少奇和周恩来「一锅端」，只能联合一个打倒另一个。那么是什么促使毛做出何种决断呢？

决定先「倒周」还是先「倒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赫鲁晓夫下台。

周自己认为自己对毛泽东是忠心的，但是毛泽东并不是这样认为。毛泽东说：周恩来从来都是跟从一把手。　换句话说，周恩来不是忠于毛泽东个人，而是因为跟毛泽东这个强者，自己才不会打倒，才有胜算，由此才选择了毛泽东。但是一旦毛泽东死后，如果周恩来活过毛泽东，周照样象批李立三、博古一样批毛泽东，做赫鲁晓夫式的报告，而且周恩来的发迹历史就是一典型的批判前任领导史。但是在毛泽东生前，周恩来会跟着毛，要保持晚节。

赫鲁晓夫的下台，让毛泽东觉得必须要防止生前就有被逼下台或者被架空的可能。

刘少奇对蹲点、调查会以及四清等问题上，是犯了「天条」的。刘少奇在１９６４年夏，一时间呼风唤雨，四处游说，并于８月１日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上，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宣称，若不蹲点，则无资格做中央委员、省

委书记、地委书记。同时刘少奇声称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开调查会为毛泽东发明所创），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

在如何搞「四清」的问题上，毛泽东亦曾经对刘少奇的看法表示过不同：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针对刘少奇的「扎根串联论」）。事后由田家英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如果是周恩来的话，二话不说，就立马写检讨，然后在第一时间递上去。

《毛泽东传》的作者们表示：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

然而事实上远非仅止于此。

刘少奇在１９６４年对江苏「四清」运动的开展不满，同江渭清发生冲突。实则是刘少奇觉得江渭清不买「账」。　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汇报全省运动进展。刘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后，于9月２３日覆信给江。刘少奇在这封信中首先针对江渭清信中所写的「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的一段话，表示这些话「不完全正确」，其次刘少奇提出「应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刘少奇解释他之所以反对学习江渭清那篇讲话，是因为江渭清的讲话「空话连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　刘少奇还指出：「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　虽然当时此信经过毛泽东修改，并且毛评价甚高，但是刘少奇此举未免影射江渭清将毛泽东著作当作教条之嫌。　矛头直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然而，在造神运动中不落后于任何人的刘少奇此等行为，自然在毛泽东眼里是属于叛变之举。自然，同周恩来、林彪等人相比，刘少奇就更显得「不合时宜」。

刘少奇的以上种种做法，即使本人无影射、贬低毛泽东之意，但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同时，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下乡蹲点，但是迟迟不见动静。刘少奇一发火，做报告，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就趋之若鹜般参加城乡四清。　这不能不让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　而且报告中明确说：「对毛泽东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这更是让毛觉得是釜底抽薪。　同时期的周恩来对于毛的个人崇拜却是大造其势。

江青知道刘少奇的报告后，哭着向毛泽东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被他一手提拔的亲信、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经过密谋策划而赶下台。毛泽东后来说：「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江青的告状，这和毛泽东的担心是一致的。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赫鲁晓夫的下台给毛泽东敲响了警钟。

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到哪一天也会把毛泽东弄掉。」

１９６４年年底，毛刘公开发生冲突。１９６４年１２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的做法让毛泽东无法继续忍受下去，其一是１２月１９日刘少奇安排的王光美介绍「桃园经验」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等到毛泽东出面就自行宣布散会，毛泽东对陶铸夫妇讲「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拉尿」；　其二是１９６４年的１２月２７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打断毛泽东的话并且不再给毛泽东讲话的机会直到会议结束。　所有这些都让毛泽东难以接受。后来刘少奇道歉，毛泽东也表示：「我批评了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　实际上隔阂已经产生，难以消去。

刘少奇在毛泽东生前就有大不敬的态势，让有利天平渐渐倾向于周。

毛泽东在批评了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统战部、文化部等之后，现在又转向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但是毛泽东又不能盲目行动，犯「四面出击」的错误。更重要的是虽然刘周等所有一线领导无可能一致对毛的行动，但是毛泽东却要防备这一招。

从周恩来的角度看，刘、周之间的矛盾远远大于周、毛之间的矛盾。刘在「高饶事件」中曾与周连手，但是在「反冒进」时却被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准备用对待整风的态度对待大跃进并暗示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达到了「路线」性质的程度。毛泽东在周恩来对其大表忠心后，又采取保护周恩来的做法。　对于周恩来来说，自然是对毛既感激又畏惧。但是对于刘少奇来说，周恩来却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在６０年代初的经济恢复期，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关系是若即若离，并非亲密。首先是在刘少奇的力主提议下，在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握有经济大权，相当于经济内阁）里面，周恩来仅为组员。在１９６２年的北戴河会议期间，周恩来受到了下面的很多人的指责。有的在二月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上赞同中央决策的人，现在开始反悔埋怨（因为毛泽东开始批黑暗风），甚至对周恩来说了十分难听的话。刘少奇并没有出来为周恩来说话，反而是和毛一唱一和的又领导起新的潮流。　无论从历史的渊源还是历史的现实，周恩来都和刘少奇存在着相当大的芥蒂。而这种关系在毛泽东看来，恰恰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五、局势的发展

虽然后人从意识形态、毛对社会理想的追求、以及对国内特权阶层不满等等诸多「正面因素」来寻找毛发动文革的原因。但是纵观整个文革，特别毛本人就是最大的「资产阶级法权」拥有者，所有的这些，毛在文革中从来没有从制度上或者法律上拿出有效的措施来维护或者保证所谓这些「正面因素」。事实证明，毛发动文革，其一：立足点就是权力，拿回权力是为了保证自己生前或者死后不会被推翻或者鞭尸；其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树立自己认为可靠的接班人；其三：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己成为斯大林之后的世界共运的领袖（笔者按：此举早早破产，而且这也是毛自建国后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

毛泽东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从扫清外围开始。这些外围就是后来所称的「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周恩来后来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份讲「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

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　　「彭罗陆杨」是连在一起的，毛泽东是作通盘考虑的。

但是整「彭罗陆杨」前后，局势并不是很明朗。康生在１９６５年８月底９月初，在钓鱼台同几个秀才讨论建国以来的外交工作时表示：「我早就认为，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与会人员雷英夫提出疑问：外交可是周恩来一手领导的。康生表示：「你到底还年轻，还不懂得什么叫路线，什么是路线斗争。政治上的问题，复杂的很呢。现在你还不明白，过一年、两年之后，你会慢慢明白的。」雷英夫后来说，进了监狱之后，才明白康生已经预感到文革风暴，并且怀疑要打倒的第一个是周恩来而不是刘少奇，或者刘周「一锅煮」。

就在１９６６年的３月份，江青在搞文艺座谈会的时候还批了周恩来：「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提出了……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也好嘛！这次会是毛主席赞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锁起来.不向下传达。周恩来另外又搞个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纯粹的民族乐队，不许混杂。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改作检讨的。」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要不要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事情。１９６６年２月初，彭真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说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可以从容考虑。３月５日，刘少奇在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不派，并将讨论结果告知毛。但是毛并无回音。３月１０日，彭真提出，鉴于毛没有答复，是否可以考虑另外一种意见，刘少奇以与会人员常委仅为其一人为由拒绝了彭的提议。但是３月１２日，彭真突然通知吴冷西，已征得刘少奇同意，另起草一份电报。但是吴冷西拒绝起草。彭真于是自己起草，然后用电话传给毛。　　此事后来成为彭真一大罪状。

此事非常蹊跷。毛泽东首先不表态，继续钓鱼。而后无论彭真是否得到刘少奇的同意，都会造成是刘少奇同意的结果。然而妙处在于，毛泽东在此时非常害怕内外勾结，这才是致命之处。此举对于彭真的倒台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对于刘少奇也是大大不利的。

文革起来之后，在工作组一事上，周恩来完全表现的圆滑。

而刘少奇却越陷越深，在７月２９日的讲话成了压断骆驼腰的最后一根稻草：「清华有人写了一条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大家认为不得了了，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起不了作用，搞不乱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保护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刘少奇同志讲到这里，毛主席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刘少奇的讲话被打断，全场掌声雷动。　　实际上毛完全是冲着这句话才突然出来的。毛疾步行走带出来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都扇到地上去，刘少奇不得不弯腰下去拾。毛泽东此时走到舞台前沿，全程震耳欢呼。穆欣回忆道：「这种情景，给人们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刘少奇被一张大字报「打倒」。周恩来被派到清华去继续表现自己：「我当时从外地回来，又碰到外语学院的问题，我选了二外，到二外又碰到张彦在这个方面所造成的恶劣情况，这

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张彦的问题。本来想接着转到外语学院去，但是由于清华的问题，中央和主席让我去，我不得不改变方向到清华去。」

第三章 文革初期：积极配合毛发动「文化大革命」

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大步骤。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是积极配合毛泽东，出了大力气的。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的出色表现，使毛看到了周的意愿和能力，对于文革的发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使毛决定在打倒刘少奇之前不仅不去动周，而且还要大加利用。

一、拿下杨尚昆

毛在文革中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打倒了「彭、罗、陆、杨」。在这四个人当中，杨尚昆第一个被拿下。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也就是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层增加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

毛对杨尚昆的不满是由来已久的。１９６５年7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会议，当着周恩来的面大骂杨尚昆，说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王力回忆说：毛主席早就要杨尚昆离开北京，说杨尚昆搞窃听，还说反右派时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骂杨尚昆从来不检讨，他打右派打错了，翻过来了，他也不检讨。会上大家说马上叫杨尚昆走。会开完后，杨尚昆打电话给吴冷西，问会上谈了些什么问题？吴说「我没参加会，你问王力。」杨尚昆就问我，我不好说毛主席骂他，只说毛主席在会上大讲党史，讲庞然大物。从这次会以及后来的发展看起来（因为毛泽东同时骂了刘少奇的秘书邓力群），庞然大物是指刘少奇。

毛泽东说杨尚昆窃听事件、不检讨仅是放出来的烟幕，非实质性问题。杨尚昆被免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职位的敏感性，并非完全因其本人的所谓错误。所以一开始并没有被打倒，而只是免职、调动工作。１９６６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打到杨尚昆的决议时，把背着中央私自安装窃听器等罪名都加在了杨尚昆头上。对此，周恩来明确说过：「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

杨尚昆被免职的实质意义是，毛要把中央的机要与保卫的权力交给自己的亲信汪东兴掌管，保证毛泽东的旨意畅通无阻。虽然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出身，与杨的工作阅历和能力，无法相比，但是由汪东兴掌管中办，毛泽东才更放心。

除此之外，不为人注目的是，杨尚昆还代表中央分管「克格勃」（即前身为中央社会部，建

国后改名为中央调查部）系统的工作。文革发动之际，在毛泽东眼里有窃听前科的杨尚昆自然不能被继续信任。

那么在拿下杨尚昆的过程中，周恩来起了什么作用呢？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９日，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三人代表中央约杨尚昆谈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通知他将被解职，调任广东省委书记。杨尚昆当然知道此事的严重性，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

１１月9日，杨尚昆「写了一封信给主席」，要求「能见见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评、指示」。１１月１０日，「中午主席找去谈话」。毛泽东这时还和杨尚昆打马虎眼，说什么「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以及什么调查、汇报之类的话。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９日，杨尚昆到周恩来办公室告别。此时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知道又要搞什么运动。杨尚昆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找周恩来。杨尚昆激动的对周恩来讲：「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它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中央对杨尚昆的问题「早有察觉」，当然应该是毛也有察觉，周也有察觉；然而在同杨尚昆谈话的时候毛也不动声色，周也不动声色。想当初周恩来对于李锐询问彭德怀的信会有什么结果时不也是不动声色么？

文革兴起之后，根据廖汉生（杨尚昆的妹夫）的回忆，１９６６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原在国务院教育部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作的白林（廖汉生的妻子），「就因为尚昆的『问题』，不适合做党办工作，调整到其它处工作」，「２０天以后，贺龙元帅家里传话给我，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事隔一天，王尚荣来到我家，转达了贺龙副主席的意见」。「我向白林转达了领导同志的意见，要她接受组织的考察」，廖又分别向贺龙、叶剑英、李雪峰、杨勇、郑维山汇报了情况。

虽然周恩来是什么意见？贺龙又是什么意见？廖汉生都没有说清楚。但是结果却表明了的：「株连」是有的。

二、整肃罗瑞卿

接下来的是整肃罗瑞卿。不少人引用罗瑞卿的秘书王仲方的回忆说周恩来事先不知道，此事是值得商榷的。

罗点点在其回忆录中说周恩来是知情的。

余汝信先生认为：「因为罗所处的敏感位置，毛泽东当然认为会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漏风声。惟多种材料及回忆表明，常委中除毛、林之外，起码周恩来、邓小平是知情的。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到达上海的当天，１２月５日，即召周恩来从北京飞上海。当天，周在毛召见后，即成为毛有关批罗指示的实际执行者。其它与会者中，起码陶铸、谢富治、叶剑英、肖华、杨成武、李作鹏、张秀川、王尚荣、雷英夫等是知情的。政治局成员中，刘少奇、彭真、贺龙等不知情并不奇怪。在毛的心目中，罗与他们走得那么近，提防还提防不及，岂能让他们事先知情！彭真毛就干脆以在京「看家」为名不让他到会。」周恩来事先是否知道，或者是提前多少天知道，是可以商榷的。而笔者更兴趣的是周恩来在批判罗瑞卿中的所作所为。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说：「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　　但是罗点点并没有举出实证来证明自己的说法：周恩来到底知道多少？

罗瑞卿的倒台，涉及诸多因素。笔者曾经专门撰文论述。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姚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转载问题成了政治上的「试金石」。１１月２５日，周恩来飞抵上海，随即知道姚文的内情，当即打电话通知了彭真。　此时的周恩来尚不知毛的底，还「与」彭为善，这也是周恩来的一贯作派。一旦知道毛的底，周也翻脸不认人，痛打落水狗。罗瑞卿此时也在上海陪同毛见外宾，并在和毛的交谈中得知毛是看过姚文的。《罗瑞卿传》以及一些刊物对此的表述是：罗得知后给彭真打电话，并告诉彭真，毛已经看过此文，他已经要《解放军报》转载，请彭真也考虑转载。笔者认为，事情的微妙在于，就在罗打电话之前江青刚试探完罗瑞卿。罗拒绝了江青关于要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的提议。而江青则告诉罗，北京就是因为有彭真才不转载姚文的。现在罗真的打了电话给彭真，在毛看来，彭真确确实实「按照」罗的建议转载了姚文（关于周恩来的作用见下文论述）。这充分证明了罗彭的关系不一般。　　或许罗瑞卿想留一手或者其它原因，《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在转载时的表态是不一样的。

周恩来是在１２月５日到上海，当天毛就召见了周恩来，随即成为毛有关批罗指示的实际执行者。　　周恩来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游说叶群出面揭发罗瑞卿。

叶群到达上海后，带林豆豆到上海锦江饭店去看周恩来，谈了七八个小时，林豆豆一直在场。林豆豆说，她们连午饭也没吃，叶群说她本来不愿在会议上发言，总理通知她讲一讲，她就讲了一讲。周恩来说是主席亲自点的名，叫他一定通知叶群讲一讲。林豆豆还听周恩来对叶群说，主席召集这个紧急会议后，怕罗长子在云南搞「政变」，特别对云南加强了控制。叶群还问罗长子会不会逃到国外，周恩来说不会。　　叶群为什么不愿意讲？因为周恩来要叶群讲的只是重复叶剑英在１１月４日的话。

罗瑞卿的一位部下这样回忆，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４日，叶剑英从杭州打电话叫我第二天坐飞机去见他，说事情很重要，但没有说什么事，说来了就知道了。第二天晚上下了飞机，叶帅已派车等在机场，然后把他接到空军疗养院，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肖华都在。叶帅开门见山地说，家门不幸，罗瑞卿出问题了，一是要当国防部长；二是对林彪封锁消息，不汇报；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汇报，要不一说几个钟头，林彪在大连养病，罗瑞卿拿地图讲了很长时间，林彪直出虚汗；四是对林彪搞突然袭击，等林彪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

就解决问题。说完，叶帅没有评论。我说，我回去对罗瑞卿采取什么态度呢？叶帅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来了。几天后，我随罗瑞卿去参加外国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路上，罗瑞卿气得鼓鼓的。原来是李作鹏几个找他谈工作，吵起来了。罗瑞卿还很奇怪，李作鹏过去不是这样嘛。我心里有数，李作鹏肯定也被打过招呼。果然，上海会议之前，李作鹏几个人拿出了一封诬告罗瑞卿的信。上海会议主要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给他罗列了许多罪名，罗瑞卿一直不承认那些不实之词，再三说明自己是支持拥护林彪的。为此，罗瑞卿同志受了不少冤屈。

叶剑英实际就是安排此人回去盯罗瑞卿的梢！而后来叶群在上海会议提出的「叶四点」完全是叶剑英提出的这四点的翻版！因为叶群所说罗瑞卿通过刘亚楼讲的四点如下：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　　「叶四点」其中心内容是罗瑞卿要主管军队，做国防部长，而叶剑英对这位罗瑞卿的部下所讲远比「叶四点」厉害，基本上就是后来给罗瑞卿定罪的基础－－－由折磨封锁林彪发展到反对林彪。

但是为什么后来毛泽东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点？很明显，毛泽东决定要打倒罗瑞卿之时，不再像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那样赤膊上阵，那样连个转圈的余地都没有。毛泽东要借用林罗的矛盾，这样通过叶群的口说出无疑要比通过叶剑英的口砝码重的多！另外比这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通过此举把林彪捆绑在「倒罗」的战车上，而对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重视，因为后来根本就没有形成以叶群讲话为主要内容的下发中央文件！

周恩来做通了叶群的工作，而叶群在某种程度上被与会人员看作是林彪的代言人。周恩来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封锁彭真。

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杨成武递交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写了那段著名的批判「折中主义」的话。此件在转发时还有彭真的份。但是随后，林彪于１２月３日写信告毛：十二月二日主席有关五十五师突出政治一文的批示已经收到。毛泽东在此信上于１２月７日批示到：

林彪同志：

此信一同印发。

十二月七日

彭真同志暂不来此，可以不送阅了。

毛泽东已经决定不让彭真参与上海会议，属于被封锁对象。

上海会议召开后，在云南的罗瑞卿知道邓小平、李井泉被叫到上海会议开会之后，自己却没有得到通知，急的象热锅上的蚂蚁。　　罗瑞卿打电话回北京，问彭真。彭真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　　彭真打电话到上海，找吴法宪询问会议情况。时值吴法宪在

周恩来房间，秘书过来通知吴法宪。吴刚要去接电话，周恩来阻止吴：不要接，就说找不到你。他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吴法宪觉得当时非常奇怪：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列席常委会，位高权重，难道彭真也出了问题？　罗点点则说：后来彭真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吹了一点风。彭真又打电话给罗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知道了。

是信不过吴法宪，怕吴法宪说漏嘴？自己要亲自交代彭真才行。无论是哪种情况，周恩来都巧妙的利用了彭真，彭真是把罗瑞卿「搞到」上海的一个重要棋子。难怪周恩来对叶群说，罗瑞卿不会跑。

但是周恩来除此之外还是做了严密布置。首先，罗瑞卿一到昆明，周恩来就打电话告诉阎红彦要看住罗瑞卿。　再次，周恩来委托吴法宪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周特意强调，要吴亲自掌握好这架飞机，做好应变措施，飞机只能往东飞，不能往西飞。吴法宪说：明白这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者印度去。

吴法宪亲自交代前往接送罗瑞卿的时念堂机组，并且告诉他们：「现在发给你们机组每人一把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时，你们要听中央的。空中要注意监视他们（罗瑞卿等）的行动。」就在吴法宪交代机组人员的时候，周恩来特意打电话来询问情况，吴法宪汇报说：请您放心，机组人员的飞行技术不错，政治上也很可靠，一定能把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好。」

这不是把罗瑞卿当敌人看待了吗？

很明显，周恩来要保证罗瑞卿来上海与会，故意让彭真去安抚罗，让机组还带枪「押送」，以便成党交给的任务。

上海会议分为三个组，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由周恩来主持的组异常活跃。

罗到上海后，也是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指示出面与罗谈话。当罗瑞卿要求见毛泽东或者林彪把事情说清楚的时候，周恩来不同意，「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并被周批评为「幼稚、天真」。　据说当时是周恩来一把抢过秘书手中的电话，疾声厉色的怒斥！

上海会议只是决定把罗瑞卿清理出军队系统。但是为了保证文革的顺利发动，毛泽东决定有必要在军队进一步肃清罗瑞卿的影响。于是毛泽东决定于上海会议之后的来年三月份召开批罗会议。　特别是《二月提纲》以后，毛泽东要把彭真饶进来，特意安排留守北京的彭真主持这次会议，让彭真充分表演。果不其然，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三月批罗会议中，叶剑英把罗办秘书等人写的揭发材料报给毛，罗自己也写了个申诉检讨材料。毛作了批示，大意是罗是漏网的高饶分子，罗执行的是资本主义军事路线，在政治上反党反人民的，作风上一贯飞扬跋扈，要批倒批臭，彻底打倒。但是叶剑英并没有把此批

示告之罗，而是把罗朝死里整。罗此时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毛身上。罗在３月１８日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去见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他无论见到他们其中的哪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　周恩来却告诉罗：你的事情是主席亲自定的，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幻想）！罗瑞卿听到此话，五雷轰顶，写了个便条给其家人，随即跳楼自杀。周恩来得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罗是自绝于党。

从这些情况来看，周恩来不仅事前参与了倒罗的各项准备活动，且事后作了大量工作，周在１９６６年5月２１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给罗瑞卿等人定性时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１５日上海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了文艺晚会，演出的中间还安排了舞会。因为刚揪出了罗瑞卿，干部当时还是非常紧张，但是周恩来忽然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评弹助兴。作为广州人的叶剑英结果却唱出了地道的苏州评弹，周恩来同叶剑英的配合真是相得益彰。　周恩来一吐心中怨气。

原来，罗瑞卿飞扬跋扈，曾经在建国之初就对周恩来出言不逊过。在处理被称之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的第一冤案》（陈泊、陈坤被罗瑞卿迫害一事）过程中，周恩来受陈泊之妻吕璜之托，专门从公安部调阅案宗，然后同罗瑞卿交涉。但是罗瑞卿根本就不买账，在电话中就指责周恩来。知情人告诉笔者，罗瑞卿指责周恩来，你插什么手，你是政务院总理，但是不是我的领导，这个事你管不着！罗瑞卿同周恩来讲话电话后，大为震怒，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受到严厉指责，对陈泊的迫害变本加厉。　后来周恩来评价罗瑞卿：「你们艺术学院出来的，部艺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是罗！罗瑞卿、陈其通、魏传统是气味相投，都喜欢旧的。当然艺术院的学员是好的。他们一谈起四川戏，一点不好也不让讲，不但对你们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罗瑞卿就是不准讲四川戏不好，飞扬跋扈！你听他说过吧？（郑维山：听过。）他们气味相投，应把他们批倒、批臭。」

三、清算陆定一

陆定一遭清算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认为「宣传大权」要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中。除此之外，陆定一和林彪、周恩来、陈毅等人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面。毛泽东要靠这些人去发动文革，清算陆定一自然有为这些人「买单」之意。

１９６１年夏季，《文艺十条》出台，但是陆定一不准发出。周恩来、陈毅多次催促，仍不准发出。１９６２年年４月，趁陆定一不在北京，才得以发出，而且是用齐燕铭主持的文化部的名义。

周恩来在１９６２年的时候，对待知识分子一度表现的很右。　周恩来在１９６２年的广州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但是此事在中央高层有人反对，此人就是陆定一。中宣部不让传达这个讲话，更不能公开。　当时陆定一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意识形态。　当时的周恩来寄希望毛泽东对此表态，但

是毛泽东却没有为周恩来说话。　　毛泽东怎么可能为周恩来说话呢？时任中纪委常委的曹瑛在讨论《历史决议》时说：１９６５年，我陪柬埔寨外宾到武昌，毛泽东同志接见。毛说我要使整个文化界还有党政军等，使他们半年到一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了。他是咬牙切齿地说这个话的。

１９６３年，中宣部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长会议，会议简报称：「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赫鲁晓夫的观点。」矛头直指周恩来。会议简报还称：「中宣部有三条线：一条是周总理、陈云，抓文艺；一条是康生，抓理论工作；一条是陆定一，没有什么可抓。」就是说，周、康等人在文化部夺了陆定一的权，销了陆定一的职。周恩来自然非常恼火。在随后召开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中，周恩来突然到会，本来周恩来很少参加书记处的会议（笔者注：此说并不准确，《周恩来年谱》对周恩来参加书记处会议多有记载），非常激动的讲：「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我首先讲的，列宁早就讲了，少奇同志也讲过，我讲了为什么就不对呢？」　　陆定一为什么敢对周恩来开炮，不对刘少奇开炮呢？１９６３年的刘少奇风头正劲，陆定一捏柿子专挑软的捏。

陆定一直比较左，左到什么程度？（笔者注：文革之后，陆定一是属于反思比较彻底的一位中共元老。）顺应毛泽东的旨意，１９６３年3月１６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在批评有鬼魂形像的戏演出渐增的问题时，突出的批评说「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批评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７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陆定一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陆定一还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知情人说，毛泽东一直认为陆定一在政治上比周扬强。

比较诡异的是，但是若干年后，文革爆发，陆定一作为《阎王殿》的阎王被整肃，周恩来却仍然高就其位，这为周恩来的高政治段位作了极好的脚注。特别是陆定一的「左」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八届十中全会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的这种欣赏左倾干部的思维从「反冒进」就已经形成，这为中共体制内的干部多为「假大空」提供了极好的解释。

周恩来的及时转向以及同江青良好的关系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和１９６４年6月，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重要批示先后发表。周恩来用激情澎湃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忠心拥护：「实在应当登高一呼，把主席的话广泛地传播开，而且在行动上来证明，真正是拥护党和毛主席的话。」周恩来亲自抓《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革命现代剧，并主导了歌颂毛的历史大剧《东方红》，把毛泽东的宣传与崇拜推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潮。　　在１９６３年１２月2日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出台之后，周恩来就提出文艺界要彻底改造，改造的根本途径是和工农兵相结合。　　周恩来反过来指责中宣部，我和你们斗争到什么时候，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按照毛主席的讲话办？

同周恩来相比，陆定一在江青面前明显不如周「识相」。江青说过：「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　　周恩来则不同。

１９６３年，江青认为只能搞现代戏，不准搞古代戏。周恩来就责问周扬：「你们不是说现代戏不好写吗？（指《霓虹灯下的哨兵》）现在不是写出来了吗？你们看怎么样啊？你

们不要老写死人了，写写现代戏吧。」

文化部于１９６４年6月5日至7月３１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出面召集演出人员并举行座谈会，江青首次以公开身份出席了大会，在会上批评到：「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

江青在中宣部指手画脚，陆定一也很少顶他。但是，陆定一对于当时文艺界的态度和江青是不同的，是搞「折中主义」的。陆定一一方面认为满足于「帝王将相」等戏，中国迟早也会出现赫鲁晓夫；另一方面，陆定一也认为《赵氏孤儿》等戏要允许其存在。　江青认为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于是转往上海。

江青在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后，要求陆定一合作遭到拒绝。　但是那个时候，毛泽东对于陆定一还是保护的。毛泽东说认为：文艺界的问题，中央有责任，他也有责任，不应该责备陆定一。　但是在１９６５年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炉后，陆定一配合彭真，对此文进行抵制，大大激怒了毛泽东。周恩来出面，要求彭真陆定一等对此文进行转载。　在随后的《二月提纲》出炉的过程中，陆定一也和彭真站在一边，此时陆定一下台的命运已经注定。陆定一自己也不是没有感觉，在１９６６年2月去武汉汇报《二月提纲》的时候，就非常紧张。　陆定一把自己和彭真绑在了一起，都认为「评海瑞罢官」一文中罢官和彭德怀的联系是乱联系，不好。

于是陆定一和彭真一起遭到了清算，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以往的过节。

在１９６６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陆定一清算历史旧帐：「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不能这样讲，……不能像陆定一所讲的那样一律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根本不讲理，副总理要兼一个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干，说我要抓大权。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员会，他也不干，因为胡乔木同志建议要搞文字改革委员会。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陆定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后他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的决心。厚道是有阶级性的，有党性的，对国民党蒋介石不能讲厚道。没有个性，只有阶级性、党性。」

以后，周恩来多次点陆定一的名，指责其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恩来管不了中宣部，管不了陆定一。　１９６６年9月２７日，被审查中的陆定一写信给周恩来要求看一些文件以便写检查，周恩来没有理会。

１９６７年1月，周恩来追溯当时对中共五大部中两个最老的、最有名的部（组织部和中宣部）进行的冲击，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们自己组织部落在了安子文手里，思想工作落在陆定一手里，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许多高级干部不如年青人活跃这是个根源，是阶级根源。」

从陆定一遭到清算，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政治路线」并没有「组织路线」重要，是否遭到整肃和清算，并不完全取决于你的政治观点，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用得着的人。陆定一所鼓吹的的「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若干年后在代表毛思想的「两个估计」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

四、斗倒彭真

彭真在七千人大会的时候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变局－七千人大会》的作者张素华认为：彭真的这段慷慨陈词，成了七千人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他是惟一一位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错误（当然，毛泽东不仅仅是这些错误，但即使是这一些错误，当时也无人敢具体指出），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彭真的这个讲话，成了日后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不断被人们所称赞。」

反过来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彭真是说毛有错误，然而重点还是在后面，为毛分担责任，找了「替死鬼」。

钱痒理先生则认为：彭真指责毛确实不合中共党内的高层政治生活规则的。但是彭真对毛的这些批评，都是毛在「大跃进」遇到挫折后多次承认过的。彭真的说法类似「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因此钱痒理认为，彭真的发言与其说是针对毛泽东，不如说是通过坦率的指陈来维护毛泽东。　笔者赞同钱痒理先生的解释。彭真的讲话，在毛看来是否是真的批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个是彭真自己，一个是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有无受到影响。

１９６１年，彭真回山西视察时说：这些年大家受苦了，因为我们犯了错误。他接着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马克思犯过错，毛主席犯过错。他说：「谁不犯错误？毛主席自己讲，我的错误一火车也拉不完。我彭真犯过的错误就更多了。」　这说明彭真在七千人大会时的讲话是有前例的，并不是突兀的，这可以看出彭真还是维护毛的权威的。

更重要的是在７０００人大会之前后彭真，是得到毛的充分信任的。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彭真被毛半路调到庐山上，充当生力军。对苏论战当中，彭真也是毛依赖的主力之一。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对彭真的信任更为突出。

１９６３年冬，毛泽东派江青到北京搞京剧改革。江青说：「主席说了，北京做得好，叫我来学习。」而且其时毛对北京市的工作是满意的，表扬的。彭真和市委也是欢迎江青的。１９６４年，毛泽东还夸奖彭真：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你怎么搞？北京是首都嘛，全国各省、市都看着你呵！　毛泽东选择文化界作为突破口时，在１９６４年7月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笔者注：毛泽东一开始是提名陆定一，但是陆定一推辞不干。）

正如彭真的秘书说的：「表面上看，是看不出毛泽东要搞彭真的。『文革』前他似乎很信

任彭真。比如，１９６１年各国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中共派代表团出席，任命彭真为团长；６０年代中期，有个时候要批判朱德有野心，毛主席是让彭真去和朱德谈话的。又比如，直至１９６６年３月，周总理出国访问期间，中央就把周总理的一些工作交给了彭真代管。」其间，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事情出在江青和北京市委日行渐远上。彭真一开始对江青也不错，到后来就应付了，最终导致江青的不满。

无论如何，直到１９６４年年底，毛泽东对于彭真还是高度信任的。这可以从《前十条》一直到《二十三条》的制定看出。毛泽东在指责计委和中央书记处为独立王国的时候，并没有表示对北京市委有什么不满。在１９６５年初期，邓小平和彭真甚至取代刘少奇负责社教运动的领导工作。　　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彭真的信任。

事情的转折点在吴晗问题和姚文元的文章上。而正是这个问题，彭真和陆定一一起栽了个「大跟头」，被划到一个「集团」里面。

１９６２年夏，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江青就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定一当场拒绝。１９６４年，毛泽东亲自把《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３９个《文学艺术数据》，批转至县团级，却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提出批判吴晗的问题。吴晗则于应周恩来要求，写了正式报告，说明《海瑞罢官》绝无影射意图。当《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发表后，陆定一认为，此文牵强附会联系「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进行抵制。

后来周恩来说，１９６４年主席提出过批判吴晗的问题。１９６５年４月２日周恩来到邯郸碰到刘子厚、李雪峰。李雪峰对周说，主席批评了彭真，说彭真认为批判吴晗是个人问题。周恩来回京后对彭真说，雪峰对你有意见，说你对主席指示听不进去。彭真表示：「批评得对。我的认识同主席的话有本质的区别。」

笔者认为，如果彭真配合毛，批吴晗，作为批周或者批刘的干将来使用也未尝不可能。毛泽东是递给彭真一把双刃剑来处理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当然从历史的变化发展来看，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终究还是难逃一劫的。

当彭真在１９６５年硬顶着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时候，周恩来介入。周恩来得知姚文（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之后，在１１月２７日出面向彭真挑明，此文是毛泽东亲自批阅过的，彭真不得不表示可以转载。　　对于此点，国内党史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在孙琦所著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作生涯》中说：周恩来心里明白，这篇文章一定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如果北京的报纸再不转载，那便是公然和毛泽东对抗。无奈，他只好亲自过问，到了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对此，康生和张春桥曾经讲：上海市委告诉了周，周给彭真打电话之后，北京才同意转载。张春桥还特意讲到：罗瑞卿到上海，下飞机后从警卫员中听了点消息，知道了对北京的意见。陈丕显先和罗谈了，罗打电话告诉彭真。陈又告诉了总理，文章在总理的督促下，拖到１１月２９日，北京各报才开始转载。

彭真的秘书说：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

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２８、２９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杨成武也陪过）。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贺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

这也验证了周恩来的杨尚昆是单干户的说法。

周恩来的介入也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周恩来的这种介入，完全可以在后来说成是周恩来「包庇」彭真，成为打倒周恩来的一大证据，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重大信号，就是周恩来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得以解决。

当时是两种对立的观点形成了僵局。周恩来在此时出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彭真被迫做出让步。这仅是表面的东西。其实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运动」是否能够顺利经过分娩的阵痛，在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在周恩来的出面之下，终于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来到世上。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的形成作为标志，文革序幕的一角就这样在周恩来手里掀起。笔者认为文革应当从１９６５年的１１月算起。

彭真同意《北京日报》在１１月２９日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跟进。《人民日报》则将姚文元的文章作为学术性的而非政治性的文章转载，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加上了按语说「欢迎批评，也欢迎反批评。」即是按语中的「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同彭真谈话，重申《海瑞罢官》的的要害是「罢官」，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表示「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吴晗不是政治问题。」实际上，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挽救」彭真。　　毛在修改姚的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指出这一点，完全是出于「时机不到他不会透露半个字，以免打草惊蛇。」　　当时毛彭谈话的时候，在场的还有杨成武和康生。杨成武刚刚因为在倒罗中立下了大功。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三个人都被视为将来「文革的重要干将。」后来，张春桥对彭真的顽固表示惊奇说：「不知道会触动这么深，震动这么大，更不知道彭真会这样坚决地反对。」

彭真在１９６６年2月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时候，仍然坚定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　　事情的转折出在3月１１日晚。当许立群向彭真请示如何回答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提出关于「二月提纲」涉及的「学阀」等问题时，彭真指责上海市委在发姚文元的文章时失去了党性。　　彭真这种对待上海的态度完全是和毛泽东的设想背道而驰的。

但是毛泽东的权术是如此的「莫测高深」。１９６６年3月１８日至２０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吴冷西对周恩来讲：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周回答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吴冷西接着向彭真也谈了，彭真的回答同周一样。

１９６６年3月２８日至３０日，毛泽东同康生连续三次谈话。而在谈话之前，康生说：3月２８日我去上海前，与总理谈了一夜。　　康生与周恩来到底谈了些什么，迄今未见披露。但是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毛泽东觉得一举拿下彭真是很有把握了。笔者认为，其一就是

刘少奇当时不在家，其二就是周恩来的表态。于是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要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康生后来在５月５号和６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毛泽东的这三次讲话贯穿一个中心问题：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现在已经出了，彭罗陆杨，田家英、邓拓、廖末沙都是，向中央进攻，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３月３１号，康生奉毛泽东之命回到北京并且当日将三次谈话纪要给周恩来、彭真看并汇报四个小时，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不仅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作者注)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同时，除了向毛写了正式报告之外，周恩来还特意用打电报的方式告诉毛泽东以示郑重，表示对毛泽东给以坚决的支持。

随后，４月２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那篇没有让发表的攻击要害的文章。４月５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被压的文章。　而当时的《人民日报》是周恩来主管的。

周恩来私下背地里抛开其它常委做如此表示，影响可谓非常恶劣。

在中央常委中，周恩来示第一个作如此表示，以示忠心。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中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陈云曾经对「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为什么发生如此表示过：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而周恩来则是向毛泽东臣服的第一干将，离开中央集体率先表示同意错误意见，因此对于文革的发动，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远远不是仅仅用被动的卷入，说了几句违心的话那么简单。周恩来做的不仅单纯表示向毛泽东效忠，而且变本加厉，拿出实际行动来拥护对毛泽东的支持。

４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以中发（６６）２１１号文件批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语说这个纪要很好，很重要…不仅适合军队，还适合地方。４月１６日，周恩来认为此批语一般化，对纪要的评价不够。陈亚丁根据周恩来的口述重新起草了个批语。江青找刘志坚、张春桥、陈亚丁做了推敲修改，２２日刘志坚送周恩来审定。５月２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废止２１１号通知，１０日用新批语代替，但是时间仍落款为４月１０日。新批语相对与旧的，着重增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内容。　众所周知，《纪要》在江青從作为协助毛泽东指挥文革的助手摇身一变成为旗手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周恩来此举也是向毛江等作政治上的表态。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在思想上对于即将到来的文革做了动员。４月底的周恩来在一次讲

话中说：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目前正在我国兴起。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长期的斗争。我们必须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以及其它各种文化界中，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４月９日至１２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恩来指出彭真的「路线」是错误的，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１９６６年4月１６日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周恩来并且代表中央同彭真谈话三次，指出其所犯错误。　彭真对于这一切应该早有准备。早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之时，就是因为周恩来的干预，彭真才做了让步。后来撤销《二月提纲》的时候，毛泽东打电话给周恩来，对《二月提纲》作了严厉批评，质问周恩来这个材料怎么会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达，到底是哪个皇帝决定的。对于毛的指示，周恩来告诉彭真：想不通可以保留看法，你现在需要沉默。毛主席看过那些人的文章，而且是他亲自批准。你、我，还有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都应尊重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党不能再出现任何裂痕了。

毛泽东敢于趁刘少奇出国访问之际拿彭真开刀，这同周恩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至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障碍基本上都排除，只剩下如何让刘少奇等犯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错误了。

五、参与发动「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对于文革的发动知不知情，中共官方的的说法是说周恩来不知情，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不太清楚，周对「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的。　事情果真如此嘛？事实上周恩来从处理杨尚昆、罗瑞卿的时候就开始涉入，并非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知情，反而是积极地向毛泽东表态，全力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

１９６５年夏，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将由别人取代的消息，已在极小的范围内传出。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１９６５年秋，周恩来奉毛泽东命去看望已赋闲几年的王稼祥，周恩来对王稼祥说，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　在「文革」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它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的接班人时，认为邓小平可以接替毛来掌舵。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在他的狱中回忆里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

当然也有人看出了征兆。邓力群就说过：「拿我来讲，过去不知道林彪跟毛泽东的争论，觉得林彪不但政治上行，而且会打仗。管好中国这个国家，中共这个党，光懂政治不懂军事不行。据我的接触，当时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少。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选择，不能说不包含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林彪的看法。」　笔者曾经和国内一位党史专家对此进行过讨论，从１９６５年的形势来看，南北连个方面均有战争威胁，北面来自来苏联，南面来自入侵越南的美国。战争的威胁是毛泽东要换接班人的原因之一，而且这种形势下，林彪则是第一人选，特别容

易获得党内支持。

按毛泽东的说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发动文革，是想清算建国后十七年的总账，清算所有在十七年中反对过他的人，包括刘、邓、周、陈、彭等等。当然，毛泽东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采取分化、拉拢等手段，层层剥笋，各个击破。在１９６５年底至１９６６年４月份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大力协助下，顺利完成外围的清理工作，即「彭、罗、陆、杨」被打倒。而在这一阶段刘少奇的「被动」同周恩来的「顺从与积极表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有数据表明，刘少奇只是在大局一定的情况下，才表态支持。但是周恩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正如他同吴冷西讲的：「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因此周恩来一方面要积极配合毛泽东的部署，另一方面要不失时机地、不断地向毛泽东表示「忠诚」。

除了在清除「彭、罗、陆、杨」「四大家族」的工作中竭力配合之外，在毛泽东的其它部署上，周恩来也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主要执行者。

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所谓《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４月２４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根据李雪峰的回忆，这个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 这个扩大会议其实也就是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演，文革的到来已成定局。

刘志坚回忆说，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就把他叫到钓鱼台８号楼说，中央确定刘志坚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

５月１日，周恩来在欢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的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毛泽东为了这个头等大事，做了长期的准备。

１．随着林彪一起念「政变经」

林彪在著名的１９６６年「５?１８讲话」也就是所谓的「政变经」中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５月１８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

５月１８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胡志明时，都说「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

但后来周恩来却说「５?１６通知」「关系到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理论、路线、方针都谈到了，归结到结束语，主席已经意识到睡在旁边的赫鲁晓夫，不仅是彭真，有的已经揭露出来，有的还没有揭露出来，有的还正在培养作为我们的接班人，各级党委都应该提高警惕。这个话在中央来讲是刘少奇。那个时候不能说，是党内文件，你们没有传达。就是我们经常跟主席接近的人，有那么一点点感觉，但也不敢想，因为主席没有透露。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感觉，曾经跟主席议论过，拿林彪同志和刘少奇比，林彪同志的思想性高得多了。」

在５月１８日的时候，当着刘少奇的面，周恩来当然不会明确说刘少奇就是赫鲁晓夫。但是背后不还是和「主席议论过，拿林彪同志和刘少奇比」过么。「不敢想」的说法是仅仅是为了衬托毛主席的「权威」而已。因此，周恩来在五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是明确知道毛泽东的矛头所指。这在周恩来５月２１日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倪端来，通篇讲话充满了对林彪的吹捧，但是对刘少奇则丝毫没有赞扬。

要说林彪一个人在念「政变经」，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无论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还是刘少奇都有念过「政变经」。　在５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鉴于毛泽东多次谈到要防止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建议林彪做一个关于政变的讲话，这就是林彪说：「常委的其它同志要我先讲」的由来。　戚本禹在论及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时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笔者认为周恩来比刘少奇更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其实，周恩来不仅大讲特讲防止反革命政变，还大力吹捧林彪，号召全党群众要紧跟毛泽东走，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一定意义上讲，周恩来的通篇讲话就是为文革的发动做了全党的动员。

余汝信先生论及林彪「５?１８讲话」的要旨是「防政变」而决不是「政变」。「防止反革命政变」及随之成为实证例子的对彭、罗、陆、杨「四大家族」(周恩来语）的揭发批判，是当时毛泽东灌输予中央的思维定势，并使之成为整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共识，不是林彪个人的发明创造。以解决彭、罗、陆、杨为主要任务之一的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持者是刘少奇（受正在南方的毛泽东所委托），常委之中，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都讲了话。林彪「５?１８讲话」开头第一句就说：「本来是常委其它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让林先讲，并不等于其它人不讲。按照戚本禹的解释，而这「常委」则是指周恩来。林讲话之后，周恩来于５月２１日、邓小平于５月２５日均分别在会议上讲了话。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有无正式发言，至今我们不得而知，目前所知的刘少奇关于彭、罗、陆、杨问题最详尽的说明，是其于当年６月２７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据目前所知，周恩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均未见中共官方的正式转发件。故此，长期以来，歪曲史实者似乎有了可乘之机，造成的假像是似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有周、邓、刘与林彪观点相同、论调一致的言论这么一回事，即使是比较严谨的文革史著述，在对林彪「５?１８讲话」大加鞭挞的同时，对周等人的讲话也是避而不谈，未着只字。

中共正式出版物首次公开承认有周恩来的讲话，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一条简短记载：「５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惟

要参阅周讲话全文，目前还只能求助于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出版物。

周恩来开宗明义的讲，「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至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笔者注：周恩来在此狠批彭、罗、陆、杨）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与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讨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笔者注：原文如此，不太通顺。）

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 5 月 5 日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时谈到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所采取之策——「剥笋」政策。毛泽东说：……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周恩来讲：「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笔者注--这是党内第一次把彭罗陆杨作为一个反革命集体对待)，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削政策的胜利（笔者注：原文如此，笔者认为是剥笋政策），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像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领导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彭（真）是高山倒马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

对于「四大家族」，周恩来后来还耸人听闻的评论到：「１９６３年主席就曾经说过要防止党内一两个有威信的人带错了路，舒舒服服地变成了修正主义。１９６５年主席又提出要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地方敢不敢造反这个问题。到１９６６年就果然出现了，真是不信而言中，这是主席英明伟大的预见，试想如果彭、罗、陆、杨的阴谋成功，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要落地。」

除了对积极鼓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周恩来在这里还大力褒扬林彪。周恩来说：「『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地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虎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份量的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彭、罗、陆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最后，周恩来告诫全党：「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着，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着，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对这段话的评价是：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

此外，周恩来在讲到领导与群众的问题时，讲：「中央更加团结了，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主席在１９６２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１９６３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１９６５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学上海，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充当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自斯大林在１９５３年去世之后，毛泽东就为这个目标奋斗，这也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之一。因为毛泽东要争当世界共产主义领袖，最大的不利条件

就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远不如苏联，但是毛泽东却一直想走「快捷方式」。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对于毛泽东「心声」的把握。

周恩来在讲到「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时，有人插话：「彭真说总理总讲他的社会出身，党内讲，党外也讲，真有点麻烦，讲得太频繁了。总理这样讲是榜样，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刘介梅不是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了吗？」

周恩来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办副主任田家英自缢身亡。　主管中央档案事务的副主任曾三停职审查。6月，周恩来的亲信、国务院副秘书长（前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调任中办第一副主任，７月，童兼新组建的中办秘书局局长。

２．处理广播电台的安全问题

林彪带头念起了「政变经」，周恩来积极跟进，陈伯达、康生也一拥而上。但是，要说实际行动起来防止「政变」，还是周恩来出力最多。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同时，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被提为中办副主任。

１２月１４日，毛泽东约李质忠谈话，称：「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１９６６年1月１４日，周恩来约丁莱夫、杨成武、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周称，广播事业局要成立电台安全保卫小组，要从部队调一个现职参谋长专管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4月８日，拟调广播事业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陆军第６３军参谋长王寿仁抵京履任（据王寿仁后来回忆，他是乘坐周恩来的专机赶至北京的），５月３０日，中央正式任命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

3月２７日，周恩来在杨成武、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吕展（北京市公安总队总队长）及丁莱夫等陪同下，检查广播事业局大楼（当时局机关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均在同一大楼内）的安全警卫情况，指示要制定警卫应急方案、指定应急支持部队、播音室前要有战士守卫、大楼院内不能开门太多、广播剧场不能对外，等等。3月２８日及4月１２日，周恩来分别检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位于北京市郊的两个发射台－－双桥４９１台、沙河５７３台的安全警卫工作。

5月１４日，即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展开对彭真的批判期间，周恩来于０时４０分指示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台。广播局上午研究确定了代管办法后，向周作了汇报，周当天批示同意。５月２７日，公安部队司令部作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年初以来，根据周恩来、总参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队对加强重要广播电台的警卫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９８个重要广播电台普遍加强了兵力。各总队对电台警卫工作均指定专人负责。各重要电台的警卫部队还调整加强了干部，并有营以上干部重点掌握。各省、

市、自治区对调动电台警卫部队的权限都作了规定，以防止发生问题。加强了通讯联络，给警卫部队配备了无线电台。

３．肩负保卫首都的工作

１９６６年5月１５日，周恩来、叶剑英依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

关于首都工作组的工作任务，周恩来解释说，是在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发现后，主席感到首都的保卫很重要，责成我来管这件事，组织了首都的工作组，由军委、公安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其它一些部门组成，任务：

１、保卫中南海安全。

２、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

３、保卫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等等。

４、为保卫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

５、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

以上五条，六月初向主席汇报，主席对第四条原则上不太赞成，主席提出：把矛盾上交中央，中央怎么办；矛盾下放到公社没有土地，也不好办，交到其它省，是以邻为壑，还是自己消化。这个指示，我已通知首都工作组，但用工作人员的问题和当时红卫兵运动的迅速发展，有的单位没有传达下去，现在各单位在查封黑材料中，如发现有那时的黑户口，五类分子名单，要鉴别开来，封存起来。　　需要指出来的是，「以上五条，六月初向主席汇报」的人正是周恩来本人。

首都工作组有一个长期计划，即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的「成份不好」的居民。按周恩来的讲话则是毛泽东在５、６月份否决了此计划，但是实际上在６６年的夏季，此计划得到非常好的实施。根据资料，以「遣返」为名，把近１０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３３，６９５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８５，１９６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４０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　　显而易见的是，此计划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其它政府官员的协助。谢富治就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加少给他们。」

在那个夏季，「打杀，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的传言在北京流传。这种传言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在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的指引下，北京第１５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于６６年8月２５日来到橄榄市附近广渠门大街１２１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疯狂的红卫兵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

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　然而在９月１０日，周恩来则声称「反动资本家砍伤十五中的学生」，进而劝说不「要组织十万人的示威活动」。因为「这样一搞，反而倒使这个反动的资本家扬了名，扩大了敌人的影响，在国际上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周恩来考虑的是开大会影响不好，丝毫没有批评「打人不好」，违法不好，打死了人在周恩来的眼里也是不需要偿命的。仅仅在８月中旬至９月底的４６天，在北京市被打砸抢分子打死的达１７００多人。８月中旬至１０月３日，從北京城里赶走所谓「牛鬼蛇神３９万７千４百人。」

事实也是如此，正如宋永毅先生指出的那样，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

一个当年仅１６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１０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

５月１８日，即林彪「５?１８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之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陆军第６３军１８９师和陆军第６５军１９３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５月２６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称：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不可否认的是，「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所说：「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发表改组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是四个卫戍师。以前两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

对于这段时间周恩来的行为和活动，麦克法奎尔和沈迈克在其书中对此有过精彩的描写。下面是其中的节选部分：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接见一群不守规矩的学生时说加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是最好的部队高度「精干」。他们不会因为有人「骂他们」、「动手打他们」就被煽动起来，他们绝对不会「开枪。」「如果你们骂他们、打他们，你们要知道他们是毛主席的战士。」　据傅崇碧说，在文革的高潮时期，卫戍区的干部、战士、家属超过十万人。３０年后他回忆道：「当时发到卫戍区的中央文件数量比整个北京军区都多。」　（笔者注：这些文件绝对多数均为周恩来起草或者批示过。）

除了采取步骤保证整个北京地区的「安全」，首都工作组采取了更为慎密的措施来增进

中南海高墙内的保安。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６月说，因为中南海多年以来是杨尚昆「管」，里面混进了「背景复杂」的人。主席甚至考虑到「反革命集团对中央搞暗杀」。　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杨尚昆的继任汪东兴对中央办公厅进行了重组。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人赶走，主席就不能搬回中南海。」

不只是毛和他的同事在中南海的居住区清除了可能和杨尚昆有「不正常关系」的工作人员；一些因为资格老而多年住在中南海的党的重要人物也被「赶出去」了。７月初，李富春副总理和汪东兴通知那些人：中央「最近决定」以后只有与政治局常委的工作直接有关的高级官员才能住在中南海里面。其它的人要搬到北京的其它地方。

大约一年以后，周恩来回忆说：「到了六月，北京稳定了。」　稳定是有可能的，但绝不是平静。事实上，就在这个月，文化大革命走向公开、吵杂、和喧嚣。

由此可见，无论是林彪，还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但是林彪是讲得多，做得少，周恩来却是做得多，讲得少，如此而已。毛泽东的意图，周领会的最快、最深，执行起来最坚决。

４．参与批判朱德

５月２３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薄一波、乌兰夫等纷纷发言严厉批判了朱德。

周恩来说：「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１９３７年底到１９３８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它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

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监督。」

周恩来对朱德的批判「从反对毛主席的错误」是周、朱都参与的，似乎是在替朱德分担些责任。但是周恩来随即话锋一转，「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把朱德同张国焘联系在一起。接着周恩来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最为重要的是，毛在庐山上指责彭的时候，就说他百年之后，有人怕彭。现在周恩来把朱同高饶彭黄联系起来，并且说「毛主席也担心」，言外之意朱德如果活到毛死之后，就有可能是做赫鲁晓夫报告的人。

周恩来是否真的认为朱德有这么大的能耐，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批判朱德，向毛泽东表示对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支持。

六、从工作组问题中脱身

１９６６年5月２５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当夜，李雪峰按照周恩来、康生以及陈伯达等人的意见即内外有别来到北大处理此事。　　随着毛泽东下令将大字报公开向社会发表，累积多年的社会矛盾在突然之间有了爆发的裂口，社会开始动乱，首先是在校园。毛泽东后来自我评价是「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于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决定派出工作组，形成了后来称之为「黑暗的５０天」。　　派工作组的事情，周恩来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周恩来后来在工作组一事上全身而退，由此显出周恩来在政治上的老辣。

对此，《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认为：周发觉政治气氛诡异，于是周恩来借机出国，毛泽东对周恩来此举的动机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马，当即表示：「赞成总理的意见」。个中原因有二：(１)毛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２)周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保持晚节」的讲话，业已在政治上表白心迹。在这种情况下，毛乐得顺水推舟，批准周出访东欧，以免和刘、邓一起陷进去。

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工作组，就是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决定派出的。

鉴于天下大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６月９日飞往杭州恳请毛回京。但是毛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对于工作组一事，毛对这三人讲：「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太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但是毛泽东同时又对下面的人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

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对于要出国一事，周恩来此时反而是犯了犹豫。(笔者甚至认为周恩来此时并不想离开。) 周恩来要陈毅代替他出国。　究其原因无非有二：（１）国内局势变幻莫测，自己出去，会不会就是下一个彭真？（２）保护陈毅（笔者注：此时陈毅正被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冲击。) 彭真被打倒，就是因为趁刘少奇不在家，现在陈毅会不是就是下一个彭真？陈毅倒了，自己就快了，毛泽东多次说过此话。　对于此二种干系，周恩来不是不清楚。但是毛泽东却是有意让周恩来「摆脱干系」。

周恩来在６月１６日离京，先去罗马尼亚，然后２４日访问阿尔巴尼亚。６月２７日，周恩来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说：「目前，我国的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粉碎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阴谋。这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在文化领域内的专政。我国广大人民，正在彻底破除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虽然陈伯达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６月１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但是陈伯达再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如此意见。而周恩来除了在地拉那表示支持，而且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多次表示要横扫牛鬼蛇神！两次公开表示赞同陈伯达的意见。　周恩来确确实实在履行自己的诺言：「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作为证实笔者推测的另一证据则是：有人透露，周恩来在此次为时半个月出访中，其心情一直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状态中。甚至在回国时巴基斯坦的总统发觉周恩来表现有异于往常。

周恩来一回国，康生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刻意拉拢周。根据王力的回忆，康生主要告诉周恩来刘、邓可能站不住了，周自己不要陷进去，主要是两条，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

麦克法奎尔评论到：「周恩来的精明过人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接受康生要他管管文化大革命的建议，他设法躲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从７月１１日开始，他飞到武汉见毛，又到上海主持接待来访的尼泊尔王太子。７月１１日和１２日，周与毛长谈。毛给周看了他在７月８日给江青写的信的抄件，信中毛说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设想，说了他要搞个「天下大乱」，也表达了他对林彪５月１８日在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的关注。７月１４日，周在飞回北京的路上绕道到大连，在那里向林彪转达了毛的意见，林彪表示将在回到北京以后根据毛的评论修改讲话的正式文本。７月１９日，陈伯达也许是因为和毛讨论过而壮了胆，再度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以刘、邓为首的大多数人的反对。」　关于周恩来的态度，无论是《周恩来传》还是《周恩来年谱》都没有提及。

７月２３日，在讨论工作组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与康生、陈伯达等人意见相反。同日，陈伯达还在北大宣布了「对于『６?１８』这个事情，说是个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这个事情明显是冲着工作组去的，因为针对发生在北大的「６?１８」事件，刘少奇在６月２０日以中央名义将北大工作组的简报批转全国：「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

处理。」

高文谦先生在其《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于周恩来与工作组的关系做过深刻的解析，并引用周恩来在７月２４日凌晨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作为证明。

高文谦先生说：在工作组问题上，周恩来本来就因出访东欧而相对超脱，回国后更是由于康生的打招呼和毛泽东的交底，而有意同刘少奇、邓小平保持距离，并注意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接触，竭力在两军对垒中保守中立，为自己预留退路。在毛回京后尚未明确表态之际，周就已经开始转向，不再完全附和刘、邓不撤工作组的主张，而是着重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办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讨论工作组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认为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党对运动的领导总得通过某种形式，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列举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阻碍运动」。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周恩来连夜写信给刘、邓，出面充当和事佬，试图化解双方的歧见。

周恩来在２４日凌晨４时写信致刘邓。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此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告，并致敬礼！

周恩来

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高文谦先生断言：这封信充分表现出了周恩来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和息事宁人的为人。信中既肯定了派工作组的「必要性」，为众多参加工作组的干部进行了开脱，又强调各单位发生的情况「有其特殊性」，暗示中央文革所说的情况亦有可能，并表示要到现场作调查研究。这在表面上是响应毛泽东回京后，对争论的双方所提出的号召，实际上则为他后来的转向预留了伏笔。果然，当毛随后正式表态，对工作组大张挞伐时，周马上紧跟，率先表态拥护，主动对派工作组的问题作自我批评。

根据最新的史料，笔者认为此说法可以商榷。

卜伟华先生说，在７月１９日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陈伯达以工作组不一定比学生高明、有的还整学生为理由，提出撤销工作组时，周恩来、康生、陈毅、陶铸表示支持。

郭影秋则回忆说：是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回到北京后，形势更加急转直下。据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首先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笔者注：江青是７月２０日才回到北京，此说法不确切），在此期间内刘少奇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７月１９日至２３日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我曾参加过一次，会上对于是否派工作组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不主张派，而少奇、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主张派。小平同志说：「党的领导被打倒了，下面的组织瘫痪了，没有党的领导，运动怎么进行。因而，应该派工作组协助党委、党组织进行运动。」周总理这时插话说：「我们年轻时搞运动，也没有什么组织领导，学生自己可以搞运动。」意思不是很明确，似乎是不主张派。少奇马上针对周总理的话说：「学校运动起来了，发生那么多问题，谁能办得好呀，让你去也解决不了。」会上自始至终对于是否应该派工作组，一直争论不下。

通过郭影秋的回忆，显然周恩来是站在陈伯达一边的。周恩来是针对邓小平的话做的反驳，而刘少奇则反驳周恩来的话，其间的气氛显然比较紧张。

《周恩来年谱》对于周恩来的立场采用的是曲笔：１９６６年7月１９日、２２日，周恩来参加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消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此说法同《刘少奇年谱》的说法相同，即没有正面提及周恩来的态度。

继而根据周恩来在７月２０日到毛泽东处开会，２３日同邓小平等人到刘少奇处开会，讨论工作组问题。

由以上材料，笔者推断，周恩来在此时对工作组的态度已经明了，并非「着重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办法」，而是就此同刘少奇等人发生了争论。周恩来致信刘、邓的意旨并不在于「出面充当和事佬，试图化解双方的歧见」，而是因为和刘邓发生争吵之后，主动提出弥补其间关系，并为自己作出一些解释。

而且根据卜伟华先生的资料，此时支持撤销工作组的并不是少数，而是多数。

笔者认为，此手法同康生在《二月提纲》的做法是一模一样。康生在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并无反对意见，因为没有完全摸清楚毛泽东的底数。　周恩来同样如此，在得到康生的密告之后，同样把自己摆在一个可进可退的稳坐钓鱼台的位置，也如一个押宝的赌徒，一手押红，一手押黑，不管是红是黑，他都保险取胜！一面支持陈伯达的意见，另一方面又对刘少奇采取模棱两可的说法，不表态。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对工作组提出批评后，周又马上紧跟，率先表态拥护，接着主动对派工作组的问题作自我批评。相对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态度，周恩来的「跟进」是显而易见的。

周恩来在２４日凌晨就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大字报。周对周围的师生讲：「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个半小时的大字报，你们的大字报贴在外面，我只能趁你们睡着的时候，天亮了，你们起来了，就不让我看了。我不能坐在办公室里乱发议论，我要来看，然后向毛主席汇报。」

随后的第二天，周恩来继续来看并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今天我很满意，很感谢你们，你们很守秩序。你们写了很多大字报，让我看了俩个小时。我从大字报中学习到不少东西。昨天看了两个小时，今天看了两个小时，你们懂得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比较、研究事情了。……我既来了，就要抓下去。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我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热烈鼓掌）不管你对革命认识有多少，多一些，少一些，或犯了一些错误，不要紧，只要你们革命。我也犯过一些路线错误，但是仍是做党的国家工作。

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检查，看有没有错误，有了就要改。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精神力量就会变为物质力量。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工作就会搞好。

总之，一句话，只要革命，总会有前途的！（热烈鼓掌）

你们回家的都回来了，我就和你们在这里见面。你们还没早餐，我找个快捷方式，还是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非常有特色。第一个，周是第一个向学生表态支持学生革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个，文革中一大特色，周恩来群众集会上挥臂指挥合声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从此发端。在为毛泽东个人崇拜推波助澜时，周恩来可以说是独出心裁，表现得与众不同。周恩来没有象林彪那样编纂毛语录，而是通过更通俗更容易传播的音乐和舞台艺术，和广大老百姓打成一片。

１９６６年7月２９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对于过去一个半月的形势做了讲话。

首先，周恩来把主要责任推到被撤职的领导上面：

「同志们、同学们：

在北京，过去旧的北京市委，旧高教部的领导，旧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都犯了严重的，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黑线性的错误。这就是一种罪行了，不单是普通的错误喽！」

其次，周恩来对于工作组做了解释：「我们仓促地决定了，迫不及待地到处派工作组。」「刚才小平同志讲了，也有的工作组是好的，但工作组大多数同志主观上是好的，主观上不是想这样做，但他们的工作方法是老一套，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求，尽管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但是效果就是这样冷冷清清，或造成了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学校和学校的联系也隔开了，那势必就冷冷清清了。这套方法完全不适合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师生的革命运动的要求。」

周恩来还对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作了传达，例如成立的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

周恩来对于新生的中央文革小组特意提出表扬：「我们中央的同志，首先是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陶铸同志和其它同志到群众中去，他们去体验，我们现在跟着去学习。」

最后，周恩来表态：「总之，这一个新的事情，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我们离青年时代远，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新的经验，老革命做新工作就年轻了，革命工作就能做得更好！（鼓掌）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七、积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其成员名单是在周恩来参加、由邓小平主持，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９日至１２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草拟，并报毛泽东批准的。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而陈伯达顺势提议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　　但是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是默默无闻的。

文革小组的首次亮相，是周恩来精心策划的。７月９日，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宴祝贺会议成功，并与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宴会前会见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事先，周恩来亲自打电话通知穆欣，要陈伯达参加会见，并叫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出席宴会，新华社将趁此机会公开报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的事。

为了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毛泽东在７月２４日发话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继而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而称赞：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

７月２７日晚，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时称：「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所有成员都到北师大来，跟着你们学习文化革命的经验。……好多同志写条子来，要我们介绍文革小组的同志，我执行这一指示：组长陈伯达同志，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康生在介绍江青时，首次将江青称为「第一副组长」。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关于此次接见的新华社电讯稿刊登于次日的《人民日报》。　　通讯中说：「有１，５００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他在致开会词时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在此新华社电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般，江青高于其它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呼之欲出。

８月３１日，毛泽东以乘敞蓬汽车绕行天安门广场后再开大会的方式，第二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据新华社消息，毛和林彪「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陪同乘第一辆汽车，紧跟着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辆汽车，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

乘坐的第三辆汽车，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乘坐的第四辆汽车，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乘坐的第五辆汽车，缓缓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六时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宣布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开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她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

新华社电讯首次公开称江青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对于这个非驴非马的中央文革小组，从开始亮相到结束，周恩来都给以了大量的支持和合作，详述见专题部分《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的关系》一文。

八、为毛的大字报张目

工作组是撤了，通知也发了，但是一系列的问题还需要解决，第一是要使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些决定需要通过党的中央全会正式追认，其次要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

７月２７日至３０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期间，周恩来分别约邓小平、陶铸两次谈话，与康生谈一次。８月１日，按照毛泽东意见，周恩来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　为什么是周恩来处理清华大学？众所周知，清华在一定程度上是刘少奇的代名词，这种安排是一种政治上的考察。周恩来处理清华的「用心」就是对毛泽东的忠诚，二者是可以划等号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周恩来对刘少奇的态度是同自己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导致毛泽东决定写大字报的主要诱因是８月４日毛同刘少奇的激烈争论。毛泽东指责刘少奇的罪状之一就是：「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镇压学生的主要材料之一就是蒯大富遭到打击。

８月１日凌晨和晚上，周恩来分别找蒯大富谈话。　蒯大富向周恩来详细论述了清华的情况，主要就是告了工作组的状。蒯大富回忆说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不让一起来的贺鹏飞进来，而贺鹏飞之所以要进来就是「怕我(指蒯大富)告工作组的状」。　蒯大富在接受田炳信采访时表示：「你们注意啊，这天是１９６６年的7月３１日。８月５日，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就出来了，给刘少奇以致命的打击。所以我想起来啊，有点对不起刘少奇。」　蒯大富的告状，为毛泽东的大字报提供了炮弹，也成了毛整刘的利器，而穿针引线的则是周恩来。

同时，周恩来找王光美谈话，叫王光美准备去清华大学工作组参加总结和检查。周恩来告诉王光美：「你检查时不要牵连别人。」王光美后来说：意思是不要牵连少奇同志和其它中央同志。　然而王光美在清华就是代表刘少奇，王光美做检讨，怎么可能不牵涉到刘少奇？据知情人讲，在刘少奇的追悼会上，王光美连邓颖超的手都没有握，很是尴尬。

８月５日毛写了大字报之后，并没有立即公布。但是周恩来是第一个看到大字报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是毛与之商讨的唯一的一位。同日，周恩来按照毛的旨意打电话给刘，要刘不要再见外国人，也不要再公开露面。　毛泽东把底透给了周恩来。据当年参加八届十一

中全会的廖汉生回忆：「一天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海、空军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打招呼会散了，周总理又向各省、市第一把手打招呼。」　可见此时的周恩来远比林彪重要的多。事实上，根据张爱萍在讨论《历史决议》时的谈话，毛泽东早就写好此大字报，当时并没有拿出来。根据历史的发展则表明，毛是同周恩来商讨之后才决定拿出来，并且由周恩来出面做先行工作。

关于毛泽东何时写大字报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但是无论那种情况，周恩来都起到了其它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林彪在内所不能比拟的作用。这从中也折射出周恩来地位的升迁，自然是大力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获得的丰厚回报之一。

就在５日晚上，周恩来约各元帅（包括贺龙）谈话，谈了三个多小时。　周恩来此举，明显是在向各元帅交底，实际上就是先行为毛的大字报做工作，打预防针。吴法宪回忆到：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据笔者考证实为６日）周恩来亲自向军队主要领导人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与会者除吴法宪外，还有杨成武、张爱萍、肖华、许光达、肖劲光、苏振华等人。周恩来将毛的「大字报」向众人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周恩来向各位元帅交底只会比同吴法宪等人交的更深。

根据上述资料表明，实际上毛写完大字报后，告诉了周。但是在向大会传达之前，需要预先做好工作。此工作是由周恩来完成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周恩来先在５日晚做元帅的工作，继而在６日做了更多军队高级将领的工作，然后是各省市一把手的工作。从中也看出毛泽东的倚重力量是军队。

如前述，文革的打击对象不仅是刘少奇，而且有周恩来。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这包括周恩来。　中共的党内斗争就是如此，你自己检讨还不行，你要揭发别人，你要对别人落井下石，你才能过关。此时，周恩来就处在这么一个关头。

周恩来在８月５日和２２日两次在清华大学讲话。　周在讲话中明确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错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周恩来讲：「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的，平反的。」

对于工作组问题，周恩来说：「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两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很称赞你们的革命勇气和革命首创精神。同学们，他们有大无畏的精神！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阻碍革命运动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工作组阻碍运动的发展，压制群众运动，甚至镇压群众，那就有权利把他们赶走。学校革命的主人，很清楚，是革命的学生，教职员工。而工作组来了，如果起个战士的作用，那还许可，可是我们在工作组派来后，又加了一些限制，生怕群众运动搞乱了!」

周恩来同时强调：「我这次来清华是老老实实做学生的，来学习的，也是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２２日，周恩来再次讲：「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是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现在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会很快地在全国点起来。那么今天来到北京的西安的、兰州的、南京的、长春的、哈尔滨的、天津的、上海的、贵州的等等各地的许多同学，都把这个火接回去了，所以相信他们也能和你们一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九、实际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的。王力回忆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毛主席下决心换接班人。那时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就由总理主持。从这个时候起，中央批文件就是总理批了，没有少奇同志了。把少奇同志换下来，是全会前夕就定了的，选举只是个形式。全会公报是早就写好的。公报初稿是总理批的。」　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实际上会议的组织者。实际上，没有周恩来的鼎力相助，这次全会是开不起来了的。

全会公报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在７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此公报除了大力吹捧毛泽东之外，还大力吹捧了林彪：「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王力在回忆时讲：「公报初稿是总理批的，我当时的印象很深：第一个为何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没有刘少奇；第二主席后边即是林彪；第三初稿上写上了刘少奇的一段话，给勾了。」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呼之欲出。

１９６６年8月1日，宣告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但是林彪还像往常一样请了病假呆在大连。毛泽东决定让林彪取代刘少奇，让汪东兴几次打电话催林彪马上回北京，并让周恩来安排专机。但是林彪知道，「虎背」是不能「骑」上去，骑上去就下不来了，推辞再三，而且正式写了请假的书面报告。　８月４日下午，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激烈争吵。当天，毛泽东再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林彪，林彪还是推却身体不好，不能出席。　据说从全会一开始，接林彪进京的专机就一直停在大连，但是林彪就是不上机。毛泽东大怒，你林彪不来，不配合，停会，林彪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复会。

这个时候周恩来再一次出面劝说。周恩来打电话给林彪，我现在处境很困难，你不来，我就更不好办。　文革之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认为自己并无这个能力，于是推脱。周恩来找陈伯达谈话，陈伯达推荐康生，康生既有

原来在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工作经验，也有这个能力，更有在延安整风的领导经验，但是康生却不能做「刘盆子」。陈伯达推辞多次，但是周恩来最后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嘛？」　　同样，林彪出于「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不得不来。

林彪的威望在当时确实很高。树立林彪为接班人，不仅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权宜之计，同时也迎合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意见。陈云在建国之初就同高岗谈起并提出林彪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邓力群更是回忆说自建国后就认为刘少奇不如林彪，到文革前林彪当接班人更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然而林彪接替刘少奇在党内的职务的提名，却是由周恩来揣摩毛泽东的旨意而提出。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秋天告诉吴法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刘少奇。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晚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接林彪回京。周还特别交代说「要绝对保密。这件事，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当接林彪的专机抵达机场飞机滑行到机场在跑道一头停下时，周恩来立即登机面见林彪，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三人在机舱内部谈了三十多分钟。但是林彪出来的时候，脸色阴沉，吴法宪本来想上前说几句，但是却吓跑了。　　而根据当时参加讨论《历史决议》的刘澜涛的发言，毛泽东当时确实没有提及邓小平。刘澜涛说：

记得有一次在杭州开会时，接北京电话，说罗瑞卿同志跳楼重伤，我们听了心情非常沉重，毛泽东同志不问长短，毫不动容，就宣布继续开会，当时我深感寒心。到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首先炮打刘少奇同志，毛主席亲自说，我对少奇同志观察了２１年，现在完全失望了。请周恩来告林彪（当时在旅大）尽快来京。

原来，当毛泽东在８月４日下午和刘少奇当面翻脸之后，决定换马。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录，当时的副主席名单是林周二人，但是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以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亦有资料说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代替邓小平接见兄弟党时表示，接见时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而不用中央副主席的名义。　　在以后的文革岁月里，周恩来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但是林彪知道接班人是「烫手山药」，极其免强为难。但是当毛泽东对林彪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应该有个登台演说才好啊！」实际上林彪知道这是毛泽东要他表态，攻击刘少奇等，林彪以不明就里为由推辞不干。周恩来表示可以找别人代写。于是周恩来找雷英夫谈话，要其为林彪准备讲稿。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除了吹捧毛之外，还吹捧了林。　据知情人告之，是周恩来出面向全会提议林彪为接班人，并当场表示：(林彪)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一贯忠于毛主席，跟毛主席最紧、跟得最好。」周恩来还表示：「我们党，毛主席是最高统帅，林彪同志是副帅。今后的一切大政方针，都要由主席和林彪同志来决定，其它人都是做具体工作的。」此类的话，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重复。

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确认了文革的左倾指导方针，使其合法化，而且从组织上得到了保证。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说：「(这次）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会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相继遭到诬陷和迫害，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完全失去了抵制和纠正的能力。

十、林彪诬陷刘少奇的真相

在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中，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时称：「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少奇仍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时候，林彪就指使叶群于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诬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诬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告诉雷英夫，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诬陷材料，由他批转毛泽东主席，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特别法庭判决书亦确认：「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让叶群把他们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

此材料主要指责刘少奇（１）大家应该学习王光美的经验，不应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２）自以为可以和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３）在历史上也犯过很多方向性的严重错误；（４）在组织路线方面也有很多错误；（５）思想作风恶劣；(６)攻击养病的老同志。

众所周知，自１９６２年以后，林彪基本上闭门不出，怎么会有揭发刘少奇的材料？叶群又是如何才能口授？事实上证明，林彪除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收集或者转送其手下将领对罗瑞卿等人的揭发材料之外，自己从未写过或者让叶群口述过对于被打倒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揭发材料。而且雷送刘少奇的材料是在８月１４日，为什么相距不到半个月，又因「８?２５事件」被林彪下令撤职查办呢？余汝信先生认为：让刘少奇靠边站，是毛泽东本人的「战略部署」。在雷英夫材料的上报过程中，林彪只不过扮演了一位中间人的角色。林彪将雷的材料送到毛处之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结束，刘的靠边站已属必然，雷的材料对此过程并不会起到什么大的作用，更多的只是成为林的一种政治表态。而「８?２５事件」突然发生，林彪一旦要在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之间作出抉择，他无理由不支持前者而支持后者，不管他雷英夫是否在十多天前还有「功劳」。

「四人帮」倒台之后，雷英夫到处向人诉苦，当年的那份报告是被别人逼出来的。

１９８１年春，雷英夫经总政批准解除隔离。夏天，雷在青岛疗养后回京路过济南时，有人请他吃饭，雷说：「我是受冤枉的，军委要派人给我平反，我揭发刘少奇是周总理叫我揭发的」。还说：「现在院里将取消教育长，训练部设部长，回去要我当训练部长。」　雷英夫还说：（当初的那个报告）毛主席批准了，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也知道。」

真相大白。以雷英夫的身份，既不是中央委员，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结果尚未透露，雷何来如此大胆，何来如此知情？背后有周恩来这颗大树，自然知晓一切。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于文革的发动并非完全不知情。当然，毛也不会让他完全知情；他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有可能不完全清楚，所以他要时时处处揣摩毛的意思；对「文化大革命」有可能缺乏某些思想准备，但周肯定不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的，他是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积极地向毛泽东表态，全力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支持这种努力充分体现在号召「保持晚节」、做老干部的思想工作以及对新生事物的支持（红卫兵、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后来的造反派等）上。但是周恩来的地位并不是稳固的，而是处于随时可倒的状态，直到陶铸倒台才站稳了脚。周恩来在这段时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也是不可或缺的文革依赖支柱之一

第四章 天下大乱：成为真正的「总管家」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尽管还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经被排出权力核心之外。周恩来的党内排名没变，但实际权力有所增加。不过这并不表明周恩来的地位完全巩固。根据毛泽东的「层层剥笋」政策，在剥掉了刘少奇之后，下一层会是谁？周恩来会在下一层被剥去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随时有可能将周卷下台。这一点可以从周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从陶铸的起伏过程中看出端倪。

一、周恩来的困境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通知》，是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然后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按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方针起草，再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其中的重要内容全是毛泽东亲笔写成。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可知，毛泽东在反复修改这一文件中，曾先后将文件稿批给江青、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却从未批给林彪。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时，是全体到会者都毫无异议地表示同意的。

但是周恩来毕竟不是毛泽东在线或者称之为「毛派」的人，文革，就是要清算一线的错误，清算建国以来１７年的问题，周恩来也是被清算之列。

在毛泽东文革初期的人事布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苗头：分化刘少奇、周恩来，打倒刘少奇之后，周恩来则是下一个被打倒目标。正如陈毅在文革初期一针见血：「说什么

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　陆定一在讨论《历史决议》时也指出毛泽东是要把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打算解决的。而周恩来对此也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文革伊始，周恩来就在门厅前面准备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简单的洗漱用具，准备随时被抓走，到时候只需提上这只小包。

王保春和王文耀（二人均为陈伯达的秘书）回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颖超亲自写信给刘叔宴（陈伯达的夫人）并登门拜访，原因则是周恩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且批的很重。于是邓就求救于自己的老部下，希望刘能促使陈伯达从中调和。在毛泽东批周之后，许多应该由国务院处理的行政文件，国务院各部的生产、业务报告，都经中央办公厅转到陈伯达办公室。陈伯达不同意这样做：「怎么能这样？这些文件不能接，要由总理处理。」　陈伯达的政治预见能力可见一般。

作为替代，毛泽东准备安排邓小平接替刘少奇负责党务系统，并且兼管中央项目组；启用陶铸接手周恩来的政务系统；林彪则作为党的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主持军队事务。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中央同意，陶铸除分管中宣部外，还分管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等，还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笔者注：关于陶铸参加军委工作，并不确实）。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把陶铸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可见毛泽东对其是寄予厚望托付重任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是林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二个星期左右），中央日常工作才由周恩来再次负责。

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由周恩来修改由中央碰头会讨论过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并报送毛泽东审阅。《规定》提出：中央局书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省长，中央各部部长、第一副部长或常务副部长，国务院办公室主任或第一副主任、委员会主任，部长或第一副部长、党组（委）书记或副书记的任免，由中央常委会直接审定，或由常委碰头会议提出报毛泽东、林彪审批；党和政府系统的司局级干部，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指定常委陶铸审批；大军区、军兵种和三总部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呈报毛泽东和中央。　周恩来的名字全然不见其中，可见毛泽东要重用的人当中，周恩来已经不在其列或者实际权力大为缩减。

从邓小平的分工，以及陶铸所分管的部，以及此《干部任免通知》所规定，周恩来基本上已经被架空。如果不是林彪抽身而退，周恩来就只有一个外交部可以主管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后，就成为毛泽东手中强大的利器，周恩来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是非常重视和合作的，但是二者之间并不是没有冲突。

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８日至２０日之间，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在京召开。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等二十多人参加。蒯大富、王大宾说：文革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责周恩来「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下来」；还提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问题」，「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张春桥把这类发言上报毛泽东，并向江青和陈伯达汇报，反映了有人说周恩来搞折中主义，是八级泥瓦匠。江青在汇报会上说：「小将们讲的对，周总理就是搞折中主义，一贯如此。」

随后在１０月份，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解决８、９月间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和陶铸以及各省市委领导人的问题。

１０月３１日，7千多人在北京体育馆集会纪念鲁迅逝世３０周年，姚文元在会上作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讲话。姚文元说：「他多次批判过『唯无是非观』，主张革命的战士应当旗帜鲜明，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他最憎恶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他曾经这样淋漓尽致地刻划过这类『正人君子』的丑态：『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他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无情地勾出了那种自称『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的丑恶鬼脸，指出『蒙蔽是不能长久的』。这真是对于今天某些自命『超然』『公允』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绝妙的画像。」

《红旗》杂志在同日的社论中亦指责：「在两军对垒中那种貌似『公允』、『公正』的『和事佬』，那种所谓『不偏不倚』的『骑墙派』」，「『调和』、『折中』就是混淆黑白，为虎作伥。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中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那些标榜走中间道路的人，必然划到修正主义的泥坑。」「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行调和、折中，这实际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然而实际上的周恩来并不是如此右，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是一直左。自从周恩来提出陈毅代替他出国未成之后，周对于发动文革是积极响应的，而且为了揣摩毛泽东的想法，表现的比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还要左。更为深层的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例如「伍豪事件」、周恩来在苏区时同毛泽东的关系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的表现，这些就如紧箍咒一般牢牢的套在周恩来的头上。由此而造成的心理负荷和内心的恐惧恰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表白要保住晚节、紧跟毛走的重要内在原因。由此周恩来必需表现的比别人更「革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自己是永远跟着毛主席走的人。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只有这样，周恩来才能够给自己宽心。这也是解释周恩来对待孙维世等关系密切的人包括自己的亲属的「大义灭亲」。而这种「大义灭亲」能体现自己是革命的最有力的行动之一。除此之外，周恩来对于曾经跟随他长期工作的下属或者同僚也是丝毫不仁慈，例如潘梓年等人。同时也就解释了周恩来为什么会对中央所定性的坏人加以毫不留情的迫害或者对他们所受到的惨无人道的待遇熟视无睹。

１９６６年6月份，周恩来指示干部要引火上身。随后不久，毛泽东提议所有干部都要在运动中表演一下。于是在李富春主持的、陶铸抓的、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都参加的会上，搞出一个「司局级以上干部都要烧一烧」的会议纪要。周恩来阅后，批示到：「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关锋在此文件上批：「我看这个文件不好」。王力说：「我是不同意提出干部都火烧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和王力五人联名对此文件表示了异议。毛泽东批示此件不发，退文革小组。　　周恩来在指导外交部的造反派运动时，一再指示矛头要向上，但是这矛头确是不能对准陈毅、周恩来的。

中央文革倒周的行动，完全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如果毛泽东不点头，无人敢对周恩来做出实际行动甚至动这个念头。后来把周恩来赞同文革的发动说成是说了违心的话，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坚决的斗争，抵制了文革的发动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完全是即斗争又联合，作为毛泽东的左右手，共同把文革发动起来并推向高潮。

周恩来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邓小平出局、陶铸倒台而站稳了脚，随之而来的天下大乱更是让毛离不开周。但是「九大」以后，林彪又自己跳了出来，所以周恩来才得以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以后毛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行动还没有开花结果，周恩来就离开人世，自己在生前终于没有被打倒。这可以说是幸运的。但是如果离开周恩来，毛泽东的文革能发动起来吗？

周恩来对于文革的发动，并不是不知情，而是对于毛泽东的部署率先带头表示支持，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周恩来自身的地位，「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观点，对于为数不少的干部无疑敲响了警钟，只有顺从毛泽东的旨意，不可违背，从而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消除了重大阻力。　即使如此，针对周恩来的打倒行动，时起时伏，周恩来后来说：文革让他少活十年！　这是大实话。

従以上史实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出于实用的目的，对周恩来在文革发动的战略中的配合给以了充分的信任，包括与之商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实际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商讨决定政治局常委名单等事情，但是随之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想法有过短暂的起伏。可是这种起伏随着时局的变化很快就消失，等到毛泽东重新想整肃周恩来则是「九大」之后的事情了。

二、因林、邓的矛盾而避过锋芒

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人事布局中可以看出用林彪、邓小平、陶铸「三驾马车」代替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苗头。　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是鲜明的。尽管邓小平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和毛泽东有些疏远，而刘少奇越走越近，以至于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和刘少奇来站到了一起，但是毛泽东始终是将刘、邓是分开的。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政治局常委排列次序，邓小平的位置比文革发动前提升了。按照王力和陈伯达的回忆以及《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陶铸是从下面被毛泽东「勾」上来的，也就是说本来邓小平的排名比后来的高。　而邓小平在这次改选中，是全票当选。

作为中发〔６６〕２６７号附件二的大事记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看出，前者隐晦了邓小平在《二月提纲》中的责任，后者还表扬了邓。　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还分管中联部、中调部等，其中更重要的是邓继续担任「彭、罗、陆、杨项目审查委员会」主任，而原来这个一开始是周恩来负责的。所有这一切表明，毛泽东是要留下邓小平幷且是委以重任的。

然而，由于林彪所持的与邓小平「势不两立」的态度，由于邓小平在林彪、江青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采取的「避其锋芒」的态度，又由于邓小平对刘少奇未能「反戈一击」的态

度，使毛泽东的这个初衷未能实现。　　这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形势比人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本来是要批刘少奇的，而林彪和江青却认为主要的危险不是刘，刘已经被「一张大字报」打倒，现在主要危险是邓。林彪批判邓小平同自己争战功，把邓小平同彭真、吴晗和北京市委问题等捆绑相连，指责邓小平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　　除了林彪之外，谢富治等也指责了邓小平。　　不为人所知的是，周恩来也指责了邓。根据孙万国先生的采访，一位国内党史专家说，在文革之初，周恩来不仅攻击了邓小平，而且在邓小平倒台一事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文革结束，邓小平在非常小的圈子里对于周恩来是非常刻薄、批评有加的。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专门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要他和林彪搞好关系，配合他在人事上的安排和布局。据说邓与十帅中的九帅关系都很好，唯独从不与林来往。邓小平回忆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和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可以这么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毛泽东要邓小平「跟林彪搞好关系」，林彪、邓小平共处为其最重要的布局。王力说，但是林彪把邓批成那个样子，两人就无法共事了。邓对康生说，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

８月份，邓小平还在人民大学等地方公开讲话，指导文革。　　１０月份的中共中央会议开始，邓小平还做了关于文革开展以来形势的报告。　　但是经毛泽东审定的陈伯达讲话稿公开将刘、邓并提作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加以批判。　　陈伯达的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就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鉴于这种形势，毛泽东不得不让邓小平检讨。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少奇负责的党务工作由周恩来暂时担当。其后林彪曾短暂地主持过中央工作，以后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它原因，不再主持，最终由周恩来负责党、政两方面的事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在众多人包括周恩来指责邓的局面下，邓小平显然无法继续工作。陶铸也无法很快接手周恩来这两个摊子的，于是周恩来也就不可能很快地被排除。毛泽东对于邓小平则采取了「冷藏」的办法，以备后用。

三、因陶铸倒台而不可或缺

文革以前陶铸就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不喜欢北京的空气，就四处巡游。毛泽东最爱去的地方就有柯庆施主管的华东、陶铸主管的广东、湖北、李井泉主管的四川等地。代替陆定一的陶铸为吹捧毛泽东也是不遗余力的。

陶铸在调到中央以后的工作，对于文革初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积极响应并支持的，毛泽东也是满意的，这就有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升到排名第四的结果。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开始对陶铸不满。

首先，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象毛泽东预期的那样向刘少奇猛烈开火。从陶铸的角度来看，也许是由于在「高饶事件」中因为反对过刘少奇而犯错误的教训，所以有些踌

躇不前。对此，毛泽东当时虽有不满但尚未计较，仍然重用陶铸。

８月、９月，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主要是周恩来和陶铸两人在管，毛泽东后来表示过对两人这段时间工作的不满。王力说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就是批评周恩来和陶铸的。

９月２１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天津市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去世，５０万人参加了追悼会的消息。毛泽东批评到：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１０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陶铸的秘书马恩成回忆：「这次会上我没有见到陶铸，在简报上也没有看到他发言。会议快结束时，陶的秘书张汉青来看我和薛光军，并问了我们会议的情况和中南局机关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未见陶铸同志发言？张说：陶铸最后有一个书面发言，可能交得晚了，来不及印出。对此，我不便再多问，但已感觉到陶铸可能左右为难，处境不妙。」　　陶铸仍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搞文革，反对在农村工矿企业深化文革，连续搞了几个社论和指示，所有这些，虽然毛泽东画了圈，但是正如王力认为：毛泽东内心是不满意的，这些同毛泽东的文革思维是背道而驰的。

在会议期间，甘肃的胡继宗（原湖南省委常务书记，陶铸的下级干部）提醒陶铸：伴君如伴虎呀。

这时毛泽东认为陶铸留在中央已经不合适了，让他和谭震林到中南和华东地区视察。但是谭震林说工作忙，又受到冲击，不能成行。毛泽东就让陶铸自己一个人下去。但是陶铸也留在中央不走！　　这时毛泽东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打倒陶铸。但是随后而来的几件事却使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

１１月１０日「安亭事件」发生，张春桥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做出了「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肯定结论。而陶铸的态度则是大相径庭。陶铸就在王洪文率众卧轨的前夕，主持讨论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其目的正如陶铸所说：就是要把他们（上海的潘国平、王洪文等）压下去，写这社论把他们压下去。

１１月２７日，江青指使关锋、戚本禹列举了陶铸七大罪状，指责陶铸实际上仍在执行「刘邓路线」，更为严重的是，此报告断言陶铸同毛泽东提倡的「炮打司令部」唱对台戏。

１１月２８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它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而这个讲话是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的。　　很明显，陶铸不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也不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

接着，毛泽东决定要陶铸在１２月６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表态要陶铸检讨，实际上就是批斗。

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在以借过生日为名，实际是向其亲信路线交底。毛泽东明确说道：「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要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毛泽东所引「咎由自取」是陶铸的原话。　　对于「不识相」的只能打倒。正如王力所回忆到：这时主席定了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这个会于１２月底在怀仁堂召开，总理

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就是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直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主席定了要开这个会，大家议论是要陈伯达发言。　　王力的回忆、和曾志的回忆都说在这次生活会是一边倒地批评陶铸，只有李富春说要不让陶铸回中南算了。王力还回忆了一个细节：毛泽东曾说，希望你们能开个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１２月２９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和陶铸谈话，毛泽东再次批评陶铸：「你怎么还不下去？」陶铸不明就里，以为毛泽东还在保自己。会见以后，立即将谈话内容通报了周恩来和林彪。

周恩来当即作出了布置，说：「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林彪则说了「你呀，现在就被动」和「要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忠告。

然而这些都为时已晚，因为毛泽东已经决定要打倒陶铸，只是还在考虑打倒的时间和方式。

１２月３０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不知得到什么暗示，「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　　接见中，陶铸与之发生了正面冲突。

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了这支造反队，接见中陈伯达、江青、康生表了态，随后「打倒陶铸」的消息传遍全国。　　至此，陶铸在毛泽东的文革人事布局中被剔除。

周恩来在陶铸被打倒的事件之中的作用相当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有记录说，陈伯达、江青宣布打倒陶铸的时候，周恩来、王力也在场。　　王力则表述得较为含糊，说在场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我，还有别人。」

周恩来本人的解释则是：「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正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早在１０月１８日，周恩来就和陶铸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操作不同。当时，预定的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红卫兵。但是陶铸主管的宣传部在１７日废除了１６日为这次接见拟定的「标语口号」，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后者删去了一些过长的文字，如「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首都三司」立即起来造反，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了「首都三司」的意见。

在１２月６日批评陶铸的会议上，周恩来批评陶铸讲过「怀疑一切」。　　事实上，周恩来不仅在这次会议上，而且在陶铸倒台之前、之后都有在公开场合及私下里对「怀疑一切」的说法表示过不满。周恩来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周恩来曾经对陈伯达说：「陶铸这样讲，我就不好开展工作了。」　　周恩来的意思很明显，陶铸的怀疑一切，有火烧到自己头上的危险。

同样是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让陶铸作了自己的「挡箭牌」。会前，在毛泽东否定了由谷

牧等人搞的「十五条」的情况下，谷牧不知情，仍然搞了个汇报提纲。陶铸知道毛泽东态度，但是没有制止。周恩来也知道有这么一个提纲，也没有制止，而且周恩来是知道底细的。 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决定借此批斗有关人员，除了谷牧之外，还有周恩来和陶铸是涉案人员。在这次会议上，陶铸一个人顶下了所有责任。正如高文谦所述，周恩来在此事上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

在《工矿十条》下发之后，毛委托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陶铸，林彪说有病推辞不干，于是由周恩来主持。

在1月4日凌晨，周恩来同陶铸谈话。虽然周恩来自己对陶铸说他自己并没有听到陈伯达江青康生的讲话，但是根据上文王力的回忆则表明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场」，而当时的传单则表明周恩来是在现场。 且不论周恩来听到与否，周恩来是和江等人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代表中央同陶铸谈话的。作为中央代表同要倒霉的「当事人」谈话，周恩来是多次扮演此种角色。曾志的回忆非常清楚的表明，周恩来就是通知陶铸：你已经被软禁，不要离开家门一步!。贺龙后来则是「陶铸翻版」而已。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周恩来在5日的谈话，说明周恩来同陶铸谈话之前并没有同毛泽东商量，也没有经过党中央讨论，仅是自己根据自己掌握的底牌同陶谈话!

陶铸倒台之后，周恩来曾经如此表白过：「（陈伯达）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那些是执行主席路线的。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荐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

「打倒陶铸」原本不在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之中，不仅如此，毛泽东原本还打算重用陶铸。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陶铸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冲突不断。陶铸在某些事情上的做法，不能不使毛泽东认为陶铸已经成了继续深入发动文革的「绊脚石」，必须加以整肃。相比之下，周恩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更能够让毛泽东和江青所接受。同时，在林彪、周恩来与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压力下，邓小平不得不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出局。这个时候，以陶铸代替周恩来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毛泽东以林彪、邓小平、陶铸的三架马车代替刘、周系统的打算未能实现。

陶铸对于「文化大革命」言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态度都令毛泽东日益不满。相比之下，周恩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则是更顺从毛的旨意，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采取更加「忍让」的态度。局势的发展、两人各自的表现，终于导致了陶铸的「倒台」和周恩来的「保全」。

陶铸倒台使周恩来的作用暂时更为重要，地位暂时更为巩固。周恩来的作用也就更加无人可替。周恩来暂时站住了脚跟。陶铸实际上给周恩来作了「挡箭牌」，让周恩来得以继续留在文革的战车上。

四、终于成了「总管家」

陶铸倒台后，周恩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总管家」。

周恩来在建国以后，虽然处在中共权力核心之内，但是并不是最主要的核心。除了毛之外，刘少奇也处在周的头上。１９５６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成立，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更是沦为其执行机构。根据《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记载，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更是「王小二过年ー一年不如一年。」以１９５９年ー１９６１年其间为例，周恩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多达６０余次，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才１０次左右。周恩来更是多次致信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情况，而大政方针需要由中央书记处作出。

１９５９年5月１６日，周恩来为了解各地钢铁、主要是地方生铁的生产情况和问题，以便给６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提供这方面的材料，约各副总理谈话，建议在２０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的重点地区去视察，６月１５日左右回京。次日，周恩来就此事写信给邓小平并中共中央书记处，说明「视察的内容，主要是生铁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为此，拟到产铁、产煤基地，对矿石、煤炭、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设备、运输、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问题做具体了解，以求实现中央经济小组的要求：先保质量，后争数量。除此以外，对市场供应，农业生产等问题也就近进行一些了解」。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８日，周恩来批评《人民日报》１１月１６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的１月到１０月全国工业生产情况的材料中，报道这十个月工业生产总值比１９５８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九，是严重违反中央的规定，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错误的。周恩来指出：中央早有规定，凡全国性的数字，一定要经过中央批准才能发表。要求接受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把工作做好。并要吴冷西回去宣布凡是全国性的数字现在一律不发表，到今年底或明年初再说。什么时候公布、如何公布都要经过李富春同志和中央书记处。

这种局面一直到１９６５年下半年之前都没有什么大的改观，反而是彭真的地位的崛起，使得周恩来头上的「婆婆」更多了。　　也正如前述，连陆定一都敢不理会周恩来的意见。这一切到了毛泽东开始发动文革之后开始改变。

首先是在清除「彭罗陆杨」之中，周恩来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紧接着，在文革的正是发动到１９６６年年底的天下大乱时期，由于林彪的大撒手和陶铸的出局，周恩来成了毛泽东不可或缺的主要助手。其内含主要有二，其一就是周恩来出色的组织、工作能力，这也是大陆党史界一直所津津乐道的地方。例如周恩来自红卫兵运动以来，仅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统计，周恩来共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达一百六十余次。毛泽东接见八次红卫兵的壮举也是周恩来一手组织操作的；其次，文革中最黑暗的一面之一，就是中央项目组为主的迫害各级干部及普通百姓的行为，而主管中央项目组的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能力恰恰是官方一直所不予承认甚至羞于提及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清除的「阶级敌人」，也是周恩来要执行的任务。纵观周恩来的这两方面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周恩来的生存。（此部分请读者参阅专题部分《周恩来在中央项目组中的作用》一文）

随着１９６７年全国全面夺权的展开，周恩来才真正成为具有实际意义上的全国的「总管家」。在这点上，毛泽东是从组织上作出了保证的，那就是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代替中央书记处处理各方事务。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书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他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杨成武后来也这样回忆：「林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

五、在军管的过程中大显身手

自文革兴起，一些重要单位如监狱、物资仓库等自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到了１９６７年，夺权导致的派系斗争以及武斗，甚至是在１９６６年的大串联，诸般等等，导致天下大乱。相比之下，军队情况则好的多。此种情况下，军管则成了能够维持秩序、保证国家基础保障供应的的唯一办法。到１９６９年开「九大」以前，军管遍及全国，上至国务院各部委下至县政部门，甚至出现一部分军队管制另一部分军队的奇特现象。

而各单位的军管，大部分是周恩来在其主持的文革碰头会上提出并报毛泽东批准、或者由毛泽东作出具体军管单位批示后由周恩来而非林彪执行具体操作执行。

以下是公安、铁路、交通、邮电等系统实行军管的实例。

１．公安系统的军管

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会见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时表示：「我们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样防止接管风。革命靠自己，每个工厂、单位，都应提高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组织起来，监督他们认真抓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躲在后面，叫我们上当。」

１９６７年1月１７日下午５时，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后到公安部报喜。谢富治给以热烈支持。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表示：「现在政法公社宣布市公安局夺权，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要帮助他们搞好这一工作，这个工作很复杂、繁重。条件成熟的要夺权，不成熟的就监督嘛。」　同时周恩来表示：「北京市公安局夺权了。夺权以后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中央文革是会帮助你们研究的。」

１月２６日，周恩来同样对《政法公社》的夺权大为赞赏：「夺权要由联合到大联合，以本单位革命造反派为主，外单位援助为辅。自己解放自己。当然也有特殊的，内部力量差，外部力量强，去煽风点火，机会成熟了，不夺又不成，不夺可能被右派夺了，那就夺。比如公安局的夺权，《政法公社》的同志长期蹲在那里，逐步培养局内的造反派，夺了权。」

而对于这一历史情况，诸多文章则明显是混淆事实。例如万迪宏在《谢富治沉浮录》一文中如此描述：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江青在接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组织时，公然鼓励他们去占领劳动部、总工会，谢富治立即效尤。１２月３１日，他与周恩来在接见北

京政法学院的「造反」组织——「政法公社」时，主动「建议」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

当时，周恩来听后惊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谢富治竟然会煽动群众去接管公安机关，自毁长城。于是，他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是你说的，我不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

且不说周恩来根本不会在大庭广众之前对谢富治如此否定，显然作者对此点是毫无背景知识所致，从以上事实来看，周恩来、谢富治等对于公安局军管一事毫无异议。

余汝信先生则根据档案材料研究认为：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后，对于公安系统是否能夺权，中央领导层曾持肯定态度，但很快就发现问题接踵而来，难以收拾。如在北京，先是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后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提出不能由单一组织接管，引发争议，双方大打出手，各不相让。为不让对方占便宜，又各自向中央文革提出，干脆让军队接管算了。经谢富治请示周恩来，决定军管，于２月１１日由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联合发出布告，称「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牟立善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为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以后，各地公安机关相继实行军管。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对京、津两市实行军管，拟先从公安局入手。次日，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公安部、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经毛泽东批准后于２月１１日发出。１９６７年９月６日周恩来同意公安部党组提出的由北京卫戍区接管公安部预审局的请示。同月２７日，周恩来在第四次接见广州地区赴京各群众组织代表时说：公安部门在业务上不能分派别。现在公安机关瘫痪，派别很多，我们必须实行军管。机场、铁路、仓库、码头，港口等都要实行军管，不容许侵犯。

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９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等文件。１０日，将《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报送林彪转毛泽东审批。此前，在修改该决定时加写：「各地公、检、法机关是专政工具之一。现在不少地方公、检、法机关造反派一方面作为革命群众组织与地方上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串连和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又作为专政机关执行专政职能，这种混淆两种职能的情况是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的。」「各地公安机关不论由机关内部或外部造反派已经夺权的，仍应实行军事管制。在军管实行后，外部造反派应立即退出公安机关，不再到公安机关进行串连，内部造反派应按行政系统接受军管委员会或军代表的领导，不许进行内外串连，也不要再参加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接系统的大联合和代表会，而只在内部协助军管会或军代表进行革命和业务工作。」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主要内容：一是对公安部进行彻底改组，新的机构已组成，总数１２６人（以军队４１名干部为骨干），其余全部人员由解放军干部带领，已于２月７日离开机关到西郊政法干校集中学习，揭发批判；二是深入开展大批判，截至目前止，共挖出叛徒、特务、走

资派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重点分子１０１人，逮捕２２人，群众看管７９人，其中包括7个副部长级干部。7个副部长级干部中，徐子荣、汪金祥、凌云于１９６７年被逮捕，杨奇清、严佑民于１９６８年3月被逮捕，刘复之、尹肇之被监督劳动；三是指称罗瑞卿、徐子荣、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把黑手伸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继续批深批透，批倒斗臭；四是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军级）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选拔１５０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翌年１月１９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公安部运动情况简报》，称公安部机构组织进行了初步改革，将原来的１１个厅、局合并为5个办公室（即政治、行政、侦破、治安、接待办公室），编制由１２００多人减为百人左右。精简下来的１０００多名干部，春节之后赴东北佳木斯农场，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对这两个报告，周恩来未表示异议，并转报毛泽东及中央批准。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内务部的军代表和公安部业务领导小组即联合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上报《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报告称，撤销高检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其工作终止。高法准备留二三十人（一半为军队干部，一半从原来的干部中评选）负责审核重大案件。公安部除留下原来的四十几个科以下干部外，再加上军队干部共留百人左右。其余精简下来的二千四百多名干部于明年２月春耕前，分别下放到佳木斯（公安部、内务部）、湖北沙市（内务部）、湖北沙洋（高检、高法、公安部一部分）三个农场。农场的所有制和领导关系都隶属于当地革命委员会。１２月２６日，周恩来批示「拟予同意」，毛泽东批示「照办」。

２．铁路、交通系统的军管

１９６７年３月，由周恩来提议，旨在着重讨论军队支持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三支两军」问题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在京召开。

周恩来在３月１３日讲：「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夺权斗争是由上海推动起来的。夺权斗争的发展虽然不算很快，但也不算慢。但是在这个阶段中，不少地区（有一半），不少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旗帜鲜明地联合起来，有的革命组织转化了，有的两方都是革命派，但不联合，甚至争论不休，发展到武斗，当权派干部没有挺身而出，没有检讨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线，这样就使当地的军事领导机关无从支持和参加革命的『三结合』夺权，这些单位陷于瘫痪状态，或者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或边防、沿海，或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或专政机构，或机密要害部门，或国防企业事业单位，国防工厂，仓库等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

３月５日，齐齐哈尔铁路局所属昂昂溪车站，因引导员、扳道员在工作时间辩论争执，忘扳道岔，盲目接车，造成３８３次旅客列车与０２０次货物列车侧面冲突的重大事故。机车大破一台，货车损坏八辆，正线中断行车６小时１０分。

铁路部门上报《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的材料说，齐齐哈尔铁路局管辖线路阻塞现象严重，每天都接到全国各地发来大批请求运送物资的告急书。要满足这些需要，每天必须运出五千一百多个车皮，而目前他们每天只能装运一千七百至一千八百个。外地运

来的物资，每天也有二百多个车皮卸不下来。铁路局的事故大大增加，到３月１５日，已发生行车事故三百二十六起，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这样短的时间内，事故之多，损失之重，是该局历史上罕见的。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纪律涣散，不听指挥；派别多（全局二百多个组织），不但增加了脱产人员，而且经常争论，影响工作；有些人强调破框框，而把一些必需执行的规章制度随便破除了；领导干部「怕」字当头，放弃领导。３月１８日，该局军代表介入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三结合」的抓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并计划在各分局也成立指挥部，代替长期瘫痪的领导机构。但全局军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困难仍很大，迫切希望驻军派更多的干部去加强领导。

针对如此严峻形势，毛泽东在３月１９日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作出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虽然毛泽东的批示是给林、周两人的，然而具体措施，则是周恩来落实，林彪参与的材料至今未见。

３月２１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的批示，要余秋里、谷牧立即研究拟出对铁路，交通、邮电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当晚，周恩来接见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造反派代表和各部党组成员，说：请大家来，是要迅速解决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的工作问题。对三部要实行全面军管，不能再耽搁了。

次日，周恩来与李富春、李先念等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交通、铁道、邮电三部群众组织代表共六十多人。周恩来在接见时称：「机关大联合都没有搞好，『三结合』还没有条件，三个部都不成熟，铁、交、邮刚由部外转入部内，铁道部三十三个组织观点不一致，两大派还要谈判协商。……」「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主要物资设备、援外、国防、航空先军管。一月底，我的意见民航局归军队管。那样集中，但到真正实行军管时，有部分人拒绝不干，闹了几天，军事院校和工厂还是说服了，最初闹的人多，一天天闹的人就少了，闹了四五天没闹头了，最后不闹了。现在是三月份，不能再耽搁了。原来二月份又等了一个月，刚才大家鼓掌，可能是不会有意见。总之不能再推迟，无论如何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先搞大的，邮政先搞省会、直辖市，大的港口，至于地方还可根据需要，实行军事管制。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由谷牧同志负责。军管的目的是过渡的办法，还是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

３月２８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关于铁道、交通、邮电部门实行军管的决定。　至１９６７年5月，铁路系统大部实行军管。全国十八个铁路局，军管了十个，即齐齐哈尔、吉林、锦州、北京、呼和浩特、柳州、成都、西安、乌鲁木齐、昆明铁路局。五十一个铁路分局，军管了二十七个。

但是对铁道部部机关军管的实施，延至５月中旬方得以落实。５月１９日晚，周恩来接见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１月２９日成立）全体成员和部机关两派群众组织——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和联络总站的代表。针对有人提出要砸烂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周指出，联络总站造业务监督小组的反是错误的。周说：你们上纲太快了。现在我宣布铁道部实行军管。如

果你们再来冲击，就按军管处理。

５月３１日，周恩来接到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报告：郑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段因两派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四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六十九列。周恩来当即批示同意济南军区６８军党委常委关于要求对徐州铁路分局和火车站实行军管的急电(时陆军第６８军军部驻江苏徐州市，负责徐州地区「三支两军」事宜)。中午，周到毛泽东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毛泽东表示同意。

下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肖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开会，商定如下对策：(一）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二）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三）参加军管的军队人员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铁路、轮船运输的管理，免受干扰；(四）责成总参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次日拿出方案。会后，周恩来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措施，连同铁路中断情况的八份电讯，一并送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告「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于５月３１日正式发布。《决定》共八条，其中第一、四条称：「一、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任命苏静为军管会主任，杨杰、朱互宁为副主任。」「四、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部属单位无论是否实行军管的，均受部军管会的领导；分散在各地的单位，同时受所在地革命委员会或军区的领导，但有关生产运输调度业务，必须服从部军管会的集中指挥。」

６月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６月５日，周恩来召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文件之一，为《对铁道部实行全面军事管制的部署（草稿)》。６月１２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国铁路实行全面军管。

第五章 二月逆流：协助毛成功地反击

陶铸特殊的倒台方式，使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感觉到「人人自危」，自然对江青产生怨言。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毛泽东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林彪对江青不满，林彪为稳定军队作出了一些行动。这些都使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感到了一些鼓舞。加上他们对于「革命已经革

到自己头上」的不满和反弹，终于汇集成一股「二月逆流」。对于这种局面，毛泽东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成功地离间了林彪和其它副总理、老帅。因陶铸倒台而暂时稳住的周恩来，见风使舵，帮助毛遏制了这股「逆流」。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一举取代了书记处，使毛的「文化大革命」继续向纵深发展。

一、一月夺权

文革在１９６６年底继续向纵深处发展。周恩来在在１２月６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于文革的发展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首先表示运动是「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继而周恩来痛打落水狗：「刘邓路线不仅（笔者认为此处缺了个「是」字）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笔者注：在这里周恩来已经不再称刘、邓为同志。)」

在批判完刘刘邓之后，周恩来继续对原有的部分中央机关点名批评：「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

周恩来随后臬了一堆人的名字：「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谢富治同志是单枪匹马到公安部去的。罗经常给他出题目，也受到他的干扰。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

最后周恩来劝说大家要放弃抵触情绪，积极投入到文革当中：「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如果我们不搞文化革命，怎么样呢？就不能不出修正主义。大家的情绪那末不好，最多是脱裤子，罢了官，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怎么行呢？」「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外思想不通，有埋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有话当面说了，把思想搞通就好嘛！但违反组织原则，欺骗中央，那是不允许的，这样就会变成黑线人物，就会变成反党。这次会大家老老实实把思想摆出来了，脱裤子，就好嘛！但不能当面这样，背后一套。那是不行的。」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

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同时，毛泽东表示「祝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

这一切意味着在１９６７年，社会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涉及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果然，新年一过，党的第四位领导人陶铸便被打倒。

１９６７年1月４－６日，上海发生主要性质为夺权的「一月风暴」，继而北京的新市委造反派于1月１８日也在混乱中发生了夺权。

但是对于夺那些权，毛泽东在１月１６日表示：「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此话表明，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

对此，周恩来也多次明确表示只夺领导权不夺业务权。

但是，毛泽东随后改变了主意。毛泽东说：「不要分走资派与顽固派反动路线了，夺过来再说。」　周恩来随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到现在多数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的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这是毛主席引用了《战国策》上的「触碧说赵太君」），要坚定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合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上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周恩来这个传达核心就是一条：不论什么权，包括业务权，先夺过来再说。　另外关键的一条则是：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一月夺权之后必然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然而负责审批新成立的权力机构（即后来称之为革命委员会）则是国务院。这符合毛泽东的本意么？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和１０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各省的文革由中央文革主导，但是省

市委的日常工作还是由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主导、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分片分工负责。

一月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随后而来的则是成立的「新政权」由谁来主导，这是产生「二月逆流」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照同一个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则不难发现毛泽东早已经另有打算。

二、中央文革小组的崛起

在中央文革成立之初，中央曾经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用江青的话说：「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

但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得到毛泽东额外的赏识。１９６６年7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毛泽东只接待了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让刘少奇吃了个闭门羹。　毛泽东在２４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联席会上对文革小组大加赞扬：「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同时，对工作组责骂一通。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还规定各级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一跃而为政治局常委。全会不久，江青成为中央文革代理组长，列入中央领导人的行列。

中央文革小组开始有自己的碰头会，由陈伯达召集。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矛盾重重，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

随着文革的继续深入，特别是在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发出《工业十条》和《农村十条》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几乎全被冲垮，运动也扩展到工厂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和进行，主要通过中央几个领导人以及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讲话和中央文件、报刊社论的精神来体现。文革小组的权力也随之延伸到基层。

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为毛泽东发动和继续深入开展文革的「利器」。

但是周恩来同时还主持中央碰头会。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2月2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

党政一些业务问题。」4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由于两者因具体的分工不同，冲突自然难免。合而为一自然是最妙不过。因而毛泽东否决周恩来的提议是意料之中。

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开始之后，新华社在1月10日对此发了两篇热情洋溢的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另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电报起草之后，由周恩来主持通过了此贺电内容。笔者在此特意强调指出的是官方历史的「裁剪手法」。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在引用此手稿内容是特意删掉了「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一句，以造成读者既然是毛泽东批示给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么贺电内容也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讨论通过的，从而为周恩来撇清。但是根据王力的回忆，此电是由周恩来主持讨论通过的。

此贺电内容倒是无甚出奇之处。原本仅是「秘书班子」的中央文革小组却让国人惊诧，罕见的排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署名之后！王力回忆说，在贺电内容通过后，毛泽东到会，说署名要加中央文革小组。　对于这个非同小可的举动，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承认：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其实这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职能的根本转换，由一个参谋秘书机构变成一级行政机构，自此，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向各级党委或者行政单位下指示了！中央文革小组一跃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之一，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后患无穷。「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小组」也成为当时的政治口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

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心思摸的最透，指示领会的最深，执行的最坚决。

毛泽东指示起草贺电一事是在10日早上5时，在当天周恩来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表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陈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笔者注：指的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保守派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经济主义倾向。）。」

周恩来执行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示非常坚决。以至毛泽东说：「这样不行」。　周恩来在1967年2月1日（仅仅几天的时间!）说：「工交二十三个部门都夺了权，纺织部内部造反派未形成，外部要帮一下。国防口、农林口、文教口参差不齐，发展不平衡，但也夺了。各省市也都在夺。」

１９６８年2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各地来电格式的通知，其中要求专电向中央请示，属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可告中央文革小组；属于行政业务问题，可电告国务院。这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一种非正式的确认。　《周恩来年谱》如此记载：「（１９６８年2月１６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给各地的电报稿，通知今后来电应按问题性质分别发给有关部门，不要给个人来电。二十五日，嘱秘书向各自负责联系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招呼：今后给中央写信或发电报，均应按中央二月十六日通知规定执行。」　此种记载，非常令人惊讶。既然表明周恩来亲自所拟电报稿，但是电报稿内容却忽略不提，纯属有意而为之！周恩来还亲自为此电再次打招呼给各级领导负责人，可见周为此电是十分的重视！然而仅仅因为电稿是抬高突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周恩来年谱》的作者们就丝毫不提及其内容。这正如宋永毅先生所评论：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　由此完全可以洞察编纂官史的作者们的用心良苦之处。

在１９６７年2月5日(笔者注:王力回忆说是3日或者4日,穆欣则回忆说是2月初,笔者考证为5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反映：由于一些人被打倒，书记处的一些日常工作没有人抓。毛泽东回复到：「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三、毛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形如一盘散沙，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员的穆欣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　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意。

随后毛泽东借中央文革小组在2月4日关于「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批示发火：「为什么匆忙发出这个指示？也不送给我看」虽然毛泽东认同这个批示的内容。毛泽东继续批评到：「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怎么行？」「文革小组没有经过正式会议做出过决定，各人说各人的。康生说一套，陈伯说一套，江青说一套，对上没有报告。」

陶铸是在毛泽东默许下被打倒的，是由江青等在公共场合下公开的。陶铸的倒台是必然的，但是出局的形式却是出乎意料。堂堂的一个政治局常委转眼之间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突然被打倒，那么下一个将会是谁？相对于陶铸，毛泽东、林彪是暂时无需担心的。比陶铸地位更低的人则感到自危，甚至包括周恩来。

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就曾经来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寻求答案。李富春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　谭震林发牢骚：「这样一件大事，起码应该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陈伯达有什么资格公开点陶铸的名，宣布陶铸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又怎能决定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这不是胡来吗？」

于是有人提意见，像陶铸这样一个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没有经过中央开会研究，是不合

程序的。　此例一开，中央文革就可以随意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再要打倒其它人就更不在话下。老同志们能不愤怒？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向毛泽东提出。

对于这些「老家伙的愤怒」，毛泽东了如指掌。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现在机会来临，毛泽东借陶铸事件，趁机敲打下中央文革小组又把它送进「预期的位置」。

在２月６日的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毫无经验，没有领导过罢工，没有指挥过打仗和群众运动，只是做了些调查研究工作。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态度，让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能够「上钩」，毛泽东特意在２月６日说：「今后，每周到我这里谈一次。在座的，再加上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关锋、戚本禹，不要另外搞三、四个常委的小组。平常我要多看些材料，一周一次会。日常工作总理多做一些。」　此话一是回应周恩来关于碰头会的提议，最主要的还是给「老家伙」们壮胆。结果呢，这只证明是毛泽东「虚晃一枪」，给这些人一个「定心丸」：我对你们还是信任的，你们还是有闹的资本。

２月１０日，毛泽东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等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毛泽东继续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１２日，毛泽东继续批评：「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

四、分析「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

毛在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打倒陶铸的事件是中心话题，附带延伸了对老干部的问题。毛泽东以后并没有为陶铸平反，这种批评，正如王年一评论：令人啼笑皆非。毛泽东不也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么？既然打倒错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打倒而让陶铸照旧工作呢？」　但是却给还在位的革命家们一个回答：打倒陶铸本质上没有错，但是江青在程序上是搞错了的，以后就是要搞你们，也会通过组织程序，不会不明不白如陶铸一般。

再次，就是关于夺权中还要不要党的问题。

毛泽东在１月讲过：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批驳了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党的领导还是要的。　但是毛泽东传达夺权要先夺过来再说，这样就把这话否定了。现在毛泽东又重提还要党政军。这也是周恩来在２月１７日声称财政部党组的工作要恢复的重要背景。　其实在文革中「党」的领导的变化非常复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６６-１９８２）》中对此有详细论述。

其次，在１０日批评完之后，毛泽东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　但是毛泽东却「欲盖弥彰」:「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　此话并非仅仅是为保护中央文革小组，以免批评之事流传于社会，造成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被动，于文革大局不利。而是要告诉「蠢蠢欲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批评文革小组是要封锁的，不想让你们知道，不给你们造成机会。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把戏。结果，叶剑英同老帅们通了气，李富春同几位副总理讲了。　毛泽东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火已经点起来了。　而谭震林早就对江青不满，因而在知道毛泽东批评江青的消息后，备受鼓舞。　但是「二月逆流」之后而作为通风报信的叶剑英、李富春却丝毫未损，反而作为正确一方批评帮助犯错误的一方。

２月１１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开始因为文革革到自己头上表示不满。叶剑英责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看到此种情况，周恩来发现攻击中央文革要成为会议的主题，于是匆匆地结束了会议，而使老帅们未能遂愿。「大闹怀仁堂」于是２月１６日才能再次上演。

毛泽东在１２日继续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不能不说是继续「引蛇出洞」的高招。１２日的批评至关重要，因为２月份的第一次大闹已经上演。

１４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毛泽东传》的作者们承认：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　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毛泽东为了继续自己的「引蛇出洞」，公开造舆论。王力在２月１４日对《红旗》杂志通讯员传达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有的权夺来夺去，倒没有真正的夺权，有的夺了，并不能很好的巩固，带『长』字的都叫靠边站。有一个单位（是中央的）都是年轻人，一个带『长字』的都没有，不能夺权。现在流传着对司局长稍微靠近一点就叫『保』字派的说法，不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而从那一级出发，这样搞下去，我们要失败。」「对于军队一定要采取

正确的态度。相信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这支军队在毛主席和林彪主席的领导下，是一支坚强的人民的军队。军队支持地方可能支持错了，但斗争的锋芒千万不能指向军队，军队中个别人是有错误的，但如果因军队个别人的错误而把矛头指向军队，我们就要犯错误，就要上当。」「把陶铸轰了之后，所有的副总理都要轰，甚至连文革小组也要轰，但是就没有发觉有敌人。」

五、周恩来的反应

周恩来在１月４日凌晨同陶铸谈话。曾志的回忆非常清楚的表明，周恩来就是通知陶铸：你已经被软禁，不要离开家门一步！。　根据事后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来看，周恩来这次谈话仅仅是同江青等人商讨过而非执行毛泽东的决定。

周恩来对于自己的处境非常了解。一月份的混乱局势，特别是在他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先夺权」之后，局势只能进一步恶化。对于因为陶铸非正常倒台方式而引起的老帅和副总理们的愤怒，周是了如指掌的。特别是一月份「大闹京西宾馆」之后，中央文革和老帅「副总理」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闹翻脸」的结果会置自己更加艰难的地步，因为文革实行的是「剥笋」政策。自己曾经亲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过。

因此，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２月初，亲自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只能因势利导，发气无济于事。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节外生枝，增加「文化大革命」的困难，不要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动，要他们「戒慎恐惧」，遇事三思……周恩来嘱咐周家鼎亲自送给几位老同志看，一定交给本人，不要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

周家鼎拿着信先后到过陈毅、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同志那里。这封信签名回来周恩来看过后，就被销毁了。

周恩来为什么要写这封信？难道是怕引火上身？无论如何，从事后发展来看，周恩来这封信没有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也足以说明这些老帅当时也并不是对周恩来「言听计从」。周恩来对他们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高文谦在其《晚年周恩来中》说：在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时，周恩来知道事情闹得有些「出格」，特别是陈毅的发言和谭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会让中央文革一干人抓住把柄。他本人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脱不了干系。所以他采取主动，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为此毛派汪东兴前来听会，不过等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

实际上，散会后，周恩来向汪东兴介绍了会议情况。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然而，中共官方在编撰的有关周恩来的书时，多是故意把此事隐瞒。例如陈扬勇在其《苦撑危局：周恩来在１９６７》一书中引用谷牧的回忆：「这一次总理没有去，三天都没有去。」来为周恩来开脱，以证明周恩来保护这些老同志。

六、林彪的被动

在1月份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一事，林彪是站在军队高级将领这边的。　事后，林彪痛斥江青。吴法宪在其在回忆录中有专门一节谈及此事。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里也印证了这场林彪与江青的冲突。

１９６６年底，林彪同意以军委、总政的名义发电报给各大军区，提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受到冲击时，第一书记可到军队来暂住，绝密档案亦可送到军队来保存。　加上《军委八条命令》的出台，所有这些均使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受到了鼓舞，并且认为林彪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毛泽东此时「火上浇油」，特意同林彪拉开距离。

毛泽东在１０日斥责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时还批评了林彪：「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同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王力回忆到，毛泽东是面对林彪讲这话的，是在批评林彪。

毛泽东批评林彪，无意中会造成一种林彪也是受压制的如同老帅一般。

其实，林彪对于军队有着自己独立的想法。林彪认为，军队应该独立，不应该掺合地方事务。早在１９６０底，林彪针对罗荣桓要求军队与地方政务挂钩的观点给以否定。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这并不符合林彪的本意。毛泽东特意批示到：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但是在稳定军队维护军队利益上，林彪和老帅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个就决定了林彪不可能置身度外。特别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使得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林彪是他们阵营中的一员。林彪审时度势，并没有像上次因为「肖华事件」（即１月份的「大闹京西宾馆」）那样再次大骂江青。

２月１６日大闹怀仁堂是整个「二月逆流」的高潮。谭震林是「二月逆流」的主角之一。余怒未消的谭震林在１７日怀着满腔忿恨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丑化党」、「真比武则天还凶」。而谭震林就此而被打倒，而且在以后召开的「九大」会上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也充分说明了把矛头对准江青的后果是严重的，也证明了笔者所持有的某人同江青的关系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其政治命运的观点是正确的，无论是谭震林，林彪还是周恩来。

谭震林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林彪的信任。

其实就在一次大闹之后，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就在李富春家里相聚，谭震林就提议应该找林彪，而且认为林彪是和他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谭震林提议：「应该找林彪同志反映情况，争取他的支持。」

２月１７日，林彪收到此信，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而且要求保密。　这无疑是在保护谭震林。１８日，江青携带王力到林彪处谈话。１９日凌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震怒」，林彪再也掩盖不下去。林彪这时候才把信转给毛泽东。

知情人告之，谭震林写给林彪的信并不是只给林彪一个人的，而是谭震林一式两份，抬头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并且谭震林给林彪的信是在毛泽东开会决定整肃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后才交出来，上写「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胡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这个和张云生的回忆是相吻合的。　这个和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上把许世友等人骂张春桥等人的信及时转给毛泽东形成鲜明的对比（笔者注：详见后文第八章论述）。

林彪的批语显然搪塞之词。毛泽东收到此信后，批示原件退回，显然是对林彪表示不满。特别是毛曾经要求江青携带王力到林彪处通气。林彪此种「不作为」显然不是毛泽东想要的结果。

林彪收到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彪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张云生说这是林彪发泄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一幕。　林彪的不满还在继续。当毛泽东在２月１９日凌晨召集严厉指责谭震林、陈毅等人的紧急会议时，本来通知了林彪参加，但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了叶群作为他的代表……　根据王力的回忆，原本是毛泽东主持的常委扩大会只要通知林彪，林彪都会到席。

江青、王力向林彪汇报毛泽东在１６日夜的谈话时表示：（谈及徐向前元帅时，林彪说了一句）「他不能代表解放军。」　知情人告知，林彪还讲了一句，还批评了陈伯达。王力回忆说林彪说陈伯达不过是个书生，实际上林彪是针对原来陈伯达关于军队的说法再次批评到：「解放军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怎么不知道。」

在「大闹京西宾馆」中，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公开发言：「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叶剑英把会议情况报告给林彪。　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因「大闹京西宾馆」事非要压黄永胜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笔者认为，黄永胜的表现与后来黄代替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一直关系甚大。林彪在文革后「９１３事件」之间极力避免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插手军队事务，因此毛泽东也只能把以「批林批孔」之名行让江青、王洪文等人插手军队事务之实的行动在「９１３事件」进行。従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点也注定了林彪的结局。同时也说明林彪和周恩来处事的不同，林彪在军队中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毛泽东的「为所欲为」，例如抵制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支持后来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对抗江青等人，而周恩来则明显的不同。如果周恩来像林彪一样抵制江青等插手政务系统，显然局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好些。但是正是这种不同，也预示了两人的结局的不同。

然而「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为了推卸责任，把事情搅浑，居然说出「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这样明显歪曲事实的话来。对此，周恩来同志也应声。周恩来对杨成武说：「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　周恩来对罗瑞卿说：「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

毛泽东对林彪的做法洞若观火。在１９日凌晨会议之前，毛泽东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做了工作，说：现在老帅们不听我的，我准备带着林彪到南方去闹革命，打游击，重建一支解放军。为了笼络林彪，毛泽东并特许叶群今后可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上，惯于逢场作戏的毛泽东又故意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然后又危言耸听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毛泽东把林彪置于「火烤」的位置。你林彪不是想置身度外嘛？毛泽东把这些人矛头说成是指向你林彪，我俩是拴在一跟绳上的蚂蚱。挑拨离间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

七、徐向前的言行

在１９日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上做出决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因此后人把徐向前也列为「二月逆流」的主角。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

江青之所以提名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完全是因为徐向前因为历史上问题（很容易被划到张国焘那边去），适合做「刘盆子」。

徐向前自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以来，可以说是「鞠躬尽瘁」。

徐向前在会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大发雄威：你们（指文体单位）是专门闹革命，机关是抓革命，促生产，要一面革命一面工作，主要是闹革命。你们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斗争总是不平衡的。你们现在主张怎么革命？（《新燎原》一同志回答：我们主张揪出幕后人，不仅保卫部，上面还有线，扶植一方，压制我们一方。批判反动路线，才能斗批当权派。）你们认为斗杨勇、廖汉生到时候没有？（答：没有。）没到，什么时候到？（徐副主席很气愤站起来）你们认为阻力是什么？（答：爪牙没抓出来。）你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你们这样搞会把打击面扩大，杨勇、廖汉生这样的活老虎毛没拔一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得很，刘、邓路线，刘志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少数。凡是斗群众，凡是犯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都是斗争目标？那个军区那个部队没执行过。为什么对杨勇、廖汉生你们斗过几次？我劝你们把廖汉生斗斗，杨勇是个什么东西，斗斗去。我非常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不斗杨勇、廖汉生，要去抓郑维山，造郑维山的反！方向错了。你们造反，对！造什么反？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这个反不造，你们要扩大，就会扩大到你自己头上，如都搞成杨勇、廖汉生的爪牙、走狗，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个是对杨勇、廖汉生要斗垮、斗臭、烧焦；一个是团结到批评到团结，不要打击自己的朋友，我和你们商量研究，革命不容易，不能分散火力，我看你们要好好的学习十六条。革命怎么革，革谁，革命的目标都不知道你们革谁的命？放着老虎不打，硬拉自己的朋友！如果让我参加你们的新《燎原》、《星火》，我不参加。（《火炬》一同志：如这样大方向一致，就团结一起干。）放着活老虎一毛不拔，还到处去找，究竟有多少老虎？要打多少老虎？

关于１月１９日的大闹京西宾馆，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在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中「徐帅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叶剑英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

然而实际情况是徐、叶两人在是否要揪斗肖华的问题上拍茶几、捶桌子，相互对抗。

《叶剑英传》如此叙述：「过了一会儿，肖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肖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肖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程骨折。」

《徐向前传》的描述是：「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作为当事人当时在场的吴法宪后来证实：「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责任，和陈伯达一起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于是引起两位元帅之间的对抗。」　吴法宪还回忆说：「徐向前（帮助陈伯达批评肖华－笔者注）批评了肖华。」徐向前说「你肖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吴法宪还说，两位老帅在肖华问题上得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得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晚上得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得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是背后都议论纷纷。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邱会作就被总后造反派批斗「车轮战」，被搞得晕厥。林彪下令邱会作到西山去，还特意批示到：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但是在１月份，徐向前无视林彪的批示，打电话给邱会作：我不是以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命令你下西山，去见群众。」邱会作无奈，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严刑拷打，致终身残疾。后来又被林彪救出。

根据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邱会作的这段回忆得到证实。周恩来：「对邱会作同志，邱会作同志被斗了几个月。（邱会作同志就是去年林付主席『八?九』讲话说的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付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赵尔陆的问题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仍然把赵致死的责任归于林彪。

林彪曾经对赵尔陆问题的讲话，「对赵尔陆的错误要狠狠地批，对他的工作要重重的用」。典型的林彪特色，双关语，一方面是保，另一方面是批，重点是保。林彪对张爱萍、韩先楚问题的批示同此批示大致雷同。在赵被造反派冲击后，林彪第一个提出让赵到北京的西山休

息。于是周连同聂叶等人具体安排了此时。当赵的噩耗传来，林立即派叶群去看望赵尔陆的夫人郭子瑞同志，并把郭子瑞同志接到毛家湾休息。郭子瑞对林副主席说：「怎么革命了一辈子到成了反革命，走资派！？」林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怕戴帽子，走资派是党内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后来又派黄永胜的夫人项辉方和邱会作的夫人胡敏，多次到赵家看望郭子瑞同志。这个时候，国防科委的造反派还硬说赵是自杀，是叛徒，要打倒，林彪写了个条子批示到，赵不是反革命，其家属也不是反革命。

周恩来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接见七院代表时候说:「我看了你们两条标语，说赵尔陆是彭、罗在线的人。（插话：是彭、黄分子）（这时总理大笑）你怎么这样乱连？我还以为是彭真呢！你们把彭、黄、罗、赵连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是在全党全军都通不过的。凡是了解党的历史（插话：聂、贺六一年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上是有严重问题的）六一年对赵尔陆的批判过头了，过火了。那时会上罗对赵的攻击最厉害，按他的办法干，赵就根本不能做工作。罗的方案都提上来了，在我的前厅吵得不行嘛，是林副主席考虑了几天之后，从外地打电报给主席留下来。你们提六一年这条对赵最有利，我劝你们把这两条收起来，不然你们要失败的。」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讲话没有被及时传达。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一次回家见到毛泽东时，谈到赵尔陆被整的事，毛泽东说：「赵尔陆是井冈山的人，为什么要整他？」这句话在赵尔陆去世后才传出，如果早点传达下来，在当时毛泽东的话真可以说是一句顶一万句，绝对权威，赵尔陆肯定会得到保护，对赵尔陆的攻击将会减弱，他的生命将会延续。

下了西山的赵尔陆，终因遭受迫害导致的过大心理压力和压抑，最后引发心脏病、哮喘病致死（１９６７年2月2日），不可谓不是个悲剧。

但是在整个事件中，是谁下令赵尔陆下的西山？就是时任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只为自己评功摆好，对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丝毫不提，难道是对历史真实的回顾嘛？

徐向前针对贺龙说：「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的，贴到什么地方，哪时贴都有指示。」

这是笔者目前看到在公开场合明确说贺龙政变的最早的材料。

徐向前还多次提及「揪军内的一小撮」。

徐向前在接见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派时讲：「我们总政新的文革小组成立以前，情况是不太熟的，所以我不多讲，只少讲几句。为什么我们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因为过去全军文革小组是以刘志坚这个坏蛋把持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封锁。既不请示也不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多指示不执行，对他的批评还不改，这是我们军队里所谓刘、邓反动路线里头一小撮里面的一个人物。这样打着红旗搞了好多鬼事，你们的材料比我们还多些。最近是准备进行批判刘志坚这样一个坏蛋的大会吗？筹备嘛！因为有这样的人物搞鬼，我们全军的文革小组能搞好吗！搞不好。」

从上面种种情况来看徐向前并没有对所谓的文革抵触，反而是积极参与，整这个，烧那个，不亦乐乎。

虽然徐向前如此卖命，却依然讨不了好。

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人与会。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愤懑。黄永胜就直言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这个会议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但是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徐向前在２月份的态度有所转变，几次批评陈伯达（读者亦可以参阅《徐向前传》），但是相对于叶剑英在１、２月份的表现，实属「小巫见大巫」。而且叶帅后来还在２月份对赵永夫开枪事件表态说「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

对于徐向前离职的原因，徐自己也有过说明：江青板着脸说，徐老总老了，不能工作了。

因此客观的说，徐向前虽然和陈毅、谭震林一起被勒令检讨，但是若说其实二月逆流的「干将」也未免与历史不符，夸大其词了。

周恩来则在徐向前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冲突进行调和。徐向前自己说：「我于是向总理表示想辞去全军文革的工作。总理慰勉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这两句话由总理说出来，感染力是很强的。」　徐向前虽然没有辞职，但是后来因为「二月逆流」被批，军队文革小组就渐渐销声匿迹了。

八、陈毅的说法

陈毅在２月１６日怀仁堂的会议上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嘛？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陈毅的这些话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事后整理的，并

经过周恩来、康生核对过的。

当陈毅讲到周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周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　陈毅敢当着周的面，挑拨离间，胆子够大的。周岂是如此能轻易被挑拨的？当陈毅讲了对毛泽东有影射的话后，周恩来又是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周恩来叫王力整理出一个２月１６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王力在会上读了，并核对情况。陈毅表示异议，说有一句他没有讲，要去删掉。周恩来当场驳斥：「讲是讲了，不要删了。」　周还在此处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有人表示，包括王力，均认为陈毅在讲话中影射了林彪，这话值得商讨。因为就在同一时期内，陈毅这尊「大炮」不断在吹捧林彪。　更重要的是，陈毅的这番讲话是以否定刘少奇、彭真等为前提的。

「９１３事件」之后，１１月４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对与会人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二月逆流』。」毛泽东同时编造谎言：「『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就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同时毛泽东叫叶剑英把此话转告给陈毅。　但是叶剑英并没有传达。周恩来在１９７２年１月２日看望陈毅时也没有向陈毅传达。

直到次年１月６日，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后才去告诉陈毅。

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没有毛的发话，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毛发话，也必须再三验证，可见，在当时毛的权威所在。

九、反击「二月逆流」造成的后果

正如前述周恩来在２月２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文把革的钓鱼台会议和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的碰头会分开。很明显，周恩来的意图仍然是把两套人马分开，免得互相争吵，以利于工作。

对此江青曾经指责：「你（指周）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

４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因为周恩来的提议明显不符合毛泽东意图。

２月１９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毛泽东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２月２５日到３月１８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

中共官方史说，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出面负责召集和主持针对这几位老同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在这样的会上，他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其中包括那些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包括自己。在期间，由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开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有一份经李富春起草、周恩来审批的国务院系统开展运动的报告。

其中陈毅的话颇有意味。据王力说：在周恩来和康生对会议记录作最后整理时，陈毅认为记录歪曲了他的一些话，要求删去，被周恩来拒绝。陈毅要求删去的内容是其没有把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相对比联系。

周恩来为了能够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除了在记录上尽量撇清自己除外，还做了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行动很不得力的检讨。而这些检讨成了江青时不时敲打下周恩来的武器。

１９日会议之后，由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不复存在。《毛泽东传》的作者们如此写道：「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同时，江青、张春桥轮番找周恩来谈话，打着贯彻毛泽东关于「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指示的旗号，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中央书记处来看待，今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区筹备建立革委会的权交给文革小组。

王力说：这个事件以后，江青就以文革小组的名义公开向总理夺权。一次是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公然对总理说：「主席已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象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周恩来只好说：「我以后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后来江青、张春桥又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说：「以后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江青还说：「地方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总理不要管了。到北京来汇报，总理太忙，不要组织了，由文革小组组织。」

反击「二月逆流」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局瘫痪了，中央文革不仅取代了书记处，而且取代了政治局，创造了在中共历史上开创了踢开政治局的先例，而周恩来极力的配合是造成此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地离间了林彪和其它老帅们；而周恩来也得到一定的回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执掌中央项目组两大权力系统，此地位一直到「九大」之前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首先是在发火之前，给周恩来一个「甜枣」。针对周恩来对事先没有看十三期红旗社论一事，毛泽东说了一句：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但是随后却指示王力将即将要刊出的《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交给周恩来审阅。

社论提出：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出发去对待干部。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切怀疑，一概否定、排斥、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教人的政策，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周恩来阅后送毛泽东审批时注明：「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毛泽东则回应到：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以后重要的社论都应这样做。

江青虽然时不时的向周恩来问罪（中共官方党史对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也时不时地向周恩来示好（中共官方党史对此则避而不谈）。江青在这种重大问题上和毛泽东还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

阎长贵回忆：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阎长贵先生还说：１９６７年２月下旬的一天，我送一份反映贴总理大字报的材料。江青看了看，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我知道，中央当时不允许给总理贴大字报，江青、陈伯达曾派我到北大找聂元梓，要她组织人到天安门前覆盖关于总理的大字报。江青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影响也很大。

周恩来对此也是礼尚往来。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更紧密，也更加顺从江青。

李富春在「彻底批判陈毅大会」上的讲话时讲：「昨晚和今晨总理叫我来参加你们的大会，这说明总理是支持你们的大会的。总理亲自确定为『彻底批判陈毅大会』，你们批得对，批得好。希望你们今后彻底批深批透。你们提出陈毅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提出陈毅不投降，就坚决打倒他，我都赞成。但是你们有的同志提出『打倒陈毅』，我看还不行，你们勒令陈十天交出检查，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刚才周总理特地打电话告诉我，要我说一句：总理和中央文革是一致的，现在有的人想挑拨是办不到的。」　类似的话，据笔者所知，周恩来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过。

十、尾声

在文革轰轰烈烈进行了半年之后，当初积极参与文革的老帅们发现「文革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命」。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就不乐意了。在１９６７年初，接连发生了几件让老帅们感到振奋的事情。先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陶铸被打倒一事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会后李富春将消息传播出去；其次林彪因肖华的事情大骂江青，而且「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也壮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胆。这些老家伙们终于在２月１１日和１６日的「大闹怀仁堂」出了口恶气。

在毛泽东听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汇报后，决定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惩」这些犯上作乱的「臣子」。

１９日凌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然而时隔不久，除了谭震林之外，其它人都复出，足以证明毛泽东是阳谋，而不是蓄意打倒。谭震林完全是因为骂江青的信而被真正打倒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

毛泽东决定中央政治局从２月２５日到３月１８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勒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到正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军委扩大会上作检讨。中央文革小组把此事捅到社会上，由此而造成了声势巨大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虽然这次老帅们作了检讨，但是毛泽东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阴一套阳一套，对于文革是不是「转弯了」。时有凑巧，王秉璋事件给毛泽东一个机会。

１９６７年１月，王秉璋被造反派游斗之后关押，患上了肝炎。王的妻子找吴法宪要求写报告给林彪。林彪得知后，报告给毛泽东，说七机部是机要部门，王秉璋完蛋了，那谁来主持工作？毛泽东同意林彪的意见，把王秉璋解放了。同时毛泽东通过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把王送到西山和老帅们住在一起，看看他们在干什么，说什么，都有那些活动，有无串连。毛泽东要求王秉璋详细了解情况并直接向他报告。后来王秉璋向毛泽东报告的非常详细：徐聂叶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作了什么，谈了什么，写的一清二楚。王秉璋说，老帅们在受到批斗后，接受了教训，态度转变了，一致认为这个运动稿的很好，对于防修是功不可没，起了巨大作用。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批给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对这些老帅开始加以保护。

首先，４月２９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１１８室召集周恩来和被指责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开了一个团结会。毛泽东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当晚，周恩来就见机而作开出一个出席「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的名单。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岁月氛围里，这样重大的节日能否有资格上天安门，成了判定某个人有无「问题」的显著标志，关系重大。一般来说，这个人能参加这类活动，名字一见报，就意味着此人政治上没什么问题，不在打倒之列。5月１日晚上，这些老同志都登上了天安门，与毛泽东等一起同首都群众欢度五一节。次日的《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尽管这样，这些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还是被认为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毛泽东的心中，那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还没有回到他们「大闹」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对于因为受「二月逆流「冲击的这些老帅，国内党史界一概把这些人的复出和照顾归功于周恩来，这是不公平的。当时在４月份，康生和江青提议中直机关党委组织起来，老帅周围的工作人员、党支部成员对其批斗。老帅们被搞得灰头灰脸的，家也被造反派围困了。４月底，叶帅在西山的宿舍被几千人围困，日夜口号震天响，要叶帅出来「回答群众问题」。

林彪把这情况向毛泽东报告。但是毛泽东直到5月3日才委托黄永胜去西山作造反派的工作。经过长达两个小时的耐心规劝，造反派才离开西山。林彪趁热打铁，建议毛泽东停止老帅们家里党支部对他们的批判，说再这样下去，老帅们的身体就垮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林彪派黄永胜和吴法宪两个去老帅家里慰问。

相比之下，5月5日，周恩来亲笔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和谷牧(并告李富春)提出：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重犯过去「错误」；否则，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甚至走入「绝路」。周恩来语气强硬，措词严厉，来告诉这些人不要再对文革加以抵制。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又对这些老帅们重加鞭挞。

事情的结束最终是因为「９１３事件」之后。毛泽东出于笼络人心之举，把罪责归于林彪一人，「二月逆流」方才告一段落。

第六章　全面内战：随着毛的意志左右急转

「二月逆流」很大程度上在各地表现为「二月镇反」。特别是有了借林彪口述、毛泽东批准的「军委八条命令」，各地军方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镇压造反派，还发生了流血事件。

毛泽东成功地发动「阳谋」，反击「二月逆流」，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局。但是这种中央层次上的逆转并不和各地的文革开展同步，各地的造反派仍然处于受压制、甚至被打成反革命的状态。

１９６７年2月２７日，陈伯达把载有天津小站材料的《快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１９６７年2月１５五日编印）上报，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毛泽东对此批示到：「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在此批示下，反击浪潮由中央逐渐传到全国各地，各地造反派纷纷喊出口号，要揪出当地的「谭震林式的代表人物」，例如：武汉要救出「武老谭」陈再道，广州要「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

３月２７日，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周恩来在３０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共五条，其中第二条讲到：「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对此，毛泽东批示到：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４月１日，中央又转发《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的附件，其中规定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４月２日「人民日报」《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此社论是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站长徐鹏飞提供的原稿基础上修改形成的，审批社论者，除总编唐平铸外，还有后来随谢、王到武汉的北航红旗的吴介之（研究生）。

４月６日，中央军委发出林彪口述后加以整理《十条命令》中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一时之间，各地造反派声势大振，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出现重大的反复，直到发展成７、８月的「全面内战」和「武化大革命」。

而在这过程中，周恩来积极配合毛泽东的部署，不遗余力的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先是在「５１３武斗」事件中见风使舵，接着在「７２０事件」中立下大功。周恩来真正掌握了「党、政、军」的大权。「７２０事件」让毛泽东急速转向极左，随后又紧急刹车，借刹车之势，周恩来对动了自己「奶酪」的王力痛下杀手，这一切都体现了周恩来的政客本色。

一、「５-１３事件」和军委办事组的成立

根据王年一先生的介绍：

１９６６年冬至１９６７年春，在空军机关、海军机关、总后勤部机关和它们所属的文体单位、院校，群众组织都分成两派。空军中保吴法宪（时任空军司令——编注）的、海军中保李作鹏（时任海军政委——编注）的、总后中保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长——编注）的是一派，即所谓「保守派」（亦称「老三军」），人数较少。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是一大派，即所谓「造反派」（亦称「新三军」），人数较多。当时的「造反」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肖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编注）、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编注）随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大派。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造反派是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的，然而最微妙的地方则是所谓的保守派中的一些人可以直接通天。

吴、李、邱的日子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好过，为避免揪斗，曾经藏起来，而邱会作被打致重伤。

时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５周年之际，「老三军」准备于５月１３日

在北京展览馆搞一次文艺会演，而对立面则准备冲击这次会演，并且认为这是同「老三军」决战的机会。

为了准备这次演出，「老三军」的成员之一刘素媛（曾经陪毛泽东跳舞）找到毛泽东寻求帮助。毛泽东则让徐业夫亲去毛家湾向叶群交底，并要叶群找刘素媛谈。刘素媛则把毛泽东要保吴法宪告诉了叶群。叶群表示支持演出。然而这和周恩来原来的设想并不一致。周恩来在４月２０（或者２２）日指示：五一节各文艺单位到公园演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

无论是演出之前还是临到演出之际，肖华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对于此演出都坚持：要演出就要联合演出，否则不可以演出的观点。５月１３日，肖华打电话指示军委文革办：通知空军、海军、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请他们劝说一派演出的文艺团体不演出或者推迟演出，以免引起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反对演出的群众组织，命令他们不准冲击演出会场。军委文革办当即执行了肖华的指示。演出前，肖华和陈伯达来到演出现场，肖华劝大家不演，陈则模棱两可，含含糊糊。　　演出发生武斗之后，肖华和陈伯达又赶到现场，指责演出的一派不听命令，这直接导致了「５?１３事件」之后对肖华的批斗。

武斗发生后，周恩来一面帮肖华解脱，一面急速转向，表态支持演出的一派。周恩来在１４日凌晨３点多接见反对演出的「冲派」时表示：「演出是肖华和我们批准的。你们不应该造这次演出的反，演革命的戏，演『长征组歌』，难道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为什么要冲？」

周恩来为什么急速转向？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要有革命性、科学性嘛，可是你们呢？（下面吵吵嚷嚷）你们是那儿的？你们派别多，我搞不清，反正今天的演出，冲就不对。既然已经演出了，七点钟听说要武斗，我们正在议论这个事情，你们就打开了，本来想叫他们不要演了，后来他们要坚持演出。林副主席知道了，非常着急，马上表示支持，肖华主任忙着这件事，可是你们（指冲派）从派别的利益出发，就这样干。」

１４日凌晨６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海军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是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派别）并讲话。周总理表示本来你们没有要求我接见你们，我来接见你们，我是支持你们的！

但是１４日晚，周恩来在解决两派武斗的问题时，因为两派都在，故周恩来批评了武斗，支持了肖华。然而这引起了「老三军」的不满。张秀川对周恩来说：「总理，这件事你最好不管了。」张秀川把内情告知了周恩来。

「老三军」对肖华不满，开始揪斗肖华。周恩来在５月２１日还公开表示对肖华的保护，林彪叫肖华暂避西山。

余汝信先生认为：以流行的说法，肖华个人的政治危机，缘自两个月后，肖华被指为这一主要是军内两大派的武斗冲突事件的幕后支持者和操纵者。关于「５?１３事件」，目前似乎还未有一篇文章能真正说清楚其前因后果，究其原因，还是如李德生那样将事件的责任公式化地归罪于「林彪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事实上，「５?１３事件」前冲派在军内占相对优势，倾向于冲派的，不仅有肖华、还有杨成武，而支持所谓「三军党委」的一派、

却处于相对劣势。目前，并没有材料支持「５?１３」武斗冲突是一有组织有计划的「预谋」的说法。它与文革中众多的突发事件一样，是两派矛盾激化的产物，却决非有什么周密的幕后的「预谋」。

「５?１３事件」后表态支持「三军联合演出」的，不仅有林彪，还有周恩来，于是造成了肖华政治上的被动，但决非毁灭性的打击，并没有任何人（包括林彪）给肖华定性，肖只要认真检讨，也许还可以过关。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肖华自己的「不检点」。而将肖「不检点」的事往上报的，不是别人，正是杨成武（这次，是杨成武「要把水搞浑，他自己逃脱」了）。毛泽东得知肖华在东躲西藏中竟还有如此行径，可以一边写检查，一边拈花惹草，龙颜为之大怒，直斥其为「扶不起的天子」！毛的这句内部「最高指示」被迅速传了出去（这就是有人故意要把水搞浑了），也就最终决定了肖华垮台的命运。惟江青事后对此过程有一段讲话：「解决肖华问题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结果把肖华不应该拿出去的材料拿出去了，搞得满城风雨，对解放军不好，是抹黑。坏人利用这些来捣乱，破坏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时制止，始终没有制止住，地方也利用上了，这样就打偏了」。

根据知情人讲述，肖华调戏的女服务员，是杨成武认真交代总参管理局政委严峻从女服务员手中拿到铁证的。严当时还不愿意，被杨痛骂一顿。

６月９日晚，周恩来陪同林彪以及其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人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的演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导。从此「新三军」一蹶不振。肖华的倒台，却意外的导致了军委办事组的的成立。

有人断言是林彪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的，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０日，江青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１９６７年夏天，斗争肖华的时候，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引者注：军委办事组亦称军委看守小组)。开始是４个人。后来……在军队产生了新的办事班子——军委办事组。杨、余、傅问题出现后，进行了改组。」

看守小组的成立，实则是因为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相继瘫痪，欲以其取代上述两机构负责指导总政及其它军队驻京机关、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方面工作的职能。

根据王年一先生文中引用的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５日，军委办事组给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得知：

在江青提议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在８月１７日发出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吴负责，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９月２４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办事组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

报告还对军委办事组的功能做了解释：１０月４日，我们研究了军委办事组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认为，由于总政目前处于瘫痪状态，军委文革小组目前实际上也处于瘫痪状态，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

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

同时报告说：「军委办事组是个临时性的(笔者注：语句不通，原文如此)，待政治工作组组成后，即将办事组的工作移交政工组负责，军委办事组即行撤销。」

对此报告，周恩来于１０月１６日作出批：「提议在小组会议上讨论一次，再正式报告主席、林副主席。」１０月２０日，康生批：「此事必须先请示林彪同志，在林彪同志同意后再正式上报主席。」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７日，杨成武、吴法宪向林彪报告称：「关于军委办事组问题，向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个报告，遵康生同志的指导先报您批示后，报主席批示。现将报告呈上，请阅批。」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

毛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８日批示：刚成立又取消，恐怕不妥。

军委办事所行使功能在１９６８年「杨、余、傅事件」后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根据王年一先生的文章：１９６８年3月２８日，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毛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说，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

毛又说：「军委办事组要订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头。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过去我们两个处在第二线，让他们去搞，他们也不汇报，搞封锁，实行隔离，隔离不反省。」

林彪说：「不了解情况。」周恩来说：「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

毛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

毛说，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

从以上论述得知：军委看守小组的提议与林彪无关，军委常委不再开会与林彪无关，其中起作用最大的却是无任何军职的周恩来!

实际上，在肖华被毛斥为「扶不起的天子」之后，不仅总政治部，全军文革小组亦实际停止了运作。8月１６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三军党委负责人时宣布：鉴于徐向前、肖华主持的全军文革小组已经瘫痪，不能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中央决定，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四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同时，总政要关起门来乱一阵子，

肖华不参加一切公开活动。１９６７年1月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及８月该小组停止活动，都是周恩来出面宣布的。　由此可见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实际地位。

一个明显的对比则是：尽管林彪在名义上是中国级别最高的副总理，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国务院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周却对军队事务则涉入极深，随着文化大革命展开，周密切地介入了解放军的所有主要决策。据林彪手下一位将军的儿子说：「我父亲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发生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说军委办事组〔他是其中的一位领导成员〕一共处理了１３００多份文件，没有一件毛主席不知道，没有一件周总理没有亲自处理。」　也正如上述军委办事组成立伊始，也是优先报告周恩来的。

周恩来还直接参与了文革期间部队的调到。根据时任军长胡炜的回忆，无论是通知其执行任务，还是部队的调到，都是周恩来所为。在１９６７年9月４日，周恩来更是告诉他在执行任务时：「必要时，可以开枪！」　根据知情人讲述，武汉「７?２０事件」之后调派海军亦为周恩来亲自所为。

周恩来授权开枪的事情还在宁夏导致了「青铜峡事件」。据当时主持兰州军区辖内陕、甘、宁、青四省区「三支两军」工作的冼恒汉回忆说：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２日，陆军第６２师奉命赴宁，其所属１８６团进驻途中受阻。师部于是上报军区。冼恒汉说：「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兰州军区随即报送的处理意见中提及，如有人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部队可以还击」冼恒汉又说：「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此时的周恩来真正成了中共的「管家」。每天的各种请示、报告、文件象小山似的堆在周恩来面前，有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央的，国务院的，中央军委的，中央文革的，都需要周恩来处理。难得一次的是，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１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报送的关于部队干部职务任免报告上批告叶剑英、杨成武并报林彪：军委有关日常行政、部队调遣、干部任免、部队编组、武器装备等非属三支两军和国防外交范围的请示报告和批件，应由军委和总参直报林副主席请批，不需经我手转报。此事请军委常委一议，报林副主席转报主席批准。否则，压在我处文件太多，无时处理，而且超越权限。贻误大事。　事实上，并没有人照办，周恩来仍旧是忙的「脚不着地」。

二、「７-２０事件」

在１９６７年的春夏之交前后，各省造反派经历了很大的分化改组，而这些分化改组对于后来「７-２０事件」起来很大的催化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理解「百万雄师」的敢于造反是关键性的。

其一是四川产业军的垮台，其二是河南省造反派二七公社的得势。在「７？２０事件」发生之中，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张根成被抓后，有军人指责批判说：「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８０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

１９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在汉口对「百万雄师」头头讲话：「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８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这些动向，反映出部队对于全国形势认识,对中央文革十分疏离;担心形势将不利于武汉,担心「犯方向路线错误」。

周恩来对此洞若观火，在７月１８日的军区和会议说：「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

徐海亮先生在其《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中认为：这些动向，反映出部队对于全国形势认识，对中央文革十分疏离；担心形势将不利于武汉，担心「犯方向路线错误」。实际上，通过各种渠道，他们收集研讨了内蒙、成都和河南军区的问题，研究了中央的态度，对解决各地所谓「保守派」的方针政策，表示极不理解和极其不满。当时最担心的是走四川、内蒙、河南的道路，这些忧虑立即以大量对抗性言论、标语——甚至谣言表示出来。

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某些百万雄师的头头和军区包括军区司令陈再道等对于周恩来甚至毛泽东都非常藐视。

根据徐海亮先生《「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一文叙述，在１６日的军区汇报会上，陈再道和周还对拍了桌子。

周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将整理的工人总部(百万雄师的对立面－笔者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嘛。

陈再道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

陈再道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过去的那些事－－笔者注）……我还不知道」？以至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也（气的）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事情激化之后，周恩来将重返武汉，陈再道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和王力一样」!

批斗王力时，军区副政委要２９师张政委让群众头头放了王，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

武汉」!

因此笔者认为，从现有的这些材料来看，一旦侵犯了自己的利益，敢于对抗中央对抗毛泽东的人不是没有，也由此而得出现在对于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大大夸大了的。张根成回忆：张回到东湖宾馆，谢富治、杨成武、余立金在场议事，张问为什么独立师干部这个样，还说什么「游泳的人、那老头子」那地方……谢说「你不知道呀，那（蔡）就是王明的警卫员！这个事就是他们搞的」！显然，谢富治和三军领导认为出现了兵变，而其中还有历史渊源。

在整个「７?２０事件」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７月１８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对于武汉的局势作出带有结论性质的四点：「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此四点被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连夜传达到团以上的干部，接着被传达到排以上干部，并把独立师派驻武汉各单位的军代表叫回来听了传达，并要求军代表传达给群众组织。　这是造成「７?２０事件」最直接的导火索。

据８２０１的干部后来揭发，蔡在传达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锺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锺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它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牛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顿时会场吵吵嚷嚷，二人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意思要他们注意策略，把矛头指向王力。

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不友善的，只不过后来是王力做了替罪羊。

事件爆发以后，周恩来除了返回武汉，秘密安排毛泽东出走上海外，还调动了部队包围了武汉。７月２５日，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见到《湖北日报》的一个在京记者刘某问他武汉局势，周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某某、某某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当事人后来回忆，在刘丰找到王力以后，周恩来对北航的井岗山、吴介之两位同学说「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７月２５日，周恩来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也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２６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

论「７？２０事件」，参加会议的同志至今还记得，周恩来指出该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陈再道和锺汉华听到总理严词，几乎当场瘫倒在地。

７月３０日清晨，周电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３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当日旋接见曾思玉、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　　引入注目的是，此次任命不是由林彪亲自通知和主持的。

三、急速的左转导致了「全面内战」

「７？２０事件」在文革史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首先是其强烈的刺激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认为造反派受压制，而有军区支持的保守派则因为有「枪杆子」做支撑，是造成造反派不得势的重要原因。「枪杆子出政权」的思维再次左右了当时的文革趋势，中央的政策急剧左转，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外交部的失控，军区所受到的冲突，都使以林彪为代表的军队系统和视外交部为周恩来根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伤害。二者的抵触和反弹，加上整个局势的失控，毛泽东不得不来个急刹车。王力、关锋以及林杰则成为这次急刹车、急剧转向的牺牲品。不幸的是，因为文革最后的终结，王力等人在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了。

７月２８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讲指出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武装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武斗才能停止，并直言过去军区错误，就是对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农民，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就是策划，放纵！军区要负这个责任。７月３０日，在第八次接见河南代表时，周恩来就提到武汉讲：「军区、军分区、野战军给保守组织、支持军区的保守组织发了枪，名字叫『发给基干民兵』，他们拿了枪进行武斗，或者挑动农民进城市进行武斗。我们反对这样做……过去放纵群众斗群众，是有人策划的」。

但是凭借「７？２０事件」的东风，各地造反派大受鼓舞，持械武斗和抢枪恶风不止，特别是全国掀起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抓当地的「武老谭、「陈再道」，严重冲击了各地军区。在武汉刚刚翻身的三钢造反派，居然前后出动数万人次，到湖北专县乃至全国「武装支左」，遭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和一些中央领导的臭骂。

林彪就各地群众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产生强烈忧虑，致信毛泽东，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的问题，但毛并不认同。

实际上，「７？２０事件」对于毛泽东所产生的刺激同林和周是不同的。毛泽东第一反应则是造反派手中无枪，受压制，这是造成当前造反派受压制的最主要的原因。早在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就讲「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据王力回忆说：「林彪在此之前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前面说形势很好，后面主题是夺枪问题很严重，必须发布命令禁止夺枪。毛主席的信是针对这点说的，前面说同意形势很好，这是套话，但他不同意后面林彪关于夺枪的话。毛主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他分析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支持右派。他着重分析多么严重！他原来说三依靠，最重要的是依靠部队，现在说部队主要领导骨干支持右派。他说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从这封信里还可以看到，他老人家的思想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要建立第二武

装。……毛主席８月４日的信，５日林彪主持会，就要贯彻执行，周总理也参加了。老实说当时大家都蒙了。但都得表示拥护，都得这样作」。

张云生则回忆到：从对回信的批示来看，主席对于目前形势比较乐观，对于一些地方发生的抢枪事件，似乎也不很焦虑。

林彪又主张起草了一个针对广东严禁夺枪的通告，周批给文革碰头会准备发出，后接受王力的意见（怕与毛的判断「夺枪问题并不严重」相左），叫广东先试验一下，而且强调对劳改犯夺枪，部队可以开枪。由于情况认识不一，周恩来要求全军文革小组将南京、广州、沈阳三个军区受到冲击的详细情况立即上报，并约三军负责人和南京、沈阳军区领导谈话。

就在毛泽东到达上海的的当天晚上，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会议中间，江青突然来到会议现场，发表了著名的「文攻武卫」的讲话：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虽然江青在讲话中也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然而整个讲话的中心却是要反击！据陈晓农先生说，此举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的。

毛泽东在８月４日致信江青时就认为：认为７５％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文革运动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并说「如此左派声势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　此信在中央文革传达。这足以表明「７?２０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在这种刺激下对整体形势作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因此笔者也有理由相信江青的「文攻武卫」讲话正是毛泽东授意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３日，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杨成武的汇报时，表示同意湖南长沙准备武装１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并饶有兴致地介绍了上海准备武装１０万工人的做法。他问道：枪在右派手里好呢，还是左派手里好呢？他还说，正规军的枪夺了不要紧，以后再发嘛！听说４７军有个团长的枪被夺走后大哭起来，这是个好团长。右派抢了去哭是对的，左派抢去了就不要哭。８月４日，余立金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两派之间斗争加剧，都在抢夺武器，应该加以制止。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了凡是打了大仗的就好，烂透了就可以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全国抢的枪，只有二三万支嘛！」此后一个月，全国被抢夺的枪支达到４８万至５０万支，毛泽东仍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三四十万支枪有多少哟，不多！５０万支有多少哟，不多！光全国民兵武器就有３５０万支嘛。」

周恩来接到江西告急电，在京西宾馆主持军委扩大会，由文革办事组电告江西制止抢枪；但与会人员刚刚回到钓鱼台，毛泽东的批复已经发来，为什么军分区可以向保守派发枪，我们不能武装左派？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回忆：因皮定钧电告中央，江西抢了百余条枪；上午，周紧急召集康生、张春桥、杨成武、韩先楚和王广宇等开会，商议起草电报，批评军区和造反派。该电也按惯例以要事汇报形式呈上海毛泽东，毛中午即批复。戚本禹问他们为何匆匆发电批评江西军区和造反派，说毛有批复。

周恩来在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说「造反派当然要求武装，这是最高统帅的指示！」在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中明确规定：「枪杆

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来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首先是武装工人，学校里应该搞军训。」

因此在１９６７年8月１０日，「中发〔１９６７〕２４３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第6条明确规定：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此通知实则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通令全国进行武装左派的宣言。

时任四川革筹第一把的张国华曾经传达过武装作派的中央指示：「武装革命派，是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部署。主席最近有个精神，中央文革有这样一个指示，就是对革命派，在具备下面的条件下要武装……我们这个四川呢，已经武装了几个地方……」

曾经轰动全国的「三次武装支泸」也同周恩来密切相关。作为「三次武装支泸」的重要参与人物王茂聚说：「武装支泸是周总理批准的。」　但是后来在１９６８年9月１６日，周恩来否定了这个说法。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８月中下旬。

８月２４日周恩来接见广州造反派和解放军报记者，仍然提出：广州工人造反派要以「红旗工人」、「工联」、「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工人」为核心首先联合起来。……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后，马上武装工人，可以武装２—３万人，双方签订的四项协议是靠不住的」。周恩来指出孤立分化瓦解「地总」、「春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交红旗」、「红旗工人赤卫队」可以争取。同日，周恩来、戚本禹接见广西双方代表，一开始就谈到：很久不见你们了，两个月了，最近很忙。你们「联指」怎么越搞越不象话，又去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全部武装他们（「４?２２」派），看你们怎么办？！「４?２２」的同志，文革给你们的电话知道了吗？（要上交援越抗美军事物资）你们比较听话，办得比较快。还有一部分没有收回是不是？！

正如徐明的评论：周确确实实、时时牢记毛泽东当年文革的根本意图，还要让革命造反派在这场斗争里得到支持和壮大，不能让造反派吃亏，对黄永胜就警告，再不能制止武斗，就给造反派发枪。　正如上述，周恩来对于造反派是大力支持，而且要发枪进行武装支持。

急速左转的表现还有其它方面，例如「砸烂公检法」也是在这个时候传达的。

当事人施义之回忆说：「１９６６年底我到公安部时，『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在内部大字报和批斗会场上时有出现，但听到正式提出『砸烂公检法』口号是在『七?二〇』事件后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中。『七?二〇』事件后，７月２２日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回京，各部委都有人去西郊机场迎接。公安部有李震、于桑和我去了。谢富治回公安部受到联络站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还开了欢迎大会，大会由我主持，李震致辞，谢富治讲了话。」

「会后部领导一起从礼堂后门走出，在路上谢富治对李震讲：『我讲话别的不要传下去，

我讲的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这句话要捅下去，用什么方法，你们研究』。谢还说『我听毛主席说『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当晚，李震找我商量，能否通过联络站办的小报《红旗》把这个内容捅下去。我说：『看来除了这个办法外，没有其它办法了』。第二天联络站的马文华拿来稿子要我审定，我要他送李震。印出后，由联络站的政治部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分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七?二〇』事件以前，各级公检法部门已被冲击、被破坏，这个口号捅下去无疑是火上浇油，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砸烂公检法』的高潮。」

１９６７年8月２１日，周恩来对《七机部军管会的指示》中说：「政治部和公、检、法不是一个系统，政治部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如果要砸，要劝阻；劝阻无效由他们负责。要劝说『新九一五』的同志不要管，千万不要武斗。政治部的领导干部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不要砸。」　周恩来的言外之意是，公、检、法是可以砸的。就在三天之后，周恩来表示：公、检、法过去受彭真、罗瑞卿控制，有很多思想和作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搞跟踪、搞盯梢、偷听电话、搞特务活动，甚至挑动是非。公、检、法一定要搞大的斗批改，才能彻底肃清罗瑞卿的流毒……。

实际上，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０８页)「砸烂公检法」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作为执行毛泽东文革政策最得力的助手，周恩来自然对此是坚决执行的。１９６８年3月１８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就讲：「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伸向浙江的黑手一个个揭发出来，砸烂公检法，文教战线上许多坏事要改造。」　后来，当毛泽东改变调子说他在杭州住过多次没有出什么事，说明浙江公安机关也没烂么。周恩来随着就改变调子，说不能讲坏分子在公安战线上对我们实行了专政。

但是大陆党史界归其罪于谢富治一人，显然是有失公允。

四、「全面内战」使毛不得不紧急刹车转向

「７?２０事件」深深地刺激了毛，使毛觉得「枪杆子」不听使唤，百分之７５的军区、军分区支持了右派，于是发出了要「武装左派」的指示。这样一来，枪支弹药便通过各种方式落入了势不两立的各派群众组织手，武斗终于发展成了「全面内战」。

同时，各地对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的冲击也达到新的高潮，也就是「揪军内的一小撮」。

《红旗》杂志发表「八一」社论当天，天安门广场和西单附件就有大字报，点了五个军区司令的名字：陈再道、杨勇、杨得志、许世友和韩先楚。这五个司令不听中央招呼。　韩先楚被称为「韩再道」。

8月１６日，造反派抄了许许世友的家，刮起了倒许的「八月黑风」。　致使林彪在１９６７年8月份亲自出面保许世友：「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不通，落后了。但他几十

年来是一员战将。现在还是想法不让他犯错误，不要因为他对文化大革命犯错误而搞垮他。」毛泽东于８月１８日也在上海秘密召见许世友，明确向他交底：许世友打不倒，南京军区党委打不倒，南京军区打不倒。

中央的「８?4 指示」使广州军区局势迅速恶化。根据叶曙明先生的叙述，在７月２３日武斗之前，广州两派的冲突，并未动用热兵器，甚至连用棍棒的都不多。8 月 4 日中央指示和「文攻武卫」使武斗变得合法化，各群众组织开始纷纷制造武器。而炮轰军区，则为抢夺军队枪支弹药、军用设备，提供了一个「革命」的理由。8 月初，群众抢武器达到了高潮。迟泽厚先生告诉后来告诉叶曙明先生，武斗期间，广州两派一共抢了一万多支枪。

《红旗》杂志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以后，广州造反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炮轰广州军区党委的口号响彻羊城。8 月 1 日，广州红司再发出《炮轰广州军区党委紧急战斗动员令》；工联发出《给广州军区广大指战员的一封公开信》；８月８日，广州三司炮轰广州军区党委联络站发表《严正声明》；８月１２日，红司发表了题为《坚决打倒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社论等等。矛头直指军区，声称广州谭震林式（指黄永胜等军区领导）的人物是逃脱不了人民的镇压的。

叶曙明先生的《文攻武卫，武斗升级》一文中也详细介绍了「７?２０事件」之后广州武斗情况的急剧升温。8 月２３日造反派冲击军区是最严重的一次，连军区作战大楼都占领了，就是作战室没敢进。黄永胜到北京汇报，戚本禹当着周恩来的面问黄永胜：黄司令，现在抓广谭啦，谁是广谭啊？是不是讲你啊？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

但是军队毕竟是毛泽东的最后支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毛的能够发动文革的依靠。无论是毛还是周，都知道军队是解决造反派和保守派冲突的关键所在。正如王力所说：「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中央讨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

８月１１日，周恩来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时讲：「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像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潜规则。

在「７?２０事件」之后，名为揭开「徐向前老帅画皮」的大字报劈天盖地，主要罪名为（１）积极推行张国焘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２）可耻的逃兵；（３）刽子手陈再道的黑后台等。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甚至抄了徐向前的家。　但问题是徐向前不能倒。

建国以后，以徐向前、韩先楚、许世友等为代表的原四方面军干部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重

用。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权术，是一、四方面军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轻易不能打破的。徐海亮先生就认为在「７？２０事件」事件发生后不久就认识到这个问题：

可是毛泽东经过冷静慎重考虑，很快决定将武汉事件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处理，称陈为「你们要打倒」的同志。这时，对事件真相和背景的调查、审查都刚刚开始，事情并未弄清。但是，他对事件有个基本判断，当然不愿把自己统帅的军队置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边，轻易地依靠激愤的民众去搞臭搞倒一个又一个刚烈的老军人；也不愿意有人利用陈再道的错误打破政治平衡。周恩来出面，首先阻止了对原四方面军同志的可能伤害，保护了业已靠边的开国将帅。被造反群众抄家的徐向前与徐海东，立刻得到周的关照。毛、周迅速地制止了对原四方面军领导的怀疑与冲击、制止了文革滑向宗派斗争的可能，进而保护了彭绍辉、许世友和韩先楚等。

仅仅是对陈再道似的人物与顺藤摸瓜的冲击，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国，首当其冲的是原来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和各军区领导。文革中一再显露出的所谓「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暗流，完全可能立即变成顶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线斗争和对军队高级领导的教育，引到山头与宗派与历史恩怨的歧路去，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并不主张的。

因此，一方面毛泽东要建立第二武装，要武装左派，另一方面对犯错误的四方面军的干部并不深究。事实上，鉴于历史的原因，在长征过草地时期，一、四方面军就有「密电情结」。因此在「７？２０事件」事件的时候，四方面军干部就会认为这是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微行》一书里面讲述毛泽东和林彪在对待有关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上，是非常极慎重的。而在文革之中，中共中央一再保护备受冲击的韩先楚、许世友、陈再道，毛又特别倚重四方面军的将军，如谢富治、陈锡联、许世友，还有郑维山、李德生、韩先楚等，这都是为了那个潜规则。如果陈再道被彻底打倒了，「反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导致许世友等一干军区司令的倒台，最后甚至连一方面军的黄永胜等也跑不了倒台的命运。那么文革也就真的将会是一场内战，毛泽东也许真的会再上井冈山。

江青在１９７０年回忆这段时期时讲「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

于是毛泽东说「７？２０事件」不是「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变」，他（指陈再道）也不是「住到贼窝里去了」。毛泽东说，「７？２０事件」「不过是要以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这个时候，无论是毛还是林、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毛来讲则是考虑如何刹车。

８月１４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１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的《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４０周年》社论一文，指出要『还我长城』」。

同时，外交部在８月份的出现的情况为这种退缩的提供了台阶。

周恩来送走毛泽东之后，严令军区一定找到王力。王力找到后，当事人回忆，当时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王力被送回之后，周恩来上楼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里」？赶到屋里，周紧紧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亲了又亲，激动地说「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王力回忆，周还流下眼泪）

在送王力回京的飞机起飞之后，周恩来的飞机才起飞，但是到达北京之后特意安排王力的飞机后降落，造成周恩来迎接王力的局面。王力回京以后，邓颖超携主席塑像去钓鱼台看王力，江青还对此发牢骚不快，说「统一战线统到中央文革来了」!

７月２５日，周对河南军队干部，谈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国准备分省和军区办武装干部的学习班。周恩来首先落实办湖北省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调武汉军区和湖北、河南省军区的领导干部进京学习。当时，毛对王力看法甚佳，还要王力承担办班组织工作。８月１２日，周恩来到京西宾馆接见武汉地区军队领导，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请你们到北京来，一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二是要你们好好学习，提高觉悟，跟上形势」。谢富治、吴宪法、王力参加接见并有讲话。

１９６７年８月７日，王力在钓鱼台１６楼接见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后来成为外交部的造反派头目）和群众组织代表，说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话，对陈毅造成很大压力。王力讲话记录被印成传单，广为流传，成为炮轰陈毅的重磅炮弹。虽然王力在其回忆录中百般解释，但是后果已造成。对此，周恩来在８月２３日评价到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　　８月１９日，外交部造反派公开宣布「夺取」部党委领导权。整个外交部上下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各司的外交业务瘫痪停顿。在造反派夺权后，外交部发往驻各国领使馆的电报中竟出现「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大权一时落入造反派手中。

毛泽东说：「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造反派也心知肚明：「不打倒陈毅，就不能打倒周恩来。」　　周恩来的命运同陈毅的命运休戚相关。周恩来对于这种矛头所指早有准备，中央文革小组也对这种苗头大力鞭笞。

８月２０日，经周恩来同意，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４８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１９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３４名工作人员。」　　８月２２日２２时４０分，北京数千红卫兵、造反派演出了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荒唐的一幕——火烧英国代办处。

后来毛泽东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这是一次非常严重涉外事件，造成中国与各国关系紧张，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极大损害，影响极其恶劣。

周恩来立即出面制止，和江青、陈伯达、康生一起，紧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签名的广播讲话稿，在现场反复播出，劝阻疏导狂热的人群离去。周恩来又和陈伯达起连夜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极其严厉地批评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作法，宣布外交部夺权「完全是非法的」，表示：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我们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

眼看局势大乱，火烧到自己的眉毛了，在１９６７年的8月２４日午夜，周单独约见了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经失去控制。王力有一个「八?七讲话」，一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王力给外交部的谈话及一封信有些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造词有些问题。占外交部的事，火烧英代办处，连锁反映（应）到外贸部、其它部……这样下去怎?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报告。

毛泽东则让杨成武回北京向周恩来转达的口头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此外，毛泽东「并对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

８月２６日夜，周恩来先去林彪处，又与陈伯达、康生、江青宣布了隔离王、关事宜。８月３０日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宣布毛泽东的决定。

毛泽东的另外一条批示却透露出一些玄机。

９月７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于９月４日的检讨信上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　此批示明确王力等还是同志，陈再道不也被称之为同志么？不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么？

但是事情的结果却是王关戚最后都被收押入监，这又是为什么呢？

９月２４日，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外交部反对王力一派的王海容就去向毛泽东汇报王力「八?七讲话」在外交部如何不得人心，想探听毛泽东的态度，而毛泽东却只吟出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然后就以要休息为由对这位表侄孙女下了逐客令。

这两句诗是出自唐人罗隐凭吊诸葛亮的一首诗中，慨叹诸葛亮虽有雄才大略，然而时运不济，壮志难酬的命数，这充分表明了对王力、关锋的倒台充满不得已的痛惜之情。渔歌子认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所表达出来的对王、关、戚的感情，与毛泽东「九?七批示」是一致的。他并未将王、关、戚归入应被打倒的敌人之列，而只是迫于当时的某种形势，不得不抛出他们来作牺牲，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　但是无论如何，客观上，周恩来成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第七章　艰难的收场：为毛收拾烂摊子

１９６７年７、８月的「全面内战」使「文化大革命」再也无法像原来那样继续搞下去了，１９６７年秋毛泽东南巡归来不久就提出要开「九大」，实际上就是要收场、要结束「天下大乱」。但是，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相互的仇恨一旦被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煽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平息下去，更加上历史上形成的中共干部的派系、山头的矛盾也纠缠其中，使得由乱到治的过程格外地艰难。再加上毛泽东又不甘心让「文化大革命」完全偃旗息鼓，于是出现了多次的反复。从另一意义上讲则是毛泽东自文革伊始，就不得不在文革的不同阶段启用不同的群众组织派别，排斥阻碍当时文革部署的派别。（笔者注：毛泽东搞文革实际上也是「摸石头过河」。）而这些所谓的中央的部署，就成为当地的掌权者屠杀、迫害对立面的工具或者对立的造反派攻击对立面的借口。而这些部署的完成也是由周恩来主导完成。

从１９６７年秋到１９６８年９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山河一片红，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共「总管家」的周恩来反反复覆地造反派打交道、一个省一个省地组建革命委员会、处理「杨、余、傅事件」，整个过程是曲折而又艰难。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周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行事。

一、周恩来与造反派

自造反派、保守派的出现到退出历史舞台，代表中央出面同这些派别打交道最多的无疑是周恩来。无论是对于造反派的支持还是压制，周恩来都是同当时以毛为首的中央文革派是一致的。并不是像中共官方党史中说的只是「林彪、四人帮」在支持、煽动造反派。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前后，各地造反派风起云涌，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的有效武器，因此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实际上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不久，各级党委负责人就纷纷提出「炮打司令部」、「引火烧身」等口号，以积极的姿态领导运动，除紧跟党中央的部署之外，部分党委领导人或是想「引蛇出洞」，搞右派模式的翻版。周恩来就曾经亲自为造反的群众支招，为造反大会定名为「炮打司令部群众大会」。

但是对于这些造反派，中共当权派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摸索，首先是总结出了复员军人不能成立自己的组织、不准成立跨行业、全国性的组织。继而是「支一派」「压一派」，即支持所谓的「造反派」，瓦解所谓的「保守派」，结果激起了被压制一派的剧烈反弹，酿成震惊中外的「７?２０事件」。之后毛泽东急剧左转，发出「武装左派」指示、并由江青出面鼓吹「文攻武卫」，导致「全面内战」。然后毛泽东再度急刹车，中央对各地的处理办法，改为「两派大联合」揪斗「走资派」。有的地方进行得比较顺利，有的地方却问题却始终无法解决，中央最终发现只能支持一派对另一派进行剿灭，如果两派都不「听话」时，就把两派都「消灭」。经过血腥的镇压之后，全国山河一片红才姗姗来迟。在新生的革委会建立起来之后血腥的镇压并没有停止，反而是变本加厉，此为后话。

１．早期的造反派

无论是北京市红卫兵造反派的出现，还是中央各部委造反派的出现，周恩来是热情支持的。以国家机关系统中第一个成立的造反组织的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为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态度。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出席并发表也热情洋溢的讲话。　　首先周恩来表示了热烈祝贺：

「同志们，我首先要祝贺你们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成立！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现在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问好！」

其次周恩来对于造反派的任务进行了动员：

「我们逐步地看到，在我们中央的各部委，国家的各科室、各系统罗、各部委、人民团体的各方面，地方上各级领导中，几乎普遍的在不同程度上，在那个一段时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我们认为必须提倡炮打的精神，而首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后果和它的影响。所以，这个斗争是及其艰苦的。」「我们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各个系统、各个方面，从城市到乡村，更大地、更广泛地、更深入地动员起来了。你们这个战线，动员得好！所以，我们首先来组织这个战线，支持你们革命的造反派！支持你们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恩来最后还寄希望这火能从中央烧到地方：

「最后一点，你们现在是造反派，你们在各部成立了组织，也把这个各部的组织形成一个整个财贸系统的造反联络委员会，不仅要在北京活动，你们还准备有计划地派出代表向全国的财贸系统进行革命造反。」

然而时过不久，在１９６７年的二月份，就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二月镇反」。笔者认为出现在中央层次上的和地方上的层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前文所述，中央层次上的是毛泽东的「阳谋」，然而借「阳谋之风」，有些部门特别是军队系统因为受冲击严重，对造反派（也包括一些保守派）出现了严厉、残酷的镇压。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几个原因也可以说明此镇反绝不是没有先兆。

第一个是由于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不听指挥，导致冲击各保密机关、军事机关等，迫使中央采取行动。１９６７年２月份，一些军区受到冲击。《人民日报》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报道福建军区对冲击军区的造反派展开镇压时，表示反军活动是「无产阶级的敌人的疯狂反扑。」１９６７年1月１６日，《红旗》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把湖南保守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被定位「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１月２２日，周恩来当众宣布「中国工农红旗军捍卫军」、「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北京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都是反革命组织。

第二个就是针对于当时出现的成立全国性组织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取缔。因为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完全可以演绎成为游离于中共的另一大政治组织，足以让中共感到威胁。因此整个中共领导层就会集中对外。当时在１９６７年初的「全红总」的镇压，就是这类模式。

第三个就是对于训练有素的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组织，中央是不允许存在的。例如在１９６６年底各地成立的全国红旗军，颇有战斗力，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吸收工人、农民参加，在内蒙古就成立了全国红旗军的第四纵队。　在湖南则成立了以解放军的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为主的「湖南红旗军」。１９６７年1月２０日中央军委来明确将其宣布为反动组织，责令省军区抓捕了其头头贺孟宣等，解散了其组织。

因此，诸多的原因造成了中央上层领导一致对外，连手造成了这次地方上的镇压。在３月份，当毛泽东在中央层面上成功的完成「阳谋」之后，发现各地又冷冷清清，于是又杀了个「回马枪」。但是因为时间差和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造成了「反击二月镇反」在各地的表现不尽相同。

但是在此过程中，周恩来等人因为要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但是毛泽东的出尔反尔，迫使周恩来等人也就表现的前后不一，多次翻脸不认账。

以湖南省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为例。「湘江风雷」全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４日成立于北京。１０月３日，其负责人向陶铸志简略谈了在北京成立这个组织的情况，并请陶铸同志当纵队顾问，陶铸同志收下了红卫兵袖章和纵队革命造反宣言及其它材料并且表示：我不当顾问，我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当了几个顾问，我就当你们一个普通队员吧。

在毛泽东默认下，陶铸很快倒台，并且这成为中央文革整治「湘江风雷」的一个重要理由。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1月２０日点名批评了「湘江风雷」，并且说那是陶铸搞的。　同日，湖南省军区根据中央「１.２０来电」，镇压了冲击军区的「湘江风雷」的盟友组织「红导弹」、「红旗军」等。2月４日，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后来在解决湖南问题时，周恩来却当众表示：中央从来没有发出过「１.２０电报」。

2月５日解放军开始出动逮捕湘江风雷组织人员。　2月１６日，周恩来说：现在冲军事机关成了风，这怎么能行呢？长沙冲了，贵州贵阳要缴解放军的械。我们说有坏人指挥，长沙不仅冲了，而且占了军区大楼，最后我们下令抓头子。是「红旗军」和「湘江风雷」合起来搞的。　直到６月９日，周恩来还说：湖南「『湘江风雷』几乎遍全省，跨行业，其头头确是很坏，有的是帮会」。

但是，过了不久，毛泽东又认为「二月镇反」会葬送「文化大革命」。依据在４月初通过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以及《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各地受到镇压的造反派开始得以翻身。中央开始自１９６７年的7月１２日开始接见湖南各组织代表解决湖南问题。此时的背景则是：在武汉「７?２０事件」前后，毛泽东依据下面所报情况，认为现在全国形势不容乐观，全国大多数军分区、武装部都是支持了保守派，而镇压了

造反派。在这大背景之下，例如青海的「八一八」、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钢工总」、江西的「大联筹」这些被一九六七年所谓「二月逆流」时期被打成反动组织的造反派开始翻身。「湘江风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自７月１２日至８月６日，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时间，中央连续六次接见湖南各方代表，解决湖南问题。周恩来是其中的主角。周恩来对「湘江风雷」彻底的平反：「湘江风雷」是左派组织，革命组织。周恩来还承认「那个『二?四』批示是因为我们受了蒙蔽!」会见代表其间，周恩来还叫医生检查被湖南红联高司扣留的「湘江风雷」代表的身体状况。

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声称：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２月３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

２．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造反派的命运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5日，２０个「湘派」组织代表在湖南长沙「东方红总部」举行会议，讨论并确定了「省无联」的《成立公告》，并议定了１０月１１日召开「省无联」成立大会。但是周恩来总理于１０月9日，在武汉召见包括「工派」与「湘派」在内的湖南部分大造反组织的头头时，说:「『省无联』是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你们一些组织发表的《九?三〇》声明是错误的，你们不应再打内战了，分裂不利于长沙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无论周恩来这话是否说的由衷，湖南造反派组织在１９６７年炮轰周恩来的行动却是没有断过。陈益南先生认为：当时湖南在文革中，之所以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活动，除了造反派中不少人，存在有对周恩来总理是否应对「二?四批示」负有责任的疑问这一思想基础外，北京「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周恩来的思潮及组织，无疑更是湖南反周活动的直接动因（长沙「红中会」及其属下《齐卫东》、《夺军权》的一些学生，都与北京「五?一六」有联系）。当然，更重要的背景，应该是文革中出现的造反派不断炮轰、打倒中央领导人而「成功」的特有惯性思维，在起强大的作用。既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是在造反派的一顿「炮轰」后，顷刻能垮台，那么，再出现一次「炮轰」周恩来而又「成功」的可能，又如何不会在激进冒失的红卫兵头脑中产生呢？！像「红中会」这样全部是尚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学生红卫兵造反组织中，有些人踏上这条「反周」之路，几乎是「顺理成章」了。　陈益南先同时表示「当时几乎整个「红中会」的红卫兵，都或多或少有「反周」或怀疑周恩来的观念，特别是其领导人，「反周」意识更是强烈。

林彪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４日接见湖南驻军负责人时就说过「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在活动」。这番话的背景，就是因「红中会」成员发动了几次炮轰周恩来、反对省革筹小组的大行动。其实早在１９６７年8月１２日，「红中会」组织属下的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与《夺军权》这两个战斗队就贴出了公开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镇反」的「黑主帅」。

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在１９６８年1月１２号出台。文中声称：「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像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固然，不仅有此文，另外还有《我们的纲领》、《关于组织和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两文。

１９６８年1月２４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在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南班全体同志时，一致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康生说：「『省无联』的纲领，杨曦光的文章，周国辉的讲演，他们自己被迫把湖南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刘、邓、陶的爪牙，公开的。隐蔽的都跳出来了。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自首分子跳出来了。彭德怀、贺龙的爪牙也都跳出来了。而反革命「非常委员会」的党羽，「五?一六分子」的党羽，就在你们湖南被迫的跳出来了。」

于是「省无联」的头头们被判处重刑。张家政（湘江风雷第二号头头）被判２０年，宋绍文（省文艺界红造团）判１５年，毕健（湖南红旗军）判１０年，杨曦光（红中会）判１０年，周国辉（高校风雷）判７年，张玉纲（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判３年。还有如李仲昆（湘江风雷）等人，则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长期监管。同此相对应的是所谓「五?一六分子」的头头也遭到残酷迫害。

二、从全国夺权到山河一片红

对于中央的有名的造反派干将，周恩来曾经说：「第一个高潮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布以后，全国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也推动了机关和大中城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洪流所向无敌。」「现在蒯大富要比聂元梓巩固得多，当然我不是说聂元梓不好，聂元梓一声炮响震动了世界，我是说聂元梓比蒯大富经受的锻炼少，我从七月份回国后经手了两个人的问题，一个是蒯大富，一个是王锡鹏，我不随便捧他们，靠你们左派奋斗。」

而各省的情况，又因情况而异。这里我们以山西、四川、内蒙古、浙江、广西为例，分别阐述在此过程中周是怎样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行事。

１．山西

文革开始的时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因为地域的关系被毛泽东看作是刘少奇、安子文在线的人。１９６６年初，薄一波等人的对立面、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就被叫到北京，以便中央了解情况。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刘格平给毛泽东、林彪、康生写信反映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本人则如何坚持斗争和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情况。１２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

刘格平于１９６７年1月6日由北京回到太原，住进山西省军区招待所。随后开展了紧张的串联活动。经刘贯一介绍，刘格平首先与张日清谈话，策划在山西的夺权事宜。１９６７年1月上旬，刘格平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召集开会，参加这次集会的有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续纯实、陈守中。会上刘格平说他在北京见到了总理和康老，说中央领导同志授意他负责组织起来，革山西省委的命。随后刘格平等人策划了组织「１?１２夺权」。此次夺权在２２日被周恩来表扬为「山西省也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发挥了首创精神，各地也创造了很多新经验。」　直到１９６９年周恩来还表扬说「你们夺权早，占头几名」。

但是此事却引起了强烈反弹。卫恒称：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人所写的大字报，是政治迫害。他们五个人的底子我们清楚，他们掌权不如我们掌权。现在我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要对中央和山西人民负责。对于刘格平的境遇，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失败，挑拨是非，把斗争矛头引向群众，指向解放军，指向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许多地方有这样的征候。本来这些领导干部是很好的，但也有矛头对准他们，如山西的刘格平同志，山东、黑龙江、贵州，更不用说上海和北京了。」

２．四川

四川刘结挺、张西挺二人更可以说是被周恩来一手解放出来的。对于此二人，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份，周恩来和西南赴京联合告状团四十名代表座谈时，就向代表们了解刘结挺的情况并把刘等人揭发李井泉的材料要去。　只过了４天，周恩来就接见了刘结挺，但是并没有表态。

１９６７年3月２６日出版的第４３５期《文化革命简报》登录了反映宜宾问题以及为刘、张翻案的文章（题目为《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文化大革命猖狂反扑残酷镇压革命派》）。毛泽东在第二天对此批示：「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来京商谈。」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四川各路人马来到北京。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至４日其间，集中精力同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　４月３日，周恩来当众宣告：「四川宜宾地区的问题马上就要解决。」　４月４日就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声称：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此通知认为：（１）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２）刘结挺案应予平反。（３）这个通知，可在当地群众中宣读，对这一冤案，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效率之高，令人感叹。

于是在周恩来、康生、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最后经毛泽东同意批准，刘结挺、张西挺被派回四川四川担任了「省革筹」的主要负责人。5月7日，有名的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以中发通知的形式公布于众。通知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定为革命组织，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

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

曾经作为张国华手下的刘、张，现在同张国华平起平坐起来。张国华向周恩来反映：「我们１８军的同志对他（指刘结挺）有反映，觉得一下提的太高，这样重用他……」周恩来则态度严肃的说：「这是中央决定了的，你要做１８军同志的工作。」

１９６７年5月１４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人向周恩来等联名提交《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陈述以任白戈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声称长期以来，受到李井泉的支持，庇护，他们互相勾结，在重庆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任白戈追随李井泉坚持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实证明，任白戈早已堕落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意见，应当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要帮助受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被错误宣布成非法的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等。

5月１６日，周恩来表示：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回成都后写来的关于重庆问题的报告，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同日，周恩来表示：刘结挺、张西挺是被李井泉长期打击的，经过考验，我们把他们提到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周恩来为了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点名批评了反对他们的四川的群众组织（「产业军」和重庆「８１５」派，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8月２１日见国务院各部及所属院校代表时称之为「产匪」。）。周恩来更是于5月１９日下令：１、派军队保护造反派。２、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３、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付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

被周恩来称之为革命组织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和「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却因为围绕对刘、张问题和对支左部队的某些看法不一而产生分歧。自刘、张返回成都，「红成」就开始掀起打倒他们的行动。　为此受到压制的「红成」到北京告状。９月２６日，周恩来、陈伯达等人接见进京告状的「红成」代表。周恩来说：「『红成』打倒刘张的错误是立场问题」，「滑到危险边缘了。」　周恩来这压一派、支一派的讲话大大激起了「红成」的愤怒。「红成」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斗争更激烈，四川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双方恶斗不止。反对刘张和支持刘张是导致四川武斗的重要和主要原因之一。四川武斗是惊天动地，天下闻名。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９日晚，要打倒刘、张的的「红成」红卫兵组织等要求在２０日上午九点以前打倒刘结挺、张西挺。如果打不倒就立即解散。张国华为此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当夜就做了指示（这个指示比保护彭德怀的指示迅速多了！）：

（１）刘、张的问题是四川十条的问题。对待刘、张的态度就是对待十条的态度。打倒刘、张就是反对四川十条，就是反对了中央。

（２）刘、张的住处不要转移，原来住在哪儿，还住在哪儿。军区要保卫他们的安全。这是对军区、部队的一个考验。

（３）揪斗刘、张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揪斗刘、张的会，无论刘、张在不在场，那大方向就错定了！

１９６８年1月，张西挺因为「杜灵」事件遭到群众组织毒打。此事惊动了中央。周恩来发来专门指示：「这种行为是目无中央的表现，要严肃对待。」

在重庆也是如此。「重庆８.１５」与「反到底」两派也因为在打倒和支持刘张上产生分歧，继而相互大打出手，竟然惊动了毛泽东。１９６８年3月１５日，周恩来在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时说：「重庆『八?一五』去年把李井泉搞去，根本不斗他，不给「『反到底』斗，『反到底』扎了三个草人，斗了后把他烧了，『纸船明烛照天烧。』为什么不给他们斗，这是大方向问题，我是听主席说的。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周恩来又批评张国华和梁兴初：「你们在成都要像梁兴初同志在重庆对反到底的讲话那样，尖锐的批评红成对刘.张的问题，问题就解决了。」「他是了解情况的，有点吞吞吐吐（指张国华）。我问的那句话，就是要你直说，你要敢讲。你那发言是滑稽的，你对重庆两派的说法是矛盾的。『八?一五』是响应「红成』在成都打刘、张的，你说他比『反到底』错误少，你的发言是有偏向的，没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讲话。你在中印边界，主席交给你的任务，你的决心那么大，为什么这次你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十条对五十四军称赞了，五十四军有点翘尾巴。对『八?一五』偏听，所以『八?一五』响应红成打倒刘、张的口号，没有站在全局，五十军去年十二月的电报是好的。五十四军在重庆的态度有问题，助长了『红成』打倒刘、张的气焰。张、梁、刘、张是不可分的，是十条上肯定的。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指梁）你在重庆对『反到底』的讲话，敢那么批评，没有讲『八?一五』。给『八?一五』那样讲就好了。」

１９６８年3月１５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领导在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时明确表态：反刘、张就是给李、廖翻案，就是刘、邓复辟。

正是有了中央和周恩来的这种支持、壮胆、撑腰，刘、张二人在四川犯下了滔天罪恶。后来两人因「杀人」和「伤害罪」等罪名分别被判２０年和１７年有期徒刑。

１９６８年5月２８日，以张国华同志担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天宝、张西挺（女）等同志担任副主任的四川革委会正式成立。

３．浙江

毛泽东私下对周恩来讲，要保江华。于是周恩来照令行事。在１９６７年2月１２日批斗江华大会的前一日，周恩来派飞机接江华进京。而事先得到此消息的「红暴」(浙江省红色暴动派临时指挥部)因此开始转向保江华。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此事批示给中央文革。

浙江当时主要的两大派是「省联总」(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红暴」(浙江省红色暴动派临时指挥部),「二月镇反」之后重组的「省联总」由于受到外来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２０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在当地占据了优势。

由于中央并没有明确表示要打倒江华(这个同四川的情况截然相反，李井泉被中央早早

宣布要打倒），所以江华问题成为两派斗争的一个原因。无论是周恩来还是中央文革小组都没有明确说那一派是保守组织，所以两派都是造反派组织。

１９６７年6月２４日，中共中央明令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各地群众组织代表团来京谈判需达成六条协议的通知》。(中发〔１９６７〕１９９号）通知要求：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由此按基本平等的精神，中央对浙江问题发出《中共中央对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的批示》（中发〔１９６７〕２２３号）周恩来在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时说：「我向你们介绍过浙江红暴会翁森鹤同志。省联总把红暴会打了，翁森鹤同志也挨了打，但他坚持大方向，坚持团结，批评红暴会的缺点。他是红暴会的赴京代表，因为这样一个观点，红暴会认为他右倾，把他从代表团开除了。开除后他还是坚持大方向。我同红暴会的同志讲，不应该开除他。」此中也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态度。

浙江自１９６７年3月开始军管。军管会由驻浙江部队负责人组成。龙潜任主任，阮贤榜、曹思明、南萍、陈励耘任副主任。１９６７年6月３０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双方代表对《六?二四》通知达成协议。实际上却是冲突不断。在中央发出上述中发２２３号文件通知之后，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8月１６日对浙江省军区的电话指示中要求红暴会要靠拢省联总，要教育造反派照顾大局，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省一级不行的话，看看厅一级有没有人站出来。这样过一段，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　由于一直没有省级干部站出来亮相，浙江省在１９６７年8月6日成立了浙江省临时领导机构或称为浙江省最高权力机构（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在8月份，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即「两个改组」)。任命南萍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熊应堂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政委。此改组表明了中央的意见：即在大联合中以「省联总」为核心，「红暴」为被联合一方。为此两大群众组织也开始相互妥协，例如「省联总」不再称「红暴」是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犯了错误。

尽管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9月２０日说「最近八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问题，即甘肃、四川、河南、内蒙、湖北、湖南、江西、浙江。」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是周恩来的讲话表达恩来中央迫切希望浙江能够解决问题的想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点，其一就是省级干部直到１９６７年年底才有人站出来亮相；其二，两大群众组织仍然纷争不停，军管会领导人对两大派的看法不一。针对如此分歧，罕见的是，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２日批示到：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此论调固然符合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７、８、9月在南方一系列谈话的精神，但是未免不含有其对江华的个人因素。１１月４日，周恩来对黑龙江省炮轰派代表时的谈话时指出：浙江两派打得不可开交，能不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主席说：不能，它不是象武汉百万雄师那种情形。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等文件。此通知于１２月２日以中发通知形式发出。通知指出：「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作了重要的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对于各地的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中发

〔１９６７〕３６７号）通知还指出：「目前不少地方都存在不同于百万雄师的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应当对他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即毛主席提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政策，而不应对那些组织的群众采取施加压力、绝对排斥的政策，才能有利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但是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各地的群众组织并不是享有这种待遇。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４对四十七军就中发〔１９６７〕３６７号通知的请示的回电时说：湖南的高司不同于浙江的红暴，高司的总部不能恢复，要帮助基层组织认识错误，要他们跟造反派搞大联合。

中发〔１９６７〕３６７号文件还指出：「应当组织有各派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力帮助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批评他们的错误，并促进他们自觉地改正自己的错误；同时大力推动他们同其它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共同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在革命『三结合』领导机构中保留他们一定的名额。」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双方又因此名额的多少展开新的争夺。

为贯彻通知精神，周恩来在１９６８年１月份分别于１８日和２０日同「红暴」派、浙江「省联总」代表谈话。周恩来批评了「红暴」想继续把队伍拉大，矛头指向军区的做法，并不能因为「省联总」压过他们就要再反一下，但是同时也告「红暴」以后省联总来了以后也是要批评他们的，他们也有很多错误。周恩来在同浙江「省联总」谈话时要求浙江「省联总」高姿态，在省、市革命委员会要有他们的代表，在工代会、红代会代表中给红暴留点席位。红代会只留一名常委就不够了，组织上采取高姿态。同时周恩来也要求浙江「省联总」切实同「红暴」联合。　　接着在２月５日，周恩来基本上按照同样的要求再次同双方代表商谈，稍微不同的是对于「红暴」的批评少了些，同时表达了迫切希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愿望。经过马拉松式的商谈，周恩来在２月１５日，同时会见了双方代表，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协议。

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联合发出通知：浙江省「省联总」和「红暴派」来京代表，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基础上，经过了「斗私，批修」，实行自我批评，达成了《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终于在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８日宣告成立。当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成员。周恩来表示浙江委员会的成立要归功于毛主席路线的胜利。

４．内蒙古

内蒙古和很多其它省市一样，夺权从１月１１日《内蒙古日报》社开始。　　造反派先期占领，接着保守派反攻，接着在保守派的要求下，军队介入。军队介入前，请示军委，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回电指示：「一定要调查清楚情况，情况不明，不宜轻易表态。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军队不得动武，可以出面调解。」造反派对于军方的行动大为不满，不仅要求军区领导到作出检查，还围攻军区。１月２７日，由造反组织「长缨战斗队」写的《内蒙古军区竟敢违背中央指示，出动武装部队镇压革命群众》一文载入《中央文革快报》，并由林彪批转，通报各大军区。但是随第二天的《军委八条》则让军区大受鼓舞。

２月５日，造反派学生韩桐被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打死，为此国务院、中央军委于２月６日发出特急明码电报。全文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均请军区转）：

在内蒙古军区发生的事件，应该立即停止，事态不要扩大。请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四方面各派３—５名代表来

北京商谈解决。我们于２月６日派飞机来呼市接你们的代表。

据悉，军区周围有一师范学院同学中弹致死，如确，应严追凶手和指挥者，

查出后应予法办，并向死者家属致唁和予以抚恤。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呼三司」报全文转载，外蒙古电台立即播出消息：内蒙古军民冲突，一学生中弹致死。根据吴迪先生的说法，这一国际影响让周恩来后悔不迭——因为电报的最后一段是他加上去的。

２月１０下午，周恩来、肖华等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第一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由于各方各持一端，无法做出结论，周恩来决定立即派内务部长曾山带上秘书、法医赴呼调查。周恩来再问询了各派的情况，批评了「呼三司」丑化解放军。周恩来说：「对待人民解放军要注意影响，不要丑化。你们（指三司代表）将来夺权还要靠解放军协助嘛！」

２月１２日，周恩来办公室电话指示：内蒙的问题很大，总理正在全面进行研究，一定要很好解决。现在武斗很严重，要求四方面代表分别给家里做工作，停止武斗，不要使事态扩大。　２月１４日，周恩来再次指示：目前双方对立情绪很大，这样下去，对解决内蒙问题不利。几方面都应立即打电话回去做工作，停止对立宣传，停止对立和冲突。

１９６７年的２月份，因为《军委八条》的颁布，大环境要求造反派不能把矛头指向军队。但是内蒙开枪事件过于严重，因此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见并没有特别指出内蒙造反派的问题，并且接连发出两个指示，要求息事宁人。

但是在２月１６日的接见中，周恩来严厉批评了造反派，指责他们矛头指向解放军，不维护国家利益。而此时正是毛泽东在２月初之后连续多次批评中央文革之后，并且表示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无政府主义要不得的。

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首先讲：「你们（指造反派）公开在报纸上点解放军。你们完全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接着周恩来抬出了毛和林，周说：「这样也不行，主席和林副主席看了以后很不安，你们的脑子有点热了，你们想到没有，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你们能实行大民主吗？我知道你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你们在给人民解放军脸上抹黑呀！（周很激动）」

随后，周恩来批评造反派拿死人压活人：「我今天是抑制着感情说这些话的，你们当中不少是左派，现在我还承认你们是左派，但是这件事你们错了，就是死了人也不能这样做呀！我们不知有多少人民解放军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这样做了吗？」

周恩来接着举了各地的例子，冲击军区是不对的，是不允许这么搞的，因为「这次是有领导地自下而上的夺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次夺权靠什么？靠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靠社会主义道路，靠『十六条』。」「如果解放军有错误，你们可以提出来，中央可以解决。我们是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一旦敌人来了，首先冲锋陷阵的还是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我和解放军谈话几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和红卫兵则要好几个小时。」

最后周恩来指出：「今天任何人都不准动摇我们解放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声誉。」

借《军委八条》的背景，加上周恩来的讲话，无疑会使内蒙古军区壮胆，认为自己大方向是对的。于是军区变本加厉，同保守派结合在一起，制造白色恐怖。从围攻内蒙古师范学院「东纵」大楼，到大肆拘捕，仅呼市公安局和内蒙古公安厅自２月８日至３月１７日，就拘留、逮捕５００多人。从２月初到３月中旬，全区旗县以上的１９０多个单位被保守派夺了权。同时，军区着手筹建党委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与高锦明等「反乌兰夫派」对立的王逸伦、王铎被军区列入应予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名单之中。在以二王为首的「革命干部」的支持下，军区决定于３月１８日召开全市大会，成立呼和浩特革命委员会。

３月９日，周恩来又分别接见了「呼三司」和「红卫军」的代表。然而这次会见，周恩来同「呼三司」代表会见时完全是对军区「和稀泥，对「呼三司」进行了批评。」　周恩来上来就批评「呼三司」：「你们和军区关系没有搞好，那怎么能行呢？他们打电话说，你们还散发传单，继续闹对立，你们组织内部有没有人在挑动啊？」当代表郝广德说：他们（指军区和保守派）包围师院时，有剧烈爆炸声，外面有探照灯，人员匍匐前进，喊冲啊，冲……。周恩来解释到：「这是精神战嘛！」

「呼三司」代表反应很多人被抓，周恩来无任何表示。只是在郝广德说军区是奉军委和总理指示抓的时候，周恩来非常生气表示：我怎么能指示抓人呢！

周恩来又指责「呼三司」静坐，指责「呼三司」在外面宣传：「你们对军区乱叫，哎，那怎么能行呢？看你们把这事件闹的，越来越复杂，二医大到处捅，捅完就走了，把负担加在别人身上。」

郝广德辩解到：「二医大被围攻，我们去援助。」周恩来对此进行了批评：「你们红卫兵就管得宽，什么都管。军区的事么，问题越搞越复杂，跟军区对立，使你们处于不利地位。」

周恩来的这种态度无疑对于军区的行动是「火上加油」。然而这种态度和当时中央对于军队的态度是一致的，或许中央有平息事态，息事宁人，对双方都进行劝解的意思。但是中央的屁股在当时是做在军方这一侧，因此造成事实上的支持军队，各地因此而形成的「二月镇反」皆因此而起。

３月１０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重点讲了两条路线斗争，这是长期存在的。３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出炉（中发〔１９６７〕９６号）。这种动态预示着中央政策的变化。事实上，「二月镇反」并不符合毛泽东关于夺权的设想，因为如果是保守派夺权成功则意味着刘邓路线的反复。这岂不是前功尽弃了么？因此，中央首先在３月１７日发出通知：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

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对方报纸上报道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　此举使得内蒙军区决定于３月１８日召开全市大会，成立呼和浩特革命委员会的设想破灭。

３月１８日，周恩来等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在接见过程中，周恩来一反前态，严厉指责了内蒙军区，在座的康生、肖华等也对内蒙军区加以痛斥。（笔者注：大概因为毛泽东在３月１１日下令调查青海２月２３日流血事件。）

周针对内蒙古军区宣布「河西８.１８」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一事讲：「你们表面上似乎听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办事都得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但你们不是这样。你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耽心内蒙古军区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们把那么多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同群众搞得那样对立。」

接着，周恩来针对内蒙军区扣留《红旗》和《解放军报》记者一事，指责军区对抗中央，是不遵守军委的命令。在座的王力说：「《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刊物你们竟敢扣押《红旗》的记者。你知道《解放军报》是谁领导的？是林副主席，我们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你们把解放军报记者也扣了起来，把笔记本没收，至今不还！」于是周恩来说：「你们竟然在军区门口把《红旗》和《解放军报》记者扣起来。四大自由嘛，记者没有这个自由？肖主任打了电话，你们还要押送回来。扣留了笔记本，在黄厚手上一个月不报告。记者报导如不符合实际，你们可向上反映嘛，怎么能扣留？这件事就是对抗中央，没遵守军委的命令。」

随后，周恩来更加严厉的指责：……第四、宣布人家好多组织为反革命，怎么能这样压制？即使是保守的组织，也要教育提高，怎么能压制？完全不是对待群众组织应抱的态度。这是刘、邓路线（康生插话：这是反毛主席思想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五、你们派部队来北京，就是你们要指挥中央，你们目无中央。北京卫戍区是保护中央，保护毛主席的。你们派兵来大街上抓人，是要为所欲为。

第六、还有这样的传单（指军区印的陈鼎写的材料），还加上了按语。清华附中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即使是他写的，也要劝说他不要写。你们还加上了按语，印发传单？如果是你们写的。这样做不是破坏解放军信誉吗？这怎么能这样对待红卫兵？何况对红卫兵，你们对中央文革的记者都那样对待，这是对抗中央！

第七、你们包围了师范学院，据这位同学（指郝广德）讲已经三天了。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那样对待？这是你们有指挥的，要把一个群众组织搞垮嘛。对这个问题，打电话你们没有回答，还要中央去调查！这一个月来你们进攻，不照中央的意图办事。清华附中同学的信，如调查属实是你们强迫写的话，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欺骗中央。

第八、开大会夺权，说是搞呼市的庆祝，实际上是夺区党委的权。权星桓、康修民实际上是让你们掌握的群众组织抓起来了。对区党委书记，你们军区政治部就定了性？你们比中央在先把名字点了，不夺权也等于夺权了，你们有这么大的权吗？七、八号夺权（指呼市）根本没有报来，十五号登报，明天要开大会，还要批准登报，都不是商议，是给我们下命令，统统是先斩后奏，你们犯了多大的错误！

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不能再忍了。这些你们都没请示过中央。你们想过了没有？这么做对不对？（郝广德：他们把十八号开会的事在广播电台广播了）噢！报纸、广播怎能有同中央不同的声音？你们掌握了报纸、广播，就登、就广播？广播问题的四点指示不生效了？（郝广德、高树华：他们把二十二问中央文革，在京参予反中央文革活动的「抗大」，在报纸上、广播上称为「左派」，要大家学习）这是反动的！你们（问《红旗》、《解放军》报记者）认为「抗大」是什么组织？（记者答：「抗大」炮轰中央文革，是反动组织!）

最后，周恩来说：「说明你们（指军区）的立场问题，是执行刘、邓反动路线。你们说群众大会不开了，还是要开向中央示威？是真不开了，还是搞什么？这都要看一看。对区党委的六位同志要立即恢复自由!」「今天会上谈的不能向外传，四方面各负其责。」

周恩来给内蒙古军区扣上来了一系列的罪名「「向中央示威」,「欺骗中央」,「反抗中央」直至执行刘、邓反动路线」。

值得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在同一个时期指责其它军区的言论同此相仿。作为执行当时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这无疑是没有什么可以多加指责的。然而，在官史如《周恩来传》或者其年谱中，周恩来此种作为是丝毫未有提及的，为的是避免破坏了周恩来爱护军队的光辉形象。

以３月１８日谈话为基点，从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１２日，中央多次接见四方代表，严厉批评内蒙古军区、自治区党委的王铎、王逸伦和保守派。

３月３０日，中央召见区党委代表，周恩来让二王检查错误。周恩来指责王逸伦「顽固地坚持刘、邓路线，又是乌兰夫的人。」周恩来指责王铎「搞投机」，「同保守派搞结合」。最后二人被周恩来定性为：「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反扑，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复辟」。

经过多次接见，被成为「红八条」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在４月１３日晚出炉。其主要内容是「呼三司」等造反组织是革命组织，军区别领导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改组内蒙古军区领导，成立以滕、吴为首的内蒙古革委会筹备小组。

但是此事遭到了内蒙古军区和保守派的严重抵抗。呼和浩特竟然出现了「周恩来是两面派」、「打倒康生」、「与中央血战到底」、「砸烂高锦明的狗头」、「与『呼三司』决一死战」、「强烈要求中央撤销八条」、「重审内蒙问题」等标语，以至后来还出现了「周总理为什么反不得？」的大字报。４月２１日下午，中南海西门外出现了五百多人的「内蒙古赴京代表团」，他们宣布：「我们要在这门口静坐，周恩来不接见，我们不离开。」静坐持续了六天六夜，周恩来不得不承认：「在北京发生这样的事，可以说还是头一次。」４月２７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答应接见。但是在在周恩来不足两个小时的讲话中，口哨声、口号声、跺脚声、起哄声达五十余次。　这种藐视中央权威的会议或许是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宣告了文革路线的破产。

两派的对抗逐渐升级，随之武斗在五月份也被推向高潮。５月１０日，保守派在曹文生、张三林的指挥下，几千人围攻党委大楼。围攻人员手持凶器，砸烂门窗，焚烧文件，打伤工作人员１００多人，重伤２０余人。　５月１１日，内蒙军区在中央指令下派出部队，支持造反派。保守派终至败北。

根据吴迪先生的文章介绍：根据当时内蒙古的各类小报公布的数字，自４月１３日至５月１３日的一个月内，呼市地区保守派（包括军人）上街游行示威者达十万人次，出动汽车七百余辆，参加武斗三万余人。有三千多军人不归营房，脱离建制。在这一个月中，因武斗致伤者一千三百余人，重伤三百人，致死者十余人。

针对如此混乱形势，５月１６日晚上，周恩来、康生、江青、徐向前、聂荣臻、叶群等１６位中央首长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两千七百多名赴京战士。事前这些战士被内蒙古军区参谋长王良太等事先打过预防针。根据吴迪先生的论述，无论这些中央大员无论如何解释，，这些劝慰之言迅即淹没在混乱和愤怒的海洋之中。终此会，台上是声嘶力竭，好话说尽，台下是哄声四起，群情汹汹。向台上递条子，送材料的军人接踵挨肩。坐在主席台一侧的第二夫人叶群成了接收材料的三等秘书。会后，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人到总参招待所看望这些赴京军人，这些中央大员们竟在「周总理两面三刀」、「周总理是两面派」的鼓噪声中被送回了汽车。

接连在５月１９日和２０日，周恩来等又分别同军区警卫营和部分军区和自治区领导座谈。军区警卫营要整训，周恩来讲：「警卫营要做模范，过去你们领导上犯了错误，你们是受骗的，所以认为三司是个反动组织。过去你们支持『无产者』，所以现在感情一时扭不过来。你们要集中在一起，整顿一下，要做模范嘛！」　第２日，周恩来同自治区领导座谈，表示中央坚决支持滕、吴和造反派，并警告如果再不服从命令，以自由脱离解放军（论处）」，「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要采取行动」，「中央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５月２４日，总政治部在政协礼堂召开欢送内蒙赴京人员大会。军人在会场上再次高呼「背叛中央」的口号，冲上主席台殴打了内蒙军区第一副政委吴涛和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陆杨。

主持会议的王良太向大闹会场的将士们发问：「今天的会开的好不好？」众齐声欢呼：「好！」「王良太回到住处后洋洋自得，并喝了茅台酒。」

毛泽东终于震怒了。５月２６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审查。对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军区其它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同时，「调一个师的兵力移驻呼和浩特；将军区警卫营、通信营部分人员和高炮营，测绘大队调离呼和浩特，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将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同日晚，周恩来、康生等中央负责人接见「呼三司」等造反派代表，传达了军委的上述决定，表扬他们听话，勉励他们戒骄戒躁，再立新功。十五天后（６月１５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将中央对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及其部属的处理公之于众。

在中央的极力高压下，内蒙古的保守派终于被造反派击垮。１９６７年１１月1日，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吴涛、高锦明、霍道余任付主任。滕海清是被从被窝里叫起来直奔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宣布任命的。　滕海清的上任却给内蒙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

５．广西的大屠杀

广西的情况也是比较特殊，在中央没有决定明确支持韦国清之前，中央对于广西的两派基本上调和。但是明确表态支持韦国清之后，中央则全力支持支持韦国清的一派，继而这一派成了屠杀另一派的主要民间依靠力量，但是这种屠杀得到了韦国清的支持，甚至中央的支持。

文革中广西主要是两大派「联指」和「４？２２」。二者实则由群众组织大联合后，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９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发表「四?一九」声明，因为对此意见不一，从而分裂出来的。「联指」(南宁联指，柳州联指，柳州铁路局钢联指，桂林联指，被称之为保皇派)主要是支韦(韦国清，广西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４？２２」(南宁４？２２，柳州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桂林老多，被称之为造反派)支伍反韦。

文革中周恩来多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１９６７年６月１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时说：我们今天主要是听两派代表的意见。６月１４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时表示：韦国清有功劳，但是也有错误要检查。你们冲击军管就是不对。军区支持韦国清同志过急了，个别同志工作方法有缺点毛病，你们可以提意见，进行批评。在这两次会见时，周恩来和稀泥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三次，周恩来就严厉批评了「４？２２」派，并指责了伍晋南：军区，野战军可能有些缺点错误，但是你们（指「４？２２」）这一派从来未讲过解放军一句好话。……伍晋南，我最后警告你，再插手铁路、插手军区问题，我就要隔离你们。６月３０日，周恩来在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组织时又和稀泥，说桂林「老多」过去是出名的嘛，「４？２２」是造反派嘛。你们造反的早，觉悟的晚。又指「联指」说：你们造反的晚，觉悟的早。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和戚本禹第五次接见广西双方代表。周恩来严厉指责「联指」进攻「４？２２」，讲「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全部武装他们（４？２２），看你们怎么办？！」同时周说：「现在军区决定支持你们（４？２２）。你们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要欢迎他们（「联指」）回来，慢慢地走向大联合。」（笔者注：此时的背景恰恰是「７？２０事件」之后的左转。）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周恩来第六次接见广西双方代表时提出：两派要联合，不要叫「４？２２」人家反革命集团了，反过来也不称「联指」为韦国清集团，两方面组织要保证六?六通令、九?五命令的全面执行。（笔者注：「７？２０事件」之后的左转，然后又右转。）９月２２日，周恩来第七次接见广西双方代表，笔者尚未查到具体谈话内容。

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份，决定以韦国清为首建立文革文本革筹小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２日批转韦国清同志《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中发〔１９６７〕３４２号)。同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中发〔１９６７〕３５３号）出台。《决定》指出「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这个检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已经批准，并且已经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示『照办』。安平生、伍晋南两同志在运动中也有错误，他们都做了初步检查，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三同志的联名检讨，表示愿意改正他们的错误。中央同意他们这个检讨。」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２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６日，周恩来单独接见了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周恩来在接见中批判了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错误。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周恩来第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时态度一改从前。周指出「联指」和广西「４?２２」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本来都是造反出来的。但是都犯了一些错误。同时周严厉批评了「４?２２」敌情观念不强，犯了很多违反纪律的事。究其主要原因则是「４?２２」是不支持韦国清的。

正是由于中央的这个态度变化，广西省在１９６７年冬「联指」开始在广西各地成批镇压屠杀「４?２２」。这种屠杀同中央力挺韦国清有直接的联系。１９６８年４月９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１２级台风，声称：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１２级台风。

掌握权力的「联指」以及重新上台的干部，「名正言顺」地镇压广西「４?２２」，必须在政治上搞臭「４?２２」。１９６８年５月２日，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在常委会说：广西「４?２２」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以及「反共救国团」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操纵、混入的反动组织。据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记载，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１日，广西各地、市、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后，「联指」掌握了政权，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５月１１日止，全广西惨遭杀害的「４?２２」的干部、群众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以及「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共１８０００多人。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７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经捕获团长１人，副团长３人，政治部主任３人，经济部长１人，支队长４人，联络站负责人共６３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份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４?２２』派的控制区），利用『４?２２』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此举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周恩来代表中央给以明确的结论。

以广西为例子，著名的「七?三布告」在１９６８年７月３日出台。正如吴若愚先生所论述：到了１９６８年的夏天，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聂元梓的时候，觉得造反派已经过了头了，已经失控了，毛泽东利用他们已经达到目标，可以把造反派牺牲掉了。在此之前，中央颁布的「七?三布告」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笼的。其时，全国已经实现全面军管，在广西，掌握实权并从未被打倒的以韦国清、欧致富为首的军方，从一开始就站在「联指」一方。对「４?２２」的集体大屠杀，就是在军方的纵容甚至策划，指挥下进行的。如果说「七?三布告」前，军方还是半遮半掩地纵容和参与「联指」对「４?２２」的屠杀，那么「七?三」布告之后，军方就赤裸裸亲自上阵，调遣军队对「４?２２」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围歼。　实际上并不是仅仅广西一家按如此模式照办。

１９６８年７月，中央、中央文革派飞机到广西，接两派（「联指」、「４？２２」）头头赴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7月２５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对于「４？２２」严厉指责。此次接见实际上一边倒的审判，广西造反派「４？２２」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中央的「七二五讲话」宣告广西造反派组织的终结后，与会的「４？２２」众多代表被解放军武装软禁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学习班。广西「４？２２」赴京控告团４２７人，也成了「联指」的俘虏，被押回广西关监。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９日，广西「４？２２」的九个头头：白鉴平、廖伟然（柳州）、章英、农烈（南宁）、王反修、李振林、钱文俊（柳铁）、刘振林、刘天偿（桂林）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

这次「七二五讲话」讲话，在文革造反派历史上应该占有其重要的地位。下面是部分对话内容：

康生：听说广西党校有个教员叫朱仁的，朱仁在座吗？（这时区党校「红

浪」的朱仁站起来。）我希望你忠实地讲，你来北京到底干什么？是革命

的，还是不革命的？

康生：你这样的党校教员，毫无党员气味，你这样的党员，是代表什么党？

你是代表国民党，是谢王岗的党！

周恩来：你是「４？２２」的吗？（朱答：是）你代表哪个「４？２２」？

（朱答：现在的「４？２２」。）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４？２２」吗？

熊一军是不是你们一起的？(笔者注：朱仁为广西党校教员。)

康生：你要老实交待在北京造了些什么谣言？参加了些什么黑会？搞了些什

么黑活动？哪个黑司令部指示你的？

陈伯达：把你的黑司令部端出来！

周恩来对广西「４？２２」派评价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这个谈话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周恩来谈到桂林造反大军「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一事时，有这样一番话：「去年、前年你们造反动路线的反，做了些好的事，现在还造谁的反？！我在去年说过：你们还有造反精神，我支持了你们，现在你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们里边一定混进了坏人！」周恩来还斥责「４？２２」另一代表苏振国说：「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当「４？２２」代表曹东峰汇报「西大『革联』被围几个月了，没粮食吃」时，周恩来反驳

道:「什么没粮食吃,你们抢啦!」这样一些讲话传达下去,当然就会被认定是周恩来宣布「４？２２是反革命组织」了。

在长达五小时零十分会议上，所有在座的中央首长无一不对广西「４？２２」派进行了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其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文革时中央领导人对群众组织－中少有的。完全形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认罪不准抗辩的局面。中央领导指责广西「４？２２」要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梧州和南宁放火问题由「４？２２」负责，犯了反对「七?三布告」,不支持韦国清等错误。

同时周恩来等人还对「反共救国团」表了态。

周恩来说:「你们（指广西『４？２２』）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

康生说:「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你们（指『４？２２』派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４？２２』里边更多!」

康生说:「今天在广西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七三』布告已经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但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是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

周恩来与康生等人没有丝毫的区别。

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还特别点了广东「红旗」派负责人武传斌：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破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大革命时，我在两广呆过，我为你们难过，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我再讲几句，反正朱仁是会传出去的，我也不怕你传出去。去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到广州，与造反派谈谈，那时「三面红旗」是造反派，但不能总吃那三个字，不能吃一辈子。他说什么周某人是支持他们造反派的。但是，他现在跑到北京来，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了!」

「七二五讲话」不仅是对广西造反派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广东的「红旗」派。此后，广东「红旗」派成了「过街老鼠」,由「响当当的造反派」变成了「反革命」、「右派」,广东各地游街队伍中经常可以看到被押着示众的「牛鬼蛇神」是地、富、反、坏、右、「红旗」……

当时亲历会场「４？２２」派的「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头头钱文俊所描述的场景：整个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４？２２」……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整个接

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帐会。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如此而已……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力剿杀下，广西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对此，因很多文章都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在此，笔者无意再加以重复。

三、「杨、余、傅事件」

可以说如果离开了周恩来，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革时和在开展文革中的一些措施很难说能够贯彻下去。而周恩来能够在文革中一直「屹立不倒」，此乃一大原因。相比之下，江青的冲冲杀杀更多是在舆论方面，周恩来则是把毛的思想落实在行动上。１９６８年３月份发生的「杨、余、傅事件」就是个明证。但是周恩来在「杨、余、傅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一直为人所忽视。周恩来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可谓是举足轻重。

杨成武、余立金以及傅崇碧的倒台至今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毛泽东在「７?２０事件」急速左转之后随即来了个大调头，随之在１０月份发表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指示指出「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到了可能犯错误的时候」。然而正如毛泽东所多次强调的，一个倾向总是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伴随着该指示随风而起的「右倾翻案」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按照王年一的解释，杨、余、傅的倒台则是因为在此大背景之下其忠诚度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从而导致了清洗。　吴法宪则认为是毛林在吴法宪和余力金发生冲突时选择了吴法宪。　然而事实比这个复杂的多。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林彪对于杨成武等人的错误做了一个说明，随后周恩来接着发言。　周恩来首先是表态「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的英明的决定和命令！」。其次是周恩来表态：我们要永远忠于中央文革！周恩来为什么表这个态？

杨成武的倒台，究其原因之一，中央文革认为杨成武对中央文革不忠！江青认为杨成武整她的黑材料。　（笔者根据其它知情人的叙述，杨成武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杨成武脚踩多条船，特别是和江青走的过近，江青以图通过杨进而染指军队，此事引起林彪的警觉，而在此事上林彪也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另外杨成武私下里认为其应该在即将召开的「九大」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其现有权力表示出不满，而此事引起毛泽东的反感。诸多原因造成杨成武的最终倒台。）特别是杨成武按照江青的指示，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态同意下，组织编写了「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此提纲是对真实历史的完全篡改，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因为提纲只提到毛、林、江三人。　二者相连，江青迁怒于杨成武。江青在３月２４日讲话中声称：又例如，有的人勾结起来，像杨成武之流，口头上说，中央文革怎么样、怎么样。而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欺骗中央文革，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革命委员会。

因此，周恩来在此次讲话中，非常突出的向江青当众表示忠心。除了多次带头高喊坚决相信中央文革的领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领导！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

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此外，周恩来首先针对江青的心理特点，对于其备受怀疑的历史情况做一说明，给以充分的肯定：

周恩来表示：「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

随后，周恩来针对于杨成武整黑材料一事表示看法：

「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

周恩来接着对于江青的斗争历史做了说明，「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以此证明「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而说明江青的具体工作，「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１９６４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１９６６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

最后周恩来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如果不了解杨成武为何倒台的真实原因之一，是很难理解周恩来为何如此屈膝卑恭向江青谳媚。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另外还突出了一下两个特点：

１）对于当前出现的「右倾翻案」给以严厉批评。周恩来讲：「在这两条路线斗争中，接着就出现了去年的反动的『二月逆流』，就是说，在中央以『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为代表的，和一些同志、一些人，仍然继续地、坚决地、顽强地、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早在３月２０日，国务院办公室就传达了「谭震林应该打倒」的指示。

２）周恩来把矛头指向聂荣臻等人。周恩来讲：「那么，今年这一次又把杨成武等人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二月逆流』）公开出来，揭发出来。我们林副主席指出了，我们中央文革坚决的揭发这件事情。这一次事情还在继续揭发，我们甚至于要研究，要在座的我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你们继续揭发，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

聂荣臻在４月６日打电话询问叶群：杨成武的黑后台指的是谁？叶群替周恩来掩饰：并没有点名嘛，社会上正在炮轰，将来轰到谁就是谁。 ４月７日，聂亲笔致信毛泽东，希望就杨成武「黑后台」一事同毛泽东面谈。４月１０日，周恩来电话转告毛泽东在这封信上的指示：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周恩来在４月２０日接见国防科委代表时讲：「聂荣臻同志我也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我知道他不是一贯正确的，是有错误的，我不在这里说。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想跟他提几点意见，帮助他。在二（应为三月笔者注）月底杨成武问题出来后，他给毛主席、林副主席有一封信，也抄了一封给我，毛主席加了批语，然后准备继续写一份检讨，他确实对这次大会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的，感到不安，写了一封信，我打算给他提几点意见。他是四月十六日写的，我还没有提意见，毛主席要我帮助他，等写了以后，经过国防科委党委讨论后公布，有意见还可以提。」后来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周恩来再次提到：「聂检查说他这个『多中心论』是杨成武灌输的，是受杨成武的影响。其实，是聂搞的『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闹起来了，杨成武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可见，这个黑后台，周恩来指的就是聂荣臻。

杨成武的厄运到此并没有结束。

３月２７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召开的１０万人大会上，再次对杨成武鞭挞，对江青的革命历史、丰功伟绩作了系统的宣扬，并当众举臂高呼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和打倒谭震林等。周恩来为什么如此卖力？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３日外交部９１名干部联名贴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被认为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周恩来对于越是关系亲近的人下起手来特别重，例如原南方局的干部潘梓年等人的处理，以撇清自己。周恩来在此时率先表态打倒谭震林和如此卖力猛批杨成武都与此点不无关系。

周恩来后来在多个场合对杨成武等人继续鞭笞。周恩来在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０日接见国防工办、七机部、中国科学院代表时表示：总参党委提「以杨成武为核心的党委领导」那种情况是杨成武自己提的，是自己喜欢，不但自己喜欢，而且对别人也强加，给国防科委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写了一封贺信，写了有以某人（笔者注：指聂荣臻）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领导。 在「九大」时，当毛泽东提到肖华、杨成武时，周恩来表示肖华，杨成武都是坏人，杨余问题大一些，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实话，三个人都不讲实话。

到了１９７０年，周恩来又暗示杨成武是所谓「五?一六」这个反革命分子戚本禹等人的后台。周恩来说：「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滨》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注销，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

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

「杨、余、傅事件」后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由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然而自军委办事组改组起到提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者均是周恩来！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５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向林彪报告称：「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讨论过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拟了５个同志，现先送上，请考虑是否妥当，并请在您考虑后，向主席报告请示。名单：黄永胜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当天，林彪：「呈主席批示。」毛指示照办。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８日，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毛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说，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讨论过程中，周恩来提议说：「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笔者注：《周恩来年谱》在此处掐头去尾，直接引用了毛泽东的讲话而把周恩来的提议删略不提。)毛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毛说，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

除了上述周恩来的讲话之外，还可以看出周恩来在其它方面落实毛泽东部署时的重要作用。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３日，毛泽东开会解决「杨、余、傅」问题。定板之后，剩下的事情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完成的。周恩来在毛泽东和林彪离开之后，继续主持会议，决定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为防止走漏风声，要求吴法宪一个人去接黄后，由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抓杨成武的时候，作为杨成武邻居的徐向前，其哨兵被换，电话线被切断。　可见作为中国特工鼻祖的周恩来的老辣与干练。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并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准备好接待工作（根据傅崇碧的回忆实为软禁）。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整个过程，滴水不漏。无论是在文革发动时的罗瑞卿事件，还是文革中的「杨、余、傅事件」，还是后来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周恩来都坚决地贯彻了毛泽东的决策，可谓忠心耿耿，日月可鉴。

四、清理阶级队伍

始于１９６７底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方面是对中共传统的敌人加以消灭，另一方面则是在建立革命委员前后，作为解散群众组织（特别是对立面的组织被冠以各种例如叛徒、特务等称谓加以整肃）、消除派性的一种辅助手段。

毛泽东利用文革初期刘少奇等第一线官员犯下的错误，激起的众怒，号召民造反，向着他认为的官僚阶层发动进攻，这自然不包括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１９６７年１月风暴之后，毛泽东本来以为各群众组织会很快达成协议，「三结合」会很快实现。在此

基础上，毛泽东就会继续引导把矛头指向军队。　即毛泽东的本意是依靠军队整治地方、各层官僚政权，然后反过来依靠重新建立的政权整治军队。１９６７年４月初接连发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以及军委十条，都强调了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在此大的背景之下，在１９６７年夏季发生了各地严重冲击军区的事情。但是「三结合」并没有很快实现，毛泽东不得不才用军管的方式，而这注定了毛泽东想依托重新建立的「三结合」组织来整治军队的想法落空。实际上整治军队的实施到了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的时候才得以实现。毛泽东不得不优先考虑成立符合自己旨意的政权组织。但是在种种政治势力出于自身的利益，纷纷对造反派组织实施渗透与控制，导致各地的群众派性武斗不断升级。此冲突是造成各地迟迟不能成立「三结合」模式的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工作重点自１９６７年８月底之后就从整「走资派」转为重点打击群众组织中的「坏人」。

因此当大批的造反派冲垮了各阶层的官僚政府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群众组织要解散。　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种行为难免被造反派认为是「兔死狗烹」。于是很多造反派显示出其独立性，１９６８年７月有所谓的由北京、广东、广西、四川、辽宁、黑龙江、青海、贵州等地造反派头头云集的所谓清华、「北航黑会」就是其典型案例。其在会上要酝酿成立的全国造反派联络组织更是犯了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忌，反过来遭到更残酷的打击。

但是造反派毕竟仅是群众组织，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融合后，其成分非常复杂。这就给当权者有机可乘。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视察三大区的时候就讲：「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回顾时也说：「工厂里确有坏人。」而这些坏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恰恰是「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毛泽东在一开始，设想通过「斗私」、「批修」等「说服教育」的方式来消除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但是并未成功。于是借用参与行政控制权力的军队为主导，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掌控下，「清理阶级队伍」成为毛泽东对付造反派的一个杀手锏。

而「清理阶级队伍」这个词正式的出炉，则是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周恩来、康生和江青接见北京红代会成员时江青提出的。江青讲：「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历史，不突出不搞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是不行的，这一点回去好好搞一下。新华印刷厂讲得很好，就是建党过程中，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要逐渐清理阶级队伍，党内要清除特务、叛徒、变节分子，党外也要清理，对于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要严肃处理，刚才提的三K党（指国民党、一贯道、三青团）有现行活动的严肃处理，地富反坏右不老实的也要严肃处理，当然由群众处理，不是由政府。」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３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送毛泽东参阅。5月１９日，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5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联名转发这一材料，要求「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然而事实上在这之前，各条战线的清理阶级队伍就已经动员多时。

１９６８年2月２１日，中央首长在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

话充分了体现了这一思想。周恩来讲：「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但周扬以及叛徒、特务掌握的文艺界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我们现在抓住天津典型，不仅要在天津，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杨润身等，其它地方也有周扬的死党，必须号召广大文艺界革命派，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党内最大的刘邓陶，联系到文艺界的黑线周扬、夏衍，进行批判。不仅是天津，上海、北京也有，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批臭批倒，好不好？天津万张反革命集团，不仅是两个人，是个集团，当然是个小集团，有叛徒，有特务，特别是在文艺战线，公检法专政的机关更要做好工作，要改造，要改造公检法，改造文艺界的领导，把坏人揪出来，有错误的检讨错误。公检法是实施专政的，以后必须依靠解放军改造。」

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８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全体学员时指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务繁重，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因为过去对刘、邓及其在西南的代理人李井泉联合批判不够，流毒很深，还未肃清，你们不是要解放大西南吗？这个口号现在才实现，贵州开了个头，还不够，四川处于首位，一定要四川起来，四川在西南影响很大。要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这是你们的责任，两派要联合批判。同时，还要联合起来清理阶级队伍，把最坏的人揪出来，当然要区别对待，最近我们印了江青同志的二（两）个讲话。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五日给文艺界座谈的讲话，……主席批示的某个印刷厂清理阶级队伍的材料，还有公检法清理阶级队伍的材料，这点在四川很重要，中央是写在第一条的，希望你们两派要联合，深入地把阶级敌人清理出来，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心明眼亮，四川这个大后方才能巩固。」

随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下发了一系列的在各条战线上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例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转发全国煤炭工业会议决议的批示》（１８６８.０７.２４；中发〔６８〕１１２号）中指出：认真清理阶级队伍。解放前的煤矿长期被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霸占。解放后，在中国赫鲁晓夫招降纳叛的叛徒哲学庇护下，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混进了煤矿职工队伍，他们伺机破坏和捣乱，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把它们挖出来，批倒批臭。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当时关于各省的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以及各省派系联合的批示中，清理阶级队伍成为必提之要件。

同一个时期，中央首长在接见各省代表团时，也均提出清理阶级队伍都的要求。但是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很少对事情作出具体指导，具体的执行是靠周恩来完成。当毛泽东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周也有自己的认识：「要自己把坏人揪出来，有材料交给对方组织，自己把自己那派坏人揪出来，这样子比较好，不损害革命组织本身。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容易识别好人坏人，但在特殊情况下，背后有坏人容易被蒙蔽，要自己把他揪出来，这样不损害这个组织本身，这个组织就更好。」　在如何执行上，１９６８年２月５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谈话时指出：「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搞个专政的。内蒙古搞得好，他们叫群众专政。」

高树华先生以其亲身经历说：如果列举文革中最为百姓痛恨的事情，除了「抄家破四旧」，恐怕就是属所谓「群众专政」了。恐怕后者更胜一筹，呼市地区有民谣说：「不怕判刑坐监，就怕送到群专。」因为在「群专」名义下，可以任意逮捕、关押、刑讯，甚至秘密杀害，无需法律依据。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５日，「呼和浩特市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呼市群专」）

成立，和全国的形势合拍，内蒙古猛挖乌兰夫黑在线的漏网之鱼。。１７日，「呼市群专」就开始了第一次大搜捕，「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深入程度、组织纪律性都出乎意料之外……从而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　抓的人之多，迫害手段之残酷，包括高树华先生的著作在内的很多书籍都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1月6日，在内蒙革委会第二次全委会上，滕海清、高锦明等人发动了「挖肃」运动，并组织了一批「挖肃」的骨干队伍，并提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　在１９６８年的1、2月份，根据时任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常委高树华的回忆，内蒙古的挖肃和群专均得到了中央的肯定。１９６８年的2月4日，中央首长在接见赴京汇报的滕海清等人，对内蒙的工作很是赞赏。　得到中央支持的滕海清变本加厉，最终在内蒙古的「挖肃」以及「内人党冤案」上遗臭万年。１９６９年2月4日，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在接见内蒙古革委会主任滕海清时仍然说：内蒙很复杂，内部有敌人，外部有修正主义，乌兰夫在内蒙搞了二十年，他要搞独立王国。内蒙问题，要全部解决，有个时间问题，你们时间不长，搞得不错么，你们不要太急了，中央从来没有催你们。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群众组织要自己去判断，识别，自己去揪。这无疑是提供了一个清理对立面的绝好机会。主持中央日程工作的周恩来从来没有出台一个文件系统而明确的说明，仅是笼统的要求和发一些所谓「经验材料」。至于要清理什么样的人，政策标准是什么，却从来没有发过明示。这是清队中各地个单位自行其是根本原因，也是造成如此大规模的迫害惨剧的罪恶之源。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矛头对准那些造反派则是心照不宣的。

滕海清办公室主任李德臣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造反派已经发展到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地步。……现在已经到了触动老造反派灵魂的时候了。」滕海清更是亲自上阵，矛头指向「呼三司」。　对此点，全国各地都在唱同一个经。

「清理阶级队伍」之所以受到欢迎，还与各地掌控权力一方清除各种异己势力提供了便利。董国强先生以江苏南京为例，详细论述了许世友利用此机会大整原来对立面的过程。

即使在中共自己和毛泽东本人看来，「清理阶级队伍」也被严重扩大化了，周恩来对于这种扩大化是知道的。１９６８年底，曾思玉向周恩来汇报：湖北省清理出几万多阶级敌人。最终这场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周恩来等人协助进行的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最终导致了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的惨剧。其具体细节已有众多文章论述，此处不在赘述。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为中共中央的权力枢纽，也成为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拳头」。执行毛泽东的决策，同各地方派系打交道，是周恩来工作中的重点。但是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对于当地派系的态度，或者是毛泽东对于当地派系所拥护或者反对的当地领导人的态度，成为周恩来行为的准则。毛泽东自１９６７年南巡归来，随即提出要开「九大」。周恩来在准备「九大」的过程中尽心尽力，并且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了重要的讲话，为打倒刘少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八章　「九大」前后：为毛巩固文革的胜利

１９６８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虽然毛泽东「天下大治」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但是大体上压住了「天下大乱」的局面。１０月，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者刘少奇进行了总清算，同时还批判了「二月逆流」的参与者。１９６９年4月，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之间进行了权力的再分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都各有所获。然而，胜利者皆大欢喜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新一轮的权力斗争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才一年多就在１９７０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爆发出来。

一、八届十二中全会

１９６７年9月２３日，毛泽东视察华东、华北、中南区之后回到北京，就提出明年要结束文革，召开「九大」，项目要尽快结束。除了有问题的，很多的同志要参加「九大」，要当中央委员。刘少奇与邓小平要有区别。并且指示周恩来负责「九大」筹备工作。

次日，毛泽东召见周恩来，表示接班人当然是林彪，同时表示刘少奇与邓小平分开。　周恩来在１０月9日表示把应当用法律的形式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定下来。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整理了一份通报并由中央下发全国，即《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知》　。通知说：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中央在１９６８年9月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委会后，又宣布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9月7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１９６８年年底至１９６９年年初中共中央陆续批转了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作为「斗批改」的样板。

为了筹备「九大」，中央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份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１９６８年１０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事先讨论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共商定一百三十三人。9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个出席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名单草案解释，并将名单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前，中央文革小组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清算他们的错误，而且连朱德也要批判。周恩来提出要请示毛泽东。江青回复毛泽东已经同意。周恩来于是安排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到全会的各个组里去。例如陈毅到华东组，华东组对于陈毅可以说知根知底，这种安排极其有利于批判。根据吴法宪的回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不仅有几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谓错误，还有他们几十年以来的老账。吴法宪认为这些这些材料中央文革的人是提供不出来的。因为这些老同志参加革命以来的错误统统得到了清算，包含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井冈山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等。

毛泽东在１０月１３日讲话时，曾经和周恩来有以下对话。

毛泽东：「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毛泽东：「×××呢？」周恩来：「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周恩来就是「活字典」。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正是周恩来提供了这些「炮弹」。

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系统地批判了军中元老。

对于聂荣臻，周恩来批判到：（１）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结果使七机部长期武斗；（２）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３）聂借口保护干部子女，说我们是：「不教而诛」。实际上是关心「联动」；（４）聂荣臻同志不但对「９?１５」、「９?１６」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５）「多中心论」是聂荣臻搞的。但是聂检查说他这个「多中心论」是杨成武灌输的，是受杨成武的影响。其实，是聂搞的「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闹起来了，杨成武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６）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

叶剑英的错误在于：（１）叶剑英派工作队，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２）戚本禹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因为他们压抑群众运动，所以军事院校冲中南海；（３）二月大闹怀仁堂后，１７日甘渭汉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１７０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４）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高干子女作坏事，就是高干纵容的，陈云的女儿陈伟立，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滨，反动得很，现在还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付主席；（５）赵永夫是付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２３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八?一八」给围起来，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说是林付主席祝贺的。二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到不对头，林付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

徐向前的问题更严重：（１）徐向前对邱会作同志的批斗要负责。邱会作同志被斗了几个月，被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

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２）他们镇压群众后，有些学生在三座门静坐几昼夜，要找徐向前辩论，中央让他去接见群众，他不去。有的同志说：「外面冷得很，不要把他们冻坏了。」徐向前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对群众就是这样的恨。以后还是陈伯达同志去作工作，徐向前还说：「这是军队的事，谁要你管？」并说：「我用不着你们管，我没有什么错误。」江青同志是全军文革的顾问，但是他们开会不通知她，所以江青同志说：「他们把我开除了。」

周恩来还对保护老干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１）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２）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实际上几个元帅两次接见的两次讲话后，群众要他们检查，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事后，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

周恩来最后质疑说：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会议的最大成果则是，依据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项目组提供的证据，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二、「九大」的召开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同年１２月，周恩来起草「中央参加「九大」作代表的名单和预拟名单」。

１９６９年3月8日，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陈伯达政治报告写得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看来恐怕不行吧。　同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部分「九大」政治报告稿和「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的时间、议程。会后，将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林彪：「九大书面报告稿，伯达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还有两个半问题（国际、毛泽东思想和团结起来），请伯达同志三天内将它写完，然后大家来议。」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被指责为「鼓吹唯生产力论」，最终遭否定，周恩来并没有表示任何支持或者赞同的意见。

１９６９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周恩来在４月１４日做了发言，主题有二，第一个表态拥护文革，第二个是吹捧林彪。周恩来表示：「（在回顾了历史再经历文革之后）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

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周恩来发言的第二部分则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后果。那就是最遭人诟病的「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一说，使林彪长期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们的耻笑和责骂。对这一篡改历史的说法风行一时，周恩来是有责任的。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周恩来，应该比一般人更了解那段历史，但是，为了政治需要，为了「紧跟毛主席」，他却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领导人的重要身份向庄严的党代表大会讲了这样的话：「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后，周恩来又于５月１４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传达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时，谈到南昌起义的时候，再次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而引人深思的这个讲话中的一段内容。

当毛泽东提出不要抓坏人不要扩大化时，周恩来则表示：「应该抓敌人，抓坏人嘛……。」周恩来还说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他们是叛徒、内奸、异己分子，但跟他们跑的并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也要区别对待。刘少奇的错误是网罗一帮子，勾结起来，别人不知道，搞分裂，是地下黑司令部。

三、「九大」前后的一些国内外重要政策的变化

１．外交

文革的发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毛泽东要在把中国树立成为世界革命的「样板」，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毛泽东试图以中共革命成功的模式来实现世界革命的成功，即以所谓的亚非拉为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馆的首要任务。

而作为主管外交的周恩来对此是认真执行的，也是不遗余力的。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周恩来在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中国革命越强大，越能影响世界的各个国家。世界革命中心逐步转到了中国，我们要备荒。备荒不仅是克服每年不可免的灾荒，备荒，包含了为人民而储备，为战争而储备，还要为世界革命做出支持。

为了贯彻这一精神，中宣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主席语录。根据新华社统计，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下发两个「批准」到１９６７年７月，共有２５种外文版毛着计４６０万册发行到世界１４８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说这一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

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但是强加于人的宣传导致了无数的外交纠纷。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中国的外事工作贯彻宣传毛主义和「文革」这一「主要任务」，一直延续到１９６９年。其形式五花八门，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泽东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和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泽东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了毛泽东语录和毛画像。中共在很多邻国有华侨组织、友协和侨校，这些组织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数据，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革命者」。

１９６７年，６５名留法学生和４名留学芬兰学生根据中央指示回国参加文革时途径莫斯科。１月２５日，学生们决定要到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敬献花圈，而斯大林当时是被苏联政府否定的。行动前，留学生通过中国驻苏联使馆向外交部国内报告，外交部很快复电同意。由于学生效仿国内的红卫兵，朗诵《毛主席语录》，高唱斯大林的赞歌，导致苏联警察的制止，而且很快演变成流血事件。６９人全部遭到毒打。周恩来给学生致电慰问，外交部并在２６日照会苏联大使馆，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罪行」提出「最强烈的抗议」。２月１１日，周恩来亲自主持「欢迎留学生愤怒声讨苏修法西斯暴行大会」。

比宣传更严重的是，一些外国的激进分子也真正的学起「造反」来，要造本国政府的反。对此剖有研究的程映红就对坦桑尼亚做过精彩的描述。坦桑尼亚是中共６０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国家。派往坦桑尼亚工作的某工作人员（某英文翻译）在１９６７年底来到坦桑尼亚后，也拉起「造反」人马，并鼓动当地仿照红卫兵组成的「绿卫兵」也起来造反。实际上此虽然是受到中共的启发而成立的，但这个组织的宗旨却不是造反，而是贯彻政府的政策，是动员群众的手段。然而中方的「造反派」却表示要用「中国红卫兵」的名义和坦桑尼亚的「绿卫兵」串连，向他们介绍「红卫兵」的「造反」经验。１９６８年初这些人又开始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大肆活动，要求他们起来造本国政府的反。１９６８年７月，坦桑尼亚杂技团学成归国，最初团内还相安无事，但很快就闹起了派性，动不动就「造反」，以「革命」的名义为自己争名夺利。中方「造反派」的上述活动引起了坦桑尼亚政府安全部门的注意，把情况上报给总统尼雷尔。当时尼雷尔正在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对银行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国际社会怀疑他受到中共的影响，国内很多人纷纷反对，尼雷尔本人受到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造反派」在坦桑尼亚肆意妄为，必然会给尼雷尔的反对派提供机会。而刚果的卢蒙巴政权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被右派军人推翻，就是前车之鉴。在这两次政变中，右派军人的借口都是现政权亲华亲共，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中共的附庸。这两次政变使中共在这些国家多年的苦心经营和援助一夜间化为乌有。尼雷尔接到政府部门关于中国「造反派」活动的报告后，对「文革」在坦桑尼亚的发展非常忧虑。

１９６８年６月尼雷尔访华时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中方「造反派」的问题。根据中共外交官的回忆，尼雷尔与毛泽东会见时，双方一开始由于对「文革」的分歧很不愉快。尽管毛泽东后来也表示，不允许「造反派」在坦桑尼亚活动，但他的理由却与「文革」没有关系，而是说这些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有了毛的圣旨，周恩来与尼雷尔会谈时表示，中共绝不允许援外人员把无政府主义带到国外，更不允许他们在国外「造反」。

那个企图在坦桑尼亚开辟「造反第二战场」的英文翻译，被使馆送回国后即下放劳动。

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造成了与毛泽东的愿望相反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文革开始仅一年多的时间，中国就同３０多个建交国家发生外交纠纷。甚至有若干国家例如加纳、印度尼西亚等国同中国断交。从１９６５年７月到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只有也门一个国家同中国建交。已经建交的和半建交的５３个国家，发生外交纠纷的有４０个。而且许多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缅甸等都发生了针对当地华人的流血事件。中国的外交走进了死胡同。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证明，这种强加与人的做法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中共当局开始改变做法，首先收敛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１９６８年3月份，毛泽东连续在一些涉外报告上批示：不要强加与人，并删去一些类似「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之类的话语。　１９６８年3月２９日，毛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１９６８年4月6日，毛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２１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１９６８年6月１２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批示：「不要」。

于是，周恩来在１９６８年7月在修改改《关于改革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时加写：「反对形式主义和强加于人的宣传」，「反对庸俗化」，要「通过生动的事实、准确的叙述、鲜明的主张，实事求是」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学院式的背诵，教条式的宣传」。要克服和纠正对外宣传中的「自我吹嘘」。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９日，周恩来得悉摩洛哥当局因中国「无锡」轮悬挂毛泽东语录而阻拦该轮进港，中国驻摩大使馆代办向摩外交部表示抗议事，作内部指示：「无锡」轮去摩洛哥挂毛泽东语录的做法不对。１９６９年6月初，周恩来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外滥送毛主席像和语录等情况提出批评，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慎之又慎。

虽然在对外宣传上有一定的收敛，但是在没有发生重大的战略性的转变之前，中共在外交上的策略不会有根本性的调整。

例如缅甸是中共在「文革」期间被视为「输出革命」的重要目标国。中国政府曾与缅甸政府达成政府间协议，承诺中国不公开支持缅共，缅共在华机构和领导人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这些约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公开露面，而且还在中共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鼓动缅甸革命。毛泽东亲自批准留在中国已有１７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为了保护那些在中国受训的缅共人员能安全进入缅甸开展武装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护送到缅甸境内，直到被护送人员抵达安全地点。有时这些中共护送部队还直接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战斗。中共当时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是，利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民族的亲缘关系，将东南亚国家的少数民族作为东南亚共产党扩大武装时的兵源。毛泽东曾很明确地告诉老挝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么！

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么！１９７０年在和越共总书记黎笋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让老挝共产党到云南的老挝族中去征兵。在座的周恩来和黄永胜说，在西双版纳有老挝族，周恩来还说「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像」，毛泽东说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还以历史上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队伍为例，说这些少数民族都很能打仗。

但是「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的威胁促使中共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于是联美反苏的战略也就应运而生。特别是在１９７２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的「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标志着中共的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１９７２年，斯里兰卡再度发生名为「格瓦拉叛乱」的左派军事暴动。虽然并无证据表明中共支持这个组织，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场还是引起了斯里兰卡政府的怀疑。亲华的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压力，被迫对中共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监视和检查措施，拆封全部邮件，搜查新华社和中国工人的宿舍，连中共援助斯里兰卡重点建设项目的物资也在搜查之列，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担心使馆会被关闭。为了保住和斯里兰卡的关系，周恩来被迫接见斯里兰卡大使，不但没敢就斯政府的监控措施提出抗议，反而说班夫人很聪明，反复检查，查不出中共有任何牵连，「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吗？」周恩来甚至还说，中国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如果斯里兰卡政府在搜查中国驻斯机构时发现有这类人物，「请坦率地告诉我们，帮我们清理阶级队伍」。

中国大陆最近披露的材料说明，在墨西哥直到１９７２年还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击队在活动。１９７２年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总统埃切维里亚决定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就在中国大使熊向晖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游击队」，此消息经报刊披露后给亲华的埃切维里亚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埃切维里亚在接受国书的仪式上不得不异乎寻常地向中国大使熊向晖提出中共支持游击队的问题。中共资深拉美外交官黄志良在回忆此事时，不但不否认这些游击队受中共支持，反而坦陈「这是中国『文革』混乱时期极左路线留下的恶果」。和墨西哥建交是中共７０年代初调整外交路线时在拉美取得的一大胜利。为了巩固和墨西哥的关系，周恩来迅速邀请埃切维里亚访华，给予极其隆重的接待，借此向墨西哥舆论表明中共无意支持反政府游击队。

２．内政

文革发动之后，有过几次杀戮的高潮。第一次是１９６６年红八月前后（笔者注：包括「黑色的五十天」）的暴行，第二次是１９６７－６８年间的武斗，但是这些并没有以国家政权的名义进行。在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连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文革史专家丁抒先生认为，５０万人死于清队。　依笔者在查阅如云南省等各地的文革资料时也发现「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是在整个文革中迫害致死人数最多的一个时期。「清理阶级队伍」在一定程度是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服务。但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对于人民群众的屠杀并没有结束，反而在１９７０年再次掀起了高潮。

１９６９年8月２２日，周恩来在送给毛泽东审阅的关于边疆各省市的情况报告中提出：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没有改造好的

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由革命群众严加管制，劳动改造。　　同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声称：「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１９７０年1月３０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递交送审稿时附了一封信，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示下达全国，即所谓「１?３１指示」。

同一时期，《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毛泽东批准也于２月５日同时发出。三份文件的贯彻执行构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最重要的是两点：(１)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２)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同「清理阶级队伍」不同的是，这次运动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而所谓的「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大多都是以言论、思想获罪，其中典型的有对文革不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等。毛泽东的「一个不杀」政策彻底成为谎言，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自延安掌权之后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共当局镇压大规模地以言论、思想治罪的高峰。

这份文件还将杀人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这无疑是造成各地大开杀戒的的最重要的原因，在实际执行当中，判处死刑的权力甚至一度下放到了县、市一级。

据历史学家王年一披露：「一九七〇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捕了二十八点四八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其中，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　　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许多地方都有像遇罗克这样的思想先驱者被枪毙，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共产党人被判处重刑。如今已经证实，大多数都是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〇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〇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正如上面所述，这一运动的开展依然是由周恩来首先提议的。在维护中共统治方面，周恩来是不可能心怀慈悲的。正如周恩来对遇罗克的评价：「此人不杀，杀谁?」对杨曦光则认

为「此人反动到了几点!」

四、「九大」之后新的政治格局与走势

林彪在中共「九大」被确立为「接班人」。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九大」全体会议发言时称：「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它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林彪在现场听了周恩来发言后即称：「我没有准备讲话，我插几句话。总理的讲话，我事先不知道内容。……我个人很惭愧！年轻时上井冈山，和毛主席在一起，那时不知道什么事，只知道跟毛主席干就是了。讲老实话，从我接触的领导人中间看，毛主席比其它人高明。那时我仅仅是这点朴素的感情，不是自觉的、高瞻远瞩全面的认识，工作上取得的一些成绩，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若是跟贺龙、若是跟张国焘搞下去，我的脑袋没有了，不是可能没有，是一定的没有。我能存在完全靠毛主席，每个时期都是毛主席指引方向，跟着干就是了。一切都是靠毛主席英明领导这个伟大的政治因素。我个人起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的。」

「九大」之后不久，５月初，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决定不设书记处，由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处理中央日常事务。」　对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的态度非常明确，多次要求军委办事组参加政治局工作班子的同志全力支持周恩来，说「你们要把总理（周恩来）当作军队的领导。总理的事就是军队的事，他对你们说的话就是对军队的指示，一定要照办。」

周恩来此时是如何领导的呢？邱会作说：「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的过程中，终于形成了一个『模式』，其核心就是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个人的关系问题。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是平等的（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是中央常委会一班人的『班长』。虽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毛主席为主，常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形式上毛主席只是一票，在名义上并没改变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但是周恩来执政后，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了，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成了毛主席的『从属』，党的政治局领导集体要向毛主席个人请示工作，听从他的指示……那个时候，周恩来对重大问题是向毛主席写书面报告（同时也报林彪）。他在参加毛主席接见外宾等活动时，有些事还当面请示，有时还约毛主席面谈。在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处理问题时，凡他认为有必要的，讨论后会请汪东兴、叶群分别向毛主席、林彪口头汇报。毛主席的批示和汪东兴带回来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内传达学习。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只有在毛主席批准或划圈后才能发出。」

相对于文革中１９６７－６８年的政治格局来说，周恩来的权力并无太多增加。但是相对来说，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势力的比重却明显增加。即使林彪本人没有此心，但是客观的形

势造就了这种结果。第一个，为了稳定全国动乱的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军队则以「三支两军」的形式介入文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一元化」领导的各省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中现役军人占了七成多，而各省的县级革委会由军人担任主任的多在８０％以上，最多的云南和湖北省居然占到了９７％。　第二个，而在中央领导中，军委办事组是「九大」后政治局工作会议的主体，其成员占了政治局工作班子１３名成员中的７名（黄、吴、叶、李、邱、李德生、谢富治）。

周恩来的权力基础正如上面几章所论述的，陶铸倒台之后，邓小平也出局了，全国大乱的局势等诸多方面造就了周恩来始成为真正的管家。「九大」召开，周恩来没有代表中央作任何报告。当「九大」开过之后，按照文革发动的初衷，周恩来则是下一个目标。但是此举则有两个前提：第一个，有人能代替周恩来，此人就是毛泽东一直对其保护有加的邓小平。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个，林彪的配合。此配合不仅是指对毛，也要对毛身后的江青等人。但是林彪与江青等人的矛盾一直很深，竟然到了要拿枪毙了这个「娘们」的地步。

相比之下，周恩来则明白的多。

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将，是「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是冲锋在前不回头、拚死效力的「过河卒」。不仅江青如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亦然。许多事看似张、姚表演，实为江青所为，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有文革史的研究学者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夫妻店」里他和「文革女老板」的关系。

邱会作认为：「周恩来对江青的认识与众不同，认为『江青问题』是关系到全党的『政治大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会影响全党全国的大局。因此，周恩来对江青处处关照，爱护，帮助，忍让，甚至有时有些放任，只要她不闹事就好。」　周恩来不仅认识到，如何对待「江青」的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而且还能够在实践中落实。自反「反冒进」以后，周恩来的心思大部分就用于如何讨好毛泽东的问题上，实属历史的悲剧，也是周恩来的悲剧。　知情人讲述，周恩来在１９６８间曾经授意主管军政大学的张秀川搞了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里面提到了毛林会师，还提及了江青的伟大奋斗历史。但是当毛泽东否决了江青委托杨成武搞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之后，周恩来下令把写成的东西全部收回销毁。

作为毛泽东的代言人，「九大」后江青接连对周恩来的发动了几次攻击。最重要的一次是《周恩来年谱》记载的「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唯有提及要纠正的则是《周恩来年谱》所记载的时间是不对的，时间非１９７０年的5月１７日，而是「九大」之后不久，１９６９年的5月１７日。

根据程光先生的采访，「九大」之后，江青背着周恩来曾经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发泄对「九大」后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是专门诽谤周恩来的。

就在九大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悄悄的告诉吴法宪：「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上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这个口号的提出，周恩来要负责任。吴法宪把此事向林彪做了汇报，林彪则告诉吴法宪：「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

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吴法宪还建议叶群把此事告诉周恩来。叶群说「我已经告诉周总理了。」吴法宪还回忆到：「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合适的时候，再一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恩来，想提醒他注意江青、康生等人的活动。听了我的话，周恩来只是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

１９６９年5月１７日，江青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姚文元在其住处开会。江青在这次会议中对周恩来评论到：「周恩来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组织才能，这一点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看不清，容易跟着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文化大革命』中他办错了几件事情，写了检讨，现在还在我的手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只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来中央常委碰头会垮了，这才要求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

邱会作回忆，江青５月１７日攻击周恩来时，黄永胜当场予以反驳，带头中途退场抗议，并立即到林彪那儿作了汇报。以后的情况是这样的：「林彪说：『最近以来，江青攻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应当向毛主席汇报……』汪东兴立即安排了黄永胜、吴法宪当日晚七点到毛泽东处，而我（邱）则到了周恩来那里。江青前几次谈话都涉及到周恩来。每次讲过之后，我都利用和周恩来一起工作的机会，及时地向周恩来『透风』。他听了以后总是表情凝重，压抑不语。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他非常难过地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是仁至义尽，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坚持照顾她几十年呵，人不能不讲良心呀！……我很感谢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你及时的通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你们都是老同志，历史上的事，你们虽然不在中央领导岗位上，但是事情的内容，中央的结论，你们是知道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

「晚上黄永胜说，他们大胆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江青的胡说八道，但毛主席似乎对江青没有太大的愤怒，仅仅有些『小责备』，主要还是为江青『开脱』。毛主席说：『对总理的问题，她（江青）是随便说说的。政治局委员之间谈些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专搞攻击别人的活动。你们（黄、吴）到我这里来，我不会向她讲的，你们也不要说出去。要是她知道了你们来我这里，讲过她的问题，那今后你们的日子就不好混了!』」

毛泽东当然心知肚明，黄永胜到他那儿去告江青的状，就是林彪在告江青的状。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几句后，又告诫黄永胜（也是对林彪），不要把与江青的矛盾扩大，也不要把事情公开，否则「黄永胜」们就会「混」不下去。

周恩来是闻名世界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政府总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江青为何敢向周恩来叫板？对此，邱会作记得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说了几句他印象很深的话。「『我（江青）同主席的关系，你们能见到的当然就是夫妻关系了，你们看不到的又是什么呢？同样，主席同总理的关系，你们能看到的好像是挺好的，但实质上并非如此，你们看不到的又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邱）想过，江青如此胆大妄为，攻击周恩来，整周恩来，一点没有『背景』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在此时，林彪自己跳了出来。

林彪不仅不配合江青攻击周恩来的行动，更为要命的是，在１９６９年７月，林彪把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转送给毛，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刚刚向林提起张春桥是不是可以作为接班人培养，林彪则王顾左右而言他，说还是邱会作等这些经过考验的人靠得住。　张春桥是毛泽东的心腹爱将，可以说在唯一一个在文革发动之后敢顶毛的嘴的人。　历史也证明，张春桥等人才是毛泽东真正得同路人。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算盘，将石头砸向了林彪。

而同时期的周恩来则很有自知之明。例如在１９７０年６月１７日在上报给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与中央工交政治部、中央基本建设政治部、中央农林政治部、中央外事政治部、中央文教政治部、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由文革前夕的９０个单位，精简为２７个单位。拟设立的２７个单位是：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冶金工业部、一机部、燃料化学工业部、水利电力部、交通部、轻工业部、财政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农林部、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公安部、卫生部、文化组、科教组、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办公室、国防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上述单位除国防部、文化组、科教组不建立革委会和党的核心小组、国务院办公室不建立革委会外，其余全部建立核心小组和革委会。

国务院拟设立的２７个单位中，划归军委办事组管辖的单位７个，分别是：国防部、二机部（划归国防科委管辖）、三机部（划归空军管辖）、四机部（划归总参通信兵部管辖）、五机部（划归总后勤部管辖）、六机部（划归海军管辖）、七机部（划归国防科委管辖）。此外，８个单位（包括１个委员会和７个国务院直属局级机构）由国务院系统调出，即：电信总局调归通信兵部领导；海洋局调归海军领导；民航总局调归空军领导；中央气象局与总参气象局合并，归总参领导；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测绘局合并，归总参领导；体育运动委员会调归总参领导；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原定归中央文革领导，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改归其管辖。

经过此番裁撤，国务院的权力被减缩、分割是空前绝后的。如规定「各部、委建立党的核心小组，直属党中央领导」，「各部、委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工作部门，其大权集中在中央」，又在国务院系统内划出数个部门归军队管辖，或干脆调归军队领导，国务院实际只领导２０个部门。而这一自行放弃权力的方案，却是国务院自己主动提出的。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的精明之处，「权高震主」的现象是不允许发生的。

五、九届二中全会

１．九届二中全会之前

１９７０年３月，毛泽东考虑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其时，毛泽东在武汉，林彪在苏州，筹备工作的具体操作，则由在京的周恩来主持进行。

１９７０年３月，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３月７日，毛泽东和汪东兴谈话，作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毛泽东说明：「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据此，王年一先生分析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和信中对此是怎么说的？无论过去的有关著述还是近年出版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都讳莫如深（有香港出版物称周恩来在信中最早提出了设国家主席和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但资料来源不详）。不过，毛泽东既是针对所阅文件而作的指示，由此可以推断，是草案或信中提到了设国家主席和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不与「副统帅」林彪，也不与周恩来或政治局其它领导人商量，便作出了只能照办的指示而不是提供商量的建议，并要汪东兴第二天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毛泽东泽东后来把「设国家主席」与批判林彪集团联系起来。关于设置国家主席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对此进行过讨论，再次不再多赘。

事情的结果则是直到８月份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此事仍无定论。

８月２２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宪法修改草案中「不设国家主席」作了解释，谈及了林、周、陈、康在此问题上与毛的不同意见：

「下午见主席，我们特别提了国家主席的问题。报告上已经说了嘛，但我们又说了：大家热切希望，既然是一元化嘛，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样就满足群众愿望。领导嘛，当然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了。但在国家形式上，是国家元首、副元首。我们并且还提了个方案，说接待外国使节可以由元首授权，国家主席授权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接待使节。大概几位同志，伯达、康老、我、林副主席，四个人都说了，主席说，那是个形式。（康生插话，主席还有句话，说『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主席』。）当然，起草的稿子还是照顾那个一开始由东兴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意思。但我们还是反映一下子，还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席说，现在当然也见了不少外宾，也可以不见，有些不是也没有见嘛。主席说，当国家主席、元首嘛，就是有点好客，不大好不见，虽然接待使节可以由别人。实际上，这个问题主要的还是党的领导和行政上国务院，党的本身也还有一些事。设立人大常委会为的培养干部。外国人不是说，党的决议人民代表大会保证通过，人大常委会更是保证通过。资产阶级也是这样的，你看嘛，英国的国会制，还不是多数是工党的决定？然后国会通过就是了。甚至还没有通过就已经宣布了。现在是保守党是多数了，是保守党的国会。美国也是一样。资产阶级也是一个党和一个行政机构。主席说，那两层都有必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后来康老也说，有人主张把人大常委会同国务院合在一起。主席说，那也不行了，总还要有那么一个机构才行。」

最值得主意的是，周恩来讲话里面提及「但我们还是反映一下子，还提出了一个方案。」言外之意，此次周恩来是「揣两份干粮上山」的。　　据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中办印发的《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确实是两种方案，一重是《宪法》条文有「国家主席」的一章，另一种则是没有。

事实上，周恩来特意打电话告诉陈伯达：有些人主张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请陈准备些条文，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陈伯达则说：「因毛主席还是不赞成设国家主席，我回来就把那个条文抄样扯掉了。周总理给我打电话的事，我也从没有跟别人说过。会上批我批的那样厉害，一说，事情就会牵连到周总理。有许多事，我都自己一个人吞下了。」

２．周恩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半段的表现

会前，毛泽东就想请林彪讲讲形势问题。对此，周恩来也是知道的。８月２２日晚，陈伯达到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能在会上讲话。陈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人民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陈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陈认为，如果林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泽东肯定会支持林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林彪没有对陈伯达表态。林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向主席报告一下。」 (笔者注：惟未见陈伯达本人关于这件事的回忆)

九届二中全会本来预定在８月２３日下午３时开始。但是会前，毛泽东再次问林彪要不要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林彪向毛泽东谈了张春桥等同吴法宪等之间关于删掉三个副词的争论。并且周恩来也表示有这么回事。

原来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３日（笔者注《毛泽东传》为１３日，吴法宪在其写的回忆录中则是１４日），宪法修改小组成员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了激烈冲突。事情缘于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认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而吴法宪认为这是「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而且吴法宪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 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正是周恩来一手定稿的。事后，吴法宪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表态：「我支持你，你批评的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周恩来同时表示赞成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然而时过境迁，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继续调查吴法宪等人。康生追问吴法宪庐山前后的活动时，周恩来就说：「你（吴法宪）在８月１３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当场吴法宪就回答：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的。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周恩来很不高兴。

８月２３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发表了针对于张春桥的讲话。 按大会议程，林彪讲完之后是周恩来讲话。毛泽东问周恩来，你讲吧。然而周恩来则说不讲了。 周恩来此举显然是不想冲淡林彪所讲的主题。

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汪东兴提出来要重新听一下林彪的录音。周恩来表态：「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周恩来进一步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放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这样，九届二中全会的日程被打乱。

汪东兴回忆：播发录音的时候，有人提议要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每位代表，与会者鼓掌表示同意。周恩来让我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还嘱咐要由林彪审定后再发。我将毛主席的意见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在听完林彪的讲话录音之后，叶群对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昨晚总理交代张春桥准备《宪法》草案中设国家主席的章节，这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们要向总理学习。据知情人的叙述，此时周恩来还特意「照顾」了张春桥。周恩来对张春桥说：「宪法草案，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张春桥回答说：「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

邱会作在西北组讲：「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这不符合历史。……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饭后碰到邱会作，赞扬邱会作，下午放了一炮，很有力量。　　吴法宪也发现，在８月２４日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吴等人有说有笑，但是对张春桥等人表情冷淡。

周恩来自己在东北组也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天才」的观点。周恩来说：「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

８月２４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小组讨论。华北组开始「起哄」，汪东兴提出要揪人。在讨论的过程中，８月２５日下午，华北组的四名劳动模范先后发言，质疑《宪法》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认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有问题，还点了康生的名字。吴德说：这个态度你们怎么表？如果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吴德向周恩来禀报，周恩来责备吴德为什么不在会上反驳。吴德说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周恩来说：不是很好讲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是毛主席，副主任是林彪，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　　周恩来为什么态度突然改变了呢？

原来２５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毛泽东决定先拿陈伯达开刀，于８月３１日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我的一点意见》。　　毛泽东用来写「我的一点意见」的语录是周恩来提供的。８月２８日，周恩来叫吴法宪写检讨，并向吴索要了一本陈伯达搞的「语录」。　　庐山会议之后，回到北京的陈伯达打电话向周打听情况。周欺骗陈伯达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缓和，汪东兴把那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陈伯达回忆说：周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陈终身难忘的。　　陈伯达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至此，庐山风向陡变。吴法宪回忆说：庐山闭幕的时候，周恩来明显开始和吴疏远，并且当周恩来同康生同机返回北京的时候，两个人很亲热。吴法宪慨叹：「周总理很值得我们学习，善于『看风使舵』」。　　８月２９日晚上（吴法宪回忆录上是３１日根据《周恩来年谱》应为２９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陈伯达的错误。会议中间，周恩来曾经三次递条子给林彪，希望林彪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有利团结。但是林彪根本不理，令周碰了一鼻子灰。

３．周恩来在九届二中的后半段

１９７０年8月２５日，刊登有汪东兴、陈伯达、陈毅等人发言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全会第六号简报）印发全会后，各小组会上要求设国家主席、提出要「揪人」的呼声更加激烈。许多中央委员都作了附和陈伯达、叶群等的发言。　　拿到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张春桥顿时惊慌失措，连忙带着姚文元找江青。江青第一个反应是找周恩来，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江青直接找了毛泽东告状。随后，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又到周恩来处谈话。

当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之前，毛泽东特意把周恩来叫来交底。周恩来也向毛表示坚决的支持。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之后，毛泽东决定立刻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这也是正是周恩来存在的价值。

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并警告说，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吴法宪所在西南组的组长张国华回来传到了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在下午两点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副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毛泽东是如何知道「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的？这本是许世友写给毛、林的信中所言。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收到此信。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和南萍、熊应堂等人的信到了大会会务组，又到了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把信转给叶群，并附条子说此事到此为止。　　周恩来的两面派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随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紧张的同各方谈话。２６日周恩来约吴法宪等人开会后，到林彪处谈话。晚，到康生处谈话。以后又约全会六个小组组长开会。２７日，周恩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下午，先后同林彪、陈伯达谈话，批评了陈伯达。晚，参加政治局部分成员会议。会后，去康生处约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谈话。２８日，周恩来先后去林彪和康生处谈话。之后，约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

江青后来对这一段的历史有过回忆：「那天我和康老正在开会，总理派人送来了陈伯达的发言稿，不是记录稿，我们与陈伯达干了一仗，说他真狠毒啊，你想把毛主席周围的人一网打尽。从此再没见过这王八蛋。我当时讲，你拿了枪杀我的头好了，你们就是跟这样狠毒的人走啊！你们怎么解释呢？真狠毒！就是要颠覆我们国家，帮助苏修，颠覆世界革命根据地，这能容忍啊!」

关于这一段时间周恩来的表现，徐景贤有过一段非常真实的回忆：与中委们的无事等待成对比的，是周恩来的格外忙碌，为了配合毛泽东查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周恩来调集了各大组的发言记录，发现几个「宣讲员」的发言内容惊人地相似，说明事先有过串连，统一过口

径。于是，周恩来和康生一起，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到各组「宣讲」的由来；结果查明了陈伯达编选的、通过汪东兴印发的那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出笼经过。为驳斥陈伯达、吴法宪等人散布的谣言和诡辩，周恩来特意把北京存档的关于毛泽东圈掉「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的文件原件，调来供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参阅，周恩来白天黑夜地操劳，据他自己说：「足足有三十六小时没有合过眼!」　周恩来还根据毛的明令调黄永胜上山，安排李德生、李先念回北京「值班」。

１９７０年8月２９日周恩来参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与康生传达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列讲话，着重讲了团结问题。周恩来提出：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8月２５日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停止了小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在联系历史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自我解剖、批判后，强调；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１９７０年8月３１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上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严厉地点名批判陈伯达。周恩来在此之后如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一样，是毛泽东所依靠的、贯彻毛泽东意见的主要执行人。

同日，周恩来先后同黄永胜、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深夜，周恩来同康生到毛泽东处，将《我的一点意见》稿取来，给张春桥看过并同张谈话，并与次日交给林看，林表示同意。随即，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对《我的一点意见》稿作个别文字修改，然后决定付印，并将印件送陈伯达阅。随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陈伯达。周恩来在发言中严厉批判了陈伯达:《我的一点意见》时说，这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

9月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指出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但要陈再进一步检查，我看有困难。然而实际上的情况则是：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日研究「批陈」问题，确定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并把调查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当面教给周、叶。　叶剑英在毛泽东处领命后，以周恩来特别顾问的身份，率领工作组到福建、广东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最终为批陈整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而陈伯达则说：「后来听说，在一个会上，有人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还举例说，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就配合了。在这样条件下，周恩来同志还能维护我，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　笔者极其怀疑这是在粉碎文革后美化周恩来的行为而造出的谎言。退而其次，即使周恩来这样讲了，也不能抹杀掉周恩来是执行毛批陈最得力的助手这一事实。只能说陈伯达对此的认识还是一书生之见。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中间，9月2日，周恩来飞回北京，在深夜，约外交部、外贸部和外经部领导成员开会。在讲话中指出：《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

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经过研究，并请示了毛主席，从９月５日起，不要登语录了，《共运资料》也不登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这本语录，未经中央批准，要清查一下。中央已三令五申，不经中央批准不得出版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还乱编东西，怎么这样不谨慎？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定是中央批准发表的。不能滥用毛主席的威望。有些话不是毛主席讲的，有的没有发表，不能以讹传讹。《参考消息》主要是正面的，也要选登反面材料，使大家有所比较，否则不能起广泛的教育作用。同月８日，周恩来就由《西行漫记》一书改名出版的《毛主席生平》和邮票发行等问题批示：（一）新华书店及各地分店收回这本书。《毛主席生平》不再出售，但《西行漫记》译本不要禁止。（二）告交通部，邮票上不许再印毛主席像、语录、指示和诗词。

９月１４日，周恩来在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会议上，向与会人员传达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并介绍陈伯达的历史情况及１９５９庐山会议上陈的问题。　据说，在这次庐山会议之后，周特意留下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听他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周恩来回顾了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毛泽东军权的事实。　周恩来交待了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莫斯科路线。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六、九届二中全会余波

１．王良恩之死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还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就是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三位上将上书毛泽东、林彪，信中提出「几个犯错误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工作，而应该下基层锻炼。」这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等人。　这信不仅在若干年之后又起波澜（三位上将检讨多次方能过关），而且还是时任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少将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８月２５日，许世友等三人的写好之后，委托当时担任华东组记录简报工作的华东组会议秘书洪雪竹交给负责大会会务的王良恩，请王良恩转呈毛。　王良恩接到这些信后，按程序上交给周恩来。然而老于世故的周恩来却把此信转给叶群，并附条子，到此为止，存你处。周恩来此举也有避免事态扩大化之意。事后叶群对吴法宪、邱会作讲：我捡到三个「险球」，你们一定要守口如瓶，我一定要保住三个司令。

「林彪事件」之后，由汪东兴和王良恩负责领导查抄林彪住处以及办公室。搜查人员在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中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根据一位当事人的回忆：这几封信都在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中。我们在清查中发现后，感到不好把握，就一起交给办公室主要的负责人、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他负责呈给上面。王良恩再次把信交给周恩来。深知内情的周恩来重新做了批示：「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退。周恩来。」　周恩来此举是将信退回王良恩，表示此事应当了解不予追究。

１９７２年初，江青在参与处理山东揭发林彪问题时得知，在庐山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省领导向中央写信，建议处理当时在庐山犯错误的人。依据此线索，江青找到了这些信。江青于是找毛告状，要求清查此事。江青给中办负责人（即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一定要彻查这几封信是如何到林彪那里去的！」此事涉及到王良恩。江青于１９７３年1月9日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作出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同日，中央办公厅临时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揭发批斗王良恩，最后，江青「王良恩是野心家、阴谋家、大反革命、定时炸弹！」康生提出要追究王良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什么阴谋」。

周恩来得知此种情况下，指示王良恩：边检查边工作，但是却丝毫不出来替王良恩解释此信是如何到林彪那里去的！

多次检讨却过不了关的王良恩最终选择了自杀！

虽然王良恩的问题固然不止这些，但是此事的份量颇重。　但就此事而言，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不过就是中间的经办人，最后却被逼自杀，个中原因耐人寻味。「林彪事件」之后，江青想利用此线索，以王良恩为突破口，然后扩大战果，把自己不中意的几个人予以打倒。江青的威逼，众人的揭发，落井下石固然是王良恩自杀的主要原因，但是作为对此事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却未施以援手，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解释，这也是王良恩绝望的主要原因之一！

２．周恩来与检讨

吴法宪回忆：８月２８日，周恩来就要求吴法宪作检讨。周恩来对吴法宪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9月２２日，周恩来在看到毛泽东２１日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后，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批件送给林看，提议先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

除了自己善于做检讨之外，周恩来还善于劝别人做检讨。

早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上，周恩来就劝彭德怀不要站在局外指手画脚，要尽快认识「错误」亦即检讨。

刘宁一说：阿尔巴尼亚邀请一个妇女代表团，我和总理商量去不去？因为阿方邀请多次，决定还是去，总理推荐夏之栩同志带头，我也请示报告了康生。代表团出发后第二天，江青在人大会堂开什么会，突然把我叫去提出：据说有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去阿尔巴尼亚，谁决定的？我回答是我们提出的，请示了总理、康生、富春。江青说，毛主席讲的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职权，这样重大的事为什么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总理要我赶快检讨，我检讨了说我落后于形势，有老框框。谁知总理也批了一段「思想上有老框框」，富春同志也写了同样一段，康生也只好写了自己有老框框之类的检讨。

１９６６年底，一些军队院校学生对陈毅、叶剑英等老帅的讲话不满。１９６７年1月

３日，军队院校的「批资筹备处」要批判陈、叶。周恩来劝刘志坚做检讨：为了缓和学生们把冒头指向老帅的激烈情绪，是否由「全军文革」承担些责任。　　１月４日，刘志坚于不得不做了检讨。刘志坚说：「昨天晚上，总理提醒我，今天上午全军文革小组开了许多钟点会议，小组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这样我才有所触动，下面我分别讲一讲我的错误。下午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

但是这些人是如何对待刘志坚的呢？刘志坚说：「没有向中央文革、军委全面的反映军队院校文化革命情况，没有主动发现主流，（康生同志插话：不是没有全面，而是没有。）我们最近反映了一次。（江青同志插话：那是我们要你去汇报的。）（总理插话：你就没有汇报过，是我们要你去汇报的。）都没有反映主流，只是听了一些当权派的汇报，汇报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康生同志插话：话要说大问题。）（总理：不要讲这些小问题。）（杨成武同志插话：黑暗，一塌糊涂，只讲阴暗面，一片黑暗。）（王力同志也指出这一点）首先是领导机关受到冲击了，片面反映了一些坏的情况，起了很坏的作用，对叶副主席在他的思想上起了很坏的作用，讲了些这样的事情……的问题，火车票的问题……的问题呀！」

从这些插话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本意并非是要刘志坚做检讨过关，而是完全配合中央文革等人把刘志坚当作替罪羊抛出去！事实也是，刘志坚在１月５日会见学生的时候，就被抓起来。１月８日，刘志坚就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直到１９７４年被毛泽东指定解放后才复出。

肖劲光的例子则是另外一种情形。１９７２年７月，为贯彻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了「四?五」会议。此次会议实质是要让苏振华复出做准备，肖劲光要为此让路。为达到此目的，肖劲光被扣上「上了林彪贼船」的帽子。但是肖劲光就是没有松口，于是会议开成了马拉松。

此时此刻，周恩来出面。周恩来打电话告诉肖劲光。肖劲光回忆说：周恩来几次打电话安慰他，并暗示他为避免整垮，有些问题可以先承认下来。　　在此重压下，肖劲光不得不打掉牙齿朝肚子里吞，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自己上了「贼船」。于是事情得到了解决。「四?五」会议后，肖劲光同志以「上了贼船」的莫须有罪名，又由海军党委第一书记降为第二书记，苏振华同志升任为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肖劲光同志被剥夺了主持海军工作的权力。

当然也有极其个别的不畏周恩来强势的铮铮铁骨。１９５７年马寅初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尖锐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呼吁尽快地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但是这和毛泽东当时要搞大跃进是背道而驰的。大跃进是要有广大的人口做劳动力的。于是遭到严厉批判，不是学术上的批判。完全是政治高压、政治迫害。但马寅初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周恩来再次出面了。周恩来特地约马寅初谈话，劝他不要固执己见，应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别人劝马寅初，马寅初还可以不放在心上，但是周恩来劝，马寅初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这次谈话后，马寅初梳理了自己的理论，发现并没有错。他又写出５万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发表在《新建设》１９５９年第１１期。　　马寅初在文中拒绝了周恩来的劝降：「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七、批陈整风汇报会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７日与康生、李德生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提议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所写《我的一点意见》下发传达，因为「在办理陈伯达项目工作中，我们发现如不使更多负责同志和办项目的同志知道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就不容易得到多的真实的揭发和检举材料，而现在党内外和国外舆论都已渐渐觉察到陈伯达从九届二中全会后即不再出面，可能出了问题。因此，我们提议将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扩大印发范围至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党和政府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以便得到对这一可疑之人的更多揭发」。并告此建议已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阅后批：「略宽为好，如地级、师级；中央应有一指示下达。」１４日，周恩来批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经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１６日，中央正式下发此《指示》和《我的一点意见》，要求各单位由主要负责人亲自传达。由此，全党开展「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

但是从哪些部门「以便得到对这一可疑之人的更多揭发」呢？陈伯达是在华北组「煽风点火」的，而华北组除召集人李雪峰外，还有北京的吴德、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作为所在省、市的领队出任副组长，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代表军队方面也是副组长。而文革中，陈伯达同华北的关系又特密切。

陈伯达参与天津、河北问题的解决，是缘于当时为了解决各省市的问题。１９６７年8月９日，中央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会议并做了分工，张春桥、姚文元参与华东，陈伯达参与天津、河北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在这次会上说：作这样的分工，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推动形势发展，实现毛主席争取明年春天或稍晚些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

这也是陈伯达与华北结缘的开始。作为担负华北地区「三支两军」主要任务的北京军区，自然要服从代表中央参与处理华北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陈伯达。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至次年１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都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３８军支持激进派，陈伯达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未免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３８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　　这个案例比先前描述的广西案例一点也不过分。但是，华北的问题仍然被选做突破口。

华北方面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时候，李雪峰、郑维山等只传达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对于批陈讲的很少，向中央汇报得也很简单，说我们按照中央的精神已经传达，就两句。康生在华北给中央的报告上批：奇怪？毫无揭发！遂将华北的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这就成了问题。江青鼓动北京军区内部揭发，于是３８军的揭发报告便应运而生。这个报告是毛泽东让江青把３８军的人找到北京，搜集情况，写的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揭发的是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前两次在华北的乱说乱动。报告第二部分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我军于１９６７年初奉命调华北以来，越来越感到，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据我们所知，北京军区的许多重要会议，他都到场讲

话……」这份报告，在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反党行为的同时，还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北京军区负责人在纵容陈伯达在这里乱跑乱说，使他成了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此举并不仅仅是批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批陈，达到改组北京军区的意图。文革开始，杨勇和廖汉生被打倒，北京军区就被改组过一次。在杨余傅事件发生的时候，毛泽东就想改组北京军区。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北京军区又一次被改组势在必行，因为毛泽东虽然当时是把矛头对准陈伯达，实则是对准林彪的。而北京军区肩负着首都的保卫工作，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的，因此一定要通过改组，从而换上自己信任的人，这样方能感到安心。随后，毛泽东借批示周恩来的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报告而把黄永胜等人都放「进来」。毛泽东此举表明毛对庐山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三个副词的斗争，并不只局限在对陈伯达的批判上，而是想采取各种办法削弱林彪在军队的势力。

这个报告自然是攻陈的炮弹。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批了该报告：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让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当日，周恩来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３８军党委报告的批示。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先约北京军区党委郑维山、李雪峰等８名常委于１８日前来中央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并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的问题。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列席会议的北京军区党委常委、北京卫戍区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对３８军报告的批示。为了「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决定先以三天时间召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初步统一认识。并决定华北会议自２２日开始，北京军区所属各单位及北京、天津、河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四百三十余人到会。

周恩来于１９日，书面向毛泽东、林彪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昨晚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主席对３８军报告的批示，参加会议的还有华北地区和北京卫戍区的一些负责同志。会上，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的建议，认为这次会议应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时间要长一些。为开好这个会，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同意在人到齐、开大会之前，先以三天时间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同时，由黄永胜、李作鹏找３８军到会同志谈话，指出他们的报告是好的，起了推动作用。在会上，要通过揭发批判来达到团结。毛泽东当日批示到：「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并指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毛泽东在批示中还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会议。

这个批示预示了以下两个问题：１）改组华北军区；２）批陈整风是台面上的，台面下的是考察黄永胜等人的表现，以及他们和华北的李雪峰、郑维山是怎样的关系。若当时能揭发出实质性的材料无疑会更好。实际上当时，中央已定「陈、李、郑反党集团」，所以无论李雪峰、郑维山等人如何检讨都过不了关的根本原因。

２２日，华北会议正式开始。然而当时会议仍然由李雪峰、郑维山主持，因此，要批他

们，怎么个批法？根本无法深入。对此，２４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参加会议的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的汇报。因揭发批判陈伯达而涉及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郑维山和李雪峰，政治局会议认为，华北会议还未形成认真的批评和彻底揭露的精神，要求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主要小组会上继续做工作，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响大会。２５日，周恩来就华北会议情况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目前会议还处在学习和表态阶段，估计形势打开，将在今年底、明年初。同时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意见。毛泽东阅批：「同意。」２６日，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分别在各小组会上继续发动揭批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同日，周恩来火上浇油劝大家发言，并说：「如果会议开的无力，中央要点名了。」２７日，中央政治局指定四个人帮郑维山写检查，指定吴德、吴先恩等四个人来「帮助、督促」李雪峰、郑维山端正态度，交代问题。郑维山后来说，当时的「帮李、郑小组」实际上就是搞逼供。

问题的症结是之一「为什么听任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乱跑乱说」，正如前面所述，正是周恩来主持会议，宣布的中央领导人的分工ーー陈伯达参与华北的三支两军。而李雪峰、郑维山的检讨恰恰是不理解这一点，没有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跟着陈伯达跑?」以至陈伯达成了「太上皇」。但是周恩来却对此保持缄默。陈先瑞在回忆录中就说：「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这除了中央能阻止他，北京军区是挡不住的。陈伯达到华北是「解决」地方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们没有请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太上皇」一说也不是事实。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和１９７１年１月４日，江青再请示了周恩来之后，来到会上猛批了郑维山。江青讲：「现在我还称你们同志，就是因为你们还有机会交代，主席的批示是给你们出路的。你们是群众攻一点交代一点，你们要彻底交代。」　江青在此次讲话中，把北京军区领导人奉命陪陈伯达到内蒙视察说成是「背着中央」，陈伯达之所以在庐山上有恃无恐就是因为有北京军区给他做后盾。　江青还指出华北山头是有历史性，点了聂荣臻的名字。

针对江青的讲话，周恩来在１月９日致信江青，提出：「我勾掉的几处，有的案尚未结，有的牵连太多。与主题无关，可以去掉。」对讲话中随意点名批评的情况，指出，「这样点名，未经讨论，恐不恰当」。并告：「主席在（一月）六日批示：讲话不要印发。七日批示：录音是否放听，请先将文字送我看过再定。我建议，你将这两次讲话录音的文字本先呈主席审阅。」１１日，将根据江青两次讲话录音整理的文稿送毛泽东，毛阅后批：「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作内部材料保存。」　唯一可以理解的是，毛泽东现在需要的军队诸如聂荣臻等人的支持来倒林，因此江青点聂的名是不合时宜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政治上的老辣远非江青所可比拟的。

１月８日，毛泽东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上批示，提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当日，周恩来批示将此件印发政治局成员，明日讨论、下发。次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济南军区报告的批示，一致认为当前应以批修整风的自我教育运动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中心。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近期将专门召开一两次政治局范围的批陈整风会议。同日中央军委召开批陈整风座谈会，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会议。自本日起，出席军委座谈会的全体成员均参加华北会议。

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２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纪登奎、李德生关于华北会议情况汇报，商定召开大会及结束会的安排。《华北会议对郑维山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和《华北会议对李雪峰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两份材料被上报给毛泽东。材料列举了李雪峰、郑维山的六大罪状以及同陈伯达的关系，但是却没有任何同林彪甚至是军委办事组（指黄、吴等人）的联系。

１月２０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提出：即使中央指出原北京军区负责人的错误，也不应与陈伯达放在一起成为所谓「反党集团」。华北会议之后，「仍需进行一段艰苦教育工作，如北京军区、华北局旧机构、河北省革委和河北省军区、天津市革委。而军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关系，连山西、内蒙在内，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处理。因此，中央的发言和会议的传达，要很好地掌握分寸，有步骤地进行」。毛泽东阅批：「照办。」

１月２３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据董保存先生，周恩来讲：「第一，你们认为华北问题还没有揭盖子，我认为是到了高潮。我不同意华北会议还没开完即刻改组北京军区。第二，你们硬把郑维山向陈伯达一边拉，这个不好。这样把郑维山向陈伯达那个方向拉，郑维山就可以不作检查只等审查。第三，处理结果向主席报告要写两个意见，一是郑维山作检查继续工作；二是北京军区改组，郑维山免职。把这两种意见报告主席，主席批哪一种意见就按哪一种意见执行。不要只报一种。」

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根据《毛泽东文稿》中<对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的批语》的注释得知，毛泽东在周恩来１月２０日送审的讲话提纲初稿上批示到「已看一遍，大体可用。明天可能谈一次」。１月２３日，毛泽东约周恩来等谈话，商议周恩来的讲话提纲。根据毛泽东意见对提纲作修改后，周恩来于当夜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在送审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同意」；并且又在信封上写了一个批语「完全同意」。１月２４日，周恩来即根据此提纲，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会议全体大会上作总结讲话。这个讲话提纲后作为中共中央１９７１年第６号文件印发。

据此，可以得出，关于北京军区改组等意见在２０日即已经成为定局，而且在周恩来递交的《华北会议对郑维山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和《华北会议对李雪峰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两份材料中已经完全认定郑维山是站在陈伯达一边的。

１月２４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对于华北会议作出总结（中共中央１９７１年第６号文件印发）。周恩来在讲话中严厉的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动辄骂人训人。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他对同级以家长自居，对下级蛮横霸道。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的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李雪峰还在庐山会议上搞了准备翻案、算账的材料，这次会议上又派人回去销赃灭证，在背后捣鬼。他对有的同志的揭发批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这种态度如不转变过来，那是很危险的。

同时周恩来宣布了改组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免去了郑维山的司令、李雪峰第一政务的职务。

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李雪峰在检讨中除了「反党集团」、「阴谋」外，李雪峰什么都认了。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周恩来、江青都相信了，认为李雪峰说清楚了。只有毛泽东一人不相信。到了中共「十大」时，周恩来，甚至包括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李雪峰没大事，不应该划为林彪的「大将」，但还是开除了李雪峰的党籍。当时，项目组副组长纪登奎曾问周恩来：是不是和毛主席说一说？周恩来说：你代表我们去说。毛泽东说，不能原谅，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意思是李雪峰没说实话。　　纪登奎则回忆说：他向毛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谁知毛主席听了以后，高深莫测地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

关于周恩来指责「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更是信口雌黄。１９６８年各派内斗不止，导致铁路运输不畅。河北磁县两派把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广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对此中央采用一律镇压的策略，无论你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１９６８年２月８日，周恩来电话指示郑维山：「维山同志，据铁道部军管会报告，邯郸地区两派发生武斗，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广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你们马上派一个团到那里，制止武斗，恢复铁路畅通！可以按『二六命令』处置，『二六命令』你们可大量印发，广泛宣传……」「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于是对于不听指示的当地造反派，解放军最后采用了武力镇压的方式。华北会议上，只有黄永胜为郑维山讲了话。黄永胜对全体与会者说：「磁县事件，是上面的责任。」

第九章　「林彪事件」：进入新一轮的斗争

１９６６年，周恩来在揣摩毛泽东的旨意后推举林彪为接班人，并在文革中多次对此加以解释。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林彪都是坚定的文革派。周、林二人都是毛泽东发动和推行文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林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军队力量的「橡皮图章」，而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其角色绝非官方定位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分析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对比两者在文革中的表现和作用，周恩来的真实形象无疑会更加清晰。周恩来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互相尊重与支持，现在大陆官方将周恩来与林彪关系解释为周恩来与林彪进行了「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这一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无视事实和有意误导，无非就是想人为地区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一方面拔高周恩来的伟人形象，另一方面则继续抹黑林彪，让林彪充当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林之间的裂痕逐渐公开和扩大，周恩来不断揣摩毛意图，开头还试图调和毛林的关系，但是随着毛搞掉林彪的意图明显起来，周也就根据毛泽东的调子对逐渐和林彪等人划清界限。在处理「林彪事件」前后，周恩来再一次充当了毛的「第三只手」。事后，周恩来又对划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加以整肃。

一、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

１．周恩来的「积极」、林彪的「被动」

林彪曾经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　　实际上确实如此。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揣测毛泽东的「圣意」后，推荐林彪为接班人，此后二者的关系由此变得非常之近。特别毛泽东当时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另一个是周恩来。但是当名单传到周手上时，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林彪就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对此，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多次给以解释：「从七大开始，每次斗争，都感到刘少奇没有多少马列主义水平，看他二十年了，到十一中全会，就决定了，刘少奇不能挽回了，他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难道你能说主席包庇刘少奇吗？问题是要逐步认识的。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挂帅，就看出林彪同志思想水平高，认识水平高，就认识到林彪同志是正确的，能紧跟主席思想的。一九六五年大家逐步认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一九六六年就解决了，水到渠成，心服口服。」

后来邓颖超在庐山会议上曾经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邓颖超还争功似地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　　当然，当毛林反目之后，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颖超都对此再也不提。

表面上林彪是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章上明确记载的接班人，可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实权。文革中任何大小事项的决策权都在毛泽东，而执行权则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特别在文革初期，林彪看起来更像一个「橡皮图章」。无论是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是一月夺权之后在建立各地委员会的过程中，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远远大于林彪。

文革初期，林彪接连在８月１８日，８月３１日和９月１５日对红卫兵讲话。这些讲话被国内党史论者「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从而导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各地迅猛发展，势如燎原。」　　周恩来在９月２５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也承认「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　　吴法宪说：据我所知，林彪历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都是由中央文革代为起草的，林彪从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每次都是照稿宣读而已。

何蜀先生在在查阅大量有关「文化大革命」史料后认为:「现经常被用来当作批判靶子的一些『林彪讲话』,其实并不全是他自己的,大多是别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写好并经毛泽东审定后安排他去照着念的;讲话表达的也并非他的个人思想,而是表达了『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的意图和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高层领导集体的思想。」

何蜀先生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史实来证明之:1966年8月31日,正值「红五类」红卫兵(或曰「血统论」红卫兵)制造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对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斗大加赞赏和鼓励。在接见之前,林彪审定别人为他起草的讲话稿时,在「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边,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审定时批示给林彪:「这样修改很好。」　显然,这篇讲话基本上是别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代林彪起草的,林彪所加写的只有那么两句,其内容与前边的话的意思并无多大不同(等于是同义反复)。毛泽东认为「这样修改很好」,可以看作是对林彪的鼓励。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又作了讲话,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专门讲到了两种不同的「炮打司令部」,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些「牛鬼蛇神」企图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这篇讲话稿是接见前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宣部部长陶铸送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加写和改写,强调了不能容许「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这段话,对当时刚刚兴起的「炮打司令部」造反浪潮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次讲话中作这样的强调?这是值得研究的另一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讲话并非林彪自己写的,代表的也并非林彪的个人意愿。因为反对「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显然不好用来当作林彪的「罪行」,一般文革史著作很少提及这段话。

何蜀先生则指出,关于9月15日接见时的讲话,还有一个细节不大为人注意。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第137页)的有关注释可知,在这次接见之前,陶铸曾将替周恩来起草好的讲话稿送周审定,周于14日将讲话稿送陶铸时提出:「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讲即可,已函请主席批示。」陶铸在将讲话稿送毛泽东审定时写道:「我意明天还是林总与总理两个都讲较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即批示:「可以由两个人讲。」可见,当时的讲话,不仅稿子是由陶铸组织写作班子(当然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起草的,而且,由林彪一人讲还是由林彪与周恩来两人分别讲也是由毛泽东最后决定的。关于1966年国庆节庆祝大会(即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林彪讲话,有的文革史著作提到林彪和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习惯于从两人的讲话中各取所需,引出不同的句子,强调林主要讲造反,周主要讲纪律,或者说林的讲话是高调,周的讲话是低调,等等。其实,在了解了当时这些讲话出笼的内幕之后,这样说显然就不准确了。

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周恩来不仅在同红卫兵时候讲话火气十足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参与具体的工作,林彪则是只讲讲话应付了事。

周恩来在8月5日清华万人大会上讲:「我这次来清华是老老实实做学生的,来学习的,也是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

周恩来在８月１８日号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

８月２７日周恩来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

在８月３１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周恩来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工农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类似的讲话举不胜举。

鉴于当时历史情况，周恩来与林彪都要表态，但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不仅是口头上的拥护者，而且还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在以后的文革岁月里，周恩来堪称之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没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推动，毛泽东的任何疯狂举措都几乎难以推行。即使周如国内党史界认为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但实际上周是毫无保留地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方针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事实上，后人只能考证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周恩来的内心真正想法外人很难得知，所谓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也就只能是臆测了。相反，如果从周恩来对其亲属们的劝诫，则完全可以得出周恩来是非常自觉的投入到这场运动。文革发动之初，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曾经向周恩来诉苦，周恩来的回答则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共产党员要能经风雨。见世面。」　无独有偶的是，周恩来亦曾经如此训示过其侄女周秉德。周恩来指责周秉德是为当时被批判的省委说话。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1月２６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批判薄一波、陶鲁笳的斗争至今没有展开，学校将薄一波抓回来后没有示众，都斗争薄一波，但不揭发，薄一波领导财经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么多人批判，为什么现在批判不起来？抓彭、陆、罗、杨不怎么困难，为什么抓薄一波那么困难？今天工交口都在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几年，工交口成立党委，管各部党组，党委，部长。管得很深，为什么各部揭发得很少？」

１９６７年3月3日周恩来在批判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的会上说：「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像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张仲瀚随后即被关押入狱。３月２８日周恩来接见安徽各界代表时说：「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丁凯文先生就写过：被周恩来点名打倒的省级领导人还有广西的贺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东北局的顾卓新、喻屏等人。事实上，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打倒的人数量之多，一点不比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少，从周恩来文革期间的大量谈话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原领导人几乎全被打倒了。　因此周恩来是对毛泽东文革路线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所有文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周从头至尾几乎都参与。这自然也包括毛泽东打倒众多原一线干部的策略。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角色决不是所谓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而已。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被逼自杀后，周在１９６７年1月１４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却将阎定性为「叛徒」，周说「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周恩来同日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讲话时，周再次说「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

被称之为「大树参天护英华」和「殚精竭虑护英华」的周恩来，讲这种煽风点火的话绝非少，而是举不胜数。然而这些语言，在官方的周恩来传记，自然是一点都不会提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　按照《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的说法，在文革中，毛泽东的很多决策，事先林彪都毫不知情，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杨成武也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　高文谦先生甚至认为：「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周恩来绝非官方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所言：周恩来的确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但周「很不理解」，是「违心」和「被动」的，且设法纠正过火的、极端的做法，努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

对于大串联，王力回忆说「大串联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说各地学生到北京要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他才高兴。」由于这是毛坚持要做的事，周恩来也是坚决服从的。

但是由于外地学生来京是毛泽东一手制定的决策，虽然这给周恩来的国务院出了很大的难题，周恩来还是坚决执行服从的。至于具体的行动，毛泽东的八次接见红卫兵都是由周恩来精心策划安排，无论是组织、安排，还是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周恩来都严格把关，精心策划。　第一次，周恩来安排在天安门由毛接见红卫兵，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结后周恩来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以后的七次每次接见之前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根据１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的报道，１１月２５日和１１月２６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看，毛主席先

后检阅了１１００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则接见了２５０万。

而且正如上述，从「一月夺权」到「军管」再到各地委员会的成立，都是由周恩来具体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即使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是保证毛泽东的文革大略得以发动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尽管林彪在名义上是中国级别最高的副总理，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国务院的工作。林彪的影响力仅局限于军队，但就是如此，周恩来在有关军队的实际运作中，其作用远甚于林彪。周对军队事务极感兴趣，随着「文化大革命」展开，周密切地介入了解放军的所有主要决策。据林彪手下一位将军的儿子说：「我父亲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发生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说军委办事组〔他是其中的一位领导成员〕一共处理了１３００多份文件，没有一件毛主席不知道，没有一件周总理没有亲自处理。」

自１９６７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陷入了造反夺权的动乱之中，毛泽东不得不派出解放军对全国实行大规模的军管，由此开始了「三支两军」。但是作为军队主管人物的林彪却基本上毫无作为，而是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的周恩来，不仅过问军队的部署调动、人员安排，且常常亲自发号施令，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在军队参与「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周对军队的掌控能力。

首先由周恩来在1月２７日传达毛泽东２１日的指示时：「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１９６７年1月２５日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说「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抓。」2月１７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三）接管后停刊几天……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　同月２７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委会，并建议对云南亦先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同意。２８日周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此外周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谈云南实行军管事宜。

3月１３日周恩来在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谈及军管问题。周说「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此后，各省部级单位甚至县市的军管问题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处理。３月１８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讨军管问题，并致函毛泽东：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３月２３日周恩来要求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照办。４月２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刘贤权任军管会主任。５月１９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说，派军队保护造反派；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７月２８日周恩来给新疆军区的指示说，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有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们是问。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５月２７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ＸＸ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２８日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如此深入介入「三支两军」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林彪作为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对「三支两军」却极少介入，除了表态支持毛泽东指示外，亦未曾发布过什么特殊命令。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０日的军级干部会上，林彪亦到会讲话，在谈到军队支左问题时说：「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持工业、支持农业、支持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林彪还说：「支持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

周恩来还直接下令调动军队。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周恩来直接把电话打到当时陆军XX 军在西安市的军部，要军长胡炜派部队对某武器弹药库严加保护，并说必要时，可以开枪！１９６８年５月下旬周恩来再次命令胡炜去保卫秦岭山脉深处、宝成铁路附近的一座国家战略储备油库。

这些都充分说明周恩来对军队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其作用在实际上甚至超过林彪。当时作为「大秀才」的王力则说：「林彪的态度是：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　林彪自己则说：「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　这些无疑是对林的「无作为行为」做了最佳的批注。

对于地方事务，虽然毛泽东在批示时也指明林彪参与，但是实际上林彪基本不管。２月７日，毛泽东对西藏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表明看法的报告

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于次日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肖华同张国华、陈明义谈西藏问题。１９６７年５月８日凌晨，周恩来再次与有关人谈西藏问题。　在周恩来的主持研究下，毛泽东要的答案出来了。张国华是好人，周仁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其梅（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是坏人，被中央宣布定为「中国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打倒，王其梅也成为「军内一小撮」之一，以后被迫害致死。

２．周恩来与林彪的的互动、两人的不同

在不涉及到实质性问题的前提下，周恩来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厚道。

但是一旦涉及到实质性问题，周同林等人很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周恩来不会无视毛的存在。无论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的态度。王光美曾经回忆道：「陈云同志曾就包产到户和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业生产的问题，同一些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来同志表示还是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　周恩来唯「毛」首是瞻的形象被王光美的短短一句话活脱脱的勾示出来。

除此之外，更进一步的说，周对于毛是无条件的忠诚，当任何个人与毛发生冲突时，他均会不问是非地站在毛的一边，非常熟练的对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处置。这也是周恩来的存在价值所在。

即使官方的《周传》等书籍时，周对毛几乎没有一句劝谏，在「反反冒进」之后，他对毛的错误路线从来都是大力倡导、不遗余力的推行的，都时用服从大局来解释的，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对毛的错误做法从来没有过反对意见，只要是毛的指示明知是错他都要想尽办法坚决执行。一旦毛的心思有变，周恩来更是积极揣摩毛的动向，以便更好的为毛服务。

林彪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决非官方所称的「周恩来跟林彪、四人帮作了不同形式的斗争」、「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与周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关系。这种关系纪体现在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上，也体现在林对周的工作上的支持。

在１９６７年的春夏之交，北京以及其它地方有一股「打倒周恩来」的浪潮。５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２日，张建旗将他３月３１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抛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２３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６月１４日，「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成立。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的「１」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高文谦先生说：此时是周恩来在政治上最难过的时候，社会上倒周的势头甚嚣尘上，周本人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内部不断遭到江青组织的围攻批斗，日子很不好过。这时毛泽东正在南方巡视，林彪利用坐镇北京主事的机会，有意拉周一把，出面表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对他表示：你要大胆主持这个会，放手处理问题，我现在情况不熟，身体不好，全靠你了；还特地向军队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

周恩来对林彪的这种关照自然心存感激。１９６７年夏，毛泽东命杨成武回京单独向周汇报情况，毛强调只对周恩来一人讲，但周仍然坚持要杨还需向林彪汇报，并请杨转告毛是周让其向林汇报的。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录：李单独向周汇报毛的病情，并说不可告诉其它人，因为这是毛严令禁止的。但事实上周还是向林作了汇报，当李志绥质问周恩来的时候，周则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不报告他呢？」李志绥在书中还透露说，「九?一三事件」后，汪东兴派人查抄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宅，抄出很多林周的合影，汪将这些照片收了一大包给了周，周对此感激不尽。

在毛泽东于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会见北京京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谈话上。这是个带有私人性质的谈话，那么在这次谈话中，不经意的二次周的谈话，就可以折射出周林的关系。第一次，当老毛批评蒯司令的井冈山乱打乱闹时，林彪表示：值得，损失最小。随后周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当谈到林彪是接班人时，周表示：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实际上，周恩来对林彪做了大量不合实际的吹捧。在此仅举一例。后来，周恩来把对林彪的吹捧至极致：「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的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像林副主席中央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定下来呢？」　接班人要用法律的形式定下来，也是古今中外的新鲜事。翻看国际共运史来看，无论是哪个政党，也无此壮举，周恩来这提议，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整理了一份通报并由中央下发全国，即《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１９６７.１１.２７；中发〔６７〕３５８号）。通知说：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丁凯文先生认为：林彪领导下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九大」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主军之时，还是后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军委办事组当权之际，军队系统不仅从未参与过中央文革倒周的活动，而且大力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的工作，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有必然地联系。　有一次叶群专门告诉杨成武和吴法宪，一定要积极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叶群告诉吴法宪，林彪当面对周恩来表态说：「我的身体不好，一切工作还希望你鼎力相助。」

「九大」召开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曾对吴法宪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周恩来要对此事负责。吴法宪会后直接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吴到毛家湾，对吴说「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

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事后吴法宪和叶群都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　另一件事是：「九大」后江青擅自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除江青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会上一是大肆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二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江青指责周恩来「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看不清，容易跟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江青炫耀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办错了几件事，还有检讨在我的手里」，并说「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江青还说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面对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黄永胜等人当场与江青顶了起来，随即宣布退场。黄永胜等人会后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让黄、吴二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并要叶群立刻联系。邱会作则去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通报有关情况。周含着泪握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但是毛并未在意此事，只是对黄吴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

除了这种相互支持的互动外，周、林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是较为一致。例如解放老干部。１９７１年万里和赵紫阳就是在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大力支持下得到解放，万里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与此同时，经过黄永胜等人的艰苦努力，还有一批军队干部如杨勇、张宗逊、梁必业、张震等人也都榜上有名要被相继解放。

林彪与周恩来有不同的地方。林彪根本不怕江青，甚至当面怒斥江青（详见下文）。江青要整周恩来，林彪都对周恩来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但是周恩来不会直接同江青抗争。

更多的不同是两个人对事情的思考不同。林彪在私下从不赞扬文革，却以「文化大要命」称呼文革；以「武化大革命」形容武斗，充分体现了林彪对文革的真正看法。　１９５９年，林彪就在私下里指责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而反修斗争则是「骂绝了，做绝了，绝则错。」　刘少奇倒台之时，林彪在私下里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　对于文革中的动乱、发枪、支左等多个方面，林彪都和毛有过不同意见。更为深刻的是林彪对于社会的看法和毛泽东根本不同。林彪认为「人一切为了改善生活，故只有有关改善生活的行动才能动员大众，人的需要什么就什么。」　林彪还认为：人民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的及其它东西。不可忽视人民的生活，而无目的去干别的。林彪在建国之初在中南关于土改等政策都是相当右的。如果说林彪是「勉従虎穴暂栖身」还有一定证据的话，那么对于周恩来有又什么证据呢？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林彪拒绝了毛要其见斯诺的要求，并私下对家人发泄对毛的不满，揭他的老底，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并愤愤地表示：「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一一笔者注）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到了１９７１年5月1日，林彪根本不想参加，后经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再三劝说后，才勉强到场，却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对林彪也视若不见，冷淡之极。林彪仅仅坐了

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最后导致连一张合适的合影都没有留下来。周恩来为此大为恼火。

周恩来绝无可能这般私下对毛不满，更别说当面「摔脸子」了。

１９６７年5月２１日，周秉德从西安回到北京，吃完饭时同周恩来谈起了西安的文革局势。周秉德批评那些学生造反派斗老干部的行为。周恩来则说学生大方向对，只要符合「十六条」，拥护党和毛主席，就是革命学生。周秉德实在不理解：些造反派，残酷批斗革命老干部，尽做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也算大方向对吗?」周恩来怒道：「你好像是省委派来做我的工作来的。你总是袒护省委，为省委讲话，你再这样我就把你赶走了！」最后，周恩来说「我有错误，但我跟主席。晚年不是消极的保持晚节，而要积极地保持晚节！」

周毛都去世之后，社会上起来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由此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

３．周恩来调解林彪和江青等人的冲突

林彪和江青的真实关系，是不是真的如官方所言「相互勾结，篡党夺权，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直至１９８０年后被合二为一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　但是随着运动的开展，林彪与周恩来和江青等文革派的态度则变得大相径庭。而这也是林彪最后得以很快出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１９６６年的１０月份，造反派开始冲击部队。１９６７年1月１４日，肖力(毛泽东的女儿)控制下的《解放军报》刊出标题是「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这是最早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这篇社论号召：「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

各地的造反派有了这个上方宝剑，军队的各级领导人就遭到了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样的厄运，被揪斗、游街、罚跪、撕掉领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就悲惨的死于非命。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叫苦不迭。此举大大的刺激了军中的老帅们，中央文革同代表军队势力的老帅们的矛盾一下子就浮出了水面。1月１９日，叶剑英同徐向前因为肖华一事，对拍桌子，「大闹京西宾馆」。

２０日，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

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揪斗肖华一事，引起了林彪的极大愤怒。林彪叫秘书打电话通知江青专门来一趟。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　　张云生说「林彪脸色气得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张云生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气成这样。」林彪对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张云生惊得目瞪口呆。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肖华，抓肖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关于林彪和江青之间，据说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找枪，「毙了她！」

吴法宪回忆说「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吴法宪还说：「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于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这也是林彪主持制定「军委八条」的重要背景。

但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靠山是毛泽东。周恩来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中央文革是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生的力量。中央文革，在两年前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肯定了的。那个时候，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下，中央文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前线发动群众的机构。」　　从本质上来讲，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没有隶属关系，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听命于毛主席的。

但是林彪远没有周恩来看得这么清楚。江、张、姚的政治数量级无法企及林彪于万一，林彪曾鄙夷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种名字他过去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林彪不只一次骂过江青而且还时时刻刻提防江青染指军队。林彪嘱咐叶群：「不能让这个女人插手军队，军队不能乱。」但是毛泽东通过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江青出任顾问，并接受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以利于江青在军队势力的渗透。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只有关锋一人与会，其它人都躲避开。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不平。黄永胜就严厉批评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等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

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笔者注：周恩来曾经说谢富治在徐向前和杨成武之间任过一段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不买江青的账，认为军委办事组只能向毛、林、周三人负责。原来军队调动命令报告上名单冗长，致使兵力调动迟缓且易泄密。于是毛泽东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黄永胜依令而行。江青则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等：「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江青扬言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写检讨。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黄吴也认为没有错。周恩来、康生和姚文元则和黄永胜和吴法宪谈话，要求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原定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之事也受到江青的阻挠，周恩来则出面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发话，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黄永胜回来之后，毛泽东在江青不在场的时候，告诉黄永胜：不要怕江青，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　　黄永胜等人就真的信以为真了。

由于周恩来主持文革碰头会，这样夹在中间，事情难办。吴法宪说：「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周恩来提出，黄吴李邱要和江青等人在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周特别叮嘱这些丘八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说话。不曾想，黄吴李邱遭到江青破口大骂：「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么？」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黄永胜等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周恩来也觉得江青太过分，就把事情报告了毛。毛指示江青要检讨。周再次叮嘱黄永胜等人不要「放炮」。江青的检讨很不象样，吴法宪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知情的汪东兴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江青听了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气得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

为了弥补林彪和江青的间隙，周恩来主动提议，把江青的行政级从九级提到五级，林彪同意了，并和周恩来一起签名。

但是林彪对于江青等人的敌视是很明显的。１９６９年９月，林彪到江西视察时讲：在中国，小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现在就要注意。他还明确说：据我看，上海就是小资产阶级掌权。　　林彪向毛泽东推荐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事后向江青讲，林彪就是不想让我们插手军队。张春桥曾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

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

二、在毛、林冲突之间

１．周恩来劝说黄、吴、李、邱作检讨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布置的批陈整风，矛头就对准林彪。１９７０年9月１９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纪登奎、陈先瑞、吴忠的谈话中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小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泽东为了敲山震虎，第一步是以汪东兴的检讨为诱饵，利诱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也检讨，借此顺藤摸瓜，可以直捣「黄龙」。

9月２２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２１日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后，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批件送给林看，提议先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指出。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

其实早在庐山上，周恩来就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8月２８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　叶群对吴法宪说：「你为了捍卫主席思想，主观动机是好的，不要检讨。」但是周恩来对吴法宪说：「现在要保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做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周恩来给吴法宪出点子，在检讨中要重点写自己，对林彪讲话「理解错了」。现在周恩来找上门来了，吴法宪不检讨过不了关，叶群对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只要不牵涉首长和黄总长，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劝吴法宪，检讨中不要涉及叶群和他们。

9月２９日，吴法宪检讨。１０月１３日，叶群检讨。毛抓住了就不放，１４日批示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庐山发生的问题，是「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因此「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但是黄永胜等还没有检讨，大鱼还没有钓出来，毛泽东再次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但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三人迟迟不写检讨。

黄永胜觉得自己是半截子上的庐山，自己有什么错？根本不需要作检讨。周恩来让邱会作做黄永胜的工作：不是发言不发言的问题，主要是检讨宗派主义，让主席高兴点！　这就是周恩来喜欢检讨的原因和目的？！

１９７１年2月２０日，毛泽东批评军委办事组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

一下，就动不起来，」要求「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次日，江青传达了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周恩来以自己为例，联系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教训，极力劝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做检讨。　　在周恩来这种引导下，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以及其它政治局成员也做了检讨。

２８日，周恩来就中央军委办事组２６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检讨报告致信黄永胜，提出：「如果军委办事组这个报告，不提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检查，事情的发展就好像接不上；而你不在这报告上单独写几句，也对主席的几次提示和批评，难以交代，时间也耽搁了。报告上还应写几句，在军委办事组开会后，各总部、各军兵种都在继续进行批陈整风，情况如何，也应写上。」同日，黄永胜按周恩来信中要求，补充了有关内容。

3月份，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交出书面检讨。但是所有的检讨都没有涉及到林彪。毛泽东一时无奈，只能扩大黄永胜等检讨的范围。３月２３日，毛泽东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书面检讨批示给周恩来，并通过江青转告说，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下午，周恩来与康、江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周向汇报毛泽东后，毛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3月２９日晚，周恩来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批陈整风几次会议情况，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林彪听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但是丝毫没有批评黄、吴、李、邱。

事后，毛泽东询问林彪有无批评，吴法宪说挨批了。周恩来帮忙圆谎：「批了，批了。」吴法宪说，这下子毛泽东高兴了。

１９７１年4月１５日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京举行。但是在周恩来前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并表示希望林彪出席时，用李德生的话说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出席。　　但是在１８日，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上同他们串联的事情，当晚黄永胜就告诉了叶群。林彪决定１９日返京亲自坐镇，准备在必要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等抗衡。　　鉴于林彪回京，毛泽东决定会议延长，由周恩来出面，送去批陈整风会议的有关材料，并通过叶群转话，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但是林彪一口回绝。周恩来私下里对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周恩来以为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可以为毛的欢心为毛做检讨。

既然林彪就是不肯与会讲话，「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就只能草草收场。毛泽东以退为进，一方面稳住黄吴李邱，另一方面要做足功课，出手必胜。

周恩来在４月２９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作总结讲话指出：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经过会上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讲话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

迎帮助的态度。

周恩来复杂的一面在这前后也表现的非常明显。在庐山会议之时，由于毛泽东还没有示意出是要打倒林彪。９月７日，在林彪下山之前，周恩来看望了林彪，但是没有说话。林彪特意叮嘱黄、吴、李、邱有事多向周恩来请示报告。

当毛泽东批示吴法宪等人的检讨「可以了」之后，在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时，在东北小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上同他们串联的事情。陈锡联将此事汇报给周恩来之后，周恩来打电话安慰吴法宪：「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我要王辉球、王秉璋他们去向你说明情况。」

对于周恩来希望林彪检讨的态度，林彪并没有直接表态。但是林彪私下里对黄吴李邱则说：「根据我的看法，你们没错。你们检讨我不怪你们，也不会生气。但我不会检讨。」

２．周恩来要和林彪划清界限了

毛泽东是对林彪不满意，还是因为传统的看法因为林彪代表的军人势力的崛起让毛泽东担忧？

据说是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篇社论作了严厉申斥的批示，因为「发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是就在这同一期《红旗》杂志上，除了这篇社论之外，还有另一篇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同样有「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对它作这样的批示？在「７２０」事件之后发表的若干社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有时还一天同时发两篇社论中，几乎每篇都有这个提法，为什么毛泽东一直没有「发现」并作出这样的批示？

两篇都有「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有一个提法是《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中没有的－－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此文突出的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颂扬林彪，大段大段地颂扬林彪对建立人民军队作出的贡献，称颂他「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由此何蜀先生尖锐的提出对林彪的这些颂扬，能不引起毛泽东的不安和反感吗？　　实际上，杨成武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在上海虹桥宾馆，有一天，毛泽东非常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还要杨成武回去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要犯错误。　　这里的个人指的就是林彪，这是对舆论宣传林彪的直接否定。对于周恩来，也知道了毛林之间关系的玄机。几年后，毛泽东南巡时明确说：「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

也有不少的文章提出，是因为军队势力的极度膨胀导致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事实上军队势力的极度膨胀同林彪权势的增加并不存在必然关系。「九?一三事件」之后，到「十大」的时候，各省省委书记中，军人占４７％，第一书记中仍然占６６％。　　所以毛泽东真正忌讳的是林彪本人的「权高震主。」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个讲话，引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共鸣，竟然「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表面上矛头对着张春桥，骨子里否定文革。毛泽东坐不住了。毛泽东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

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就同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的所作所为。紧接着８月２８日就要求吴法宪做检讨。

当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林彪时，出利害关系的选择，无论原来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如何，周都不会冒主席之大不韪，为林彪说一句好话。相反，周一如既往的如同对待彭、罗、陆、杨，对待刘少奇一样对待林彪。落井下石是必然的。

虽然周恩来劝说吴法宪争取主动尽快写出检讨是为林彪讲话承担责任，甚至随后建议毛泽东删除为批陈伯达而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涉及到吴法宪的内容。周恩来甚至在毛泽东发怒之后，仍然在２６日一大早，周恩来就全会印发林彪开幕式讲话一事致信康生：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之后认真读两遍，有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于午前退我亲收。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垦。　午前，康生将林彪讲话稿退回，并告，我看了两遍，只在第三页上改了一个标点。如果林副主席同意发表，我看可以印发给到会同志们学习。

但是周恩来开始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并有意洗刷他本人与这场风波之间的干系。为此，周在追查中示意吴法宪应该在政治局决定全会讨论林彪讲话的问题上替他讲几句话。吴法宪果真照做了，把责任担了起来。不仅如此，周还一再要吴法宪出来证明他当初曾经批评过黄永胜不愿留守北京，非要上山这件事，以便让毛知道他并没有上林彪的这条船，事先并不知情，而且是有过斗争的。

此外，周恩来还设法补救他过去对张春桥一直比较冷淡的态度，刻意在一些场合当众表扬张、姚两人，说他们这回姿态高，照顾大局，不计较别人的误解，事后还主动在发言中讲了维护林副统帅的好话。８月２９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曾经连续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

对于毛泽东想通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检讨，进而把林彪揪出来的战术，周恩来也是极力配合，不断催促他们做检讨，其中不乏以自己也做过检讨来劝说。后来毛泽东果然在叶群的检讨上做出严厉的批评。当初搞刘少奇，不也是先从王光美入手么？

更为明显的是周恩来对待林彪本人的态度的转变。林彪被明确树立为接班人之后，如果毛、林、周等国家领导人依次而出会见内宾和外宾时，周恩来总是将随行的人有意压后几步，以突出毛、林二人。这在文革历史纪录片中是可以看到这个细节的。　周恩来为了突出林彪，当其和林彪一起对公众讲话时，也刻意注意突出林彪。例如在１９６６年的「８１８」讲话中，林彪先讲，周恩来随后。周恩来特意在呼喊「毛主席万岁」时比林彪少喊一个。林彪喊了三个而周恩来只喊两个。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份，毛泽东以下发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同斯诺的谈话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毛泽东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

要，要降温了。

为了配合毛泽东的攻势，在１９７１年1月２6日，周恩来找出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８月和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所发两份文件，　其中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8月４日中央批准同意陶铸的报告上写到：「此件不因人废言，因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须严格执行。」周恩来又在原报告所写「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即『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照主席的指示办」处批注：「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无止境的，永远不能说『顶峰』，说『最高最活』。」周恩来还在在逐段批注时特意注明：「林副主席在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为反对刘少奇的不提而对抗毛泽东思想，用此提法，有鼓舞全党全军全国人心，打击刘少奇反动气焰的必要性。」

洞察出此间奥妙的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2月１８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简报第四条反映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批示：「第（四）条说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然而此事的始作俑者就是周恩来，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来在大会重点发言中公开宣称「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当时周恩来这个不「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的发言，吓得林彪赶紧打断周恩来的话，说：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还当场哭了起来。

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5月１０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讲述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周恩来在讲述「井冈山会师」时说：「当时林彪是个连长，陈毅同志是个团的党支部书记。」在这里，周恩来丝毫不再提毛林会师一事，而且把当时仍然为右派代表的陈毅作为林彪的上级讲出，这与当初周恩来极力对林彪的吹捧形成鲜明的对比。更为惊讶的是，周恩来再谈话中表扬了邓小平。（笔者注：将在第１１章详述。）

在１９７１年8月，周恩来对一幅准备对外发表的画有毛泽东、林彪在一起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批示道：「这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这实际上是在否定谁呢？。

到１９７４年杨成武复出的时候，周恩来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　罗瑞卿解除「监护」后，周恩来也曾让邓颖超捎话给罗瑞卿，希望他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身上，把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

三、「九一三事件」

１．事件突然爆发

笔者认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竟然对毛的禁脔张春桥下手，而响应者尽然群势汹汹，形成潮流，「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使毛泽东深感忧虑，于是拿掉林彪成为必然之举。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步步紧逼下，尽管周恩来一再劝说，林彪还是没有行动起来，

公开认错，主动让位。

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向陪同周恩来前来汇报的熊向晖了解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后，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陈长江回忆主席对接班人林彪越来越不满。到１９７１年８月，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顶点。谢静宜的丈夫苏某在空军机要局，通过谢静宜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主席决定南巡，行前主席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跟着林彪走。难道解放军都会造反？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解放军不听指挥，我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８月５日，叶群身体不适回到北京检查。８月６日晚，邱会作带夫人胡敏来到毛家湾，谈到深夜。周恩来特意打电话问候，听说叶群正在接待客人，马上追问是那些客人。

８月９日周恩来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中央日常工作，并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女）转告。

１９７２年５月，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６０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７份，传达范围非常狭窄。去年７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捣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这说明周恩来清楚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在南巡中的一系列行动，其矛头都是对准林彪的，显示出毛已下决心将林彪的问题端出来，彻底解决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实际上，毛在南巡前已向周恩来打了招呼，其行踪也只有周一人知晓，周对此心知肚明，密切予以配合。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４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同沿途党、政、军负责人谈话，讲述党内路线斗争历史，批评并揭露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及背后支持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活动。另一方面，周恩来年８月１６日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并告诉林彪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一方面周恩来于９月１０日请示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等事宜。毛泽东批，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另一方面，「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黄、吴、李、邱均有重任，黄为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等也是副总理，李、邱也是副总理；吴是副委员长，只是大家不理解，主席为什么要康生当委员长，而不让朱老总当委员长，总理还叮嘱这几个将军在会上不要再议，不要放炮，主意不是他们几个的。

笔者认为，此举措完全是想稳住黄永胜等人，不要把黄永胜等人真的逼向林彪，让林成为「孤家寡人」。虽然诚如后来黄永胜说我虽然忠于林彪，但是更忠于毛主席。但是毛自己

确要小心行事，犹如文革初要把北京城变为「水晶球」一样才敢回到北京。但是一旦将林彪拿下，一向号称「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的毛，是不会留用黄永胜等人的。当初杨成武倒台之后，叶剑英等人遭到毛的抛弃，也是此种原因，无非叶剑英是和杨成武都是踩着罗瑞卿的肩膀上来的罢了，更何况在「文革」中同林彪一起对抗过江青的黄永胜等人呢？况且党内的斗争模式早已固定，等着你腾出位置的人和你曾经整过的人，正眼巴巴看着你倒霉，早已经准备好大石头了！

周恩来对于南巡中的毛泽东保持着「热线」联络。毛泽东向周交代林可能会被他逼得狗急跳墙。　9月3日，在南方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将经毛泽东阅改过的他和华国锋追记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稿专送周恩来处。　9月１１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前往长沙听毛谈话后返京的华国锋谈话。　9月１２日，毛泽东火速回京。毛泽东的专列路过济南的时候，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给周恩来打了个电话，汇报了专列离开济南的时间。

当夜「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的飞机还没有起飞，周恩来对李德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林彪「要逃」！　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夜行不安全，而且说要去看望林彪！叶群急忙推辞。　当周恩来得知有飞机在北戴河机场，连续采取了以下关键措施：

（１）周恩来叮嘱吴法宪如果叶群来电话要去调飞机，则不能答应，说要先请示我才可。吴法宪照做了。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吴法宪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做决定，要请示总理。这可是原先没有的事！叶群接着打电话找黄永胜，但是黄永胜被周恩来「留在」人民大会堂了！叶群找不到黄永胜，这才慌了！叶群急忙冲向林彪的卧室：首长，黄吴李邱被（周）抓了，现在就要派人来抓你了！

（２）周恩来同叶群讲完电话后，在凌晨零时左右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告诉了毛泽东，并且随后毛泽东就搬到人民大会堂。

（３）当林彪的座车大红旗从其驻地冲向北戴河机场时，８３１４部队中队队长肖奇明开枪射击，击中大红旗后座玻璃上。事后周恩来还表扬了肖奇明，枪开的好！

无论叶群一方还是毛、周一方，都相互把对方当成了敌人！

当天晚上，周恩来还告诉了李作鹏一条奇怪的命令－一道命令把黄、吴、李都绕进去了！当叶群和周恩来通电话时，叶群对周说林彪要「动一动」，是「天上动」。周恩来先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后，随即令李作鹏：山海关机场的专机不要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令才能放飞，但是后来则称李作鹏将此命令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虽然后来李作鹏回忆说：9月１２日晚上在海军大院，周恩来给他打电话，让他通知山海关海军机场。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李作鹏夫人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以后审理「两案」时说李作鹏说一人让起飞就起飞，而李作鹏坚持说他说的是四人让起飞才起飞，他没有篡改。其实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不重要。

如果要拦堵飞机，周恩来可以直接通知机场。周恩来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而且这个命令，周恩来并没有告诉黄永胜和吴法宪，也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周恩来的命令就是

让飞机无任何起飞的可能性！　　若是周恩来本意如此，那么可以直接通知机场把跑道封死就可以了。如果是因为黄吴李都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是李德生等人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周恩来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把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都拴在一根绳上。更为更为重要的是，黄永胜等人作为林彪的下级，此命令有何用？！

那么邱会作呢？

知情人透露，邱会作曾讲，「与其说林保过我，不如说周保了我」。早在１９３５年内周恩来从邓发手里救下了邱会作，后来长征时，周患重病，肝脓肿，高烧昏迷不醒，是邱和另外三人一直用担架把周抬出草地的。１９６７年3月３０日周恩来对着一群革命小将，作了一大段关于邱会作的讲话。首先周回顾历史表达了邱是我周恩来看着长大的，而且是行影不离的。并且说是在１９５９年，毛亲自点名叫邱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作的很出色，有多么出色呢，周恩来在点名道姓地点评了我军历任总后部长之后说：「邱部长是我军历来最优秀的后勤部长，是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邱在周、林之间起到什么作用呢。在第二次庐山会议前，林与周曾过默契，相互支持彼此很多。邱会作自己这样解释过，是某种意义上的林、周之间的联络员。周对于邱是充满了期望。７０年代初，有次邱随同周接见外宾时，周恩来被问起高龄、接班人选时，周以手指邱说：已经找好了，就是这个人。随即表扬了邱所负责的生产、整顿、军工、后勤等部门，对未受到大的破坏、内部尚有序表示满意。当时叶帅、熊向晖等都在在场。邱极感受宠若惊，乃至半晌无语后来在回忆录里对这段好好写了一笔。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老毛在９月２３日晚上向周恩来布置对黄、吴、李、邱采取措施后，因已通知邱会作第二天上午到机场送负责同志出国到越南访问，没有来得及同邱会作谈谈。工作人员解释说「总理确实想单独找邱会作谈谈，做做工作，因时间来不及，没谈成。」其实这就是一种春秋说法。在「九?一三」之后的去越南代表团的名单上还有邱，周一直想把邱支开，让邱去越南避下风头，这才是周的想法。

２.「９?１３事件」对周恩来的冲击

「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曾经痛哭。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解析。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有如下解释，即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却叛国投敌自我爆炸，周恩来深感无法向世人交代其中之原因。　　高文谦先生的解释为毛周因治国理念的不同，周长期在毛的阴影下生活，有志难伸。　　丁凯文先生则认为「毛泽东的下一个斗争矛头必是他周恩来无疑。所以当纪登奎一提及林彪自我爆炸应该高兴时，周不仅不能高兴，反而悲从心来。周只能告诉他们『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显然，周恩来心里明白他不仅又要作一个新的项目组的负责人，制造新一轮的迫害，很可能他自己也逃不过这一被整的厄运，毛泽东怎么会容忍他周恩来坐稳接班人的位子呢？」

邱会作曾经说：林彪死了，最困难的就是总理了，过去林彪在，总理可以因此挡住来自上海帮的明枪暗剑，现在，总理被推到一线了。果然不久，就开始批周公了。　　邱会作明白此道理，周也会明白。

周恩来在得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一个人面对墙壁大哭，说过最有份量的两句话：「还没有完」和「林彪是个好人!」　　周恩来当然知道林彪是好人。知情人说，周恩来曾经坦言：在林彪手底下，比在彭手底下好过的多。现在应该更明确的说，周恩来自己当然更清

楚，如果林当家，那么周的日子会比毛当家的时候强过万倍！

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是巨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是巨大的。向来谨慎小心的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变得多疑；不仅是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了。周恩来的专机机长长张瑞霭对此有过生动的回忆「林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我国。

１０月１０日，总理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以往专机起飞，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总理同机组同志们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这次不同。听完报告，他不放心地问：「飞机检查了吗？」答：「都检查过了！?」周又问：「正常吗？」答：「正常。」周再问：「没发现问题？」答：「没问题，都正常。」周继续问：「试飞过吗？」答：「试飞过。」周反复问「也检查也试飞过了？」答：「我亲自检查试飞过了。」机长张瑞霭从１９５４年起就为总理飞专机，从未见过总理这样不放心。我自己跟随总理乘飞机，何止百次，空中遇险就有过七八次，更不曾见过他这样不放心。又问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飞机。

专机飞越长江时，张瑞霭报告说：「总理，要过长江了。」

总理一直在朝航线下方张望。以往遇险，都是我不放心，我紧张。我总想找机长去问个清楚，而总理都是一百二十个信任地稳坐不动。记得两年前总理跟叶帅去河内吊唁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进入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马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们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一百二十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不止。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下方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没错，总理，是长江。」张瑞霭忙拿出地图递给总理：「你对照一下，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段……」

总理拿着地图，在张瑞霭的指点下，对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点点头：「哦，是长江……」

以镇定出名的周恩来的此番作为确实出乎意料。周恩来首先要确认飞机无任何机械故障，再次要求确证的机组人员政治上可靠，最后自己要亲自证实飞机是在国内飞行。此等诸般行为同「九?一三事件」究竟有因果关系，现在为止，尚未发现有力材料证明之。

３．新一轮的迫害

９月２１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同意汪东兴的报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设一项目工作小组，掌管和整理有关林彪、陈伯达全部案件材料，该项目工作小组以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领导进行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　随后，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项目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又经报毛泽东同意，１０月３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项目组的通知。

犹如中共一轮轮的清洗，「林彪事件」之后的清洗是惊人的。丁凯文先生说：「『九?一三事件』虽以林彪专机坠毁于外蒙而结束，但事件本身的后续影响却刚刚开始。中共内部开始了新一轮的清查清洗，抓了一大批所谓林彪『死党』、『余党』。中共军内被立案审查的军以上干部就达千人之多，随即而来的就是各种形式的『株连』『迫害』，受牵连者几达三十万众之多，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林彪一案过去三十多年了，可是其影响依然未消，许多人冤狱未平、死不瞑目。所以，林彪一案绝不仅仅是林彪一家或『黄吴李邱』几员大将的问题，其牵连之广，受迫害人之多，比刘少奇一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直到１９７４年，又有很多人被划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漏网残余分子」被整肃。

以总参为例，自一九七一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底，总参党委就开过四次扩大会和专题清查会，集中揭发清查总参工作人员同林彪的问题。在这期间，总参党委向中央上报了九十七期揭发材料。在此期间，除中央审查的二十二人外，总参还清查了有牵连的五十九个人和二百二十多个问题。

时任副总参谋长的阎仲川就因为「林彪事件」受牵连。而阎的主要问题则是发生在１９６９年的「一号号令」。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在苏州的林彪通过秘书张云生向在北京值班的军委前指下达了几条指示。黄永胜接到指示后要求阎仲川把指示下达到军中。阎仲川则自作主张的把其编为「前指开设之后的第一份首长指示，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这就是「一号号令」的缘起。随后军委前指陆续下达了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等命令。但是这些命令下达并没有预先通知周恩来。后来地方系统的电报、电话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数报告都把林彪指示称为「林副主席一号号令」或「林副主席一号令」。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看后大为惊讶。于是１９日晚，周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找去，询问林彪指示的来历、内容，特别指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为「一号号令」?对此，阎仲川的认识则是：回答周恩来的提问并不困难，即使说清楚了，问题并未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林彪的指示虽然只发军队，却事关重大，而且执行起来不能不涉及地方。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指定留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这件事情军委办事组理应向他报告。但黄永胜布置任务时对此却未作交代。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在批评办事组成员时，却又偏偏未点明此事，越是这样越令人感到难过和不安。

周恩来可以说有理由质问黄永胜并表示对此不满，因为周恩来毕竟是代表中央坐镇北京的第一号人物。但是此后发生的事情则难免显得周恩来有点「小家子气」了。

９月１３日当天，周恩来接见阎仲川、彭绍辉、王新亭、张才千几个副总长。周恩来表情严肃，坐在沙发上。见到阎仲川等人，他免除了平时不可少的寒暄，对他们耸肩，两手向外一摊，突然说了一句：「哼！副统帅，跑了!」大家全都愣了。周恩来突然用烁人的眼光望着阎仲川，直呼其名：「阎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听到点什么风声没有？」问到自己头上阎

仲川反而冷静下来。他简单地摇了摇头：「没有。」　　周恩来虽然没有再问下去，但是对阎仲川来说这已经是恶运的开始。

９月２４日，随李先念访越的阎仲川回国。代表团成员下飞机后没有各自回家，却被引导到贵宾室。大家刚刚坐下，周恩来便态度严肃地对阎仲川说：「阎仲川同志，中央已经决定黄永胜离职反省。你是黄永胜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发他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生活方面的！」然后他向叶剑英等人点了点头，独自先行离去。阎仲川思想抵触：要我当黄永胜的助手，是组织的安排，当助手而「得力」，有什么错？叶剑英先讲话了：「你还年轻，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发交代，还有前途嘛！」李先念只说了一句：「好好揭发交代罗！」主讲是纪登奎和李德生。他俩介绍了半个月的清查工作，主要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小舰队」的一些活动，什么「５７１工程」纪要，暗害毛泽东的阴谋计划，等等，希望阎仲川认清形势，与林彪、黄永胜等人划清界限，积极揭发他们的罪恶活动。

从此，阎仲川开始了隔离审查的生活。项目组提出许多认为可疑的问题，要他逐个回答。他全凭记忆笔写口答，居然对每年的来龙去脉都说得清清楚楚，项目组已经感到没啥可问的了。阎仲川的绝大多数问题陆续都排除了，但在「一号号令」问题上却长期过不了关。阎仲川认为，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是否别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负责向全军传达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组织上符合原则、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怀疑，因为是军委办事组五名成员向他下达任务。如果说自己在承办此事过程中有错误，那么，第一是编号可以不从头另编，以免引起误会，但这只是技术问题；第二是在传达指示时，没有提醒下面注意保密，但这属于考虑不周，是在时间紧迫下的疏忽；第三是没有向周恩来报告，这确是重大失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成员应负责任，因为按工作程序，理应由他们向周恩来报告和指示军委前指报告，他们却马虎了，当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动提出建议，也可能就不会有以后的问题了。阎仲川的上述认识被认为没有抓住要害、实质。

问题的症结出在哪个地方呢？

直到１９７１年底，负责对阎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德同阎仲川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阎仲川问定性的根据何在？「总理亲自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

就因为黄永胜没有及时将林的战备指示传报给坚守北京的周恩来，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把此事上纲上线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单单是「耿耿于怀」的问题了。周恩来以此表示和林划清界线！然而事实却是，毛泽东知道「一号号令」正是周恩来告诉毛的！

林彪指示是发军内的，又是电话稿，并未抄报周恩来。但是，有的军区收到指示后，因为军区领导人兼任所在省革委会主任，于是向省革委会领导成员作了传达，而省革委会领导中有群众组织代表，这些人「造反派」的习气未改，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讲究不打折扣，闻风而动。他们不考虑什么后果不后果，连夜把指示的内容写成大字报捅上大街，果然马上引起轰动效应，部份群众大为惶恐。西南地区一个边境省尤其闹得邪乎。这种情况是通过地方系统的电报、电话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数报告都把林彪指示称为「林副主席一号号令」或「林副主席一号令」。　而周恩来正是把这些材料传阅给远在武汉的毛泽东的！

4．「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新的政治格局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周恩来此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周恩来在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正式名正言顺。「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重病之中只能向周恩来「托付」。

叶剑英在毛泽东在１９７１年５月、南巡时就已经向其手底下高级将领吹风，重提叶剑英的历史功绩。「九?一三事件」当日，周恩来就揣摩毛泽东的圣意指定叶剑英处理林彪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逮捕黄吴李邱的当天，周恩来就提议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

周恩来对政治的把握还在于对华国锋的任命上。对于华国锋备受毛泽东信任的事实，周恩来与９月３０日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

《毛泽东传》的作者们认为：「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一方面把文革中的罪行都一股脑儿放到林彪头上，另一方面毛泽东不得不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挽回人心。在一系列的纠正文革错误的措施中，周恩来无疑再次成为具体的实施者和组织者，这为周恩来在文革结束后的名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无疑也犯了功高震主的「错误」，这也是造成周恩来在１９７３－７４年被批判的根本原因。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底，有人把外国一些杂志带给毛，并说外国媒体突出周恩来，很少提及到毛泽东，并提示毛，１５３号《新情况》同毛的思想不一致。　　这就是周恩来成了被批判的起点。

第十章 起伏的两年：从最高点跌落到受批判

「九大」之后，特别是「九?一三」之后，毛泽东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具体错误，同时也意识到党内外日益增长的利用这些错误来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倾向。因此，毛泽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着手纠正那些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是由于毛泽东不仅不会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还一再发起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二者都是为了捍卫「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于是出现了在意识形态上维护文革，在具体实践上调整政策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出现了在思想上是「反右」还是「反极左」的争论，至于继续解放老干部、调整经济政策等方面则无大的改变。

由于毛泽东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界线，在调整政策的过程中，处于「二把手」位置上的周恩来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纠正「文革」造成的错误。一旦越过了毛泽东的底线，必然遭到

毛泽东的断然否定。对此，大陆党史界无疑是夸大了周恩来在１９７２年的整顿中的作用。尤其是明显地忽视了这种整顿其实大多始于「九大」。周恩来用批「林」的方式来批「极左」、批「无政府主义」也是沿用毛泽东最初的语言。

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执行调整后的外交政策方面，周恩来取了得巨大的成就。这时候，毛泽东对其不满程度亦随之增加。特别是周恩来所处的地位是二把手，按照惯例，在毛出现意外的时候，随时可能成为当家人，而周又不是毛泽东所中意的接班人。因此，毛泽东首先是在１９７２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让周恩来做了极为过份的检讨。继而在１９７３年的7月份对周恩来提出严厉的批评，以至到１９７３年底对周恩来的不满到达了最高点，对周进行了无情的打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告诉党内高层：周是有历史问题的、周并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周不是接班人。

作为「文革」涌现出来的新一代的代表王洪文，「九?一三」以后迅速崛起，其中周恩来起了相当大的作用。１９７３年下半年的批周之所以没有最终将周打倒，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初出茅庐的的王洪文极其需要周恩来的「传帮带」。伴随着「十大」的结束，王洪文的位置稳固，邓小平在这段时期的表现，也使毛觉得满意。

１９７３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对调，邓小平并没有参与其中的任何事务。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目的主要是：为整肃军队、在各大军区开展下一步的运动（即后来的批林批孔）做好准备，从而使毛更严密地控制军队，使文革激进派能够渗入军队。

一、「九一三事件」以后的调整和落实政策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

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毛泽东不承认失败，但是承认有不足，有错误。在不涉及「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前提下，可以纠正这三分错误。这在「九大」以前就开始了。

如党的重建，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就作出《关于已经成

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１９６８年1月1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建党的纲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１０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这些话为文革中新生力量进入党内提供了的依据。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则讲「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１９７０年4月１８日，康生在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对于如何整党、建党做了长篇指导性讲话。在１９７０年底到１９７１年初，部分省、市一级进行了整党，产生了新的省、市委。到１９７１年8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整党，都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

在其它领域包括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解放干部以及更为敏感的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也开始逐步落实政策。「九?一三」之后，在经济领域、科教文等部门的纠左并没有因为「九?一三」而停顿。恰恰相反，毛泽东为了保持国内稳定，抵消因「九?一三」事件带来的冲击，化解党内外日益增长的种种不满，加快、加深了各个领域的整顿，也加速了老干部的解放工作。不过显而易见，此时的整顿更具有功利性。

「九?一三」事件不仅使普通百姓当中一些人觉醒，也对上层带来巨大的政治冲击，也给毛泽东本人带来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使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因此毛泽东不得不更加倚重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在毛泽东的同意下，周恩来全面主持工作，包括落实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开始中美两国的高级会谈等等。特别是毛泽东有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而在１９７２年6月份毛泽东又指出林彪是「五?一六」的总后台，批林彪自然是要批极左。　这也是１９７２年整顿的主旋律和内在逻辑。

尽管１９７２年周恩来主导的整顿工作是「九大」以来在各个领域纠左的继续，没有毛泽东的同意，这种纠左是不可能进行的。特别是在毛泽东严密控制的外交部门，中央一系列文件（１９７２年２６号、３１号、３８号、４２号）提到反无政府主义。这些中央文件没有毛泽东同意是不可能发出的，但是人们的注意力多数集中到台前的周恩来身上，使周成了纠左的代理人和实现中美、中日建交的外交形像大使。这成了日后毛泽东严厉批周的动机之一。

在同意纠左的大前提下，毛泽东并没有给出具体明确的政策界线，因此周恩来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越过底线，只能试探。当舆论上的宣传同文革的指导思想上发生冲突、影响到文革本身时，毛泽东就果断制止，以免动摇了「文化大革命」的根基。而具体执行「纠正极左」、「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周恩来就成了毛批判的对象。

１．各个领域的调整

尽管毛泽东在１９６９年4月１３日曾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但是毛泽东也认为：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因此，毛泽东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６日，经毛泽东批准，

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此标志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出局。此时的毛泽东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并且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要把局势纳入正轨，必然要对６７－６８年期间在各个领域横行的无政府主义和极左路线加以清理与整顿。１９７０年2月２０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强调「在经济战线、生产技术领域，照旧框框不行，要打破常规，当然合理的规章制度还要保留，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　经过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于１９７０年5月２９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１．努力增加生产；２．基本建设工程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尽快形成生产能力；３．大搞综合利用；４．提高劳动生产率；５．大力降低消耗定额；６．提高运输效率；７．提高产品质量；８．改善经营管理；９．大抓清仓查库，注意修旧利废，节约代用。指示说，上述各点主要是讲工业战线，同样适用于农业、财贸和其它各条战线。　同年６月１８日，周恩来指示李先念、余秋里北方七省煤炭减产是在「一打三反」加「增产节约」运动后一种反常现象，应引起各地严重注意。防保守，排极左，仍然是当前主要任务。　同年１２月经毛泽东批准，下发针对各行各业因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而废除原有必要的安全制度而造成重大事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

１９７０年6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关于开展保密大检查情况报告》的批示稿说，各单位应结合当前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克服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倾向，普遍开展一次群众性的保密大检查，发动群众认真清理机密文件、密码、电报、国防工业科研机密数据和工作记录等等。

针对农业生产，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４日接见参加农业、商业，外贸等专业会议代表时指出：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起来了，就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就是不讲平衡，不讲计划，甚至平调。继而在１９７１年3月２８日周恩来接见出席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代表是进一步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搞好农业更要靠地方的积极性，要坚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强调：要掌握好政策，对中央已经规定的政策，不要随便改动，如奖励、自留量、换购等办法，还要坚持不变。

１９７０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的精神，国务院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外交部批极左始于更早。１９６７年8月２２日火烧英国代办处后，毛泽东指示要揪出王力等人。在这点上，毛泽东的态度和周恩来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8月３１日周恩来就批评道「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９月１７日，周恩来指责外交部有关负责人，未经批准就同意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对巴基斯坦非官方报纸刊登台湾反共消息和勃列日涅夫反华言论事向巴政府提出抗议是极左行径。「九大」以后，周恩来更是多次批评外事部门的极左行为和思潮。在「九?一三」前后的两年，周恩来更是利用猛抓「五?一六」来达到控制外交部的目的，到１９７１年周就几乎完全控制了外交部。

１９７０年9月１８日周恩来约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有关各司负责人谈话，指出：在外事部门，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同月２４日周恩来同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司长谈话，批评最近驻外使馆中出现的「左」的倾向。指出：对驻外使馆内部还热衷搞极左的人，要调回国内学习。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8日、１０日，陪同毛泽东会见来华作内部访问的金日成。会谈中，毛泽东抨击了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派」的一些做法。　１２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更是指出１９６７年７、８月份外交部失去控制，是因为有反革命。

１９７１年4月７日，毛泽东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根据此，周恩来加大了在外交部纠左的努力。当晚，周恩来就对外政策等问题发表长篇讲话：「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工作，由于当时忙于对内，对外事注意不够，出了一些乱子。有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利用极左思潮，搞了极左行动，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外交部「夺权」等。此后即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开展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乒乓球队开始。我今天请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让大家胆子大一点；但胆子大，不是搞极左。

１９７１年5月３０日、３１日，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阐述在新形势下的外交政策，批评并纠正对外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周恩来指出：我不同意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好像我国外交路线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周恩来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各项事业受影响、被破坏的情况时，说：这些事情为什么不能跟人家说？这几年我们出版的东西少了，要补上来；文艺方面除八个样板戏外，只要内容是健康的、革命的、形式不是萎靡、庸俗的，就要允许人家尝试。１９７１年6月４日周恩来继续针对判对外工作中的极左思潮问题时说：一直到现在我们总说批判极左思潮不彻底，不敢大胆批评，包括我们中央许多部门。一直到现在还有。你不把极左思潮肃清，怎么能掌握正确的政策呢？

１９７０年8月１６日周恩来同国家体委军管会负责人和一些乒乓球队员谈话，指出：建国后十七年的体育路线不都是修正主义的，还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于坏人钻空子，搞了极左思潮，弄得一个时期思想比较混乱。同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就批判出版界的极左思潮问题发表意见。指出：「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从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发展来的。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地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经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写道：这次会议「批判了极左思潮，批判了『文化工作危险』论」。

由此可以看出，在「九大」之后，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外交政策，批极左已经展开。

还在「九?一三事件」以前，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不能违背科学。……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想。」

２．解放干部

解放干部的工作从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就开始了。「九大」之后，毛泽东更加注意解放干部的问题。１９６９年６月２６日，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等谈话：「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７月８日，毛泽东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

在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经过艰苦努力，经过和江青等人几次舌战后，终于同意军队解放一批干部，国庆节要上天安门亮相，诸如张宗逊、杨勇、梁必业、肖向荣、李雪三、张贤约、王诤、王恩茂、吴克华等等。　地方干部如万里和赵紫阳在１９７１年也是在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大力支持下得到解放，万里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一方面，没有毛泽东的点头，这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因为当时毛泽东没有明确说要解放老干部，因此难度颇大。

「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出于稳定局势和收买人心等诸多方面原因，解放老干部速度大大加快了。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４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对与会人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二月逆流』。」毛泽东同时编造谎言：「『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就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同时毛泽东叫叶剑英把此话转告给陈毅。　但是叶剑英并没有转达。而且毛泽东也没有说反击「二月逆流」是错的，要给「二月逆流」平反，叶周等人也只能观望。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８日晚，毛泽东在接见出席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当介绍到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代表团秘书长符浩的时候，周恩来告诉毛泽东：他是「九十一人大字报」签名者之一。毛泽东表示他赞成「九十一」。这是毛再一次表示支持陈毅，并肯定外交部九十一人的行动的开始。

直到次年１月６日，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后才去告诉陈毅。　即使如此，周恩来在陈毅的悼词上仍然做了负面的评价，毛泽东在审阅的时候指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没有毛的发话，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毛发话，也必须再三验证，明确表态后，方敢落实。毛的权威是没有人敢于冒犯。

整个解放老干部的政策是毛泽东一手控制的，特别是高层干部。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都知道周总理保护过许多老同志。可是如果毛主席不说话，周总理也保不下来。」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来看，毛泽东对于高层干部如何安排做了具体的批示。在此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江青等阻扰的事情。至于在解放一些干部中，江青等针对于个别人的个别问题提出质疑，也是完全合乎程序的。有些文章说江青等是百般阻挠，笔者认为完全是夸大之词。

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从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

「解放」干部的进程。４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７月３１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亦根据毛泽东的解放老干部的意图，周恩来指示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给近５０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作体检，并在这个名义下获得「解放」，重新工作。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毛泽东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当天，周恩来就出三点批示：一、将刘建章保外送医院就医，并通知其家属前去看望。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提出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在年内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　无论是毛还是周，对于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早就知道，只是此时才解决而已。

解放干部的模式一般如下，老干部先致信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中央办，多数情况是周恩来具体办理。

１９７２年1月１０日，毛泽东带病参加了陈毅的葬礼，这种显然包含着歉意的举动，很有象征意义。它给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企盼已久的「信号」。周恩来不久后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一大批老干部包含陈云、王稼祥、谭震林、吴冷西、廖汉生等等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既然党中央号召揭发林彪的罪行，写信也就有了题目。许多老干部及其家属在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扯「揭发林彪」的大旗，申诉自己受迫害的情况，要求解除监禁、出狱治病、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工作。

陈云在１９７２年7月２１日，致信毛泽东：「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可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动的时间。」请求中央根据陈云的身体情况，给其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自然是此信的重点。对此，毛泽东于７月２２日批示道：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继而在陈云的第二封信上批示道：请总理办。

周恩来成为解放老干部的「代言人」，与此模式不无关系。大陆党史界在论述此过程中经常有意无意的忽略毛泽东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周恩来的形像更加「光辉」。

毛泽东在１９７３年上半年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3月３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见机而作，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解放干部的原则是正部长和中央文革直接处理过的人的材料要报毛泽东审批，副部长报中央批。　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正如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的评论：「可是如果毛主席不说话，周总理也保不下来。」　解放干部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政策的松动，周恩来也解放不了干部。即使如此，牵涉到重大冤案的时候，周恩来还是要等待毛泽东的多次明确指示。例如当分管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纪登奎向他请示如何贯彻毛为贺龙平反的指示时，周也只是表示：不忙，再等等看。而彭德怀的案子，周恩来就一点都没有可能对其松动。此二例可以明显的看出周恩来在解放老干部方面的局限性和严重的依赖性。

除此之外，并不是所有受到「迫害」的人，都会受到此待遇。

毛泽东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就说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也要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　但是直到１９７５年6月２４日，一位原在林彪处做保健工作的医生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自「九?一三」事件后参加学习班，至今已近４年，尚未作出正式结论。

二、「批林整风」汇报会

１９７２年５－６月间，中共中央在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此会议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主要任务则是两点：第一：周恩来做检讨；第二：由周恩来出面说明毛泽东早就洞察一切、江青是毛泽东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

周恩来在１９７２年5月３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传达了毛泽东当天向周恩来提出的中央要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的指示。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稿。６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此《通知》，其中提到：我党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路线斗争中最严重的一次斗争。　这次为期一个多月的重要会议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３１２人参加，可见毛泽东对此会议的重视程度。

１.「批林整风」汇报会的起因

出于政治目的，毛泽东在强撑病体参加陈毅追悼会后，因感冒致导致病情恶化，由肺炎转成肺心病，还一度昏厥过去。在此种形势下，毛泽东出于无奈，向周恩来托付了大权。此

事后来成为「批林整风」会议的起因也是１９７３年批周的根本原因之一。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当时的情况：

毛将头完全靠在沙发背上，说：「我看你们两个人（指江青和李志绥—笔者注）给我吃的药，都没有起好作用。」然后对着我（指李志绥－笔者注）说：「所有的药都停了。谁要是再说药的事，就给我滚。」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小腿缩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明明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吧。」

周恩来从来就没有被毛泽东看作接班人，这点是党内高层的共识。周恩来本人也有自知之明，自己也多次表示为自己不具备帅才，只能作助手而不能掌舵。　这一点在毛泽东提拔王洪文为接班人后，周恩来对王洪文的态度亦证明了这点。毛泽东向周恩来交权的举动只是一时的无奈之举，用毛自己的话说是形势比人强。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嗜权如命，所以此事使得周恩来诚惶诚恐。当２月１日毛泽东昏厥被抢救过来的时候，闻讯赶来的周恩来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来车。　毛泽东一醒来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写道：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周秉德竟然把地道一个维护独裁者的周恩来的形像却当作「美德」写出来，真是是非颠倒。除此之外，周又特别叮嘱让负责警卫毛的张耀祠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由于「九?一三」的周恩来处于「二把手」的位置上，又由于毛泽东说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的话，周恩来在事实上成了接班人。一旦毛泽东突然去世，周恩来就会便顺理成章地接班成为一把手。随着基辛格访华的结束以及毛泽东身体的好转，毛要解决这个问题，扭转这个局面。「批林整风」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批周会议上一言中的而得毛欢心的关键原因。毛要通过对周恩来历史的这次批判，向全党发出一个明确信号：林倒了，但周恩来并不是接班人，这个事情要由周恩来自己来说，向全党，特别是在高层，讲明白这点。尤其要让与会人员中的那些「新人」，即通过「文化大革命」上来的、被毛泽东认为能确保将来「红旗不倒」的接班人，诸如王洪文、徐景贤等各省的负责人了解周恩来的历史问题。

会议的另一个目的，提高江青的地位。一是将「林陈反党集团」更名为「林彪反党集团」　，

借压低陈伯达而淡化他的文革小组组长身份，进而淡化江青的角色；二是让周恩来为「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出面证明江青不仅为毛泽东的夫人更为毛泽东的亲密政治盟友。

２．周恩来的检讨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８日，周恩来确诊膀胱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５月２７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讲一点个人的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次日，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召集人会议上宣布此事。

张佐良回忆，１９７２年的６月份，周恩来闭门写「文章」，写的浑身浮肿，苦不堪言。这期间，周恩来也不刮胡子，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着问题。

周恩来于５月３０日致信毛泽东:「我现在正写一个讲话要点，写成后将先进主席审查，并请约我一谈，好当面请示。」周恩来于６月７日将所写《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表示自己愿意像当年延安整风那样，清算自己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周在信中这样写道：「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搞个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不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３０多页），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及附信。

６月１０日－１２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发言。　周恩来在报告中自我作贱，再次表示保持晚节，「对自己作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份的检讨」。　在谈及王明「左』、「右」倾错误问题时，周恩来结合个人亲身经历，作了严厉的自我剖析，并又一次表示了沉痛的以至于过分的「检讨」。周恩来检讨道「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常感到补过之日无多。」　凡熟悉中共党史、周恩来为人以及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人土对此相当不理解，而那些「新生力量」则感到震惊。

周恩来非常清楚毛泽东的心病，自己作检讨的要旨所在，自己不配作为毛的接班人，因此周恩来主动提议会议扩大人数。　为此，周专门在发言末尾当众申明：「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表示：「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那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　周恩来还特意引用了列宁的话「忘记过去就意味这背叛」来再次表示自己原来犯过的的罪恶是不容原谅的。

６月２３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周恩来特意宣布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它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

然而事情的发展有时并不与发起人的主观愿望一致。毛泽东让周恩来作检讨的初衷是要让人们知道周恩来有历史问题、并不是一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适合作党的接班人。然而，事与愿违，周恩来的这种检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情，赢得了人心。这与中国的道德文化传统密切相连。毛泽东一直想通过搞臭周恩来的办法，来防止周恩来成为反毛的一面旗帜，不幸的是结局恰好如此。

３．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５月２１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周就会议印发的文件逐一作出说明、解释、回顾了一九七零年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过程，并批判了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

同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意见，前往毛泽东处请示可否将毛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印发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至今为止，未有材料表明是毛授意在先，还是周主动为之。毛泽东表示可以印发作会议文件。周恩来在５月２１日讲话中说：「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

首先周恩来解释了为什么「林陈」变成了「林」。周恩来说：「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议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风」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我的一点意见》，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陈伯达这个骗子，由于主席的教导使相信他的人、上当的人觉悟了，警惕起来了。使跟他搞阴谋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整个精神，从文件上你们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整个精神，从文件上你们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九月十三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不像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

然后，周恩来讲了要发的前四个文件之后，重点介绍了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

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关于此信的真伪以及有无篡改甚至有无等问题，有学者已一一列举，此处不赘。

关键的是周恩来道出此信的目的和作用：不仅着眼于现实，也在未来。周恩来说：「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

江青介绍此信的背景时说：「一九六六年，中央在杭州开四月会议，当时我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五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也不知道会议情况」。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接着江青认为「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中讲了世界革命问题，所以，也是写给全世界人民的。」但是在这些客套之词之后，江青道出实质：「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像我这样的人。」

此信的公开发表，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三层意思：第一，毛对江青是极为信赖的，把如此重要的意见写在给她的信中，表明只有江才是毛的最亲密政治盟友；第二，既然毛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就「看穿」了林彪，那么江青也是老早「看穿」了林彪的，因此江青不是林彪的同路人－－无论林彪是「极左」还是「极右」；第三，着眼于毛身后，周恩来的检讨和推出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本质都是一样的，周不是接班人，代表毛泽东路线的是旗手江青。

如此重要的对象，但是除了毛泽东，还有谁能为江青背书呢？在中共党内高层，有资格、有能力、有愿望扮演这个角色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被称为「红朝宰相」的周恩来！

一个周恩来还不够，有扛大旗的，也有吹号敲锣打鼓的。徐景贤回忆到「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后，每个人都要表态，发言都要上简报。我也在小组讨论时作了发言：读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两面派，『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毛主席高瞻远瞩，对林彪的问题早有察觉，等等。其它人的发言，也都是这个基调。另外，也有人称颂江青的，例如邓颖超的发言，说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读了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江青致唐纳的公开信，认为江青是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搜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红材料』，等等。」

三、从批「极左」到批「极右」

毛泽东在１９７２年6月份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谈到什么是「左派」：

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尽管林彪对于文革的真实想法是不赞成，但是毛却利用「林彪事件」的机会，把文革迄今为止的所有恶果归到林彪头上，于是给林彪戴上「极左」的帽子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从逻辑上讲，既然林彪是左派的头子，左派又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那么批林彪就是批那些「极左行为和极左思潮」。毛泽东固然希望批「极左思潮」仅限于具体的政策而不涉及意识形态的争论。但是没有人知道毛泽东的具体底线，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张春桥都不知道。但是对于主管意识形态的张春桥等人，对于意识形态的「批极左」比周恩来等敏感的多。除此之外还有涉及到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等问题，因此张等人也不得不维护自己的「地盘」。出于对批林方针的混乱情况不解，王若水在１２月５日致毛泽东的信中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适合于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同样适用。毛泽东随后的表态，使得模糊的界限明朗化，也初次流露出「扬法批儒」的念头。

１．批「极左」引起的争执

１９７２年7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会见杨振宁时对参加陪见的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６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精神所写《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大陆党史界还流行这种说法：这篇文章本来是１９７２年春应《人民日报》之邀而写的，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从中作梗，不得不在《光明日报》发表。

根据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王若水以及余焕椿的回忆，此时《人民日报》尚在周恩来控制之下，并不存在张春桥和姚文元从中作梗导致不能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问题。　那为什么周恩来不同意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呢？

此事可以追溯到１９７１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制定。大陆党史界长期以来的定义是「《纪要》基本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教育工作，错误地提出『两个估计』是强加给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１９７１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下炮制出来的。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一）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泽东始自１９５７年３月的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到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它的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１９７１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

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就教育革命问题说：「对资产阶级教授我们还得利用，不然我们没有呀，不过，他们也得听我们的话，有些人嘴里也讲听我们的话，但心里老是埋怨。」毛泽东又说：「过去也有些进步，在教育方面不能讲完全不对。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一条，就是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在最近几年才开始。」

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清楚地显示出「两个估计」和毛泽东的思想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所谓的被「四人帮」封锁的１９７１年指示却是无法搞清的在何时、何地和何种情况下毛泽东对迟群等人的私下谈话！　何隍在１９７１年又哪里来的「四人帮」？！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９７１年７月６日，周恩来约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针对会上关于十七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提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

实际上周恩来对毛泽东和「两个估计」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周恩来说：「尽管有些人是解放后当教员的，但由于教育制度是旧的，方针、政策是旧的，虽然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是对的，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我们学校』是一个意思，他们是搞修正主义的。不然，为甚么在教育上没有彻底改革呢？为甚么毛主席的号召没有执行呢？」

至于《周恩来年谱》中引述的，同当时发出的文件也有不同。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的主要精神》，周恩来说：「但不能说主席的红线没有射进学校。学校不能脱离社会（从整个国家来说，十七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占主导地位的）。主席的红线还是照耀着学校的，而且有些时候还是有力的。对教师队伍和十七年教育出来的学生要有个正确的评价。要说清楚教师、学生队伍大多数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接受党的领导的。不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文件拿下去就不能起动员作用。」

两下对照，不免看出其间不同之处。对于当时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界的认识，周恩来同张春桥等并无二致，这也正是《纪要》开头部分是肯定十七年教育的所谓「巨大成就」的，但这并不妨碍《纪要》马上接着就讲「资产阶级在教育战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至于周恩来所讲的无论「主席的红线还是照耀着学校的，而且有些时候还是有力的」还是「从整个国家来说，十七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占主导地位的」都属于《纪要》中说的「巨大成就」。但是要有个「正确的评价」，并不是为了真实的反映，而是「这个文件拿下去就不能起动员作用。」但是单纯从年谱中是无法得出这个结论的，虽然年谱中所记载也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这种经过精心剪裁的历史为树立周恩来文革狂澜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做了殊死斗争的」的「中流砥柱」的形像起了绝对作用。正如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中所言「在『四人帮』反党气焰极端嚣张的困难情况下，7月6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坚决指出……周总理的指示，同样受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

应该说，从周恩来１９５６年以及１９６２年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同此认识是相悖的。但是周恩来作为１９７１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必须把毛泽东的意见贯彻下去，制定出符合毛泽东意思的中央文件。在此点上，周恩来同张春桥等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在毛泽东的大棒指挥下，没有人不做「摇摆人」，作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则是最大的一个。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０日至６月２０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综合性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这次会议不仅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而且重点提出了加强基础理论教育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大陆官方党史把此次会议归结于因为「是在周恩来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召开的」，因此体现了「周恩来等要求改变『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界遭受严重破坏的状况的意向。」　然而根据《周恩来年谱》并没有周恩来参与这次会议的记录，实际上两次教育会议的召开和主持人都是迟群。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随即，指使人撰写批驳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事实上，《文汇报》发表《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等反驳文章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份。

笔者认为，周培源的文章在１０月６日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张姚的反击，这正是１０月１４日后来成为《人民日报》「一块版」的出笼的重要背景！（见下文）正是此版引起张春桥等人的反弹，反击周培源的文章也就「顺理成章」了。

事实上，在周培源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教育革命组写成《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一文，就发表在《红旗》杂志１９７２年第９期上。如果没有姚文元的同意这是不可能的。１９７２年７月，周培源的《看法》一文送到《人民日报》后，姚文元让人民日报社派出记者，分别到天津南开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征求意见」。结果发现争论很大。８月１５日，姚文元在给《人民日报》的一个批示中写到：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人民日报》有关部门的同志仍然认为可以发表，姚文元又说：「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你们如何收场？」于是周培源的文章被转到《光明日报》。直到１０月１８日，姚文元来到上海。姚文元才表示对周培源文章的不满说：「《红旗》的文章（指《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一文）不一定都是我同意的。报刊上的文章并不都是对的，都对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有背景的，不发不好，不发是得罪人，所以发在《光明日报》上。」

姚文元的说法说明了当时和周恩来的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怕得罪人么。至于周恩来为什么也同意不发表在《人民日报》？笔者认为，周恩来知道涉足教育领域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周培源的文章不是简单的学术文章。文章中的「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综合大学理科的培养目标是「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理论知识，具备做科学实验、理论分析、概括和计算工作的能力」等理论性的言语是非常容易引起争论的。既然张姚的意见如此，也就同意，进而说不定可以通过张春桥等人的反应，推测毛泽东纠左的「底线」也未尝不可能。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周培源就６６届至７０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毛泽东对报告不痛不痒的批示到：「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　毛泽东并没有对周培源的说法作出肯定，而是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正体现了此时的毛泽东在考虑是「极左」或者「极右」的心态。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左派」对外交工作的破坏是要清算的。经过准备， 8月1日至２日，周恩来对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提出外事工作也有极左思潮，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如果真正懂得运动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实在业务上。随后，为继续排除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中联部和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准备召开外事工作会议。１１月２８日，中联部和外交部为此写报告给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左思潮。１１月３０日，周恩来审阅并同意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将报告送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

１２月１日，张春桥对此报告有异议：「当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在报告上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鉴于党内高层对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主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１２月２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

显而易见的是，张春桥和江青反对的是「提法」的问题而不是外交部门如何在「批极左」的「具体操作」上。因此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８月１日，２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周恩来在４日审阅同意修改后的报告，并注明这是「经过政治局讨论后，加以修改的」，之后送交毛泽东审阅。

８月８日，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报社，同报社军宣队和看大样小组的几个人谈话。针对谈批林问题，张春桥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同时张春桥、姚文元在也表示：不能「把批林、批陈同批极『左』思潮和抓『五?一六』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　张姚的谈话表明他们是支持周恩来对于外交部的整顿的。

同样，在姚文元主持的《红旗》第１１期(１１月出版)，也有提出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当时还没有公开在报刊上点林彪的名字)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就是１０月１４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姚文元当时没有表示不同意。

但是在国庆节的时候，报社准备了一篇社论，吴冷西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在其中加了一句话：「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评极左思潮。」送审时，姚文元把这句话删去了，说：「全国形势如何，还要再看一看。」　周恩来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然而就在这篇社论中提到：我们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斗争，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还是改变毛主席这条基本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这些隐藏得很深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揭露出来，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清算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伟大的胜利。

１０月１４日，《人民日报》由王若水审定，编发了三篇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署名龙岩，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另外配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介绍巴枯宁的书评，也是批无政府主义的。）此三篇文章组成成一块版。文章是根据国务院领导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在１９７２年３月接见黑龙江省的同志时的讲话精神而写。　　这三篇文章理论色彩浓厚。文中说「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文中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描述直指文革初期红卫兵的表现和６７年夺权风暴。张春桥在上海组织了人马写文章反驳。　　但是张春桥和周恩来之间还没有形成直接面对面的冲突。

就是上文论述的在１１月３０日周恩来审阅并同意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周恩来也仅是在联系被毛泽东谴责过的６７年火烧英国代办处风波一事提及反对无政府主义，而且这是整个报告中唯一的一次。张春桥在提出异议的时候，还是同意此报告的。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１９７３年初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尽管避开使用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提法，但依然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强加于人和大国主义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些年来在归侨、侨眷、口岸、接待、宣传工作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和极端做法，并提出今后继续清除极左影响的各项规定。

因此争执的实质不在于具体工作上的分歧，而是如何提法，而且是由谁来提。因此自八月份以来，随之周恩来纠左领域的扩大，特别是意识形态与理论性质上的牵涉，同分管意识形态的张春桥、姚文元发生冲突也是必然。

正当周恩来和张春桥等人在报纸舆论意识形态和实际工作如何「批极左」达成平衡和默契的时候，随后王若水的一封信打破了这一格局。

２．王若水的信引起的风波

王若水说：「我的想法并不是在听到总理讲话以后才产生的。早在１９６７年，王力、关锋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时，就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就实质说，『五?一六』反革命团体和林彪没有区别，都是极右，但他们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既然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我就以为这样批是可以的。」然而这些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王若水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８月１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８月８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后来周恩来等同王若水谈话时，王若水讲：「从实际工作来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有，这是大家承认的，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总理在『八一讲话」中讲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了。总理本来是讲几个单位的内部问题，还有外交方面的问题，我却认为，这个精神也应该适用于批林整风的宣传。」

王若水知道不知道周恩来同张春桥等人的分歧呢？王若水说：「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在１０月１４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王若水还说：「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１２月６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在王若水写信的第二天，１２月６日，毛泽东就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当日江青就将王若水来信送周恩来等阅。关于找王若水谈话事，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当日，周恩来阅批：「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

由此可见，尽管出于所谓大陆官方所定义的「派别利益」，对于林彪事件是「左」还是「右」江青等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周恩来还是非常团结的。没有一个人直接对周恩来发难，都是提出自己的意见，采取同周恩来商讨的做法。

周恩来接连在１２月１５日、１６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１７日和张春轿、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１９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约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

周恩来首先批驳了王若水的说法：「王若水同志听到８月１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１１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继而周恩来指出「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这次是美国记者，说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同时周恩来承担了部分责任：「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

江青直指王若水信是挑拨离间：「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间，某一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

对此点，周恩来和张春桥都敲打了王若水。

周恩来：「王若水同志这封信，一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一团，像《海瑞罢官》那时

的形势一样；一个是从中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对上海的好事不赞成，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

张春桥则说：「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各位要注意。」

王若水的回忆还提到另外两个事情：一个是毛泽东在批王若水的信时讲，当前形势如何？林彪事件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第二个是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太子刘奭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刘奭某次的讲话很不高兴，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王若水说，１９７２年的这件事，可以说是１９７４年「评法批儒」的先声。毛泽东不让周恩来作继承人，固然可以说是因为周恩来已患恶疾，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周恩来将会纠正「文革」的错误。

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元帝纪》。刘奭的父亲宣帝在晚期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当时震动很大。年少的太子刘奭有些看不下去，就利用一次吃饭机会提意见，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接着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

「九?一三」之后，周恩来不正是处在太子的位置上么？！如此，在这以后一轮一轮如潮而涌的批周，也就在意料之中。难怪乎王若水说「我已预感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

四、在毛主导下继续调整

在毛泽东断言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同时，毛泽东也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但是实际上的政策却变化不大。因为林彪的真实作为对于毛来实际是「右」的，然而在「九?一三」之后，把林说成「极左」更有利于纠正左的错误。总是要有替罪羊的，毛泽东自己不会承担「文革」所造成的浩劫的责任。

以经济调整为例。

毛泽东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批示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１９７１.１２.２６；中发〔１９７１〕８２号）。这个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处理好集体积累与社员分配的关系，在增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同时，反对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此文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中存在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得到坚决认真的贯彻，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产生了一定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从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２年１月，经毛泽东同意，在周恩来的

主持下，中央连续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１９７２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整顿企业，加强管理，恢复被砸烂的规章制度，强调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１９７３年2月２６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本年度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的汇报。在汇报会上，周恩来历数几年来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尖锐地批评它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指出：「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二』，影响到一九七二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重新修改后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以纠正生产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明确地提出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重申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规定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要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这个规定，在计划会议上讨论时，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代表赞成这个《规定》，据说只有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上海的代表反对。张春桥宣称：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他甚至要求将下发的《规定》稿收回。

由于整顿，使管理混乱，不讲经济效益的状况有所改变，工农业生产有所好转。１９７３年同１９７２年比，农业总产值增长８.４％，粮食增长１０.２％，棉花增长３０.８％，农民人均收入增长５.８％，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上升３.３％。工业产品成本消耗降低，质量有所改善。

最为明显的是外贸方面。

１９７２年2月，毛泽东审阅同意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从国外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达四十三亿美元（１９７３年初提出了一著名的「四三计划」)。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　此后，中美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１９７１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还不到５００万美元；而１９７２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价值３２３０万美元的货物，从美国进口了６０２０万美元的货物，从而使两国间的贸易额增长到约１亿美元左右。美国约有１５０多名实业界人士参加了１９７２年我国春季和秋季广交会；为了进一步推动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一些著名实业界负责人还在１９７３年初发起成立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以此促进中美贸易稳步向前发展。

根据美方统计，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４年双边贸易总额由４７０万美元增加到９.２１２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从１９７２年的６０２０万美元增加到１９７４年的８.０６９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从１９７１年的４７０万美元增加到１９７４年的１.１４４亿美元，中国在美国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达到０.５％。根据中方的统计资料，从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４年中美贸易额从１２８８万美元增加到４７５７１万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额从９５７万美元增加到１０２８６万美元，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从３３１万美元增加

到３７２８５万美元。

外交政策以及解放老干部等方面不仅没有停顿下来，而是外交上更开放、解放老干部的速度更加快了。

《毛泽东》传记的作者认为：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但是笔者根据上述事实认为，毛泽东的仲裁使得从意识形态上关于「极左」还是「极右」思潮的争论停止，以免引起对「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否定和怀疑，但是并不意味这各个领域的整顿陷入停顿。直到１９７３年的年中，事情起了变化。

尽管张春桥等人写文章批判了周培源的文章，１９７３年1月，《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草案)》经国务院批准，向各省、市、自治区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作了传达。　在教育方面也无改弦易辙行为，直到7月份，张铁生白卷事件发生。但是这和毛泽东的思想变化也是关联的。

１９７３年7月１７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来华访问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周培源随同被接见。毛泽东对周培源说道：「你的讲话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指周在１９７１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大学组座谈会上的发言)。」周培源说：「那个发言后来在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６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指名道姓地说：「上海复旦大学的谈家桢就不赞成你的文章。」　（笔者注：由此可见，毛的信息十分通畅。）

随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十大」以后「反右倾回潮」运动的兴起，使得历史再次出现了倒退，诸多领域都受到了影响，仅有外交和外贸等少数领域没有受到冲击。而这些又都表明，林彪同「极左」无关，因为即使在１９７２年年底林彪变成「极右」后，不再批林彪「极左」，这些整顿并没有停止。换句话说，就是还在纠正「极左」，但已经不是批林彪的「极左」了，也就证明了所谓的林彪的「极左」完全是栽赃，出于政治的需要了。

毛泽东对于经济调整的支配不仅在于有关重大经济政策的必须要由其签字方能生效，还在于毛泽东对于国家形势的判读。

在「左」的思想和高度备战形势的影响下，国务院于１９７０年2月１５日至3月２１日间拟定和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是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备战，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指导思想。此《草案》不可避免的盲目追求高速度，忽视综合平衡，战备压倒一切。　这实际上建国后第二次「大跃进」，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１９７１年3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批准了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会议纪要》和１９７１年计划的主要指标。　作为《通知》的附件之一，《一九七一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亦下发至省军级。其「左」的冒进思想对全国经济工作的影响到１９７１年就完全体现出来：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就是有名的「三个突破」。　周恩来竟然把这些问题归罪于林彪的「极左」路线。

在实施的过程中，虽然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2月１５日接见来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各

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说：大中型基建项目不能上得太多，不要超过一千项。「大跃进」时搞高指标，结果影响了工业的发展。「三五」期间平均每年上八百多个项目。今后每年上的项目最多不要超过一千一百项，否则，搞很多，反不如搞少点更快。

但是周恩来还是分别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７日、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０日两次同意国家计委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报告。致使１９７０年额外追加基建投资共５０亿元左右（还不包括专项特殊性工程的投资)，仅全军基建财政拨款，由原计划２１２亿元，增加到２６２亿元左右，积累率由１９６９年的２３％猛增到３３%，到１９７１年竟然投资总额达到３２１亿元，大大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负担的可能。

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６日至翌年２月１２日的全国计划会议与１９７２年１１月间的全国粮食工作会议都提出过三个「突破」问题，但是并没有什么具体措施出台，可以说毫无作为。１９７２年「三个突破」问题仍在发展，货币发行量也突破了。粮食和棉花被迫挖用国家库存，形成当时所说的「两个窟隆」。

直到１９７３年，中美和谈之后，毛泽东认为国家安全形势已经改观，战争不是那么迫在眉睫的时候，战备才由举国临战状态转入常备型，此问题才得到解决。

１９７３年1月7日－３月３０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研究和制定了解决粮食销量、工资总额、职工人数突破国家计划的严重问题的具体措施，主要是：（一）大力加强农业，增加粮食储备；（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三）压缩国防和行政开支；（四）精减职工。会议还讨论和修改了一九七三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１９７３年1月，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调整「四五」计划纲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粮食销量、工资总额、职工人数突破国家计划的严重问题的具体措施，包括（一)大力加强农业，增加粮食储备；（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三）压缩国防和行政开支；（四）精减职工。根据会议精神，国家计委一年之中又两次调整了「四五」计划指标。7月１日，计委提出「四五」计划纲要(修正草案)，强调农业是基础，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修改、降低了若干指标。１２月7日，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些设想》的汇报提纲，又一次对半年前修订的指标作了调整。　经过这些调整，１９７１年的三个「突破」和１９７２年的两个「窟窿」得到控制。

根据《周恩来年谱》，张春桥曾经两次阻挠经济的调整。第一次是在１９７２年初反对《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和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第二次是在１９７３年２月再次反对国家计委提交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但是张春桥的作用无疑被大大地夸张了。因为不论张春桥反对与否，《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中根据周恩来提出的「现在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若干整顿措施，例如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经济核算制和质量检验制度等七项制度，抓产量、品种、质量等七种指标也都被与会人员传达，但是由于没有采取根本的调整，因此「两个窟隆」在１９７２年依然出现。换句话说，批极左带来的成绩都被战备消耗了。　至于张春桥在１９７３年的反对更是丝毫没有影响整个「四五」计划纲要的调整。因此，笔者认为国内官方把周恩来和张春桥的在经济调整中的作用都不成比例的夸大了。更多的是在毛后时代，为了攻击张春桥，这些可能不足挂齿的事情都会被严重放大。

在整个「批左」的过程中，毛泽东是启动每一个「阀门」的关键，周恩来不仅要取得毛泽东的同意而且毛泽东的同意是必要前提条件。　　但是毛泽东对于经济领域的干涉和他介入解放老干部的情况有很多不同。经济方面，毛泽东仅是制定指导方向，具体计划由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制定，然后毛泽东批准。１９７３年5月份，毛泽东更是指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同一个时期，除了上述张春桥的两次阻挠之外，没有其它记录表明江青等人插手经济领域的「纠左」，这更加说明了江青等人采取的在意识形态上维护「文化大革命」和实际纠正左倾错误方面的策略和毛泽东是一致的。反过来，也表明当周恩来随着纠左的领域的扩大，涉足文化、教育、科学、意识形态的时候，这和「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相冲突的时候，江青等人的意见实际就是毛泽东的意见。特别是到了１９７３年下半年之后，毛泽东逐渐把注意力放到上层建筑的时候，江青等人再次活跃起来。因此，无论是周恩来主导的整顿工作还是江青等人的所谓「反对活动」，都是执行毛泽东的决策，都会随着毛泽东的改变而改变。用一个形像的比喻就是文革是一辆战车，毛泽东是这辆战车的主人和驾驶者，他永远操纵着这辆战车，周恩来和江青等人是这战车上不同的部件，在不同的时候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

《毛泽东传》的作者认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同时《毛泽东传》的作者也认为：「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但是笔者认为，不是江青等发难了，而是毛泽东一旦发难了，不是连周恩来都转回身来猛批王若水么？

１９７２年的调整，无论如何从哪个方面看，都无法同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的整顿相比。正如「九?一三」之前，林彪和江青等人也提出过反对过「极左」，「九?一三」之后的调整也是延续「九大」以来的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对于文革的修补，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对于毛泽东而言，任何理论的讨论一旦危及到文革的指导思想，是断然不可能的。周恩来对此是非常清楚的，实际上周恩来同「一块版」和王若水的信的直接关系都不大，都只是周恩来贯彻毛泽东整顿政策时所做的讲话精神的衍生物。正是如此，即使林彪定性改变，纠左还是照常进行。所以张春桥在１２月１９日对王若水说：「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像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亦即张春桥也表态「我并不反对对『极左』要进行完全的批评。」但是这一切到「十大」的时候就开始改变，因为毛泽东的思想在一次反复了！

五、外交部「１５３新情况」事件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周恩来的具体操作下，外交方面终于取得长足进展。继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许多国家与我国建交。特别是１９７２年２月和９月，美国总统尼克

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华，当时是十分耀眼的事。但是事情很快起了变化。

事情起源于外交部自己内部的一篇文章。１９７３年６月１６日至２５日，苏联美国举行高峰会谈。苏美峰会尚未结束之时，周恩来曾对当时的外交部长姬鹏飞说：「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姬鹏飞回部后即找到美洲大洋洲司司长林平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令其加以落实。６月２５日，林平和美大司一处(美国处)副处长张再、苏联东欧司一处(苏联处)副处长田管佩开会商讨决定，由张再执笔写成一篇调研文章，即后来在中国高层酿成轩然大波的《对尼克松一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该文分析、评述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议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编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配气氛更浓」；有协议比没有协议更有欺编性，美苏的真正愈图并非是限制战略性武器。作者最后表示：美苏两家谁也欺编不了，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刊登在外交部新闻司的内部刊物于６月２８日出版的第１５３期《新情况》上。周恩来于当天就看到张再执笔撰写的这篇《对尼克松一勃列日侄会谈的初多看法》，大为赞赏，立即批示：值得研究。随后通给外交部值班室打电话，当时外交部办公厅绪印的《外交通报》也就美苏会谈发表了文章。周恩来在电话里指示：「《新情况》这篇写得不错《外交通报》的稿子应该照着改!」

７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并对外交部的工作提出批评。

７月３日，王海容立即把毛的尖锐批评告诉周。周恩来立刻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周恩来非常清楚毛泽东这番尖锐的指责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当日即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一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然后又诚恳地写道：「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

７月４日，毛泽东撇开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而邀约张春桥、王洪文等人谈话，毫不掩饰地猛烈抨击周恩来长期主管的外交部。　为什么找张王二人呢？毛泽东说的很清楚：「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二人又都是年轻人因此「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至于外交部的文件是「（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屁文件」、「照例不看」，毛泽东用同一类的措词点名批评周恩来，在五十年代批评「反冒进」时就曾使用过。　为了不受骗所以「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例如「郭老现在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其实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重提了历史上周恩来所犯过的错误。

毛泽东再次借严厉指责第１５３期《新情况》张再一文对周恩来长期主管的外交部极为尖锐的批评：「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最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盖棺定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但是最严厉的批评则是：毛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对外交部

掺沙子、甩石头。这不是打倒彭真的语言么？

７月５日，周恩来将三日写给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的信和四日外交部的检讨报告，一并送毛泽东阅，并附信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在周恩来三日写给外交部的信上批：「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

１２日，周恩来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并１４日在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做了重要修改：「（美苏）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第二日，周恩来就将此文送毛泽东审定，并传部分政治局成员校阅，同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内「严厉」二字删去，并批：「检讨不要写了。」检讨不要写，但是要把周恩来所犯错误让更多的人了解。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批告外交部：将《〈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及《新情况》一五三号除发原单位外，加发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７月１４日，王海容在一个由１２８人组成的学习班上，传达了周恩来的话也是屁话的最高指示。

究竟出于何种原因使得毛泽东如此大动肝火？

张再说：后来知道来周恩来对国际问题的一些重要讲话和自己的文章如出一辙，不仅观点相同，而且连语言的表达上也何其相似乃尔！说白了，张再的文章其实反映了周恩来的思想！那个时候，毛泽东在不少问题上仍与周恩来有分歧，甚至「不满」，「《１５３新情况》事件便是一个最佳的突破口」。

就在这个时期，有人（笔者注：唐闻生）将一些外国杂志带给毛看，说外国媒体突出周恩来，很少提及到毛泽东，并提示毛，１５３号《新情况》的观点同毛的思想不一致。

《毛泽东》传记的作者认为是因为周恩来领导下的外交部没有能够很好的理解毛本人的外交政策。

１９７３年2月１７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首次明确提出「一条线」的构想。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6月5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因此，7月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首当其冲的就是张再一文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

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

这或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后来邓小平在联大能把毛泽东的外交思想阐述清楚，对于邓小平来说得分不少。但是笔者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

首先是根深蒂固的毛泽东对于周恩来的不信任。此种不信任源远流长。早在中央苏区，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甚至行政大权。当初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以便协调各地党组织并负责联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仅仅是因为和叛变的顾顺章等人不认识而进入。其后周恩来、王明在强调集体分工时说，博古可多管些工作，但也不是总负责。王明在去苏联之前交代：此临时中央一旦到了有其它政治局委员的地方，要交权出来。这件事情周恩来非常清楚。　　后来王明在延安时期把此事揭发出来，毛泽东的怒气可想而知！那段日子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鬼都不上门」！

其次，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的迁怒。林彪是周恩来揣测毛泽东的想法而向毛泽东提议而成为接班人的。同样这也是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等采取的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林彪事件」关系到对于「文革」以来整个路线、方针、政策及措施如何评价的问题。此后，毛泽东向周恩来询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周恩来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　　毛泽东问江青，江青也如是回答。毛泽东勃然大怒，当初林彪用这么肉麻的话这么样骗我，现在你们和林彪一样用同样的话来欺骗我！　　大陆官方承认「林彪自爆后，虽然众口一词都说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但毛泽东自己，心里是明白的。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林彪叛逃后，主席就大病一场。所以林彪叛逃对主席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有一次，我们听见主席又说起『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民谚，心里就难受。我们安慰主席，主席反而不高兴，说：『你们这是违背自然规律，有生就有死，人都是要死的，不死是屁话。』」

毛泽东的这口怨气，发泄到周恩来头上，也是找对了人。周恩来也是「始作俑者」之一。

最后，根据材料，虽然具体时间有待进一步考证，有次毛泽东在听到王海容和张玉凤读到西方对于周恩来的赞扬时勃然大怒。　　毛泽东想让人知道他才是外交政策的主宰。而正是这种毛泽东的干预才是外交部派别分化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１９７２年底的关于「极左」还是「极右」的争论，只是让周恩来感觉到「蛋炒饭没有加盐」，这次７月份的批周则使周恩来充分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据周恩来的医生回忆：周恩来这几个月心情不好，拒绝化疗，以至癌症复发。

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５日，周恩来同邓颖超会见「表妹」王去病时，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周：你在单位里人家晓不晓得你是我的亲戚?

王：我填表时从不填和总理的关系，所以单位里并不晓得。

周：你为啥不填和我的关系呢?

王：我可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但在思想上并不能保证永远跟上形势，不出差错。

倘若犯了错误，会连累总理的。

周：我也会连累你们啊！

可见周恩来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严重看到非常清楚，也从另一方面说周恩来对于自己将来的命运多桀是有预感的。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深究下去。

１９７３年3月２９日毛泽东决定周恩来为政治报告起草小组负责人后，周恩来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修改「十大」政治报告。　但是「十大」的主角不是周恩来，而是新生力量的代表王洪文。在决定「十大」政治报告由谁作的问题上，毛泽东讲述了历史上「刘邦杀白马为盟，非刘氏不王」的典故。他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呢?在张春桥的提议下，决定由刚到中央的王洪文向大会作政治报告。直到开会前夕（８月２０日)，才改由周恩来作「十大」政治报告。　但是无论如何，王洪文毕竟经验缺乏，还需要周恩来的大力帮助。这才是７月份批周嘎然而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十大」的召开与王洪文等人的崛起

本应该在１９７４年召开的「十大」，提前到１９７３年来开，一是「林彪事件」之影响所致，其次是在毛泽东看来，毛泽东发动文革防止「变修」而采取的关键措施之一就是提拔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而这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防止「变修」而采取的关键措施之一。

早在１９６７年，周恩来在接见国防工业口革命造反派代表就讲：「要提一批，提到处科级、司局长甚至领导岗位，这是革命需要，还不少，把新生力量提上来，这是运动后期要实现的，在夺权斗争中也可以适当进行。抓极少数，罢极少数，调一些，留多数，提一批。这对于「三结合」，改造领导，改造业务有好处。」

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点名「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并概叹「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九大」期间，毛泽东再次表示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应该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　借这股东风，王洪文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更是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而在「九?一三事件」前后的王洪文的表现也让毛泽东满意。　一九七二年七月，毛泽东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

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被大陆官方所津津乐道的１９７２年的4月２４四日《人民日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是由周恩来亲自审稿的。社论亦提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在１９７３年，年龄上的「老、中、青『三结合』」正式代替了文革早期各级领导机构组建的时候曾经提倡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群众代表『三结合』」(实际上是老官员、军人和造反派代表的结合)。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以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一大批新生力量被结合到中央领导班子里面。

亲历者王殊回忆：１９７２年７月被从德国紧急召回后，在７月２４日被毛泽东接见。毛泽东谈到国内问题时，看得出来他最关心的是重建在「文革」中遭到破坏的各级政府和党的机构，克服国内的混乱状态，恢复正常的秩序。他着重谈到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对总理说，你要到全国各地去，在工农兵中好好找一找，找一些人来担任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政府中的副总理、副部长，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等。要尽快地去走一下，在工农兵中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年纪轻一些的，当然也要顾大局的。要认真地找一下，把这样的人找到。……两天后，周总理召集我们和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学习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在谈到从工农兵中找人的问题时，总理提到了当时一些工农兵代表人物的名字，说这些人在群众中是有一些威信的，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太低，要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估计会有很多困难。可能要办一个学习班，让他们学点理论，学点文化知识，并且总结一点经验教训才好。后来，周总理经毛主席同意，办了几期中央读书班。调来了一些工农兵代表人物－－这个很重要的参加，但也混进了一些造反派。举办读书班的时间不长，在１９７３年８月举行的中共「十大」和１９７５年１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上，一些参加读书班的人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１９７２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姚住在一起。毛泽东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自此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包括绝密的讨论……总之，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１９７２年１１月，张春桥到上海，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说，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们只参加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的会议，他呢，总理开的会，他都要参加，国务院那一坨，中央军委那一坨，甚至连国家计委的会议，都请他去参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们多，总理指示，各个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过来……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张春桥宣布，经与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　此后，由周恩来、王洪文联合署名向毛泽东报告，周、王一起准备四届人大，周恩来、王洪文一起渡过了一段比较愉快的合作时光。对于周恩来的提携和帮助，王洪文也是报恩的。

１９７３年7月份，毛泽东对周恩来大发雷霆，怒到「外交部的文件是『(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的地步，可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十大」要召开，王洪文要周恩来的「传帮带」，在这个时机上，毛泽东批周的风波注定是小打小闹。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不仅在「十大」上点了周恩来的问题，而且「十大」结束不久，就抓住了机会，在十一月份所谓「帮周会议」就上演。周恩来到达了人生的低潮。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结束，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首长接见。叶剑英突然在讲话中提到接班人问题：「主席从６４年起就讲接班人。在座的王洪文同志，贫农出身，参加抗美援朝，又当过工人，三十多岁；主席早就注意了，要培养。」周恩来的讲话更直接：「毛主席说，外国人说我们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其实老的中间也有『修』的。我（毛）的意见是要搞些年轻人当军委副主席、党的副主席。」接着周恩来说：「我讲一讲，让你们有个精神准备，让你们震动一下，看你们受得了受不了。年老的容易保守、自满，也会摔跤。主席讲年龄要在三十岁到四十之间，工人农民。」王若水回忆：这时全场的眼睛都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

然而让人容易忽视是另一个方面－王洪文的独立性。虽然王洪文和张春桥的关系非常深，但是关系却非常紧张。虽然王洪文是张春桥的下属，但是却敢顶撞张。特别是分别作为王洪文的在上海的代言人上海革委会第三副主任王秀珍同代表张春桥的第二副主任徐景贤有激烈冲突。　　这是毛泽东非常看重的一点。为此，毛泽东还要做张春桥的工作。毛泽东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　　但是后来王洪文却丧失了这种独立性，是导致其失宠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１９７３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比邓小平的级别要高－笔者注）；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１９７３年8月2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可先开预备会议，草拟各项人选名单，此事拟由王洪文为主，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为副进行工作。4日，致信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议定各事。随后，周恩来连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洪文主持下的中央「十大」筹备小组提出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名单和「十大」主席团名单。１９７３年8月１３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几天果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并附上两份名单。信中提出：「为使筹备和准备工作衔接得好，（选举准备工作委员会）主任仍为洪文同志，副主任七人（即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均是在京政治局同志。」毛泽东表示同意。　　周恩来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8月２０日，「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毛泽东让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立即从主持人的位置下来，让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泽东选中王洪文，高层阻力很大。「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工农兵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轻干部……但周恩来说完，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吭声，张、姚不好抢先表态，坐在一边的王洪文十分尴尬。许世友表示就表态说：「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叶剑英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６０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２７

岁，孙策小霸王１７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３０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２０(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３８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一席话扭转局势，王洪文勉强跃升到党内第三位。

许世友的态度，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对于「乘火箭」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为此，毛泽东决定有必要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１９７３年8月２３日，周恩来主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周恩来传达、解释了毛泽东关于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路线，说明自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多次表示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的意愿。提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应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在此次讲话中，周恩来还说：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

此话后来被大陆党史界广为引用，以证明「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旧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十大」政治报告同周恩来无关。　更有甚者，提及此报告时，丝毫不提做此报告者周恩来的名字，反而特意点出该报告的起草者张春桥等的名字，为「尊者讳」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９７３年3月２９日，毛泽东决定周恩来为政治报告起草小组负责人。１９７３年6月１６日，周恩来去毛泽东处谈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次日，致信张春桥，转告毛泽东对「十大」政治报告的意见。１９７３年7月３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草稿和修改党章报告草稿。次日，将两件草稿讨论情况及其它「十大」准备工作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１９７３年7月５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１９７３年7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读、讨论「十大」政治报告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并商定由张春桥、姚文元再加斟酌后，印成修改送审稿报送毛泽东。周恩来的事无巨细，事必亲躬的做事风格，怎么就会在「十大」政治报告上消失了呢？周恩来为什么这么讲？笔者认为，既然毛泽东刚在7月份指责周的文件为「屁文件」，周恩来自然要替毛泽东圆场。

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时，毛泽东插话说：「对。」　这实际上针对周恩来的批评。

继５月份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候补)、江华（候补)、江渭清（候补)、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笳、曾希圣等十三名老干部之后，在「十大」上，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李葆华、、秦基伟、陶鲁笳等人被选为中央委员，廖志高、江华、江渭清

为候补中央委员。而其中的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陶鲁笳、秦基伟、李成芳、方强等人很快被任命到各省、国务院各部和军队。

毛泽东寄希望这些老革命干部不计前嫌，能和新生力量携手共进。「十大」的政治格局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想法。「十大」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处找吴德等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着房子外边菜地里的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王洪文在「十大」上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同样表达了毛泽东的愿望：「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１９７３年年底，毛泽东还就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进行了驳斥，应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线，小兵提升」。

从１９７３年9月１２日，一直到１９７４年5月底，毛泽东１６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　　在「十大」前后的周恩来的职责就是「培养」王洪文，因此两人的交往特别密切，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交往却几乎没有任何记载。当毛泽东要求王洪文、张春桥学习英语，免得上了「那些老爷们的当」时，王洪文真的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姓黄的教员，教他英语。但是王洪文却没有在外交部「插一脚。」

中共「十大」以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　　在周恩来病重的时候，也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无论是流传颇广的声称周恩来在１９７４年6月1日才离开西花厅到３０５医院就是因为要等邓小平从联大归来，还是邓颖超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周恩来去世数年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透露，周恩来为什么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她说：「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伙人乘他住院时间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去住院治疗。」　因为在周恩来在离开西花厅之后，是由王洪文接周的班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

在邓小平出席联大的风波中，王洪文是非常配合的。3月２５日，周恩来就和王洪文一起提议请示毛泽东，由毛最后定夺。只是毛泽东当天太累，未能面谈。但是毛泽东让秘书传话给周恩来、王洪文：关于邓小平出国一事，他是个人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闻讯当即表示：将于明日向政治局传达，并对有关同志做工作。王洪文也作了一番表白：原先他并不清楚，既然毛主席这样说了，当照此办理。周恩来随即乘热打铁，委托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谈，做做工作。3天后，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商讨对邓小平参加联大会议的方针问题，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均称病缺席但是王洪文参加了。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在其回忆录里谈到：１９７４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正在输血，王洪文的秘书打电话来要求周恩来去参加会议。周恩来不得不拔掉针管，赶去开会。　　主流媒体纷纷渲染此事是「四人帮」故意干扰，使周恩来不得安宁，是一种非常残忍、毫无人道的迫害行为，是对周恩来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说法。首先，《周恩来年谱》明确记载了自１９７４年１月至5月，根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五个月共计一百三十九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

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有五天，只有十三天的工作量在十二小时以内。此外，从三月中旬到五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二十一次，外事活动五十四次，其它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根据王力回忆，在文革早期碰头会的时候，只要通知周恩来，周恩来没有不到的时候。　　张佐良同时也写道当时周恩来就表示「不悦」。

其次，张佐良同时讲，是邓颖超写了纸条要求周恩来去参加会议，而不是向王洪文说明周恩来正在输血。　　说明知周者，邓颖超也。就是作为秘书的纪东也没有向王洪文说明情况。因为作为周恩来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恩来的工作习惯。

最后，王洪文对于周恩来的的健康是非常关心的。看过王洪文在周恩来的医疗报告上的批示的人说：从批示可以看出王洪文真的对周恩来的健康很关心，很焦急，不是造作的。　此次通知开会，王洪文或许并不知道周在输血当中。后来王洪文对于「长沙告状」一事说：

关于这次告总理状的问题，最近我又反复回忆，并没有在主席前说总理的坏话，因为在这个时期，我没有同周总理有过任何分歧，总理也未批评过我，我没有理由告总理的状，我当时的思想活动，只是认为总理生病，没有很好休息，还在指挥工作，这个我在政治局几次会上讲过，而且采取措施，如少批送文件给总理，动员大家少去看望他，这个思想在医疗小组也提过，同周本人也讲过，关于总理有病不休息的问题，我以前曾向主席「告状」过，第二次去长沙，我还向主席讲过，这个思想被总理阻止，后来总理说我干扰了主席。

最为明显的是在１９７３年的两次批周过程中，王洪文都无批周的言语，并且主持会议的时候非常公道，不似江青和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等人（包括李先念、耿飙、许世友、乔冠华等人），上窜下跳，活跃的很。　　章含之甚至说，王洪文是持中立态度的，没有在会议上添油加醋，而且还在江青太过分的时候制止她，不让她乱讲。　　在后来的的四届人大准备过程中，王洪文和周恩来的配合也非常的好。

一位资深党史专家说，王洪文对于周恩来非常尊敬，在１９７５年年底的时候，周恩来还建议王洪文同江青联系少一些为好。　　因此笔者认为，后来王洪文和周恩来的关系在文革后时期被大大歪曲。

１９７０年夏天，由周恩来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１９７１年７月，王海容被正式任命为礼宾司的副司长。１９７２年，王海容被提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再过一年多一点，王海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显然，这些都是周恩来一手操作。王曼恬在１９７０年就进入国务院科教组，也只能是因为其和毛泽东的关系才被周恩来「塞进」去的。

在文革后期大出风头的毛远新在文革初期就是周恩来的联络员。阎长贵回忆：１９６７年春夏，毛远新回到北京后，住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住的楼）。毛因为他到少数民族地区造过反，要他读点民族问题的书，研究一下民族问题。为此，我（当时任江青的机要秘书）还帮他从《红旗》杂志图书室和中宣部图书馆借了十几本关于民族问题的书（主要是列宁的）。在这次交谈中，我问他，在１９６７年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周总理转来你写的信让江青阅，怎么没看到你给江青写信啊？他告诉我，他从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就是周总理的联络员。这是他在「文革」中第一次当联络员。　　更为蹊跷的是，毛远新到辽宁任职一事。

余汝信先生在《<陈锡联回忆录>的弦外之音》之中论述到：

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中央同意成立辽宁省革委会，在中央的批示中，毛远新列名为副主任，排名第七。经查证档案数据，毛远新被安排至辽宁任职，并非沈阳军区或陈锡联本人主动提出，前于４月２２日，陈锡联向中央、中央文革并军委办事组提交《关于筹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意见（第二次修改稿)》，这是陈关于此问题的最后一个报告，共有三大点意见，提出了省革委会中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的人选，其中完全没有提及到毛远新的名字。

但是在１９６８.０５.０８；中发〔６８〕７０号于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云：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五月七日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而在此报告中，对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其中第３条：

３，建议省革命委员会由陈锡联同志任主任委员，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国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委员（暂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

余汝信先生说：有关毛远新事，我在辽宁省档案馆中并无看到沈阳军区６８.５.７报告原件。从军区５.７报告中央５.８即批复来推测，该报告将毛列为副主任应是中央的授意并非沈阳军区主动提出，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陈４.２２未提而军区５.７提出第二天中央就批了。在当时情况下，甚至报告本身中央都可代拟的。需要说明的是因未看到报告原件，以上所说，只是一种推断。　笔者认为余汝信先生所言有理。笔者更是大胆推测，此实乃周恩来揣测毛意而提出。当然此说法仍然需要档案材料来证明。

作为「文革中的红人」谢静宜同周恩来的关系也是非同小可。毛泽东的私人保健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隐去谢静宜她的名字，但在英国广播电台的访问谈话中透露，谢是毛的女人之一。早在文革之前，她就在中央办公厅为毛举办的舞会上被毛选中，据李志绥透露「毛同她很好」。一九六七年七、八月，毛说要南下去长江游泳，指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陪同前行。行前，周恩来告诉杨成武，中央决定由他担任周和毛的联络员，并告他：「要中央机要局送两名译电员跟你去。」据杨成武回忆：「中央机要局送来的两名译电员，一名是广东人，一名就是长春机要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央机要局工作的谢静宜。」 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在其口述史《十年风雨纪事》，谈及谢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大概在１９７３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吴德还提及１９７４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　而在「十大」上，谢静宜已经是中央委员！周恩来「投毛所好」，不能说一点没有吧！

七、严厉的批周会议

毛泽东晚年对于功高震主者极为敏感，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１号号令）都在这上面摔了跤，如今轮到了周恩来。毛泽东对周恩来从来就不信任，外交上打开局面以后周恩来在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大，毛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嫉妒，终于在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份忍耐不住而爆发。这就是严厉批判周恩来的所谓「帮周会议」。其借口仅仅是周恩来在同来访的基辛格的会谈中立场不稳，并且私自作出决定。事实上周恩来，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具体操作上，根据美国解密档案，均无问题。毛泽东透过江青之口，透露出此次实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以至于周恩来的卫士都想到可能被送进监狱。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没有文革初期的勇气，而且「林彪事件」刚过去不久，中国的社会也经不起大幅动荡。再加上邓小平和王洪文的连手格局尚未形成，这次「帮周会议」终于没有进行到底。但是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并没有放过周恩来，事实证明，周恩来一天不死，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判就不会中止。

１．批周的借口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此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还中国，政治局势都已大大改变。在美国，尼克松陷入「水门」丑闻。在中国，５月份，毛泽东首次提出「批孔」；７月份周恩来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８月份，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地位确立；到了１１月，批林批孔的文章已经是日渐增多，所有这些都严重的削弱了周恩来的权威和地位。周恩来变得更加小心与敏感。江青在１１月１３日向周恩来提出，原为对外友协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只印发周恩来、江青二人事，现在「这类简报，建议也送春桥，文元同志。」当日，周恩来就批告外交部：「请从今起，外事活动简报，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体同志，及有关各部、委、组，望通知友协照办。」

在这次访华中，周恩来与基辛格在５天里共会面１０次，除去两次礼节性的宴会和陪同毛泽东的１次，共会谈７次。　　就在１１月１４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１５日早，王海容、唐闻生拿着周、基最后一次会谈的记录稿，将划有杠杠之处念出来，问周恩来：「您是这样讲的吗？」周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笔者认为对于无论是王海容、唐闻生还是周恩来都认为是「技术」问题。特别是王海容和周恩来的关系如此亲密的情况下（见前文，王海容向周恩来私下透露毛对张再一文的不满），毛泽东在没有拿到具体的证据之前是不会「打草惊蛇」的。对于王、唐来说，在未得知毛的确切表态之下，也不可能向毛泽东歪曲汇报。　　毛泽东拿到王、唐同周核对之后的谈话记录后，根据张玉凤的回忆：唐说，那就怪了，这么大的事，总理为什么不请示主席，也没和政治局其它人商量，就急忙去见基辛格，答复建立核保护。　　笔者认为这只能是毛泽东的授意下，唐闻生等人的四处散风，造舆论。事实上，当唐闻生和王海容两位小姐把周同基辛格谈话记录送给毛后，毛当场就说：美国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这把伞叫核保护伞，这把伞我们是不能要的。还说：果真苏联打过来，就知道谁是敢打的，谁是要投降，当儿皇帝的。

关键的问题有二个，第一个：周恩来为什么没有报告毛泽东？第二个，所谓的「核保护伞」的真相是什么？

关于报告毛泽东。１３日晚，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

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复。当晚的会谈一直进行到０时３０分。结束后，周恩来对乔冠华说，现在太急了，基辛格的问题要马上答复，要报告主席。　周恩来立即打电话到毛泽东的住地中南海的游泳池电话，不料那边告知：「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着的。」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说：总理打了电话了，当时主席在睡觉，时间又不能等。　周恩来此时非常为难，一个原因是睡眠对于晚年毛泽东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好不容易睡着了就决不能被叫醒，因此当毛睡下以后，周一向不去打扰，其次此事情又十分紧迫，在毛泽东醒来之前基辛格就会离开，因此周恩来急的在办公桌旁「团团转」

文革发动之初，７月１８日晚，刘少奇知道毛结束南方巡视，从武汉回到北京时，立即赶到丰泽园，想向毛汇报，但是门口不让进，说主席需要休息，实则不然。　这次是不是故伎重演呢？

关于核保护伞。根据１９９９年美国国务院宣布解密的中美关系档案，美国确实有一个「核保护伞」计划。 １１月１０日晚，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同行的官员洛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基辛格主动向周恩提出可以向中国提供情报，使得中国在遭到苏联突然袭击时减少军队伤亡和并提供提前报警的技术，并表示可以由随行的豪尔司令来具体介绍。这件事只有四五个人知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表示现在这事不急，可以以后再讨论。但是在１２日，基辛格和毛泽东的会见中并未就此事直接交流。

１１月１３日晚，基辛格表示除了提供情报、在装备上及其它方面给予援助之外，还提出准备在美国卫星与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重点在于将情报快速传递给你们，这样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将消息传给北京，双方还可以就防止突发性核战争上签署协议。基辛格特别强调：这不涉及任何互惠或任何正式关系，而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及若干常规情报而做的建议。周恩来表示：至于你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们必须研究一下。明早在你离开之前，我将去拜访并送行。我想，有些事我们双方都用得着。虽然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实问题同样举足轻重。无论如何，周恩来表现出了热情，这或许被指责在「中美情报合作提议中表现太慷慨」的缘由？

１４日早上７时３５分，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基辛格留下了两份协议，一份是关于建立热线，另一份还包括共同防止苏联袭击的内容。周恩来说：如果如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措施上合作，对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基辛格：总理先生，要秘密地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但是同时周恩来同意指定黄镇继续与基辛格交换中美情报合作问题。　在毛泽东的眼里，这就是没有事先获得毛的同意，亦侵犯了毛的权威。

早在１９７２年１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除了为尼克松及其访华的大队人马进行技术安排之外，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就是受尼克松和基辛格所托向中方转达一个重要口信。该口信在对国际局势、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越南战争和苏联威胁做出一番分析后得出下述结论：「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所以美国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钱宁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对此，周恩来给予强烈反击。1月6日深夜１１时３０分，周恩来、叶剑英会见黑格及其所率先遣小组一行。周恩来表示：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周恩来对于国家主权是非常敏感的。

周恩来在首次同在基辛格谈完有关台湾问题后，周特意审查了翻译唐闻生给毛泽东的会议记录，而且是和唐闻生一起向毛泽东做的汇报。但是周恩来的看法和毛泽东还是有点不同就是，周认为有两种可能性，这导致了１２日毛泽东同基辛格会谈时候指桑骂槐，表示了对周的不满。毛泽东对基辛格说：「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有可能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之间的问题，就相当的复杂。我不相信会有和平解决方案。」此时毛泽东问姬鹏飞说：「你相信吗？」这或许是周在台湾问题上表现软弱的来由？

陈东林先生认为：这次会谈中，周恩来是遵循毛泽东的「一条线」策略进行的，他坚持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原则，更没有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什么。同时，周恩来也确实对美方提议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虽然他没有做明确的许诺，也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才能决定。美方虽然有个「核保护伞」计划，但基辛格鉴于以前黑格提出「保护」被中方怒斥的教训，只谨慎地提出了建立热线的建议，也没有要求任何交换条件。今天看来，如果在平等基础上中国能够得到一些有重要价值的军事情报，自然对国家安全有利，何乐而不为？毕竟中美两国在１９８８年还是建立了热线。当然，美国也可能企图用一些信息来诱导中国，但毕竟判断权在中国。这谈不上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而且基辛格强调：这不涉及任何互惠或任何正式关系，而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及若干常规情报而做的建议。

５０年代，苏联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中苏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依次向中国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但是这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弹。毛泽东把尤金召到中南海去谈话，指责苏联，发泄他长期以来积压的对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不满情绪，包括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在中国使馆安装窃听器；苏联前任大使罗申在中国外交部发展情报员；贝利亚与高岗勾结，多次派人与高岗联络；苏联驻新疆领事馆通过非法渠道收集情报等等。苏联人的印象是毛泽东整整讲了一天。

现在是美国向中国提议，共同对方苏联，要提供装备，要建立热线。毛泽东本就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感到不快。　　现在美国是不是要利用苏联压力打「中国牌」？像苏联一样利用长波电台、联合舰队来控制中国？直到１９７５年６月，毛泽东对美国人的建议仍然耿耿于怀。他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时说，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送给我们「保护伞」，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不要。

但是毛泽东的不可能找到一个类似尤金的美国人喋喋不休的骂上一天，例如找基辛格？伴随对美国的强烈不满，夹杂着长期以来对周恩来的愤恨，周恩来成了坐在中南海边上的「尤金」。有没有向毛报告都是整周的借口，真正不满的是周因为外交的成功而在国际上获得的巨大声望；同时在国内因为纠左、解放老干部导致周成为老干部和普通群众中的代言人。古话说的好：无心插柳柳成荫。所有的这一切，受到压迫的毛泽东在基辛格一离开中国，就开

始「升帐点火」，周恩来进入了人生中的最低潮。

２．批周的过程

１１月１７日，毛泽东泽东亲自出马，在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严厉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并放出狠话：「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由于周恩来开始拒不承认其在中美会谈中对美国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会议相持不下。于是毛泽东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从１１月２１日至１２月５日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主题为「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也飞来参加批斗，许世友等人就是连夜赶来的。

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认为：「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有用处了，像要动手杀『牛』了。」 另外，「十大」已经召开完毕，王洪文也可以主持政治局会议了，真的要卸磨杀驴了么？

会议对于周恩来的摧残是双重的，身体上的，更严重的的精神上的。高振普回忆：总理病情明显加重，尿血量增加。　　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卫士长张树迎回忆道：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实为人民大会堂）里天天开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面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想心事。

作为周恩来的医生、卫士等充分知道了什么叫世态炎凉。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热情的打招呼，现在有些人则竭力回避，即使迎面相遇，也是冷若冰霜。周恩来在家里偶尔和邓颖超同桌吃饭，也是相互不讲话，西花厅气氛异常沉闷。平素很受人重视的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无人在给予他们应有的礼节性问候，他们成了不受欢迎的一个小集体。张树迎对张佐良说：「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带上手铐，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只有叶剑英、纪登奎表示对周恩来的关心。

会场内的周恩来也是孤立无助，当求助他人帮忙时，得到的一顿训斥。周恩来因病右手发颤，拿不住笔，所以，请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帮助他记一下，哪知道这位平时笑容可掬的女同志立马杏眼圆睁，厉声的指责：「怎么？你想秋后算帐？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她们的发言是慷慨激昂、无限上纲唯恐批的不彻底。

各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赤膊上阵。许世友，在椅子上不安分的跳上跳下，用手指着周说：告诉你，总理，如果苏修打进来，美帝打进来，你如果想要做儿皇帝，我告诉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允许你的，不会放过你的。叶剑英说他和那些所谓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都没什么关系，参加基辛格的军事会谈是周恩来同志叫我去的。叶剑英还冲着周恩来说：总理，都是你呀！把我拉进来了。你看现在犯了这些大错误，我的心情也很沉痛，可这些事都是你拉着我的呀，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参与这些事了。李先念也直说总理都是你呀。耿飙则指责周恩来把外交部搞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在党内搞宗派。耿飙还借机说周恩来用外交部排斥中联部，中联部是张春桥领导的，因此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的。　　乔冠华则指责周同毛主席唱对台戏，对抗中央，凌驾于主席、中央之上，并称周管外交部管了２９年，不原原

本本的告诉我们主席的指示，不知道什么是主席的，什么是他自己的，自己说了算。乔冠华还说周的错误「不是偶然的，由来已久。」

参与「围剿」的乔冠华两年后向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当面检讨这件事，请求他原谅时，周恩来表示：「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

无论周恩来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都无关重要。作为从抗争时期一手培养的嫡系，反戈一击造成的刺痛绝非是唐闻生、王海容等人造成的伤害可比。但是此时的周恩来有没有想起了刘少奇、林彪等人？所有的这一切，不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么？

同时不也正说明，如果不是刻意维护，周恩来的形像又怎么是如此「高大」呢？

会议期间，周恩来因无端蒙冤受辱，心情郁结而使得病情加速发展，体内的肿瘤细胞长得很快，侵犯了周围的血管，造成溃烂出血，膀胱里积存了大量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口。他每次上厕所都很痛苦，要化很长时间，用力晃动身子才能排出。扩大会议后期，周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为此，江青、张春桥还斥责周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的批判，又给他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

会上，江青提出这一次是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想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以及汪东兴为政治局常委。　　江青提出增补常委，同毛泽东提出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增补常委，是同出一辙。既然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不就是下一个刘少奇和林彪么？江青此举实为欲探知毛泽东批周的底线。

是否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值得考虑。第一，毛泽东自７２年初到７３年的「十大」，对于毛后时代有人会走修正主义路线，否定文革的担忧愈来愈烈。而周恩来在历史上的表现是「墙头上的草」，先是跟着博古跑，后来跟着王明跑，这一切都让毛感到恐惧。在江青抛出第十一路线斗争之前，毛泽东就告诉江青，周恩来要夺权。当江青提出后，政治局的人没有人对此提法表示怀疑。　　第二：从１９７３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就让人把在延安时期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印成大字本，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后来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远新，甚至准许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内容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　　毛远新还调查周恩来的历史问题。　　毛远新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说：「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

根据现有材料，王洪文并无出格之言论。且在１２月９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江青做了屁股，毛泽东做了脸。毛泽东也并没有说批周恩来是批错了，而是「开得很好」!（笔者注：实为批的很好。）

３．批周的结局

从尼克松访华一开始，周恩来在某些细节部分就「用心良苦」。１９７２年2月２１日，尼克松访华。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出那张著名的尼克松微翘着脚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同周恩来握手的照片。但是这张照片是假的，经过「移花接木」式的处理。照片中的站在后面的翻译，人民日报登的是王海容，实则是冀朝铸。此「换人术」的决定只能是周恩来作出的。因为这类重大事件的照片审核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刀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周恩来指导《人民日报》的原则居然是：尊重事实才能尊重真理。

而周恩来以前对于此等事件是非常痛恨的。１９６３年5月２２日，刘少奇、陈毅圆满结束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的友好访问，乘专机回到北京。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欢迎刘少奇访问归来的消息和社论，并配发了机场迎接的照片。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室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时发现此张照片是经过「换头术」处理的。为此，周恩来十分愤怒：「岂有此理，荒唐!」当事者回忆，周恩来火冒三丈，将报纸重重地摔在桌上，吩咐秘书把负责那天活动摄影的摄影师和有关人员找来，猛克一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周恩来年谱》在１９６６年7月２２日的记载，周恩来指示「过去新闻照片拼拼贴贴的情况很多，今后一定要避免这种做法。」

将冀朝铸换成王海容，而王海容同毛泽东的关系，天下人尽知，此事只能说明周恩来想通过此事向毛泽东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在外交方面，只有毛泽东才是最高权威。也说明周恩来在政治需要面前，对于原则、是非的践踏也是随心所欲的。

从对于《中美联合公报》中的一个词的用法，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外交事务的控制之严与周恩来的「言听计从」。2月２５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最后，这个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事后，周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在连续几天的中美会谈期间，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肯定的基辛格的说法：「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

但是无论周恩来如何做，结局早已经注定。周恩来不得不顺毛意，而且还要加码，表示自己不仅唾面自干，而且是心甘情愿。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做４０－５０分钟的检讨就好，结果周恩来做了７个小时的检讨。　　周恩来对所有的指责照单全收，为了打消毛对他的的疑心，周在检讨的末尾还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

尽管毛泽东不同意江青把会议内容捅出去，但是在１２月１１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外交部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帮周」会议有关内容。信中还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议，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批准了此信。　　对周恩来的「批评」被扩大到了相当广泛的范围。

１２月９日，他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故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当着外宾的面，谈笑风生地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等等。

１９７４年１月，外交部组织了１８０人的读书班，人员是由各大使馆老、中、青代表组成，专门为批判周恩来使用。此举意味着毛要在整个外交系统搞臭周恩来。

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２日，毛泽东接见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向陪同接见的周恩来发问：「总理，你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毛泽东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也笑了：「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在说，抓大事还不会抓，没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无论如何，已经刮起来的「批林批孔」之风愈演愈烈，接着是批经验主义与评《水浒》，毛泽东也不时的把那九篇文章拿出来欣赏一番。事实证明毛泽东确实有彻底整治周的打算。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没有文革初期的勇气，「林彪事件」刚过去不久，再次使社会大幅动荡，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状况都不允许毛泽东这么做。「林彪事件」给了毛泽东致命的打击，毛泽东的精心准备的把戏没有派上用场，而林彪拒绝检讨也使得毛泽东没有享受到斗争快感。

更关键的邓小平和王洪文的连手格局尚未形成，也为了不致于使自己在「十大」努力经营的「老少共携手」的格局泡汤，这次「批周会议」终于没有走到彻底打倒周恩来的路上去。

然而，毛的暂时的歇手，并不表示放弃。但是无论如何，毛泽东一定在整治周的过程中得到快感。

１９６７年８月，毛泽东在上海，在观看上海造反派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电视镜头时，表些陈、曹被迫做的「喷气式」「这算不了什么嘛。」　纪登奎曾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次斗，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九届二中全会后，周恩来让邱会作做黄永胜的工作：不是发言不发言的问题，主要是检讨宗派主义，让主席高兴点！

也许因为周恩来的自虐带给毛泽东的快乐最大，每次折磨都有新的感受，这或许是周恩来能活到１９７６的最主要的原因？

４．批周的的余波

１９７３年５月份，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并要求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　随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批孔的事情。「十大」的政治报告又提出「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在此背景下，清华大学「反击右倾回潮」的三个月运动出台。同一时期，大量批孔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其真实意图之一既不在于批判已经被打倒的林彪和孔子，也

不是替秦始皇翻案。毛泽东主要着眼于解决对待「文革」的态度问题，即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肯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而许世友对于王洪文的态度，使得毛泽东认识到来自军头的反对是最大的忧患也是未来对文革派掌权最大的障碍。且自「三结合」以来，在领导班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军队干部拥军自重，雄踞一方已经多年，并不是毛泽东自己怕这些「山头」，实为后人铺路，于是八大司令对调出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司令对调会上提出「修正主义」与读《水浒》。「修正主义」与毛泽东提及《水浒》中「接受招安」都是针对否定「文革」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倾向而言，与「批林批孔」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毛泽东随后通过批林批孔更加牢固的控制军队，在这复杂的背景之下，「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也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１）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是为了让「批林批孔」运动在各军区顺利的开展，否则「盖子」揭不开。「盖子」揭不开，毛泽东怎么知道你同林彪的关系有多深？；（２）成立以王洪文为首的项目组专门处理各大军区的揭发材料，自是为了树立其权威；（３）警告这些军头不要站在周恩来一边。

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先是提出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接着话锋一转，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在随后的几天里，毛泽东多次含沙射影、怵目惊心的讲：

我还可以打几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谁想当皇帝？谁会搞修正主义？毛说：苏联要是打进来，周恩来就是儿皇帝！美帝要是打进来，周恩来就是投降主义！

毛泽东为什么对周恩来如此看法？早在１９６４年周恩来和贺龙访苏时，就发生过苏联人劝说周赶毛下台之事。事情更加严重的是，１１月８日，美国、英国等国的通讯社根据头一天马利诺夫斯基一事从莫斯科报道：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

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对许世友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这是毛泽东晚年第一次在高层会议场合提到《水浒传》。虽然仅寥寥几句，却已形成了１９７５年评《水浒传》批判「投降派」的肇端和雏形。１９７５年8月１４日下发的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中主要内容就是「冰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昆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昆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１９７５年的评论中还用对比的手法对「招安」和「非投降派」斗争还有深入阐述：位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招安」不就是投降么？原来「修正主义」、「儿皇帝」和批「水浒」是一条线。既然，

周恩来是投降派，毛泽东自然希望许世友是「非投降派」。毛泽东劝许世友等人读《水浒》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

第十一章 「批林批孔」批周公：

在身受其害的同时推波助澜

１９７３年底的批周会议和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为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奠定了基础。名为「批林批孔」实为「批周」的运动，周恩来既是运动的领导者也是被批者。

毛泽东发动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是要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未完成的任务。文革开始，天下大乱，毛泽东不得不依靠军队来维持政局的稳定。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在王洪文和邓小平组成的政治格局稳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反过来整治军队，为未来的接班人打下基础。此时，小平的崛起完全是毛泽东一手促成，周恩来并不是中共官方所认定的主动积极，而是被动、消极的。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关系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４这段时间里是非常淡漠的。

但是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意图，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军队里的地位并没有建立起来。周恩来的病情发展以及「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乱状态，使毛泽东决定停止「批林批孔」运动。四届人大以及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提到日程上来，为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的整顿打下了基础。

一、「批林批孔」的意图在于批周及整军队

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并不是一次再革命。这场运动的目的并不是象１９６６年发动的文革一样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毛泽东传》的作者虽然声称「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

事实的发展却表明「批林批孔」运动实质上就是「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的继续。从１９７３年春天，毛泽东就开始提出批孔，把批林和批周联系起来；在毛直接指导下的「两校」（梁效）的所撰写的大量「批林批孔」的文章和在北大清华「反击右倾回潮运动」（三个月运动）恰恰是是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的前期运动；运动的对象为周恩来和军队，这是毛在１９７３年底决定的。尽管在激进派的领导下，这次运动有过火，但是毛在１９７３年的所作所为正是导致这次运动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树立文革派在军队中的威望也是其目的之一。所有目的都与毛泽东考虑身后事紧密相连。整个运动也在毛泽东所掌控之中。仅是由于运动的目的未能如预期那样实现才导致运动在８月份悄然而止。

１.「批林批孔」的兴起

对于「文革」，毛泽东非常清楚，反对的人不少，赞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泽东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３月２５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毛泽东还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在１９７３年５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筹备「十大」的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以及精神。　同日以及８月５日，毛泽东两次召见江青，对江谈了批孔等事宜。８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批转的、中山大学杨荣国撰写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９月２３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沙菲说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子。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７月４日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毛泽东在严厉批评周恩来的时候，借批评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时，用尖锐的口吻告诫说：「将来（有人）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同时提到「批孔」问题时，毛泽东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至于两者有何关联，由于整个谈话记录并没有公开，所以并不明朗，但是后来的发展却实实在在的把二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７月１７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时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笔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对于这个问题，王洪文在１９７４年１月份的中央读书班上的讲话对于毛的这个担忧阐述的非常清楚。

１９７４年1月１４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做报告：「这就是提醒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同志们最近看「批林批孔」文章，说秦始皇搞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被骂了两千年，何况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肯定有人要骂，有准备十年几十年以后还有人要骂，还有人出来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孔子死了几千年了，还有人崇拜，秦始皇当时还是革命的，结果被人骂了二千年。」「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证明我们文化大革命搞的是对的，我们的「批林批孔」越深入，蒋介石、南朝鲜、南越、苏修都骂我们批孔，这从阶级观点看是不奇怪的。」

为此「梁效」写作班子应运而生。然而《毛泽东传》的作者却声称他们（指江青等－－笔者注）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

「批林批孔」材料组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成立，由迟群和谢静宜主持。江青开始并不知道。此材料组以及随后成立的「梁效」受毛泽东直接控制，由谢静宜直接向毛汇报工作，并由谢静宜向梁效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梁效」成员范达人回忆：「（谢静宜）她说我们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起来的，她说原来我们搞材料，清华几个人在搞材料，她说毛主席看了几条材料，小纸条，他说不够，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的文科老师一起搞，然后就把我们文科找去了……」　　不仅如此，在迟群、谢静宜等人直接掌控的《北京大学学报》在１９７４年第一期批林的篇目有七篇，占一半以上，第二期，批林的只占一半，第三、四期就完全没有批林的篇目了，只剩下批孔子的了。

谢静宜自己是这样解释：「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那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

谢静宜在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就是说北大冯友兰也写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立即让我们回去，说你回去拿，拿回来，给我看一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去了，然后返回，把那一篇冯友兰的文章拿来给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气地把它看完。很长呐，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镜把它看完呐，一直都没休息，而且还看出了里头那些标点错了，叫我们去改一改，很细。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的，第二篇冯友兰的文章出来之后，又送给主席，主席又看了。」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７日，江青在新华总社学习班讲：「(８月５日)主席那天还给我讲了，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江青有说「主席给我讲：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

于是以历史题材写现实问题的「批林批孔」文章满天飞。但是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对于「批林批孔」赋予了新的含义（笔者注：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１９７４年１月１日，元旦社论）。社论指出：「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社论引人注目的在提及「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时，提出「党委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大事要多讨论，讨论才能引起大家注意。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　　而这不正是而毛泽东在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批评周恩来时说的话么？

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９日，根据毛泽东指示，王洪文在召集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除了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任职等问题的几次谈话要点之外，还重提了文革前夕，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出向「修正主义」进攻。

或许开始触动毛泽东批孔是因为在毛家湾（林彪在北京的住处－笔者注）发现的大量有关孔子的材料，继而认为林彪和孔子思想同源，都是「尊孔反法」、开「倒车」的。同时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隐藏在二者之后却是同跟同源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亲自批转的并向他人推荐的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撰写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中，画龙点睛的部分是「孔子最崇拜的『圣人』」不仅是「周公」，

而且「提倡『忠』」，就是要「诸侯忠于周天子」，目的就是「要巩固各级奴隶主的统治」（复辟）。　　毛泽东不是声称敌人来了，周恩来要做「儿皇帝」的么？熟知历史典故的毛泽东借古讽今，把「批孔」同批判历史上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批评现实当中的某些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２日，王洪文和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提出向全国分发「梁效」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随后，王洪文于１月１４日在中央读书班做报告，再次详细的介绍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出向「修正主义」进攻和解释「批林」要与「批孔」结合。王洪文说：「毛主席说，『我们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的，我就号召地方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这里『干坏事』指的就是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在杭州对许世友同志说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毛主席曾反复讲过这个问题。」王洪文还说：「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要把批林整风深入下去，把「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批孔结合起来，要批林彪的流毒，就要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全面鼓吹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一切守旧的家伙吹捧孔子。林彪是当代的孔老二，批林和批孔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也必须结合起来，要打倒我们头脑里的孔家店。」

１月１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７４年１号文件下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从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正式展开。

２．周恩来的困境

此间的种种奥妙，周恩来心里是十分清楚的。

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会见基辛格。基辛格在最后一次宴会上，提出「孔夫子问题」，基辛格自认为是把毛泽东比作孔夫子，比作儒家。周恩来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周恩来十分激动地坚决指出这种模拟的荒谬。　　虽然当时基辛格对周恩来申辩：应当把我的任何误解当作无知的表现，周也拒绝接受。　　笔者认为是基辛格触动了周恩来的心事。

周恩来也曾试图淡化批孔。首先是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　　其次，在１９７３年底，大量的批孔的文章刊登出来之后，周恩来就１９７４年的工作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时提出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批林整风」斗争。周恩来在１９７４年１月上旬就政治局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报告时，也不涉及「批孔」问题。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开始的「批判无标题音乐」事件同当时毛泽东下令批周恩来外交问题也不是巧合。１０月，中央音乐学院教师黄晓和就替对外友协对于即将来访的土耳其音乐团写了演奏报告。认为其音乐还是比较健康明朗。此前在３月至９月，已经不少外国音乐团来访。但是此次却出了岔子。１１月１８日，江青致信周恩来建议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周恩来回复到今后应尽可能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请友协予以注意。姚文元将黄晓和报告中特指的「两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没有具体情节和标题」的作品，称之

为「无标题音乐」。

巧合的是，就在江青批示的前一天即１７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批判无标题音乐」事件实际上配合当时批判周恩来外交活动的「大合唱」。

对于当时的批孔和批判音乐事件，外国报纸和电文看的非常清楚。英国《泰晤士报》在１９７４年1月１９日说：中国是否准备进行另一次文化革命？……献身革命的纯粹主义者对西方音乐展开了进攻，而西方音乐看来也许远非中国的真正用意所在。这种进攻在这场斗争中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陪衬，可以认为这是新的抗议浪潮的信号，甚至抗议认为这是矛头指向党内上层那些要受批判的人。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１月２２日从东京发出外电：「中国的左翼分子在打倒古代圣哲孔子之后，现在又把矛头对准贝多芬和舒伯特……主要是通过对孔子的学术批判来攻击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领导的对外交流工作被称作是「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很明显，毛泽东还没有放过周恩来。

二、１９７４年1月的在京「批林批孔」大会

１．军委六人小组的成立以及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周恩来建议下，成立了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以替代原来的军委办事组，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１９７４年1月１８日，周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后加苏振华。军委六人小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２０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把王洪文和张春桥列入当然是有其它含义，特别在1月１８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果不其然，在１９７４年1月３１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李先念建议，军队系统的「批林批孔」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2月１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此军委六人小组成立意义甚大。第一个是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以后，对各大司令揭发材料是由王洪文统一搜集并上报中央。　而王洪文原来并无任何军职，此举可以让王洪文名正言顺的参与军队事务，挟揭发材料之威，树立王洪文在军队的威望，增加其在军队的影响力。第二个，军委六人小组管理当时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事宜，并且其成员结构保障了「批林批孔」的顺利进行。在1月２４日召开的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就是一明证。

１９７４年1月２４日，江青在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信中说：「我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二同志向全军指战员（指在下午召开的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ー笔者注）宣读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月１８日《批林批孔》的通知)。」　江青在信中还

提出：「毛主席说能文能武（毛泽东表扬邓小平之语－－笔者注），长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毛泽东对许世友之语－－笔者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双才，才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谢静宜和迟群与毛泽东的关系世人皆知。江青最后的提议则明显的是借用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议上的讲话来向邓小平和许世友示好。这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就在２８日，江青又修书一封，致「洪文、剑英、春桥、小平、锡联、振华同志，请转世友、紫阳同志」，要求许世友和赵紫阳同志协助准备材料。

同日，张春桥批示：「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虽然其它人的批示尚未曝光，至少军委六人小组并没否定江青的意见。但是此信证明了２４日下午召开的解放军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并不是江青擅自召开的。叶剑英等人也都表示同意，是在军委六人小组都同意下才召开的。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有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陈锡联，有军队驻京１４个大单位的干部战士１.８万人。会议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讲话。叶剑英首先申明这个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接着又列举了江青给空军写信，给海军送材料的事，然后说：「我们对于批孔与批林的关系理解不深，指导不力，没有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不够深人。」

２．１月２５日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对于1月２５日召开的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毛泽东传》说江青在会前对迟群讲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话。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甚至不少的文章说周恩来事先根本就不知道，因此毫无准备，并且言之确凿的说周恩来当时讲：「对于这个会，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毛泽东是事先知道的，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

然而对照当时的会议记录，周恩来并没有讲这话。相反，周恩来的讲话说明：周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周恩来还亲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参加「１?２５」大会的通知和当晚政治局会议上准备讨论的内容（此为根据江青的提议），随后并主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动员大会。

周恩来先是承认「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已经落后了。昨天在这里军队已经大动员了。」随后，周恩来对《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做了说明，称「这个材料受到了主席的称赞。」

周恩来同时还对当时中央起草的关于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的通知读了一遍。周恩来特别强调了军队里的「批林批孔」情况「江青同志首先发现了二十军防化连的一个对批孔问题的情况反映，是军报内部参考上登的。江青同志看到那里的批孔推动不起来……江青同志看了《内参》上的反映，就请谢静宜同志和迟群同志带着材料直送二十军防化连。并带去了江青同志的一封信，是１９７４年1月１３日写的……谢静宜和迟群同志到现场后立即和他们进行了座谈，浙江省委、防化兵和廿军党委均给江青同志来信，现把信转发各地，作为「批林批孔」的参考。」「跟着江青同志又给空军马宁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据说空军机关对批孔有些困难，特请苏元勋同志送上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名词解释》１００份，可能有助于批林、批孔。请指定一个连队，由苏元勋同志去宣讲。』」在后面周恩

来还讲了江青给海军苏振华同志的信，「信里说：『现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到海司去搞试点，并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其它材料以后再送。七四年一月廿二日』」

介绍完江青如何指导在陆军和空军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后，周恩来还解释了江青写给国务院文化组的信，是写给吴德同志的。

关于２４日召开的大会，周恩来解释说：「第四封信就是江青同志给军委几位负责同志的（洪文、剑英、小平）。军委收到此信后，昨天在这里已经召开了动员大会。」

周恩来还说：「我今天早晨得到了这个消息，向政治局几位同志建议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同志今天开这个会议。」

最后，周恩来讲了第六封信是江青同志写给外交部的。

周恩来还在讲话中赞扬了江青，指出是毛让江青主持这次运动，还带头喊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　周恩来还在迟群讲话之前就讲了「走后门」问题。周恩来还在讲话中讲了２４日晚同张春桥一起去看望郭沫若，并动员郭出席此次大会的事情，充分表明了周恩来是事先知道这次大会的。江青也表示要不是周恩来邀请，这次大会她还不出场了。

谢静宜在同一天的讲话中又再次重述毛的话向周发出警告：「就怕你不抓大事，不抓大事，那就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么，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主席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因此，这就不是孤立的给某一个领导同志，某一个单位的写的信的问题，而是给全党全军全民写的信。也不是孤立的在批孔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继续深入，是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防修反修的一个大问题。」

２４、２５日的会议斗争目标显然和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到１２月的批判目标是一致的：周恩来和军队。根据《毛泽东》传记记载：为了使大会的主要发言者迟群等明白她要开这次会的「背景」，江青在会前对迟群讲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话。在「１?２５」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

尽管陈永贵后来说王洪文在大会上有过发言，但是根据会议记录则表明，除了应周恩来要求，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外，并没有发言。但是王洪文却证实了此次大会是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主席的（但是王海容、唐闻生已经报告给毛）。　既然王洪文、周恩来等都没有报告毛泽东，只能说明他们认为江青就是代表毛的。这也是后来毛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的言外之意是江青曾经代表过毛泽东。　但是这个特权也是毛泽东一手授予的。

３．毛泽东的策略

１月２７日和３０日，江青再次借「走后门」问题攻击叶剑英。

继叶剑英在１月３１日因为江青在「１?２５」讲话中严厉指责「走后门」问题而向毛泽东检讨之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江青在「１?２５」讲话中提及走后门问题，相当不策略。早在唐闻生、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大会情况时，毛就表示不满意。这正如毛在回复叶剑英说写：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丝毫没有对江青等要大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满，反而是怕冲淡了主题。因此，江青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

毛泽东后来对「批林批孔」表示肯定意见的时候，对此问题有过深刻的解释：「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虽然毛泽东自己也有「走后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三箭齐发」不可以，只能有「两箭」：即批林和批孔，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偏离运动的方向－－要批判的主要目标是周恩来附带着叶剑英（为了批军队）。走后门只是小问题，不能「冲淡了主题」。

检讨之后，江青又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说江青此举会导致「修正主义」，而是提醒江青要注意大事，不要偏离「主题」。

果然主题随后被突出。１９７４年4月，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总理是什么人？总理还是我们的人么？」

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走后门问题」制止「批林批孔」运动，反而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对于江青因国内事务需要邓小平参加而反对邓小平去联合国一事，毛泽东也对江青提出批评。江青或许感到气馁，而致信毛泽东。　４月１７日，毛泽东在同一日覆信两封，表示鼓励，而且满足了江青的要求。

毛泽东说：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在第二封信中，毛泽东说：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于是江青也就只好振作起来，冲锋陷阵，还要准备好继续替毛背「黑锅」。

三、周恩来的双重角色

１．由被动转为主动

王洪文于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４日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可以被认为是毛泽东对于当前文革形势的判断的总结。王洪文说：「老干部有错误要一看二帮，允许改正，对新干部也要这样。但现在有些地方，老干部犯错误，可以一看二帮允许改正，但新干部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为什么老干部犯错误可以教育，新干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这不公平嘛！不利于党的团结嘛！毛主席批评了好些人看不起儿童团，提出『你们那几个十几岁、廿岁的人就那么高明』？现在新干部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翘尾巴，要尊重老干部，向老干部学习；老干部要传、帮、带，对新干部要有个传帮带的问题。」　但是周恩来是否还属于「老干部」？王洪文还说：「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极『左』实质；其实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右得不能再右了。」

「１？２５」大会对周恩来的刺激非常深，当时担任中联部负责人的耿飙回忆：「１？２５」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向总理谈起中联部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被江青抓住，在「１？２５」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总理听后说：「耿飙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笔者注：根据宋永毅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所记载的江青讲话，并没有点耿飙的名字）

如果说在这之前，周恩来对于「批林批孔」运动是有意采取躲避或者采取冷处理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周恩来变得十分主动。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７日，周恩来同江青等一起接见中央读书班和记者学习班的代表时，

就「批林批孔」问题发表讲话。周恩来指出：「批林批孔」要结合，批孔是批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批林批孔」可与目前城乡正开展的「批林整风」，进行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进行。

同日，周恩来根据江青的建议将反映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决心把运动抓上去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周恩来还根据「１?２５」大会提出反对「走后门」的意见，专门加写了一段要教育好干部子女的内容。

１月２８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此文章为江青指派迟群、谢静宜调查该地的一位中学生考试问题受到校方批评后自杀一事，旨在意在「批林批孔」运动各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不是个别现象。

１月３１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问题。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它时间仍搞业务」；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论哪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周恩来任小组组长。周恩来试图抓住运动的主动权。

２月５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会议认为，目前各地、各单位运动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积累些经验，才好提出问题，谋求解决。江青因扯出「走后门」问题而遭毛泽东批评之后，２月１６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

２．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攻击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从１９７３年一系列意在外交口打开缺口进而对周恩来的进行影射攻击事件的不断发生。

迟群在１月２５的讲话提到一部名字叫《中国》的电影。迟群形容此电影是「他们尽拍了一些歪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镜头，……所以像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

此影片是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６日，经过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代行文化部职责的国务院文化组批准，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反映中国的影片。１９７３年杨振宁向周恩来反映此片有问题。　在批周的政治气氛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一位干部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就电影《中国》问题给江青和姚文元写了一封举报信，他认为安导演在污蔑中国。１７日，这名干部又写了第二封信，他在第二封信中还揭发了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给周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　江青对此表示说：「过去我不知道美籍教授杨振宁对总

理说过此片很坏，最近广播局XX同志给我和文元来信揭发这片子很坏，我们才抓。」１２月３０日，中央政治局组织审看影片《中国》，江青讲：「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　这事成为当时外交部联系实际进行批判的一个主要内容。

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０日江青到第四机械工业部发表讲话，指责该部赴美考察组接受美方所赠玻璃蜗牛礼品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提出「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电生产线我们不要了」。１１日，国务院就开会，李先念在召集四个部门领导开会的会上发了脾气：「人家给你个反动标语，你也不打开看看？」同时，四机部也发了简报，通报全国。　对此，周恩来几次指示外交部就「蜗牛事件」认真调查。再作定夺。２１日，外交部在详尽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写出《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说明美方送蜗牛并无恶意，反驳了江青的论点，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周恩来阅后批示：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处理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这一报告。在此期间，周恩来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蜗牛事件」作了研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　周恩来还将报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圈阅了报告，表示同意外交部的处理意见。

所有这些事件，完全可以套用当时吴德的话来说明。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了电影《中国》联合调查组，文化组一把手吴德是负责人之一。调查组追问彭华时，有意让彭华朝周恩来身上引。但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彭华没有开口。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３日调查组研究给中央的初稿报告时，吴德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外交路线取得很大胜利，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联合时易右，决裂时易左（笔者注：这是套用毛的话）」「前段转尼克松来这个弯，现又出来右倾投降主义。」就是指向周恩来的外交口。１月３０日，调查组向中央提交报告：「所以犯这样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是丧失阶级警惕性，是不抓路线、不抓大事的必然结果。」（笔者注：整个报告，有6处提出外交工作存在「右倾投降主义」。１９７３年７月和１２月毛的两次批评周「右倾投降」）　由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联合调查组以及外交部调查组分别写出的报告均给外交部扣了两项大帽子：（１）典型的右倾投降主义；（２）极为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正是１９７３年批周时定下的调子。

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３日，江青上门要求郭沫若写检查，承认重庆时期写作的《十批判书》、《屈原》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判「王明路线」，显然是想将当年曾经担任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一网打尽。所谓「第二次王明路线」，指的就是对１９３８年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时期工作的一个方面的评价。１９３９年之后的南方局工作，从未有人以「王明路线」问罪。江青还要郭沫若写文章批秦始皇的「那个宰相」。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是当今中国的「秦始皇」，这里「宰相」自然是周恩来。

江青直言：「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安徽等地甚至还公然贴出了「打倒当代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直接指向周恩来的大标语。

１９７４年４月１日出炉的《孔丘其人》一文中，孔丘「窃取」了代理宰相的要职，是一宰相儒。　５月１７日，北京日报发表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在描绘孔子见国君的时候，「端起胳膊」来影射周恩来。

周恩来一方面要应付这些攻击，另一方面更加以积极的态度来参与「批林批孔」运动。

周恩来相继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各省和各部门的「批林批孔」运动。

１９７４年3月2日至４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军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并通过中央给福建省委，福州军区的复电。复电声称：「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你们应该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把福州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王洪文代表中央打电话给福建军区：「九号文件不是对着你们的，是针对韩先楚的，你们要集中揭发韩先楚，把韩先楚的盖子揭开。」于是福州出现了万炮齐轰韩先楚的局面。

山东在「批林批孔」中也是重灾区。周恩来指示山东省委：山东的「批林批孔」要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在山东的代理人袁升平；「文化大革命」中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示作了结论的问题不能翻案等。　袁升平等人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山东被整的鸡犬不宁。根据袁升平的说法，１９７４年，山东工农业总产值，由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的全国第六位，猛然下降到第十四位。生产遭受极大破坏，产量产值之低，为山东建国以来之最。社会秩序之乱，为「文革」以来之最，人民生活供应品全面短缺紧张，那段时间内，济南市连酱油、煤球都买不到。

此时的周恩来因为自年初以来，拚命应对这些攻击，精神上受到折磨，身体过度劳累，导致病情加重。3月上旬起每日便血达一百多毫升。据此，医疗组决定对其病情作进一步检查、治疗。3月8日，周恩来将医疗组所拟《检查治疗方案》作详细阅改、批注后，致信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提出：「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在这次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进行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随后，周恩来到三〇五医院作全面检查，确诊为癌症复发。

这段时间里，他直接过问和处理在「批林批孔」中出现问题题的省、市、自治区和国家机关就有：新疆、浙江、江苏、上海、山西、江西、吉林、福建、湖北、四川、安徽、广东、湖南、山东、云南以及国家体委、民航总局、四机部、解放军军政大学等。１月到３月就六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事宜。海外舆论也对中国国内的「批林批孔」纷纷猜测，尤其注意周恩来的言论行止。

１９７４年4月２２日，周恩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前众议员、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会长川崎秀二及其随员。川崎提到去年８月间，西方一些报道认为中国开展批孔，也牵涉到周总理，一些日本朋友对此感到担心时，周恩来说：我们这一代都是反对孔子的，从五四运动起，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孔子思想在中国社会已影响了两千多年，批判并肃清这种影响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事情，并且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在批孔的同时，还要对历史上改革派的思想进行宣传，当然我们不是继承法家，今天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已远远超过了法家。

四、稳定社会和经济秩序与更露骨的批周

１.「批林批孔」造成的社会影响

毛泽东后来谈及「批林批孔」运动时认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但是无论是江青还是王洪文在执行毛泽东的部署时，如同周恩来一样，并不能够保证所有的行动都是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意思。每个人在执行的时候都同自己的经历、经验有关，后果也就各异。

１９７４年1月１４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做报告时提到：「关于有些人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经过帮助后改了，改了好嘛，但不能说改了就不存在走资派了。走资派不但过去有，以后还会有。少数人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这话那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呢？『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领导我们造反的。」造反有理一词，使得许多各地原来已经大伤元气的造反派又看到了希望，有部分又开始活跃起来。

从１９７４年２月份起，全国再度出现动乱，已走上正常化的社会秩序迅速恶化。派性斗争再度兴起，许多地方重新拉起了战斗队之类的组织，甚至又开始武斗；一些领导机关受冲击，许多干部被炮轰、批斗，各级党委的工作又陷入瘫痪状态；许多已恢复的合理规章制度又遭否定，经济急剧下滑，不少企业陷入停产、半停半产状态；运输积压严重，铁路堵塞，运输量锐减；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大批判风又起。县级以上建立「批林批孔」小组，运动办公室和学习班。以黑龙江省为例，截止３月中旬，近３０万干部进了学习班。「批林批孔」大大影响了生产。

根据辽宁省朝阳市记载：有些单位在运动中，群众自行成立战斗队。如地区商业局机关干部成立两个战斗队，一个叫「反潮流战斗队」，一个叫「批林批孔战斗队」。八家子铅锌矿成立５４个战斗队。地区轻工商店成立战斗队后，该店领导让战斗队领导运动。还有些单位，群众公然夺领导者的权。如朝阳县大平房公社大平房大队１２队张淑琴找到生产队长李洪文说：「我代表贫下中农，从现在开始罢你的官，夺你的权」，后被公社制止。根德公社平房大队偏北沟生产队，有些社员对生产队干部指名道姓的要揪「小林彪」。东电一公司、朝建一公司、朝阳建筑机械修造厂、朝阳水泥厂等，有些工人问：「批林批孔运动来势猛，在中央是不是有个代理人？在下边是不是还要踢开绊脚石，打倒走资派？搞不搞夺权？」朝阳县古山子、东五家子公社等，有些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说：「××公社××大队被群众夺了权，谁谁『靠边站了』，开始整干部了」，弄得一些基层干部惶惶不安，影响了工作积极性。

因此中共中央于４月１０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　　该通知指出：一、「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如果对他们有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批评应当表示欢迎，认真地妥善地处理。

如果说以上两点是为了着眼于稳定，但是该通知的第三点却又挑起了矛盾。中央对于运动中冲击各级干部没有严令禁止，反而指出：「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采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对阶级敌人的破坏，要提高警惕。」

虽然通知点明中央「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起来。」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

以吉林省为例，１９７４年4月3日，中共吉林省省委召开在长春的省革委会党委、委员「批林批孔」座谈会。会议认为，省委常委对「批林批孔」很不得力，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即「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等错误。会议要求对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在执行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和同林彪死党牵连的问题，要进一步深揭深挖。5月7日，省委召开省直机关揭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大会小会，集中地揭发、批判了王淮湘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许多问题。在王被迫做了检查发言之后，会议认为王回避了要害的实质问题。会议决定，要深入发动群众，继续揭批王同林彪集团有牵连的问题。

有鉴于此，中央不得不于5月１８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除了继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外，认为「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中央也认为「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１９７１〕５７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为此，中央重申中发〔１９７１〕５７号文件宣布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据《周恩来最后两年的政治交代》一文，此两项中共中央通知皆为周恩来主持定稿，并反复修改之。

7月１２日，纪登奎电话通知吉林省委，指出：吉林省跨行业串联起来的「批林批孔学习班」的少数人，随意揪斗干部，是完全错误的，要严厉批评制止。同日，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同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宗希云等谈话，保护了王淮湘等被揪斗的干部。以后王淮湘因此受累为后话了。

此通知另外还指出「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注意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此举后来颇为诟病，各地形成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浪潮。

6月１８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工农业生产问题时指出：１９７４年上半年不少地区和部门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许多产品例如煤炭、钢材等比１９７３年同期下降很多。

铁路运输量急剧下降。全国财政收入比１９７３年同期减少５亿元。同月，当毛泽东得知从４月份开始全国工农业生产明显下降后，找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了解情况，并指示他们要注意全国稳定和解决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随后，毛批准中共中央于７月１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它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２．「评法批儒」

周恩来因病重终于与６月１日离开西花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但是批周却批的更露骨了。社会上关于周恩来因病住院而出现流言：「主要是政治原因，是体面下台」。而在上层，对周恩来的批判也更加露骨。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４日，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指出：「批林批孔」要围绕「一个克己复礼，牵涉到现实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许多问题。」同日晚，江青接见「梁效」和「唐晓文」成员时讲：「现在的文章很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以前的，不提无神论、唯物论；现在的，不提现在的儒。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我希望告诉我，提到现在的儒。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蒋介石是总代表。」在随后的谢静宜和迟群召集一些出版单位开会，迟群说：「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地方上的报刊和学报有没有批大儒的文章。」一位「梁效」的领导对批什么样的儒做了解释：「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谢静宜接着表态：「就是他讲的这个情况。」　６月下旬，江青又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之类的说法，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６月１９日晚７时半至次日凌晨，江青主持召开了一千余人参加的「天津市儒法斗争报告会」，她大讲其「儒法斗争史」，提到从先秦至明清的许多历史人物。她并以批刘少奇「进城初期亲自祭过孔」为名，说「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就出了不少的儒」，并露骨他说：「这次运动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她还借国外传媒的某些提法（有外国记者就中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发表评论说：「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暗示周恩来就是她所说的「现代的儒」。　此后，「梁效」等写作班子纷纷撰文著书，进行「评法批儒」的宣传。

６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一文，提出「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在北京等地，街头还出现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标语。

６月２３日，江青在小靳庄把接待她的妇女主任改名「周克周」。

对于是否影射，当事者有自己的说法。周一良说：我认为「批林批孔」也好，评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她只是执行而已。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条是紧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谢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

著名军旅作家张聂尔说：「我曾专门为此事找过小谢（指谢静宜－－笔者注）。她一口咬定，他们决不可能影射总理。」

「梁效」主笔范达人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说：(《孔丘其人》中描述孔子）７１岁病重在床，这段话在我写这个文章之前，我曾经看到，看到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的《孔子传》，他们有类似的描述，我觉得这段描述孔子的复辟形象很好，我采用它了，我们写文章是１９７４年２月份写的，当时总理呀还不断出来接见外宾，参加各种活动，还是这样的情况，总理生病，总理有病住院是６月份的事情。然后再讲当时这个梁效大批判组的领导，他们也没有任何人没有向我暗示，你们写这篇文章要影射周恩来，没有，这个实话实说，没有还是没有，我不能栽在人家头上，为自己开脱。」

范达人在其回忆录《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中说：１９９８年１月，我曾向谢静宜问及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她说：「《孔丘其人》一文是江青建议写的。目的在于简明扼要地介绍孔子。我就此事专门请示了毛主席。主席同意写这篇文章。文章在公开发表前，我们曾将文稿报送毛主席和周总理阅审。」如果要问我，想在此文中影射何人，那么，坦率地说，首先是林彪，其次是李德生。李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批孔」前夕，从内部得知，他已受到批判。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骂他是「大恶霸」。１９７４年２月间，(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江青叫陈亚丁到她那里开会，她说：「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理。」会一开完，总政就贴出了大标语：「打倒大军阀李德生」。这事传到了「梁效」大批判组。在此影响下，我们在《孔丘其人》一文中用了一个「凶狠残暴的大恶霸」的小标题，影射李德生，这是实情。

究竟有没有影射，相信读者可以自辨。

五、「批林批孔」的终结

１．军队中的「批林批孔」

「５１６通知」中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但是在１９６６年底，天下趋于大乱之际，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稳定地方，这也是军委「八条命令」和「三支两军」的背景。但是随后的军委「十条命令」把「八条命令」否定，于是不少人认为伟大领袖是要把「混入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地方已夺权，将要夺军队权了，突然风向一转，揪「军队一小撮」甚嚣尘上，结果军队势力大为反弹，终于激出惊天动地的「７２０事件」。毛泽东随后急剧左转，欲以民兵、造反派为依托，建立「第二武装」，对此各级军队也纷纷软磨硬抗，甚至造成军队内部的对立。同时火烧英国代办处、外交部夺权，武斗演变成「全面内战」，对此毛泽东不得不审时度势，抛出「王关戚」以平息众怒。

「九大」召开不久，林彪主动出击，攻击张春桥，大有「釜底抽薪」之势。毛泽东本来就没有把林彪作为真正的接班人，现在林彪「自我暴露」，拿掉林彪也就是顺理成章之势。「九?一三事件」的爆发或许是偶然，但是林彪的「失败」却是必然的。「林彪事件」给予毛泽东的沉重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广大群众对文革怀疑的思潮渐起，这是以后毛泽东再也不能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根本原因。经过１９７２－７３年的短暂平静，萦绕在毛

泽东心头上的军队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曾经要求军队「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１９７３年毛泽东两次严厉训斥周恩来后，毛泽东觉得必须对军队也采取措施。毛泽东先是在１２月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接着在随后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把军队好好的「整治了一番」。

１月１３日，江青就给给空军领导人写信，要求「批林批孔」，随后又找迟群等人谈话，将他们派往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随后在１、２月间，江青还以部分军区连队作为「批林批孔」的试点，江青连续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和连队、科研部门以及下乡知识青年写信，送材料。　江青还指示要给南京部队、广州部队以及国防科委等送信、送材料，宣讲「批林批孔」。同期间，江青在军队地方召集的会议上称：「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１月２７日，江青在即将结业的某期中央读书班学员和即将派往外地的一批记者参加的会议，点了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的名，并命人撕下其作为革命军人荣誉标志的领章与帽徽。（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放军军报》等军队宣传系统负责人亦与会参加）。

江青在「１.２５」讲话中提出要揪「走后门」，对于江青这种冲淡主题的做法，毛是不满的。特别是不合毛「批林批孔」的战略安排。毛意图通过「批林批孔」达到批周、整军队的目的，但是不想文革初期的天下大乱重来，而江批走后门问题无疑会使冲击面大为增加，自然会冲淡「批林批孔」的主题，那就是集中批周。另外，毛希望是通过这次运动树立起文革派在军队中的威望和建立起人脉，「走后门」问题主要是高级干部在军队中安插子女问题而非军队主要领导人的问题，揪「走后门」问题势必不合此战略。况且毛泽东本人也在「走后门」。

「批林批孔」运动伊始，正如周恩来在「１.２５」讲话中所提及，江青等主导了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运动，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各大军区领导机关写信、送材料等，要求进行「批林批孔」。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相继在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汇报会、军队文艺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指责军队领导机关对「批林批孔」消极应付，「右倾手软」，提出「要整一整军队」，「该夺权的还是要夺」，要在军内搞「放火烧荒」。

北京三总部首当其冲。据说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和张春桥断言：「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治部可以夺权。总后勤部垮得愈快愈好。」　２月８日，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攻击「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２月２５日，江青在会议上大喊：「总参问题太多了，要放火烧才好！」３月６日，王洪文听取总参谋部汇报之机时说：「要揭总参的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张春桥在２月２８日重提在１９７２年发生的「山东问题」：山东问题怎么解决的？２月２１日，王洪文派秘书到总参作战部调走根据周恩来指示和批示承办的文电３４份。４月，总参作战部被勒令清查所谓的「北兵南调」问题。　此事最后却不了了之。

１９７４年3月5日，张春桥、江青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在会上，江青点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什么「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你们。」陈亚丁回去立即传达布置，煽风点火。「打倒大军阀」的标语在北京和全国风行一时，造成军队和地方很大的混乱。　陈亚丁还说：「江青同志要我回到总政，就是要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

火!」

为查看总政点火的情况，江青要求迟群、谢静宜去总政大院查看情况，而且告诉他们「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我已告诉汪东兴，去总政这段时间内，给你们每人派一名警卫员。」 这意味着毛泽东对军队「批林批孔」的支持。当新年伊始的时候，海军就作为「批林批孔」的试点单位。迟群、谢静宜来到海军召开大会，肖劲光也表态支持「批林批孔」运动，并做了自我批评。肖劲光后来对此解释说:「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江青又有代表毛主席的假象，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唱反调。」 所谓的假象是后来的说法，当时肖劲光的认识只能是「真相」。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如果说王洪文、张春桥还有合法身份的话，江青在军队中并无任何职务，只能用背后有毛泽东这个靠山才能解释的通。这同周恩来没有在军队中任职却可以下令调动军队是一个道理。正如后来毛泽东对于「批林批孔」是正面评价的，充分说明了江青的「扰乱军队」的所作所为是毛泽东支持和默许的，这也是毛泽东言外之意所讲的「江青代表我的」的含义。只有如此，才能解释所有发生的这一切。

陈先瑞回忆到:「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多次插手北京军区部队。她抓了北京卫戍区某师６连和保定某军８连，作所谓「批林批孔」的试点。她以个人名义给连队写信，送了上百种材料和书籍，如《儒法斗争史讲稿》等。２月４日和６月２０日，江青先后两次把连队部分干部、战士召到北京，当面听发言，汇报，作指示。她还抽调一名连队指导员和五名战士，到湖南搞了三个多月的调查；派战士到全国各地的「批林批孔」点上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未定稿)，并收集了解情况。江青还到天津某军九连，直接听发言和汇报，观看军事表演。

江青不仅自己到军区部队去，还派没有军籍的记者到军区机关搜集情况，规定记者可以参加包括军区党委常委会在内的所有会议，看军区的所有文件，还可以查阅档案材料。……在全国「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那时叫「三箭齐发」，在北京军区却是乱箭齐发，又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问题翻腾一遍，军区机关二级部以上的一些领导同志，又受了一次批判。这回给我算了一次总账，查了我１４个方面的所谓错误。

（后来）我根据自己对「批林批孔」的理解，（在北京军区召开的会议上）讲得很随便。我说：对「批林批孔」运动，我们还不够理解，现在要一面学习一面搞运动，在精神上需准备挨点批，挨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想到，我的讲话内容很快就被河北省军区的人告到了江青那里，江青按捺不住对我的怒火，于５月１２日给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纪登奎、陈锡联写信，说「陈先瑞不带头『批林批孔』，不作自我批评，把矛头指向群众，借『批林批孔』发牢骚，北京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得不力」等等，弄得北京军区领导很紧张。

在江青写信的当天晚上，军区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陈锡联、纪登奎传达江青的信，对我进行批评。我于５月１３日向江青写了检讨，经陈锡联、纪登奎转给江青。我在检讨中说，江青「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我的错误的严重性，这是对我的关怀和挽救，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同时，对我们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有重要意义」。其实，这个违心的检讨，是陈锡联、纪登奎同志为保护我过关，亲自帮助写的。在那种高压下，不得不低头。

不得不低头，是因为江青么？显然不是，是因为站在江青背后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２．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妙处

广州和南京军区的司令对调，丁盛到南京，许世友到了广州。

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说：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不久，就说：「我既有挨整的经验，也有整人的本领。」对前任许司令，他嘴上称之为「老前辈」，褒之以「很能打仗」，当众表白：「我很尊敬他。有人说我反对许司令，我怎能反他呢？」转过脸又指责南京军区「迷信没有打破，盖子没有揭开，路线没有分清，颠倒了的历史没有颠倒过来。」以揭不揭许司令为标准划线，分裂干部队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抵制，又采取「搬石头」、「搀沙子」的办法「改造军区机关」。然而「倒许」的手段一套接一套，却极少有人附和。有个想当「倒许」积极分子的收发员，从一封写给许司令原来的保健医生「高老」的信上认出了我的笔迹，把信交了上去。丁盛拆看后，发现信中有对「批林扎孔」不满的内容，在大会上点了我的名。结果呢？群众舆论没有讲我的不是，反倒对这种不顾国家法律和职业道德的行为嗤之以鼻。丁错估了局势。

互相搞的不亦乐乎的时候，江青又出面安抚各军区新上任司令。两手并进，毛可谓用心良苦。

迟泽厚先生说：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８日，江青特派三名信使持其亲笔信交送到广州军区司令许世友手里，鼓动许世友「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一场持久的战斗」，信中还说「我们是心连心的。」许世友接到江青的信，心中有底，于是大刀阔斧的干了起来。许世友为了制造声势，打开局面，一方面把过去黄永胜、刘兴元当政时期因各种原因受过处分被调离军区机关或转业地方的人员，请回机关参加运动；同时又拉上赵紫阳，接见已堰旗息鼓多年的广州地方两派群众组织的３３名头头，宣称军区原主要领导人刘兴元、丁盛、任思忠是林彪死党，要这些头头与他「共同奋斗，你们在地方揭，我们在军队揭」。许世友频频在大会、小会、军内、军外讲，广州军区的问题「不简单」，过去被「捂了盖子」，现在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于是，运动迅速升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问题越揭越多，而且都具有「爆炸性」。随着材料越揭越玄，破绽越来越多，结果是曲高和寡，最后变成多数人看，少数人表演，影响恶劣。北京在７月２９日发来紧急电报指名批评了许世友，并派韦国清来处理善后。广州军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戛然而止。

丁盛说：「在广州搞了两次，一次是七四年，第二次是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那一次真是荒唐，还是林彪南逃，还是这些人，结果两个副司令被隔离，江燮元、黄荣海，这些同志是非常忠诚老实拥护毛泽东，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不是为林彪革命，是为劳苦人民革命，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人。隔离起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五千多人的大会，副参谋长刘如，政治部副主任利瓦伊英、赵国楠，要打倒他们。说是丁盛不接电话不知道，丁盛的秘书知道，陈宏康知道！真是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事对广东，中央虽然没有下正式的什么结论，但是在广州搞的这些事情，影响很大，对广州这部分干部，在精神上，是很大的包袱、负担！」

丁盛还说：「７４年在广州「批林批孔」，许世友提出来，广东的刘兴元、丁盛、任思忠就是林彪的死党，不是死党也是死党。」

被调动的八大军区司令享受此「待遇」的为数不少，过程也颇为类似。

许世友的秘书还说：（１９７４年初）江青、王洪文、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打出了「解决南京军区的问题」的旗号，颠倒黑白地胡说：「南京军区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在军区和一些地方拉拢亲信，又是「揭盖子」，又是「砸核桃」，矛头直指许司令。

３月１１日，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亲笔写信给南京军区某部防化连，并派亲信迟群、谢静宜到这个连队送「批林批孔」材料，煽动部队揭发上级领导机关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３月２６日，王洪文窜到浙江，擅自召开省委全会、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党委会，公然宣称：「涉及军区以上领导人的问题也可以揭发。」（笔者注：原文如此，并非表示笔者同意其观点。）

４月２７日，王洪文又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浙江的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要他们继续揭批「军以上领导」，并点了许司令的名，说「许世友想搞三省压上海，搞独立王国。浙江的问题在南京。」　（笔者注：原文如此，并非表示笔者同意其观点。）

这一时期在军队的「批林批孔」的记载，多是王洪文、张春桥以及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作为军委六人小组的成员，其行为是合法的。而军委六人小组组长叶剑英也在３月８日召开的听取国防科委「批林批孔」汇报会上表示要派人下去「煽风点火」。

１９７３年底的八大司令对调为１９７４年江青等人的行动铺好了路。一方面，原来各大军区司令的老班底可以彻底的揭发老司令的问题，虽然免去了面对面的尴尬，但是这种背对背的揭发却让人有口难辩，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揭发材料成了这些司令们的「紧箍咒」。

３．８月军队高干会议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后，在中央布置下，各大军区通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等方式，揭发有关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人和事，主要对象是被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及其政委等。为此毛泽东决定成立以王洪文为首的项目组，专门处理各大军区的揭发材料，并成立了两个项目小组：李德生项目小组和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以及陈锡联项目小组。　１９７４年７月，王洪文把这些揭发出来的送给毛泽东，并发给政治局委员。　这些材料表明这些司令们无重大问题，比周恩来掌管的项目组要实事求是得多。

１９７４年８月，军队高干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把各大军区司令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批评帮助」。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是批判的重点对象。关于如何开会，毛泽东指示：我看找他们来。不要一个一个，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来，一道谈一下。听说会议气氛紧张，他特别交代，每个同志发言时不要插话，发言后都要鼓掌欢迎。关于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毛泽东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又说，各地大字报揭露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　王洪文传达了这个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同时表示「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不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

会议只要一开，就绝对不是多做自我批评，讲完了就讲完了，发言后都要鼓掌欢迎那么简单。韩先楚说：我愿意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

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但是身不由己，最后还是得按那个提纲认错。

丁盛回忆说：我在南京工作时，７４年的８月份，在北京开会，当时主持会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总理他们都没有来，主席那就更不说了！我们九个人作检讨，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曾思玉、我、陈先瑞，刘兴元都作检讨，对林彪思想上的认识，都作检讨。这个期间，张春桥、王洪文硬追我，说「林彪南逃你知道」，我说：「不知道！」张春桥的作风，比王洪文凶啊，形象凶，讲话也凶，王洪文看着总下不了台，就说：「你不知道，以后再说！但是你，你上了林彪的贼船」。我说好吧，咱们就作妥协，这个可以的，但是我没有和他搞阴谋诡计。「你要写上」。我说：「写上就写上」！

这是７４年８月检讨，我们这九个人的检讨，各种各样的检讨！现在来看，不该屈服，不该写，我否定，我上什么贼船啊？

据丁盛说，有人要求他下来，当时是周恩来总理坚决不同意，说：「丁盛不能下来。」　毛泽东自然是不能把这些司令们全部赶下台，目的是要树立王洪文的权威。整个会议都是由王洪文主持。会议高潮过了，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对于司令员们，毛泽东说：都是一些老问题了，在会上讲也可以，写出来印发也可以，不写也可以。不要那么挖苦，不要强迫人家做检讨，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传达范围也不要太大，检讨不要发下去。　为了帮邓小平拉拢人心，毛泽东特意让邓小平捎话给这些挨整的司令们。　９月过后，各大司令按照会议要求和定下的调子纷纷检讨过关。

４．试点－－总政治部

鉴于李德生在安徽支左的出色表现，中共中央不止一次向全国通报他的经验。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当众夸奖他「哪个是李德生？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的不错嘛！」　在毛泽东的欣赏下，李德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九届一中全会上，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会的李德生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６９年４月任中央军委委员，１９７０年４月任总政治部主任。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可是，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风云突变。在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不到三年（次任职时间同其它被对调司令成为明显对比，例如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司令任上长达１８年，自１９５５至１９７３）当党中央副主席才三个月，李德生就被调离北京。他兼任的总政治部主任，被毛泽东一句「不要兼了吧」一句话就抹掉了。

李德生之遭遇，可以说至今还是扑朔迷离，个中缘由，现在还无法完全解释清楚。《李德生回忆录》则声称是「四人帮」诬陷所致。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为李德生彻底平反的决定中有一段话说得分明：「１９７４年９月间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在会议上，『四人帮』强迫德生同志承认『推行林彪路线』、『上林彪贼船』是不合乎事实的，应予以推倒。」但是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岂是江青等所能决定的？

１９７４年底，为了给邓小平腾出党中央副主席的位子，纪登奎和李先念找到李德生谈话，提到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在此之前，在党内很少有党中央副主席辞职的，李德生听后很诧异。纪登奎和李先念只是奉命办事，不愿意和李德生多说。纪登奎直截了当地

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九大」之后，毛泽东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首选目标是军委办事组。１９６９年7月２８日，李德生奉调进京，下午３时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李德生，并通知李德生「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和十二军的职务。」

总政治部被砸烂后，毛泽东曾经设想让张春桥当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征求林彪意见时，可是林彪就是顶着不办。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总政治部军管结束，由李德生主持工作。林彪后来说：「我在江苏跟许世友同志说，偏偏要找一个军事干部来总政当主任。军事干部中有许多不仅懂军事，也懂政治，他们打过仗，不脱离实际。我偏偏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个『丘八』管秀才。」林彪还说：「毛主席信任老粗，我也信任老粗。我说这些人粗中有细。」林彪推荐李德生是为了抵制张春桥的任命，毛泽东对李德生也是满意的，因此一拍即合。但是这却是李德生以后被整的原因之一。

１９７０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因为林彪发动对文革派的进攻，导致毛泽东的强烈反弹。李德生深得毛泽东信任，在会议中途被派下山，主持军委办事组工作。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为了防止天子脚下作乱，改组北京军区，李德生作为「掺沙子」的重要一员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李德生被周恩来派到第一线，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指挥。事后，李德生还是中央处理林彪事件项目组成员。并由李德生领衔会同余秋里、张才千主持军委三总部的工作。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汪东兴庐山会议上的「跳得最高」，不仅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林彪任国家副主席，且矛头直指张春桥等文革派。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不仅大骂了汪一顿，还命汪停职反省，在家闭门思归过写检查。据知情人告之，李德生推荐了杨德中接替汪东兴，接管中央警卫团。周恩来并且找杨德中谈了话，而康生则找了王良恩，让王准备接管中央办公厅。杨德中为了接管中央警卫团找了局办公室的武建华和清华大学支左的迟群，对他们讲了周恩来的部署，而武、迟二人却将此消息报给了汪东兴。　不料，汪东兴乃是毛泽东故意放出去的「蒋干」，并没有真心想「换马」。而杨德中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深，形同毛泽东同汪东兴的关系。如果杨德中替换了汪东兴，不知道伟大领袖是否还睡得着觉。１９７３年，毛泽东两次对周恩来大动肝火，此事又成为李德生受牵累的一大原因。对于此点，李德生在１９８６年回忆说：「江青一伙终于借『批林批孔』，掀起了反对周、叶的恶浪。我在工作中，大事都请示总理、叶帅，他们便称我为『大军阀』，进行批判斗争。」

「十大」之后不久，毛泽东要整军队，原因复杂，但是清除林彪势力是其原因之一。而李德生原来是被毛泽东看作是「掺沙子」，现在在毛泽东看来是同林彪「穿一条裤子」，阻拦张春桥的任命。现在把李德生一脚踢开，就是为了给张春桥腾出「政治部主任」一职的位子。一年之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谈到到他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但是随后的１９７５年1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也因此，后来李德生在１９７４年8月军队高干会议上，就是因为是否上了林彪贼船问题而被穷追猛打。　此事还同１９７０年5月１９日林彪接见李德生有关，李德生后来说作为总政主任，在林彪一大篇讲话之后，我不能不表态，是有盲目吹捧之嫌。

但是事情远比这个复杂。李德生还向林彪写了「效忠信」，虽然此事在「十大」以前就明了，并且没有影响到毛泽东的信任，继续在「十大」上得到提升和重用。　但是当毛泽东因为要批周恩来，要清除林彪在军队中的影响的时候，要提拨张春桥等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李德生成为靶子是在意料之中。

李德生调离北京军区之后，政治部一时显得「群龙无首」，毛泽东有意把它作为一个试点。

１９７４年1月１３日，江青对迟群和谢静宜说：「我就是要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打破他们的一统天下。让你们到海陆空三军去点火烧荒。总政的问题大得很，那个李德生不是一个东西，他在林彪死后就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互相勾结，把军队要变成他们的工具。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１月２７日晚，江青整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

１９７４年3月５日，江青召集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和总政原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到钓鱼台开会。江青对陈亚丁后说：「李德生把八一电影厂搞得乱七八糟，造孽了，他们欠下人民的一大笔债。我看总政不是一个小问题了，是要重新夺权的问题。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张春桥则说：「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这些人就造谣，竭力反对，甚至说什么批林批孔是多此一举。李德生就公开说：『我们不认识孔夫子，没有什么批头。总政这里不需要批。』这样的人能担任总政主任吗？」

陈亚丁虽然召集驻京部队文艺单位一些负责人开会，传达江青的讲话，布置在部队「放火」,「夺权」。但是陈亚丁既不敢找党组织也不敢去找有关领导去「夺权」，还怕找错了对象！最后，陈亚丁是两手空空，什么权都没有夺到。　江青等人把水搞混了却没有抓到鱼，可见能力和手段均属平平。

军队毕竟是毛泽东的「命根」，但也是最讲究资历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张春桥在党内地位虽然高于许世友（政治局常委和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是在南京军区，张在军区并无实权。这一点，许世友的儿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枪杆子出政权」，这是一句至理名言。经过半年多的借「批林批孔」整军队，毛泽东的意图并没有达到。总所周知，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文革，一个是有坚实的「文革」的依靠力量即军队，另一个是有坚定的「文革」的推动和贯彻者即文革派。现在，毛泽东希望文革派能够在军队中建立起自己的班底，到头来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虽然亦有赵紫阳、胡乔木、谭震林等人向江青等人表态，但是终归都是手无寸铁之人。　因此江青等也就只能像是４０年代的王明等「教条宗派」那样只剩下嘴上的功夫。　毛泽东也就只有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六、周恩来的日子不多了

毛发动「批林批孔」的另一大目的是整周。

１９７４年6月（此时评法批儒正轰轰烈烈，批现代大儒），毛泽东又找出在延安整风时期写的「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九篇文章」写得很尖税。它不仅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也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当「帮凶」。而且用词辛辣、刻薄，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编辑《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后来虽几经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是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　此时拿出来的目的不言而喻。

但是１９７４年的周，病情越来越重，出血速度快过排血速度，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滚，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撞开。因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输两次血。医生们要求给周做手术。经过各方包括周恩来自身的努力，终于在６月１日住进了医院，当天就动了手术。但是８月上旬，周恩来再次开始尿血并被确证癌症转移。周恩来于８月９日致信毛泽东，汇报病情及治疗方案，并告：「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经毛泽东批准，于１０日作第二次大手术治疗。　此时的病情表明周已经来日无多。

就在７月份毛泽东离京的时候，还放出「烟雾弹」，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称：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　毛泽东还一手握住周恩来的手，另一只手握住叶剑英的手，说：「：「你们为什么对这两个人过不去，他们不能反，一反就犯错误的。」（根据耿飙回忆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的话语推测为１９７４年的7月，而非耿飙所言的１９７３年——笔者注）　高文谦先生认为「他（毛泽东）决定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地，赴南方休养一段。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当年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展开攻击前就是这样做的。」

既然周恩来不久即将离开人世，毛泽东心病既可以除掉，何必再大动干戈，引起社会震荡呢？对于那些刚被解放的老干部也是个安抚。对于自己精心营造的老干部和文革新人加上华国锋、纪登奎等人的政治格局业已基本成型，毛泽东将继续整周的念头暂时搁置。这是「批林批孔」得以停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毛已经没有足够的信心和精力让１９６６－６８年的形势重新来过一遍，多次承认「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的错误不能重演。　因此毛泽东一直处于两难。例如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不愿再次看到社会出现动乱。为制止混乱局面的发展，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不仅批「林批孔运动「，还是以后的反「经验主义」、批「水浒」等，都是虎头蛇尾。

这一系列的措施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毛泽东的「八月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此指示的直接后果就是「批林批孔」的停止、四届人大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远期后果则是为１９７５年邓小平的整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批林批孔」逆势而行，周恩来的因病住院，这一切反而造就了周恩来的「忍辱负重」的形象。１９７４年9月３０日的对周恩来抱病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掌声就是对当时再次动乱的不满。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虽然毛泽东也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但是着眼点却是「帮助」。１９７４年7月7日，在毛泽东离京去武汉休养的前一天，他召集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的第一次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告诫江青不要设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提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但是王洪文依然主持党中央工作，张春桥则很快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一段话；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则传达了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有关内容；可是，在政治局传达的１９７４年9月至１２月毛泽东对国内工作的「指示要点」中，却没有这一指示。显然，毛泽东当时作出的这一指示有着明确的针对性。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岂不是不打自招？正因为以前江青代表过毛泽东！

《毛泽东传》突出叙述的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多次批评，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从整体上否定过「批林批孔」运动。如同毛泽东在１９７３年的１１月批周会议后的表现一样，毛泽东在１９７４年年底，还表扬了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此类批评与其说是批评，毋宁说是对其政治斗争手腕、策略的教诲。中共官方把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来证明「（毛泽东）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是站不住脚的。　进而开脱毛泽东在「批林批孔」实为批周恩来上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毛泽东虽然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是从来没有作出决定性的指示要求停止这场运动。就是在7月１７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且话说得那样重，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还留有余地。在主要是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批评的都是江青的工作作风，善意的批评，丝毫没有提及「批林批孔」的问题，而且要一分为二！

七、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崛起

刘晓波先生认为：「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７０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　就历史上的渊源来看，邓小平是毛派而非周派。邓小平在文革中始终是毛泽东手中进行权力斗争的一枚重要棋子。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是毛泽东一直想用来替代周恩来的最重要的人选！

１．毛、周、邓的三角关系

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三者在长达近５０年的交往中，其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早期在苏区形成的关系，及其所造成的的影响远远比一般人认识的要深刻的多。周恩来隐瞒博古成为「总负责」的真相，无疑是毛泽东对于周恩来不满的根源。自周恩来到苏区后，毛泽东颇受压制，「宁都会议」周更是难辞其咎。长征开始以后，周恩来更是不买毛泽东的账，以至多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恨恨不平的对王力说「老是四票对三票」（指周恩来、李德、朱德、博古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笔者注）　毛泽东更是在卫士面前讲过「此人当初是要杀我的」。此人有传为博古，据笔者采访得知实指周恩来。其后周恩来又在抗战初期紧跟王明，虽然在延安整风，周恩来向毛泽东输诚，甚至说自己是犯了罪恶的，在组织路线上再也没有背叛过毛泽东，但是１９５６年关于「反冒进」的争论，使得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的政治路线表示怀疑。除了周恩来对于毛泽东个人的绝对忠诚以外，周恩来的组织和工作能力也是毛泽东所需求的。因此自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的态度就是「用（工作上）而不信（政治上）」。文革初期，周恩来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整倒刘少奇最重要的打手。「九?一三事件」之后，客观的形势让周恩来处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是为此周恩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周恩来可以通过毛泽东要求其做４０－５０分钟的检讨的机会「趁机」做上７个小时来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忠心，毛泽东最后还是没有放过周恩来，一直到周恩来在恐惧中死去，周毛关系彻底结束。

邓小平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复出，苏区的经历也至关重要。在１９７２年毛泽东解放邓小平的重要批示中第一条就是「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１９３７年红军整编，名不见经传的邓小平出任１２９师（大部分官兵是原四方面军－－笔者注）政委，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是另眼相看的。邓小平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听从命令，千里跃进大别山，不计自己损失；　其二是军事指挥才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抗美援朝时候一度作为志愿军统帅的人选。　建国后高岗事件，邓小平因为向毛泽东揭发高岗而获得毛泽东的进一步信任。　作为建国后的更重要的一笔政治资产则是来自于苏共二十大。邓小平明确不同意赫鲁晓夫的做法，同朱德形成鲜明对比。　此事在中共「九大」的时候被毛泽东表扬。作为「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实际主持「反右」运动的邓小平指出：右派十分猖獗，必须痛加打击，右派实际同地主富农等一样属于敌我矛盾，决不能手软，必须赶尽杀绝。　这同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致的。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毛泽东当着赫鲁晓夫的面高度评价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原则性一词同「反右」的成果分不开的。１９５９年４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说：「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从１９５６年２月到１９６３年７月，邓小平先后七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共谈判。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１日，当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坚决「反苏修」的。可以说，从反右到批教条主义，再到大跃进，直到「九评」，邓小平可谓就是毛泽东的代言人，意气风发的走了一路。邓小平同时对毛泽东的宣传不亚于其它人。在建国以前，邓小平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在解放区进行土改的时候也是很左的。整个６０年代，邓小平不仅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关系。在１９６２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他强调说，干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导的那些东西，也一直坚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政治学习的首位，也替毛做了辩解。但是文革后，邓掌权后，这些年中邓小平的讲话几乎很难得到。原因不外乎在于维护自己的形象。（笔者认为邓小平在文革

之后，吸取经验教训，以经济建设为忠心还是对的。当然同时忽略了法制的建设，终是酿成了严重后果。）此事在１９７２年8月１４日毛泽东在那个关于邓小平的著名批示中也特别提到－当年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因此，无论是能力还是政治素养，邓小平在毛泽东眼里都是可以做接班人的。这和毛泽东对于周恩来长期的的羞辱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也可以预料文革伊始就「中箭落马」的邓小平的复出仅是时间的问题。毛泽东对于邓小平也有不满，主要是在经济路线上的分歧。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虽然可以追溯到２０年代初在法国勤工俭学阶段，但是二人并无可靠的直接交往的阶段。周恩来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而邓小平则默默无闻，并不是所谓的在「组织和开展『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邓小平则在后来回忆道：「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位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尊敬的人。」　邓小平的说法显然是应景之词，二人住在一起就不属实。从１９２７年年底到１９２９年夏季，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上海共事。邓小平先任利瓦伊汉（秘书长－笔者注）的手下的秘书，后任中央秘书长，此时的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二者的交往也实属有限，而且并无类似毛泽东和邓小平被划到同一个路线上的经历。　１９３３年5月，邓小平遭「左」倾路线打击，被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时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也是打击毛主义路线的决策人之一。建国以后，邓小平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但是大部分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主持书记处的工作。而周恩来对中央书记处是有怨气的。历史证明，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远远说不上亲密。

２．邓小平取代周恩来的历史沿革与邓小平复出的背景

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有把周恩来赶下台的想法。王光美在讨论《历史决议》时指出，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想把周恩来赶下台，曾经就此事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周恩来的功劳很大，不能这样做。相互印证的是，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于１９５２年7月就曾向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副总理并主持政务院工作，同时周恩来亦提出不再担任中央机关总党委书记。李志绥也在其回忆录中谈及，当初「反右」时，毛泽东意在「右派」把矛头指向政务院、周恩来，但是「右派」们却是要「轮流执政」。毛泽东此计流产。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借「反反冒进」终于得以严厉批判周。邓小平在南宁会议上，是批周恩来最厉害的一个。王海容说毛讲周恩来最怕邓小平，南宁会议批周，别人都批不倒，就是邓小平发言批周最厉害。　笔者认为，在１９５８年，毛泽东的打算是启用邓小平来代替周恩来而非流传甚广的柯庆施。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此事不可能公开。

毛泽东在文革发动的时候，曾经构想一个由林彪、邓小平和陶铸三人形成「三架马车」，来代替原来的刘少奇、周恩来格局。因此在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两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在常委中的地位并未下降或者动摇。　刘少奇倒台之后，「九大」开过，邓小平复出的时机已到。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毛泽东提起邓小平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周恩来，完成文革发动后的未竟目标，但是自己「跳」出来的林彪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林彪在「九大」后不久従康生处拿到张春桥的叛徒材料，然后上报于毛泽东。　林彪和张春桥的矛盾在毛泽东看来，是否定还是肯定文革的问题。因此解决林彪问题远比邓小平的复出要紧迫的多。

另一方面，虽然毛泽东多次吹风刘、邓要分开，但是这只是少数范围内的谈话，并没有

上正式的中央文件。例如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关于邓小平的谈话以及１９６９年3月１５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等。　　中共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文件，诸如中央热烈祝贺各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贺词中，无一例外的都是点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名字。如何向全国人民解释这个事情仍旧是不小的麻烦。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在解决邓小平问题的批示中还要点明「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给自己一个台阶和向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即使「九大」的政治报告没有提邓小平以及「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话，但是在上层领导人中并没有达成共识。周恩来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４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中还点了邓小平的名字。

因此，邓小平在开「九大」或者之前复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虽然在８０年代初期，邓小平曾在一次谈话中说：「九大」时候，毛泽东同志确实也提出，要我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但是林彪他们不同意。　　笔者认为进政治局是万万不太可能的，特别是联系到后来邓小平复出的过程。因为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邓小平复出都是经历相对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同王洪文的升迁相比慢的很多。但是考虑到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时的既定目标，「九大」之后，如果此时邓小平复出且能和林彪搞好关系，则对于在「九大」之后「倒周」的行动是相得益彰的。

有数据说，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应该较快地告一段落了。邓小平复出的机会也来临了。无论是出于那种情况，有资料证实此时，毛确实有想让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想法。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周恩来以惋惜的口吻说）邓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来，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的，现在看来又不行了。」　　邓朴方回忆：总理一直没有忘记过父亲，但他很谨慎的，特别是在父亲的问题上他不能多说话，想多说也不能多说话。我看到一个材料，一次在庐山的时候，提到曾设想让邓小平上山开会的事情。当然我想，一定是总理和毛主席曾经谈过这个事情，才有这种可能。」　　但是笔者认为，考虑到周恩来对待彭真的复出的态度，此时的周恩来是不会表态同意邓小平复出的或者也是极其不积极的。

无论如何，在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对于林彪与邓小平的评价「变调」了许多。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5月１０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讲述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周恩来在讲述「井冈山会师」时说：「当时林彪是个连长，陈毅同志是个团的党支部书记。」在这里，周恩来丝毫不再提毛林会师一事，而且把当时仍然为右派代表的陈毅作为林彪的上级讲出，这与当初周恩来极力对林彪的吹捧形成鲜明的对比。更为惊讶的是，周恩来再谈话中表扬了邓小平。周恩来说：我们在庐山会议受到了教育，不然我们都是「天才论」证。在座的都知道了，三个副词，「天才」我们都赞成了，还有一个「创造性」，然后又加上一个「全面」，三个动词，「继承」、「捍卫」、「发展」。「捍卫」倒是邓小平提的。三个副词，三个动词，主席一看那么多，就把副词勾掉了。副词往往起副作用。有三个动词就讲清楚了。　　期间折射出来的对林彪的贬低与对邓小平的表扬，是不同寻常的政治气息的变化。而恰恰是在一年前，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周恩来对于邓小平的说法还多有不同：周恩来说三个副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邓小平的复出第一个是得益于「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加快解放老干部的政策。「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复出的政治意义比其实际意义要重的多。

这也是邓小平复出缓慢的另一个原因。从毛泽东的８月１４日的批示到任命副总理竟然费时８个月。邓小平随后的升迁同周恩来地位的削弱在时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或者说邓小平就是踩着周恩来的「肩膀」一步步的高升起来的，是毛泽东严厉批判周的结果。毛泽东启用邓小平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周？除了上述的重要原因之外，就是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成功让毛觉得「反客为主」，由此引起的嫉妒让毛泽东觉得要把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威风」彻底打掉。不仅是外交上的，周恩来因为作为解放老干部的具体执行人而大获人心的事实，也引起毛泽东的忿忿不平。

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之后，只是参与外交活动，虽然说可以参加有关外交事务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因为外交政策都是毛泽东一手制定而不存在讨论的问题，因此邓小平复出后参加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竟然是在１１月份的批周会议!因为一直没有可以让邓小平表现的机会，因此「十大」上邓小平仅是中央委员。邓小平在批周会议上的发言可谓少而精，一语中的，使得周恩来百口莫辩，大获毛泽东的欢心。随之而来的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并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虽然邓小平此时的头衔不少，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实权，真正参与的还是外交事务，特别是作为中国联大代表团团长参加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中，邓小平在军委六人小组中的作用也是非常模糊。但是邓小平从１９７３年的复出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以前同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派关系良好，并没有什么冲突，这使得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表现更加满意。这也是邓小平能够一直稳步升迁的重要前提条件。

根据《周恩来年谱》和有关《邓小平传记》等，周恩来和邓小平从１９７３年3月个人见面以后直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份才有个人见面!周恩来从１９７４年6月1日就因病而长期的住院，再也没有回到西花厅，直到１０月6日邓小平才赴医院同周恩来见面，还是因为邓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缘故。　据此，可以判断出6月1日以后邓小平就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周恩来知道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人」，即使就是回来替代自己，也要努力为之。这或许是周恩来的伟大和无奈之处。因为对于周恩来来说，最要紧就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无论是何指示。对此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曾经指责过周恩来做事既虚伪又无原则。

无论是邓小平的外交工作，还是在国内同文革激进派的配合，都让毛泽东觉得满意。继「批林批孔」之后，国内形势的恶化，以及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都让毛泽东觉得，要彻底的「交实权」于邓小平。这才是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能够大刀阔斧的整个背景。而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年初的任命，标志着周恩来的政治生命的结束。

３．邓小平复出的过程

（１）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刻意保护

意想不到的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和在十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上，不仅是林彪、江青、谢富治等人攻击了邓小平，周恩来也攻击了邓，并在倒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笔者认为这正是周恩来看透了毛泽东的安排，利用当时的大局趋势，作出的自保行为。在这种形势下，尽管毛泽东有意，邓小平也不得不暂时退出政治舞。　毛

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批评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以及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　实际上，在书记处，是彭真仗着刘少奇的后台，大权独揽，邓小平自觉退让，大大减少了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的机会。有党史专家说邓小平自认为同毛泽东的理念有差而自觉同毛泽东疏远，以避免直接冲突的机会。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因此这个批评毫无实质内容。在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检讨上，毛泽东作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的批示。

１９６７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最高报刊点名，意味着对刘、邓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将大大升级。邓小平立即作出反应，于4月3日致信毛泽东「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毛泽东通过汪东兴捎信给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　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来信上批示到：做大的工作不行，干小的工作还是可以的。邓小平的驻地还派有解放军保护。毛泽东还把戚本禹编辑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中的邓小平言论删掉。　在邓小平提出要求面见毛泽东澄清一些事情后，毛泽东同意了，并再次告诉邓小平如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直接写信。毛毛说「看到主席态度和，批评得并不严厉，使人感到相当大的安慰。」

毛泽东在给邓小平希望的同时，也惩戒了邓小平在１９６０代初期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经济路线上的分歧。１９６６年7月１８日和8月5日，邓小平接连被批斗。邓小平因抄家写信要求面见毛泽东，毛泽东此时在上海。即使毛泽东在9月份回到北京后，也没有见邓。在惩戒的过程中，邓小平没有受到残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残，毛泽东还是高抬贵手，亦证明了毛泽东的政治安排。

根据王力的回忆，１９６７年7月１４日，毛泽东在武汉与王力单独谈话时说到邓小平「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都离不开周恩来，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　但是１９６７年的7月份，正值天下大乱，邓小平绝无在那个时期重新出山，毛泽东只能让邓小平继续冷藏。

笔者认为王力可能会夸大其辞，但是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１９６６年5月5日，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外地作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说：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一百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赞扬了林彪。

１９６７年9月２４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接班

人当然是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5日，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毛泽东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笔者注：毛泽东关于『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的说法现在已经证明是谎言。）

八届十二中全会来临之际，邓小平应毛泽东要求于１９６８年6月２０日对于自己的错误作出检查，特别是对历史上的疑点－红七军「逃兵」问题作出详细解释。邓小平最后表态说「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继而提出要求「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因此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专门对邓小平的历史问题加以澄清：「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插话：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借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九大」选举前夕，毛泽东谈过邓小平的问题，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谢、古，王明是反对的」。

在「九大」的时候，毛泽东还特意叮嘱陈伯达「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因此报告上不要写成「刘邓路线」亦即「刘邓要分开」。陈伯达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想法，因此周恩来是知道毛泽东的意图的。

由于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因此在１９６９年的战备疏散之前周恩来也是「爱莫能助」。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４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１０月２０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汪东兴直接通知邓小平要迁往江西。　因为是由周恩来一手操作这次战备疏散，周恩来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因此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周恩来与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通话，要省革委会妥善安置即将去江西的陈云、邓小平、王震及其家属，生活上要给予照顾。次日，得知江西省革委会准备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时，即告；对邓安排赣州不妥，那里交通不便，山区条件差。应安排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据此，江西省革委会重新调整了方案，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南昌市郊。　周恩来之所以强调交通便利问题，是缘于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

要他们呢。」

临行前的头一天，１０月２１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表示接受中央对于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做出过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此信由汪东兴转呈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本人看到了。邓小平一到江西，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前来接机：「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１１月２６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要求把滞留在机场的行李托运到江西。行李不久便被运到。　「同志」，就意味着邓小平问题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行李运到，说明「汪东兴之路」仍然畅通。

（２）迈出关键的一步

直到毛泽东在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４日圈阅邓小平的信之前，周恩来对于远在江西的邓小平都是「漠不关心」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邓小平在１１月６日在江西听取了《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的传达。１１月８日，邓小平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邓小平首先向毛泽东表态对文革的看法「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接着提出来了自己的要求「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此外，邓小平很技巧性地向毛泽东提及自己的孩子们，并请求毛泽东帮助，以安排好孩子们，借此探测毛泽东的态度。

果不其然，毛泽东并没有回复此信，而是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毛毛说：邓小平要求安排孩子工作上学的的事情得到了解决，这说明毛泽东仍在注视着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　　同时，毛泽东也想知道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

１９７２年1月１０日，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在同张茜等人谈话时，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笔者注：在所见所有的材料中，并没有发现周恩来如何告诉陈毅的家属以及陈毅的家属在这方面的回忆。张茜后来整理的同毛泽东谈话记录也无此事记载。)　　１月２４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谈到邓小平问题时说，林彪就是要把邓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

受到孩子被安排上到大学以及形势变化，特别是被通知可以参加党组织生活的鼓励，邓小平在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２日再次给汪东兴写信又一次提出回北京和工作的要求，信中还提出要求经济上的帮助。汪东兴收到信后，于５月３０日批道：「邓小平同志又来信，信中要求解决钱和人的问题。我建议把邓的原来工资照发。」并请将此信报周恩来批示。６月２７日周恩来批示同意。

事情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邓小平在８月３日向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保证永不翻案的信：「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８月３日的信是江西省革委会送出通过江青转交毛泽东的。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收到邓小平从江西寄给他的信，非常高兴，很激动。这封信主席看了两遍。

毛泽东在８月１４日作出了那个著名的批示：请总理（周恩来）阅后，交汪主任（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毛泽东强调了邓小平的历史：（１）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２）没历史问题。（３）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而且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虽然当日，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并且当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内容，　但是却没有了下文。毛泽东的批示固然重要，邓小平不再是「走资派」，而是「同志」了。但是毛并没有明确提出对邓小平的职务作出具体的安排，因此毛泽东虽然几次提起「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　邓小平的复出安排仍然无法具体落实。毛泽东把「球」踢给政治局，试探政治局的反应。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林彪倒台后，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一伙的势力大大加强，对于像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的复出，他们坚决反对，形成了强劲的阻力。」事实上，根据《周恩来年谱》从８月１５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上传达毛泽东在８月１４日的批示后，无任何记录显示政治局再次讨论此事。周恩来也无任何积极热心之举。

此时的国内形势又增添了很多变量。在１９７２年，面对林彪事件后党内外日益增长的种种怀疑以及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倾向的日益增长，毛泽东不得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是作为这场「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来说，毛是绝不允许从指导思想上批评和否定「文革」。因此当周恩来在贯彻毛泽东的「纠左」思想时，牵涉到文革意识形态的批判时，毛泽东不得不出面纠正周恩来的「错误」。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７日，毛泽东提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这是自「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伴随着批周，邓小平的机会也来临。笔者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表明，毛泽东在１２月１７日批周和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之间有何直接因果关系，但是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绝非巧合这么简单。而且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邓小平的崛起恰恰和周恩来受到的批评在时间是非常同步的。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当日，周恩来还约见了纪登奎和汪东兴二人。　四个月过去了，周恩来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而是要纪登奎和汪东兴替邓找个位置。周恩来的小心翼翼跃然纸面。

汪东兴的提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毛泽东的看法，这才是周恩来此信的关键之处。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７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谭震林、邓小平重新工作事写信给周恩来，提出：

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收到此信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于邓小平复出的采取非常谨慎的做法，而非「邓小平被打倒后，周恩来尽己所能，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后来又竭力创造机会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点头，周恩来在邓小平的复出上是毫无建树的，即使毛泽东点了头，周恩来也要等待毛泽东的再次确认，因为邓小平毕竟曾经是「第二号走资派」，稍有不慎，即可能被抓住把柄，而导致被动。同时亦因为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也是邓小平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更是可以解释周恩来为什么如此慎重。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１９７３年２月下旬至３月初，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邓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要让邓小平复出。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大员根本不可能赞同，于是便百般阻挠，从中作梗。政治局会议上充满了尖锐的斗争。不过，这次让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中央文革再心怀不满，也未能得逞。」

笔者对此认为毫无可能。江青等人在知道毛泽东的明确意图下（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后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丝毫不敢「违毛办事」，汪东兴对于邓的任命推荐，政治局成员都明白是毛泽东的建议。）是不可能说出反对意见。毛毛在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说「周恩来急于要让他的老战友邓小平尽快复出，周恩来知道，邓小平复出，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并完全可以顶替他的工作」的说法，同江青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至少可以认为邓小平的回归可以大大增加对抗周恩来的力量。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张春桥为此还批评上海造反派「为什么还称邓小平为第二号走资派？」。

在１９７３年１１月的「批周」会议上，不仅邓小平的表现是合格的，在接下来的近两年的时间内，邓小平同江青等人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复出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够反对江青。　１９７３年５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上讲：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这应该是实情。

直到１９７３年的３月９日，此时周恩来已经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取得两周的病假，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交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终于正式复出。

巧合的是在中央发出《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国内党史界不少人探寻「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说明了「１９７２年５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１９７２年５月中旬，在例行尿检中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５月底，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周秉建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则说：毛泽东的三条亲笔批示是（１）不治疗；（２）不要告诉周、邓；（３）搞好营养。

张玉凤回忆：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毛泽东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笔者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德怀竟然被毛泽东允许做手术。）

１９７２年８月４日，周恩来第一次尿血，不得不到北京西部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５日。 同年１１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事实上，周恩来的病情变化，毛泽东一直是了如指掌。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３日，周恩来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以至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变成红色。医疗组很快把报告上呈中央即毛泽东处。 ２月７日，汪东兴却对吴阶平电话指示到：「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

１９７３年３月２日，周恩来约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问题。５日，叶剑英陪同外宾接见外宾后，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病情发展、急需检查治疗的情况，并拿出装着周恩来血尿的瓶子让毛看。毛当即批准先检查、后治。同日。周恩来作透视检查。３月６日，周恩来去毛泽东处开会。会前，周恩来将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泽东作简要报告。周秉建说「(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方式争取到３月１０日检查治疗的机会。」周秉德还说在张佐良把病情发展和治疗办法详细的告诉周恩来之后，周恩来说：「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办法。」

吴阶平在访谈时表示：「毛主席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医中药，不能用手术，可以用针灸，可以吃中药，不能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于想，我们能不能就说，周总理自己愿意手术，周总理自己是愿意手术的，可我们不能去说，因为我们要去说，周总理说，我让你们不要说话的嘛，就违反他的意愿了。其实他个人也是想做手术的。」

因此同大陆官方党史界流行的说法恰好相反，并不是因为周恩来要准备邓小平复出的文件和江青等斗争才推迟到１０日进行手术，而是因为周恩来要在１０日动手术不得不在9日把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准备好。毛泽东已经批示很久，汪东兴对邓小平任职的提议也完毕多时，江青等人也并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周恩来办事何来如此「啰嗦」？

治疗期间，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先后前往看望李富春和蔡畅、邓小平和卓琳，以及住３０１医院的刘伯承，告诉他们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情况。

１９７３年3月２８日，周恩来同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开会。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需要指出来的是，在3月２８日的接见中，还有江青。而《周恩来年谱》则用一个「等」字把江青给省略了！　这也说明了江青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也是非常关注和支持的。從另一方面来说，邓小平的复出更能配合当时批周的策略，江青何乐而不为呢？后来，江青因为权力之争又和邓小平闹僵，则是后话。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经提起周恩来在4月9日，周恩来夫妇和邓小平夫妇会谈的事情：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辛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在同一本书里面，毛毛还写道：１９７３年我们回到北京后，父母亲曾带着我去钓鱼台他的住处看他。我们看到的康生，已经病入膏肓，骨瘦如柴，病卧在床。见到我的父母亲，康生开口便大骂江青、张春桥等人，骂得很凶，也很狠。如果是别人骂「四人帮」，自然没什么奇怪，但不知怎地，这骂，一出自康生之口，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有些变味儿。听着康生的骂，刚刚回北京的我们竟然不知所云。

毛毛关于4月9日的回忆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依据周小心翼翼的性格特点，特别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存在，周提起如此敏感话题是不太可能的。其次，邓此时刚刚复出，和周的交往甚少，甫一见面，周就同邓谈此事，其可能性更小。考虑到一个是邓小平的回忆，一个是毛毛自己的亲身经历，笔者则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毛毛把两次事情记混了。

（３）非常缓慢的升迁

3月２9日毛泽东虽然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此举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做了保留，在使用的时候还要继续进行观察。因为邓小平只能参加「有关重要决策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亦即外交政策方面的政治局会议，而不是同王洪文等一样可以「参加所有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根据现有记载，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则是在１９７３年的著名的「帮周会议」。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声称「邓小平恢复了副总理的工作，但是，周恩来总理却要暂告病假。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将主要交由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人全力来抓。」但是很少有明确的资料说明这一点。

１９７３年4月9日，周恩来在玉泉山会见邓小平、卓琳，并进行长谈。但是从此以后，再无周恩来与邓小平私下交往记录，而且引入注目的是自１９７４年6月1日周恩来搬到３

０５医院之后，直到１０月６日邓小平才因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之后才去医院看望周恩来。事实上，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周恩来与叶剑英的关系都不「热络」。　毛泽东的「观察」或许是个可以拿来解释的理由，邓小平知道要和周恩来「撇清」，才能获得毛泽东的信任。

１９７３年8月份召开的「十大」，邓小平仅被选举为中央委员，没有能进政治局。这同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让邓小平去表现，毛泽东的「考察」得到满意结果有极大的关系。机会终于在１９７３年年底来临。

在１９７３年年底的批周会议上，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会议的中间，毛泽东曾问前来汇报会议情况的王海容和唐闻生：「邓小平发言了没有？」毛泽东要了解邓小平的情况，要了解邓的态度。王海容说：主席昨天晚上说，这个会议开得不好，所以现在要调兵遣将。将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一言击中周恩来的要害：「总理表现出来的是外交路线上的错误，但是你的核心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我们在座的所有人认为，我们对于毛主席是可学不可及的，你这次的错误在于你的内心认为毛主席不只是可学的，而且是可及的。」　因为病重，毛泽东托付周恩来「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十大」之后，周恩来是排名第一的党的副主席，但是周恩来又不是毛的接班人，因此毛最不放心的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诛心之论，百口莫辩。当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邓小平的发言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一时兴起，毛泽东问谁知道邓小平的住处，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虽然因其时已届深夜，没能将邓找来。　亦有数据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召来邓小平，进行了长谈。　但是无可置疑的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表现是十分满意的。

为了避免在军队中形成尾大不掉的「山头」，进而威胁到未来的接班人，以及在军队中「批林批孔」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对调。１２月１２日到２２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的批评了周恩来，并提出要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在这同一个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邓小平才开始「归位」。

因为１９５４年9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邓小平就为其中的中央军委委员（当时未设常委），１９５９后更是１３人组成的军委常委之一（常委之中，除毛、邓外全为有军衔的现役将领）。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相当高，「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同他对自己和斯大林的评价一样。毛泽东继续到「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也劝邓小平：「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２２日，中央根据毛的意见，周恩来亲笔代中央起草文件发出通知，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王洪文虽然被提拔了上来，并得到毛泽东的刻意栽培，但毕竟新来乍到，在党、政、军机构内都还没能插上手，更不要说掌握实权。邓小平刚刚回来，却一下子在党、政、军都有了职务有了实权。」甚至一些资深党史研究专家也据此认为「毛泽东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未担任过中央军委要职的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说明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他掌管。」　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虽然在１２月１５日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但是事实上此时的邓小平并没有出任总参谋长一职。毛泽东的说法是一个笼统意义上的「总的参谋长」而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正如毛泽东在１４日所讲:「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和当时发出关于《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通知》（１９７３.１２.２２）中都没有提及出任总参谋长一职，仅是说:「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　根据中央组织部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附卷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９７.９）》中的介绍，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一职为１９７５年１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１９７５.０１.０５；中发〔１９７５〕１号），邓小平确实是在１９７５年１月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至于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他掌管和掌握实权更不是历史的事实。根据《周恩来年谱》，１９７４年1月１８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２０日，由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此建议时，将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小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同日，与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１９７４年1月３１日成立政治局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王洪文作为组织工作小组的组长，负责审查全部人事组成名单。

因此即使在军委六人小组中，当时的邓小平不仅排列在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之后，而且在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于运动的走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而与同一个时期的王洪文相比，王洪文不仅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起筹备四届人大，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大小事务，而且同时还是主管同时期为专门处理各大军区的揭发材料而成立的项目组。　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可谓手握大权，更是在１９７４年6月1日之后代替入院治疗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此时的邓小平和王洪文相比，如何比得上?作为周恩来更是悉心照顾和指点王洪文，同邓小平的交往实属「凤毛麟角」「乏善可陈」!

毛泽东给予邓小平的头衔是不少，但是邓小平实权并不多。对于毛泽东来说，邓小平取代周恩来主持对外事务才是最紧迫的事情。因此，从一开始邓小平作为副总理，分管的就是外交，随着周恩来的病重，陪同外宾见毛就成了邓小平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新的任命意味着什么？

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于这次八大司令对调，邓小平是毫无涉及。对于有人认为是邓小平先提议、提拨邓小平是为了保证八大司令对调成功等，笔者认为这都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至于谁提议的，毛泽东说是叶剑英和纪登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具体操作是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四人完成。　　对于军队的控制权，一直都是被毛泽东牢牢的掌握着。从毛泽东的１９７１年的南巡讲话以及１９７３年的许世友、韩先楚以及杨得志的检讨也可以看出。　　「林彪事件」以后，一大批原四野军队干部受到牵连而倒台，很多原二野或其它山头的人马被提拨上以填补这些「空缺」。苏振华的复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苏振华在１９７２年复出以后，很快掌握了海军的实权。　　毛泽东提拨邓小平的政治意义在于，邓小平可以作为这些人马的老上级，可以更好的理顺和协调他们同中央军委的关系。虽然毛泽东多次强调要重视和解决「山头」问题，但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山头」也不是「百弊而无一利」。况且，鉴于邓小平和林彪的间隙和历史上无任何渊源，更加有利于进一步清理军队中的林彪势力。毛泽东说：「现在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刘邓的人。」

（４）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风波

中美、中日建交以后，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好评如潮，把中国外交说成「周恩来外交」。毛泽东醋意大发之下，狠狠的整治周恩来。１９７４年的４月份，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即使周恩来身体允许，周恩来也必定是无缘与联合国的舞台。

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毛泽东特别叮嘱此事要秘而不宣，由外交部自己提交报告。　　毛泽东要观察各方反映。但是王海容却早早的在３月２０日就告诉了周恩来，这是毛的意思。周恩来对此安排表示惊讶，因为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

３月２２日，外交部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出席六届特别「联大」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批示同意外交部的请示报告的同时，考虑到叶剑英因高血压导致视网膜出血尚未痊愈，而王洪文又忙于指导「批林批孔」运动，需要邓小平协助工作，故而周恩来建议三周的特别「联大」会期邓小平出席一周，在向大会发表讲话，并与主要国家领导人接触后，即起程回国。周恩来特别指出，将他的批示意见首先呈报毛主席，暂不送王洪文、康生。在毛主席批示后再送叶剑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核阅，最后退外交部办。江青以「中央军委要开会解决李德生的问题，邓小平必须参加」为由反对邓小平出任团长。　　江青的说法也有道理，因为李德生曾经是邓小平的部下，希望邓小平能像骂陶鲁笳一样去骂李德生。　　周恩来和江青的建议有不谋而合之处，都是因为国内事务需要邓小平，因此建议缩短邓小平在联大的时间，只去一周。不同的是，周恩来是在毛泽东的决定之后作出的建议。江青则是被蒙在鼓里。

正如前述，在邓小平复出的时候，曾经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反对江青。在关键的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份的批周会议上，邓小平又合作的不错，因此江青讲的也未必不是实情。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江青一直被蒙在鼓里，王洪文知道以后也没有告诉江青。　　因此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坚持要外交部撤回这一报告，会议最后议而未决。直到毛泽东亲自出面，写

信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她「小心谨慎」。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邓小平复出和江青的利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毛泽东用来从不同角度侧面攻击周的工具。毛泽东启用邓小平以后，希望能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即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和以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派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革的大局。即使江青反对邓小平出任团长的理由都是完全正当充分的，但是难免会在二者之间种下芥蒂。

同时，邓小平的崛起，同和江青等人相处良好也有很大关系。江青在邓小平复出的时候，并不认为邓小平属于周恩来派系，而是把邓小平看作是自己的人。　　正如前述，邓小平复出的两大条件是不能够反对江青和永不翻案，就是存在「联大风波」一事，江青在１９７６年回顾时仍然承认，在１９７４年同邓小平的相处还是大体不错的。江青支持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因此，江青反对邓小平出任联大代表团团长，笔者认为理由是正当合理的，并非中共官方所定论。中共官方认为江青不仅「无理取闹」还「有着更深的用心」，「在江青等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自己「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

至于「至周恩来去世数年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透露，周恩来为什么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她说：『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伙人乘他住院时间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去住院治疗。』」　　《毛泽东传》则说「在当时江青等不断发难、政治风波迭起的形势下，邓小平不在国内，周恩来无法放心。他置病体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坚持等候到邓小平从国外归来，才在６月１日住进医院。」这种说法是值得推敲的。邓小平是４月６日离京，４月１９日回京。周恩来是６月１日入住３０５医院。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３月中旬到５月底的两个半月内，周恩来外事活动多达五十四次！

１９７４年５月上旬，尿病理检查中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证实了癌细胞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５月９日，周恩来医疗组认为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制定出《检查治疗方案》，并向周本人和负责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作了汇报，当面陈情，情况已经十分严重，敦促中央下决心批准周恩来及早住院动手术，避免发生意外情况。　　周恩来也在５月１３日约见负责医疗工作的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话，陈述自己的想法，实为请他们帮忙，提早做手术。在同医生会谈后，在医生的暗示下，周恩来写了封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够接受手术治疗。　　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叶剑英也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

张春桥说：「从现在起，到５月３０号，有好几批外宾要来，最后一个外宾，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他们都要求总理接见。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需要。所以，起码要到５月底以后，才能考虑怎么办的问题。」　　张春桥说的也是客观实情。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吴阶平说要做手术一定「周恩来一定要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毛指示检查和医疗两步走，但是吴阶平在叶剑英和邓颖超的支持下，两步并一步走之后，「后来毛主席发下话，说两步走比一步走好。」　　从１９７３年３月第一次手术之后，周恩来每一次的手术报告都是周亲自所为。　　这一次，毛泽东说：「见完拉扎克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５月底访华。　　３１日，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中马建交公报。毛泽东终于批准了。６

月１日，周恩来住院做了第一次大手术。

因此，周恩来到６月１日才住院同邓小平去联大基本上关系不大。

此时的邓小平，在外交舞台上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事，在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详细正确的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１)把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作为外交战略的基石；(２)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坚持毛泽东所说的两句话，即「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３)关于中美正常化的途径，关键是台湾问题，解决方式只能是日本方式，即承认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　邓小平，而不是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上的的地位得到明显提高。

５月１２日，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同布托举行会谈。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参加如此高级正式会谈，虽然邓小平以前也在机场迎接国外国客人，参加举办的招待外国客人的宴会，陪同外国客人到大寨参观等等。　１９７４年的邓小平也开始多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以１９７４年５月为例，毛泽东一共接见五次外国客人，邓小平陪同接见三次，而王洪文全部都参加，分别是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１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１８日，毛泽东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２５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１９７４年的上半年，邓小平参与的国务院事务也比１９７３年增加许多，虽然具体责任并未明朗，但是至少参加可以参加例行的政治局会议了。

毛泽东无疑是邓小平得到提拔的最重要和决定性的因素。当邓小平回到北京时，当晚汪东兴就看望了邓。邓小平向汪东兴致谢，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　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是说：「不是周恩来（提拔我的），是毛主席。」　在国内党史界，在此点上，无疑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邓小平在批判周恩来中的表现，同江青等人的关系处理上，都是让毛泽东满意的。特别在「批林批孔」中，邓小平也是积极配合，同王洪文等人也合作愉快。　除了对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江青的信所提开会建议赞同之外，还在３月份严厉指责陶鲁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得力。邓小平对于露骨的批周也毫无任何替周开脱之语。所有的这一切都使毛泽东觉得邓小平可以托付重任。一切都按照以「王洪文和邓小平的搭配，组成新的工作格局」的模式发展。当毛泽东在１９７４年８月，作出停止「批林批孔」运动，要重新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相对于王洪文等，邓小平无疑具有更强的优势。

基于邓小平的表现，江青在误以为邓小平是同路人，従而要求邓小平对「风庆轮」事件表态时，邓小平可能是基于「风庆轮」有可能牵涉到自己或者对江青的态度所不满而没有当场迎合江青，于是引起江青极度不满。但是在毛泽东看了这完全是「小事」，并不影响对邓小平的进一步重任，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而且在１９７４年１２月毛周见面时进一步提出：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在通过漫长的观察期之后，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初终于获得了更重要的职务，掌握了更多的实权，全面的代替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１９７５年的邓小平，无疑要站立在政治舞台的中心。

第十二章 四届人大以及最后的日子：终于没有被「打叉叉」

在四届人大的准备过程中，江青等人的表现让毛失望，但是也并不是官史中所讲的是鲜明的正确与错误的两条路线的斗争。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但去好景不长，又一次被打倒。１９７６年1月，周恩来走完了他的一生，虽然毛泽东对周恩来去世表现得出奇的冷淡，但不管怎么说毛还是放过了周，周终于保住了「晚节」没有被「打叉叉」。

一、四届人大的缘起与拖延

１９６６年7月7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改期召开。「九大」前后，毛泽东认为「文革」已经接近尾声。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中央文革小组提交的报告中声称：「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也就解决国家主席问题。」　要解决国家主席问题，自然会牵涉到修改宪法和召开人大等诸多事项。

１９７０年3月初，周恩来致信毛泽东，随信附来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周恩来在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　3月8日，在武汉的毛泽东指示汪东兴回北京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　此后，筹备工作主要是由周恩来主持。

正如以后参加过四届人大的一位代表的回忆：「虽然选举是采用无记名投票进行，但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只不过是完成一次『橡皮图章』作用。」　依据１９５４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职能，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人选等都是由全国人大选举决定。

在１９７０年5月２７、２８日，周恩来就已经认为「现国务院各部、委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已成熟，拟上报批准。」６月１６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６月７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对国务院报告的批示稿等事项。6月１７、１８日，周分别将政治局会议商定事项报毛泽东、林彪。6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批发毛批示「照办」的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在此报告中，周恩来提前任命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但是报告却不是提交给将来召开的四届人大，而是毛泽东和随毛泽东画圈的林彪。　余汝信先生认为：周恩来此时眼里，人大这个过场都不需要走了，「橡皮图章」也不需要盖了。　四届人大要主要解决的无非是修宪－－毛所关心的国家主席问题而已！毛泽东说：「我提议修

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主席」。

但是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周恩来多次向毛反映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直到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８月２２日，周恩来同其它三名常委一起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　８月２３日晚，周恩来对张春桥说：《宪法》修改草案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张春桥回答：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叶群还以周恩来为例对邱会作等人讲：「昨晚周总理交代张春桥准备《宪法》草案中设国家主席的章节，这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们要向总理学习。　周恩来２３日还打电话告诉陈伯达：有些人主张还要国家主席，请陈准备些条文，等候毛的意见，备而不用。　此后在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宪法》草案有两个版本，一个「设」，一个不「设」。

８月２２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宪法修改草案中「设不设国家主席」如此解释：「下午见主席，我们特别提了国家主席的问题。报告上已经说了嘛，但我们又说了：大家热切希望，既然是一元化嘛，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样就满足群众愿望。领导嘛，当然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了。……当然，起草的稿子还是照顾那个一开始由东兴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意思。但我们还是反映一下子，还提出了一个方案。」

经毛泽东批准，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发〔１９７１〕７７号）称：「林陈反党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他们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要设国家主席。他们反党的理论纲领，是坚持天才的观点。核心的问题，是要设国家主席，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

周恩来岂不是对于「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之阴谋非常的配合？

９月６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全会公报宣称：「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

但是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四届人大并没有如期举行。虽然据报送毛泽东、林彪的《中央准备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工作计划（送审稿）》，四届人大应在９月１５日至２４日召开。　未能如期举行的个中原因，虽然官方从未作过任何解释，笔者认为显然在毛看来要发动「批陈整风」进而解决林彪问题比召开四届人大重要的多。

１９７１年7月１０日，毛泽东从熊向晖处了解到情况后断定「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１９７２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６０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７份，传达范围非常狭窄。去年７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

他们要捣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李德生回忆：经过批陈整风，毛主席从大量的揭发材料看出，同林彪的这场斗争远没有结束，他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掌握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陈长江回忆：主席对接班人林彪越来越不满。到１９７１年８月，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顶点。谢静宜的丈夫苏某（苏元勋－笔者注）在空军机要局，通过谢静宜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主席决定南巡，行前主席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跟着林彪走。难道解放军都会造反？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解放军不听指挥，我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８月９日周恩来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的８月８日，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离京赴广州期间中央日常工作，并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女）转告。这说明周恩来清楚毛泽东的意图。

就在８月１２日下午，毛泽东南巡前两天，周恩来从广州飞回北京，立即到毛泽东那里面谈，请示四届人大的召开时间，毛泽东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设想。８月１６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分别谈了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汇报结束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９月１０日，周恩来请示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等事宜。毛泽东批，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这说明毛泽东已经下决心人事调整了。

「九?一三事件」突发，毛泽东想用组织手段解决林彪问题的可能性绝无，九届三中全会与四届人大也就又一次夭折。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最近，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延迟两年的筹备四届全国人大工作，又一次被提到日程上来。

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２日，周与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四届人大会议情况。同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决定在政治局内组成三个小组进行：１：组织工作小组。王洪文任组长，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吴德、汪东兴为组员，负责审查全部人事组成名单；２：宪法修改小组，康生任组长，张春桥为代组长。江青、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为组员，负责宪法的修改、整理工作；３：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恩来任组长，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华国锋为组员，负责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先于近期提出报告要点或大纲。以上三组工作。均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十四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政治局商议情况，提出：「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圈阅了报告。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９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筹备工作，并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３日，周恩来同王洪文一起向毛汇报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名额分配方案》等相关问题。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知识分子代表要增加一些；老朋友要照顾，同时要多交一些新朋友等。１０月２１日，对于四届人大主席团人选和《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额分配方案》均已经落实。

但是李震的突然死亡导致四届人大再次耽搁。然而国内党史界流行的说法则是「四人帮」视周恩来为夺权的最大障碍，为此发动了１１月份的批周会议，从而导致了四届人大的推迟。但从现有披露的记载来看，江青等人在此次四届人大代表的准备过程中同周恩来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亲历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孙中范回忆：１０月２１日，组织工作小组召开会议对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进行讨论。会议结束前，纪登奎要求值班室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主席团人选名单，第二天上午正式印好。第二天上午我们仍按纪登奎的布置，仔细校核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并讨论修改了说明。按惯例，当天下午，纪登奎、郭玉峰、吴庆彤、周启才等一定会来紫光阁办公，审定印好的文件。可是他们没有来，而且一连几天都没有来。后来，从国务院值班室听说，１０月２１日，发生了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公安部部长不明原因身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北京的气氛比较紧张。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这时才弄清楚，中央责成纪登奎、郭玉峰等参与处理李震事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大约在１１月初，组织组负责人吴庆彤来紫光阁召集值班室工作人员开会。他说，中央最近有些紧急事务需要处理，一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值班室也就没有事情做。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值班室可以派人轮流值班，平时可以回原单位上班，但不要出差，随时等候通知。

当李震事件告一段落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批周」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及「反右倾回潮」，直至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四届人大直到１９７４年的１０月份重新题上日程。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才是四届人大推迟的最关键的因素。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要秘书电话告诉王洪文，并要王洪文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时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突出强调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四届人大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

二、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插曲：「风庆轮事件」

毛泽东在８月决定中止「批林批孔」运动之后，开始考虑何时召开四届人大。１９７４年国庆节一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在１０月４日向毛报告：「１０月３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毛同意年内召开四届人大。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和会议期间所有

的文件、人事安排，都要向毛泽东请示和获得批准，方能凑效。

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并没有参加１０月３日晚的政治局会议，因此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在１０月４日并没有向周恩来转告关于四届人大的通知，仅是告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后来国内党史对此一致鞭挞，实属不公平，笔者认为这正是毛的安排。高文谦先生认为：他在用召开四届人大这张空头支票吊人们胃口的同时，暗中打的仍是排周的主意，准备利用四届人大组阁之机，先把周恩来「挂」起来，然后再逐步排出权力格局，用邓小平取而代之。为此，毛泽东在筹组四届人大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明显把周恩来晾在一边，既没有让他过问有关人事安排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表态是否由他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是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摆出准备在政治上重用邓的架势。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６日晚，周恩来和江青谈话。江青提出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周恩来当时并未表态。　　周恩来在没有得到毛的明确授权，参与或者主持四届人大之前，周恩来如何表态？虽然无从得知江青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找周谈话，江青此举无疑是不符合毛的部署。

毛泽东的本意是撇开周恩来，让王洪文等和邓小平一起齐心合力，趁四届人大的机会造就以王洪文等文革派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结合的权力新格局。而且邓小平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表现是让毛泽东满意的。这也是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精心打造的身后政治格局。首先是通过１９７２年６月份的「批林整风」会议，让全党知道周恩来不是接班人；然后提拨王洪文和解放了邓小平；进而再通过１９７３年的批周会议，彻底打掉周恩来的威信；随后更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让全国人民知道以后如果是周掌权，则会走复辟的道路。毛泽东在事后所说的「总理还是总理」是有所指的，如一直有让周恩来继续做总理的打算，何必来这一句呢？

虽然从来没有资料证实毛泽东设想周恩来不再担任总理，但是６月份的邓小平任中国代表团团长透露出来的信息无疑的。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为主题，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会议，使这次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谁代表不久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政府在会上阐明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为举世所瞩目。　　照理中国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毛泽东让邓小平率团前往，这不就是在暗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即将不保么？

然而一起突发的「风庆轮」事件让毛泽东认识到，江青等人的政治段位确实太低，不得不再次让以「调和」能力著称的周恩来主持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从而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不得不对江青加以更精心的指点和指教。

不少著作引用王洪文在１９８０年被审讯时的供词来证明「风庆轮」事件是意图阻拦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参谋长一事和「四人帮」一开始就打算把矛头指向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风庆轮只是个引子。江青在１０月１７日逼邓小平表态一事是蓄谋已久的。

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第一个在邓小平已经被毛定为第一副总理的情况下，无论是江

青还是其它人都不可能反对。恰恰相反的是，邓小平的任命同江青关系密切，同一定程度上来讲，毛是配合了江青才有了这么一个安排。

有著作如此叙述：「在此之前，国务院副总理中是没有第一副总理头衔的。这是在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并得到毛同意后才设立的，暗示着邓成为周恩来接班人地位。」

周恩来是第一个提出要设立第一副总理头衔的人，但是周并没有提出候选人。江青则说：「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了，他（指邓小平）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我说，那还不是你嘛。你们看我蠢不蠢哪。」　实际上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没有遇到任何的阻力。江青推荐张春桥取代周恩来的说法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江青之所以如此，同邓小平的表现是分不开的。首先邓小平复出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反对江青。　其次，是邓小平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让江青认为邓小平和她们是一路人。

笔者在《周恩来年谱》或者其它数据中未曾看到过，邓小平在整个「批林批孔」中对周恩来表示出同情或者是站在周恩来这边。相反的是邓小平却有明确支持「批林批孔」的记录。早在２月份，周恩来就建议「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政治局同志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在１９７４年3月8日，军委六人小组针对在军队中如何「批林批孔」召开会议。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在会上猛批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的陶鲁笳。邓小平批陶鲁笳要脱下裤子，要执行江青的指示，从文革中好好学习，积极进一步推动「批林批孔」运动。　再加上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年底批周会议上的表现，江青认为邓小平和他们是同路人，这是非常自然的。

风庆轮事件之后，周恩来劝说邓小平找江青谈，要搞好关系。对此，毛表示支持邓。根据后来江青的叙述，虽然有分歧，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江青表示了对邓的继续信任。

１９７４年9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归来。而在７０年代初，周恩来建议利用当前能源危机，可趁低价购进一批万吨级轮船。国产万吨级轮船的成功远航，此事正好提供给江青攻击周的素材，买船实际是崇洋媚外，不符合毛一直提倡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内部传阅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注销文章，文章中指责交通部派驻风庆轮的干部「崇洋媚外」，公开散布「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１０月１４日，江青将这份简报批给在京政治局全体成员，称「看了《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建议「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顾明说：「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七十年代初，石油能源危讥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代成新的船用原价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轮船花原价百分之二十就能买来。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总理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货款买了一批外轮。为此，『四人帮』批总理批得很凶。」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江青信上批示，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邓小平圈阅了该信。

这份文件经政治局传阅后，退给江青。于是江青在１０月１５日（原文为２５日）再作批示：

总理、康老：

这三份传阅件毛主席都看了。现送上请阅。

周恩来看后，批示：已阅。

康生也于１０月１６日（原文为２６日）写下了下面的一段批示：同意江青同志在各份材料上的批示，同意洪文、春桥、文元同志的批示。我长期以来感到交通部有问题。应通过查处李国堂的问题，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

１０月１７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针对风庆轮问题，作为已经被毛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此时还没有表态。此时江青询问邓小平的态度也是自然的，而且是突然提起，　因此并非什么蓄谋已久的事情。

显而意见的是，江青指责的是国务院，风庆轮事件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而非邓小平。而且此时的周恩来尚没有获得主持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的权力，如果单是指向周恩来，又如何能够影响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呢？况且人事的安排最后还是由毛一手决定。而且根据后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情况，把风庆轮看成是江青等把「矛头指向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也是毫无根据的。

但是，邓小平的表现却让江青非常失望。邓小平表示：我已圈阅，对这个材料我看还是要调查一下。江青却进一步逼邓小平表态：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表示：这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上赞成你们的意见吗？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　江青认为邓小平的这种态度有必要向毛泽东说明。江青认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对文化大革命从来不表态。邓小平不支持新生事务。风庆轮虽不大，毕竟是中国造的，邓小平为什么不表态？」　江青想知道邓小平是否在被任命了第一副总理之后还和他们是否一条心，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这其实才是江青质问邓小平的最根本的动机。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开会，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后来王洪文表示担心周恩来的健康才这么说的，笔者认为鉴于当时王洪文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可信的。

王洪文关于这部分的说法是：散（会）后我们回钓鱼台，江青通知我：张春桥，姚文元

至于１７号楼碰头，江青说小平吵架，就是对文革不满，有气，又说反对文革等等。江青说，邓所以跳出，可能是对总参提名有不同意见，这是一次总爆发(邓提陈锡联，江青提杨成武)。

但是从中可以发现的是，当时江青和王洪文关系的微妙之处。王洪文飞长沙之后，江青得知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丹麦首相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两次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１７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此事说明江青对王洪文的信任是有限的。

周恩来对于政治局发生的这一切，非常关心。１０月１９日，周恩来把能「通天」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向她们介绍整个事情的经过，着意替邓讲话，拜托她们向毛传话，说：经他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走的。邓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要跳出来。江青也说她是有意问邓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来他们是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周此番话，不仅丝毫不提矛头是指向自己的，反而挑拨离间，说是事先预谋好的。但是毛泽东发话此事是小事之后，周恩来又在１１月１日至３日先后分三批约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等开会，解决「风庆轮」事件的问题。　其间，还另约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还建议邓小平找江青沟通。

毛泽东对于「风庆轮事件」认为是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风庆轮所能够带来的仅是江青偶然和邓小平的冲突从而让毛认为江青等人并不能够理解自己的战略安排－要和邓搞好关系，且此时的毛泽东不想再掀起什么「腥风血雨」。「风庆轮」对于王洪文造成的影响最大。在毛看来王洪文不能够承担大任，对王洪文的「圣眷隆恩」不再。虽然王洪文继续和周恩来连手准备四届人大，但是王洪文从此开始走下坡路，而邓小平却一路升迁。这就是江青所始料不及的事情。因此，毛泽东在见王洪文的时候，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王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提醒王要注意江青。

１０月２０日，邓小平赶赴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邓小平离开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是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将他的意见带回北京：「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的身体还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毛泽东对于总参谋长人选的谈话，揭开了另一个话题，关于四届人大人事的安排。

三、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中并无两条路线的斗争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在长沙的毛泽东听取王海容、唐闻生的反映后，对江青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让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

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自王海容、唐闻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到１２月２２日由周恩来和与王洪文联名将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之前，周恩来同王洪文一共谈话１４次，包括4次此单独谈话。显然不是《毛泽东传》作者所言的「受到毛泽东批评的王洪文，这时已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对于官史中所做的一些写作手法笔者认为需要点明。例如《毛泽东传》中写道「这一年，是建国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放焰火、举办大型国庆招待会等。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报送毛泽东，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四十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显然对此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大加赞扬，但是谁主持写撰的呢？则用笼统的中央政治局，是明显的掩饰其中王洪文所起的作用。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9月２８日晚阅王洪文送来的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提议增加齐燕铭。周恩来又在次日就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致信王洪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在爱国人士中增加起义四将领夫人等。由此亦可以看出在无论是王洪文还是周恩来都是执行当时「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的政策方针。

在周恩来同王洪文等协同各方的意见后，由周恩来同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关于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对于准备过程的几个问题，将会在下面一一阐述。

１．关于总参谋长人选的争论

许多著作引用《周恩来年谱》上江青在１０月6日向周恩来提出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周恩来未表态一事来说明「召开四届人大是他们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好时机。」且不论当时的中国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毛泽东手里，而江青的这个名单为什么没有曝光呢？如果说这个名单确确实实能证明江青要「攫取国家最高权力」!

江青向周恩来提出的参谋长人选是杨成武。邓小平提出的候选人是陈锡联。　　江青为什么提名杨成武？虽然在１９６８年3月杨成武倒台时候，江青说了些非常过份的话。但是总的来说，江青并非杨成武倒台的关键因素。杨成武之所以倒台是脚踏两条船，且表现飞扬跋扈，得罪不少人。但是江青和杨成武的关系并不一般。例如导致江青倒打一耙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以及处理黑材料一事（见前文），不正说明江青对杨成武的信任么？特别是在杨成武倒台后，总参谋长换成黄永胜，黄与林保持一致，对江敬而远之，江对此极为不满，声称总参谋长选错了。林倒台后，江自然而然想起用杨成武这个投靠过来的军队内的重要人物。所以江青提名杨成武不足为奇。

周恩来并没有提出任何人选。如果把这两个人，陈锡联和杨成武，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则会发现这都是投「毛之所好」。

邓小平提名陈锡联一点都不忌讳毛一再强调的山头问题，只能说明这是投毛之所好。自陈锡联出任北京军区司令一职后，仕途一帆风顺，在１９７６年达到顶峰。而江青提名杨成武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这在周恩来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给毛的信中说得非常明白：我极端支

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　毛选邓则化解了江和邓提名上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符合毛现在的平衡原则。

由此笔者认为，高文谦先生的说法：「江青知道与沉潜内敛的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为人刚愎倔强，说一不二，以后更难相处。自邓复出后，两人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像在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上，两人的提名就不一样，相持不下。为此，江青决定先下手为强，寻机大闹一场，即便闹不出名堂来，也要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这就是后来闹出『风庆轮事件』的由来。」　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杨成武被毛看中，对比同一时期的罗瑞卿则看出明显的不同。邓小平对于整肃罗瑞卿表示出一定的保留意见，而杨成武在整肃罗瑞卿一事上是立下汗马功劳的。　杨成武在一定程度上是牵制邓小平的一个棋子，也体现出毛对邓的信任度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或许是吸取了林彪事件的教训。

而陈锡联则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副总理，预示着进一步的高升。

２．文化部、教育部部长人选的争论

根据《周恩来年谱》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１日的记载：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些让步。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力提出候选人名单，难道江青等人的提名就是夺权？

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主持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１日政治局会议，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第二方案，并送叶剑英、邓小平及江青、张春桥等阅。

张春桥在１１月２０日就被毛任命为第二副总理（只仅次于邓之后）。而主管文化和教育恰恰是张春桥的分工。尽管江青在１个月以前写信给毛表达自己的意见，提议迟群为教育部长。但是在１２月２１日，江青等人并没有针对教育部长一职提出任何候选人。相反，在１２月毛周会面的时候，周是带着未定意见向毛泽东提出是迟群还是周荣鑫为教育部长。毛泽东否定了迟群。　周荣鑫在１９５８任过浙江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而且以「土八路」的身份开了一门专讲建筑学的课。周荣鑫在浙大的表现让毛觉得满意：教育战线要多派周荣鑫这样的干部！因此，当周提出两个候选人的时候，是毛决定了周荣鑫为教育部长！

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文化部不比教育部更重要。根据《周恩来年谱》，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０日，周恩来主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设立国务院文化组问题，周恩来提议吴

德为组长，刘贤权为副组长，石少华等七人为组员。当四届人大来临，周恩来询问江青、张春桥关于文化部部长人选意见的时候，江、张提议吴德而非于会泳！

吴德回忆：「四届人大召开前，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份，周总理就分别找一些人谈人事安排，当时是三四个人为一批，周总理分批谈话。周总理在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让我去任部长。我知道后对周总理说我不行。我提出我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我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记得张春桥、江青坚持让我任文化部部长，他们说：就得你来搞。为此，倪志福曾和张春桥发生了争吵。倪志福说：北京市的工作吴德同志还管不过来，他不能兼任兼管那么多别的事情。张春桥说倪志福是本位主义。总理提出我做市委书记不兼革委会主任，主任要倪志福来搞。倪志福不干。张春桥提出别的书记是否也不兼主任了？这就牵扯到上海兼主任的问题。总理没有再提。

……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我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这个提议大概是「四人帮」商量后确定的。……以后，在一次征求人事安排的谈话中，周总理对我说，让我到人大去。周总理说：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让华国锋去，华国锋也不干；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我不任文化部部长，就讨论由谁任文化部部长。我提出文化部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我具体提名上海的一个著名教授刘大杰。江青他们不同意，他们提出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周总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

在吴德坚决推辞的情况下，此时的于会泳是吴德的副手，而且自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以来，于就在周领导下工作，为文化组组员之一。另有材料说虽然吴德推荐刘大杰，但是在吴德拒绝出任之后，是周恩来提议于会泳为部长，而这导致了江的极度不满，并拒绝向于会泳祝贺。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于会泳出任文化部部长是各方都接受的，所谓「四人帮」的设法将其亲信安插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３．「四人帮」有利用四届人大组阁阴谋吗？

周恩来自得知主持四届人大的决定后，随即连日在医院里约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找人谈话，部署落实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整个四届人大组阁都是由周恩来一手操作。

其中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周在安排老干部方面远远跟不上安排中年人和依靠造反起家的新人。周在１１月份给毛写信，表示关键在于中青干部－－实则为造反年轻人的提拔，并且支持他们在政府中任职置。在高文谦先生所著《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信的全文。在１２月份，周恩来又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但是根据《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所提，此信也包括增加「红卫兵」（即造反派）代表，并且周恩来对其类建议增补的代表名额都提出了具体数字，唯独对老干部的增选名额不提出具体数字，建议由政治局「考虑斟酌后加以决定」。

在这次提名中，周恩来提议同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周还特意提拔了一些同毛没有私人关系的人，如祝家耀、邓岗、于会泳等以避嫌。周还催促张春桥和王洪文推荐祝家耀为公安部副部长。周恩来还推荐于会泳出任文化部的部长一职。　周恩来还批评上海方面送来的人还不够！　来自上海金祖敏被周恩来安排为人大常委候选人。

周恩来同陈永贵谈话，要求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以文化水平不行推辞。周恩来用当年劝陈伯达的话来劝陈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你是个农民代表。」

周恩来从长沙回京后又提出增加董加耕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理由是上海、北京、东北都有人选了、西北也应有个年青人。但董是反许世友一派，因此周恩来最后没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让他作了人大常委。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周恩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根据会议讨论酝酿情况，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第二方案，并送叶剑英、邓小平及江青、张春桥等阅。审阅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名单第一方案，增加陈云、韦国清为副委员长。

其中大方案（第一方案）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多一些，包括一批老革命和各方面知名的代表人物，国务院安排的是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小方案是如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不宜过多(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１８人)，则将几位老革命安排作国务院顾问。周恩来同时提出对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设想国务院设顾问等想法。以及他们是作国务院顾问还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需请示毛主席决定。方案还列有：叶剑英兼国防部长，余秋里兼计委主任，谷牧兼建委主任，华国锋兼公安部长，乔冠华兼外交部长，方毅兼外经部长等。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表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赞成大方案，即副委员长人数可以多一些。这样原方案列为国务院顾问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几位老同志均明确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在讲到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赞成吴德主持人大常务工作。毛不同意谢静宜列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他说：「副委员长，小谢不能放，人家对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说：「小谢，官越作越大，搞共青团书记可以，当副委员长就不适当了。」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２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陈锡联、倪志福、吴桂贤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２１日所拟两个方案名单。经过协商，又拟出两项名单的第三方案。会后，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同日，与王洪文联名将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

在听取周恩来汇报时，在讲到乔冠华、方毅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说：「要保护乔(冠华)、方(毅)、谢(静宜)，但不要放。」最后这三个人都没有当上副总理。讲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还曾问：「吴桂贤多大年纪?」

关于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在周总理去长沙时尚未有定论。周恩来向毛汇报时提出了三个方案——肖华、苏振华、廖汉生，还提出可否调冼恒汉?对此，毛都没有表态。最后，毛再三考虑决定让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并说，张春桥有才干。

另外，毛在听取汇报时还毛还提出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开二中全会，并说：邓(小平)换李

(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来，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

因此笔者认为：文革中是否存在周、江两个阵营的对垒？根本就不存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过程充分表明，周、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相当一致，都是在毛的旨意下行事，所不同点在于采取何种形式予以完成。周江在所有重大的根本问题上没有重大冲突，相反，双方的配合相当良好。

笔者还有理由认为中共官方所谓叶、周拼了老命要找毛汇报，防止江青等人利用四届人大篡党夺权是一个谎言。编造这个谎言的目的是为了是另一个谎言能够自圆其说，那就是周恩来和江青各自拟定的名单有巨大的差别。历史的真实是在毛授意下，让他们商量名单然后来汇报。

而从邓小平的任命到长沙告状，恰恰反应了这样一个事实：包括王洪文在内的一批人对邓小平的崛起并不抱有好感，更是难以达成在一个战壕里战斗。王洪文说：

小平任命的事，我最想不通，我记得初时邓出来工作时，我就思想不通，他是第二号走资派，我看到的，听到的都讲邓不好，特别是听了几位原先同邓共事的老同志的话，使我更不信邓小平了。

这样同毛泽东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由此毛泽东期望邓、江、王等人合作一致对外（周）的设想注定落空，也注定了当毛泽东重用邓的时候，王洪文会失势的结局。

４．关于两个史实的说明

第一：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字数问题

不少著作引用毛毛的说法：毛泽东让邓小平起草一个短小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因为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健康问题。实则不然，尽管张玉凤在１０月４日给王洪文的指示中就指明政府工作报告有３千字就够了，而实际上报告仍然达到了５千多字。　而张春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字数更少，只有３４００字左右，比周恩来的报告还少１６００字。

第二：邓颖超的提名

周恩来在准备四届人大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周恩来让孙中范把其所有的亲笔原件都销毁。

孙中范回忆说：「纪登奎听了郭玉峰和我的汇报后说：看来要考虑调整全国妇联的主要领导人。郭玉峰当场建议请邓（颖超）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纪登奎当即表示同意，但他说这要同总理商量后再作决定。后来纪登奎传达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坚决不同意邓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人选要再考虑。纪登奎也曾向中央建议由蔡畅、邓颖超担任名誉主席，康克清任主席，周总理还是不同意。（后来周恩来汇报时）在讲到邓颖超、蔡畅的安排时，毛主席同意邓颖超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周总理坚持邓颖超不要当副委员长时，毛主席没有再坚持。因此只安排蔡畅做副委员长。」

对周恩来素有研究的秦九凤则说：四届人大之初，中央政治局就有安排邓颖超为副委员长的建议，这一建议并且为毛泽东生前亲笔批准。

无论如何，如果周恩来执意不肯的话，邓颖超绝对就不应该出现在提交给毛的方案名单上。周恩来此举是借毛对此事的态度来揣测毛，打狗还要看主人，人事安排不也是如此么？周恩来对王洪文等人的悉心培养、对江青等人的态度不也是这般道理么？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邓颖超的资格足够当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在文革后也曾经对自己在建国后一直没有得到升迁而恼火。即使没有处在高位，邓颖超在政治上也是十分投机的。有一次周恩来指示新华社和对外文化联络部举办一次「我国领导人出访国新闻图片展览」。邓颖超对杜修贤说：「老杜，选图片时，记住多选一些外国人举毛主席像的场面。」　周恩来得病后，有人向邓颖超问候。邓颖超回答：「你讲的不对（指总理的健康关系到人民的幸福），总理一再说过，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才是全国人民的幸福。」　邓颖超就是一个「小」周恩来，也有人说周恩来是邓颖超「调教」出来的。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邓颖超邀请朱旦华上庐山，并帮助邓颖超整理了一份反应大跃进的材料。但是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国反右倾。邓颖超竟然把此材料转交给了全国妇联。全国妇联以此批判了朱旦华。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邓颖超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邓颖超还争功似地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在该组，由邓颖超牵头集体通过了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意见。邓颖超说：「对设国家主席，我们都发言了。现在我们再用全组通过的办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小组对设国家主席的态度就更加鲜明了。」　「林彪事件」之后，在１９７２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邓颖超又对江青做出了极其不合实情的发言。邓颖超说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读了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江青致唐纳的公开信，认为江青是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搜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红材料』，等等。」就是文革后，邓颖超又根据形势的变化，一度对林豆豆许诺。但是形势再变之后，邓颖超就再也不再理会林豆豆了。

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关系，有其融洽的一面，也有另一面。知情人透露邓颖超曾经在延安因为搭竹竿晾衣服大骂警卫员。知情人也透露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摩擦不断，并曾经打架，邓向周扔碗，有次还导致周恩来脸都被邓颖超抓破。知情人还透露，周恩来和服务于中南海的文工团的团员跳舞之后，邓颖超曾经握住此团员的手问到：周恩来对你没做什么吧。张佐良则说：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年底被批期间，周恩来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

但是邓颖超和周恩来毕竟在政治上是连体的。薛明在「林彪事件」之后回到京城，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去看望。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被迫害惨死的材料在北京政治圈中广为流传，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知情人又都知道此事周恩来是要负主要责任的，邓颖超就颇有些难堪，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你写的那个报告，要是恩来看了，他会哭死的。　文革刚结束时，一批老干部要求清算毛泽东的错误，但是又同时树立起伟大的周恩来形象。其实抬高周恩来是假，想否定毛泽东是真。对此，邓颖超不无担心。因为邓颖超知道，在高度个人

集权和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周恩来不可能「洁身自好」、「光明磊落」。「毛荣周则荣，毛损周则损。」而邓和周的关系，则是夫贵妻荣么。邓颖超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么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　　基于同样道理，邓颖超还对一些老干部的复出持否定态度。邓颖超担心周恩来的声誉被毁。邓小平复出后，有人提议邓颖超进政治局。对此，邓小平说你知道邓颖超是什么样的人么？邓颖超如果进了政治局大家还有办法工作么？　　当局势发生变化，中央对于周恩来的评价过份扭曲后，邓颖超又认为在《历史决议》中写上毛在「文革」中保护了中央和地方一批领导干部，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这样写不够实事求是，反而会引起反感。

５．关于江青、张春桥叛徒问题

毛毛回忆：１９７３年4月9日，邓小平和其夫人卓琳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向邓小平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但是毛毛的回忆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依据周的小心翼翼的特点，特别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存在，周怎么可能提起如此敏感话题？其次是邓此时刚刚复出，和周的交往甚少，周同邓谈此事更是不可能。实际上考虑到毛毛写的另一次亲自陪同邓小平去看康生的情况，则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毛毛把两次事情搞混了。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３日毛周会面，周恩来又对毛谈起此问题。这也是不可以信的。根据《周恩来年谱》，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周恩来年谱》并没有告诉读者是周还是毛先提起，仅是提及「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但是很多著作言之确凿的说是周主动向毛提起。

同样根据《周恩来年谱》，毛不仅任命了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而且向周夸奖了张，说张有才干，要周向政治局传达。周还传达了「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这些都证明毛对张的重视。其实就是周恩来本人，对张春桥也是非常欣赏。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周恩来向中央文革提出，他身边缺少助手，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要求给他派个秘书，并点名要张春桥去。

陈永贵在１９６８年承认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当有人质疑陈永贵没有资格做为「九大」代表时，是周恩来根据毛的意思把此事压下。谢振华说他写了向上反映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被发现以后，于１９６８年9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六十九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遵照周总理指示，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或许过了几年之后，此事已经淡漠，周恩来提名陈永贵为副总理！　　因此，鉴于以上几点，在周明确知道毛对张的看法，周如何能向毛主动谈起此事？但是陈永贵和张春桥之间出现矛盾时，周恩来却站在张春桥这边。　　由此可以看出张春桥的份量。

根据张佐良的回忆，当时毛周会面很长时间后，准备去接周，曾经偷听到周对毛泽东的秘书说：「康生这个人，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刚才主席也说了……。」　联系到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康希望周能就此事同他联名上书，周恩来拒绝了康生的要求，笔者认为实际情况有可能是：毛根据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有人提出此事，特别是张春桥的问题，早在「九大」之后不久，林彪就把此类材料报告给毛。（笔者采访原空军情报部有关人员得知）毛因此需要向周说明此情况，而周向毛的秘书解释，把此事说成是康生「极左」的结果，实际上是为张春桥和江青辩解！周恩来和康生的关系本来是相当融洽的，不仅仅体现在周恩来对康生晚年得病之后的关心与探望。周恩来有次在洛阳龙门参观，看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周恩来当下对随同人员讲：「康老很喜欢书法，可以给康老买一套带回去。」周恩来为此专门询问周围的人是否带够了钱。　康生在临死之前的最后一搏，仍然是见了周恩来一面，据说仍然是为了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张是毛的红人，是文革的标志之一，林彪想打倒张都办不到，以至于在庐山在拉大跟头。九届二中全会后风向转变之后，周恩来竟然递条子给林彪，要求林彪表扬一下张春桥，结果林彪对周恩来的提议置之不理！　张春桥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身兼两职，既在七人「批林批孔」领导小组也在六人军委小组，红的发紫，以周的为人善于揣摸毛的心思，怎么可能会在此时向毛提及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以江青和毛的关系，周恩来更是不可能提及了。

四、１９７５年中国的政治舞台

毛泽东提出四届人大之后，让周交班，要周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全面掌管。

１９７５年1月8日－１０日，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复出两年之后的邓小平终于通过了毛泽东漫长的考察，最终获得了实权。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１３日至１７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正式成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有全体副总理出席和叶剑英、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分工。周恩来顺势说到：「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之后，邓小平实际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１９７５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邓小平。

从１９７４年8月至１９７５年1月，毛泽东四次指示要安定、团结。说明这时毛泽东已经从思想上到行动上认识和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期「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教训，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整顿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指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决策是正确的。

然而「你不管它，它要管你」的无产阶级政治却无时不在干扰「整顿」。

１９７５年2月１８日，中央政治局下发了中发【５】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此通知的重点是突出在引用了毛自己的话:「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由此也可以看出张春桥的「才干」在毛的眼里是如此的重要，也由此注定了一旦邓与张等人发生冲突，毛泽东最终必然会选择能给代表自己意识形态的张春桥等人。

１９７５年3月1日，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经过毛泽东批准，在《红旗》杂志第３期上发表。随后，《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姚文元的文章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至关重要，也论及了毛泽东的担忧－在物质刺激的激励下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号召那集体所有制推向更高层次，并且进一步推向全面所有制，警告中国仍然有沦为修正主义的危险。除此之外，姚文元还加了一段至关重要的话：「１９５９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这个意见。」毛泽东在反经验主义上是否在此之前有过表态，笔者尚未发现可靠证据。

在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说：「在延安整风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张春桥要要求把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当作纲，联系我们军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是发表了和张、姚两人相同的看法：「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会后，江青又连夜让其秘书打电话给「梁效」写作小组，解释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它是大敌，是修正主义的帮凶，使我们必须打倒的大敌。」

４月７日，《解放日报》发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垦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的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麦克法奎尔对此评论道：邓小平主持会议时以目标为导向的生硬风格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

同传统的认识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张春桥等人的矛头是主要是针对邓小平而非周恩来。重新获得毛泽东信任的邓小平是张春桥等在权力竞争方面的对手，而非周恩来。这可以从江青的讲话中得到明证。

江青曾经对于理论学习挖苦到：「不要告诉别人是我说的，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相比之下，政治局是最差的，他们只学了３条，然后就停下来了。有时候政治局没法开会，一开会总有争吵。」　此时周恩来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矛头非常明显的是指向邓。

４月１８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之后，向毛泽东反映自三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邓的观点得到毛的赞同。２３日，毛泽东在姚文元所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

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批示还要求将「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４月２７日，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根据毛的讲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人提出批评。会后，王洪文以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为名致信毛泽东：说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　笔者认为，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并没有想到会造成如此大的「分裂」。一个是邓小平对于江青等人的态度过于严厉，其次是对江青等人把邓、周放在一起的做法不满。毛泽东觉得有必要亲自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双方不要搞派性影响团结，二告诉江青等邓小平和周恩来不一样，邓小平是毛派。

５月３日，毛泽东在其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青等人。官方对于这一段的说法是「严厉的警告」。　笔者认为，毛确实批评了江青等人，指责江青等本人就是「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但是「严厉的警告」则是远远谈不上。就在毛讲话的时候，江青还插了话。江青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答道「嗯。」　亦有材料说江青在中间是多次插话。

至于官方大力宣扬的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一事（指官方宣称恰恰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在笔者看来是对江青等人友好的提醒。在１９７５年的毛泽东最担心的莫过于是「派性」问题－即影响邓和江青等人的合作的最大障碍。毛泽东从三月份就在提出要消除派性：「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　毛对左、中、右各种派性都要敲打，不仅仅是「四人帮」。毛泽东明白，只有邓小平与江青等人的团结一致才能完成文革大计－既可以保证文革的意识形态，又可以治理好国家。毛对此显然非常自信，这也是毛泽东在５月３日当众再次提及「邓是毛派」的的缘因。

经过点拨的邓小平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5月２７日的会议记录完整的体现了这一点。会议记录说：「不搞掉派性不行。春桥那个分析，现在的派性同过去不同，我始终赞成。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不是什么人挑起的。我是相信毛主席的话。在不在四人帮，都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叶剑英在随后的６月３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派性问题做而来详细的阐述，赞同邓的观点。简而言之，邓和叶都没有利用毛的批评来攻击「四人帮」。　而官方的一致的宣传是邓小平、叶剑英等集中的、严厉的批评了江青等人，甚至是会议还没有开始便是两军对垒、针线分明。　这显然难以解释如下问题。

毛对于５月２７日和６月３日会议的评价是「有成绩」。　同时毛泽东还不忘提醒邓小平江青等人是有功劳的。

毛对于邓的表现是完全满意的。而且毛泽东特意让邓小平主持这两次政治局会议，大有特意观察之意。１９７５年6月下旬，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一段时间。行前，他向毛泽东提议，在他离开北京期间，政治局会议由叶剑英或邓小平主持。7月１日　凌晨二时，叶剑英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持人选，致信毛泽东：「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　这是对邓小平表现的最大回报。邓的表现完全向毛显示：他是可以和江青等人合作共事的。逮捕四人帮后，叶剑英后

来证实到：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研究过要团结他们，结果还是团结不拢。　　团结不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青等人。江青等人把邓小平视为掌握权力的障碍，丝毫没有领会毛的政治安排。

周恩来是在４月中旬开始关注「反经验主义」。但是直到毛泽东在５月３日表态之后才开始要求秘书准备将前一时期各报刊上批判经验主义的情况，综合成一材料，连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到的《哲学小辞典》一起送阅。　　周恩来在４、５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对于毛泽东指出的江青等人的「这次错误」，表示「拥护主席意见」。「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　　周恩来在和稀泥。为此，周恩来依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　　：关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手续问题，强调：政治局工作「必须遵守九大、十大方针路线，『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团结为好」。「凡要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谈一谈。各单位拟好文件的，除外交、国防事急需立即传阅送批外，其它总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阅待议。政治局同志有意见（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讨论的，请先向主持人在两三天前提出。个人除自己管辖的单位外，其它需下达的事，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个人交换意见，不能以个人或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气来信和通电。」周恩来指望分歧在政治局内部消化。

在５月下旬，周恩来和张春桥发生了关于「三月一日张春桥在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否确切的问题上的争论。笔者认为这恰恰正如周恩来所言：「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张春桥也就不再争辩，回信到：「不再改了。」　　就在此信中，张春桥还对周恩来的健康表示了极度的关心。　　知情人讲述，张春桥对于病重的周恩来非常关心，几次周的大手术张春桥都在场，而且在９月２０日的最后一次大手术之时，周恩来不仅表扬了邓小平，同时也表扬了张春桥。张春桥在和陈永贵发生了冲突之后，周恩来也是站在张春桥这一边。

６月２８日，江青做出检讨，主旨是自己的「派性」非常严重甚至到了有可能分裂「党中央」的地步，并表态感谢政治局对其的批评和帮助。张春桥则说：「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要坚决照办，并尽可能的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周恩来率先表态肯定了江青的检讨：「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

高文谦透露：周还特意把一些政治局委员找到医院来，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适可而止，不要计较江青的态度，注意团结她一道工作。

秋石客先生说：据知情人讲，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一些老干部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站在他们一边，采取一些行动。……(但是)总理不但没有支持他们，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要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知情人讲，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人，却大做文章，抓住不放，

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知情人分析，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不希望他们再犯错误。

吴德回忆，在４月２７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双方因为要不要下发毛在姚文元请示上的批示上发生了争执。张春桥提议，毛主席的批示在其它文件上顺便提一下就可以了。张说完此话之后，双方陷入了僵持。此时吴德发言说毛主席的批示应该下发，并说反经验主义就是反对老干部。此日，周恩来就找吴德谈话，劝吴德以和为贵，团结要紧。周恩来还对吴德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之后，吴德就不再怎么发言了。　　当毛泽最后一次考验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拒绝后，周恩来在见到邓小平后批评邓小平「你就不能忍一忍?」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在反经验主义时的真实态度：周恩来不可能对江青或者张春桥等人提出正面的批评。周恩来做的更多的是「调和」的工作。对于周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一贯理解。在笔者看来，周恩来是党内真正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真正懂得毛泽东需要什么，要干什么的唯一高级干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３日，毛泽东在回答为其「读书」的北京大学讲师芦荻关于「水浒」时说发表评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进而得出结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则说：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在武汉就说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正如笔者在第二章所论述到的，那个时候毛泽东不正是想先打倒周恩来么？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水浒》的评价是早就有所指的。而１９７５年这次，只是更加露骨而已。显然毛泽东这番话不是泛泛而谈，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寄希望江青等人能和邓小平团结合作，希望能给消除派性。但是反「经验主义」暴露了江青等人对于邓小平是不满的，原因无非还是权力之争。虽然江青做了检讨，又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去访问了邓小平的家，但是这并没有消除甚至是减缓双方的关系。　　毛泽东有理由担忧自己去世之后中央会发生斗争甚至分裂，进而会出现修正主义－即有人会「鞭尸」，也就是毛泽东此时所言－否定文革即是投降、招安了。因此，当芦荻提及水浒时，毛泽东也就有感而发，实为心中早有戚戚焉。

芦荻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十分重要，对重视研究占典文学著作有价值。谈话之后，芦荻把毛泽东的谈话一句句整理出来，交给张玉凤送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同意。由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中有这样一个内容：要出版二种版本的《水浒》，因此，毛泽东把这份记录稿交给江东兴，要江东兴交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８月１４日，记录稿交给了姚文元。姚文元于当天便致信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作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并提出应把毛泽东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宣传、出版单位。毛泽东于１８日对姚文元的请示批示「同意」。

８月１７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组织讨论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谈话，还订出了一个宣传规划，于８月１０日送毛泽东处，清毛泽东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红旗》杂志１９７５年第９期发表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９月４日，这篇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见报。这些文章的关键之处在于：明确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卞席关

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浒》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其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９月７日，周恩来在会见最后一批外宾时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但是怀有深厚「伍豪事件」情结的周恩来还是坐不住了。９月１５日，周恩来在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开展对《水浒》评论一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据说，周恩来还讲：「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还有一次，周恩来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要去见毛主席，我有文件证明，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汪东兴后来说，文件没有找到。

周恩来对此太过于敏感了。江青等人的目的还是想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邓小平。张玉凤说：主席评《水浒》，根本没有影射小平同志。　９月１２日，国务院在山西大寨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部长、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与会。在会议上，江青针对「评水浒」发表讲话：「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宋朝，最著名的是方腊，洞庭湖的杨么。方腊是在浙江。还是全国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独独是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　江青在大寨还私下与其亲信大谈毛泽东评《水浒》就是批邓小平，邓小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就是防止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早在８月下旬，江青就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９月１７日，江青召集「梁效」等写作班子和电影、新闻界１００多人讲话，说：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在场的新闻记者把江青讲话要点发回北京后，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向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吴冷西做了汇报。吴冷西同胡乔木商讨后，决定向邓当面汇报。邓小平对此反应十分强烈，指示：「这个讲话要立即呈送毛泽东。」并且特别强调要想办法用别的途径尽快送上去。吴冷西和胡乔木于是找到能给经常接近毛的唐闻生，由唐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交毛。９月２１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唐闻生借机把江青讲话稿面呈毛泽东。

然而这一时期，邓小平从来就不正面谈论评《水浒》问题，也不公开讲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江青在要求邓小平在全党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邓小平便对她讲，要清示主席。江青又去华国锋那里一再提要求，华国锋也说，要请示主席。９月２４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时，谈到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及江青会后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

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不久，华国锋在一次向毛泽东清示汇报工作时，也向毛泽东谈到了江青要求在全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讲稿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江青这种做法恰好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毛泽东做出如此表示在情理之中。

到了９月下旬，形势突然逆转，毛泽东又开始对邓小平不满，以至于发展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直到再次把邓小平拉下马。

五、生命的终结

１９７５年9月２０日下午２时，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让工作人将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取来。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拼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１０月２４日，周恩来做了第五次大手术，这次手术之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周恩来时日无多了。

１２月２０日，周恩来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并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邓颖超回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周恩来能说什么呢？因为此时伴随着周恩来的是在临终前的恐惧。

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对陈伯达高调赞誉。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各院校七千余名师生员工时讲：「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林彪同志领导下的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在６６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陈伯达更是不吝言辞：「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把主席思想融会贯通，……。」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整肃陈伯达后，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分为四个部分：（１）「陈伯达的反动历史」；（２）「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３）「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４）「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这四部分内容是党内政治整肃人的典型材料模式，周恩来作为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对此是十分擅长的，也是十分了解是怎么出炉的。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发动《评水浒》的矛头是对准自己的。阶级斗争是无情的，一旦毛泽东把周恩来送入政治地狱，打翻在地，上述陈伯达的名字完全可以换成周恩来。周恩来对毛的这套整人术非常的清楚和了解，周配合毛整

肃他人也是这么做的。周恩来长期助纣为虐的结果最终会演变为为虎作伥，这是历史的必然。临终前的周恩来就是被这种恐惧深深的笼罩。

当周恩来在接受乔冠华请求与大家合影留念时，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此时的周恩来想到了什么？那些被「打叉叉」的人真的都是「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该被「打叉叉」吗？。周恩来在手术前，大声喊自己不是投降派，这又是怕的什么？这只能说明周最怕的是身败名裂。

周恩来还寄希望于邓小平。据高振普回忆，在１９７５年８月份的一天，周恩亲自向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在信中虽没有写上要邓小平同志任党内「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周恩来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　此时的邓小平已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恐惧的周恩来只能对毛泽东臣服到底。１９７６年元旦前夕，邓颖超给周恩来带来本刚出版的《诗刊》杂志，其中发表了毛泽东十年前所写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年后的头两天，周恩来在清醒的时候，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两首词念给他听。他除了悉心静听外，偶尔还说上一两句话，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了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此时的周恩来或许还期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样的死心塌地的表忠会换来毛会出席他的葬礼。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去世。９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出讣告，称「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终于保住了「晚节」，没有被「打叉叉」。

六、余波

周恩来的追悼会于１月１５日举行。此前，１月１０日、１１日是向遗体告别，１２日、１３日、１４日是吊唁仪式。毛泽东没有在任何场合露面，这使得那些热爱周恩来的人十分失望。为此中共官方的党史专家们费尽心机要想证明毛泽东没有出席悼念周恩来的任何活动都是出于健康的原因，是因为「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然而事实的另一面却尴尬地使他们的努力成为徒劳。

笔者承认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病入膏肓，「无力行动」，　毛的体力已经不允许他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但是，毛如果想要向世人表示对周的哀悼和惋惜、表示对周的看重，方法是多得很：毛可以发出赞扬周恩来的「最高指示」，赞扬的级别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毛没有这样做；毛也可以指派江青或者毛远新作为个人代表，在周的遗体告别仪式或追悼会上表示他个人的哀悼，毛也没有这样做（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还可以抬高江青或毛远新，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毛还可以把邓颖超叫到中南海自己的住处表示抚慰，毛还

是没有这样做；毛甚至可以指示媒体渲染自己对周的无产阶级感情和痛悼之意，毛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还不许别人这样做。特别是关于在中南海放鞭炮一事，朱德的秘书说：据一个同志说，周总理逝世时，他在自己的住处看身边的人放鞭炮，真是令人感到惊讶。

对于一个以外交著名于世的政治家，毛竟然决定「按照我国惯例和礼宾改革，决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来华参加吊唁活动。」

毛不是不能做这些表示，毛是不肯做这些表示。

毛泽东对周恩来去世的冷漠态度不能不使那些拥毛又拥周的人感到万分遗憾，置他们于尴尬之地。时至今日，仍然使那些千方百计粉饰毛、周关系的人辛苦徒劳。同时，毛的这种态度也使那些拥周而不满毛的人产生出愤怒。

笔者则认为，毛这样做是有意的。毛恰恰是要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周的不满，要以这种方式划出自己和周的界线、表明自己和这个做了多年总管家的周恩来并不是亲密战友、并不志同道合。

然而，毛这样做却使那些对他不满、对十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不满、尤其是对当时正在展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不满的人找到了发泄的渠道。他们尽自己一切力量来抬高周、悼念周，以各种手段来表达和宣泄自己的冤屈和义愤。甚而至于指桑骂槐，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桑树来痛骂。于是就有了「十里长街送总理」、１９７６年的「四五事件」、以至于粉碎「四人帮」，以至于造成了知道今天周恩来仍然是中国大陆甚至世界上部分群众的道德楷模。

第二部分

第一章 周恩来在对毛的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

自延安整风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仅有刘少奇、彭真、林彪等人，还有周恩来。相对于其它人，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有很大的责任，也有他的特色。但因为他一向严格控制着不让自己在宣传上显得突出，因此人们对他这方面的问题或是缺乏了解，或是未予重视。

一、周恩来在大搞个人崇拜中的首创性

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周恩来常常是走在别的领导人前面的。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开始，周恩来就在许多份致中央的电报中，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

在称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前面加以突出。在笔者所见数据中，周恩来是最早这样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这种做法完全颠倒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使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一般人只知道林彪在六十年代对毛泽东的吹捧，却不了解周恩来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

１９４３年4月２２日，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就说：「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　这年8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就最先提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他说：「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手中！」

在说到中共三年来的成就时，周恩来说：「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他强调：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在随后的中共「七大」上，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中共能够「锻炼成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很有能力的共产党」，「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在这次讲话的最后，周恩来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

周恩来这个讲话中有关「毛泽东领导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的说法并不是事实，在篡改历史方面也是走在其它人前面的。

１９４９年5月７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主题之一就是「学习毛泽东」，这是最早公开号召全国学习毛泽东的记录。周恩来声称：「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

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毛主席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的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在中国革命三十年的许多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这是在中共还未执政、还在反对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权之时就向全国青年介绍、宣传并倡导学习自己这一个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最早、最系统、最权威的讲话。

１９４９年7月6日，周恩来再一次提出：「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因而造成了伟大力量，战胜了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在１９５８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又对毛泽东进行了肉麻的吹捧：「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作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的这段长期遭到诟病的讲话：「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两相对照，就可以看出，林彪讲话的这些意思，周恩来早已在四年前的讲话中说过了。

不同的只是：

一、周恩来更极端，他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而林彪在那段话前面说的是：「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

二、周恩来用了贬损自己的说法（「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来反衬毛泽东的伟大。而这正是周恩来与众不同的一大特色。

三、周恩来的讲话比林彪的讲话更早，实际上对林彪及其它领导人后来的表态起到了引导、启发、示范的作用。

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也照样讲了与林彪相类似的话，他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这个讲话在官方编纂的《周恩来选集》中是没有的。

我们再来看看人们所熟知的林彪讲话：「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林彪在１９６６年提出的。然而早在１９６２年，周恩来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１９６２年2月１３日至3月２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周恩来在２月２５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在３于２日，周恩来对此问题还特意强调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周恩来说：马列主义在斯大林后期停滞了，但在中国革命中找到了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发展的，而毛泽东同志则是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又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有他的历史条件的，有他的发展背景的。

根据最新的资料表明：周恩来早在１９６０年１０月以前就已经说过：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９６６年7月２６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然而，周恩来在此前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曾宣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同时，据王力的回忆可以推断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周恩来主持搞的。　　《公报》中就明确宣布：「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年９月２６日，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说的很对，毛主席是列宁以后的二十世纪最伟大天才。」到１１月份，在周恩来的眼里，毛泽东远胜斯大林。周恩来说：「世界上只有列宁，毛主席这样的天才。这样的领袖不多见，斯大林问题不少，当然功大于过，三七开。」

周恩来在８月份的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来，发挥起来，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此类语言，在周恩来的文革讲话中不胜枚举。

林彪号召全军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提倡「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而周恩来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就曾把《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送给工作人员，作为解决三门峡工程问题的工具。

过去在批判林彪时，曾批判林彪说过的这句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都认为这个说法是林彪的发明，然而实际情况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在１９６６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稿中。当时值班的《解放军报》副总编冯征回忆说：这样的评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于是冯征亲往林彪驻地苏州打电话求证。结果却被告知，「一句顶一万句」是林讲的，「句句是真理」是另一位领导讲的。　据笔者多方了解，这「另一位领导」就是周恩来。

在批判林彪时，还常常说他篡改历史，比如把自己吹嘘成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把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等等。其实，这些篡改历史的做法，都不是林彪自己所为，而究其根源，却能发现周恩来在其中的独特作用。

比如，在对南昌起义的历史阐述上：

１９５７年，周恩来在审定《八一起义》展览提纲时，提纲有一段话的原文是：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在「举行起义」前加上了：「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提纲中还有一段话原文为：「七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周恩来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名字。

为「反冒进」作检讨之后，１９５９年，江西省话剧团进京会演《八?一风暴》，周恩来指示：听说戏里写了我，不要写我，要写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八?一起义。

１９６４年，周恩来在指导大歌舞《东方红》时，为了突出秋收起义的气质，指出「南昌起义部队」的旗帜可以不要，改用「中国工农红军」。

到了文革中，周恩来的说法有了更大的变化。当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之一的戴维堤，在写成于２００４年的长篇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１９６７年９月９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４０周年，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９月９日定为建军节。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烂八?一」的口号……

在混乱中，应邀出席大会的周恩来讲了话。按戴维堤的说法：「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

周恩来说的是：「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

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

戴维堤回忆：「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

至于说将「朱、毛井冈山会师」篡改为「毛、林井冈山会师」，这也并非林彪所为，而恰恰是周恩来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间说过这样的话。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指出：「『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冈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　这是毛、林井冈山会师说的源头。

在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以歌颂林彪为中心内容的发言时宣称：「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

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系统批判林彪的发言中又说，「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　周恩来这是在批判谁呢？是谁歪曲了历史？

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注重娱乐性与艺术性

在大搞个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种军人作风直来直去要求「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与这种方式不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更注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和潜移默化的艺术性。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亲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导演和经常在公众场合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自「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崇毛的讲话，是对高级干部讲的，一般民众并不知道。而周恩来则在重振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周恩来此时选择被冠名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来赞美毛泽东，是把握住了历史机会，也摸准了毛泽东当时的脉搏。

周恩来作为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堪称呕心沥血，在如何编排上费尽心思。为了突出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义，认为有秋收起义就行了（此举直接影响到文革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起义和改建军节为秋收起义纪念日），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归为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在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８日的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讲：「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

现出来……」

周恩来亲自给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人员做了７个小时的党史报告，讲述毛泽东怎样领导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周恩来要求演员「要把我们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　　有人质疑「党的诞生」部分升挂毛泽东的像不合适，因为毛那时还没有担任党的领袖。周恩来则回答说：「从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周恩来特意在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安排毛泽东接见三千名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演出人员并会演。当天夜里，周恩来提出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继续亲自领导。　　徐肖冰回忆：周恩来指示，在拍摄电影时：「你们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领袖这一点。」

为了把《东方红》电影拍好，周恩来特意要求外贸部从伦敦购买质量好的胶片，当时的外汇还是比较缺乏的。杨明伟先生对此评价道：「这一表态，令从事电影《东方红》工作的编导人员欣喜若狂，他们知道，国家经济情况虽然好转，但是对于进口电影胶片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总理作这样的表态，表示中央对《东方红》的拍摄工作非常之重视。」　　在周恩来的全力督促下，１９６５年国庆节，大型电影艺术性纪录片《东方红》轰轰烈烈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大型歌舞剧《东方红》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对当时的青少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文革中各地红卫兵编演的大歌舞无不打着深深的《东方红》烙印。「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在大歌舞《东方红》中最早由一曲《赞歌》唱出来的。到文革中发展成为「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日常用语。

为配合当时毛泽东向世界输出革命的决策，《东方红》火热上演的同时，其第二部也在策划中。主题定的是支持世界革命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内容计划描写建国之后的建设和生产。一些作品像《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已创作完成。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华时，就看了《椰林怒火》的演出。　　但是后来因为形势变化，不得不中途叫停。

究其本质，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就是一个充满个人崇拜并经艺术谎言刻意包装的向毛泽东表示忠心的产物。中国的文艺本来就是神化领袖的造神文艺，而周恩来更是把这一点推向了极致。

在文革中，在广大群众之间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绝非林彪一人之功。在文革前期，人们最为熟悉的是在众多的群众集会上，都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特别是随着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的上映，周恩来挥舞双臂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形象也在群众中深入人心。而这首歌本来是一首非常普通的歌，歌名原为《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１９６４年6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来宾在哈尔滨访问时，作曲者王双印演唱了此曲。周恩来听后，给予了热情鼓励，并帮助修改词曲，然后正式推向全国。

当年有关周恩来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回忆，曾经充斥了纪念周恩来的文集。在一篇回忆中称：１９６４年，周恩来出访回国返回昆明，总是从外国朋友临别赠送的西瓜、

芒果中挑选最大最好的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工作人员在一起联欢的时候，总理常常站起来，亲自提议，亲自指挥大家齐唱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那宏亮的声音，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激励着大家紧跟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奋勇前进。

据另一回忆：有一次，我们跟随周总理到一所大学，当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一阵阵的欢呼声，革命师生高呼：「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立即用洪亮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来指挥。」他带头起歌，挥动着手臂，有力地打着拍子，和全场一起高唱。

还有回忆称：周恩来抱起一个幼儿园的儿童亲了亲，问孩子们会不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们雀跃着回答会唱。周恩来就打起拍子，亲自指挥他们唱起歌来。　还有回忆称：出访归来飞越国界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唱《东方红》：「毛主席很伟大，要热爱我们毛主席。」周恩来对机组人员讲：「你们飞行要靠毛泽东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

总之，还在文革之前，周恩来就不断借艺术性的音乐、舞蹈、歌曲，向毛泽东表达了非凡的忠心。它们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后来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对于其它的歌颂毛的歌舞演出也是下大工夫给以关注和指点的。广东省歌舞团人员追忆，周恩来在观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时指出：第六段中的「红太阳照亮了粤海」，这样说「太小了太轻了」，「何止照亮了粤海，大概你们从广东出发吧？这样就太小、太轻了。」

三、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行为中，周恩来与其它领导人不同而显得十分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１９５８年伊始，因为「反冒进」问题，周恩来从１月份的南宁会议到３月份的成都会议，从「离右派５０米」到「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一路检讨不断。周恩来对检讨稿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后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５０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份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

周恩来在检讨中批判自己：「『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

在这里」。

１９５８年4月２５日，周恩来视察河南偃师，当一位社员高呼「周总理万岁」时，周恩来立即制止：「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能喊毛主席万岁，我是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

在指导排演《东方红》歌舞的时候，有人问长征时候周是否直接参加指挥了战斗。周恩来回答：「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全靠毛主席的英明指挥。」

更为出格的是，周恩来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贬称为「娃娃」。１９７３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在毛泽东旧居前，周恩来告诉外宾：「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周恩来贬损自己，不仅是在语言、文字上，还经常表现在行动上。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对周恩来有这么一段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些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

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也讲到周恩来的这类做法，她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

万润南回忆到：（毛泽东在「八一八」接见红卫兵时）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伸出手，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

在文革结束后纪念周恩来的文集中，也常能看到人们出于对周恩来的崇敬而写下的这类回忆：周恩来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要提前在大门口下车。　　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　　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泽东一出现，周恩来立马上前迎接。有人这么形容：「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

与此相对应的是，每次毛上天安门，周恩来都要亲自先乘坐电梯检查，然后自己不做电梯上城楼，而是从旁边的台阶步行登上城楼。随后周恩来会站在电梯门前迎接毛泽东。

周恩来的这类动作，林彪及其它领导人都做不出来。

四、结束语

１９５８年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一干中共党内要员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林彪早已被批倒批臭，刘少奇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有所论及，唯有周恩来还被描绘成是一直在对个人崇拜风气进行批评、抵制、纠正。但是透过对历史的审视，周恩来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是不亚于刘、林等人的。

第二章 周与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的关系

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其成员名单是在周恩来参加、邓小平主持的，在１９６６年4月9日至１２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草拟的，后报毛泽东批准。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伊始，并没有人给以太多重视，且在中央文革小组许多成员观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参谋秘书班子，甚至是归刘少奇、邓小平领导。　但是后来经过毛泽东和江青的诸多运作，中央文革小组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和其成员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以及人所共知的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主要骨干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历史的变迁中，周恩来的作用始终被官方漠视甚至不承认。周恩来和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以在文革前期、中期基本上是同盟关系，虽然也有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却被官方演绎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绝不能简单地「概念化」。

一、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碰头会

１．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据中发〔６６〕２６７号文件（即「五一六通知」）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简称《大事记》）记载：「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在此会议上，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严厉的批评了彭真。同时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此次书记处会议还决定，成立以由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

作为文件起草小组的一位成员之一的穆欣回忆：「经中央审定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名单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志坚，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

另根据《大事记》记载：「四月十六日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５月１６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上文字，为毛泽东亲自所加。

而周恩来对于上述会议都是参加了的。文革发动的前期准备工作，整个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都是参与了的。

文革小组成员名单由中共中央在５月２８日正式公布，明确此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　实际上的中央文革小组绝对不是江青这么谦虚、低调的说法。

１９６６年７月９日，风尘仆仆回到国内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刘少奇等一干中央要员在宴会前会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宴会开始前，周恩来特意打电话给穆欣：要陈伯达参加会见，并叫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出席宴会，新华社将趁此机会公开报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事。　周恩来不仅费尽心机创造机会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牌子打出去，还顺从毛泽东的旨意在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上不遗余力。

毛泽东在７月２４号发话：「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继而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称赞道：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并在同期举行的批刘(少奇)、邓(小平)政治局生活会上充当了主力军。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来是心领神会，亦步亦趋。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９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时就指出：「部的名称太大，过去文化部那么大，干了不少坏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小组，倒做了不少好事，很受群众欢迎。」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关于此次接见的新华社电讯稿刊登于次日的《人民日报》。　通讯中说：「有１５００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他在致开会词时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

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在此新华社电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般，江青高于其它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呼之欲出。陈伯达也被单独点出，对于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给以了非凡的待遇。对于周恩来插手此类排名事件，并不是只有这么一次。王力回忆到：１９６７年的5月1日，周恩来把已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停发，把原本排名排在中央委员名单之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提到中央委员名单之前。

２．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由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形如一盘散沙，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员的穆欣称之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　　甚至中央文革小组每天干什么(比如开什么会，通知什么人参加，接见什么组织等)，都是临时决定，办公室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安排停当，工作人员整天忙得团团转。　　而更为致命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芥蒂矛盾非常大。

江青曾经挖苦道：「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很难进行，只要康老（笔者注：康生）和陈伯达见面，两个人就吵。陈伯达连（周）总理的话都不听，尽管我告诉他你要听（周总理的话）。周总理做康生的工作，我就做陈伯达的工作，最后会议总算可以举行了。但是时间没过多久，两个人又吵起来了!」　　毛泽东也抱怨：（同一个事情）康生讲他的，陈伯达告诉的却是另一个，江青也有自己的版本。而且连报告都没有。

陈伯达曾这样回忆：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根据陈伯达所述笔者推断周恩来是在１９６６年9月中旬期间。（笔者注：陈伯达所称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为中央文革小组会议。）

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中央文革小组实在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周恩来从８月２０号左右就开始主持中央碰头会（《周恩来年谱》亦称之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由此可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完全是因为形势发展所致。陶铸在未倒台以前也经常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在１９６７年初也参加中央碰头会。　　自１９６７年2月１9日起，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和中央碰头会。前后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主要是原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谢富治。１９６７年２－３月间毛泽东同意叶群、肖华、杨成武列席与会。随着文革深入，黄永胜、吴法宪亦与会，其间成员也不断遭到清洗。　　无论是早期的中央碰头会还是后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都是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并主持会议，并决定会议议程。

二、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

１．周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冲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周恩来在理解和执行毛泽东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策上，无疑是比江青等人更胜一筹。因为周恩来还可以用亲身经历作为他人的「样板」。

文革初期，周恩来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周恩来要执行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这也是国务院总理角色的职能；另一方面，周恩来为了不被打倒，这也是他在整个文革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无论是「下地狱」还是「跪在地上装孙子」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周恩来要做一个响当当的文革派，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左。这样，在这两个方面无疑都会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

而且正如文革初期，陈毅所评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　在这种局势下，周恩来自然会遇到所谓的「黑枪」、「暗炮」。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因为毛泽东的决策导向引诱而成，也有各自利益冲突，自然还有权力之争。决策导向，自然部分也是起因于毛泽东的在他的大字报中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基本决策有什么变化。各自的利益冲突，权力之争，在周恩来身上却被演绎成根据「遵循党的原则、为人民的利益办事」，在其它人身上则成了「祸国殃民」、「篡夺权力」。这是违背历史基本事实的。

除了支持发动文革之外，周恩来还要执行国务院总理的职能，执行毛泽东保人的政策，这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央文革小组也保人，但是因为具体的分工不同，冲突自然难免。因此就有了周恩来「调和」、「和事佬」等的说法。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３０周年的讲话和１１月１日的红旗社论都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评之为「骑墙派」，谓之「那些标榜走中间道路的人，必然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　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中最大的冲突。原因有二，一是周恩来在参与了一些文件政策的制定，而这些文件并不一定全部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的意；二是针对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级领导对于文革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　对此，周恩来为了保护自己，在１１月起草关于公交系统和农村文革的文件制定中基本上不再参与，而是由陶铸出面搞。　事后，陶铸完全成了周恩来的「挡箭牌」，在陶铸落难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没有施加援手。反而是康生还提醒陶铸，进行路线交底。

周恩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交部大抓「牛鬼蛇神」，其中含有三名副部级干部王炳南、陈家康、孟用潜，若干司处级干部以及大批一般干部与工人，也分别被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并发生了抄「牛鬼蛇神」们的家的事情。　周恩来还在9月份签署了关于国务院系统如何进行文革的《纪要》，该《纪要》提出要把司局级以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事后来被张春桥告状，说周恩来对此文件评价很好，并以此威胁周恩来多次检讨。张春桥批评周恩来说：打倒所有干部其实是周恩来搞的。　此事完全表明，虽然在支持文革的大方向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所倚重的两驾马车，但是在某些方面，周恩来比中央文革更甚。或许出于争宠，也可能是争夺运动的主导权（在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发生的批极左就是对话语权的争夺），二者发生冲突是可以预见的。

２．周同中央文革小组关系的另一面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更不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云「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而是毛泽东手下两大刚柔并济的政治利器。虽然在毛泽东的初始打算中，周恩来也是要被清算的目标之一，但是在没有彻底打倒和解决刘少奇的情况下，作为发动文革的最大的借用力量就是周恩来，周恩来仍然具备巨大的利用价值。徐向前回忆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积极响应和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对于那些持有怀疑或者不积极的很多高级干部，周恩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劝说和帮助他们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和任务。最后徐向前指出，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来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想象中的「一呼百应」，很多例如李井泉等高级干部在一开始就对于毛泽东的「发动文革」很是不理解。个中缘由恐怕是「高岗事件」恍如昨天之事，历史教训不可不吸取，刘少奇经营党务多年，树大根深，难保不再翻天。还有诸如陈毅之类一开始是举双手双脚赞同文革并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大搞迫害大揪「牛鬼蛇神」，但是当揪到自己头上就不「理解」的高级干部。此二类高级干部都需要周恩来，这种「屡犯错，屡检讨，保持晚节，终生都要做毛的奴仆」的人，作为活生生的「典范」来说服众人。俗话说「杀鸡给猴看」，周恩来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那只「鸡」之外，还要「鸣几声」来告诉众人，「你们不跟着毛主席走，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毛主席。」

在本质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都是执行毛泽东的文革决策的主力军。也正是如此，也就决定了就整体而言，特别是文革初期，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十分融洽的。

虽然江青倚仗「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对周恩来时有不敬，但是江青对于周恩来并不是后来官方一直认定和宣传的：江青对周恩来是使尽奸计、迫害和炮打。　两者的关系可以用周恩来和江青自己的言论作为脚注。江青在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指出：「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　周恩来坦言：「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到：「我们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组成部分，成份上来说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斗争中，不论从维护、坚持、发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说来，不论是说批判、揭露、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说来，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央文革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她的丰功伟绩。」　同时，周恩来也同时号召广大军民要永远忠于中央文革！

通过大量的实例，周恩来对于江青可以说是毕恭毕敬。　(详见下文)。很大程度上周恩来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实质上周与毛的关系。以致周恩来多次说过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事，我们去执行。　对于周恩来如何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吴法宪对此有过生动的回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

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　　可见，经过周恩来的智慧，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提议和决定会得到更完美的发挥和更理想的结果。

１９６６年年底，同中央文革支持的「工总司」的对立组织「赤卫队」在康平路被血洗。被击溃的「赤卫队」要乘火车到北京告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抓捕「赤卫队」头头不准上访。　　在支持地方造反派组织上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并无二致。

江青对周恩来也并不都是飞扬跋扈，相反，江青有时对周恩来非常尊重。官方为了树立周恩来的伟大形象，对于此点非常忌讳，一概不提。而在穆欣、王力等当事人的回忆中都对此加以证实，而且连中央文革小组的日程都是由周恩来安排。　　林杰的太太王乃英曾经「交代」：江青经常等周恩来拿主意，虽然中央文革小组的其它人有时候不同意这种做法。林杰抱怨说，江青总是让我们按照周总理的命令去执行，事情总是变的越发困难。　　在１９６７年夏天，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戚本禹建议周恩来安全起见搬到钓鱼台。　　对所有的这些支持和关心，周恩来自然也报之以桃李。不仅对江青，连对张春桥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如此评价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陈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　　因为文革小组的工作实际上周恩来主持的，这个支持也是针对周自己的。

１９６８年中央拟定的庆祝国庆口号中有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九大」召开之前，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迅速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通知》。在此中发通知中，排名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排在国务院之前。　　这个排名绝对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周恩来在「九大」来临之际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献礼。１９６９年中央文革却在新形势下改头换面，在它解散的前夕，林彪和周恩来都赞扬它「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

１．江青的升迁

江青在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

１９５６年由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副部级）。江青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就是周恩来在１９６４年主持的京剧座谈会。江

青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在１９６７年5月８日出版的《红旗》和５月１０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在文革初期，由周恩来提议，林彪、周恩来共同签署，将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到五级。　　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

实际上，建国以后的高层对于江青的态度可以说是表现其本人政治态度的一个潜规则。作为一个老红军，徐业夫从５０年代起就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工作，曾经因议论江青而被调离过职位。　　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坚定支持是其不被打倒的重要一点原因。特别是文革初期，江青进入「文化大革命」最高领导层，是毛泽东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而在此过程中，周恩来所做的工作无疑要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林彪多得多。这自然也是周恩来「紧跟」毛主席的结果。

陈伯达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因病住院，主动提议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　　笔者认为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中共中央却为此专门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根据当时的组织程序，此类通知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草拟出来并报毛泽东批准。此事是周恩来主动为之还是得到毛泽东事先提示尚无可信证据。但是无论如何，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多次一举，而是具有深刻重大的政治意义。首先，对于江青在全国树立起其为中央首长的形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堪比「林彪事件」之后公布的《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一般，为江青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其次，为江青把持中央文革作了法律上的背书。正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论述，此通知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

虽然在文革小组内部，当家作主的是江青，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但是「名不正，言不顺。」有了此文件后，江青便成了名正言顺的当家人，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太上皇。

２．对江青的吹捧

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际，周恩来提议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后来江青提议徐向前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同出一辙。　　软弱的陈伯达和具有历史包袱的徐向前都可以被轻易作为「刘盆子」、「阿斗」使用。陈伯达自己就承认：自己没有能力。　　于是陈伯达推荐康生，但是康生如何能做得了「刘盆子」？周恩来对陈伯达软硬兼施：「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　　后来公布由江青代理组长则显得极为顺理成章。成为代理组长的第二天即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江青就主持毛泽东第二次接见５０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大会。大会情况由新华社发布消息：「毛主席和林彪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陪同乘第一辆汽车，紧跟着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辆汽车……六时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宣布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开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她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

国庆节后，陶铸对报纸上关于江青的宣传极其反感：「你（曾志，笔者注）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和总理平列，像什么样子？」　　陶铸是常委中主管宣传的，但是是谁越过他插手照片排列之事？舍周恩来，还能有谁？

１０月６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１０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讲话之后，周恩来表态：「同学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她讲的那段话，我们大家都看过，都同意的。……江青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录音，我们把它制成录音片子，到全国大中学校去放。这样就不仅是今天到会的同学、红卫兵战士都听到，而且是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红卫兵战士原原本本都听到。」　把江青在一个大会上的讲话做成录音，在全国播放。江青名闻九州岛、声震寰宇的地位与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对于一个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江青，这种待遇即使不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

其次周恩来除了在宣传江青上十分卖力气，另外还当面奉承当众江青。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晚，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革命文艺战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之所以隆重其事，是为了对江青进行一次集中的人为拔高和吹捧，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献媚的大会。

周恩来在此次大会上不顾历史的真实，对江青做了极其露骨的吹捧：「在这里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的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　在这场把江青树立为伟大的文艺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礼上，周恩来是立了头等功的。周恩来把自己摆在了是江青学生的地位上。

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评论：周恩来的讲话，通篇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的表白。谁又可以说，在江青迈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没有周恩来推波助澜的一份功劳？　诚如历史所记载，周恩来从一个这种表态到当众高举手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也就不足为奇了。　阎长贵回忆说：关于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我也问过汪东兴，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它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官方的文字、文献以及传记、年谱等对于周恩来和江青、中央文革的关系是比较隐蔽，为「贤者讳」。但是在文革期间多次的召见造反派的活动以及群众大会上，两者的关系就非常露骨了。对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关系，在１９６８年的3月２４日和２７日的两次大会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显示的非常清楚。

１９６８年3月２４日，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对军队干部会议，宣布「杨、余、

傅反党集团」的问题。

首先是林彪讲话。当林彪讲到：「表面上他（杨成武）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项目来迫害江青同志。」

此时的周恩来插话高喊：「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周恩来多次高呼：「谁反对中央文革打倒谁！」

周恩来在自己的讲话中对于江青的吹捧更是不遗余力、无以复加。

周恩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周恩来讲：「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

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

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

大家都知道，１９６４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１９６６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时隔３日，中央文革小组在首都工人体育场组织１０万人群众大会。周恩来对军队干部吹完江青后，对于普通群众再次对江青进行了肉麻的吹捧。当周恩来讲到「我们要向江青同

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时，江青回应到：「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

周恩来则说：「我不敢当，我还要学。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付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周恩来这个讲话有如下几个特点：１）从历史上来塑造江青的革命历史形像，把江比作鲁迅来赞扬；（２）江青受到过迫害，而且这些迫害者文革结束后却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３）文革期间江青又立新功。

另外作为中央领导人，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是十分难得的互相声援致意的热烈场面。这也真实的体现了在文革中期以前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真诚团结一致、亲密无间的的一面。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和江青合伙开的「夫妻店」，那么周恩来就是这个店的总经理。

如果说这是周恩来在公众场合下的作秀，那么私下里的周恩来也不逊色。知情人讲述，当时的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亲自抓（笔者注即今天的国防大学），在周恩来的专门指示下曾搞过「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知情人说她没看过那东西的原稿，据说除有毛林会师（即井冈山会师）之外，还特别对江青倍加赞扬。但是后来时间不长，因为时局变化，周就命令把写成的东西全部收回销毁。

３．江青和周恩来的互动

聂元梓回忆说：有一次，康生要我抓杨勋（经济学家，文革时为北大教师，因为反对江青曾坐牢两年）。杨勋是杨柄章的姐姐。指示我们让群众扭送杨勋到公安部。开始康生指示，我照办了。后来康生又通知让我到他那里去，问我：「指示你抓杨勋，你怎么没办呢？」我说我已经让学生把她扭送到公安部了。他说：「那总理来电话说没有送去。」然后他立刻打电话给谢富治核实。谢富治说「人送来了，在押了」。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又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已经办了，我也问了谢富治了，在押了。」我才知道这事是周恩来让办的。

当聂元梓被问到：到底为什么要抓杨勋？聂回答说：我先不知道，后来听说是周恩来完全是唯江青意图为从。　　是如聂元梓所说还是如林乃英在检讨中表示的要听周恩来的？无论如何，阎长贵先生回忆说：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这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我认为，主要就是周恩来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经过１９６７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层面上出现了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谢富治、杨成武、叶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第一副组长江青，她几乎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和重视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周恩来与江青在工作上应该是对于对方还是非常支持的，虽然时不时的江青会耍下「小脾气」。举例来说，王力曾经

回忆道：有关四川「二挺」（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他曾经应江青要求进行调查，事后也写信给江青说明情况。但是后来此信是周恩来批示的。周恩来批示道：「同意王力同志意见。」

而对于周恩来，江青也是关照有加。１９６７年１月，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了要打倒周恩来同志的大标语。　　阎长贵回忆到：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份关于周恩来的什么材料（其内容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关于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这个表态，对我影响很大。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我中央财经学院的一个大学同学（年轻教员），给我来信，说（大意）：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晚（或２月１７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周恩来讲话的纪录；其意思是想就周恩来的这次接见写周恩来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她「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学，知道给总理写大字报不行，又给我来信，说要贴李先念的大字报，我觉得他不听话，有点不耐烦，告诉他：「我不管了！」我当时的心态是只要不贴总理的大字报就行，其它我不管。我讲这件事情，是想说明，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周恩来在接见科学院造反派时说：「江青同志讲话就是指示，谁不执行，你们就造他的反。我支持你们按江青同志的指示去办事，至于他至死都不执行，那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可以夺权嘛？我只能起煽风点火的作用，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助你你们一臂之力。」

曾经是上海造反派负责人的潘国平回忆：一是有一次他参加北京工人体育馆红卫兵大会，会后大家鼓掌要中央首长绕场一周，周应是第一位，可他退到后面，还扶着江青下台阶。潘当时感到很不舒服。二是１９６７年１月，潘上京开全国造反派头头大会，第一个发言，提出部份干部可以出来工作由造反派监督，江青当场反对，把潘轰下台。潘气不过，给周恩来递纸条要求继续发言，周却公开宣布说，潘的意见，他已知道，会转告中央，今天不必再发言了。江青会后也顺势过来，叫我潘司令，并给我联络电话，派车派联络员。

江青和周恩来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周恩来曾对刘白羽说：她（江青）那里一个电话就是几个小时。　　吴法宪回忆说，江青下楼的时候，周恩来周恩来都趋步往前，扶其下楼！在江青外出青岛游玩，周恩来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两位政治局委员陪同！　　而周恩来对于江青的要求更是有求必应！江青有个人问题时特别爱找周恩来帮忙。　　江青因为觉得住１１号楼不安全提出要改住１０号楼，又在１７号楼和１０号楼下面建立防空洞。而这些工作，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的。杨银禄说：江青提出要求后，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对江青非常了解，他接到我的电话，立即就答复了：「好嘛，江青同志的想法是对的，我同意。我现在就给东兴同志打电话清他准备一下。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周总理说：「那好嘛，我请东兴同志办。」

阎长贵先生还说：周恩来到江青这里来之前，都是亲自打电话给阎长贵(时任江青秘书)，问：「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有

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阎长贵每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阎长贵说：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阎长贵还回忆到：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４．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受到毛周关系的制约

阎长贵先生说：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江青是通天的，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来。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周恩来给安排的，她在文革中的职务攀升也离不开周恩来。她１９５６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周恩来提议的，１９６９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周恩来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为转移的。毛泽东经常敲打周恩来，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泽东更极端。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就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笔者认为，按照毛泽东的本来设想，「九大」之后应该是整周。　作为毛泽东的代言人，「九大」后江青接连对周恩来的发动了几次攻击。最重要的一次是《周恩来年谱》记载的「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吴法宪和邱会作都对这次会议做了详尽的回忆。

根据程光先生的采访，「九大」之后，江青还背着周恩来曾经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发泄对「九大」后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是专门诽谤周恩来的。

江青在１９６９年夏季也向刘庆棠交底：「文艺界大批判有个困难问题，就是有总理，有些事都是总理主张的。」刘庆棠马上就呼应说：「文艺界的权还没有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久８月２６日，刘庆堂致信江青说文艺界的阶级斗争，实质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但是林彪自己跳出来之后，改变了文革的大方向。因此，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尽管从文革开始，难免有些磕磕碰碰，但是总的看来是良好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同江青是毛泽东清理林彪势力的左右手。此时的周恩来和江青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于是在，周江之间的良好关系再次体现，直到１９７２年年底。

「林彪事件」之后，江青多次宣称：总理、康生、春桥、文元，我们是毛主席这一派的，都是受林彪集团迫害的。林彪一伙到处放火，我们是救火队，保老同志。　无疑，周恩来

是被江青看作是同一集团的人。

１９７２年5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２１日，周恩来做了长篇讲话，并为会议中最重要的文件－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背书。周恩来用自己的政治声望为此信的真伪做了证明。同年８月１０日，周恩来将维特克一再表示希望见见江青的要求的报告批示给江青：「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周恩来还说：「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　周恩来不仅把江青同邓颖超、康克清等革命老大姐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在周恩来将报告批给江青之前，刚从北戴河回京的江青根本不知道有维特克此人。余汝信先生对此事的评价则是：「报告一批，周恩来完成了江青与维特克之间牵线人的角色。周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向江示好的表现，这一动作更说明，在１９７２年，周与江的关系是密切、良好的。」　笔者对此完全赞认同。

１９７２年年底，毛泽东重新对对于「林彪事件」定性。毛泽东改变的不仅是批极左还是极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政治局内部格局的重新认定。王若水回忆说就是通过此事认定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是有限的。　显而易见的是，江青在批评周恩来方面比周恩来批评江青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而周恩来在这之后对于江青的响应更为小心翼翼。这在１９７３年夏季毛亲自发动对周恩来的批评之后更是如此。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３日，为对外友协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只印发周恩来、江青二人的事情，江青以批示向周恩来提出：「这类简报，建议也送春桥，文元同志。」周恩来当日就批告外交部：「请从今起，外事活动简报，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体同志，及有关各部、委、组，望通知友协照办。」　当毛泽东决定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时，作为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笔者注：杨德中实为周恩来在中央警卫团、中央项目组的最重要的耳目。如果毛决定对周恩来动手，第一个需要清除的就是杨德中。）杨德中被江青等定为「坏人」随后被下放也就在意料之中（现代版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周恩来在「批林批孔」期间依然赞扬过江青，但是笔者认为此时的赞扬和原来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了。正如上面所论述，周恩来和江青之间也存在摩擦，可以说既有互相勾结、互持，狼狈为奸的一面，又有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一面。这完全可以归于周恩来看透了文革其实就是毛江夫妻店。周恩来通过对江青的「投资」与「阿谀奉承」，获取最高决策的信息和最高领袖的信任，自然也受益匪浅。但是自１９７２年年底之后，周恩来在政治上开始遭到毛泽东的抛弃，周恩来对江青的赞扬和顺从，在某种意义上将只是对毛泽东的输诚了。１９７５年5月毛泽东发动政治局批判「经验主义」。吴德回忆，他和叶剑英都批评了江青搞「宗派主义」。而此时的周恩来却对吴德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

四、结束语

周恩来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和文革的进展所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个决定性因素。在文革前、中期，二者整体而言是以合作为主，共同贯彻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九?一三事件」之后，两者之间因为权力的再分配，则逐步转为以争夺为主，矛盾日益尖锐。但是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周恩来对于江青

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相对于被中共认定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康生，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的公开场合对于江青都是不卑不亢,无甚吹捧。　而在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抬到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可以说是居功甚伟。

至于周恩来为什么如此自我「作贱」，是什么重要因素在文革时期制约了周恩来，导致周队对江青和文革小组如此这般。笔者认为那就是对周恩来毛泽东一个人的忠心，而非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是周恩来时刻在心里的以所谓「贤相」自居，保持晚节的心态所致，由此周恩来也只能扮演「从恶」和「帮凶」的角色，起到任何其它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而非制止动乱、更不可能拨乱反正，引导国家步入正途。周恩来还可以说是第一个领会到「江就是毛的一条狗」的高级领导人，因此，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之谜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第三章 「伍豪启事」风波

反击「二月逆流」的最大后果，是周恩来承认了「中央文革已经取代了书记处」的现实。从此，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是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各省、市、自治区筹备建立革委会的权亦交给文革小组。

周恩来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１９６７年５月份出现的「伍豪事件」则使二者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倾斜。「伍豪启事」与其说是江青要挟周恩来的工具，不如说是周恩来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心病。毛泽东则利用此事，有意不时的敲打周恩来，直到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段。

一、「伍豪启事」的起源

３０年代初，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曾使用过「伍豪」这一化名。１９３２年２月下旬，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在上海的《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报纸上连续登载所谓「伍豪启事」，宣称「伍豪」等人脱离共产党，企图在共产党内制造混乱。报纸流人中央苏区后，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的项英、任弼时表示，一定要予以还击，戳穿谎言，肃清影响。遂提议请毛泽东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告示，在全苏区范围内，向广大工农群众彻底揭露中统特务机关阴谋。毛泽东拟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并于２月下旬以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布了这份《布告》。布告全文如下：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续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唐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一九三二年二月。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在苏区瑞金，并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并且连续撰写了两篇文章，一文是《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一文是《红军十二军占领杭武的意义》，分别于２月３日和３月２日，刊登在中央苏区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上。《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署名时间是２月１８日，这一时间与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时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关于此事的说法，无论是《周恩来年谱》还是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都声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南开大学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发现。但是都没有怎么详细叙述事情的原委。刘西尧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则说：「这次反总理的『五?一六』思潮，与一位长期在国务院工作的人有关，他竟把天津『８１８』造反派弄到的一份载有国民党反动派捏造的『伍豪声明』的报纸，送给江青，妄图陷害总理。」　刘西尧所言的这位长期在国务院工作的人是周荣鑫。１９６７年５月初，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的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当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时，将载有启示的报纸的抄件交给周少华和张国忠，并由二人专程送到北京。周少华是周荣鑫的女儿。　周荣鑫为什么不直接交给周恩来？这恐怕同当时周荣鑫的情况有关。吴德说：「周荣鑫、雍文涛被揪走后，好几天都未放回来，我们就派人想办法去找。周荣鑫找回来后，周总理让他在国务院烧锅炉，红卫兵再找他时，就说周荣鑫已经参加劳动去了，实际上把周荣鑫保护起来了。」　这期间的原委则不难明白。

对周恩来来说，则是有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周恩来曾经直接授权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项目组服务。　周恩来对于红卫兵的行动也曾经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

５月１２日，周少华致信戚本禹，报告此事。５月１３日，戚本禹同关锋一起会同周少华、张国忠两人谈话并将抄件取走送予江青。

关于伍豪事件还另有一说法。李文卿在其所著的《文革中的许世友》一书中记载，１９６８年５月４日，许世友携带南京造反派清查敌伪档案时发现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火速赶到北京。　这和吴法宪的回忆是一致的。吴法宪回忆到：「江青把杨成武和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是现在你们不能看，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启事』」。

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出席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代表等人。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元帅。毛泽东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当场周恩来简要地谈了「伍豪启事」的原委：我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中到了中央苏区的。我到福建永定的时候，正好碰上宁都暴动。当时康生等在上海，他们看了这个敌人伪造的假启事，很快就由申报馆广告部在广告栏登了一条揭露性的启事。

江青拿到这个材料后，于５月１７日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信中并附寄了这个启事。江青在信中说：「５月１２日夜，收到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给中央文革来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示，为首的是伍豪（周 XX），要求同我面谈。」

对于此事，官方《周恩来传》的评述是「江青使出了更狠毒的一手。……江青此时要这样做，用心的险恶是是十分清楚的。」　事实上这种指责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最为有力的证明是「伍豪事件」并没有在社会上扩散，特别是在１９６７年的春夏之交（当时是文革中社会上第一次反周高潮)与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期间。笔者在查阅宋永毅主编的１１２卷《红卫兵大字报》以及哈佛大学所存的红卫兵数据，未能发现在社会上扩散的证据。

若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江青对于周恩来的任何企图都是无法实现的。江青在收到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之后，致信林彪、周恩来、康生是完全符合组织程序的。直到１９７２年１２月份，江青和周恩来的合作远远大于冲突。「伍豪事件」完全是周恩来自己的心病（详见下述）。江青在没有得到周恩来的回答之前，也未把这个材料定性。江青在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个材料的价值，尚无可靠证据，但是事后的发展，却表明了这个材料成了毛泽东手中有效的工具，并且随着时局的变化，此材料宛如变化多端的「金箍棒」，时而「深藏」，时而「启用」。

二、「伍豪事件」的澄清

周恩来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周恩来发动工作人员对此进行详细的查证。

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了３７年之久的赵炜回忆：「邓大姐让我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邓大姐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１９３１和１９３２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我们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报纸太多了，堆在一起有我两个人高，而且因为是竖版，找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难。」　功夫不负有心人，工作人员终于在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０和２２日的《申报》上找到了关于「伍豪启事」的声明和否定声明。

随后，在５月１９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周恩来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

同日，周恩来在江青来信批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始终没有提及毛泽东签名的那个布告。

康生出面为周恩来澄清此事为假。周恩来（在江青写信给周恩来过后不久：笔者注）专门在文革小组会议上对此说明。周恩来讲完之后，康生出面作证这件事是敌人搞的，发生以后是由他处理的。　但是因为康生现在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此等好事，一笔

勾销。

其实康生已经多次证明此事为假。文革前就有两次。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康生曾在一份涉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亲笔写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与敌人完全站在一起的说法。事实真相是：顾顺章叛变后，全家被我们干掉了，敌人为了报复，用特务机关造了那个谣。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７日，康生在另一份有关材料上再次批写道：「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的事。」　１９７２年的2月１８日，重病中的康生口述了一个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污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官方一致宣称原本知情的康生在１９６７年的5月却哑口无言了，以此极力丑化康生。

不知道陈云是否当时知道此事，但是笔者迄今为止没有看到陈云在１９６７年此事发生前后出面为周证明清白的材料，这应该和当时陈云所处地位有关，极有可能当时并不知情。陈云在１９７２年6月１３日，陈云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就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发言：「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一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他又写了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在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谢富治在死之前亦留言：「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据笔者所知，林彪没有表态。毛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　由于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态，于是留下了不少可以想象的空间。卜伟华先生说：周恩来在其后的半年时间里，心中可能一直在打鼓，他要反复的琢磨毛泽东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毛泽东不明确表态，周恩来被挂在了半空中。

当时「抓叛徒」之风十分猖獗，在此大背景下，周恩来无法不心惊胆颤。周恩来在６月３日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代表，在谈到「揪叛徒」问题时说：关于「抓叛徒」问题，重申：材料要送中央核实，不要在街上贴大字报。有的是敌人搞的陷害材料。要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着想，不能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看得那么坏。

康生在同日接见外事口单位和红代会代表在谈及「抓叛徒」问题也指出：

「抓叛徒的问题，我不详细讲，以后中央要发文件。红卫兵做了大量的工作，挖出了许多叛徒，变节分子，做了许多贡献。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关于刘少奇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照片也发了下去，大家很重视这件事，做了调查工作。外事口也好，其它学校也好但是最近发现存在一些偏向，就是到处都去抓叛徒。我们希望你们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工作，可成立调查组，深入调查。你用一个『抓叛徒小组』的名称，去调查别人，一听这个组名就有意见，很不好。

另外这件事情不简单，做结论要慎重，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不能根据未核实的材料，宣布某一个人是叛徒，这实际上制定了一个人政治上的死刑，要负政治上的责任。这和西方新闻记者抢新闻不一样，你也抓，他也抓，被利用了。我们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

党，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若都有问题那不就把毛主席的结论推翻了吗？进监狱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个很好的考验，也很光荣。不要一进监狱就怀疑人家是叛徒，不要随便贴大字报，有些群众组织做得比较好，得到材料交给中央，不立刻宣布结论，这是好的。你们革命组织要掌握方向。

不要丧失警惕，也不要特务如麻。对历史上有政治结论的，凡是中央管理的干部，历史问题的决定权绝对在中央，必须由中央决定。」

诚然，康生的讲话也有不实之处。关键之处，康生这个讲话无疑是为周恩来讲话的。为什么在搞「六十一人的叛徒」时不讲呢？康生、周恩来讲话的言外之意都在是打「伍豪启示」的预防针。

周恩来行动快速的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在６月２８日发出。通知重点强调了：

（一）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它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

第一点无需多用解释。周恩来当时尚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自然不是要清查的重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无疑也是优异的。即使群众再次发现关于周的什么材料，也要区别对待的。

周恩来的这番努力，恰恰证明了周恩来的心虚与害怕。事情如果烧不到自己头上，周恩来会搞这么一个文件么？当时有几个学生就是在调查刘少奇的叛徒时，他们中有人怀疑正是周恩来可能在泄露１９２８年的天津事件中扮演了非常可疑的角色，结果最后被整肃，最后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对于江青等人来说，既然毛泽东不明确表态，就意味着可以做文章。但是文章做的也只能是时不时的敲打周恩来，向吴法宪等人摆摆谱，却无置周恩来于死地的心。虽然周恩来已经对江青唯唯诺诺，但是江青还是要显出「老娘」的气概。

周恩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在一些相关的会议上，周恩来几次就「伍豪事件」的来龙去脉，做出详细的叙述和解释。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曾几度在１６号楼、１７号楼会议室外值班时，听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就「伍豪事件」对周恩来的高声质问，周恩来不厌其详地解释回复。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张春桥、姚文元担任正副主任的上海革命委员会材料组，把这个伪造的「伍豪启事」编进《「抓叛徒」简报》第５５期。

但是此时的５月，时值天下大乱兴起之际，打倒周恩来时机未到。「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本来寄希望各省的革命委员会能够陆续建立起来，以利于下一步文革大计。未曾想，各省造反派、保守派等各色群众组织为了争夺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主导地位，反而大打出手。

如河南问题。４月２３日，毛泽东批示林彪、周恩来：「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锺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林彪就是个甩手掌柜，具体事宜能躲则躲。

诸般事情，毛泽东当时只能依靠周恩来。

然而在「鸟尽弓藏」的时候，「伍豪启事」不啻于制周恩来与死地的利器。因此，毛泽东的批示模棱两可，未置可否。

１９６７年５月，红卫兵中掀起了自２月份以来另一波打倒周恩来的浪潮。天安门广场贴出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将周视为「右倾保守黑后台」、「二月逆流黑后台」、「右倾翻案风黑后台」。　这些红卫兵很多最后被冠以「五?一六」被整肃。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９日，毛泽东在王海容、唐闻生反映最近社会上有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来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５月３１日，康生写信告诉陈伯达、江青：建议由文革小组召集外交部的联络站及所属核心组开会，明确指出那些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周恩来于１０月和１１月，曾让工作人员将登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２日，北京大学「６４０６」信箱历史系学生范××向毛泽东写信，又反映了他在１９３２年的《国闻周报》、《申报》、《时事新报》上发现《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材料。

１９６８年1月１０日，周恩来给江青写信说：「此事在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经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直到１９６８年1月１６日，毛泽东就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反映１９３２年２月上海各报登载过《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周恩来暂时才算放下了心。同年５月８日，在一次毛泽东亲自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再次谈了此事经过并说：「我已将那件事的报纸和我的报告复印了，还要写一个材料。」毛泽东则说：「前几天，许世友忽然做飞机来找我，要亲自交给材料。我一看是《旧申报》，就知道还是那个『伍豪启示』。」「有些干部对当时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说『这还了得』。」

实际上，正如前述，１９３２年２月，毛泽东曾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

席的名义，签发《中央政府布告》为周恩来辟谣。　　同年２月２０日，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

除了中共方面的证言之外，还有来自国民党特务方面的证词。１９５１年3月7日，国民党中统特务驻上海特派员黄凯被逮捕后，承认：张冲起草了这个伪造「启事」后，他将「启事」送到《申报》馆门市部。但是《申报》广告处律师看到这个启事借口２４３人脱党而具名只「伍豪」一人而暂不刊出。但2月１６日、１７日，《时报早晨号外》首先刊出了这一启事；１８日，《新闻报》也刊登了。１９日，国民党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为何不登这个启事，《申报》遂于２０、２１日刊登。《时事新报》也在这两天刊登。

１９５３年6月7日，黄凯又在狱中写的交待材料中说：「他（指张冲）在抗战以前攸（悠）长岁月中，是蒋光头的主要帮凶，我又是他的主要帮凶。他亲笔起稿，写伍毫（豪）启事。……遍登中外各大报一星期，丝豪未达预期的效果。」黄凯刑满释放后，又写文章记述了这段经历，并称这件事的结果是「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申报》上却由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季源溥警告《申报》史量才不应刊登，史居然拒绝，他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应该说「伍豪启示」的真相是不难搞清楚的。

三、《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一时显得「大权在握」，处在接班人的位置。毛泽东仿如一个握紧拳头准备猛击对手的斗士，林彪的出走，却使这个拳头打在棉花上。毛泽东闪了腰，一下子病倒了。

１９７２年2月１２日，毛泽东突然休克。周恩来知道后，慌张加紧张，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　　毛泽东醒来的那一刻，周恩来脱口而出的是：「「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这个表白并没有获得毛泽东、江青、邓小平的认可。

江青后来仍然指责周恩来：「(周）迫不及待。」　　江青为什么指责周恩来「迫不及待」？李志绥回忆：「在毛泽东病了之后，毛对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李志绥说：「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首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两腿缩回，两首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

而邓小平则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事后，邓小平的这番表态大获毛泽东「欢心」。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当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邓小平的发言向毛

泽东报告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一时兴起，毛泽东问谁知道邓小平的住处，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虽然因其时已届深夜，没能将邓找来，但这一事情，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进行认真观察。而观察的目的，是他将要决定委邓小平以重任。」痛打落水狗，好似是「光荣传统」。但是如果你不痛打，你就会被淘汰，下一个被痛打的就可能是你自己。这个，就是中共长期党内斗争制造出来的「畸形果实」。实际上邓周的关系远非后人所述，周恩来在１９７４年6月1日住院以后，直到4个月以后邓小平才去医院看望周恩来。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写的「在法国的两年，在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则是不折不扣的谎言了。

１９７２年5月１８日，周恩来确诊膀胱癌。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还阳」了。5月２７日，周恩来先去毛泽东处，然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说：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讲一点个人的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次日，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召集人会议上宣布此事。　　然而只讲历史的上错误还不行，周恩来还要对伍豪事件做一个系统的说明。

张佐良回忆，１９７２年的6月份，周恩来闭门写「文章」，写的浑身浮肿，苦不堪言。

6月１０日－１２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自我作贱，再次表示保持晚节。

6月２３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周恩来特意宣布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它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　　中共中央还发出文件予以说明，并附若干原始材料传达至高级干部。毛泽东当时也说，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可是会后，并没有下发周恩来的报告。江青在华东组和中年组会上的讲话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　　在这次会议之后，王洪文叫人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上海档案馆查到一份「伍豪等人的启事」，于7月１７日报王洪文。王洪文批示：「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处，再等一个时期处理，可能中央有指示。」

１９７２年8月3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约周荣鑫、周少华谈话，询问了１９６７年天津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所谓「伍豪启示」以及将载有这一启示的报纸抄件送戚本禹的情况，并要周少华就此事经过情况写了一个材料，即《汇报我和张国忠通过戚本禹向中央报告国民党反动派报纸捏造总理黑材料的经过》。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就是下发一个中发文件。而关于中发文件和请示报告问题，毛泽东曾经做出批示。

１９５３年5月１９日，毛泽东批示：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

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１９６２年8月１０日，毛泽东对于领导机关应加强请示报告工作做出批示：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国外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即使报告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画了圈，周恩来又能怎么样？

王力说：后来周总理总结出个经验：凡是毛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如果只划圈，那还不行，何况这个文件（笔者注：指「二月提纲」）主席连圈也没划。　周恩来说：「主席如果说很好，照办，那才算数。」

周恩来也亲自叮嘱过工作人员：「毛主席虽然看了，也可能只是觉得总的还可以，因为毛主席只划了个圈，还可以再研究一下……」

实际上，在１９７２年6月２３日，周恩来做完《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报告后，这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做了录音，然后又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记录送给周恩来。周收到以后看过，但一直没有签字。根据毛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要把这个报告的录音、文字记录稿及其它有关文献自资料存人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存档。但周恩来如果不签字，这个报告印发不出来。

因此此事被搁置，绝非周恩来工作忙或者江青等阻拦所能解释的。

１９７５年9月２０日，周恩来要进行大的手术。周自知很可能再也起不来。在麻醉药都打了情况下，叫工作人员让赵炜把此报告尽快送到医院来。赵炜用最快时间送过来，周签字。签好之后，周恩来如释重负：「我签了字，就算是办完了这件事。」

是周自己耽搁的。因为周恩来非常清楚毛是把此事作为自己头上的「紧箍咒」，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并不是什么让周恩来澄清事件，完全是一直敲打战术，告诉全党，周恩来历史上不那么干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周恩来希望毛泽东能够了解自己的苦衷，高抬贵手罢了。

但是无论如何，「伍豪启示」当时并没有对外泄露，社会上也没有出现任何与此有关的消息。

四、周恩来的叛徒情结

１９７５年7月１日，北京医院。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在和泰国总理签署完中泰建交公报后，对一部分要求同他合影留念的工作人员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周恩来的这句话表明：他在他死后，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就可以抛出「伍豪启事」这个「定时炸弹」，把「周恩来」三个字炸成无数个「叉叉」。

１９７５年9月２０日，病情急剧恶化的周恩来再次做大手术。周恩来自知不久将告别人世，这次上手术台能否还能活着下来尚存未知数。打了麻醉药之后，在进手术室前，周恩来特地调来了「伍豪启事」事件的全部材料及１９７２年批陈整风会上关于「伍豪事件」的报告记录稿，详细阅读之后，将其封存，并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周恩来用心良苦，不仅是签名，还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不仅如此，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突然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周恩来的喊声撕心裂肺、令人动容。「伍豪启示」在周恩来心中的份量是如此的沉重和痛苦，此喊声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为什么要报告毛泽东？是要把毛泽东感动到挤几滴「鳄鱼的眼泪」然后批示「同意照办」吗？周恩来其实非常清楚，这些统统不起作用。

这是因为周恩来自己对此有个特殊的叛徒情结。

１９６６年5月２１日，周恩来在谈到「保持晚节」问题时候，就专门针对叛徒问题感慨：「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月１日接见铁道部部分革命造反派时讲：「我是经过五个时代，从大革命到现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到现在。五个阶段都经历过不少事情，看到过不少阶级，有的是钢铁战士，有的就是不行。像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但一抓住就叛变。当然也有好的，像苏兆征成为烈士。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也有很多烈士，像李大钊；也有象陈独秀背叛革命成为托派，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就像从苏联回来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住在苏联，成为人民的敌人。革命烈士很多，革命者是前仆后继。我们是留下来的人，多做一些工作，就是为世界革命服务，你们应该全心全意干革命，要胜过我们。」

周恩来还对红卫兵大搞叛徒材料大力赞扬：「我建议注意调查研究。我接见过南开大学卫东派组织。我叫他们多作调查，他们下决心钻到很多图书馆里，查了几个月。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瞿秋白死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样，结果蒋介石还是把他杀了，这篇文章被陆定一藏起来了。这些都是大事，是白纸黑字写的材料。这些材料就值得了。」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于叛徒问题不厌其烦的讲，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没有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周恩来在「伍豪事件」中扮演的真实角色到底如何？陈小雅质疑的非常有道理：

第一个：周恩来本人和中共高层以及所有为周恩来辩护的人，在辩护和证言中，所强调的都是「周恩来本人并未登过那样的启事」，所谓周氏脱党「并不是事实」。一言以蔽之，周恩来没有「做」过那件事，但从来没有人从正面澄清过：周恩来（我本人）从来没有「说」过那类话。

第二个：毛泽东在３０年代和６０年代都深信不疑的事情，为什么在７０年代发生了变化？那些原来为周恩来作过证明的元老们，为什么竟没有坚持一定要形成一份中央文件？而把这件只需举手之劳的事情一直拖到周恩来的身后。直到１９９５年，才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撰写了一篇《「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算是「正式澄清？」

对此陈小雅女士认为：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说，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地存在」。根据他的指示，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致信湘赣边特委，将红军主力分散为小部队，认为在必要时，可以「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故此，１９３６年斯诺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到的，外界曾多次谣传毛泽东「已经死亡」，并非空穴来风。

发生在「六四」后大搜捕的期间，我（陈小雅女士）还在建国门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内的政治学所上班。在一周两次的「返所日」，我和同事们在一起议论的一话题经常是：「听说谁谁谁逃走了」，「听说谁谁谁被捕了」，「听说谁谁谁出卖了谁」……一天，有人说：「柴玲被捕了。」但过了几天，又听说：「柴玲已经出去了。」对于这些谣传的信息，我们当时都没有当真，不过是一听罢了。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听有人说：「王超华被捕了。」我们仍姑妄听之。但不久，又有消息传来：「王超华已经出去了!」我们已经知道，解救柴玲、王超华等的「港支联」，实际上是「六四」后「反」出去的中共地下党的老班底，它完全有可能借鉴共产党的地下斗争经验；我们也知道，国民党的特工艺术，极大的得力于共产党。而中共的特工与地下斗争经验，又直接来自苏联的「契卡」。

早年「偷渡」成功的周恩来喜不自胜。据说他一落定便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大赞「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不仅如此，他还召集省委、省苏维埃和县委的领导人开会，报告一作就是「８个小时」……。到达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在「胜利冲昏头脑」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将此作为一段「佳话」告知过旁人，但由于根本不是事实，旁人「游戏」听之，转眼就被忘记。但记忆力惊人的毛泽东未必会忘记：「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这至少说明，直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也就是说正是周恩来到达苏区之时所讲的「佳话」才正是张冲等人制造「伍豪启事」的根本信息来源，而这正好也符合当时自然条件下的信息传播速度：「国民党谣言不攻自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失去了「时效性」——它是在周恩来出现在苏区两个月之后才刊登的。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在「出事地点」，这项「栽赃」就不能成立。但是，在「六四」后大搜捕期间的两则故事启示我们：如果当日柴玲或王超华「被捕」的谣言，按照自然传播的速度扩散的话，它从出事地点到京城，肯定已成了「马后炮」。考虑到３０年代信息传播手段的落后，一个「谣言」从广东东北部或福建西南部或江西东南部的崇山峻岭传到上海或南

京，「两个月」恐怕也不为多。

唯有一点不同的是，笔者认为记忆力也同样超人的周恩来对于此事也是心知肚明，因此才一直不敢签字，唯恐「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但是周恩来对于９月２０日这次手术之后是否还能够走下手术台无法确定，因此才命赵炜拿出此材料签字，犹如临终遗言般。

而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才是周恩来叛徒情结的根本来源，也正是如此，周恩来才有「哑巴吃黄连」的苦衷。

１９７２年的8月4日，周恩来指示：对于敌人污蔑我的材料，也要登参考清样，供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参阅，不应封锁。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周恩来也自作自受，好比人家打了右脸，然后把左脸也贴上去，没有打够吧。但是周是有心说，别人是有意做，本来周瑜打黄盖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现在成了一个是真心打，另一个也确实痛在心上。

相对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可以说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了毛。１９７５年夏，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的时候，同护士闲谈时问道：「你看我还能不能再活一年？」这话传到周秉建耳朵里。周秉建打电话给周恩来：「伯伯你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我们怎么能够离开您！」周恩来对此批评：「你怎么能对我有这种感情？我们只能对毛主席才能源头这种感情，没有我谁都可以代替，我们谁都离不开毛主席！」

第四章 周恩来在中央项目组中的作用

在文革中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各种群众组织举行的规模宏大的批斗大会，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比起现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项目组(亦称中央项目审查小组或中央项目小组)所实施的法西斯行为，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中央项目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其结构和运作迄今还很少见诸公开出版物。杨成武的回忆揭开冰山一角，领导杨成武搞项目的是周恩来。　实际上，整个中央项目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当然，江青的作用和地位比较独特，因为江青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毛，所以周恩来对于江青非常迁就。以刘少奇项目为例，江青在此案上投入的精力最多、最大。但是就整个中央项目组的组织机构来说，周恩来毕竟还是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人，而且江青对于其它项目所投入的精力相对于刘少奇项目则少的多。整个项目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能否迎合组织的要求。无论早期的彭德怀项目还是文革期间的的刘少奇、贺龙等项目，都是依据中央项目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重要项目的最后仲裁完全取决于毛泽东。无论在项目迫害上还是保护解放老干部上，都是毛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具体执行的模式。

一、中央项目组的发端与演变

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意见可以在媒体上显著报道，而同样是１９６６年５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项目组却是秘密的，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媒体上。在中央项目组存在的１３年时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也远远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项目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

中央项目组发端于项目审查委员会。　　而项目审查委员会来源于文革之初成立的一个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临时机构。在刘少奇主持的１９６６年的５月２０号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审查小组（王力称之为四个人谈话委员会），罗瑞卿由军委处理，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总负责并且直接担任项目委员会下的彭真项目组的组长。中央的项目审查委员会和军委的审查工作都是由周恩来做统一布置，例如召开项目会议等等。其它各个小组的情况是：陈伯达负责陆定一项目，康生负责杨尚昆项目，安子文负责田家英项目。陈伯达主管陆定一，后来转给陶铸继而是谢富治接手。　　田家英自杀后，在这个临时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项目审查委员会（实际是向毛泽东负责），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组，项目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　　随着文革的深入，此项目机构不仅对所谓的「四大家族」——彭、罗、陆、杨做调查，而且对其他的众多人员做调查。　　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项目委员会更名为中央项目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

自１９６７年２月起，中央项目组的成员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相差无几。　　中央项目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义上都是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人员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实际上都是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是公开的，而中央项目组是秘密的，而后者直接掌握超过国家公检法的权力，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不具备公检法的权力，但是也可以作出逮捕、关押某人的权力。这充分体现了某种体制特色。例如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各部造反派代表时就可以当场宣布逮捕财政部的某副部长。至于此时的周恩来是以何种身份下的命令，就很值得玩味。最重要的是，中央项目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起源、发展至结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间，中央项目组织同国务院一样成为常设组织，但是更有权力。中央项目组的具体工作是由谢富治和汪东兴负责，但是康生、江青觉得需要加强项目组骨干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从部队调人进入项目组工作，于是大量军队人员被调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后项目组工作人员多达数千人，其中一度有７８９位来自解放军的官员，１２６位解放军军官担任项目委员会下属的项目小组正副组长职务。

在１９６７年的秋天，项目委员会极度扩张，调查的案子数量大大增加，由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项目组」就已经分成了至少三个小组，处理所有与罗有牵连的

案子。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项目委员会分成两个办公室，就是后来俗称的「一办」和「二办」。「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即任主任），下属多个项目组：例如彭真项目组、陆定一项目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项目组、利瓦伊汉项目组等，以及后来成立的刘少奇项目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项目组等，此项目组主要负责对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项目审查。「二办」和中央军委挂钩，由杨成武负责，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主要负责军队内部系统的高级将领的项目审查。　　例如彭德怀项目、罗瑞卿项目以及后来成立的贺龙项目等。

以贺龙项目组为例，该案为主案祖，下面设１７个分案组，计有：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项目组」、工程兵的「谭友林项目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缨项目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项目组」等。

１９６８年，「三办」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领导干部的项目，三办的主任是谢富治。但是「三办」开始成立的直接目的却是调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三办」后来也处理许多其它的案子，例如「抓叛徒项目组」。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涉案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拷打下招认存在一个由朱德领导的中共的秘密「影子」，与国民党、与苏共、与蒙古共产党有联系。　　还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苏枚的「谋杀案」（法医的证据认为是自杀），此案导致９９人遭迫害，其中９人入狱，２３人被软禁，３人被逼疯，２人死于审讯者之手。

文革期间，为中央项目组服务，成为许多党、政、军机关的重点任务。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中央项目组下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央敌伪档案清查组，而且在北京以外的１８个城市由常设的分支专门就嫌疑人的政治历史提供信息。　　１９６８年8月，谢富治下令清理公安部的全部档案，为此解放军抽调了７００多人，花了１８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

中央政治局曾一度考虑撤销中央项目组，就像「九大」以后撤销中央文革小组一样，但是到了１９６９年，中央项目组变得太有用处而无法轻易撤销。　　１９７０年，它又负责「审查」陈伯达的项目，一年后又有了林彪项目。１９７５年，中央曾经设想尽快结束项目，中央项目一办、三办和「五?一六」项目组随即撤销。　　但是最终撤销中央项目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这一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为毛以后的领导人处理「四人帮」项目。

二、周恩来是中央项目组的实际负责人

周恩来主持中央项目组的工作会议，参与其所有的立案调查活动，给予指示，批阅下面调查小组所提出的报告，并报告毛泽东。　　对外界来说，周恩来同中央项目组的关系并不明朗。　　但是在很多回忆录中，仍然不免露出些蛛丝马迹。李锐曾经这样回忆：１９６７年８月间，北京项目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项目组长是周恩来。　　曾任中共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回忆说：项目组的人员告诉他，武光项目组是在周恩来和康生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受到批判，无法继续工作，邓小平把工作移交给康生，但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引述戚本禹的话表明，项目组的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实际上，此项目委员会及以后的中央项目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实际上，决定成立什么项目组、由谁分管、选派项目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例如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８日，一张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深切关注。传单批评了毛泽东、林彪等，唯一对周恩来提出了表扬。周恩来接到此传单后立即转交给毛泽东。１０月１０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传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破案。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并指定陈伯达负责，谢富治和吴法宪参加。

由于中央项目组的极度扩张，从部队抽调了一大批人员充实到项目组工作。所有的抽调人员在北京集合后，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开会，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并布置工作。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项目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项目组依次汇报工作。

为了配合中央项目组的工作，１９６７年春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干部项目组，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属一个项目审查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汪东兴、戚本禹、严佑民、肖孟任副主任。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则由严、肖二人负责。

对于中央项目组的工作，周恩来规定甚严。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写上「已阅」、「请周总理批示」，签上自己的名字，才予以发出。在中央项目组内部，对有关项目的材料，不论是下属各组上报的，还是中央项目小组成员及其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至于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压。

对于调查工作中需要查阅档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来最后决定是否可以。当事人回忆：１９６８年6月８日，我呈送了上任后的第一份报告：

永胜、法宪、叶群、作鹏同志：

为全面审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的历史，需向中组部借阅邓的档案。

是否可以，请批示！

黄永胜阅后划了个圈，在报告的天头批：「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批示。」

陈、江、康等均划圈同意。五天后报告从周恩来办公室批转回来，右下角几行饱满的钢笔字：「同意。但目前在江青处，过几天后再办。周恩来。六月二十三日。」

由此可以断定，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关于黄永胜对彭德怀项目的报告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高达８８位中央委员因为「叛徒」或者「特务」等罪被中央项目组立案调查。　每个项目组下设很多分组，这些小组曾经一度调查过１２６２位主要案犯和数目不详的相关案犯。　把这些罪行统统都扣在康生的头上是不公正的。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４日，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专门召开中央项目组会议。贺龙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性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的人物，许光达则是「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对于所有中央项目组的项目对象的定性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最后敲定。　对于周恩来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专门提出表扬：「项目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项目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

在「九?一三」之后，中央项目组重组，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３号发出通知，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项目组。　而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众多人员锒铛入狱，并无实质性的犯罪行为，当然这都是周恩来主持的「林陈反党集团」项目组的「杰作」和「功劳」。

根据毛泽东决定尽快结束项目审查的意见，１９７５年２月底至３月初，卧病在床的周恩来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尽快结束项目审查。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它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　许多官方文章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后期解放了许多被项目组审查的老干部一事津津乐道，也有的拿出对周恩来有利的只言词组作为证据，例如《周恩来年谱》记录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９日就项目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然而这种证据所能证明的只是周恩来在中央项目组的地位。后期的干部解放即使是周恩来的功劳，那么周恩来也应当为项目组的倒行逆施负责！审查所谓「林彪集团」的项目审查是由周恩来总负责，同样，审查刘少奇等人的工作也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整个文革时期，整个项目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２００万个各级干部。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７５％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１亿人。　涉及面如此之广的最重要原因是周恩来授权群众组织可以自己成立项目组。详见下述。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项目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项目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不可否认，康生和江青有私欲的一面，但是周恩来对「五?一六」的穷追不舍，不也是私欲吗？更主要的方面则是，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战斗的团体，都在为中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毛本人或者为毛的路线）工作，要对中央项目组所犯下的包括审讯、调查、逮捕和实施众多法西斯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所有提交给毛泽东的要求立案调查的人员名单，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项目组会议上预先讨论通过，也包含了周恩来对于众多项目组所提交报告的评语以及项目组所讨论通过的结论，这些评语和结论无一不是令人发指、怵目惊心。如果将周恩来在毛泽

东指示下所保护的部分人的工作同其领导下的整个中央项目组所迫害的老干部对比，周恩来的保护无疑是黯然失色，微不足道的。

实际上，任何项目组的项目对象，群众组织提出批斗，都必须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对谭震林在「二月逆流」之前一直是保护有加。但是「二月逆流」之后，不少群众组织提出「炮轰谭震林。」首先是３月１４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定。　５月份，农林口的造反派提出要批斗谭震林。６月１３日，周恩来批示可以批斗谭震林。　蒯大富被采访时就陈述当年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这次批斗，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

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诬陷薄一波是叛徒。不过，在薄一波因长期「监护」身体衰弱、危及生命时，周恩来指示将他送进医院保护起来，救了他一命。以至后来薄一波说，如果没有周的关怀，他也许早已被迫害死了。　知情人讲述，文革中被打倒的将帅能否入医院治疗，甚至是否可以开刀，都要经周亲自批示。知情人亦讲述了陈毅在治疗上的失误应由周恩来负责。可以说，相对于薄一波的幸运，周恩来制造了更多的不幸。

三、红卫兵是周恩来抓叛徒的「冲锋队」

在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直接授权于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项目组服务。　除此之外，周恩来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　而红卫兵也在报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１９６７）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它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　知情人讲述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八一八」还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得到指导，周恩来则写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点。

周恩来对于南开「卫东」红卫兵组织多次给予指示和鼓励。对于刘锡五「叛徒」一案，周恩来和康生的指示是：红卫兵找刘锡五谈，叫他谈，老老实实的谈，知道多少就谈多少。１９６７年7月，周恩来和江青指示天津市革命筹备小组要大力支持卫东某项目的调查。周恩来还亲自对卫东的工作做出具体批示：「此线索很重要，要继续搞下去。」

全国到处掀起的「揪叛徒」之风很难说与周恩来的这种鼓动和支持没有关系。由群众组织任意推倒中共组织对在白区工作过、被捕过的干部作出的正确结论，重新审查，甚至刑讯逼供。而对于这种「揪叛徒」之风，现在都归到康生一个人头上。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聂元梓说：「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是只说，北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与聂元梓在同

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

对此，周恩来的态度不是一般的欣赏。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在第一次揪彭德怀未果之后，周恩来则直接指示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在外交部，周恩来指示：要结合批判刘少奇，把外交部干部的历史问题查清。根据此指示，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成立了一个红色尖兵四连（简称「红四连」），专门负责抓叛徒。干部司的审干处配合了此项工作，把其掌握的干部材料提供给「红四连」开展抓叛徒的运动。１９６７年9月，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汉夫就被当作叛徒被拘捕审查。

四、项目组的证据与周恩来的指导

项目组的调查取证和定性是根据当时的需求，特别是可以随意更改。例如蒋南翔在文革之初所犯的罪行就有反对刘少奇的工作，而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号谈蒋南翔问题的时候又明确表示蒋南翔在文革前是极力吹捧刘少奇。　　周恩来在「七二〇」事件之后为了表示对王力的特殊照顾和欢迎，特意告知早到北京上空的王力乘坐的专机盘旋以待周恩来专机先行降落，然后在机场组织欢迎王力的仪式，一如迎接英雄凯旋，但是后来周恩来却表示王力是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而且扣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头子的罪名。

中央项目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作为负责向毛泽东汇报项目工作的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不真实性。　　周恩来对下面项目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应是知之甚详的，因为每天项目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周恩来等领导人。　面对如此众多有疑点而且是通过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和证据，是不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的，但是周恩来对此熟视无睹。例如在《刘少奇项目组》中，面对如此破绽百出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如此为周恩来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项目组的报告」。　周恩来的判断力也未免太低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陈伯达项目组给出的有关陈伯达罪行材料的证明，当时仅为一个普通工人的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都看出其材料是经不起推敲的，何况周恩来了！　　作为一度是毛泽东上级的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再也没有在毛泽东面前直起过那根脊梁骨，对于毛要打倒的人，他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

高默波对此质疑评论道：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项目组，包括刘少奇项目组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项目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项目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送报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

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否则的话，周恩来可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刘少奇。他可以把反证材料送给毛泽东。他也可以要求在项目组人员提出更可信的证据以前不下结论。他甚至可以用手续不全，证据不充份或方法不对头为由把刘的项目调查停下来。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说，刘少奇有路线错误可以打倒，但说他是叛徒，内奸和工贼是捏造。如果周恩来这么做，他当然有冒犯毛泽东的危险。但不论从良心上来说还是从中共的利益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应该冒的。」

周恩来还把成立项目权下放给造反派。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夺权兴起之后，周恩来曾经这样说：「黑材料要集中起来，搞个目录，以后集中烧毁。处理材料问题还没有一个好的典型，为黑材料争论不休，费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夺权以后，可以找几个人成立专案处理，处理材料是极其复杂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来，中央决定嘛！现在夺权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这里边去，否则就成了文牍主义了，只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价值的材料才拿出来。不钻在材料里把大方向转移了。毛主席过去受打击，现在事情都清楚，至于过去，谁说了什么话，谁搞了什么材料，主席才不管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纸只字中，妨碍了大方向。虽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几个人搞项目，不要都陷在这里，档案不可没有，不可太多。」　此举为各造反派成立项目审查、迫害对立面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在谈及卫生部孙正项目的时候，指出：（１）孙正项目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罪状的落实主要是看情节，例如叫嚷「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这句话就可以斗他。（２）定案，要说得准，很清楚。要稳准狠。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

周恩来所说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单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够给刘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够满足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项目组（同时周恩来也是刘少奇项目组组长）不得不另行谋策并最终提供了证据。依靠这些证据，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题名「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发〔６８〕１５２号、中发〔６８〕１５５号文件，下达全党、全国。同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周恩来在１９６９年「九大」期间以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证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来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官方强调的周恩来内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强调的他是为了服从大局。这些说法都无法为周恩来洗脱罪名。周恩来的内心无人知道，但是客观的所作所为都已经被历史无情地记录下来。

第五章 「周恩来保人」的真相

在中共官方的文革史中、在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中都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保人」的，保护了大量的干部和群众，而所有的迫害干部群众的坏事都是「林彪、四人帮」干的。甚至有人认为即使毛泽东要「打倒」的一些人，周恩来也总是加以保护。但是，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君主」与「臣仆」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毛泽东摧毁原一线工作的官僚机构上，也体现在毛泽东对于干部的保护与解放上。对于毛泽东要迫害的对象，周恩来是亲而为之，丝毫没有半点的怜悯。同时，在实施的过程中，周恩来也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从而留下了「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说法。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描述和分析「周恩来保人」的真相。在以下的几章里，我们将针对刘少奇、陈毅、彭德怀、贺龙的个案加以分析。

一、保护与解放老干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

在文革发动的早期，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同意，《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绝对不可能出台，但是没有周恩来的支持，该文就很难在大范围顺利转发。无论是１９６６年初批判彭真，还是9月份保护蒯大富那样的造反学生，１２月保护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在１９６７年的「二月逆流」主持对老干部的批判，以至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的整肃，毛、周的关系都是如此。

即：毛泽东是决定者，周恩来是执行者。

对于文革当中对于老干部的保护与解放，周恩来同毛泽东的关系也是如此。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５年，毛泽东谈话涉及到保护老干部的多达３５次。在「十大」选举前夕，毛泽东又亲自宣布解放包括曾希圣等１３名同级别干部。１９７５年3月至8月，毛泽东又批准几个项目组关押的老干部释放３５０人。

１９６７年2月6日，毛泽东提出徐向前、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等人都要保。依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两次写报告给周恩来，建议把叶飞、谭启龙、张平化等人接到北京。　2月8日，周恩来将报告转交给毛。毛批示同意后，周恩来采取措施，把江华等人用飞机接至北京。

更能体现周恩来在保人一事上的则是被大陆官方党史界所津津乐道的周恩来所开列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章士钊在１９６６年8月３０日致信毛泽东反映8月２９日

晚被抄家的情况，请求毛泽东帮助。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当即办理，并于八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在信封上批注：「已办。周注」。同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开列了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鲜为人知的则是，早在８月２７日，周恩来就已经收到到章士钊要求保护的信，但是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导致章在８月２９日被红卫兵抄家。　　从中完全可以看出周恩来在保人一事上的局限性，如果没有毛的首肯，周恩来是不可能有什么举措的。对于这一点，周恩来也是公开承认的。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９日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说：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月１１日，对于王任重问题，周恩来说：「王任重的病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主席命令我亲自打电话，要找王任重，有一些人还不相信，这样自由主义就泛滥到边缘了。王任重要是死了，主席找我，我怎么回答？……我这样说，并不是保王任重。如果传出去，有人又给我贴大字报，说我保王任重，那我也不怕。」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六小组会议上说：「我在这次运动中也没有经验，关键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讲了的，但有些人回去就是怕群众。不仅是部长，我还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来，当时黄火青、欧阳钦、谭启龙、江华、张平化、韦国清、杨尚奎、刘俊秀、叶飞、江渭清、张体学等不少人，叫他们自己反省错误。我有事不能去，叫谭震林、李先念同志找他们谈。在中南海，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他们在一起开会，军队方面有徐向前、聂荣臻，有情绪，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被抓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

王力说：「具体的人都还是毛主席决定要保的。有时是总理出面，有时是别人出面，总理出面的比较多。都打倒了，毛主席也不高兴。有些人一定要保，包括几位副总理。当时决定不保的只是一个薄一波，其它都要保。元帅中只有一个贺龙不保。（指１９６７年初的情况－笔者注）。」王力还说：「当时保护军事机关不许乱冲击，有些人中央要保，不光保邱会作，到处去保。凡是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受到冲击，无一不去保。中央文革也去保，这是毛主席定的。」王力由说：「打倒人的罪状都归于毛泽东，保人的功劳都归周总理，这不符合历史。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１９６７年7月１８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赵紫阳、张平化、刘子厚、张体学……都要保。都给打倒了，打倒那么多，我也不高兴。」

文革中后期，老干部的解放也是毛泽东决定后，由周恩来去执行的。刘志坚的解放就是因为先由许世友提起，毛泽东点头。而解放刘志坚的工作由周恩来来做。在国庆２５周年之前，即１９７４年9月２８日，中央政治局对出席国庆招待会名单进行讨论时，周恩来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刘志坚一人。」　　洪学智也是因为毛泽东向周恩来发问：「洪学智现在搞到哪里去了？」才导致洪学智自农场解放出来。　　类似的情况还有张闻天、江渭清等人。

二、周恩来的保人特色面面观

１．黑帮、黑线

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８月份讨论《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用词，加写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文。周恩来又在９月１０日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说：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党政机关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是黑帮、黑线、保皇派。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

这不是历史的事实。周恩来在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黑帮」、「黑线」满口飞。试举几例，８月２２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说：我上次讲了，因为前市委由黑帮统治着北京市各个部门、各个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初期很迅速地采取的办法。那么，我们的办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派出工作组，把黑帮的或者怀疑是黑帮的，或者怀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分子的权夺过来。　　１０月３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周恩来说：「黑帮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集团，搞阴谋活动，像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彭真、刘仁在全国总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的性质，而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种可能大。」周恩来又说：「被批判的领导，要敢于接受批评，对的就接受，不能模棱两可。群众问是不是革命的，是不是黑帮，你要回答。有人说：『你去调查好了!』连是不是黑帮、是不是革命的你都不敢回答，这样群众就更怀疑了。这个你要回答。你的行动作的对不对，要由群众来鉴定。有错误就承认，是黑帮就低头。」

２．廖承志的个例和周恩来对「亲者」的抛弃

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周为了保廖，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倒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香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　宋永毅先生对此评论道：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为贵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

事实上上方方（是原南方局时期直接领导的南委负责人）和廖承志都和周恩来有着密切的联系，唯一不同的是廖承志和周恩来具有非血缘关系的家庭世交，而且其母何香凝更是中共重要的统战对象。如果考察文革中被周恩来点名「抛出」的人，很多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有的甚至长达几十年。有据可查的就有：国家体委荣高棠、外交部陈家康、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学部的潘梓年、亲自下令逮捕卫士长成元功、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人。

周恩来在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有过一个精彩的讲话：

总理说：关于抓「五?一六」问题，我过去讲过四条意见：

第二条，如果发现哪个组织有坏人、有黑手，就告诉那个组织，由那个组织自己抓。农口如秦化龙问题是我第一个告诉他们的。批判谭振林时结合秦化龙，不仅是「五?一六」还是叛徒，就跟他们讲了，经委陈大伦，骆风，经济研究的编辑骆风，民族所洪涛，统战部刘郢，他们都是本组织揪出来的，知道有黑手就告诉他。

第四条，吴传启，他目的是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是国民党，从十一月份搞了我的黑材料，我都不看。我看他怎么暴露。潘梓年是个叛徒。反对派接见时，那一派问我，我没明确说，让他暴露，我要说的话，就切断联系了。他们抱得紧紧的，一个跑到江苏太湖，一个跑到山西河北交界地方。

在卫生系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

周恩来还说过：

农口的批谭联络站原来保秦化龙，我提醒了他们，他们后来把秦化龙扭送了。一追查是「五?一六」的头子之一。对刘郢、×涛、骆风、陈大伦也是同样的办法。这个办法很好，不伤害群众彼此的感情。

周恩来在大会上或者接见群众组织等各种场合时点名的有，上至国家主席、党、政、军干部下至普通百姓，依笔者所见到资料，有据可查的超过２００多人，材料表明周恩来点名的人数远远超过康生、江青等人。（笔者注：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时，经常点名，被点名者往往没有好下场。笔者所看到的资料包括有：除了常见的例如有宋永毅主编的１１２卷红卫兵报刊以及《周恩来文革讲话集（１９６６－１９７６）等，还有不常见的周良霄夫妇编辑的文革数据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汇编》等，特别要提到的是由洛杉矶「中文出版社服务中心」《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我通过加州大学图书馆的「贷书」功能借阅，几乎把全套都借全了。此套数据非常珍贵和稀缺。）被周恩来点名的人几乎全部遭到厄运（有的是遭到厄运之后被点名，有的是被周恩来点名之后遭到厄运），有的还被折磨致死，例如上述的被周恩来点名之后的卫生部一老中医叶心清（曾为他和许多贵宾看过病）被他斥为「江湖医生」、「五?一六」，抓进监狱后折磨致死。

３．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

丁凯文先生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对党内的老干部的态度基本上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例如在文革刚刚开始时，刘邓等人尚未彻底倒台时，毛泽东只是先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党内斗争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彭罗陆杨」几个人身上。对于这些已被打倒的人，周恩来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时谈到彭真，周说「他长期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更主要的是他是两面派……从现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个反党、反毛主席的分子。」１１月２８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会上谈及文艺团体时说「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７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陆定一时说陆「三二年就叛变了，也是叛徒。」

陆定一随后被关进秦城监狱。陆定一后来曾痛苦地回忆了自己的这段经历，陆说「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９日这天，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九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

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　从陆定一的这段回忆，我们丝毫看不到周恩来「大树参天护英华」的「光辉」形象。

余秋里是毛点名搞小计委的。由此周恩来对余秋里的态度是不同的。与余秋里相对应的是薄一波，而薄是被认为刘少奇在线的。周恩来采取了保余秋里拉薄一波来当替死鬼的策略。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９日，戚本禹、余秋里接见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时，戚本禹宣读了陈伯达的一封信：

同学们：

同学们发现石油展览馆的布置有政治问题是对的，我赞成你们的意见。我本来打算同余秋里同志来会见你们，因为我有事情不能来，特请戚本禹，余秋里两同志来给同学们说明展览馆布置的责任问题。据我了解责任不在石油部，而在工交口陶鲁笳同志，要陶鲁笳检讨。谨此问好。

王力说，这是周总理参加决定的方针，保余秋里，保石油部，抛出薄一波、陶鲁笳。

１９６７年1月２６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时这样讲述余秋里和薄一波：「批判薄一波、陶鲁笳的斗争至今没有展开，学校将薄一波抓回来后没有示众，都斗争薄一波，但不揭发，薄一波领导财经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么多人批判，为什么现在批判不起来？抓彭、陆、罗、杨不怎么困难，为什么抓薄一波那么困难？今天工交口都在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几年，工交口成立党委，管各部党组，党委，部长。管得很深，为什么各部揭发得很少？」「余秋里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性质与薄一波不同。他认识是诚恳的，检讨六次，心脏病复发现在还没好，我们需要他，党中央需要他，他是从小当兵起来的，你们看身上伤就知道了。他不是吃老本，靠老资格，这几年有新的创造，是部长，委主任一级的标兵，主席几次都要保。你们那天把他揪到中南海门口，那时我们有几件急事，我报告了主席，主席再次提出要保余秋里。我不是拿主席压你们，我保这个，保那个，那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不是个人行动，向你们说清楚。对薄一波恨不起来，也许是我们下的功夫不够，所以我们准备把部长集中起来背靠背揭发。

薄一波写信质问党中央说他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为什么把他揪回来，别的人还没有向党中央写过这样的信。」

另外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武光和王恩茂的例子。

当时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武光，新疆的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中著名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都认定他是革命干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武光是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１９６７年3月２１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３月２６日，周恩来就认定武光是坏人。武光参与了石河子的武斗事件，

居心不良。　　武光随后受到批斗，是当地的红卫兵把武光将他救出新疆，送到北京，继而武光迁入北航校内受到保护。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项目组为了打倒刘少奇的需要，炮制「刘仁与武光将王光美打入我军调部」冤案，把武光定为「叛徒」，在周恩来和康生的严令下，北航红旗也不得不乖乖交出武光并立即与之「划清界限」。　１１月２２日，周恩来下令一监护的名义逮捕武光。　从此武光受尽了折磨，「林彪事件」之后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直到文革结束。

而另一位新疆领导人王恩茂（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新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红卫兵都坚决要打倒他，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就再三给造反派做工作，宣称王恩茂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将他安排为副主任。但是新疆造反派仍然要想打倒他，自治区革委会甚至发起批判王恩茂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问题。中共「九大」前夕，１９６９年1月１２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为中央起草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电报，明确指示：「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内。……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经毛泽东批准，王恩茂全家由专机接往北京，他被安排出席中共「九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４．点点滴滴

如果说因为毛泽东的脸色，还有点组织性为周恩来辩解的话，那么另外一些活生生的案例更能体现出周恩来本质。

早在建国不久后发生的「潘汉年反革命事件」，周恩来对应潘汉年的所谓历史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并没有为潘汉年说话，只有李克农孤军作战。

同样，在１９６７年发生在外交部的所谓「失密事件」，周恩来也是知道这是当时中央文革和外交部之间的工作联系，也没有查出什么幕后活动。但是到而来清查「「五?一六」」时，此事却变成了大案，是阴谋策划，泄露国家机密，为帝、修、反送情报，逼有关人员承认是「「五?一六」」分子。因为清查「「五?一六」」分子而受到迫害的马继森、黄祖辕等人写信给周，都是石沉大海。

有幸得到周恩来关注的原外交部干部陈让山，在得知陈是因为说：毛主席被坏人包围，江青是个小电影演员，陈伯达当个县委书记也不够格等条罪状被迫害之后，就哑口无声了。

作为贺龙在线的许光达，在经历了极其残忍的折磨批斗之后，要求周恩来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信是传到了周恩来的手里，但是至死都没有人来同许光达谈话。

当事人回忆罗瑞卿自杀的情况时说：我到时大致十一点多，十二点罗瑞卿跳楼了，我正在现场。唉！罗瑞卿是中午正十二点跳下来的，他住的是一个楼，有三层，那个时候，他日夜睡不着觉。他把衣服脱到二楼，从三楼往下跳的时候就穿了一个衬衣跳下去。他是直着跳下来的，就是站着跳下来的，腿一下子就完了。最后我们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就往屋里抬，把罗瑞卿抬进屋里去，然后一层一层报告，向军委报告，向中央报告，你得治呀，还得请示批准，上哪个医院，一直拖了四个小时没人管。跳下去四个小时没人管啊！这几件事，我现在

想起来，真难受啊。我就想到，咱们的国家怎么这样呢，罗瑞卿这样一个元勋怎么受到这样的待遇，遭受这样的结果呢。

无独有偶的是，贺龙在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时候，据知情人讲述，也是报告很快送到周恩来手里，但是迟迟没有回音。

如果是小人物，或者是坏蛋，周恩来就连理都不理了。聂绀弩被捕之后，其妻周颖多次致信周恩来要求探监，却丝毫没有回音。

三、假象或隐情

张爱萍之子张胜说：「说到我父亲和周恩来的关系，『文革』中，父亲被批判、被审查、被关押，都有周恩来的签字，他在绝望中，曾几次给周恩来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但不知为什么，和党内很多老同志一样，父亲心里一直认为，在中央高层，只有周恩来才是了解他的，他没有能为自己说话，那是他确实有了难处。他真的不怪他，只能是自己认命了。在『文革』被打人死牢最绝望的时刻，他想到周恩来，党内还有一个清廉正直的人在，就会在心中残留下一丝希冀，即使那只是一种幻觉。」

为什么很多人对周恩来抱有这种幻觉？

陈伯达回忆：（找毛，毛不见）因觉得康生和毛主席关系比较好，又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康生，想请他帮忙疏通一下。康生不接。要曹轶欧接，她也不接。当我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恩来同志的秘书我稍等。不一会儿，恩来同志来接电话了。他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缓和，汪东兴把那个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他说话的口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然而事实上，此语录是周恩来从吴法宪手里要去，再给毛的。　　在周恩来安慰陈伯达的时候，周正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对陈伯达下手呢！周恩来曾经点评林彪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现在看来，此话对于周恩来才是最适合不过，也恰恰是绝妙的讽刺。

１９６２年北戴河会议上习仲勋因为《刘志丹》小说被批判。习仲勋回忆说：「我正在陷入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亲切的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继续说：「这包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诚心而论，作为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是周恩来手底下工作时间近十年、可依赖的工作人员。周恩来处了这几句不痛不痒、貌似关心、但丝毫没有丧失革命立场的「外交辞令」之外，丝毫无意为习仲勋去洗脱罪名或者辩护。

但是想象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被中共这个天下最无情最势利的绞肉机所绞杀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你前一天多有权势，一旦被打倒，则是鬼都不上门，恍如刹那间掉进了冰窟去，到处只见一片白眼，冤枉挨整也是哭诉无门。例如彭真一倒霉，押送其回京的李雪峰和宋任穷一路上「无话可讲。」　　甚至昨天还是「亲密战友」，今天翻脸便是生死大仇，以便体现坚

定的革命立场。

正是这种无比残酷无情险恶的政治环境，反衬出了周难得的「人情味」。周恩来一面在会上跟着赢家痛打落水狗，过后又打电话或接电话，轻描淡写地宽慰两句受害人。也正如王光美说的：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在刘少奇、王光美项目组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批示「应予判刑」。　　周正是这样，一方面对周围同事总是表现出充满人情味的温情，往往关怀备至，似乎通情达理；另一方面，他对毛又是无条件的忠实，当任何个人与毛发生冲突时，他均会不问是非的站在毛的一边，非常熟练的对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处置。

由此可以理解张爱萍、陈伯达、习仲勋的认识，或者他们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或者是他们也有说不出口的隐情。

第六章 刘少奇的冤案与周的参与

毛泽东无意在文革之初就打倒周恩来，而是利用周恩来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使周恩来称为自己手中倒刘的利剑。建国之后，周恩来一直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打压、排挤。另一方面，毛泽东要「烧」一下周恩来的策略又促使周恩来附和毛泽东展开打倒刘的战役。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明明清楚刘少奇的历史、明明知道刘少奇一案是冤案、假案，根本不会为刘少奇辩诬的原因之一。

一、支持毛把刘少奇拉下马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排名第二降到了第八，失去原有的接班人地位。林彪上升的第二位，成为新的接班人。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对毛、林的决定性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当毛没有表示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并作出种种承诺时，周恩来也是跟着表态，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毛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但一旦成立刘的项目，周则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并出任「刘少奇项目审查小组」组长一职，为整倒刘少奇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此间周恩来的种种行为完全是周忠于毛氏文革路线的明证。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刘少奇和毛泽东当面争执。李雪峰回忆：两位党的领袖为派工作组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在场的人谁都不敢吭声，感到惊心动魄。

当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知刘少奇不要再出面会见外宾。　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被拿掉，但是毛泽东说：要保刘少奇过关。

根据毛泽东意见，刘少奇按照毛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了检讨。９月１４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提纲批示到：「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同时毛泽东建议刘少奇把检讨送给政治局、书记处等同志讨论。刘少奇当日把毛的批示和检讨提纲送给周恩来。刘少奇致信周恩来告知毛的意见并提出「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周恩来向毛请示之后，将刘少奇的检讨稿批送有关人员提意见。周恩来本人并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１０月２３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检讨。

就在这次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并且在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表态说：「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解决。」　周恩来在此前后也是多次禁止把刘少奇的事情公开化。１０月１２日，周恩来就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发「请帖」名义要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事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１０月１９日，周恩来约陶铸、童小鹏、周荣鑫等谈话，布置劝阻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此日，周恩来又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并派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不要召开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

在１２月１８日以前，毛泽东在此时表现出来的还是：对于刘少奇的问题要在党内解决。毛泽东还派陈伯达去制止北大公开张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江青在１２月１８日回答红卫兵一司关于刘少奇问题时表示：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的问题，中央可以解决。但是江青同时表示原因是：「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　事实上也是如此，就在１２月１５－１８日之间，王光美项目组成立。

而在１２月２７日前几天，毛泽东表示：对刘少奇可以公开批判，但是要背对背，不能面对面的斗争。　１２月３１日，周恩来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谈话。指出：主席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你们可以把你们要问的问题提纲给我，让她回答问题。　针对有人提出刘少奇的问题是属于敌我矛盾，说：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因此当1月初，北京建工学院两派红卫兵要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毛泽东批告周恩来：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作些工作。周恩来在7日凌晨找该校两派谈话，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此事表明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指示是完全加以执行的！即可以公开批判，可以贴大字报了，但是不能面对面的斗争。

1月6日，周恩来得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后，立即派秘书孙岳赶至清华大学要回王光美，并打电话催蒯大富放人。7日，周恩来接见七机部造反派时批评骗揪王光美行动：斗王光美不仅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后，要看一段时间，不要扩大这个问题，这是毛主席、政治局的意见。

实际上如果没有周恩来的点头，公开批判王光美，面对面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王广宇回忆：１９６７年4月１０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清华园召开有３０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和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薄一波等人的大会。但是要用王光美出国时穿的衣服来侮辱

她，需要到王光美家里把衣服拿出来。然而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王广宇又说：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但是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群众的「要求」，即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但是周恩来为什么就不能坚持原则呢？当时保陈毅的时候，周恩来不是说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两下对比，相差远矣。

在１９６７年的1月１７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在谈话中提到刘少奇时，仍称「刘少奇同志」，并且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注：指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２月１２日至１８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也说，刘少奇在「九大」还是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因此在１９６７年1月8日，当有造反派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口号时，周恩来当即背过身去以示抗议，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方法。

对于这段时期的保护刘少奇的行动，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3月２１日对务院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解释说：「你们要揪刘少奇出来斗，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保，我对他有什么好感？你们要考虑我的地位嘛！」

二、协助毛把刘少奇置于死地

但是事情在１９６７年3月起了变化。3月２１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黄铮说：早在１９６６年8月１３日，康生让他的妻子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　笔者认为此领导人就是周恩来。这封揭发信在部分领导人之间作了传阅。　１９６７年3月２１日，周恩来、康生等人讨论了「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１９２７年叛党嫌疑问题」，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王光美项目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　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议论时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或会议记录。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事又归他管，所以事后他特地让工作人员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简短材料。这份材料中记载有：「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１９２５年在长沙被捕、１９２７年叛党嫌疑及１９２９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项目办公室调查研究。」康生亲笔在这份材料的下面注了一行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来、伯达、康生都看过。」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四人之中，只有周恩来对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是清楚的，可以说是当事人之一。上述的１９２７年叛党嫌疑及１９２９年在沈阳被捕等问题，周恩来更是清楚。

在中央项目审查小组公布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１９６８.１０.１８；中发〔６８〕１５５号）材料中认定刘少奇在１９２７年国民大革命的紧要关头，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工贼，破坏工人运动。报告列举的罪名其中有：使「干群脱节」，解散工人纠察队，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以及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变勾当」。

然而，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是当时中共为了消除湖南军阀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维护国共合作而作出的决定。此决定是在１９２７年的６月２８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常委紧急会议上作出的。　　作为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仅仅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周恩来不仅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和张太雷一起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等问题时，只交出部分破旧枪支，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隐蔽、钉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军队里。　　至于调走武汉工会骨干，根据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利瓦伊汉等人在１９６８年2月２７日证明，２７年6月初，中共中央鉴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与蒋介石合流(历史上称之为-宁(南京)汉(武汉)合流)，的步骤逐渐明显，遂决定疏散各地集中在武汉的干部，刘少奇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转移. 隐蔽，有的派往贺龙、叶挺的部队，又新调一些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干部来坚持工作。　　根据《周恩来传》的记载，自五月十九日，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这段时间内，常委会议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一次. 处理各项紧急事务。六月三日，增选瞿秋白为常委。四日起，中央常委由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四人轮流值日。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六月下旬。　　对于这段时间中央关于湖北工会的工作部署，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的。

对于「「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变勾当」一事，周恩来也是非常清楚。１９２７年7月上旬刘少奇肺病复发，经中共中央批准离开武汉去庐山养病。7月下旬，时任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指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到庐山，将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通知刘少奇，要他有所准备，注意安全。

在中共中央公布的中央项目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号中发〔６８〕１５５号】材料中，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东北叛卖革命的罪证是一大罪状。

然而，当时的满洲省委对此事前后经过悉数报告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实际领导人的周恩来对于此事的来龙去脉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周恩来却丝毫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和说明。

１９２９年8月３１日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常委向中央报告刘少奇、孟用潜被捕经过。9月１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刘少奇、孟用潜被捕事件给满洲省委的信，指出刘少奇、孟用潜到满洲省委后的工作，「在精神上路线上迥然与前异，的确创造了满洲党之斗争的精神」；并分析了他们被捕的原因和应记取的教训，指示省委要「用全力去营救」刘少奇、孟用潜二人。　　9月中旬，奉天高等法院下判决书，刘少奇、孟用潜「煽动工潮」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孟用潜出狱当天，同临时常委派来的人见了面，并回到省委秘书处。9月１９日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常委写报告给中央，介绍刘少奇、孟用潜被捕情况，指出刘少奇、孟用潜被捕事在工作上虽然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的思想倾向方面，没有多大的影响。同时还介绍了奉天、抚顺、辽阳、哈尔滨以及其它各地党组织的情况。９月２１日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指出，「现时省委既已恢复，临委取消」。

在刘孟二人被捕后，省委即获得消息，派人了解事情的经过并积极设法营救。同时将刘孟被捕经过省委于８月３１号向中央作了报告，出狱后省委又向终于报告了两人出狱的经过。

而中央对此并无怀疑，因此很快覆信指示刘少奇继续担任满洲省委书记。　　作为中央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不仅亲自写过指示，而且应当对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都十分了解。然而恰恰相反，刘少奇在历史上的此条罪证是周恩来首先提出的。在中央项目审查小组会议上，作为总负责人，周恩来说：「刘少奇的简历上有时写：『１９３０年春，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有时又把『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几个字划掉，改成『在罢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说刘少奇是１９２９年被捕过，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细查一查。」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经毛泽东审阅的戚本禹的长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各报刊同时发表。此举标志着对刘少奇的批判完全公开化。

为了消除群众对此的疑惑，周恩来在４月６日，４月１４日，４月１８日连续向社会、群众解释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三次讲话的主题基本一致，中心思想是：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从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到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再到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八大」报告，刘少奇的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４月６日，周恩来说：「一九六三年的社教运动，考验了刘少奇，搞了个形『左』实『右』的后十条。到《二十三条》，对他失去了信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反对。从七大开始，每次斗争，都感到刘少奇没有多少马列主义水平，看他二十年了，到十一中全会，就决定了，刘少奇不能挽回了，他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难道你能说主席包庇刘少奇吗？问题是要逐步认识的。……对刘，邓的问题，也是逐步认识的。《清宫秘史》一九五零年就要批判，拖了十七年，今天才拿出来批判。现在，提出批判《清宫秘史》，是从抗日战争开始，批判《修养》，就要联系到抗日战争以前。」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８日，周恩来在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其中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周恩来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此讲话影响非常坏，后来周恩来自己也意识到。　　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也做了同样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刘少奇被批斗。对于这次批斗，当事人戚本禹说，「毛主席在

外地。」「周总理参与组织了，连夜召集的会。原来没有夫人陪斗，陈伯达加的，他的目的是要加上王光美」。　笔者对此说表示怀疑。但是沿用了官方多年的说法：周恩来「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在中南海中的许多领导人。」此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周恩来前往武汉的几天，不正是这些揪刘的造反派闹得最凶的几天么？怎么也没有冲进中南海？但是随之而来的８月５日批斗，周恩来确实是同意的。江青在１９７１年的华北会议上说：「六七年七月，主席出巡大江南北，七、八、九三个月，这些反革命他们就想在那个时候夺权，全部夺权。有什么为证？首先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北图事件，午门会议。午门会议就是布置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样的围困中南海，开始在西门，就出不去了，我就告诉总理说，不行了，北门走不了啦，然后又到新华门，那里挂了旗帜，也出不去。我们的意思是叫他们撤退。最后走东华门，那里也挂了三面旗帜。我给总理说，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我们上了大当，他们都安排好了，有一个人，这个人我看不惯他，眼珠子上下转的，是轻工学院的，给总理讲，提出要在天安门开十万人大会，在中南海里面斗刘少奇，总理答应了，我们也都同意了，给中南海拉了线。他们要斗刘少奇那个『黑修养』，目的是搞臭康老，因工作关系，那个『黑修养』，康老搞不出来，是陈伯达搞的。他们就是要搞康老，搞总理，过后我们才知道上了大当。」　事实上这种批斗，没有毛泽东的同意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更令人发指的是，周恩来在刘少奇项目组上的表现。

有文如下叙述：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７日，周恩来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

周恩来问：「那刘多荃没听过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周恩来生气地说：「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在周恩来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张春桥，由张春桥最后作了亲笔修改。当时连中央项目组也有人提出：１９３０年中共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１９２９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众所周知的是，作为中央项目组的一把手，刘少奇项目组的组长，所有的材料最后上报都是周恩来一手把关的。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这些材料根本上报不了。上面所述，不恰恰是在说明周恩来暗示他们材料应该怎么做才像模象样些？

王年一就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　为什么没送呢？

李锐先生曾多次向单少杰先生谈起他所亲历的一件事：大约在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４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引者）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

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最早揭露周恩来在「刘少奇项目组」的调查报告的批语的是《中国季刊》（１９６９年第３７期）。周批示到：此人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罪该致死。更有文证实八届十二中（一九六七年十月）前，周恩来就「刘少奇项目组」的调查报告，亲手批示「此人该杀」上呈毛泽东。此一笔迹也于八十年初，刘少奇案平反前后，由邓颖超出面，通过胡耀邦，抽出暗下销毁。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是在《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一文中引用了孙万国的材料，后来又表示他的文章引用过的史料－－－周恩来曾经批示：此人，指刘少奇，该杀，是比高文谦级别更高的人透露的，能够看到更多文件。　　而曾经是中央项目组成员的某位将军的儿子则明确表示周恩来的批示是「此人该杀」。　　金冲及后来亦表：有此事，大意如此，个别字可能不同。意指「此人该杀」实为「刘贼该杀」。

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还亲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报告，把刘少奇所谓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项目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如此众多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邓颖超深知这些数据一旦披露，就会极大地损害周恩来在世人心目中已经形成的那种正人君子的形象，于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销毁，并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后如愿以偿，迫使中央同意烧掉这些资料。可以说，邓颖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维护其夫君周恩来的形象。　　邓颖超此举是「千古留一骂名而去百名」，可谓神机妙算的绝世高招。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都是刘少奇项目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来的。在此过程中，周恩来绝对知道刘少奇的「罪证」有若干的疑点，许多材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刘少奇的叛变一事就是周恩来代表中央给刘做了解脱的。在政治需要与良知之间——周恩来毅然选择了政治需要。最后刘少奇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作为所有项目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送报毛泽东作最后首肯。然而现在官方的舆论都是一口咬定：整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林彪集团」，从来不涉及周恩来，既使涉及也是说周是违背良心，不得已而已。

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周恩来在刘少奇遭受迫害过程中的一些不齿行为，竟然被当错「善事」来加以漂白。

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说：「１９６８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成了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为什么故意把爸爸折磨病了以后，又要抢救呢？当时中办的负责人对医护、工作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党，给「九大」留活靶子!』谁都知道，对象爸爸这样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出生入死的考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共产党员，最大的摧残、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活着看到被开除党』了。……」

官方编撰的《周恩来一生》则说：１９６８年刘少奇病重，医护人员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下不愿意或者不敢去护理，周恩来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护理刘少奇。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而这个做到的一切的背后却是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在１９８６年出版的高皋、严家其所著《文革十年史》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然而就是因为这部分此书没有通过在出版前的审查！把一个已经瘫痪的老人绑在床上，是故意残忍的折磨，是虐待！更直观、具体，一看就懂。这种迫害已经远远超出对一个「罪犯」的惩罚，而是一种表态的心理满足！

陈伯达在刘少奇去世以后，曾经向周恩来问过刘的情况。周恩来说他后来不肯吃饭，就没有办法了。陈伯达还问刘少奇为什么不辩护？周恩来说外面的事，刘少奇什么都不知道，没有让他知道。　赤裸裸的谎言，实际上刘少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是充分配合治疗的。刘少奇也早给王光美说：「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　周恩来的说法无异于是说刘少奇是自杀的，是自绝于人民、党的。

文革结束后，一九七七年韩素音到北京访问邓颖超，问她：「我也曾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文章。他现在被平反了。当时我所得到的资料不正确。我该不该向刘少奇的太太王光美道歉？」

邓颖超回答：「你有什么错？你并没有反对他。你相信我们。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文件，也是周恩来签署的……我们需要为此行为道歉吗？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又非如此做不可……他不得不往大处着眼。」

是的，周恩来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也从来没有表示过。从后来周恩来的言行，却丝毫看不出周的问心无愧来，因为周只是担心后人在自己的脸上打叉叉而已。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来担任组长的「刘少奇项目组」为其「圆满完成任务」举行了酒宴。

第七章 周恩来「保陈毅」的真相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力保陈毅一事，是中共官方津津乐道的。

周恩来在文革初期与陈毅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战友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类似于刘少奇与彭真的关系。如果陈毅倒了，周恩来就失去了一面屏障。在经过前期的周恩来与康生的通力合作下的工作之后，借刘少奇出国之际，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一

举拿下彭真。当中央要派周恩来出国时，正值北外学生坚持要打倒陈毅之时，周恩来要陈毅替其出国。虽然此举未果，但是毛泽东此时也没有要打倒陈毅的想法。陈毅在文革之初对毛泽东的支持，使其安然渡过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在「大闹怀仁堂」中的出格表现，陈毅被毛泽东认为是无可救药的人。但是当时的情况决定了周恩来要死保陈毅，同时毛泽东对周也说要保，但是背地里又说不保。造成这一情况的发生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在当时还不能和周恩来撕开脸面。于是在外交部周恩来处于两难，一个是要支持毛的文革路线，一个是造反派是要打倒陈毅。此事让周恩来备受折磨。直到１９６７年的８月底，这一切才得到改善。但是当到了１９７１年庐山会议的时候，毛泽东要整林彪，周成为是唯一可以借用的主要力量。此时的陈毅已经被周恩来抛弃了。

一、在「一批二保」的前提下力保陈毅

文革发动之初，陈毅就因为工作组问题陷入了麻烦。第一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起来造反，要打倒陈毅，因为陈毅派出刘新权工作组镇压了学生。当时正值亚非作协会议召开，时北外学生又说参见会议的中国作家中有黑帮，要冲击会议，而会议恰恰是由陈毅主持。当在周恩来要陈毅代替他出国未成之后，就要求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派兵严加保护陈毅的安全。

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后，陈毅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并且在华东组传达了毛泽东在８月４日指责刘少奇的话。　但是陈毅的「大嘴巴」、敢放炮的性格还是不那么招人喜欢。周恩来告诫陈毅：「不要讲话！」而且在周恩来的一手安排下，陈毅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做了检查，成为第一个被解放出来的副总理与部长。

为此，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日、１３日、２６日、６７年１月３日连续同北外学生见面，做工作，强调中央不同意打倒陈毅。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造反派联络总站代表。在这些接见中，有人当面顶撞周恩来。下面是其中的一幕：

（有人说要打倒陈毅）总理说：「我反对，我不能接受。这样简单不行，我可以和你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一外有的同志说，不是打倒陈毅，而是要把陈毅烧成红通通的无产阶级外交家。」（答：现在没有这些标语了，而是要打倒！）

总理说：「没有开辩论会，怎么能这样武断，烧烧我不反对！」

１月１０日，江青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代表毛泽东表态：

目前有股风，把斗争锋芒对准我们军队的某些好同志，对准中央及国务院的一些好同志。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群众答：不能！）对陈毅同志不能采取对刘邓、王任重、陶铸那样的做法，而应该同志式的批评他的错误，承认他的工作。」

江青还在讲话中提及陈毅的历史上的功绩，是支持毛的。

陈毅的检查稿是经周恩来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的「检查稿」。陈毅作完检讨后，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讲话，表态肯定了陈毅的讲话。毛泽东先行审阅过陈毅的检查稿，陈毅检讨后又批示：很好。

在毛泽东表态和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外事口造反派联络总站主编的《革命造反派》刊登了其一把手张殿清的表态：「我们欢迎陈毅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陈毅是我们的红司令。」于是直到３月下旬，外交部内的秩序基本上是平静的，陈毅与造反派之间的合作是愉快的。

对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周恩来还是特意要照顾的。　１９６７年１月，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周恩来也随之引导外事口夺权。周恩来打电话告诉时任外办副主任李一氓：「你们不革命！应该成立战斗队。」接着陈毅也打来电话：「哦，革命还要下命令啊？你们为什么不夺权？」「外交部已经夺权了，我们自己人不夺，别人可要来夺了。自己外办的情况，什么情况，到底清楚些嘛，这是我和总理研究了的。」

２月１６日，陈毅在怀仁堂的中央碰头会上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嘛？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陈毅的这些话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事后整理的，并经过周恩来、康生核对过的。

当陈毅讲到周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周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　陈毅敢当着周的面，挑拨离间，胆子够大的。周岂是如此能轻易被挑拨的？当陈毅讲了对毛泽东有影射的话后，周恩来又是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周恩来叫王力整理出来一个２月１６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王力在会上读了，并核对情况。陈毅表示异议，说有一句他没有讲，要去删掉。周恩来当场驳斥：「讲是讲了，不要删了。」　周还在此处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周恩来保陈毅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能触及毛泽东的底线，还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周恩来当时是否处于「危险」状态。

陈毅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当天晚上，陈毅又发了七个小时的牢骚。陈毅说：「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是在场的。前一时期大字报很有水平，现在的大字报越写越多，字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低。打倒朱德，打倒贺龙，中央根本不同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了呢？朱德今年八十多了，这样搞，人家骂你共产党是过河拆桥。你们谁都不相信，只相信毛主席、林总、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六人，承蒙你们宽大，加上五个副总理，才十一人。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

把我拉出去示众!」

但是陈毅同时又说:「受迫害的同志不要报复，你过去把我打成反革命，现在我要把你打成反革命。请将我的意见转告他们不要报复，否则就成不了大事。有几个人没有反对毛主席？很少。林付主席没有反对过，很伟大。我反对过两次，后来承认了改正了错误。搞一点黑材料有什么了不起么，年轻人要学会有很宽阔的胸怀，宰相肚里能撑船。我整过很多人，人家整我的也不少，彭真、陆定一就整过的黑材料，我不怕，我看也不要看。受打击最多，受委曲最大的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的威望最高。」

但是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无疑让周恩来失望，让毛泽东恼火。２月１９日，李先念和谭震林来到陈毅家，告之毛泽东发了震怒。陈毅顿时慌了手脚，当晚就找了周恩来，并当即写了封信给毛，要求当面说清情况。但是未见答复。接着，陈毅又写了第二封信。毛终于答复，但是信中一大段是说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结尾是「见面有期，稍安勿躁。」

３月下旬，陈毅卷入「二月逆流」、在怀仁堂放炮的情况终于在社会上传开。４月５日，「批陈联络站」成立，总共有外交部联络站、北航红旗等３５个单位参加。４月２１日，联络站召开全部「揭发批判以陈毅为首的部党委在干部问题上执行刘邓资反路线大会」。陈家康在大会上揭发了陈毅在部党委会上说过「干纲独断」。意指这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不满。由此，陈家康被周恩来多次点名为「跳梁小丑」，以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５月１１日上午，「批陈联络站」下属十几个组织上街游行，要求陈毅到群众来接受批判。当晚，周恩来连续两次接见外交部各组织代表。但是在会谈中，造反派成员对周恩来显然是表现的「大不敬」。下面是部分对话节录：

周恩来：外交部要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是外交部长，还参加外事活动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

造反派：你不是主张陈毅到群众中来的吗？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起哄，喷气式飞机一坐，这怎么行？！

一同学：我们就是要批判。

周恩来：批判错误可以，但不能揪人。批判错误也还要创造条件。

群众：什么条件？

周恩来：大中小「三结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群众：好几个月，有反复嘛！我怎么知道他二月份又出了事。有反复，你也知道，何必问我。

一同学：陈毅不到群众中来，心里有鬼。

周恩来：他心里有想法。你们想想，你们几个队伍游行，把他揪去像什么样？

「六?六」代表：５月４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他到现在也没回答。

周恩来：5月4日他已经患肠炎了。几个造反派齐声地以命令式的口气说：你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你要相信群众。

周恩来说：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说着，

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使陈毅真正陷入困境的就是这个１９６７年的5月。批陈联络站多次提出要批斗陈毅，但是周恩来认为时机未到。经过多次争论后，周恩来同造反派达成协议：第一，批陈会要待安排好了再开；第二，先在外交部开小会，然后到外语学院等单位接受批判，大中小会结合。

４月３０日，被印度尼西亚驱逐的中国临时代办姚登山回国。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姚登山既让造反派有了一个可以取代陈毅的人选，也被周恩来看成是陈毅的备用胎。一旦陈毅真的倒台，姚可以成为周恩来在外交部的代理人。后来形势逆转，姚登山被周恩来一脚踢开，则是后话。

姚登山一回国，就受到周恩来的垂青。在周恩来的运作下，姚站在中间，左挽江青，右搀毛照了一张相。如此殊荣在中共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周恩来两次提出让姚登山参加抓部党委的工作，参加「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但是姚登山以工作不熟悉为由，没有参加。姚登山在外交部积极执行周恩来交代的任务。　　姚登山更是在８月２６日保护陈毅时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此事后来被渲染成周恩来一人的功劳。

毛泽东对陈毅是什么态度？王力说，毛泽东说这辈子他就要保两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就是陈毅。　　毛泽东还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没有什么了不起。人家要打倒，就打倒一下嘛！」「现在在我们国家里，群众提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毛还举例子说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倒陈毅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个指示，竟然没有向周恩来传达。

１９６７年8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时表示他赞成「打倒陈毅」的口号。毛泽东说：「我对陈毅也没办法，就是要红卫兵给他点压力……将来保陈毅也要靠红卫兵。」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是模棱两可，陈毅难道要由红卫兵来决定其命运？

毛要假手群众批判陈毅，周恩来要保陈毅，但是又不能对毛发动起来的群众泼冷水。周恩来处于两难。对于周恩来来说，一直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毛泽东又公开认可了外交部造反派组织攀险峰对陈毅提出的口号「一批二保」。　这对周恩来来说，意味着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根据时任陈毅秘书杜易的回忆，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五一节期间两次私下对陈毅说「我是保你的」。　周恩来显然会从陈毅处得知此事。

而此时期的周恩来，正是在文革中遭遇到第一次「伏击」。１９６７年的5月至8月份，北京一些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提出要「动一动」总理，「烧一烧」。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还上了街。

关于周恩来同陈毅的关系，毛泽东说：「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对于这一点，连造反派也供认不讳。一个造反派骨干曾赤裸裸地扬言：「不打倒陈毅，就不能打倒周恩来!」

「７２０事件」后，整个中国局势急速左转，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来也不得不同意陈毅到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１９６７年8月一共开了八次批判陈毅的大、中、小会。外交部开了三次小会。周恩来对批陈小会抓的很紧。什么时间，怎么开，哪些人发言，发言内容均须事先经过周恩来审定批准。可以说凡是造反派的「批陈」大会，周恩来都「事必躬亲」，每场必到（笔者注：除了２７日晚上的除外。）。

8月７日，王力发表了一通关于外交部的谈话，主题内容就是肯定揪陈是正确的，说外交部夺权不彻底。王力在其回忆录中对此多加辩白，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此讲话大大加剧了外交部的冲突。陈毅接连受到群众批斗。8月１１日与２７日，陈毅也两次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王力还说，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　王力在这次谈话中还对姚登山解释了他和周恩来之间的不同。姚登山问王力，「不是总理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吗？」王力回答说「总理身份不同嘛。」

显然，由于毛泽东公开说的和私下对王力讲的不同。虽然周恩来可以从陈毅处得知毛泽东的底，但是周恩来不可能公开亮出。以至有些造反派认为中央文革（特别是王力讲话之后）和周恩来之间是有分歧的。周恩来对此非常在意。一方面，周恩来对于来自造反派、红卫兵的攻击表示：对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另一方面，对于造反派等质疑的周恩来同中央文革是否保持一致，周恩来多次声明，他和中央文革之间是亲密无间的。

8月２２日，火烧英国代办发生之后，周恩来紧急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周恩来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周恩来又说：「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部党委几个人你们都点了名，说某某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有通令，完全目无中央。」

８月２７日，李富春代表周恩来出席「彻底批判陈毅大会」。李富春说：「你们提出陈毅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提出陈毅不投降，就坚决打倒他，我都赞成。但是你们有的同志提出『打倒陈毅』，我看还不是，你们勒令陈十天交出检查，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刚才陈伯达特地打电话告诉我，要我说一句：总理和中央文革是一致的，现在有的人想挑拨是办不到的。」

８月１９日，外交部发生造反派封部党委夺权事件。毛泽东在２１日终于明确表态：「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哪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啊?……」接下来，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我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　笔者认为这也是上述８月２２日周恩来同造反派谈话口气非常硬气的原因之一。８月２７日，周恩来变得益发强硬。周恩来怒斥造反派：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火烧英国代办，使得外交部的局势逆转。外交部的运动开始转向。特别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的８月底开始右转，要批判极左思潮，要搞大联合。外交部开始抓坏人和清理「「五?一六」」。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毛泽东批示：造反派不听周总理的话，还叫什么造反派？矛头对准周总理，就是对准我、林彪。　周恩来１０月１８日作出查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指示。但是陈毅的形势却不乐观。

批极左，全国出现了一股为被错误批判的人和事翻案的现象。外交部也不例外。１９６８年初，外交部出现了三张批判「打到陈毅」的大字报。其中最著名的是「９１人大字报。」此时恰恰是「反击右倾翻案」时期。从２月到４月期间，周恩来独此给予严厉批评。周恩来说：九十一人大字报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无论周恩来是否是假戏真做，周恩来自１９６７年９月就提到要谨防「二月逆流和右倾翻案。」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日，周恩来再次谈到此大字报时讲：翻案风有各种形式，极「左」也可以为「二月逆流翻案」。因为极「左」是同右合作的，是保护右的。现在反右是主要方面，要反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要击退为「二月逆流」翻案风。

二、在事过境迁之后抛弃陈毅

八届十二中全会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份召开。陈毅作为「二月逆流」的代表再次被批。在这次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调子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以前。为了批判方便，周恩来特意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安排到各个分组里去接受批判。　周恩来也点名批判并揭发了陈毅：「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在十月三十一日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特意点了陈毅的名字。毛泽东说：「对这些老同志（指参加『二月逆流』的人），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在那个突出政治

的年代，作为右的代表无疑于反革命。这对陈毅实际上一种侮辱，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

在「九大」期间，陈毅在华东小组继续受到严厉批评，并把陈毅从井冈山到「二月逆流」的各种「反党罪行」来了个彻底清算。个别和陈毅熟识的老干部也跟着围攻陈毅，说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经过这翻折腾，素有「大炮」脾气的陈毅也被整的没有脾气了。甚至连初出茅庐的王洪文都可以直指陈毅的鼻子骂：「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陈毅连声应承：「应该清算…应该清算…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直到大会秘书处的吴法宪把徐景贤、王洪文叫到办公室去，传达周恩来指示，批陈要「适可而止」，并说「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吴法宪同时还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九大」并没有正式宣布罢免陈毅的外交部长的职务，却安排他请病假，由姬鹏飞任代理外长。陈毅可以说正式「失业」了，后来又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下放到石家庄。

作为中央委员，陈毅参加了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没有想到，本想这次抓住机会，表示自己立场坚、也可以趁机一报私仇的陈毅，再次翻了船，结果整出个「二陈合流」。

此时的形势已经不同于１９６７年。由于林彪带头攻击了文革干将张春桥等人，毛泽东大发震怒。对于文革，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自然对于自己的得力大将，毛泽东是一护到底。但是事前，没有人会认为在林彪和张春桥之间，毛泽东会选择张春桥。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定攻击张春桥就是攻击文革，攻击文革就是攻击毛本人。此等情况下，周恩来成为可以说是毛泽东要借用的唯一的主要力量。陈毅自然也就不再是周恩来的「门户」。

历次会议陈毅都被安排在华东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上，陈毅被批得「体无完肤」。这次，陈毅提出换个组，于是周恩来把其放到了华北组。８月２４日，陈毅发言。陈毅说：以前我错了，这回我非跟上不可。陈伯达发言之后，陈毅第一个表示支持，说完全同意陈伯达的发言。陈毅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是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有人质疑陈毅是否有资格讲话。陈毅说：我怎么没有资格讲话？我没有保卫毛主席的资格了？陈毅又做了第二次发言。

结果，受到攻击的张春桥等人在江青的带领下找毛告了状。毛泽东在８月２５日下午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下令中断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风云突变！

８月２６日，周恩来和康生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康生说：「你们要交代，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吴法宪当场反驳：「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为反革命分子了？」周恩来当时没有表态，当吴法宪讲话之后，才说：「康老的话错了。」未曾想到的是，８月２８日，当林彪为吴法宪等人开脱时，说不同意康生讲的陈毅跳出来的说法，陈毅同吴法宪等人也没有联系。周恩来则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　这个说法是「两陈合流」的说法源头！后来扣到了康生的头上。

１９７０年9月6日下午，历时十五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届二中全会宣告闭幕。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句话使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

九届二中全会后，在传达陈伯达的罪状中提到：陈伯达同「二月逆流」某些人勾结起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对此，陈毅的夫人张茜非常生气。　　陈毅自己说：这次庐山会议上，我讲了对主席的敬佩，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有天才这样一段话，就把我搞成「二陈合流」，真是莫名其妙，冤枉也。

「林彪事件」之后，１１月４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对与会人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二月逆流』。」毛泽东同时编造谎言：「『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就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同时毛泽东叫叶剑英把此话转告给陈毅。　但是叶剑英并没有转达。在场的周恩来也没有传达。

１９７２年1月2日，周恩来去医院看望陈毅，丝毫没有向陈毅透露出一点信息。

直到次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后才去告诉陈毅。　　但是此时陈毅已经毫无反应。张茜退出并病房后，十分生气的说：「为什么不早来？这时候已经听不见了，传达有什么用!」

陈毅去世后，毛泽东却借机做了场「政治秀」，表达了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的一丝慰问之情。但是陈毅的悼词修改之处，却折射出其应有的内含。

根据当事人刘岩的说法，周恩来对其所拟的悼词草稿修改的主要部分是删去一短句，增加一长句。他用红笔勾出的一短句的全文是「一贯忠于人民忠于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增写的一长句是：「有功亦有过，但他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毛泽东在审阅周的报告时批了两处文字，一处批在报告的首页上：「基本可用。删去两段。」一处批在悼词稿的第二页上，即周总理用红笔勾出的一短句和增写的一长句旁边：「前面已作了结论，后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并用红铅笔将不要的两段话划去。

第八章 彭德怀的冤案与周的责任

周恩来在「反冒进」被批判之后，再也不敢向毛泽东「谏言」。无论是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还是之后，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批判丝毫不手软。而在文革中彭德怀所受到的迫害，周恩来更是负有一定的责任。

一、庐山会议前后

罗瑞卿曾经撰文:「建国以后,在反对高岗、饶濑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历次斗争中,周总理都是毛主席路线的坚决捍卫者。」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对于彭德怀的态度,可见一般。

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就曾写过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委托周恩来,进言毛泽东,但是周恩来推却不干。　周恩来此举,自然同反「反冒进」之后所受到的批判有关。事实上,自那以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向毛泽东谏言过,更谈不上在重大决策上坚持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已经从对毛泽东推行的政策的忠诚蜕变为对毛泽东本人的忠诚。大陆官方党史界把在1966年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看法作为周恩来不同意此提法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广为宣传。　然而事实的真相则是周恩来仅是对于一个文字性的提法质疑,毫无对其内容的谏言。　此事也充分说明了大陆官方在维护周恩来的形象方面的捉襟见肘。

1959年7月14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两天之后,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定下关于此事的处理方法——「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同时要求周恩来通知彭真等上山。周恩来比刘少奇敏感的多。刘少奇当时还建议会议再开一周便结束,而周恩来在20日就批评了周惠,原因就在于周惠批评刘建勋等人的「假大空」。　这种调子明显是和毛泽东发彭德怀的信的意图是不一致的。周恩来开始转向。转向的同时,周恩来还故意回避李锐的话题。李锐在19日或者20日问周,毛对彭的这封信如何看待?周说没有什么吧。

此时的毛泽东采取不同寻常的态度来警告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够站稳脚:第一个就是彭真一上山,就代替周恩来主持会议的讨论工作;第二个就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周恩来,或点名道姓,或旁敲侧击,诸如「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同时又说「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　这一切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非完全信任与敲打。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彭德怀在庐山上书,毛泽东批彭是不对的。但是只有一个毛泽东批,也是批不起来的。而这种左的路线,就需要左的干部去执行。1940年,曾就文艺问题与王实味争论过的陈伯达,得知毛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后,连声欢呼:「跟上了,跟上了」对此单世联先生这么揶揄陈伯达:从此陈伯达平步青云,直到第四把手。　周恩来不也是这样的人么?周恩来也跟上了,而且还能在文革的浪潮中全身而退,如果不左,而且有时候要极左,周恩来又如何能熬到最后?然而周恩来在左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身败名裂?然而这正是大陆官方所不愿面对或者故意遮掩的地方。

7月23日,彭德怀对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然而,周恩来一语点破:彭的「骨头是犯上」。　周恩来的骨头在「反冒进」之后就不再犯上了。

7月26日,周恩来批评彭德怀「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分开」,彭德怀则针对周明明知道经济困难而不敢言感叹:「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

滑。」　　在批彭的时候，周不忘向毛泽东表示忠心：「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１９５９年6月１２日，彭在列车上召开总结出国访问的总结会议。他在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最怕的是官僚主义作风，领导脱离群众，不晓得领导要走群众路线，才能丰富自己、丰富领导。什么是领袖，概念不明确。不能认为职务高就是领袖。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很强调防止官僚主义，即，一、民主选举公务人员，并可以罢免；二、公务人员的薪金不得高于一般人员。……这一次看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给我们的印象是极深刻的。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庐山会议期间，彭又几次怒气冲冲地说：他怎么能这样看待这个信！过去打仗时不是经常有争论吗，争论过后还是照常工作，哪个去计较！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一点意见也听不进了！这样下去，同斯大林晚年有什么两样！

庐山会议之后，１９５９年8月２４日，周恩来应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的要求，在会上作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的报告。

报告将彭德怀的历史分成１５个时期：（１）平江暴动及其以后一段时间；（２）立三路线时期；（３）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期；（４）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５）长征、遵义会议；（６）张国焘分裂时期；（７）北上长征时期；（８）洛川会议及其以后、东征以后西征；（９）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１０）华北抗战时期；（１１）延安整风和华北座谈会；（１２）七大前后；（１３）西北野战军时期；（１４）抗美援朝时期；（１５）主持军委工作时期间。周恩来历数彭德怀的历史问题。除此之外，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彭德怀以外，周恩来把张闻天和黄克诚也列入「高岗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重要成员」，这一次是「高饶事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虽然周恩来表示：「我也不能说对彭德怀同志的历史问题知道的完全的清楚。」　　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对彭德怀的历史来个总的清算和鞭挞。

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在刘少奇作口头报告谈及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时，周恩来插话表示：彭德怀是高饶事件中的主要成员。

二、彭德怀被「揪回」北京

文革前夕，彭德怀被变相「流放」到成都。标志文革发动的号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文汇报》上吹响，预示着彭德怀必定再次要坠入深渊，万劫不复。以「保人」著称于世的周恩来同这个时期的彭德怀关系如何？传统的看法则是，周恩来对于彭德怀从成都被抓回北京不知情因而对于此事所述极为简略，仅以接到西南局报告后给以指示，一笔带过；　　或者宣称周恩来对于被抓回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积极保护。　　但是历史的真相如何？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抓回北京知情不知情？周恩来对于抓到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哪些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保护彭德怀？周恩来对于彭德怀受到的迫害应该负哪些责任？

「揪彭」无疑符合毛泽东文革斗争的战略决策和整体大方向，但在具体的执行中有以下

几中不同的说法：（１）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份，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或者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２）根据聂树人的回忆，在１２月的中旬左右，在周恩来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出「揪彭」，得到全体参加人员的同意。笔者对于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根据聂的回忆，参加人员有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等人，而且当场并没有指定由哪个红卫兵组织去负责抓，为什么去「揪彭」的队伍只有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两家而且显得很有组织性？显然聂的回忆同这一点不符。

笔者根据种种不同材料，推断出「揪回」彭德怀的过程大致如下：在周恩来主持的的中央项目组的会议上，做出把彭德怀揪回的决定。　戚本禹指派阎长贵向朱成昭传达了此命令。　但是朱成昭前两次所派人员被彭德怀感化均告失败，特别是前两批人员回到北京后，把他们在成都同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交给朱成昭。　而朱本人则对彭德怀持有同情态度，就把这份谈话记录交给中央文革，结果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于是中央文革另起炉灶，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在此情况下，朱成昭又派出以胡乐成为手的、１００多人的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　然而朱成昭第三次派人，则是受了周恩来的直接命令的。这也是朱成昭在其自述和接受宋永毅先生采访时一直坚持的：抓彭德怀回来是周恩来直接下令的。根据阎长贵先生同笔者私下的通信也间接证实了此点。

由以上所述内容可以推断出，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揪」一事显然非常清楚，并非《彭传》所述：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后，心知这一幕为江青所策划，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能给以几点指示。

实际上就在１２月２３日凌晨４时左右，彭德怀秘书綦魁英紧急找到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告之彭德怀被红卫兵所抓。杨沛向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打电话告急。钱敏感到事态十分严重，电话中答复杨沛道：「我立即打电话请求国务院，你们要好地保护他」。　而周恩来在２４号才就北京航空学院等入川红卫兵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揪彭德怀进京一事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嘱秘书电话告成都军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此时的彭德怀已经身陷囹圄。周恩来对于彭德怀的关心远远不如对毛泽东的指示或者江青的提议所做出的反应来得及时。

三、彭德怀被批斗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　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９日周恩来就西安「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一事批示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　这恰恰从另一方面证实，彭德

怀在北京遭到的批斗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同意的。

王力回忆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的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这是执行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做的决定。……他（们）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决定，他们说是的。再一条是把彭德怀交给群众批判，结果搞成了批斗，把彭德怀的肋骨打断。戚本禹说这也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他执行的。他们也问了汪东兴、杨成武，说确实是中央开会决定的。对此，王力解释说：我判断是专案组的会。项目组的会也是周恩来主持的。项目组就是办这种事的。揪人、批斗、关人都是专案组管的。

虽然在这次批斗中，周总理指示要「天派、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交给那群对待他们认为是「叛徒」或者「坏蛋」的敌人，怎么会手软？这个是有前例可寻。１９６７年1月底2月初，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明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无异于是给自己作一个政治表态丝毫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１９６７年7月１９日，彭德怀在红卫兵手底下受到严酷惨烈的拷打。在这场批斗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而中央专案小组的领导们，对此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报》小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动态的报告，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正是周恩来主持；　　第二个是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第三个是来自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报刊。

彭德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就写的十分清楚。7月１９日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7月１９日到２２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彭德怀自１９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２２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２０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7月２２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在彭德怀遭受严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导致重伤后，付崇碧就把彭德怀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周恩来，并且附上胸片。２０号的病志显示：胸部正位象Ｘ线所见：（１）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２）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３）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４）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但是周恩来也仅是表示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斗彭德怀，实际情况却是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例如把彭德怀转移或者实施其它措施例如隔离或者送至３０１医院「监护」，受到重伤的彭德怀在随后几天仍然遭到批斗和毫无人道的摧残。

四、彭德怀项目组组长

实际上，彭德怀项目组组长一直都是由周恩来负责或者兼任。杨成武回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项目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项目组长是贺龙兼任的」。　项目组组长的挂名是有个潜规则的，直接挂名的项目组的组长要高于被审查人的排名。例如在「二办」中主管彭德怀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但是挂名的却是周恩来。　对于彭德怀项目组的组长一事，《彭德怀年谱》如此记述：「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８日，项目组传达中央项目领导小组指示，宣布各办公室领导成员和工作对象。彭德怀项目办公室领导成员（略）。」　一个略字，无字胜有字。

即使后来黄永胜接手主管彭德怀项目组，但是根据组织的原则，黄永胜也要把有关彭德怀的项目材料上报给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不仅是主持整个项目组的会议，中央项目委员会以及以后的中央项目小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

１９８１年1月２３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判决书中说「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项目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

但是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原报告是这样写的：

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

时间为１９７０年年9月１７日。

黄永胜在１１月３日批示「同意」。

吴法宪说：按照我们当时的做法和理解，黄永胜批示的意思，应当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

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项目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吴法宪更是表示愤慨：「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项目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综上所述，周恩来对于彭德怀所受到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推而广之，对于在文革中被中央项目组所迫害的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周恩来同样是罪不可赎，因为对于作恶多端

令人谈虎色变的中央项目组，周恩来则是其首要负责人。在反思文革这场人类浩劫的同时，有人却以种种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只能用毫无说服力和具有真实客观性的「违心」来为之开脱，在铁的事实面前，周恩来的本来或者历史原有的形象，难道不应该浮出水面吗？

第九章 贺龙被整与周在其中的作用

贺龙之所以倒台，其根本原因在于：在毛泽东眼里，他是站在刘少奇、罗瑞卿一边的，是不可以信任的。在贺龙被迫害的过程中，虽然林彪涉入很深，但是无疑又一次成为给众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掩盖劣行的「替罪羊」。

毛泽东最初确实没有要打倒贺龙，只是考虑将贺龙夺权、让贺龙靠边。但是，由于贺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使毛终于作出整肃贺龙的决定。贺龙对待刘少奇的态度始终不能让毛泽东满意。贺龙四处插手在先，林彪搜集材料报给毛在后。林彪仅是毛泽东安排搜集材料的其中一位。而成钧等人供认的「贺龙兵变计划」让毛泽东彻底改变了主意。

周恩来在贺龙事件初期是伸出援手过（在本文不是讨论的重点，如有兴趣者请参看官方《贺龙传》以及《周恩来传》等）。但是致命性的两封揭发信连使本来对贺龙持同情态度并给以有限保护的周恩来来了个１８０度转弯。在贺龙被项目组审查和迫害的过程中，周恩来则更是难辞其咎。周恩来负责实施了整肃贺龙的决定。而且人们至今还没有注意到的是：周在给贺龙平反的过程中有意拖延和阻挠，最终导致了贺龙在１９７４年并没有完全被平反，而是留下了「尾巴」。薛明一家在最后也忠于明白事情的真相。

一、毛、刘冲突是贺龙遭整肃的根本原因

１．毛、刘冲突

中共党史上每一次权力斗争都会冠之以路线原则斗争，并以此对所涉人员划线。毛泽东的名言之一就是：「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三年大饥荒之后，在中共要员眼里，毛泽东与刘少奇相比，一个是威望大损，而另一个则是如日东升。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足以让毛泽东怀疑自己的接班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虽然毛泽东后来承认：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是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其实还要更早。

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不久，毛泽东已下令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始策划排除刘少奇

为代表的党内高层的反对派。　　随着社教的进行，更是让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１９６４年，「四清」运动开始，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下乡蹲点，但是迟迟不见动静。刘少奇在南下视察安徽时候，发火：「干部不蹲点，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甚至说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　　大批省部级干部才纷纷下乡。

除此之外，刘少奇还指责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过时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刘少奇竟然含沙射影的说毛泽东的著作是「教条」的。对此，毛泽东不能不感觉到「大权旁落」，内心对刘少奇非常反感。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9月１２日，当计委领导小组汇报计划工作，并要求毛泽东对财经工作挂帅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少奇同志挂帅。我年纪大了，有时我妥协，他厉害……比如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点，说过去蹲点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时妥协，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他强的地方。」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底，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也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毛泽东在１２月２６日过生日时还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

于是，从七千人大会到四清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不断深化，终于变得难以调和，终于使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要整倒「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回到一线。

２．整肃罗瑞卿

对于毛泽东来说，到底谁是属于「刘少奇司令部」的，并无明确范畴。但是，只要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我这边，脚踏两条船的，就是属于被整的范畴。在毛、刘之间搞投机的人，想脚踩两条船的人自然为数不少。而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搞「文化大革命」，前提就是要先把军队牢牢掌握。对于军队里面那些毛泽东认为对自己不忠的人，对刘少奇亲近的人，自然属于要「清洗」之列。于是罗瑞卿便首当其冲。

罗瑞卿上任之初，曾经咨询过彭真的意见。彭真告诉罗：你不去掌握军权，谁去？任务虽重，但也有好处，可以多接近书记处，多接近邓小平，多取得他们的指示。　　他们指的是谁，不言而喻。邱会作回忆到：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时候，上边有人对罗瑞卿打招呼，让他当国防部长。　　１９６５年春，刘少奇在昆明讲接班人的问题时，提出一些人泡病号、不工作，岂不知，长期不工作，就是最大的错误。罗瑞卿在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时候，就提到了刘少奇的这个讲话精神。　　１９６５年2月１８日，罗在国防工办党委会上说：「刘少奇怎么不支持（指部院合并）？党中央的副主席，战时就是三军统帅！」　　刘少奇在１９６５年５月，公开放言：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　　罗瑞卿私下对其子女说：我们这些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是少壮派，以后要靠我们这些人。　　根据罗瑞卿自己的叙述，刘少奇曾经在背后散布过周恩来的流言蜚语，这不正说明刘、罗走的很近嘛？在毛泽东看来，罗瑞卿的屁股已经坐在刘少奇那边，已经是不可信任和重用的人。而奇怪的是，罗瑞卿在不同的场合下，包括公开的讲话，关于军队事务的讲话，竟然把刘少奇和彭真单独点出来，例如表示此决议刘少奇已经看过也同意了。如果说刘少奇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怎么理解罗瑞卿为何也要这么提起彭真呢？

罗瑞卿在手握大权之后，飞扬跋扈，得罪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导致林彪左右为难，不得不把问题提交给毛泽东解决。　　压倒骆驼腰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罗瑞卿断然拒绝江青的提议。文革发动前夕，江青借解决军队文艺工作的问题为名插手军队，要求罗瑞卿支持其搞军队文艺座谈会，被罗拒绝了。于是罗瑞卿成了毛泽东要发动文革的绊脚石，被毛泽东首先清除出局。正如文革史专家丁凯文先生所述：毛在文革中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打倒了「彭罗陆杨」。「彭罗陆杨」是连在一起的，毛是作通盘考虑的，「彭罗陆杨」就是刘邓司令部的前沿阵地。

自１９６２年2月１７日，林彪就开始病休，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和聂荣臻共同主持。但是贺龙主持的国防工委和聂荣臻主持的国防科委因为机构重迭的问题，两者矛盾重重，如同水火。中央军委只得另组国防工办来协调贺聂的关系。但是罗瑞卿在处理过程中，却未能处事公道，偏向贺龙，引起聂的极大不满。　　曾任贺龙办公室副主任、贺龙的秘书何家为认为：贺龙和罗瑞卿的关系很好，但是军委的其它几位副主席都是受罗瑞卿打击的。贺龙则不然，两个人互相支持。　　毛泽东曾多次对罗瑞卿说，要多向贺龙请示工作。　　贺龙却由此和罗瑞卿走的太过于近乎，不仅在工作中还是日常生活中。　　当毛泽东要拿掉罗瑞卿的时候，贺龙自然也在考虑之中。

１９６５年1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听取中南局汇报工作时有段插话（是一大段的插话），特别强调了要突出政治：「有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可见，搞个人野心总是搞不久的。我们党五朝书记都不好，但也没有人能把党搞垮。最危急的是内战后期，王明路线的几年。遵义会议后十年，虽然还是洛甫当总书记，王明路线基本被克服。但抗战初期，也有过王明路线。……因为搞个人野心，总要有几个人合谋，可是联络人多了，就容易暴露了」王任重说：１９６４年6月１５日、１６日上午，毛主席在北京西郊观看大比武表演，１６日下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一栋两层楼的小会议宣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讲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一个是准备后事要搞接班人问题(接班人五个条件)。其中尖锐地提到五朝书记，但没有与「野心家」联系起来。１９６５年1月毛主席讲话特别强调了「野心家」,「野心家」指谁，当时谁也不知道，也不便问。

毛在当年对罗瑞卿问题批示到：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毛泽东在１月份的话不就是这个批示的翻版么？

作为孤立和打击罗瑞卿的第一步，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９日被批。有人「策反」肖向荣：「罗瑞卿是犯了反党性质的错误，你要与罗划清界限，揭发罗的问题」。　　１１月３０日，批判肖向荣的会议结束之际，会议主持人王新亭特意来询问贺龙：「贺总，现在批肖向荣，说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反问为什么，王回答罗讽刺林彪。贺龙说：「如果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但是事隔两天，也就是１２月２日，王新亭再次找贺龙，告之批肖的事情要出简报并且将写上罗是肖的后台。贺龙坚持说罗瑞卿绝不会反党，这个不仅可以担保而且可以传达。

实际上这是毛给了给贺龙一个表态的机会。毛泽东也给了林彪同样的机会。在１１月初，毛泽东就要求林彪对罗的问题表态，并表示如果林身体不好可以由叶群代为汇报。在１１月

底毛泽东召见叶群之后，从此有了「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说法。而毛泽东在１２月２日就大骂了罗瑞卿是野心家。　　林彪的表现比贺龙更令毛满意。

于是，整肃罗瑞卿，贺龙被完全蒙在鼓里。上海会议结束后不久，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毛泽东决定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被叶剑英取代了！　　根据文革史专家余汝信先生的研究：因为罗所处的敏感位置，毛泽东当然认为会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漏风声。惟多种材料及回忆表明，常委中除毛、林之外，起码周恩来、邓小平是知情的。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到达上海的当天，１２月５日，即召周恩来从北京飞上海。当天，周在毛召见后，即成为毛有关批罗指示的实际执行者。其它与会者中，起码陶铸、谢富治、叶剑英、肖华、杨成武、李作鹏、张秀川、王尚荣、雷英夫等是知情的。政治局成员中，刘少奇、彭真、贺龙等不知情并不奇怪。在毛的心目中，罗与他们走得那么近，提防还来不及，岂能让他们事先知情！至于彭真，毛就干脆以在京「看家」为名不让他到会。而且周恩来还特意让吴法宪对彭真封锁消息！

事情很明显，贺龙已经同罗瑞卿成了拴在同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而且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成了刘少奇的人马，属于要拿掉的人！自然，下面接着批罗的事情，毛泽东没有让贺龙掺合，而是放了贺龙的「假」，为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打开方便之门。同样，毛泽东也有意暂时让贺龙「清醒」，做个逍遥派，以免在解决罗的问题上又陷了进去。但是事实证明，即使后来毛泽东当面点拨贺龙之后，贺龙依然我行我素，终于导致自己被彻底打倒！

３．贺龙和刘少奇、罗瑞卿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底异乎寻常的发了「雷霆之怒」，以「四清矛盾」为出发点，于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８日，１９６５年1月３日、５日，毛泽东连续指责刘少奇，最后竟然得出结论说：白区的正确代表是李雪峰。　　最后由于王力和陈伯达的努力，刘少奇主动向毛泽东道歉，作为响应，毛泽东对一些领导人表示：「我批评了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毛泽东此招纯是「烟雾弹」。刘少奇的道歉就是真心的嘛？刘少奇很清楚，自己同毛泽东相比，最大的劣势在于一个是军队，一个是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多年来树立的崇高威望。

而在１９６５年的5月２６日《体育报》和《解放军报》率先刊登出《毛主席刘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一文。接着１９６５年5月２７日，《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体育报》、《解放军报》记者的通讯报道《毛主席刘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全国各大报１９６５年5月２８日纷纷转载该文。虽为通讯报道，但是此事却是１９６４年6月１６日的事情。事过一年，《人民日报》才在头版发表此事，究竟是为什么？

此文完全是大搞个人崇拜。记者报道：

「从车上步下两位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的人，迈着稳健的步伐，向水边走去。正在水库里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学生和解放军战士，远远就认出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刘主席，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来游泳啦!』

『刘主席来游泳啦!』

青年们看到毛主席和刘主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只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毛主席和刘主席拨开千顷碧波，肩并肩地向前游进。时而侧泳，时而仰泳，神态悠然，轻松自如。青年们紧紧跟在毛主席和刘主席后面，斗志昂扬，破浪前进。」

此时毛泽东远在井冈山，而这次报道又是《体育报》和《解放军报》记者搞出来的，罗瑞卿在此次游泳中又是全程陪同，文中又大肆为刘少奇唱颂歌，宣传规模空前，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相对应的是，贺龙主管的《体育报》却不登毛泽东语录。

当毛、刘冲突伊始的时候，形势并不明朗，中共高层或许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洞若观火。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对韩丁谈话时明确指出文革的苗头始自于１９６２年。　斯诺在１９６４年访华时要求访问刘少奇，却被周恩来拒绝，与之对应的是１９６１年蒙哥马利访华，周恩来得知蒙氏在探询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时特意安排蒙与刘会面。　鉴于会见外国人的特殊敏感性，周恩来此举可谓微妙。而对应的是，当时掌握军队相当大权力的贺龙、罗瑞卿等人却懵然不知，脚踏两条船。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能一心一意，就是「小老鼠们，船要沉了，就要搬家了。」

从１９６４年底到１９６５年初，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冲突愈演愈烈。　当毛泽东决定要清除刘少奇时候，最担心的并不是刘少奇的党务系统，而是军队，是刘少奇对于军队的渗透以及军队高级将领的是否「变心」或者「脚踩两条船」。

在１９６５年5月份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引入注目，广为人知的是林彪两次对罗瑞卿的动怒。第一次是因为罗瑞卿在召开之前并没有和林彪商量。　第二次是因为叶剑英等人告状，罗瑞卿自作主张作了作战会议的总结讲话，拆了叶的台。　不为人们所注意到的则是，5月１９日刘少奇接见在北京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全体成员。罗瑞卿事先请求在京常委接见与会人员，但是林彪以健康理由推迟。林彪突然改变主意，临时到场，并在刘少奇宣布散会之时，表示要讲话。　林彪否定了与会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已经认可的与会者的发言。此意表明刘少奇并不能在军队中享有决定权，进一步延伸则是代表毛泽东讲话的林彪阻止在中央主事的刘少奇插手军队事务。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罗曾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份讲:「军队干部参加地方社教运动，应该按照刘主席的指示办，刘主席的指示一定要执行，但要先试点，刘主席也是这样讲的。」贺罗在视察军队的时候，更是露骨:「我们是代表刘主席来看望你们」。

同此事相互对应的是，刘少奇在同年夏天，悄悄走访贺龙。根据贺龙子女的回忆，刘少奇和贺龙话不投机，并当面批评了刘少奇:一九六五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刘少奇不预先通知就突然来访。刘少奇坐了一会儿，沉着脸走了。爸爸气得在屋里走来走去，愤怒地自言自语:「想搞什么名堂！？有什么了不起？不尊重毛主席，我就要批评，就要提意见！……。」　虽然贺龙子女百般「澄清」，仍然表明:刘少奇在文革前夕极力拉拢串联贺龙并不是子无虚有的事；刘少奇同样希望能够获得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取得同毛泽东斗的资本，同毛泽东抗衡。笔者认为刘少奇对贺龙做了某种承诺，贺龙在文革初期才表现的有恃无恐。这种拜访并

不是没有结果，在文革展开之后，贺龙对刘少奇的态度相对于其它一些高级将领例如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是迥然不同的。

而在上海会议批罗瑞卿，刘少奇飞到上海还没有下飞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就把批罗的数据送上飞机。　当天晚上，刘少奇来到贺龙住的地方，询问贺龙是否事先知道批罗。贺说不知道。刘少奇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刘的这句话，意味深长。

刘少奇为什么要找贺龙问呢？

聂荣臻说：「刘邓只听贺龙、罗瑞卿的话，不安排，不听我们的意见。薄一波也出来说：『什么新型材料，我不懂。贺龙６２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要中央重新考虑『二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罗瑞卿与贺龙一唱一合，大叫：『能安排的就要安排，不能安排就坚决不安排，国防工业生产耽误了，工办负责任。』」

上海会议期间，已经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绊脚石」的罗瑞卿被整，在此时，同罗瑞卿关系密切的贺龙，并没有表现出同罗划清界限。除此之外，贺龙同刘少奇彭真等人的密切关系，也是贺龙被毛泽东怀疑成「不能够继续重用的军队领导人」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同次会议上，贺龙被解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

４．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

应该说，贺龙对于毛泽东是支持的。突出表现在：（１）二、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师；（２）在延安整风期间，贺龙积极支持毛；（３）贺龙领导的晋西北根据地对于延安的大力支持；（４）建国后的庐山会议。特别是庐山会议，贺龙出于个人恩怨猛攻彭德怀的表现让其成为直接受益者。

但是，关于贺龙在庐山升任军委副主席一事却存在着诸多不实说法。　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１日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八中全会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彭德怀、黄克诚的工作改换问题，请大会讨论，同时并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　周恩来找林彪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全军的事都要管。但是林彪推辞不干。　同时林彪私下委托罗荣桓和罗瑞卿向毛泽东进言，林彪身体难以胜任国防部长，贺龙则是合适人选。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听取意见，还是决定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第三副主席。

贺龙在「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方面也不落人后，徐寅生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打乒乓球」就是一例。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贺龙是十分信任的，当林彪以身体原因不能继续工作时，宣布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那么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对贺龙不放心的呢？

正如前面所述，毛泽东对于刘少奇插手军队是严加防范的，对于军队表现持有二心的将领是很怀疑的。恰恰在１９６４年四清期间许多人都感觉到毛、刘之间出现微妙不合的时候，贺龙的表现可谓独树一帜。

１９６４年9月１８日，贺龙视察解放军政治学院。贺龙公然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司令是刘少奇。」「以后报告要经过罗瑞卿批准，你们为什么不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做报告，王光美也可以嘛，他们是靠的住的。」　值得一提的是，贺龙在一些敏感时候公开场合的讲话不能不让毛泽东重新考虑贺龙的立场。

私下里的贺龙，对于毛泽东和刘少奇有过比较。贺龙对其长女贺捷生说：「你在宣传部工作，不能犯错误太多，特别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你这个小党员要好好看，研究研究，你就是政治嗅觉不灵，干不了什么大事，一定要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请教。」　另外，贺龙由于性格豪放，经常不拘小节。１９６２年毛泽东接见国家乒乓球队并观看球员表演，贺龙站在门口看了１０分钟就走人。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没有露面。在１９６６年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闭幕式上，乐队奏《东方红》，全场起立，贺龙却一个人起身走了。薛明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禁不住喊出声：「糟了。」

但是，在中共的高层，窃听、监视甚至互相卧底的情况屡见不鲜。有关人员的往来、谈话、行动都会有人注意并且上报。　毛刘之间更是如此。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毛泽东离京四处「交底」，密谋倒刘部署。但是在中南海的刘少奇办公室收到一份无抬头、无署名，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泽东在外地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记录。其中有毛泽东谈四清运动：「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　而毛泽东也不示弱。罗瑞卿在任公安部长时，曾经因为交报告少而遭毛泽东训斥：你的党性比 XX 差，比 XX 委的人差，他们 XX 部，XX 委买茶叶的事我都知道，你们公安部的事情我不知道。」　毛泽东真的不知道公安部的事情？毛泽东是在提醒罗瑞卿不要自己做大，太过于自主。

由此可以推论，贺龙的诸多不敬行为，瞒过毛泽东的可能性不大，且不说其有部分是公开讲话。这些「大不敬」很容易在毛泽东那里产生歧义，在毛泽东紧盯刘少奇，防止刘少奇挖自己军队墙角的关键时刻，贺龙的这些话在毛泽东听来，无异与是向刘少奇表忠心。不仅地方大员党务干部唯唯诺诺，视若神明，连属于自己「禁脔」的军队系统干部也向刘少奇输诚。这些无可避免的进一步加剧毛泽东要搬倒刘少奇的想法，犹如多米古诺牌效应，反过来会加深毛泽东对贺龙的猜忌和不满。

毛泽东准备在国内做「大手术」的时候，出于安全考虑，借赫鲁晓夫下台之机，决定同苏联缓和关系。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５日，中央派出党政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副团长贺龙)离京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４７周年的庆况活动。但是，期间却发生了令毛泽东震惊的一件事。１１月７日晚上，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同志一听这话，立即很严肃地对他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周恩来在听取贺龙报告后一再向苏方提出强烈而严正的抗议，直至勃列日涅夫道歉。

事情更加严重的是，１１月８日，美国、英国等国的通讯社根据头一天马利诺夫斯基一事从莫斯科报道：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　对照历史，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手段，改变别国党的领导人，不是

没有先例。共产国际解散后，在斯大林时代以及以后的若干时间，苏联也从别的国家党内找到内应并施加影响和压力，从内部进行颠覆，以改变不按其指挥棒转的别国党的领导人。

这件事有双重效应。其一是大大影响了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其二是当贺龙被整肃之后，周恩来会变本加厉来整肃贺龙以洗清自己在其中的干系。

这些事对贺龙的影响绝对深远。

赫鲁晓夫的下台与上台都与军队密切相关。著名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如此评论：搞掉赫鲁晓夫得力于军方的支持。马林诺夫斯基如此猖狂挑衅，对毛泽东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可以确知，毛泽东此后想到了政变问题。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以后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提出了防止和对付「兵变」、「政变」的问题。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０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１９６５年底和１９６６年３、４月间，毛泽东问过军队和地方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肖华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江青对刘志坚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说她耽心「毛主席在杭州的安全没有保障。」刘志坚立即转告总参谋部，总参谋部立即通知南京军区许世友采取措施，加强对毛泽东的安全保障，许世友立即作了部署。总参请刘志坚将此情况报告周恩来和军委。刘志坚从上海赶到杭州，向周恩来、林彪、叶剑英作了报告。　　此后在「兵变」、「政变」的问题上的定位一直到林彪作了著名的「５１８讲话」时到了一个顶峰。

那么，毛泽东担心谁会搞「兵变」？１９６５年底和１９６６年初，毛泽东在武汉和杭州的时候，曾经两次同陈再道谈话：「中央可能会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你是听谁的呢？听我的，还是听什么人的？你不是已经揭露了罗瑞卿了吗？岂只一个罗瑞卿呢，还有比他大的呢，他们都盼望我下台。就像赫鲁晓夫搞斯大林那样来搞我，就像勃日列涅夫赶赫鲁晓夫下台那样来逼我下台。这都是可能的，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和你讲故事。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办？」陈再道表态说：「主席，你放心，我是坚决地站在你这一边的，坚决地要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而且要斗争到底。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这点，已经有人跟我打了招呼了。」　　或许正是这个表态才让陈再道在「７.２０事件」后仍然被毛泽东称之为「同志」，得以保全性命？。

那么谁是比罗瑞卿更大的人物？

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　　至此真相大白于天下！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

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贺龙、罗瑞卿正是毛泽东心目中混进军队里面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中国有句俗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苏联人眼中，贺龙自然是「有缝的那只蛋」。而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来作「秘密报告」，同苏联这么搭上界的，自然属于被怀疑之列。所以无论以后贺龙如何洗涮自己，总是有点「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的味道。

刘少奇说：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

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表示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贺龙被搞错了。但是同时，毛泽东也表示：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可见，贺龙的「军阀」形象对毛泽东的刺激甚深。笔者认为：如果说发生兵变，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贺龙。

５．林彪与贺龙的历史纠葛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向贺龙谈起林彪，并对林彪做了一番负面的评价。诸如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而背后却写信要撤换他（指会理风波－－笔者注），另外林彪爱出风头不能顾全大局等。贺龙借此事询问陶铸，知不知道林彪在历史上的问题。陶铸告诉了林彪。根据罗瑞卿的回忆，贺龙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薛明回忆：早就知道林彪的历史问题，而且做过揭发！　薛明说：周恩来告诉贺龙同志，陶铸向林彪反映贺龙讲了林彪在长征中的坏话！

根据《贺龙传》的记载，蒋介石曾经在１９３８年１月于洛阳召集第二战区军官会议，林彪、贺龙等人都参加了。会后，林彪曾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后可吹吹风。」此事成了林彪的心事。　笔者认为，此事有被大肆渲染之举。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初期，表达过类似意见的不少，彭德怀还喊过蒋介石万岁，周恩来也说过不少蒋介石的好话，历史环境使然。

薛明在延安曾经揭发过叶群，此事被认为后来林彪整贺龙的原因之一。在延安，薛明揭发叶群那件事，明明是薛明的错，如今一边倒的回忆录都咬定叶群有特务嫌疑，其实是不公道的。当时延安整风中的「审查干部」运动，或者叫做「抢救运动」，普遍存在的过左的倾向，片面夸大敌情，冤枉好人。如今都说是康生的错，其实错者绝非康生一人，否则也不会成为「运动」。许多人成为受害者，诸如柯庆施、陶铸和曾志，等等。最惨的当然是王实味，直到被冤杀。叶群也是受害者。像叶群和薛明这样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当时是怀疑的重点。我们不排除薛明也曾遭到过怀疑的可能。薛明揭发叶群，有可能是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影响，也有可能是为了撇清自己，也有可能是出于女人间的嫉妒。不论何种原因，事后总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没错。但不要非得把别人说成是不革命、反革命、特务。事后不仅薛明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贺龙也没有。甚至现在写回忆录的人也没有，就因为叶群是林彪的老婆。「抢救运动」做到别人头上是不对的，是毛泽东、康生的错。做到叶群头上，难道就是对的吗？

笔者认为，第一件事，毛泽东难逃挑拨离间之罪。如果林彪真的有错误，毛泽东有权利

批评，但是在另一位高级将领贺龙面前谈及，实在是不利于团结，而是呈口舌之快，搬弄是非。第二件事公正地说，林彪是做了一件好事。历史也证明了蒋介石有抗战之决心。为了抗战抵御外侮，利用蒋介石，鼓舞士气，何罪之有？第三件事，笔者认为诸多文墨骚客应该客观看待历史和秉直书写历史，而不是「为政治服务」。试想，贺龙在最后时刻，不就是因为「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而被耽搁，以至于不幸身亡！

其实除了宿怨之外，林彪对贺龙还有「知遇之恩」。

彭德怀在１９５９年的７月１４日上书毛泽东后，其下台的命运即以决定。林彪在８月４日出席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向新上庐山的中央委员传达中央的精神。林彪说：「…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一批援兵。……」　但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开始同彭德怀以及其它政治局常委们讨论国防部长「换马」的呢？根据《彭德怀年谱》，毛泽东在８月１日对于彭德怀提出的不再管军委一事表态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但是在８月７日，毛泽东单独同彭德怀谈完之后，彭德怀委托其秘书写一个辞掉国防部长、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的信。　在８月１１日毛泽东主持的八中全会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彭德怀、黄克诚的工作改换问题，请大会讨论，同时并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

但是林彪对于此事的反应如何？根据当时林彪的秘书关光烈的回忆，林彪对于此事非常不感兴趣。早在１９５８年军委扩大会议「反军队教条主义」的时候，林彪就写信告诉毛泽东，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林彪还委托罗荣桓向毛泽东说自己不想干，毛泽东批示还是要林彪干。　但是舒云并没有解释林彪不想干什么。根据 FrederickC.Teiwes 和 WarrenSun 合着的《TheTragedyofLinBiao：RidingtheTigerDuringtheCulturalRevolution１９６６-１９７１》中透露，根据他们的采访，对于广泛流传的：

庐山会议期间，彭真从庐山打电话给罗荣桓，通报了会议情况，并说，毛主席准备让林彪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并征求未出席会议同志的意见。罗荣桓说，国防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彪身体不好，似不宜担任这一职务。罗荣桓建议由贺龙任国防部长。彭真向毛泽东报告了罗荣桓的意见，然而未被采纳。

事实真相则是，正是林彪私下委托罗荣桓这样做的。林彪同时委托罗瑞卿向毛泽东进言，不同意林彪出任国防部长，所有这一切充分表明了林彪对于出任国防部长毫无兴趣。

而关光烈的回忆则证实了这一点。１９５９年的庐山回忆开到一半，毛泽东命令林彪上山（笔者注：根据种种材料笔者推断林彪是７月２９日才上庐山；亦有材料认为林彪是２５日上山，例如最新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林彪日记》 ）。林彪上山后，周恩来找林彪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由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全军的事都要管。林彪让关光烈给周恩来打电话，说他的身体担当不了国防部长。　８月１７日八中全会决定撤消彭德怀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同时决定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第三副主席，但是正式公布则是在９月１７日。

二、毛泽东终于作出整肃贺龙的决定

１．贺龙在文革初期的表现

值得指出的则是，贺龙虽然被毛泽东暂时抛弃在一边，但是并无要继续整肃的理由。可是贺龙自己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用人的战略，没有认识到自己可以成为牵制林彪的一个棋子。在毛泽东整肃刘少奇的时候，贺龙不积极同刘少奇划清界限，没有能够反戈一击，于是贺龙在毛泽东的棋盘上成了「闲子」。而贺龙自己却不甘寂寞，到处插手，从而导致自己被动，以致被整。

（１）文革初起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而彭真掌控下的《人民日报》迟迟不予理会，直到１１月３０日才转载。此事后来成为彭真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罪证。各地方报纸转载的时间各有不同，华东各省率先响应，很多省却按兵不动。毛对此极为恼火，成为以后算账的一个依据。

贺龙在这之中的表现肯定是不能令毛泽东满意的。有一个例子是四川省委当局对于是否要在《四川日报》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举棋不定，于是向邓小平打电话请示，碰巧邓小平不在，于是又打电话给贺龙，贺龙回答不转载。于是，《四川日报》便没有及时转载，一直拖到到１２月１８日，比北京还晚了半个多月。

１９６６年3月２８日至３０日，毛泽东同康生连续三次谈话。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要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康生后来在5月5日和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毛泽东的这三次讲话贯穿一个中心问题：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现在已经出了，彭罗陆杨，田家英、邓拓、廖末沙都是，向中央进攻，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3月３１日，康生奉毛泽东之命回到北京并且当日将三次谈话纪要给周恩来、彭真看并汇报四个小时。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不仅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笔者注)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同时，周恩来还特意用打电报的方式告诉毛泽东以示郑重，表示对毛泽东给以坚决的支持。

在４月９日至１２日，此时的刘少奇忙正忙与外事活动，由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周恩来明确指出：《彭真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周恩来

同时警告彭真：想不通可以保留看法。你现在需要沉默。毛主席看过那些人的文章，而且是亲自批准发表的。你我还有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都应尊重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不能再出现任何裂痕了。　实际上，就是让彭真闭嘴，老老实实的等着挨批！更为重要的是告诉彭真，不要抱有任何幻想，我们是不会站在你的那一边的！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圣谕」，违抗不得！

贺龙在４月９日由成都回到北京。彭真在这紧要关头，在４月１１日晚拜访贺龙。　彭贺如何谈的现在是无从知晓，但绝对不会是如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联系到上文，刘少奇的拜访以及那篇不容忽视的报道，贺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表态，也就不难理解。

（２）贺龙「插手」军队

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与卡博、巴卢库谈话，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笔者认为，毛泽东主要是针对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及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和总参「８.２５事件」而言。

诚如余汝信先生分析，中央在５月份下发的[６６]２６８号文件，尤其是肖华发言对刘亚楼的指责，才是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造成混乱的根本原因。　在会议中，空军党委常委形成了三派：１、吴法宪、余立金；２、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王辉球；３、张廷发。吴余在会议初期是被批派，也是少数派。吴法宪回忆到：北京军区空军还比较好，没有跟着起哄，其它如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还有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他们和常委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哄啊、闹啊的，……。

众所周知，中共军队历来是讲山头的，红二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的「山大王」自然是贺龙。会议中间，６月１９日晚饭后，原红二方面军出身的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三人到贺龙同志家里。贺龙同志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看法，而这些看法是同林副主席、叶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与此同时，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据说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这个情况是真是假，我闹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没有直接见到贺帅。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以后成钧他们自己做检讨时讲出来的。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都同时说到了这一点。」「贺龙还表示：『吴、余是有错误的』。」　贺龙当时还说过：「看来，空军这个标兵是有些问题。过去不但你们受了蒙蔽，我们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问题揭开来好。有问题不揭，将来捂出大事来，那损失就大了!」

姑且不论吴、余是否真的是有错误，贺龙未经与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商量，对空军高层的矛盾匆匆表态，给吴、余定性，这对于这次会议中的矛盾激化无疑是起了重大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贺龙的这种私下表态行为就是一种「地下活动」－明显是违背了组织原则的。

相对于同时「插手」的叶剑英，贺龙明显表现出政治上的「幼稚」。会议初期，６月９日，叶剑英专门给空军常委写了一封信，内称：「空军党委领导核心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党委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互相见面，相互间要经常提意见。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要当作某种数据去收集，看到同志有了错误，要随时提出来，不要使问题成堆。希望你们这次会议是在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胜利的会议，是团结的会议。」　叶剑英说的是「官话」，态度是不偏不倚。

而且此时的叶剑英没有独断专行，而是经常同林彪联系，及时汇报会议情况。　林彪在得知空军七常委联名控告材料内容之后，对叶剑英称：「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该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　根据吴法宪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４日的交代，林彪当时说：「在空军现在这个领导班子中比较起来还是吴法宪、余立金比较正，刘震、成钧等人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是不允许的。」

而叶剑英在听了林彪对海、空军党委全会、扩大会议的意见后，「在当晚就报告了邓小平，小平说他完全同意。第二天７月４日在刘少奇那里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军委常委贺龙、聂荣臻、陈毅和叶剑英都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由邓小平亲自记录。

「一、党绝对不能允许搞地下活动，刘少奇特别指出，犯错误，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错误，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肖劲光、苏振华、吴法宪、余立金四同志，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不够的，以后还可以再讲。常委其它同志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党委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这种方式撤换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

对于几乎同一个时期的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中暴露出的矛盾，林彪亦同时指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常委的意见同林彪是完全一致，就是现在领导班子有错误可以批评但是不能罢官，更不能通过「地下活动」来搞！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刘少奇主持的７月４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贺龙是参加了的。贺龙同中央唱了反调。贺龙在７月１１日召开的讨论空军问题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表示：「个别也可以做些调整嘛」　而众多的贺龙传记，视７月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议而不见，把贺龙的话作为贺龙反对林彪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

就在７月１１日晚，贺龙大发牢骚：同林彪的斗争，只要我不死，我就同他斗争到底。我就不相信他这一套，他这个人为什么就不能反对，他能代表党？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他就是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吓唬人，使别人不敢讲话。　根据范硕的说法，「在７月１１日，叶剑英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针对空军常委中有人搞小动作，企图撤换空军两个第二把手的问题，提出批评。他形象引用三国人物的典故，批评某些人『罢官』『夺权』斗争，真是『天下英雄谁敌手，可惜今日无曹刘（暗讽空军中的曹里怀、

刘震)。」　现在难以得知的是，贺龙的这番牢骚如果是真的，难道真的仅是对林彪一个人？毛泽东在６６年９月９日要求贺龙对一些对其不满的同志包括林彪登门拜访，这些其它同志都是谁？叶剑英的那个比喻对于贺龙来说，不也是个讽刺？

据知情人告之，这些老同志之一就是叶剑英同志。

林彪对此心知肚明：「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贺龙底下，在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也早就没有了，一定没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肯定地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的。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能够允许我存在吗？那就变成段德昌，(二十八年开到鄂豫皖去的……)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

不仅林彪清楚，就是其它人也清楚。邓小平说：（林彪）至于和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据笔者所知，陈锡联曾经揭发，在文革初期，时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的黄立清告诉陈：如果他们（指吴法宪）整我，我就到贺老总那里告状。

（３）总参「８.２５事件」（依据笔者手中最新的总参的材料，此事件主要应该由杨成武负责）

「８.２５事件」的主角王尚荣说：他是在那种「革命」气氛中，胡胡涂涂签名的。他是贺龙的老部下。是不是糊胡涂涂签的，笔者没有关键材料来证实。

８月２２日，杨成武在京西宾馆礼堂召开总参机关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机关开展文革的动员报告。会后，有人就在总参机关所在地贴大字报，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一批大字报，其矛头大部分是对着总参领导对着杨成武。

８月２５日下午，毛泽东要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本来总参外事局局长潘振武为引见人。但是外事局参谋孙启祥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他代表革命群众，要求毛泽东不要让潘振武参加接见。徐业夫将他接到孙电话事告之杨成武，杨请示了周恩来，周同意了杨为照顾群众情绪，不要潘参加接见的建议。

但是外事局一些干部对此不满，借２５日下午总参党委召开会议之时，冲到会议现场质问杨成武，杨成武对外事局冲击会场的同志做了解释。这些冲击会场的干部退出后，杨成武又向到会的总参党委委员和列席的部、局领导重复了一遍。王尚荣是总参党委委员，参加了这次党委会。杨成武两次叙述潘未参加接见的经过，王尚荣都是亲自听到了的。但是当天晚上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随后各部、局马上响应，纷纷贴出了大字报，表示对外事局部分人的「革命行动」的支持。总参机关的形势，发展异常迅猛，使人有「乌云压城」之感。

周恩来获知此事，打电话告杨成武，要杨提高警觉，并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随后，周还亲笔写了一信说明事情原委，徐业夫也于２７日写信给总参党委作出解释。

总参党委收到两信后，第二天公布于众。二人的信立马把局势翻盘。

８月３０日，叶剑英在三座门开会，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讲话指出此事是错误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也批评了王、雷。王、雷做了自我批评。

下面的陈虹的说法，是国内党史出版物的关于林彪作用的一个「流行说法」：

本来事情已经结束「可是林彪知道了，却抓住不放，他说此事一定有后台，要撤作战部长、副部长的职」。「第二天，林彪亲自召集军委会，老帅们大都参加了，贺龙副主席也到了会。林彪讲了对『八二五』事件看法后，坚持要撤掉王、雷的职务。他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可，于是会上决定撤销王尚荣、雷英夫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职务，交代问题。随后军委给各大军区和军兵种发电，宣布了王、雷被撤职的事，作战部掀起了对王尚荣、雷英夫的揭发批判。总参各部局的同志也到作战部参观大字报。这就使总参机关的局势得到了控制，变得较为平稳」。

陈虹又说：「客观地讲，林彪当时利用了『八二五』事件，对王尚荣等人进行了迫害，并借这个事件整了贺龙同志，这件事的平反是完全应该的。但这不等于说这个事件就是正确的。就这件事本身来看，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能说成是对的」。

余汝信先生评论到：笔者十分同意陈虹最后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却难以同意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对总参「８.２５事件」的定性，周恩来早在林彪之前已认定是王、雷要夺权，周不是说了「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吗？林彪后来坚持要对王、雷按原则处理予以撤职，并没有什么错，否则，作为军队中枢的中枢——总参机关的局势难以稳定。而且，这一处理意见得到了军委常委会议全体与会者（包括贺龙）的一致认可，不能说是林彪一人对王尚荣（陈虹此处没有提雷英夫）的「迫害」。陈虹文章还多处为杨成武开脱，认为杨并无意要处理王尚荣，这恐怕也有违当时事实。总参大院内发生的事，杨成武不主动去汇报，周恩来、林彪怎会这么快就知道？以杨的脾性，周、林对事件的性质都已表了态，维护了杨的权威，杨高兴还来不及，还会为王尚荣说什么好听的话？

而事情的关键还在于，在这大字报上，不仅有王尚荣的签名，还有贺龙办公室的人。 贺办还随后另外起草了一张「炮轰办公室党委」的大字报，矛头指向杨成武，号召向王尚荣学习，虽然贺龙、薛明并没有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而且贺龙对大字报内容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事后，薛明还是为此做了检讨。

而王尚荣在被「揪」出来之后，王的爱人打电话给薛明，说王尚荣想见贺龙。

针对此事，林彪批示到：这件事与不久前煽动空军颠覆吴法宪、海军反对李作鹏、王宏坤等「同出一个根源」，并报告毛泽东。

２．毛泽东决定整肃贺龙

贺龙上述的所作所为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但是更重要的是贺龙对刘少奇的态度、贺龙与林彪的关系终于使毛做出了整肃贺龙的决定。

８月５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的批评了刘少奇。就在当天晚上，周恩来约各元帅（包括贺龙）谈话，谈了三个多小时。　周恩来此举，明显是在向各元帅交底。吴法宪回忆到：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据笔者考证实为６日）周恩来亲自向军队主要领导人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与会者除吴法宪外，还有杨成武、张爱萍、肖华、许光达、肖劲光、苏振华等人。周恩来将毛的「大字报」向众人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周恩来向各位元帅交底只会比同吴法宪等人交的更深。

随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和会后召开的一系列解决刘少奇、邓小平「问题」的党内生活会上贺龙并没有表态，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向毛泽东表示「忠心」，同刘少奇划清界限。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回答：「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

此外，有知情人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军队系统将领与会人员只有贺龙一个人对批刘、邓不积极，这也可以从《贺龙年谱》以及其它材料反向理解得知。

贺龙同刘少奇藕断丝还连。不仅不划清界限，在王光美受红卫兵冲击后，贺龙见王骑自行车上班不安全，特地从军委总参派出一台卡车保护王上下班。　８月１８日刘少奇上了天安门，但是一位工作人员发议论：「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贺龙当场批评：「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可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以后不要这样说喽。」

贺龙的表现无疑是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免职，贺龙就被毛泽东用做牵制林彪的重要人物。上海会议批罗，贺龙则被解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　但是随后在１９６６年３月份举行的批罗会议，贺龙却被排除在外。上海会议一结束，贺龙就被安排到广州休息，随后被中央安排到西南视察。　特别是中央传达有关罗瑞卿问题之时，特意保护了贺龙。　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有意安排，刻意让贺龙同罗瑞卿事件摘清。罗瑞卿被批判之后，林彪曾严令军中诸将「批罗不可涉及贺龙」，所以那时贺龙丝毫不曾被牵连。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开始的「批刘邓生活会」，当牵涉到贺龙的时候，毛泽东下令停开，保护了贺龙。

但是也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在权衡各种因素利弊之后，毛泽东还是选择了整肃贺龙而不是继续保护。但是在整肃之前，还是给了贺龙最后一个机会。

毛泽东在９月５日，把林彪递交上来的揭发信/诬陷信交给贺龙。同时毛泽东对贺龙表态：「你不要紧张，我当我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很，能联系群众」。　当时贺龙表示要找林彪谈，但是毛泽东婉言拒绝。但是三天以后，９月８日晚，毛泽东通知贺龙去谈话。９月９日徐业夫按照毛泽东指示给贺龙打电话：「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争取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缘何这般安排？９月８号，毛泽东故意置贺龙于召开的中央军委

常委会之外(详见下文),目的就是让贺龙登门拜访的同志在贺龙拜访之前知道毛泽东的底。

１０日，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登门拜访林彪。林彪说：「贺老总啊，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说：「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

这次谈话，很明显的是林彪要让贺龙表明在毛、刘之间的立场：支持谁，支持毛，反对谁，反对刘，提醒贺在关键时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贺只是绕圈子，打转转，王顾左右而言他。话不投机是很正常，也从令一个方面证实了贺龙没有彻底抛弃刘，这不符合毛泽东的期望。林彪等于把底透给贺龙，但是贺龙模棱两可的答话无疑让自己陷于日后的被动。

贺龙同林彪谈话之后，还去拜访了其它几位毛泽东提到的几位同志。这几位同志是谁，笔者无从知道。但是有人写道：这几位同志或者背过脸去，缄口不言；或者违心批评，附和形势。

毛泽东在文革中多次用「登门拜访」的形式来测试对方的政治表态。

9月中旬，贺龙对一位领导说：「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不承认存在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１０月，贺鹏飞还喊：「谁反对刘少奇，谁就是他妈的反革命!」　贺家的子女确实表现的也非常突出。７月，贺晓明在北大同江青辩论长达三个小时。　毛泽东在７月１８日回到北京之后，还亲自做过在清华的贺鹏飞的工作。

刘少奇在１０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上做检讨后，贺龙说：「刘少奇的检讨是被迫的。」

知情人告知，在十二月底，贺龙还写了一个报告抬头有刘主席。

毛泽东把自己置于一个调解人的位置，造成的印象是林彪和其它老同志对贺龙不满。毛泽东的权术谋略不可不谓是炉火纯青。

就在贺龙一步一步的走向深渊的时候，在１２月２８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突然跟他招呼，让贺龙坐到自己身边，以示信任。

但是毛泽东这个「好人」，被周恩来「一语戳穿」。１９６７年1月１１日，林彪主持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　这不正说明「打倒贺龙」的整个部署是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吗?

１９６７年1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

３．林彪参与整肃贺龙

现在可以来探讨一下林彪对整肃贺龙的参与。

９月２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你要主意贺龙，贺龙实际上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由此可见，是军委要开会，林彪才打电话要求李作鹏写材料。而贺龙是否是罗瑞卿的后台有待商斟，但是贺龙确实在搞林彪，而且很明显是贺龙搞在前，而不是在后。

毛泽东一面在贺龙面前做好人，另一方面指使林彪充当「坏人」。１９６６年9月８日上午，军委常委会议九人民七会堂新疆厅召开。林彪、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刘志坚、邱会作列席。据会议记录 ：

主持会议的林彪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抖。他的材料很多，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找各位元帅谈一谈。主席已找贺龙同志本人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淡，主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

「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外，贺是最不好的一个。」

「过去早有苗头了，因为不那样紧急，所以拖着没有谈。我从没有同主席谈过。这次他搞到总参来了，利用外事局这样小的一件事，要把杨成武同志搞掉。要打掉杨成武，换上许光达。」

「在空军大闹要搞掉吴法宪，就是他煽动的。打掉吴法宪，替成钧开路。」

「空军开会期间，贺那里是地下司令部」。

「海军他想扶苏振华，搞掉王宏坤、李作鹏、张秀川。」

「材料很多了，总参、空军、海军、工程兵、政治学院、国防工办、公安部、卫生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很密切。」

「现在主席说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这是个打招呼会。会上没有异议。

与会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纷纷表态拥护毛的决策和林彪讲话。　就在同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通过了经叶群、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提出要成立贺龙项目组的提议，形成了会议决定，并责成中央项目小组写出立案报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根据林彪的说法，材料很多，不仅空海军有，还有总参的，据刘秉荣说有十几封！这个说法和张云生的回忆是一致的。　如果此说属实，贺龙则是众怨甚多，那么这些材料都是

林彪组织的？根据中共党史写作的潜规则，只要和林彪挂钩的、上了林彪贼船的都会「抖个干净」。那么海空加起来材料也就不过几份，其它那些是谁写的，谁组织的？有谁有这么大能量？而且后来贺龙登门造访的不仅有林彪，还有几位其它同志。是谁，难道还不清楚嘛？如此，林彪追究贺龙，仅是其布局中的一个部分。因此，笔者认为林彪搜集的材料完全是毛泽东授意，而且关键的是贺龙确实掺合在其中。

同一个会上，林彪还谈了一个事情：「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主要危险在主席百年之后，他会放炮起哄，会出乱子。」　毛泽东怕有人做朱可夫。十月份，关于贺龙有问题的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负责人。　其中，根据冼恒汉的回忆，叶剑英、肖华专门就贺龙的问题同他交底。

正如上文所提到过，毛泽东认为站在王尚荣背后的是贺龙，真正的主谋是贺龙。作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徐业夫为什么要写信给总参党委？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秘书，是无权主动去做此事，而是毛泽东授意。可以说，军队是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的「后院」，后院起火，可不是毛泽东所想看到的。因此，笔者断定毛泽东对于整个「８.２５事件」是了如指掌。那么林彪坚持要对王、雷按原则处理予以撤职是自己的意思，还是执行毛泽东的意见？

根据王年一的材料，在８月中旬至９月初，林彪对贺龙的追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林彪在８月１７日表示海军应该立即收兵停战，立即收回工作组。要团结起来搞好工作。不久，林彪召见了李作鹏（笔者注：实为９月２日，林打电话给李），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李作鹏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给林彪写信，诬告贺龙反对「以四好为纲」，支持海军某些人反对李、王、张企图罢官夺权。林彪将此信报送毛泽东。

（２）吴法宪１９８０年９月４日交代：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根据贺龙年谱，是８月２８日，笔者注），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有一天上午林彪约我去汇报情况，即汇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情况，我说：「据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等人交代，会议期间他们曾到贺龙家去谈过，说：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和领导会议，问题很多，又不积极，对开会采取消极态度。贺龙同志回答他们，『那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开嘛，继续把会开好。』林彪说：『这不是明明指示他们夺你的权嘛，我早就知道贺龙插了手，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贺龙早就想叫成钧当空军司令员。你叫傅传作他们把材料写出来给我，并且写一个报告给我。』然后林彪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我就回来了。」我回来后就叫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他们写材料，他们材料写好后交给我们，用吴法宪、余立金两人名义向林彪写了一个报告，将材料送给林彪。

（３)吴法宪，余立金给林彪的这个报告写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报告中说：「大概是６月１９日晚饭后，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三人到贺龙同志家里，贺龙同志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看法，和林副主席、叶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报告中转述了吴富善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对贺龙的「揭发」，然后说：「我们觉得空军党委这次全会所以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同志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林彪将此报告和所附材料报送毛泽东。

另外，根据张云生的记述，在叶群组织下，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写了「揭发」贺

龙的材料以及几个兵种都写了揭发贺龙的材料。

值得重视的是，上述事情的发生都是在8月中旬至9月初。

客观的说，根据上述论述，贺龙确实有到到处插手的活动，揭发材料里面诬陷的也会不少。而且更重要的是贺龙对林彪的敌视态度，使得贺龙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组织原则，例如在关系到部队人士变动上面。

更深一层，追究贺龙，是林彪自己主动追究的？还是林彪得知毛泽东的意思后主动去搜集的？换句话说，是林彪用材料去改变了毛泽东对贺龙的认识还是林彪知道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有变之后才去搜集材料？甚而是毛泽东授意林彪去做的？

王年一曾引述吴法宪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４日交代：「在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以前，林彪曾多次同我说：贺龙要成钧当空军司令员，你要警惕和防备成钧夺你的权。」　但是最新的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却再没有提及林彪曾说过这样的话。联系到上述材料收集的时间，笔者认为，吴法宪的这个说法是在项目组压力下的产物。

而对于海军的事情，徐向前后来讲：

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学生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

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

在６６年的文革初期，空军借倒刘亚楼拱吴法宪、海军倒肖劲光、总参倒杨成武，而这些背后都隐藏着贺龙的影子，而且贺龙也敢说敢做，就如贺龙说调整班子一事。贺龙说：王宏坤可以调出来！　军队如此混乱，贺龙俨如幕后「黑手」。毛泽东怎么安得了心？

所以，林彪是被毛泽东推到前台来整治贺龙的棋子而已！更重要的是，现在众口一词，只说林彪参与了整肃贺龙，现在众口一词，其它人根本不提，这对林彪是不公平的。

４．周恩来也对贺龙不满

按说贺龙对毛泽东矛头指向刘少奇一事，早在周恩来解释毛泽东的那张大字报以前就明了。

７月３１日，王任重、李井泉来到贺龙家，对当时的形势议论一番。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因为有人贴了刘少奇的大字报和王光美在清华被群众攻击。　贺龙建议王任重去找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主管解决清华问题。而要解决清华问题，势必为向王光美开刀，而向王开刀就是对刘少奇开刀。但是王任重推辞不去，于是薛明出马。薛明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陈述了贺

龙的意见。但是周恩来对此态度很淡漠，很是让薛明纳闷。

其时的周恩来正在为贯彻毛泽东的文革意图而操劳。7月３１日，周恩来亲自找蒯大富面谈。贺鹏飞几次也想听蒯大富的汇报，都被周恩来拒绝。蒯大富狠狠的告了工作组一状。

贺龙不是不知道毛对刘的态度。贺龙就在8月1日刘少奇主动承担「文革」中关于工作组错误的前一天，即7月３１日这天，对周恩来说：涉及到刘少奇的处理一定要谨慎，一定要顾及党的团结。

8月5日，周恩来在清华主持为蒯大富平反的大会。周恩来说：「我这次来清华是老老实实做学生的，来学习的，也是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同日，周恩来又向贺龙等元帅解释，而贺龙的做法实际上又一次扯了周恩来的后腿。

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清华贴出大字报，支持工作组，支持王光美，骂蒯大富。这些都不符合当时周恩来解决清华问题的方针。而这些大字报大都是经过贺龙以及贺龙的秘书修改的。

周恩来主持清华大学蒯大富平反的大会，贺鹏飞对蒯大富是批的体无完肤。

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开展，贺龙在诸多问题上，和周恩来产生了矛盾，特别是荣高堂一事。在薛明、贺晓明在凤凰卫视访谈的时候，明确说道：周恩来说荣高棠是反革命，但是贺龙说不是。

8月１８日贺龙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8月３１日贺龙再次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还特意安排贺龙同毛泽东在第一辆车上。事后，周恩来被中央文革小组提了意见。　贺龙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

在得知王尚荣被定性为反革命后，贺龙说：「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要揪后台啊。」

在林彪的9月8日传达了毛泽东对贺龙的看法之后，周恩来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１９６６年9月２５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时故意透露了一点玄机：「（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　丁抒先生评论到：周恩来的这种讲法，故意抹去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者贺龙的名字，在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加上了当时仅仅是个连长的林彪。这种对贺龙的贬低在那个政治上极度敏感的年代里就是一种关于贺龙要垮台的暗示。

１0月1日，贺龙正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有人向贺龙报告荣高棠因为内部派系斗争被造反派围攻，贺龙接到此报，急火攻心，当场晕厥。

贺龙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旬，贺龙在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小组会上作检讨：「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贺龙随后在１１月１３日的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也仅是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给其准备的稿子，照本宣科，显得谨慎，不再当众放炮。

但是贺龙还是身不由己被牵涉的越深，最后周恩来生气了。

为了对付不让荣高棠出国的体院和体委少数派，１１月２日下午由国家乒乓球队、游泳队、羽毛球队、体操队组织了个「出国誓师大会」，并邀请了贺龙，荣高棠出席大会。贺龙对此的解释是：「前天开誓师大会，接了请帖很犹豫，未问清楚，本来出国有几百人，讲讲话，一去看到一礼堂人，知道糟了，要我讲话，我就不讲话了。」

到了１１月４日，多数派一些出国运动员等竟不按时上车出国，而到国务院请愿，要荣高棠出国。周恩来对此很恼火：「把贺总也请来了，把贺总给拉下水了！」「听说荣高棠不出国，你们就不去，我一听就以为荣高棠搞的鬼。我对熟悉的同志要求的严，我了解荣高棠，他有许多短处，突出政治不够，原则性不高，政治性不强，还有些迎合。我怀疑誓师大会是他搞的，要批评。」

荣高棠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陶铸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０日会见体育界造反派时表示：体委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是荣高棠。

贺龙对李达说：「荣高棠是我的接班人，我告诉了总理。」　这句话传了出来，周恩来的反应如何，不难想象，贺龙是在和总理对着干。

时隔半个月，荣高棠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徒弟、叛徒嫌疑，是周恩来亲自定的。周恩来动怒了，打了贺龙的屁股。

周恩来：「你们说荣高棠是个修正主义分子，我看是对的。在我们体委，荣高棠掌握这样领导权的人，完全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那怎么能不把我们体育界引上歧途呢？」「不晓得从那个时候（指抗战时期）一直发展到现在，却变成一个真正的彭真的徒弟——两面派罗！所以，他在思想上，在灵魂深处，应该说，你们批评得对，他是彭真型的人！」「不仅是在表面的形式上，在灵魂深处，而且在历史上，我们现在正在审查彭真入狱经过的那一段历史。同样的，荣高棠也有这样的经过，也值得审查。」

周恩来认定是荣高棠利用这些尖子运动员来要挟。周恩来的讲话把荣高棠打入了另册。

在周恩来讲话之后，陈毅也讲了，贺龙发现预先准备的稿子「步调不一致」。

贺龙最后来了个补充发言：「荣高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大会开得很好。要把荣高棠斗倒！斗垮！斗臭！」。　贺龙这段话明显的是言不由衷。

私下里，贺龙对荣高棠说：「我们要相信毛主席。有人想整我，毛主席不听他们那一套。毛主席还说要保你荣高棠。」　在周恩来把话说明的时候，贺龙还是没有和荣高棠划清界限，怎么不扯周恩来的后腿？

荣高棠自然不是反革命，但是在此问题上周恩来同贺龙的认识不同。如果只是群众组织造反派贴荣高棠的大字报，说其是叛徒不要紧，周恩来这个讲话则是完全不同，周在那个时候是被认为代表中央表态。

薛明说：「从这以后群众就不饶他了，总理说他是反革命，彭真式的人物，你这么讲不是反对总理嘛？好多大字报就对着我们来了！」　薛明说：贺龙认为荣高棠是革命的干部犯了工作上的错误。

随后贺龙的形势突然恶化，被造反派冲击，与周恩来等这次讲话不无关系，要知道，揪后台在文革中是司空见惯。周恩来为什么不替贺龙在荣高棠问题上「撇清」一把呢？周恩来为什么在荣高棠定性一事上不事先同贺龙通个气呢？

就在开完斗争荣高棠大会的第二天，贺龙被体育系统造反派逼的有家难回。当天，周恩来指示贺龙暂到钓鱼台６号楼休息。第二天，贺龙按周恩来的指示从钓鱼台搬到了新六所。

三、周恩来负责实施整肃贺龙的决定

尽管在１２月２８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让贺龙坐到自己身边，以示信任，然而这丝毫改变不了贺龙的处境，贺龙已经走向深渊。

１２月３０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当着贺鹏飞的面当众宣布：「你爸爸犯有严重错误，我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要触动他啦，还有你妈，也不是好人。」１２月３１日，「打倒贺龙」的口号响彻北京街头。１月４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贺龙「搞阴谋」、「是个坏人」、「要端出来」。

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贺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４０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

同时，受到江青鼓动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传出了风，要到新六所抓贺龙。薛明连续３次向周恩来告急，但是没有回音。

１月１１日凌晨，贺龙本意回东交民巷，途经中南海时临时起意向周恩来报告此事。周恩来得报后让贺龙暂住其家。对于此事，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中已经有详细描述，不多冗赘。薛明、贺晓明在凤凰卫视访谈的时候对此事也说得非常明白，而且薛明特意强调是她建议贺龙要向周恩来报告一下。

据知情人告之，贺龙住进周恩来家后，周恩来有意躲贺龙，不与其交流。但是贺龙极想询问周，如果实在躲不过去，周则以无时间读报让薛明读报来应付。此般种种情节同权延迟

所述大同小异。

１．周恩来出面向贺龙摊牌

作为贺龙的老部下，成钧以及廖汉生在不堪忍受的迫害下，在１９６７年初，供认了「贺龙兵变计划」。　笔者认为此事直接导致了贺龙问题的升级。

１９６７年1月１９日，周恩来、李富春代表中央正式同贺龙谈话。周恩来主要讲了如下几个问题：１）林彪说贺龙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问题；２）贺龙到处插手；３）毛泽东百年之后不放心；４）洪湖肃反贺龙应负责任。谈话过程中，周恩来不容贺龙分辨，谈完之后就不理贺龙，告之，「我还有事要办」就离开。贺龙当时非常惊讶和气愤：「我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贺龙指的是谁？周恩来应该是其中一人吧。

据知情人告之，当时周恩来讲话如「连珠炮」，不容贺龙分辨，贺龙想插话，但是都被打断或者阻止。贺龙听完之后，并不想离开周家。《中国元帅贺龙》记载：贺龙有很多话要说，实在按耐不住了，站起来想申述自己的观点。周恩来何等聪明，不等贺龙说话，便阻止他。　薛明回忆：（周恩来的谈话）说的快极了，像一口气念下来的讲稿，不给贺龙说话机会。

谈完之后，贺龙就被送到西山隔离，实则软禁，正如余秋里所言是失去自由。　贺龙对此番「正式谈话」耿耿于怀：「别人不了解我，难道总理还不了解我?」「毛主席不是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帐。」

笔者认为：周恩来这次谈话，其实就是代表中央同贺龙之间一个摊牌。根据吴法宪的回忆，主要是毛泽东、周恩来连手策划，周恩来执行实施。吴法宪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１９６９年6月9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Ｏ一医院逝世。」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主要是毛泽东、周恩来连手策划，周恩来执行实施，这也是文革中诸多冤案的一贯模式，例如后来逮捕所谓「四大金刚」等。

知情人说，毛泽东在６７年１月份重申对贺龙的的项目审查。 此事应当同成钧的供认有关。知情人说，１９６７年１月份成钧的供认贺龙确有兵变计划，这同１月１９日摊牌贺龙一案的升级有直接关系。

王力回忆说：（１９６７年）一月份就不保贺龙了。

６７年1月上旬，陈再道、锺汉华到北京参加军委会议。1月２０日，陈、锺打电话回武汉说：军委在查贺龙的问题，我们军区也要查有没有贺龙分子，开常委会查这个问题。二方面军出身的副司令员唐金龙在２１日凌晨在家开枪自尽。

知情人告知，有人问过直接办（贺龙）案的人，此人说从头到尾都是周在操作，林一直没有掺合。此言可信。代表中央同被迫害官员谈话宣布中央处理决定是周恩来的一贯职责：无论是早期的习仲勋，杨尚昆还是后来的刘少奇、陶铸、贺龙、「杨余傅」，直到「黄吴李邱」都是由周恩来出面向他们宣布中央的意见，然后关押、审讯、流放。周恩来对这套操作流程想必已经是轻车熟路。

贺龙被送到西山之后，６７年３月份，中央军委改组。贺龙的军委副主席一职被正式撤销。

周恩来对体委造反派的指示：对体委的文化大革命十分关心，并再三要求不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刘、邓、陶，以及贺龙、荣高棠。这就是大方向。

２．贺龙项目组的设立

杨成武回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项目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项目组长是贺龙兼任的。『文革』中，贺龙被列为项目后，组长仍由周总理接任。」　这个组长，杨成武的这句话是存在岐义，组长到底是指的贺龙项目组还室指的彭黄专案组？但是如果联系整个文章来看，在杨的文章里面，还列举：上海会议「揭发了所谓罗瑞卿的问题，会后成立了罗瑞卿项目组，组长也由周恩来总理担任。」党中央于１９６７年春成立了对干部的项目审查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无疑这个是指的贺龙项目组，因为杨的意思是指这些新成立的项目组的组长开始都是周恩来担任的。

在王年一的文章也是如此论述到：王年一在引用了杨成武的原话后，还解释到贺龙的级别是如此之高，「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不担任谁担任？除了毛泽东，还有谁能让周恩来担任这个组长？」王年一写道：「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来宾卡博和巴卢库的讲话中就明确说了：『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９月１３日（正是贺龙在囚禁地盼着周恩来兑现秋天去接他回京的诺言时）（笔者注：此说有误），中央正式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审查报告经过周恩来之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语」。

在《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司马公」先生一文中》高文谦答复司马公时，明确点出贺龙项目组的组长开始时是周恩来。

因此无论是王年一还是高文谦都指的这个组长是贺龙项目组的组长，但是鉴于王年一仍然在国内，而高文谦在国外的不同状况，此中缘由不说亦明，王年一不可能像高文谦一样直言而述。

综上所述，在杨成武的回忆中，这个组长指的是贺龙项目组的组长无疑。而且这和当时的项目组的潜规则是相符的，就是直接挂名的项目组的组长要高于被审查人的排名。例如在「二办」中主管彭德怀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但是挂名的却是周恩来。

附：周恩来对贺龙项目组请示报告的批示

周恩来

１９７０.１２.０３

「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消。现项目组既又重新提出查此人，可否先告项目组将邓小平以三反罪行、招降纳叛线索（笔者注：先定罪，再按罪名找材料，是项目组一贯模式，从彭德怀到林彪一案，概莫例外）写一报告来，以便拟此查阅。周恩来。」

附一

贺龙项目组的报告

康生、永胜、法宪、叶群同志：

关于邓小平的三反罪行，招降纳叛等问题，经过调查，我们已掌握了不少材料和线索，但其中有些问题的核实和查证，还需要查阅一些档案材料。为此，我们拟到中央档案馆、中办机要室等单位查阅有关材料，并对必要的部分拍照取证。

是否妥当，请批示。

附：申请查文件目录表。

贺龙专案组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附二：

吴法宪对贺龙项目组报告的批示：

可否查这些档案，呈请总理、汪东兴同志批示。

１９７０.１１.３０

上述这些项目组报告皆来源于宋永毅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此为具体办案的中央项目小组的典型报告案例。由小组具体操作人员写出报告上报主管人员，由主管人员在上报周恩来。是否可行或材料是否可由采纳，最终都是由周恩来拍板定

案。

贺龙项目组成立之后，周恩来并不是和贺龙断绝了联系，也不是无能为力了。而这恰恰是官方为周恩来辩护的最大的所谓「证据」。

１９６８年８月６日，康生在贺龙写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待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　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周恩来主持的。

１９６８年下半年项目组曾经准备与贺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是这个方案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否定。　反过来，那些迫害贺龙的方案又是如何出笼的？不也是在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或者中央项目组会议上通过的？

其实「背靠背」的策略早在一年以前就出炉了。周恩来：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你们写过信，主席不批准怎么办？我不能拿主席的话压你们。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你们知道我的处境、我的难处：把他搞出来怎么办？你们知道了就不要去了。不能宣传。宣传也进不去。」

第二天，周恩来又传达了「背靠背的斗是最高指示」。

在同一次讲话中，周恩来告诉这些代表：「贺龙他制造材料，说他一直跟毛主席走，是一贯正确的，这当然是不对的。你们要攻他的要害。研究问题要研究点历史。诸如南昌起义问题，洪湖革命问题，立三路线问题以及段德昌问题。」

贺龙死亡之后，３０１医院写的两份「关于贺龙死亡原因的报告」都上报给周恩来。周恩来无批示。

３．贺龙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中扣在贺龙头上的帽子有一大堆，诸如「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土匪、军阀」、「二月兵变」、在体育界搞「锦标主义」，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足以置贺龙于死地。正如「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足以置刘少奇于死地，而必须把他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一样，贺龙最致命的罪名是以下几项。

（１）晏章炎揭发贺龙通敌

中共湖北省委１９８３年６月４日报送中共中央的中共武汉市委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４日《关于晏章炎诬陷贺龙同志的调查报告》说：晏曾三次诬告贺龙。

晏章炎：武汉市第二十中学英语教员，其父晏勋甫，解放前曾任国民党陆军中将参谋长、南昌行营二厅厅长、汉口市市长等职。

第一次在１９６４年下半年。他找学校党支部书记袁顺理谈话，他说他父亲在１９５８

年被划为右派后，曾告诉他一桩秘密。说他父亲抗战前在国民党南昌行营二厅当厅长时，有一天收到一个报纸卷，拆开后发现一张字条，落款是一个龙字，他父亲当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派了一个姓黄的去苏区找贺龙接洽，回来后说贺龙同意投诚。情况层层反映上去，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有关材料上作批示，予以否定。 笔者认为，若非真的属实，晏章炎怎么敢在贺龙还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揭发此事？

第二次在１９６６年7月２３日，晏写了一份材料，继续诬告。情况又层层反映上去，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予以驳回。

第三次在１９６７年2月１４日，晏写了《关于揭发贺龙在抗战前叛变的罪恶活动的材料》。由晏所参加的造反组织的头头专程进京交给了中央文革接待站中南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按规定程序送交中央文革办公室简报组。

２月２０日，简报组原文照抄了一份送林彪、江青。２月２２日，江青拿着抄件对周总理说：「这下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随后，２月２８日，文革办公室将原件转交中央军委信访处。３月４日，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送杨代总长，请示处理意见。３月６日，杨代总长签送林彪阅。３月９日，林彪在送批签上签了名，江青划了圈。

（２）烈士段德昌遗孀揭发贺龙杀害段

１９６７年初，湘鄂西已故领导人段德昌的未亡人给武汉军区写了一封信，主要揭发：（１）贺龙在三十年代和国民党有勾结；（２）贺龙在杀段德昌一事上的责任。

段德昌的未亡人刘淑云揭发：「１９３３年古历2月１１日，贺龙到我家，对我说：『段德昌就要回来了，给他准备点好吃的吧。』第二天段德昌回到军部就被捕了。同一天，我也被捕了。古历2月１３日贺龙亲自审问我，一进门就问：『段德昌是反革命，你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贺问：『他是反革命，你们是俩口子，你都不知道！？』贺龙问：『段德昌平常说过哪些反动话？』我说『他什么反动话也没说过』。贺龙走后， 2月１４日、１５日关向应、夏曦先后来审问了我。」刘淑云还说是贺龙设计「诱捕了段德昌」。

关于段德昌一事，在刘淑云揭发前后，段德昌手下的士兵、以及贺龙军部特务班（执行看押犯人）的战士以及亲手执行枪决段德昌的战士都写了揭发材料，力陈贺龙的责任。

对于杀段德昌一事，对周恩来的影响不小。周恩来还「提醒」时任宁夏军区司令的朱声达起来揭发。

周恩来：（大意）傅传作同志告诉我两件事，一是贺龙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二是段德昌同志被杀时，贺龙问他有什么要求，段说：一我不是改组派，是共产党；二洪湖老百姓很好；三给我一颗子弹。贺龙说他一贯正确，实际上立三路线时期，他执行的最坚决，只剩下他和关向应、夏曦三个人，谁都不相信了，段德昌同志就是他杀的，洪湖根据地是段德昌同志搞的，那时贺龙在山上，他篡了段的功劳。这一段历史贺没有给组织讲，也没有人揭发。关向应是个好同志，但到延安时我去找他，也没有讲。贺龙是冒险主义，后是逃跑主义。这件事你（指朱声达）是知道的，也不揭发，你怎么没把段德昌同志的作风学到，而是学了贺老总的作风，所以这次宁夏搞的很不好，要好好反省反省。

朱声达作出了回应。

朱声达：长期以来，在思想上对贺龙不仅崇拜而且十分感恩戴德。自认为在捆改组派时捆了我，并要杀我，是贺龙、关向应救了我的。后来我在长征途中负了伤（当时在红四师十团任连长），过金沙时掉了队，又是贺龙派周长庚（当时是红四师的卫生队长）把我抬走的，因此我对贺龙感恩不尽。在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对贺的重大问题一直进行包庇。一九三二年洪湖突围、作战、行军都是段德昌指挥的，胜利到达了湘、鄂、川、黔苏区，这一段功劳是段德昌同志的，但后来被贺龙窃取了，我一直没有揭发。

我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学了贺一套军阀主义作风，一直把这种军阀主义作风带到党内来，一掌遮天，目中无人，大搞一言堂，在党内进行家长式的统治，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破坏了我党的光荣传统。在部队建设上不抓根本，不突出政治，而是搞突出军事，贯彻彭、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同志之间拉拉扯扯，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对党、对组织阳一套、阴一套，玩弄两面手法。总之，在思想上、作风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军阀主义一套，与毛主席的教导格格不入。这是我所犯错误的一条重要原因。

周恩来说：三二年还是三三年「肃反」，第一个就把段德昌同志杀了，说他是「改组派」，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是洪湖地区的创始人。解放后讲起这个事才平反了。贺龙说这个问题他不负责任，把责任推给夏曦，肃反时的负责人是贺龙、夏曦、关向应，贺龙是头子。我曾找他谈过话，说肃反应该是贺负责，贺一直认为由夏曦负责，这次他才承认错误。这次我到武汉，部队一同志说：打死段德昌起决定作用的一票是贺龙。我（总理）说这句话很公道。两个结论：贺龙不是一贯正确的，（一）在湘西执行了立三路线，（二）肃反扩大化。

而周恩来早在１月１９号提出贺龙在肃反一事上是有责任的。贺龙与１９６７年３月７日上交《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为自己辩护。周恩来将材料转呈毛泽东。

这个材料，显然周恩来没有相信。

（３）李仲公揭发贺龙通敌－-最致命的揭发

贺龙同志的平反有两次。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６日的《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指出，１９７４年9月２９日《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贺龙同志的平反不彻底，有些提法是错误的。

哪些地方平反不彻底？根据《贺龙传》以及《贺龙年谱》的记载，贺龙的主要问题是牵涉到１９２７年、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的叛变、通敌问题。 １９７４年的《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１９２７年以及１９２９年的事情丝毫不提，而这正是当时《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所提当时立案是必要的依据。

而贺龙拿到这要其回答这几个年份的提纲时候，恼怒异常，「冤枉」二字写满几张纸！贺龙怒吼：「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整整一天，贺龙就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１９６８年3月２6日至4月２０日国务院参事多次举行分组会，学习文件， 座谈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历史上的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的「军代表」动员参事们反映他们所知道的中共高干的历史情况，李仲公３月２５日对「军代表」说，我有事情反映，但必须向周总理本人单独谈。稍后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早年贺龙同志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参事室即向周总理联络员郑凯同志电话报告，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去。参事室即派人送去。

而李的这封信正是揭发贺龙１９２７年和１９２９年贺龙通敌叛变的亲笔信！　具体的说，就是南昌起义时期干了哪些阴谋活动，１９２９年又亲笔写投降信。

根据蒋健先生的分析：李是蓄谋已久，但信显然不是１９６８年3月伪造的，否则他造假的技术和速度未免也高太快了，周总理也太好骗了！

客观的实事则是：１９６８年5月２０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学习班学员时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宣称对贺龙不保，虽然毛泽东没有提李信一事，但是未免过于巧合，令人遐想。

１９６８年6月，贺龙问题升级。贺晓明：「那个文件抬头变了，就是坦白交代了。我爸爸一看就说坏了，我的问题升级了。」

１９６８年6月１４日，贺龙一案正式由中央项目第二办公室接管。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指出：贺龙是中央点了名的坏人！　既然如此，项目组对于贺龙怎么会发善心？

「九大」上，周恩来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表示：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证明他们是同刘少奇一样的叛徒、内奸、异己分子。

贺龙被困在西山永远没有被释放出来。

在贺龙去世后的5年以后，周恩来下令调查李仲公交来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结果发现所用纸张是４０年代后出产的。这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呢？李仲公其人从历史上看，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但是在９０高龄时，在接受调查时拒不承认造假，尤其是面临抗拒从严的后果，还拒不认错，不合他的本性。

关键的是，为什么当时周恩来不做纸张鉴定？１９７４年9月２９日就要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而这个鉴定结论一直到１９７４年9月２３日才出炉，这都说明了什么？

周恩来在１９７５年6月对薛明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这个对不起，应该是诚心诚意的！

而贺晓明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候，突然间来了个转折：现在呢我就觉得呢，这个问题

太复杂了，太复杂了，总理有他的难处，但是他也有过失。

然而，知情人却告诉我两件事：１）贺龙病危的当天，黄永胜、邱会作把贺龙病危报告交上去等了四个小时左右才有回音２）薛明在私下里接受某著名女作家采访时，一谈到周恩来就「咬牙切齿」。

而李仲公的这封信是周恩来亲自处理，未经过任何第二者！周恩来受此信影响至深！在贺龙平反的过程中，直到最后一刻才去鉴定真伪，周恩来阻挠贺龙平反也就不难理解了!。

南昌起义部队在溃败过程中，贺龙第１０军第１、２师在发生过任由粤军缴械收编（随之牵动了前沿阵地２４师的溃散)，而南昌起义时贺龙麾下的赵营长叛变导致起义提前举行。

红卫兵在北平《晨报》上发现的一则消息，云贺龙曾经在１９２７年的８月贺龙给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发过四封电报。　　而晏章炎自６４年就开始揭发，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内部刊物《军政旬刊》（１９３４年第１８期）上则说「熊贡卿招降一事－一切办法均已议妥」，虽然此刊同时说明熊已经被杀。

而贺龙确确实实是「土匪」出身，脚踏两条船，未必不是真。

关键的是，从贺龙的平反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周恩来是如何对待这些材料的。毕竟揭发的许多事，周恩来都是直接受牵涉当事者之一。

１９６７年７月，毛泽东在杨成武面前还称赞「贺龙同志是二方面军的旗帜」。

不久，毛泽东变调了。毛泽东说：目前要把大批判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把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批判本地区、本部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整个报刊的重点是刘、邓、陶、彭、罗、陆、杨。在军内批判重点是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瑞卿。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对征询「九大」的意见通报》时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此文件发到全军连级党支部。

１９６８年２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及附件是毛泽东签阅的对贺龙明确定性的中央文件。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可想而知，以后的项目工作必须为此服务，所以笔者认为那些具体项目审讯人员还是医疗人员，下至普通看押人员、外调人员上至周恩来、黄永胜、邱会作无不要为这一定性服务。

文件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他们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使叛徒、特务得以混进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机关，长期窃据要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这些叛徒、特务揭露了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此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各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都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彭德怀、贺龙、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揭透批臭，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军管国家体委的命令中严申：「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

对此，毛泽东曾经两次对此事作出说明。

１９６８年5月２０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学习班学员时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重审：「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而若干年后，「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改口了：「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毛泽东真的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有意思的是，后来周恩来让廖汉生写为贺龙平反的材料。

贺龙最后非常明白：不是林彪的问题了，是毛泽东的问题。

４．周恩来的责任

高文谦在其著作《晚年周恩来》如此评论道：本来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贺龙当即处决了熊贡卿一事，领导层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当年湘鄂西中央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可以说，身为中共资深领导人的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不过当调查组按照林彪的旨意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以后，他却没有出面为贺龙辩诬，相反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附和了叶群的提议，正式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

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贺龙的）报告正（都）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评，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开脱，诸如贺龙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背后捅了一刀，让中央一时真假难辨，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书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宋永毅则说：「（周恩来）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

根据杨成武的说法，当时贺龙项目组的负责人是杨成武，而领导杨成武搞项目的是周恩来。最后给贺龙定罪的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材料，不管具体负责人是杨成武还是后来的黄永胜，他们都是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案子，任何其它什么人的揭发都要经过项目组的调查采纳才能上报毛泽东、林彪等人。可以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项目组的人是在违背了周恩来意愿的情况下「蓄意陷害」贺龙。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不管是真是假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是对否能迎合组织的要求。

试想，周恩来为什么就不能把证明贺龙无罪的材料上报给毛、林呢？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周恩来作关于使用贺龙历史材料的批示：「同意。使用这些材料，应与当时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并鉴别真伪。」

可以看出的是，这里面透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这些材料有问题，所以要同当时的背景联系起来，如果单纯的看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二，当时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只能左，不能右，你说又多少人又会有多少程度的去联系问题发生时的背景呢。更不要说有时候既使没有这些问题，都要去编造。

１９７５年夏，在八宝山贺龙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上，已经身患癌症且已到了晚期的周恩来，在有人搀扶着走进八宝山礼堂时，他，声泪俱下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他……」长喊，真是催人泪下，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的时间也不多了……」紧接着，周恩来又这样告诉薛明，然后，他们痛哭拥抱。却不知周恩来本来并未有意去参加这追悼会，是因为毛泽东批示才去的。

周恩来的喊声中充满了手足之情，悲切之音，7 个躬，这些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把多少不知内情的人欺骗一生？

四、艰难的平反过程

「林彪事件」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上至中央常委下至普通老百姓，揭发林彪、叶群的「反党罪行」成了他们光荣的任务和义务。

贺龙的妻子薛明自然属于知情人。作为主管林彪一案的周恩来派出的老徐、老齐找到薛明的当天，没有忙着让薛明去看医生等，而是急不可耐的让薛明揭发叶群。　薛明讲述道：他们呆了半个月，薛明讲了半个月，事后，他们先回去汇报去了。目的达到了，他们就走了，是因为要先回去汇报。结果薛明后来做火车回来，连飞机都不没有的坐。但是这个事情竟然被说成是薛明虚弱的连飞机都做不了了！

薛明被带回北京之后，就落进了迟群的手。看守薛明的张鲁妮告诉了薛明真相，是要审查薛明同叶群的关系。　薛明同其子女的团圆是因为其子女写了信要求的，并不是周恩来主动提供机会的。贺晓明回忆道：因为临产，回到北京。姊妹三个相聚。聚首的当天，含着泪写了封信给周恩来，要求打听薛明的消息。第二天，周恩来就派人来，带他们见到了薛明。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毛泽东出于政治目的，为了把文革整老干部的责任推到林彪头上，主动提及要解放一批人。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事后，总政治部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项目组一办（笔者注：实为二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却吃了闭门羹。　为何？谁在主管项目组？是周恩来。是周恩来没有告诉二办负责人可以把贺龙的材料给蒋润观。

１９７３年2月２９日（原文如此，据笔者根据不同材料推断仅是２月底，具体日子不祥，因为１９７３年的2月并无２９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地与邓小平、张春桥谈活。据张春桥的记录，毛泽东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　值得提出来的是，《贺龙年谱》以及《贺龙传》在此处的描述是不准确的，指责张春桥没有向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插话：「一个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在贺龙去世之后四年之后，毛泽东仍对贺龙带枪一事仍然耿耿于怀。

１９７４年9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毛泽东病并且强调不要再核对材料了。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是谁在核对材料？是谁当时主管整个「翻案」工作？是周恩来。

阻力不仅来源与周恩来一个人。

据知情人讲，在１９７３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说：「贺龙的案不能翻，张爱萍的案也不能翻。」　其实叶剑英和贺龙的恩怨已非一日，始自延安整风，久已。

叶是踩着贺龙的肩膀上来的。早在打倒贺龙的过程中，叶不仅紧跟毛的步调，而且对贺龙落井下石。１９６７年夏天，叶剑英曾对国防工业一次会议的代表这样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贺（龙）、罗（瑞卿），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贺（龙）、罗（瑞卿）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龙）、罗（瑞卿）经常排挤、打击聂（荣臻）副主席。贺（龙）、罗（瑞卿）专门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我这方面，就不要讲了。」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肖华就对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冼恒汉、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吹风：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冼恒汉替贺龙辩解，但是叶剑英和肖华根本不理睬，还让他回去向在军区部分领导传达。

１９７４年9月１３日，中央项目审查小组上报《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对于贺龙的骨灰安葬将秘密举行，「实行五不政策」，对此贺捷生非常不满。贺捷生直接上书中南海，此信由周恩来转呈毛泽东。贺捷生说：因为我和张玉凤的父母是邻居，我们交流过，张玉凤说，毛主席对你爸爸，觉得有歉意。他还有个批示，所以总理才能去参加追悼会」

五、分析和结论

１．毛泽东的作用

毛泽东是持有决定权。诚如周恩来所说：定性由主席定！

１９６６年七、八月份，为了给大学里派工作组的事，毛、刘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两位夫人一个在北大，一个在清华，观点截然对立。这个时候贺龙的表现显然是无法让毛满意的。而贺晓明是被认为代表了贺龙的态度的。

毛泽东说：「乱了就可以乱出名堂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

从贺龙项目组的设立来看，没有毛的同意谁都不可能对贺龙进行立案调查，就像上海会议解除贺龙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样，没有毛的同意和首肯，也是不可能的。

起关键作用的则是二方面军高级将领的揭发，才导致毛泽东决定「不保了」。

毛泽东的态度决定了贺龙的命运。

薛明说：「（贺龙能够平反），我想这都是毛主席几句话的结果。」

２．林彪的作用

建国以后，１９６３年贺龙代林彪主持军委，有观点认为林彪要重新夺回权力，所以置之贺龙于死地。林彪要不要通过打倒贺龙来夺回权力呢？１９５９年9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新的军委由２１人组成，中央军委主席仍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林彪的位置在贺龙之前，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１９６３年9月，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还是在林彪之下因为是林是政治局常委而且是党的副主席。如果说林彪仅是为了夺回权力，完全可以通过组织手段，重新掌握权力。

在贺龙被害的过程中，林彪虽有牵涉，但林彪决不是主谋。林彪和贺龙斗，林彪属于反击。

知情人说，在有关贺龙项目的所有材料上，林彪无任何批示。这也说明了在８０年审判的时候，并无任何文字材料来证明林彪有过任何「恶毒」的批示。

文革中有一个说法：「林彪同志当即识破了这一阴谋诡计，为了让这一小撮牛鬼蛇神充分暴露，故意暂时不予回击，但却一直密切注视会议的动向。」

３．周恩来的作用

３月底贺龙薛明收到小女儿贺黎明的信，贺龙回了几十封信，但是贺龙的子女一封都没有收到。　根据杨德中的回忆，贺龙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８日以前，贺龙的信件都是由其直接交给周恩来，但是周一封都没有转交给贺的子女。　１９６８年３月６日贺龙亲笔致信杨德中要其代购治疗糖尿病的药Ｄ８６０，但是没有回音。

６７年国庆节的时候，贺龙发高烧。吃饭呕吐。周恩来不讲，让傅崇碧讲。康生、江青反对送３０１，周恩来当时不吭气。最后只好进２６７医院。

不可否认，周恩来在贺龙到西山的初期，给了一定的关怀。但是这种关怀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类似傅崇碧所言，一旦和江青等冲突，周恩来只会默不作声。

贺龙实际上就是自１月１９日之后就被押解到西山，从而软禁。看管贺龙的是８３４１部队的战士。当事人回忆：还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贺龙元帅那时被关押在西山，那里也归我们团（隶属８３４１部队）管，我有一次晚上去看警卫战士。我问执勤战士，首长现在有些什么要求，战士反映首长想要吃点辣椒，项目组他们不让给。我说，想吃点辣椒有什么不让给的，怎么这样呢？战士说，咱们没办法。那时候，贺龙身体也不太好，一两个礼拜，不是老吃窝窝头，就是在生活上受到虐待。　《贺龙传》里面也写了不少令人发指的事情：例如饭里面掺沙子不说，还把饭倒在地上，让薛明贺龙象猪一样舔着吃，这不仅是折磨还侮辱人格。

贺龙一事主要是杨德中主管，而且一直到贺龙去世！就是贺龙外出就诊之后，也是要交给杨德中，由其押送贺龙回到象鼻子沟。

贺龙项目组始终在周恩来的控制之下，林根本管不着。

当毛泽东着手要为贺龙平反，周恩来一面拖，一面准备，直到１９７４年１月才同廖汉生谈：整贺龙同志搞错了，毛主席对这件事很关心，我也很关心。为了尽早搞清贺龙同志的几个问题，你要写个证明材料，以便在复查中弄清事实，作出结论。虚与委蛇而已。直到最后毛泽东催得不能再拖了，邓小平把此事在政治局公开传达了，周恩来才忙着为贺龙平反。

周在贺龙追悼会时连鞠七次躬，说没能保护好贺等等，这种姿态颇能迷惑不知真相的老百姓，表演实是登峰造极。

林７１年死了，贺龙７４年还在被调查。杨成武也是，他的女儿杨易可是在「林彪事件」之后被迫害致死。可在杨被「解放」后，周如此跟他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

罗瑞卿复出之后，周恩来对他说：「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

４．结论

文革的起因就是毛泽东要「炮打司令部」，打到罗瑞卿，稳定海空军都是为发动文革和

保证文革的顺利发动。贺龙没有理解和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反而四处插手，明确不赞成打倒刘少奇，不相信中央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因而，贺龙也成为了顺利发动「文革」的「绊脚石」，被打倒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必然结果。

一旦项目组成立，本着「一切要为政治服务」，受项目审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来制造的，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判定的。而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批原二方面军将领被牵涉关押审讯则是标准的时代产物。例如受贺龙一案牵连的许光达，在受到严重迫害后，其子许延滨曾经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周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后来项目组的人员正式通知许延滨信已转走，但是没有人来同许谈话。时过不久，许光达就被迫害致死。

贺龙被打倒，除了其本人不安分之外，没有毛泽东的同意谁也打倒不了他。秉承毛泽东的意思，林彪等人出面搜集材料。

贺龙项目组被毛泽东批准成立，其所有一切报毛之材料必须符合毛泽东给贺龙的定性。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出于政治目的，借批林彪之际，笼络人心，把脏水都泼在林彪头上。但是贺龙的平反，却遇到了周恩来的阻力。究其原因，是周恩来认为李仲公的揭发是真实的。因为对于这些事情周恩来本人就是当事人，周恩来想把事情真正搞清楚也无可非议。但是这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想法。无论材料是否真实，都无需核对，一切还是要为政治服务。

一旦大局一定，周恩来则作出一番对贺龙平反积极支持的态度，最后不惜以超出常情的七个大躬来向世人表示自己的忏悔。

故，贺龙一案必须放到整个大环境去考虑，而非单纯林彪之迫害。

迫害人并不都是毛泽东、林彪在迫害，解放、保护老干部也并非都是周恩来之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尚是任重而道远。

而贺龙一案，始终在周恩来的控制之下，看守西山监管贺龙的部队主要是８３４１的部队，直接受杨德中和汪东兴的领导。　　实际上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的所谓无论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还是「叛徒」或者被周恩来直接掌管的贺龙等人，如果被红卫兵揪斗，都需要在周恩来的同意下才能揪斗。　　而贺龙在西山受到的令人发指的惨酷迫害，更是在周恩来直接掌控下发生的，直至贺龙去世！周恩来在贺龙一案上，绝不仅是保护的一面，更多的是迫害，而且在贺龙的平反上不仅不积极，而是推迟延误直到毛泽东明确表态之后，才开始积极为贺龙平反。

因此，周恩来在贺龙之死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十章 周恩来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文革期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以称之为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本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造反组织，以多次张贴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而著称。但是随后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遭到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残酷镇压。事情并未因「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消失而结束，彻底清查「五?一六」被作为清除异己、巩固新诞生的革命委员会而被扩大到全国范围。全国因此受牵连的不下百万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中其它运动所未有。在这株连甚广、卑鄙残暴，不可宽恕的清查运动中，反对周恩来就是反革命，周恩来同其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现了和江青等人同在一个战壕作战的风采。同时，周恩来也借机在外交部等领域铲除异己，清洗对立面。而文革结束后，此冤案竟然没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过，虽然最后证实这是一场人为的打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

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起源与瓦解

「五?一六」的直接起因是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此通知的发表，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中央会有新的政治动向，即要继续揪出「那些睡在我们身边，但是还没有被识破的赫鲁晓夫。」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７日，毛泽东在武汉说：５月１６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　周恩来则说：「『五?一六』的出名，是因为《五?一六通知》。去年五?一六通过的，今年发表，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新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还在主席司令部里。说这才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恰恰相反，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巩固，这是使敌人快意的，使我们亲者痛恨的。」　实际上，《五?一六通知》的发表是周恩来建议毛公布的。　实则是又一批想立旷世奇功、以为又走在了历史前沿的造反派而已。从根本上来说，这仅是无数中敢于反潮流、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种。

「五?一六」兵团是７月１日正式出现的，主要是以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属钢院造反公社红一团）和北外「六?一六」的组成，主要代表人物为张建旗、张光武等人。　早在４月份，张建旗就写了一封攻击周恩来的万言书《致总理的公开信》，送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张建旗提出所谓「要掀起深入揭发高潮」和「抓新的一小撮」，活动大幅度升级，并相继在５月份－７月份贴出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期间遭到数次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打压。

５月２９日，毛泽东针对最近掀起的攻击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康生看到批示后，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一事表态。１９６７年６月３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时，对「五?一六」

发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陈伯达等人并指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叶群在会上也表示:「林彪同志是很尊者周总理的。」「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嘛。」　江青说:「有人把斗争锋芒搞错了，把斗争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周总理,一位能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这就错了。」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表态并没有制止住世态的恶化。６月３０日—７月１日，在张建旗倡议下开会两天，宣称「首都五?一六兵团」正式成立，并通过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决议声称:「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数据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

根据当时红卫兵材料，7月１４日在首都大街上及农口各局、各院校发现大量反动传单，８月９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再度大量出现。　又据记载，张建旗等在８月３日—４日开了两个晚上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一，积极准备写、印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和传单，公开贴出和散发。二，扩大组织，统一行动，成立所谓「八个方面军」。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写了７种传单，大约印了４０００份，并抄写了１３份大字报。８月９日凌展，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街头，张建旗等人还向北京大专院校，以及湘、鄂、粤、新疆等地邮寄传单。

８月１１日，「首都五?一六兵团」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要铲除。陈伯达说:「《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江青说:「『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像『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8月中下旬北京地区开始组织集中打击「五?一六」。8月１４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等分站。随后包括张建旗在内的「五?一六」骨干分子相继被抓。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还捣毁了「五?一六」的大本营——北外「六?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８月２６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大「井冈山」等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至此，「五?一六」全面崩溃、瓦解。

１９６７年9月２４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快报》第４６２１号刊登的《公安部有关人员谈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一些情况》说：

８月１１日，江青等中央首长宣布「五?一六兵团」是阴谋的反革命组织以后，该组织

从政治上、组织上迅速土崩瓦解……但是张建旗等６—７人，仍在负隅顽抗。……８月１７日，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抓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到８月２５日，就把「五?一六兵团」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７２０事件」之后，毛泽东急速左转，武装左派，结果天下更是大乱。８月份，竟然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极左行为。毛泽东要刹车，向右转，于是曾经被毛泽东指定要参与外交部事务的王力被抛出，且被冠之以「五?一六」后台被整肃。在此事上，无产阶级司令部表现的高度一致。

二、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清查「五?一六」中的密切合作

１．清除王力、关锋、林杰

在调查「五?一六红卫兵团」张贴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的过程中，发现在一名「五?一六」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主管《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妻子。还有个「五?一六」骨干分子宣称，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当事人也断言：仅靠这一点材料，难以判断周英、林杰同「五?一六」有无关系，更难判断他们是不是这个组织的后台。而且「五?一六红卫兵团」到８月底就已经土崩瓦解，被彻底摧毁了。　　事情的要害不在于是否真的有牵连，关键在于周恩来是否认为你有牵连。

对于周恩来震动最大的是当时发生在外交部的事情。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时指出：「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它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　　这也是周恩来对「五?一六」揪住不放的一个重要原因。

「７２０事件」之后，八月初外交部一度失控。而「五?一六」攻击周恩来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达到高潮。这种局势一个是危及自己，另一个是关系到中央的权威。同时抓「五?一六」成了周恩来在外交部扫荡对立面稳定外交部的一个有效和有力的策略。特别是毛泽东在「７２０事件」之后的急速左转之后的刹车，也认定「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的时候，周恩来更是有恃无恐。

首先是王力发表了在外交部影响很大的「八七」讲话，受到鼓舞的外交部造反派在外交部的造反活动愈演愈烈。　　再次在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据说，周恩来知道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极为震怒与自责，下令彻查。　　但是实际上纵火的与王力并没有直接关系，更为诡异的是周恩来并不去把纵火的责任查个水落石出（笔者注：真正参与纵火的人并没有受到严惩），而是栽赃嫁祸与王力、姚登山等人。如果真的查清了，这赃也就不好栽了！８月２５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

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就在８月２５日当天，周恩来针对外交部中激进分子谈话：「『五?一六』在外交部有根子，有人在外面打着『联络站』的牌子干坏事，你们知道不知道？将来你们跳进黄河洗也洗不清，中央文革那里有材料。」

８月３０日，王力、关锋被抓。　对于王力的被抓，康生、江青也是非常卖力。根据王力的回忆：江青曾向毛说：「王力以为７.２０以后天下不是毛泽东的了，是他王力的了。」毛说「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然后江青和康生便证明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

虽然后来「王、关、戚」并称，实际上当时的称谓是「王、关、林（指林杰）」，只是在１９６８年１月戚本禹也被打倒之后，林杰的名字才被戚本禹所代替。

周恩来后来多次对「王、关、戚」笔诛口伐。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科院）同戚本禹等人的关系密切，周恩来对于学部清查「五?一六」是异常的关心。（详见下文）

１９６７年８月３１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时针对外交部的形势发表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指责了姚登山，批评了陈家康，对于外交部的的「五?一六」问题说：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指「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秘密活动、抓材料。「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已经为日后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埋下了伏笔。在后来的讲话中，周恩来也多次提到８月１１日批陈大会、火烧火烧英代办处，言之确凿的认定这些都是「五?一六」分子所为。这些活动也是后来在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重点之处。

２．清查「五?一六」的严重扩大化

虽然「五?一六红卫兵团」到８月底就已经土崩瓦解，但是追查「五?一六」分子却成了当时中共高层铲除异己分子的工具。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五?一六」大张挞伐，纷纷强调严防从「右」或者「左」的方面「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时因为当时革命委员会难产，无产阶级司令部希望通过镇压「五?一六」分子来铲除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以此来促进大批判和大联合。因此「五?一六」问题演化成为一般的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实际就是中央文革)，反对革命委员会，反对解放军的普遍性的反革命集团。　周恩来则解释说：「不要因为打击『五?一六』的极左思潮，就变成右的老保翻天，以批判极左思潮来推动革命大联合。」　由此，周恩来还联系原来的「二月逆流」：「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１９６７年9月1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提出要联合。要团结共同对付『五?一六』，搞大批判。」　谢富治在９月１０日接见中学代表时，继续点明主题：「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人数不超过５０人，这５０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主要是有后台老板。」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文化大革命」中各类受过冲击的人又被重新清理一遍。在谢富治领导下，公安部在１９６８年在公安部成立的第三办公室，负责审查「五?一六」项目以及其它案件。１９６８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中央成立了清查「五?一六」项目领导小组，陈伯达为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并正式部署清查「五?一六」。　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清查「五?一六」又进一步与社会上的「一打三反」结合，成为新生政权推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要手段。但是因为「五?一六」分子本来就没有几个，于是被镇压清除的人被冠之为所谓的「幕后人」和「操纵者」以及后台。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小报第５６３３号刊登《中央机关群众组织抓「五?一六」分子中的几个问题》。这份材料说：「一些单位已有扩大化。」它又列举了种种表现。谢富治、陈伯达等人也先后提出抓「五?一六」不要扩大化。１９６７年9月１９日，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时的讲话时说「五?一六」小集团人数很少，不要到处抓「五?一六」。　１９６７年谢富治传达了江青的指示：「抓５.１６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５.１６，哪里有那么多５.１６呢？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５.１６的帽子。」　但是实际操作上，抓「五?一六」被大大夸大化。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７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项目组全体人员。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陈伯达还说：「案子要落实，情况要弄清，要有真凭实据。」「『五?一六』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特务集团。」

对于陈伯达的这个观点，周恩来显然是持有不同看法的。

周恩来说：「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每次运动都是说只抓一小撮，抓几个头头。在实践上，在左倾的错误理论指导下的运动，都是会扩大化的。因为对于到底谁是「五?一六」分子，并无明确的概念，到头来，只能是成了整肃对立面的工具。

周恩来在１９６９年9月２０日讲话时对「扩大化」问题谈到：「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

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显而易见的是，周恩来在这里强调的是要继续搞而非防止扩大化。

１９７０年1月２４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等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军宣队代表，集中部署了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周恩来对「五?一六」问题做了总结性的讲话，指出：(一)「五?一六」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二)「五?一六」的部份罪行；(三)深挖「五?一六」的意义。周恩来还说：「这些人（指『五?一六分子』）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既要深挖，又要谨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但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在此讲话中，周恩来把吴传启、王力等人，甚至杨成武等人都纳入「五?一六」这个大筐子。周恩来在讲话中还特意为中央文革涂脂抹粉，说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

周恩来在陈述了王、关、戚之后，点出了杨成武的问题：「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注销，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笔者注：指的是１９６７年１１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杨成武的理论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肖华。……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

周恩来继续说到：「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在周恩来这种指导思想下，「五?一六」问题能不扩大化么？这也是与会的江青、康生等人的共识，也是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共识。

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于１９７０年3月２７日发出。　此通知完全是周恩来1月２４日讲话精神的体现。通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革委会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层层举办项目人员学习班，要求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动群众，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人民战争。有的地方在清查过程中，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定清查的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事件、重点人物，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这一运动成为派性斗争的继续，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把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说成是由于「五?一六」的破坏，把一派群众组织干的错事当作「五?一六」反革命罪行来清查，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五?一六分子」成了一个「筐」，可以将任何人都往里装。　　《通知》虽然提及避免扩大化和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绝对不肯否定「五?一六」的存在，各地只会在上述通知精神下严重「左倾」，因此只能更严重扩大化而非避免。且由于普遍存在着逼供信，清查「五?一六」的问题也就陷入越清越大的恶性循环。而且通知进一步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加上所定「五?一六」的罪行范围广泛，因此，「三?二七通知」虽然有制止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倾向的词语，但实施中却只能适得其反。

金春明先生说：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项目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林彪事件」之后，林彪也成了「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而且名列首位。到１９７３年冬，身任公安部长、「五?一六」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并兼管项目办公室的李震，也自杀身亡了。在下边的清查运动中，由于大搞逼供，轻信口供，项目组负责人被咬为「五?一六」分子的事，也屡有发生。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但是，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却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的灾难，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这样的教训是不应该轻易忘记的。

然而周恩来却说：「中央３月２７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周恩来还辩解到说：「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五?一六』就是利用《５.１６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当天，周恩来就约８３４１部队支左办公室、驻北京外国语学院军宣队负责人谈话，听取汇报。　　翌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项目联合小组的决定》。项目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１３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　　整个项目组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此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更加「深化」。

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更是强调：「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五?一六』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各地也设置了专门机构，先后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定案范围被扩大为「三指向」，即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而实际上是以追查反周总理为主。吴德回忆说：当时，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

此时抓「五?一六」已经变成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铲除异己的重要借口，也成了一个把敌人可以装进去的「大筐。」通过揪所谓幕后「反革命的黑手」，铲除自己的对立面，为权力斗争通用的模式，在此模式下，抓「五?一六」不可能不扩大化。

王年一先生说：「打成「五?一六」的人，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严家其认为全国遭受诬陷迫害的有数百万人。　　江苏省趁着「三?二七通知」的东风，自１９７０年4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运动，１９７１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足足超过十几万。　　王力说：「我是作为『五?一六』头子被打倒的。但是项目组审查了１２年多，没有查出我同『五?一六』有任何关系。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１５００万『五?一六』分子。」

３．清查「五?一六」成为周恩来同中央文革的粘合剂

打倒王力等人，无可避免让人联想到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人。然而借「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攻击周恩来之名，又借王力等人煽动外交部造反派之实，把王力等人归为「五?一六」的后台加以清除，而周恩来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进而引申为王力等人不仅是攻击周恩来，而且是攻击了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如此这般，既可以把王力等人和中央文革可以分开，又可以借口凡是类似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极左」行为或者反对周恩来的都可以

划为「五?一六」分子而加以整肃。对此，周恩来也是极力配合，言谈之间刻意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团结性是不容质疑的。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分别讲话。

康生说：「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

江青在陈伯达讲话时插话表示：「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而此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向外表达了一个坚强的声音：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团结一致对外的。

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团时称：「五?一六」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切不可以上当。　　此讲话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广播。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６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大专院校代表时周恩来做了长篇讲话。周恩来首先对前阵子中央文革的「友好」表示响应，特别强调了他与中央文革之间的密切无间的关系：「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个讲话，你们放了录音了吧？（众：都放了。）她讲了三个问题，可是你们的做法与这三个问题都相反。」

接着，周恩来说：「９月１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一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我们小将到处传闻，油印，推论，臆造，总归是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就是帮助你们。」

最后周恩来说：「『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人讲好了。（康生插话：勾心斗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来干扰。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样从右的方向来干扰，两者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所以我们要指出『五?一六』问题，但不允许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机会翻案。文汇报今天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从中央领导巩固起。」

周恩来还说：「我们学主席著作不好，我四十六年党的历史，我犯过不少错误，也犯过路线错误，不需要『五?一六』来整理，我心里清楚。我个人犯过错误要认识错误，我快七

十岁了，要做到死，学到死，要改到死，跟到死，就是要至死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统帅。」

继而９月１７、１８日，周恩来再次强调：「『五?一六』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

周恩来似乎非常在意有人把他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单独摘出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日再次传达了周的观点：「五?一六」中央已经宣布是个反革命组织了，「五?一六」不仅是反总理一个人，总理是主席身边的，毛主席说的话，通过总理来贯彻，反总理不光是反总理，是反中央，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理很多讲话是毛主席讲的，但是总理不能说那句话是主席讲的，针对总理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财贸口（「五?一六」）直接对总理，实际不仅是总理一人，实际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是反中央的问题，是搞阴谋活动。

对于清查「五?一六」，无产阶级司令部，表现的异乎寻常的一致。周恩来江青等人在１９６９年８月接见文艺口代表同志的谈话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江青说：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姚文元插话说：包庇那更是不许可的。谢富治则说：不能麻痹，包庇就更坏了。掌握政策把敌人查出来。周恩来应和到：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由此折射出来的，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中央文革等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在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政府在清除地、富、反、坏、右，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诸多事情上，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由此可见在这场可以称之为「浩劫」的大灾难上，周恩来注定是要被审判的。

４．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一个样板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在周恩来一手指导下进行的。周恩来更是直言：关锋的根子在学部。王力、关锋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

对于学部的清查「五?一六」，当事人孟祥才有个详细的回忆：

我参加的「大批部」也兴师动众地抓了一阵子「五?一六分子」。主要目标是与王力、关锋有牵连的一派组织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红卫兵联队的骨干分子和头面人物。由于这些人都进了监狱，所以最后只抓了经济所的周慈敖。据有人揭发她整了周总理的材料。……１９６８年底，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进驻学部，先搞了一阵子大联合，批判「走资派」。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学部成为重点单位。由于除钢铁学院外其它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五?一六」组织，所以，由此开始的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就只能是「莫须有」的大冤案了。

学部的清查运动开始不久，当时中央的一个重要的负责人（笔者注：此负责人即为周恩来）就接见了学部工军宣队的主要领导。他根据学部上呈的有关「五?一六」案情的那些编造的材料，明确指出：「学部是『五?一六』的大本营，黑据点，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

周景芳、洪涛、王恩宇、傅崇兰是『五?一六』的操纵者、组织者、黑后台、骨干分子。」这番话对学部清查「五?一六」无疑起了定性和导向的作用。只要承认这个假前提的存在，学部的联队和大批部两个群众组织的人谁也脱不掉「五?一六」的干系。

按照当时的思维定势，既然中央下发了清查「五?一六」的文件，又有某重要领导人对学部「五?一六」问题的明确指示，学部肯定有很多「五?一六分子」。工军宣队于是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清查「五?一六」。……清查运动尽管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因为学部压根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自然也找不到真凭实据。怎么办？好办，拿出历次搞运动使用过的驾轻就熟的老法宝：逼供信。此法还真灵验。……凡是钦定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即指称个个都反，整黑材料，乃至搞反革命武装政变，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重新将当时已经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扶上台，等等。其实，只要领导运动的人，尤其是项目组人员还具有起码的良知，只要认真审查同一个所谓「五?一六」组织的分子们所写的交代材料三份以上，就能判定此案纯属子虚乌有。因为所谓的「案情」人人言殊，矛盾百出。关键是找不到任何可以定罪的原始材料，什么表格、照片，整领导人黑材料等，一件也找不到。清查运动进行到１９７０年初，清查者和被清查者心里都明白，所谓「五?一六」组织根本就不存在。……后来哲学所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哲学所一个审查对象翻供，说被逼交代的材料都是假的。一个清查积极分子说：「什么真的假的，给你戴上『五?一六』帽子就是真的了。」

１９７１年春天，上级忽然又来了指示，学部五七干校停办，全体队员到河南明港的一个军营集中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这一次，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五?一六」不能一风吹。还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内容是过去运动走了些弯路，只重视清组织，忽视了清罪行，这次重新开始的清查主要是抓罪行；只要将「五?一六」的罪行一桩一件搞实了，他们就翻不了案。同时，又传达了中央某重要领导人（笔者注：中央重要领导人即为周恩来）接见学部工军宣队领导的指示。大概工军宣队领导在汇报中谈到所谓的「五?一六」组织和罪行只有交代材料，没有原始证据，定案难度大，这位领导人要求集中力量抓罪行，并强调「群众参加就是证据」。……不过，从毛主席和某重要领导人指示以及中央文件的内容看，近两年的全国性的清查运动遇到了困难。因为根本不存在全国性的「五?一六」组织，用逼供信的办法只能搞出一大堆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交代材料。如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清查运动应该停止了。

在这次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整个学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究竟有多少人？我没有确切的统计，估计不会少于一千人，即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近十人死于非命。历史所被牵连在内的也在百人左右。

三、外交部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外交部是周恩来的后院。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清查「五?一六」的行动，周恩来自然不会怠慢。外交部是全国清查「五?一六」的典型，头号重灾区。三千个工作人员抓了一千七百个「五?一六」，更甚的是，在１９７２年二十人被周恩来亲自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如同全国的清查「五?一六」，１９６７年8月开始到１９６８年是摸底排队，到１９７０年开始全面展开，１９７２年之后开始收尾。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的8月底开始直接指导外交部的「五?一六」清查。对于外交部的什么样子的人属于「五?一六」，显然有着自己的认识。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第４９７５号说：「１０月１８日下午，总理在同外交部……接待组同志谈话中指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有人与『五?一六』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活动。」实际上就在１０月１７日，在一次接见毛里塔尼亚外宾后，周恩来对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说：「『联络站』同『六一六』的关系密切，直接间接参加「五?一六」的活动，名字我现在不说，我有名单。」同时周恩来又说：「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检查我看过了，很不深刻，根本过不了关，我看了很生气。」周恩来表示：「我支持『联络站』到８月３１日。」

周恩来为什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联络站」)如此痛恨？早在１９６７年5月，因「联络站」核心组的王中琪等人参入过反周恩来的短暂活动，而与王力、戚本禹等人，是支持批判陈毅的，他们更是老造反派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联络站」）的鲜明支持者。而王力那导致他倒台的著名的「八?七讲话」，也就是他接见「联络站」核心组人员时发表的。「六?一六」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赞同「五?一六红卫兵团」观点的极左派红卫兵组织。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副部长韩念龙在外交部大礼堂召开全部大会，宣布周总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有人同「五?一六」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组织顷刻瓦解，下属成员纷纷退出。其核心组成员王中琪等人，还被原「联络站」下属组织与《攀险峰》等组织人员抓起来，以「五?一六分子」罪名，送公安部审查；因证据不足，第二天公安部即将人放出。

但是周恩来在实践中尽量撇清自己。周恩来说：「『五?一六』也不只是炮轰总理，他们随时都可以转移目标，目的是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个乱七八糟。」周恩来又说：「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周总理，要明确几件事情，给毛主席抹黑了。」

陈家康是周恩来特别留意的一个重点。周恩来多次表示陈家康像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周恩来同时表示「你陈家康象小丑一样，跳出来了，很坏。」原因何在？１９６７年4月２１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全外交部「揭发批判陈毅及部党委执行刘邓资反路线大会」，部党委成员、副部长们都一一被点名命令上台「揭发」陈毅。姬鹏飞等只好支吾搪塞，只有在运动初期曾差点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副部长陈家康揭发到：陈毅曾在文革初的部党委学习会上，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干纲独断」。陈家康的这个「揭发」，在当时确有重磅炸弹的影响。　陈家康也为他的这个「揭发」付出了沉重代价，从此他再没有能出来工作过，直至迫害致死。

在周恩来的直接掌控和催促下，外交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与全国的这个运动同步进行的，１９６８年中开始，直搞到１９６９年间，外交部是战果累累。清查「五?一六」则是运动中的重点之重。

在抓「五?一六」的紧张关头，周既运筹帷幄，指挥全局，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找外交部造反派若干头头和骨干，劝说他们坦白交代。１９６９年3月３１日，周恩来亲自出马接见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韩立业和「大联筹」负责人，谈话中心就是推动抓「五?一六」。被接见的还有前「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张殿清、高诚、王中琪、黄安国和蒋书勤。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点到王中琪和黄安国，要他们老实交代「五?一六」的组织问题。周恩来

要黄安国：彻底揭发，不要冤枉一个人，也不要漏过一件事……。　周除向黄这样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做工作，还做老干部的工作。归国华侨出身的林兆南就是一个。他经周动员承认了，回去一想觉得不对，又推翻了。姬鹏飞不甘心，又找他谈，他再次承认了。回去再想，又推翻了。如此反复多次，被传「七进七出」。

在威胁逼供、重点突破下，清查「五?一六」终于取得了重大成就。黄安国、洪嘉与成绥三被定为「五?一六」组织的三个组织部长（笔者注：黄与成分别是原联络站的核心成员）。而这三个被当作从宽处理的样板，从而诱使更多的人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而对于不承认的，则予以严惩。　除此之外，包括欺诈蒙骗做伪证、项目组轮番轰炸、恐怖政策、利用亲情等威逼法西斯手段，外交部清查「五?一六」取得「辉煌战果」。到１９７２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１）正式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２０人，头一个就是姚登山，原「联络站」核心组头头王中琪也在列；（２）另有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３１人；（３）因「五?一六」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８０余人；(４)定为犯严重错误的１７０多人；(５)因「五?一六」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１４０８人；共计１７００多人。

在运动中间，１９７０年7月马文波向国务院汇报说，外交部已清出了１５００个「五?一六」问题的人时，周恩来说：「外交部有那么多『五?一六』？不要头脑发昏。」正如前所述，周恩来此话并不意味着要制止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到是说明了周恩来知道确实已经扩大化了。作为掌握内情的清查骨干张燕龄曾经把外交部清查「五?一六」严重扩大化的原因以及后果告知周恩来。　周恩来实际上根本否认外交部的查「五?一六」有扩大化之举。原美澳司司长现在湖南干校查「五?一六」的郑为之，当面向周恩来陈述外交部的查「五?一六」已经扩大化，周恩来随之把郑为之调离其职，外放阿根廷。张燕龄也因为实事求是反映情况被清理出外交部。而那些清查的要员姬鹏飞、马文波等人却受到周恩来的重用。

更有甚者，当周恩来特别指示外交部要以抓「五?一六」为运动中心，陈伯达流露抓「五?一六」出现扩大化倾向，他即批评称运动才开始怎能讲扩大化，这会给群众泼冷水。

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份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时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五?一六」。

周恩来点名的姚登山原是周恩来一手树立起来的典型。周恩来曾经当着姚登山的面说说：姚登山你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你在对外斗争时是英勇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了，是我把你派出国的，你回来我去接你了，我又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　这姚登山原是驻印度尼西亚使馆代办，曾在雅加达使馆奋勇保护中共国旗，备受吹捧，回到北京时受到周恩来和江青的亲自迎接，后在周恩来的策划下，在「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看完烟火会，姚站在中间，左挽江青，右搀毛照了一张相。如此殊荣在中共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周恩来视其为可培养对象。姚奉周恩来之命，从5月起到8月，到北京大专院校做外事报告，以图影响红卫兵学生正确对待外事工作，并且参加外交部的文革运动，被「联络站」核心组负责人聘为顾问。周恩来还提出让姚登山参加外交部党委常委。可是形势突变之后，周恩来指责姚登山夺了权：大权旁落了四天。　最后姚登山以反周，要夺陈毅的权（实则均为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罪名被列为「五?一六」头号分子，被关进了秦城监狱，长达9年多。

整个外交部当中，姚登山还不是算最惨的。比他高级得多的刘晓（八届中央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王炳南(中美大使级代表中方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潘自力（驻苏大使）和陈家康（副部长），虽曾长期与周共事，却被定为外交部「五?一六」后台。潘、陈二人被迫害致死，王炳南是家破人亡，刘被整得精神痴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的这场政治运动中，周恩来要以更「左」的行径来表示对党的忠心，顺带清除异己。

四、结束语

清查「五?一六」运动基本上是以国家暴力机关作为后盾，由当时恢复原有秩序后执掌大权的当权派所搞。因此很难将其归于所谓」四人帮」的罪行。因此，这场时间长，规模大，手段残酷，害人无数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最后竟然是不了了之。但被当作「五?一六」抓的上千万人及受株连者，并无得到中共的一个正式平反决定。　　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从发动者到组织者，无一人承担责任。笔者从来没有听过周恩来或者邓颖超对此有过歉疚之词。周恩来的检讨与世闻名。但是周恩来的检讨有哪次不是讨好毛而为了自己犯下的真正错误而作？与毛无关，确属个人所犯错误，周恩来做过检讨么？何方先生说：抓「五?一六」迫害了上千万人，在最后也知道并不存在「五?一六」，但是周恩来始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过态，讲过实事求是的话。　　况且清查「五?一六」运动既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共识，周恩来自然也就更加不必为此表示任何的歉意了。

结束语：笔者对周恩来的认识

林肯总统曾有一句名言：「你可以愚弄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愚弄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无法愚弄全体人民于永远。」

这是我们写此书的最初动机。但是如何写，则是得益于在美国的生活所见所得。在美国，任何一个人在被法庭判决之前，都是对被告实行无罪推定。因此，对于周恩来的历史定位是由其所作所为而判定，而非其心态、动机来决定。不能以某一时期、某些人所定义的好人与坏人的标准去预先判定谁是好人或者坏人。周恩来是政治人物，是总理，就更应当着重于从其政绩和政治遗产来考察，而不仅仅是其私德。对历史人物的解读，离不开对史料的分析、挖掘，观点必须随着新材料的面世而改变，即观点必须是建立在材料基础上。

孩子看书的时候睡着了，父母说：孩子真努力啊，睡觉的时候都在看书。旁人说：孩子真懒惰啊，看书的时候都在睡觉。历史学家应该考证的的是，「孩子看书的时候睡着了」这件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有没有旁证等等，先确定细节，再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是笔者在写作此书时一直坚持的基本态度。

在一个和平的时期，中共建政２７年，而国内的老百姓不仅是一直生活贫困，更是经历了生灵涂炭的大饥荒和文革岁月。国家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而它的国务院总理却是一个圣洁的完人，这无异于天方夜谭，令人感觉不可思议。有人把这些不幸灾难归结为体制，但是体制不仅仅是由人在历史当中磨合创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错误的体制必须要有人来执

行。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路线就是第一位的，左的路线需要左的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现在广为人知的角色，就是执行毛泽东的救人、灭火的角色，执行国务院的职能。另一个则是紧跟毛，全力执行毛整肃、放火、致使天下大乱的决策。没有周恩来，毛泽东的文革战略是很难搞下去的。周恩来更多的是扮演后者，但是现在中共宣传和大部分人看到的是前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充满了一个集团和另一个集团、集团和个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这并不是路线斗争。无论是在上层还是在下层，无论是在文革初期还是文革末期，路线斗争都不过是为了整垮对方而扣的大帽子，都不过是解决个人恩怨的托辞。所谓路线斗争应该是党内在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革命任务的总的指导方针问题上的斗争。而周恩来从来没有对党的指导方针表示否定过，就是其执行的批极左、解放老干部都是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其行为本质是，前提是要肯定当时党的指导方针，要达成的目标是缓和当时指导方针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周恩来在文革后期来被批，并不是因为路线斗争的原因，而是因为毛泽东的既定文革目标所致。周恩来后来成为中共树立的楷模完全是利益的需要、大众心理的需要而非历史的真实。

一、周恩来是一位不合格的总理

中国老百姓是一个大量的谎言构成的体系下的牺牲品，周恩来却是这一谎言体系的主要构建者之一。在历次违反宪法、违反《党章》、违反人权而发动一轮一轮的清洗整肃当中，毛泽东无疑要负首要责任。但是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应负相应的责任，不管他是被迫的、无奈的、还是无意的，在破坏法律、党的制度上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之命保护一些老干部的作用，也远远大于周恩来所被后人称道的那些修修补补。作为政府首脑，周恩来的主要作为不是灭火，而是保障整个国家的良好运作。如一今天的法律标准，行政不作为是要撤职，严重的要追究渎职罪。

因此，从这点上来说，所谓的没有周恩来，中国（包含文革）的灾难会更大，换做他人，没人做的比周更好是赤裸裸的谎言。因如果法律的尊严得到保障，党的制度不受到破坏，即使没有周恩来，老干部也会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护。

作为政治人物，最值得后人用来评价其政绩的是两点：１：政治遗产（包含国家上层政治制度，还包括基层老百姓、社会组织的民权）２：民生（老百姓的吃穿温饱，文化教育）。

在毛泽东带头破坏党和国家的制度和法律时，周恩来不是阻止毛的做法，而是忠实的执行了毛的错误指示。因此周是要负政治责任的。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在代替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过程中，周恩来执行了毛泽东的错误决策。而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完全是不合党章的明文规定。中央文革小组从诞生到正式参与党中央的决策和执行决策，周恩来都是大力辅佐与培养的。这是一个周恩来配合毛泽东破坏党的制度和国家的法律的一个典型范例。　再比如，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碰头会决定成立王光美项目组。王光美是第三届人大代表，

受《宪法》第三十七条保护。这一做法是违背宪法的。周恩来要承担破坏法制的主要责任。

周恩来作为总理，应该对毛进行积极有效的辅佐，在毛周围营造出民主决策氛围，他的责任比其它高级干部大。做好这点，需要从革命时期就要有这个意识。如果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没有远见的问题。也就是作为总理某个方面合格与否的问题，如果潜意识里只有「效忠君主」的意识，那么他的治国境界就存在缺陷。缺陷就是缺陷，周恩来作为总理不可推卸。面对民众，作为政府的一号人物，周需要实际解决他们的是丰衣足食的问题。这两点，周都需要有正面的结果，没有正面的结果，周就需要负责。

对于最高层的几个，需要担当的，首先是政治责任。评价，必然需要以效果为标准，对于负面的结果，他们是不可以推卸责任的。比如，对于领导人，不能用曾经反对过搞大跃进，但是最后还是搞了大跃进来推卸责任，因为，你不是地方大员，你也不是某个部长。

建国以后，周恩来除了唯一一次对毛泽东说不外，从来没有对毛泽东谏言过。即周对于毛没有过正面的实际有效的制约，或者做的只是婉转的协调，细节上的协调，对于毛的决策基本上没有有效影响，甚者大多数是照顾毛的面子进行个别的「遣词造句」(例如在１９６１年把「整顿」改为「调整」)。作为总理，更应该从源头上去影响一个国家，即对毛的决策施加影响，而不是在毛做出决策后进行小媳妇似的「修修补补」。从源头影响决策，是大的智慧，因坏的政策导致民不聊生，再掉眼泪，非常虚假。人祸比天灾更可怕。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周恩来根本不是委屈求全，而是完全的异化。周恩来没有什么需要委曲求全的。因此，说周在文革「顾全大局」「只是说了些违心话」是解释不了的周的。因为异化的周恩来只能为毛是从，是周对于毛的认识上的缺陷，而非周性格上的缺陷。

毛泽东之所以能破坏党的制度，视国家法律为儿戏，其主要潜在原因就是毛泽东已经被「神话」。毛泽东发动文革更是依赖其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来的巨大威望。对于毛的神化起源，都承认起始于延安整风时期。当时已经有很严重的言论箝制，比如王实味的死。当时树立毛的权威，或许确有必要，但是，既然最后发展为「神」，其早期的「树立权威」说法的正面意义就要大打折扣。整风运动，骨子里的精髓应该是「神化」运动。在此运动中，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比的，虽然角色不一样。周长期是毛的左右手，不管主观想法如何，客观来说，他都需要负责的。毛的「神化」，在６０年代前，已经形成。因此，在追究「神化」毛的过程中，却发现是周的责任最大。因为周的言论表态就是行为。作为中共元老和建国后的总理，周恩来所臣服而表现出来的巨大感召力是刘少奇所不能比拟的。徐向前对此就有过很深刻的解剖。

异化的周恩来，把自己完全贡献给了毛泽东，因此在几千万人的冤魂还没有散去的时候，在周恩来一手导演下，以吹捧毛泽东为主题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就出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恐惧已经渗入到他的血液、骨髓里面去了。

周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了什么？周恩来留给后人的，无论是政治制度上的遗产，还是在中国经济方面，不是乏善可陈，而是遗祸无穷。这已经为真实的历史所证明。而周恩来的这种不作为完全可以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证明。

一直被中共官方津津乐道的周恩来保卫老干部的例子就是那张著名的十三人名单。在「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钊也未能逃脱被抄家的

命运。无奈之下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毛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周趁势列出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十三人名单，对他们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正如胡平先生所认为：但是在法律被蹂躏的时代，那区区十三人名单以外的人又由谁来保护呢？当红卫兵见到这份名单时，他们难道不是同时也得到明确的暗示：那些在名单之外的人－－千千万万的人－－是否任随他们凌辱处置的？！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领会，这么行动的。谁能说在「红八月」的血腥罪恶中就没有周的一份？恶有大恶、中恶、小恶之分，但纵然小恶也是恶。

事实上正是对制度的破坏，才使得所有的人都置于有可能被迫害的局面。正如崔卫平先生论述到：假如你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某个打倒老干部的决议，尽管内心多么不赞成（笔者注：笔者并不认为周恩来不赞成。），但是并没有阻止这种决议的产生和发挥效用，你会后、事后再力图做出某种补偿，只能是杯水车薪！你保了张三而李四呢？你保了部长级而副部级呢？你保了党内的要人而党外的呢？中南海住满了怎么办？你保了上层而下层呢？在下层发生的并不比上层更不残酷，许多下层的工人农民也一样迫切地需要保护呢？他们怎么办？等你高高在上的周恩来亲自一个一个签字、画押？人命早就没了！早就人头落地了！

二、周恩来是为毛一个人服务的

梁漱淇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毛泽东召集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梁漱淇的话，虽是一家之言，但起码说明，在重大决策过程中，毛泽东的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之后缺不了周恩来这位总理。

在中共高层，唯一能言行如一，真正做到对毛泽东「驯服」的只有周恩来一人。造成的原因则是周恩来对于自己的错误定位。周应该首先是共和国８亿人民的总理，其次才是毛的部下和助手。恰恰相反的是，周后期把自己定位于毛的臣子，而且还是愚忠的那种，所以才会对毛唯唯诺诺，卑躬屈膝。

广义的来说，他做了党的驯服工具；狭义的来说，他成了毛的驯服工具。自毛泽东主持中共大局后，周一直甘当配角，并不遗余力。搞「大跃进」时，他竭力配合过毛；搞「文革」时，周是毛的第一帮凶。　　周恩来不花功夫理国政，把精力都用在为毛出鬼点子整肃其对手上。当听到毛的怒斥声时，便检讨不已，自己给自己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在人们对周恩来的赞誉中，最常听到的话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忍谁之辱？负谁之重？顾谁之大局？对于周恩来来说，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则是维护毛，顺从毛。因此周是忍毛之辱，负毛之重，顾毛之大局，显然不是人民的大局。同时被周恩来「忍」掉的还有人民的利益，或者是说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如果没有周的倾力相助，毛能折腾不起来的。周恩来的所作所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延长了毛泽东的政治寿命，也延长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时间。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中国第一人」，周在其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作用。强权，都是周和与周类似的人捧、惯、纵出来的！从「反『反冒进』」以后到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政治生命的完结，对于毛泽东的每次倒行逆施、出尔反尔，周恩来都是尽量配合。仅以

林彪为例，周恩来揣测毛泽东的旨意，苦口婆心的劝诱林彪骑上虎背。但是当毛林翻脸之时，周恩来则坚决的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很难想象没有周恩来的毛泽东的时代，会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历史不能假设，谁也无法回答。

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表态：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这就是周恩来的跟人政治哲学，无条件的紧跟毛个人，不管毛本人是对还是错。事实上，周恩来从来没有表示质疑过毛的对错。中共政权形似一个「金字塔」。毛泽东是「金字塔」的最顶端，而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其它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权力，周恩来也是其中的一位。周恩来也知道自己的权力都是来自于毛本人，这也是周要紧跟的一个内在原因。

周恩来在建国后，不仅在自己正确的情况下做检讨，而且经常以顾全大局的名义劝别人向毛泽东投降。客观的效果则是周帮助毛制造了党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分裂，无论是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还是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并不反对文革，但是在历史上，周有几次都是靠批前任一把手而巩固地位的。特别是当毛对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做得的报告怀有深深的恐惧时，周就不能不遭到怀疑。周恩来对此也非常明白。当毛泽东越是临近人生的终点，周恩来存留心头上的恐惧越重，因为毛泽东为了杜绝周恩来式的人物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打倒。所以，周恩来就得时不时的向毛泽东表态，让毛泽东感到放心，以示自己的忠诚。例如在１９７２年毛泽东突然晕厥又苏醒过后，周恩来第一句就是「主席，大权还在你手中啊。」周恩来挖空心思想的的并不是国家、百姓，而是如何讨好毛。但是这身后秘密报告之事，却不是毛泽东在生前所能控制的。毛能做的是消灭一切可能的人选。而周恩来则是最可能的人选。因此，无论周恩来如何做，都不可能让毛泽东感到放心。唯一能解除这一双方都恐惧和担心的死结那就是周恩来死在毛泽东之前。周恩来对此或许是明了的，至少在１９７５年夏季就曾经表示了厌世的想法。

三、如果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是否会更大？

许多人用「没有周总理，文革的灾难可能会更大，换做他人，没人做的比周更好」来为周辩护。首先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历史不能假设。这正如现在有人说汪精卫是因为突然间死掉所以曲线救国的大业没有来得及证明一样。现在学者们能做的只是弄清楚周恩来到底做了什么。

对于周恩来所所作所为，是不能用「那是共产党体制」的错，或者是追究罪魁祸首亦即毛的错来为周恩来辩护。如此，周恩来自己亲手迫害、诬陷、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都推到共产党身上、毛泽东身上而一了百了。正如李南央女士在其著作《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所举张志新一案，有人质疑到：割喉管的人无罪，押打张志新的人无罪，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无罪，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对于体制所造成冤案和罪恶，是没有办法对谁起诉的，只能对具体的犯罪执行者起诉，正如二战之后对战犯的起诉一样。因此，对待周恩来的所作所为也应当是如此追究和审视。

为了证明自己对于文革是鼎力支持的，周恩来采取了「灭亲」（是否「大义」却难说清）的行动。包括其干女儿孙维世、亲弟弟周同宇等人被捕，都是周恩来亲手签署的逮捕令。其亲属是否真的有罪，则完全是不在周恩来所要考虑的。对于中央定性的坏人，周恩来也就会将置之死地。这本身就是中共党内斗争的逻辑，作为其中的一个螺丝钉，周恩来也必须这样做。

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在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说：对周总理，我是衷心爱戴的，但也要实事求是，不能把他神化了。他也作了许多违心的事。总理最熟的钱瑛、荣高棠同志，钱的拘捕，总理批过，荣的叛徒帽子是周总理给戴的。人就是人，总是会犯错误的。王明当初要没有周恩来同志，王明上不了台。笔者认为，同样道理，没有周恩来，毛泽东能够为所欲为么？

例如周恩来是文革时期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所有重要的大案、要案都归周恩来管，如刘少奇、罗瑞卿、贺龙，以及后来的林彪项目等。中央的要案均需周恩来的签字、批准，诸如关押、审查、外出提审、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转移、看病、家属探视等，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周恩来对文革中老干部的遭受迫害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中共官方后来为此辩解到：１）周恩来签字不是周恩来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是违背他的本意的；２）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３）更重要的是要看周保护了很多的干部。

但是经过具体研究周在项目组的行为后，笔者认为周所有的签字都不是被迫的。对于是否违背周恩来的本意，周恩来从来没有如此表示过。从一开始组织调查到最后结论的出炉，作为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周恩来没有不得不履行的问题。相反，这些后来被认为受到迫害的人，在当时恰恰被定位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敌人。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具体执行人，周恩来恰恰是自觉履行其必要的职责的，是兢兢业业的。周恩来要执行而且要残酷地执行，没有违心不违心之说，只有执行了和还没执行之分。这也恰恰是中共官方所从不提及的事实。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忍让、服从大局的说法是荒谬的。更何况是，周既然签了字就要负责。

在文革当中，作为毛的决策的最主要的执行人，周恩来带给全中国的灾难远远大于其行使的正常职能所带给国家的正面作用。这个已经由历史证明。那些以周是违心的，被迫的，本身就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如果周是违心、被迫的，那么数十年下来，周恩来岂不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最大的伪君子。而这又是官方所不愿承认的。因此中共在维护周恩来的形像难免顾此失彼。

周恩来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特殊性。例如很多人的定性都是周最早讲出去的。例如对王任重的定性。在我们采访过程中，有人表示当时只相信周讲的，周代表中央么，周讲了出来之后，我们的胳膊就轮的理直气壮了！

还有人为周恩来如此辩解到：周不签，还会有别人签，不会改变受害人被打倒的结果。这如同强盗头子逼你拿刀滥杀无辜，你不但去杀，而且还冠冕堂皇振振有辞：「我不去杀，还会有别人去杀，我不去杀，同样也不会改变受害人被杀死的结果。」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文革的最大帮凶就是周恩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当中，遭到周恩来点名迫害的人达到２００多名以上。对比当时江青、康生的讲话，周恩来的点名远比这两人高的多！在中共高层会议上，周恩来更是对于中共高级将领的往事如数家珍，及时的插话。例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问到：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插话说：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毛泽东又问到：×××呢？（周恩来回答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何方先生在其《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中说》:「至于给我个人，九年干校可以说一无所得。人们会说，你总还是读了一些书吧。我却不以为然。如果不是在政治迫害和思想压力下，换一个真正的学习环境，我相信会读得更多更好。」　同理，如果说周恩来还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保护了一些人，为什么不说如果周恩来能够坚持「反冒进」时敢于对毛泽东说不的精神，那么许多人也就不可能遭受到迫害呢？更不用说，周恩来为了讨好毛，显示自己的「左」性，在外交部大抓特抓牛鬼蛇神、「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对于周恩来的所作所为是应该批判还是存有感激之情，不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么？「没有周总理，文革的灾难性可能会更大，换做他人，没人做的比周更好来为周辩护。」则是不折不扣的歪理了。

周恩来要扮演很多不同的政治角色，但是首要的角色则是要无条件的忠实于毛个人，热衷于吹捧对毛的个人崇拜，千方百计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不折不扣的执行毛的所有指示，大大的扩大了文革的后果。　「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更大」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了。

四、从没有主动地去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谎言

中共建政之后，一旦党内斗争开场，周恩来就决不含糊，立刻就认准了谁是未来的赢家，站在强者的一边，同时巧妙地和注定要倒霉的那一方疏远。事后，周恩来都要痛打落水狗，决不会「丧失立场」，充当毛的第三只手。１９５９年彭德怀一事就为一例，早期王明也为一例，后期「林彪事件」又为一例。随着越来越多的史实披露，周恩来参与迫害的事实即使现在官方也不得不含蓄的承认。虽然中共官方不得不用违心、不得不履行组织手续为其辩护，进而提出如果换做他人，只会比周更糟的谎言。除此之外，挺周派退而求次，提出周恩来从来没有主动的害过一个人。但是这也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言。

文革伊始，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

自１９６７年夏季开始到１９７２开始收尾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则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全国因此受牵连的不下百万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它运动所未有。在这株连甚广、卑鄙残暴，不可宽恕的清查运动中，反对周恩来就是反革命，周恩来同其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现了和江青等人作战在一个战壕的风采。同时，周恩来也借机在外交部等领域铲除异己，清洗对立面。文革结束后，此冤案因为周恩

来的关系竟然没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过，虽然最后证实这是一场人为的打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

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缘起于１９６７年春夏之交的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怀疑一切思潮影响的红卫兵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但是这些红卫兵组织在８月下旬基本上全部被镇压。由于周恩来失责，外交部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情。周恩来把外交部的失控归于「五?一六」反革命的破坏。抓「五?一六」则成了周恩来在外交部扫荡对立面稳定外交部的一个有效和有力的策略。从抓捕王力开始，到整肃陈家康，直至姚登山，周恩来在外交部掀起了腥风血雨。外交部三千个工作人员抓了一千七百个「五?一六」，更甚的是，在１９７２年二十人被周恩来亲自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中，「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是重要的一个口号。

王年一先生说：「打成「五?一六」的人，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严家其认为全国遭受诬陷迫害的有数百万人。　　王力说：「我是作为５１６头子被打倒的。但是项目组审查了１２年多，没有查出我同５１６有任何关系。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１５００万『５１６』分子。」

五、周恩来成为伟人的背后

从逻辑上来讲，当一个国家整个方向错了，乱了那么长时间，给国家造成那么大的灾难，而国家的主要领导却被奉为圣人，真是不可思议！为何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在暴政下唯唯诺诺的宰相或高官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为何我们历史书上就从来没有体谅过处于周类似处境的以前所有时代的那些高官的难处？周恩来成为成为伟人，确实是机缘巧合。

首先是中国文化、道德方面的价值取向问题。周恩来给人的任劳任怨的形象获得了大量普通不明真相的百姓的好感。因为即使现在，很多人还在为邓颖超为周恩来缝补睡衣这一朴素的行为而感动。做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人们对他的要求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平，是否还有人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周恩来的私德在中共高层，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建国以后，周恩来确实没有出现过绯闻。虽然大陆境外有些刊物和书籍论述到周恩来在外面也有女人，但是在笔者看来不足为证。据笔者通过某位知情人的讲述，周恩来在建国后确实在男女关系上相当克制。周恩来也没有什么存款。但是这并不表示周恩来不会享受，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拥有者。

吴法宪回忆：周恩来有一非常漂亮的专列。半夜，吴法宪去找周恩来，发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恩来剪指甲。　　周恩来的漂亮指甲，曾经给尼克松很深的印象。丁盛回忆到，当时广州军区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修了大房子。周有次住了之后，邓颖超告诉丁盛说，周恩来很高兴！　　周恩来在钓鱼台也有自己的一幢办公楼，中共当局在１９７０年也为周恩来在老使馆区的一处别墅装修过。　　但是这些从来在中国大陆内部是提不得的，因此是不为人所知的。

其次，在文革末期，很多人对社会充满了怨恨，但是又无处发泄。周恩来的去世则提供

了很好的一个机会，借悼念之事闹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由于毛以及其扶持的文革派的自作孽，周才在一部分人心中成了反对文革的工具。特别是在１９７６年初，经历过７５年整顿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复，老百姓对当局的怨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当事人在回忆参加当时有名的发生在南京的「三?二九运动」时说：我们２５日的悼念活动是从长江路过去的，后来数学系的同学则是绕道新街口过去的。因为当时官方不允许去悼念，所以我们的这个举动实际上就是在挑衅了，就是一场游行示威了。当时我们这个班去的时候，还没有造成游行示威的印象，但也很受社会上的注意。因为春节放假以后就没有什么人去梅园了，现在一下子５０多人抬着大花圈走过去，就很有影响。梅园新村的管理人员很快接到通知，就把大门关起来不准我们进去悼念。同学们不管这些，有一个同学从墙上翻过去，把大门打开，大家一下子就冲进去了。其实这次活动悼念是假，挑衅是真，是想借悼念故意挑起政治事件。说实在话，当时我们反「四人帮」没有什么新思想，没有提升到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思想高度，只是感觉这个社会太黑暗了，必须放一把火烧一下才痛快。

不可否认，确实有人是真心的去悼念总理，但是「四五事件」前后参与悼念活动的大部分群众是暗含对毛、对文革不满，特别当时的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匿名大字报，直接攻击的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攻击的是张春桥、江青，甚至有的已将矛头指向毛本人。

文革结束之后，不少中共元老开始打着周恩来的旗号反对毛泽东。例如当时刚复出的陆定一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点名的指出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从１９５８年开始直到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才结束。

显然这种选择是一种很无奈的，除了毛之外，还有谁能一直在中共决策层能代表中共？唯有周恩来一人而已。中共无论如何都不能是「洪洞县里无好人」的一个党。

对于周恩来，据海外的文章披露，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陈云、胡耀邦都曾经指出周恩来是有过失的。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也批评过周恩来是没有原则的。

为了所谓「维护」周的形象，中共做的工作并不少。例如那首著名的诗《周总理你在哪里》时，原文是「革命的征途千万里/你大步紧跟毛主席」就被改成「革命的征途千万里/你大步向前不停息」。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周恩来积极投入并支持。正如在文革刚结束文革路线还没有被否定的时候，无数回忆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无人否认这一点，恰恰相反的是，都把周恩来作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坚定不移的忠实执行者来赞扬，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更是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的贯彻毛泽东的每一项关于文革的指示。但是３０年后，这段历史竟然被颠倒，周恩来竟然是被动违心的卷入文革，岂不是咄咄怪事？

中共把文革彻底否定的同时，把文革实际的二把手树立为文革时期「正确」的代表，本身就是荒谬的逻辑。作为文革派的同路人，甚至是文革派的中间力量，中共把周恩来完全从中剥离出去。于是本来是掌控全部高干生死簿，冷血残害同僚的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最后以保护干部的姿态欺世盗名。但是这个这个「光辉形像」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检

验。正如有人评论到：以这样的形像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平怎能提高呢？不充份揭露毛泽东的罪恶，中国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觉醒；同样地，不批判周恩来这样的伪「道德楷模」，就难以激发中国人的道德勇气。

周恩来向来都是审时度势，站在强者的一边。在周恩来看来，政治生命是第一重要的。周恩来从来没有表示过问心无愧，只担心后人在自己的脸上划叉叉而已。

天道恢恢，青史无情。政治宣传从来都是过眼烟云，而历史会记录一切！

后记：写作的起因与致谢——司马清扬

本人最早对文革感兴趣是因为偶然之间对林彪产生了强烈而浓厚的兴趣。当时国外有个比较有名的论坛叫做文学城，讨论历史的地方叫几曾回首。时任版主对林彪表现出极端的仇视。在渐渐讨论的过程中，曾经对于时任版主所讲的事情提出过疑问，但是却遭到极力打压。时任版主从开始的删贴到封杀我「蓑笠翁」的 ID，无一不表现出一个活脱脱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现代版的「独裁者」。毕竟文学城是处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在我和另一个网友「苏门走狗」的合作下，号召大家起来，「打倒独裁者」。结果一举把时任版主扫地出门。同时收获的是对林彪的重新认识。在这期间，我在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林彪的文章，同时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在大量阅读林彪的材料的时候，我逐渐发现一个问题：大量的所谓认为是林彪做的事情实际上不是林彪做的，而是周恩来做的。例如「句句是真理」、在文革中主管军委、文革中的迫害干部等问题，特别是贺龙问题等等。笔者认为有必要正本清源。

另一方面，中共建政后，本应该是従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向，但是实际上却是从革命集团向利益集团方向不断异化，建立政权前向人民的承诺，诸如民主、富强等等等，都一一落空，在此异化的过程中，周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与其同时，毛周关系是从党内同志到君臣关系不断的异化，越到晚年，毛的君王意识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说的就是法,他本人就是天)思想越加强烈，周越来越像毛的家仆与工具，其人格、思想越加矮化。那么周恩来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蜕化，蜕化之后又是如何的表现的呢？真实的过程则是蜕化与表现是相辅相成的。而将周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对毛及对江对文革的态度，则更能体现出周的蜕化之完全。刘、林、邓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满与抗拒。而林彪尤甚。唯独周没有。同林彪相比，周恩来只能在毛泽东的阴影下苟延残喘，最后落得郁郁而终。而林彪的一「飞」，则是石破天惊，刺破了毛泽东的文革神话，使得国人第一次在文革中惊醒，开始反思。而林彪留下的大量的读书札记更是证明了林彪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值得思考的是，周到底是没有思想还是将其隐藏得太深以致外人都看不透？这也是本人动笔的一个起因。本人通过大量的史实认为，周恩来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关键在于经过长期的「自我阉割」或者自我麻醉都会使得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丧失的一乾二净！以致外来的压迫带来的虚幻成为真实的景象。这在生物学上完全可以得到解释。例如周恩来对于毛的崇敬与恐惧而造成的自我矮化，在本人看来就如现代医学证明的经过长期的外界刺激而形成的条件反射一般，完全成为潜意识的行为。

众所周知的是，周恩来是被中共树立为道德楷模的。在国内出版的大量有关周恩来的书，

本人收集了大约近３００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作为官方定论的，例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传》等，也包括《周恩来年谱》。此类书无疑是含有大量可信的史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对于周恩来的很多活动的描述都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对很多事情更是丝毫不提。例如对于周恩来在中央项目组的活动，就甚少提及，即使提及也是只展现其光辉的一面。对于周恩来在众多项目材料上的批语则是提也不提了。第二类是曾经是周恩来的身边工作人员写的关于周恩来的回忆。这类书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特别是文革刚结束但是还没有否定文革的时候，关于周恩来支持文革、支持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大量做法是作为「优秀事迹」来回忆的。第三类就是非正式官方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其特点是打「擦边球」，或者欲言又止。而国外出版的，最为有影响力的或许应当是高文谦先生所著的《晚年周恩来》。此书应当说含有丰富的史料，但是本人认为过于拘泥于周恩来的心理活动探讨。当然还有很多的英文版有关周恩来的书，在此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于是本人就产生了要写一本有关周恩来的书的念头，就是要对官史补遗，期望能够在大众之间塑造一个立体的、完整的周恩来的形象。此念头一起，便一发不可收拾。起笔于仓促之间，写作也完成于仓促之间，因此此书不足之处，必不能避免，错误也必定有之，包括技术性错误。如有提供新的史料加以辩驳或者争论，本人将不胜感谢。这无疑要特别感谢加州大学所提供的良好便利条件，我可以借阅所有有关周恩来的数据－－可以说是从全世界的图书馆中去借阅。当然遗憾之处也必定不少，例如鉴于精力有限，本人无法对周恩来与对外援助、与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的关系等等进行论述，而这些对于认识周恩来无疑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在写作的过程中，认识了很多的对文革、中共党史颇有研究的朋友。文革史专家丁凯文、余汝信、蒋健等就是在几曾回首闯荡的时候认识的，在和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本人深受其益。丁凯文先生更是百忙之中给本书作序，作者不胜感激。本书的两位作者也是这个时候相识的。

网络论坛让人之间的距离缩短。无论是信息的传递还是与人的相识都明显优于传统模式。在２００４年夏季，通过强国军事论坛，我又逐渐认识了张聂尔、京城孤魂、马甲同志、海平００７、相炳、山羊、danbe、书吃等一大批党史爱好者。此军事论坛虽然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其短暂的生涯中，余汝信先生对「她」的评价甚高。特别张聂尔女士，我曾经同她用 QQ（一种网络对话工具）对话多次，获益匪浅。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还认识了舒云女士并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帮助，并有幸当面请教过。同样在我回国路过湖南的时候，也得以向陈益南和杨大庆先生当面请教。

２００７年8月份，我专程前往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去复印「传说中」的程前的《文革漫谈》（即王年一手稿）。在图书馆工作的 Nancy　Hearst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虽然从来没见过王年一先生，但是仍然非常感谢王年一先生。让我感激的不仅是手稿所提供的丰富史料，更是被王年一用那板板正正的字（我称之为是老私塾里训练出来的），一笔一划的誊写在一个个的方格里面的精神所感动。在返程路过纽约的时候，见到了胡平先生。后来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还向胡平请教过。

后来何蜀和吴迪主办了电子杂志《记忆》，我陆陆续续的投了四篇文章。吴迪先生在百忙之中给以精心的修改。通过修改前后稿子的对比，使我学会了如何把文章写的更加精炼、条理更加清楚。何蜀更是对此书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笔者对何蜀和吴迪表示真诚的

感谢。通过《记忆》，我还认识了阎长贵先生，在短短的时间内，书信交流即达几十封。后来我还亲自拜访了阎长贵先生，阎长贵先生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印象。不可忘记的是，在同一行程中，我和金秋到丁东家蹭了一顿饭，和丁东畅谈了几个小时。我也和卜伟华先生电话交流多次，获益匪浅。

《记忆》杂志带给我的还有一位横跨上万里的澳洲的一位朋友，孙万国。２００９年夏季，借孙万国来美国之际，笔者同孙先生就党史中的许多问题交流了看法。随后，我和孙万国去洛杉矶同宋永毅先生见面。宋永毅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对我的写作帮助非常大，节省了大量时间。闲谈之间聊起丁抒。有次我去明尼苏达，恰恰就在我离开之前的前一天晚上，和丁抒联系上了并且用电话聊了两个多小时。虽然近在咫尺，却因临近午夜未能见面，颇为遗憾。

还要特别感谢许多给我提供大量史料的知情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够提供给读者真实的名字。

对于本书所采用照片，因年代久远或者其它原因，没能及时联系到摄影者本人或者版权拥有者，敬请摄影者本人或者版权拥有者通过出版社与作者联系，以便作者支付薄酬。

最后，笔者要特别感谢明镜出版社何频先生，没有何先生的慧眼识珠和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就不会有此书的顺利问世。另外对于在香港负责明镜事务的黄志民先生，笔者也对其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深表感谢。

后记之二：写作的过程——欧阳龙门

司马清扬对各位帮助者的致谢也代表了我本人的谢意。

对于司马清扬提到的多年前在「文学城-几曾回首」网站发生的风波，我本人曾试图做一些调和而未能奏效，于是只好置身事外。

下面我要就本书的写作过程说几句话。

大约五年前，我开始对中共党史感兴趣，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人物和事件感兴趣，开始上网看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文学城 -几曾回首」，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启蒙时期，同时也结识了司马清扬（当时的网名为「蓑笠翁」）以及其它一些网友。当时自己对中共党史的认识基本上是以接受中共官方的政治宣传为主，只是对一些具体问题有质疑。通过和一些网友的交流，通过进一步阅读历史数据，逐渐开始从「接受中共的政治宣传」向「探索客观的历史真实」转变。司马清扬和其它一些人也经历了类似转变。尽管我们在年龄上有很大的差异(我比他空长二十多岁)，在地域上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分别在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但是这个类似的转变过程使我们成为忘年之交，成为本书的共同作者，而且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他常常走在了我的前面。

本书就是对这样一个转变过程的阶段性总结。

其实这种转变是一种趋势。回顾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大陆的作者发表、出版的有关中共党史的文章、书籍，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港台、海外出版发行的，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党史研究中属于「中共的政治宣传」的部分慢慢开始让位于「客观的历史真实」。即使是中共官方的党史，有些作者也试图从在「中共的政治宣传」中或多或少透露一些「客观的历史真实」。趋势当中虽有反复，但总的方向不可逆转。仔细读者可以从我们列出的参考文献中看出这一点。

当司马清扬提出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和他在对周恩来的认识上还有很大的差异。我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对于周恩来的「光辉的一面」留有印象，而对于周的另一面则了解不多。但是我们的共同点是「探索客观的历史真实」。于是我们开始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讨论我们要用到的每一件史实。在收集资料方面他付出了比我大得多的努力，而讨论的过程常常变成他说服我的过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掌握了更多的资料和证据，尤其是原始资料和证据。这就使我们能够跳出政治的、道德的框框，完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事件和人物、来看待周恩来。（司马清扬：完全的跳出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你觉得跳出，仍然会有人认为你是在「抹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我们只能尽可能的跳出，置于文中的部分内容，显然会有很多读者认为过于政治化，特别是结论部分。而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于结论部分尽可能的看淡，而对于史实更加重视，因为即使不同的史实，仍然会有不同的解读。）我衷心地希望本书的读者，尤其是和以前的我类似的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一点。